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上册

ISSN 2436-6471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上册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编辑组 编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2022

『地理言語学研究』モノグラフシリーズ No. 2-1
ISSN 2436-6471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编辑组编
《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上冊）2022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6342364
© 2022 by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発行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発行者：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ウェブサイト：　https://geolinguistics.sakura.ne.jp/
所在地：　東京都渋谷区渋谷 4-4-25　青山学院大学 G1305 研究室

目　录

上 册

致谢 v
岩田礼履歴及び教育実績 vii
岩田礼研究業績一覧 xi

曹志耘：回望路已远——我所经历的中日汉语方言学交流往事 1
石锋：信息-焦点纵横谈：从焦点连续统谈起 9
江海燕：不同功能角色代词在语句中的时长表现 16
王萍、王晓雯：日语音高重音和语调互动关系的实验研究—兼论与汉语声调和语调叠加共现关系的共性和差异 32
髙橋康徳：上海語窄用式変調の再考 52
古屋昭弘，和平 译：关于带巴楼本《正字通》 70
丁锋：慧琳音義中四家文本引《切韻》考 85
橋本貴子：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ける Sanskrit の/v/の音訳について 109
松江崇：揚雄『方言』所収の「北燕」「朝鮮」方言語彙の性質 134
宮島和也：再論秦文字系統中的「於」——試談秦與六國書面語的接觸影響秦文字書寫的一例 151
户内俊介：殷代単位词刍议 165
陳怡君：漢語繫詞「是」的歷史發展——由禪宗語錄《臨濟錄》切入觀察 182
木津祐子：「把」字句から見る長崎唐通事資料 196
ラマール・クリスティーン：“洗手去”（手を洗ってこい）再考：南北対立を超えて 208
王莉宁：汉语方言“漏斗式”的地理演变模式 219
汪维辉、王文香：“长江型词”与汉语词汇史研究 230
铃木博之：滇川藏交界处藏语支语言中的“狗”——相关语音形式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253
秋谷裕幸、汪维辉、野原将挥：说｛狗｝ 264
太田斋：“现在”义词试探 281
李雪敏：汉语“追赶”义词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 293
铃木史己：试论汉语词汇的系统化——以表〈玉米〉义词为例 306
王周明：小议介词语法化进程中“往”与“于、向、到、在”的共现现象 325
竹越孝：語彙交替と文法形式—飲食動詞の変遷を例として— 342

下 册

苏晓青：江苏北部多方言交界地区语言地理学研究概要 1
远藤光晓：根据调类合并归纳出调值演变的方向性——以河北省唐山市一带方言为例 41
黄河：用集成数据分析增加 ABA 分布对语音现象的解释效力 53
周磊、黄晓东：江西湘东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66
黄绮烨：广东潮阳方言连读变调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 79
张勇生、王洁：鄂东南赣语的声调类型及其演变 94
孙建华：延安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 109
孙凯、昂色拉加、桑吉克：玉树藏语（拉布话）反身-强调人称代词的初步考察 129
支建刚：官话方言中 Z 变韵与子尾的并存现象 147
王桂蘭：〈茄燒白〉字類在屏東縣萬丹鄉的語音變體分佈研究初探 156
Hsiao-feng CHENG: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Fujian: The Words for ‘wind’ and ‘maple tree’ 171
李仲民：语言接触中的“类推”与“回避”——以台湾西海岸为例 187
石汝杰：上海市川沙方言音系 198
栗华益：试析闽语入声韵尾的演变 223
大岛广美：畲话的短调 247
徐建：皖西南方言开口一二等韵读齐齿呼现象考察 262
许井岗、汪恒璐：徐州方言古清入字新老变化的性质与特点 277
中野尚美：山西省霊石県北西部の嵌 r 化韻 292
遠藤雅裕：論臺灣海陸客語小稱詞[ə^{55}]的來源 299
胡贵跃：安徽黟县方言的持续体 328
刘艳：山西文水话“V 脱”的句法语义特征考察 337
张盛开：平江各方言中的多功能动态助词 348
崔蒙：“嘎拉哈”小考 376
村上之伸：閩語の“なみだ”を表わす語形について 384
日高知恵実：方言の商業的利用—常州方言トランプの表記を例として— 395
劉乃華、吉村桜子 訳：至る能はずと雖も、然れども心は之れに郷往す—岩田先生との交友回想— 418

致　谢

我是一个平庸的学人，而这次承蒙日本地理语言学会冠以敝人之名编纂“荣休”纪念论文集，并有如此多的友人为此赐稿，深感无上荣幸。

回首我 1971 年进入大学以来所走过的路，是与“幸运”二字分不开的。我努力了，但若没有遇到良师好友，现在的我无从谈起。

首先要感谢的是平山久雄、鲁国尧两位恩师。平山老师在研究方面对我一直十分严厉，我也因此而略有小成，但他同时又亲切待我，并乐于助我，就连我的个人琐事他也关爱有加。鲁老师的热情不同一般，我的连云港方言调查以及亲属称谓研究都是在他的四处奔波安排下才得以实现。鲁老师的指示有时突如其来:“你明天发言吧”、“你要在一周之内提交论文”等等，当初都让我颇为尴尬，但我感觉老师就像个魔术师，使我几乎每次都能获得成功。我年轻时不敢向两位老师如此表白，如今，借此机会向两位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并祝健康长寿。

我田野调查的经验并不丰富，其中最难忘的是 1997 年苏晓青先生带我去连云港地区开展方言调查，我们同甘共苦，在短暂的时间内搜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原始语料，此乃苏先生之功。在学术交流方面，感谢曹志耘先生长期以来对我们研究的信任和协助。他还让我参加了《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编辑工作，虽然我的贡献甚少，但我将这一工作视为我学术上的荣誉。

1975 年，我考入了东京大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当时正值医学部“音声言语医学研究施设”（最终未能升格为研究所，现已废止）最为活跃的研究时期，各种先进的实验设备吸引着我，于是我以文科研究生的身份钻进了实验语音学研究室。我感谢泽岛政行、广濑肇二位教授慷慨地为我提供了纤维镜、EMG（肌电）等工具，而且帮助我进行生理实验。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那里开放而且自由的研究空间。遗憾的是我 79 年去南京留学以后就痴迷于方言的世界里，尽管 89 年又得到了在东大进修半年的机会，但最终没做成有系统性的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有幸直接受到了贺登崧（W.Grootaers）神父的教导，他当时很健康，每年都会骑着自行车跑遍日本各地，对我来说这是极大的幸运。他是属于高本汉时代的学术大家，善于逻辑思考，也深谙中国古典。他不仅教我

语言地理学，也教我一些人生哲学。他的论文集《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在共译者桥爪正子女士无偿的帮助之下得以在 1994 年出版。我不善翻译，而这次之所以敢于挑战，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学习贺神父的思维方式。还记得当我完成了译文的校对工作时，我的一种顿悟之感油然而生（わかった！）。于是便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漢語方言史の不連続性—中国語言語地理学序説”一文，随想随写，而没想到贺神父特意写信夸奖我说，“你这一篇有理论上的创新”。后来马瀨良雄教授也要我的拙作，我当然得意，但同时也汗颜，因为以马瀨先生的学术水平为准，我的这篇小文简直就等于小学生的习作。

1999 年贺神父离开了人间，而他论文集的中译本 2003 年在中国出版。石汝杰先生翻译能力比我强得多，这是中译本在中国获得了很多读者的原因之一，到 2018 年已出了第三版。

1989 年是日本及世界各地都发生社会转变的年头，而正是在这种时间点我把石汝杰先生请到东大的实验室来，拍了他说苏州话时的喉头。这一实验记录后来由石锋先生译成汉语并收入《汉语研究在海外》一书中。我感谢二位石先生长期以来与我的友谊。

另外，与太田斋、平田昌司、古屋昭弘、柯理思、远藤光晓等属于同一年龄层次的友人 1970 年代以来一起切磋学问，这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近十几年来我有缘与不少年轻有为的学者（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分享语言地理学的魅力，这也是我尤为宝贵的经验。

远藤光晓先生是目前日本语言学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这次他在百忙之中筹划这部论文集，实令我不胜感激。我也感谢铃木博之、日高知惠实二位年轻学者承担了编辑工作。

最后感谢这次赐稿的 50 多位友人，与他们相处的欢乐时光仍浮现在我脑海里，令我终生怀念。

2022 年 2 月 10 日

岩田 礼

于小松小屋

岩田礼履歴及び教育実績

学歴

1952年9月	出生（岐阜県羽島郡笠松町）
1971年3月	岐阜県立岐阜高等学校卒業
1971年4月	東京外国語大学外国語学部中国語学科入学
1975年3月	東京外国語大学外国語学部中国語学科卒業
1975年4月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士課程中国語・中国文学専攻入学
1977年3月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士課程中国語・中国文学専攻修了（修士論文題名：中古中国語舌歯音声母の歴史的変化について―特に捲舌音をめぐって」）
1977年4月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課程中国語・中国文学専攻進学
1979年9月	中華人民共和国南京大学留学(在学留学)
－1980年8月	
1980年9月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課程中国語・中国文学専攻退学

職歴

1980年10月－1981年3月	熊本大学文学部助手
1981年4月－1986年3月	熊本大学文学部講師
1986年4月－1996年3月	静岡大学人文学部助教授
1996年4月－1999年3月	静岡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1999年4月－2003年3月	愛知県立大学外国語学部教授
2003年4月－2008年3月	金沢大学文学部教授
2008年4月－2018年3月	金沢大学人間社会研究域歴史言語文化学系教授
2014年4月－2018年3月	金沢大学人間社会学域人文学類学類長
2018年4月～現在	金沢大学名誉教授
2018年4月－2022年3月	公立小松大学国際文化交流学部教授、学部長

学会活動及び国際会議の主催

1992年6月－1993年6月,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
2000年6月－2002年8月	理事
2002年8月	The 11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1, 第11回国際中国言語学学会), 愛知県立大学
2004年4月－2008年3月	日本中国語学会理事
2004年4月－2006年3月	日本中国語学会理事長
2006年4月－2008年3月	日本中国語学会大会運営委員長
2007年11月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日中両国の方言の過去、現在、未来」, 金沢大学連携融合事業「日中無形文化遺産」, 金沢大学文学部
2010年9月－2019年3月	日本音声学会編集委員
2012年3月	「第1回中国方言文化国際学術討論集会」, 金沢大学国際文化資源学研究センター・北京語言大学語言研究所共催, 金沢大学
2014年10月	「首届中国語言資源国際学術研討会」, 北京語言大学語言研究所・金沢大学国際文化資源学研究センター共催, 北京語言大学
2015年11月	「東アジア言語地理学シンポジウム」, 金沢大学人間社会研究域・富山大学人文学部共催, 11月5日:金沢市, 11月7-8日:富山大学
2018年9月	Komatsu Round-Table Conference on Geo-linguistics, 公立小松大学

招待講演、集中講義

1987年3月－4月	南京大学中文系「方言地理学」、「声学实验」
1990年9月	国立清華大学語言研究所「漢語方言地理学的問題」
1994年	広島大学文学部「漢語方言研究」
1995年、1996年	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漢語方言研究」
1997年	埼玉大学教養学部「中国語学概論」
1999年7月	南開大学・全国語言学暑期高級講習班, 青島海洋大学
1999年、2000年	熊本大学文学部「中古音韻」、「漢語方言の音声研究」

2000年12月　京都大学「漢語方言地理学」
2001年12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小型研討会「方言地理學的調查研究及其思想」
2002年12月　静岡大学人文学部「言語地理学」
2006年8月　南開大学・全国高級語言学講習班「方言地理学的调查研究及其思想」，南開大学
2006年11月　日本中国語学会第56回全国大会「汉语方言“明天”、“昨天”等时间词的地理分布及其历史含义」，愛知県立大学
2007年8月　第14回国立国語研究所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世界の言語地理学」(Geolinguistics around the World) “Geolinguistics of Chinese (1): History and Recent Trends”, “Geolinguistics of Chinese (2): Interpretation of Linguistic Map”
2008年12月　北京語言大学語言研究所「《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及相关问题」、「语言地理学对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贡献」
2011年11月　中央民族大学・語言学学術講壇「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及其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应用」
2012年9月　北京語言大学語言研究所「方言词的接触及所指的转移现象」
2013年8月　台湾師範大学地理学系・語言、地理、文化的探究─日本地理語言學大師系列講座「詞彙變化的機制（以漢語為例）」、「語言史的重建（以漢語為例）」
2013年　東京外国語大学
2014年5月　澳門大學中文系学術報告会「漢語方言中詞語的牽引現象」
2014年9月　東京大学文学部「漢語方言地理学」
2014年12月　中山大学(高雄)・兩岸語言多視角比較研究群聚會，「《漢語方言解釋地圖》的邏輯思考」
2015年8月　第六届嶺南漢語方言研究的理論与実践研究討会暨第三届地理語言学培訓班（広東・暨南大学漢語方言研究中心主催）「《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的逻辑思考」，広東省羅定職業技術学院
2016年7月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24)「类推与牵引对词汇变化的作用－以汉语方言的时间词为例－」，北京語言大学
2016年8月　日本地理語言学専家中国大学巡回講座「汉语方言中词语的牵

	引现象」，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7年1月	中日理論言語学研究会「山西省周辺の方言伝播ルートについて―セミの語形を例に―」，同志社大学
2018年6月	韓国中国語言学会春季学術研討会「词源的探讨和语言地理学」，ソウル大学
2018年9月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回顾地理语言学及有关研究的发展」、「词源的探讨和语言地理学」
2019年9月	日本中国語学会・中国語学セミナー「漢語方言における語彙変化の特徴―時間詞二題―」，東京大学本郷キャンパス

国内の非常勤講師歴

八代高専、佐賀大学、愛知大学、愛知教育大学、神田外語大学、岐阜市立女子短期大学、岐阜聖徳大学、椙山女学園大学、名古屋学院大学、筑波大学

海外の大学の客員教授

2010年～北京語言大学客座教授

2011年～南京大学方言与文化研究所兼職教授

海外の若手研究者（博士課程大学院生）受入れ

1. 金沢大学連携融合事業「日中無形文化遺産」による短期研修プログラム（2008 年度～2010 年度）
   北京語言大学 3 名、蘇州大学 1 名、ほか 1 名
2. 日本学生支援機構(JASSO)による長期研修、短期研修プログラム
   長期(2009 年度、2010 年度)：北京語言大学 2 名
   短期(2012 年度～2014 年度)：北京語言大学 4 名、台湾師範大学 2 名、南開大学 1 名、浙江大学 1 名、北京大学 1 名

岩田礼研究業績一覧

Ⅰ　著書・論文

A. 方言学１（狭域、江蘇省連雲港地区）

A-1 连云港市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1982年第4期, pp.285-296.

A-2 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県での方言調査(一)(二)(補),《均社論叢》11～13号，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11号: 1982年5月, pp.8-28；12号: 1982年11月, pp.1-32; 13号:1983年5月, pp.20-25.

A-3 赣榆·青口方言声母近几十年的语音变化,《中国語学》230号，日本中国語学会，1983年，pp.145-150.

A-4 江蘇省･連雲港方言の音韻体系(Ⅰ)(Ⅱ)(Ⅲ)(Ⅳ),《アジア･アフリカ文法研究》, 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以下“AA研”と略称）, No.12: 1983年, pp.129-146; No.13: 1984年, pp.31-60; No.14: 1985年, pp.57-75; No.15: 1986年, pp.57-76.

A-5 方言境界地域に於ける新語形の発生とその成因…中国江蘇省東北部地域に於ける言語地理学の試み(Ⅰ)…,《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28，AA 研，1984 年，pp.100-118.

A-6 身体語彙の体系と語形変化…中国･江蘇省東北部地域に於ける言語地理学の試み(Ⅱ)…,《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30，AA 研，1985 年, pp.62-176.

A-7 赣榆县石桥乡方言的声调（初探）,《開篇》Vol.4, 早稲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 1987年，pp.9-19.

A-8 赣榆・青口方言（新派）的连读变调,《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37, AA研, 1989年, pp.221-236.

A-9 赣榆･罗阳乡方言的入声－兼论赣榆方言入声的历时演变,《中国語学》239 号, 1992 年，pp.164-171.

A-10 江苏省连云港地区方言的语言地理学研究概要,《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pp.243-259.（共著：岩田礼、苏晓青）

A-11　方言地図の作成とその解釈，《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紀要》第 7 輯，2003 年，pp.1-32.

A-12 矫枉过正在语音变化上的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pp.1-7.（共著：岩田礼、苏晓青）

A-13 Homonymic and Synonymic Collisions in the Northeastern Jiangsu Dialect - On the formation of geographically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s – ,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ese and its Neighboring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ng-hsin Ti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W-6, Academia Sinica, 2006, 1035-1058.

A-14 方言边界上的存古现象：以江苏连云港地区的入声为例, 《開篇》Vol.27, 2008年，pp.186-196.（共著：苏晓青、岩田礼）

A-15 聲調調值演變的微觀探討：以江蘇東北角的方言爲例，《語言時空變異微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 49，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2012 年，pp.225-251.

B. 方言学２（広域、全国） *太字は著書

B-1 言語地図と文献による語彙史の再構…“ひざがしら”の狭域的/広域的言語地図を中心に,《伊藤漱平教授退官記念中国学論集》, 汲古書院, 1986年, pp.47-72.

B-2 江蘇･安徽両省における親族称謂形式の地理的分布と古称謂体系の再構, 尾崎雄二郎・平田昌司編《漢語史の諸問題》,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 1988年, pp.207-272.

B-3《中國江蘇·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親屬稱謂詞的地理分佈》,《開篇》単刊 No.1, 好文出版, 東京, 1989 年, 89p.

B-4 漢語方言史の不連続性―中国語言語地理学序説, 《人文論集》45-2, 静岡大学, 1995年, pp.43-77.

B-5 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pp.203-210.

B-6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Chinese Dialects - Project on Han Dialects (PHD)-,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Vol.24-2, EHESS-CRLAO, Paris, 1995, 195-227.

B-7 A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Databas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ese Dialect Geography, *Quantitative and Computational Studies on Chinese Languag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79-94.

B-8 The Jianghuai Area as a Core of Linguistic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A Case of the Kinship Term “*ye*爷”,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Academia Sinica, 2000, 179-196.

B-9 長江流域における Sibilants 声母体系の一類型,『佐藤進教授還暦記念中国語学

論集』，好文出版，2007 年，pp.303-313.

B-10 方言接觸及混淆形式的產生—論漢語方言「膝蓋」一詞的歷史演變,《中国語言學集刊》(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HKUST), 第1卷第2期, 2007 年，pp.117-146.

B-11 汉语方言〈明天〉、〈昨天〉等时间词的语言地理学研究，《中国語学》254 号，2007 年，pp.1-28.

B-12 中国の言語地理学：歴史、現状及び理論的課題，《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紀要》第 11 輯, 2008 年, pp.1-25.

［中译］王曹杰译〈汉语方言地理学—历史、现状与理论课题〉，萧红主编《中国语言地理》第一辑，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2017 年，pp.154-173.

B-13 从"疟疾"的方言地图看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南大语言学》第三编，2008年，pp.165-182.

B-14《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東京，2009年，341p.（岩田礼编）

B-15 Chinese Geolinguistics: History, Current Trend and Theoretical Issues, *Dialectologia*, Special Issue 1, Universitat de Barcelona, 2010, 97-121.
http://www.publicacions.ub.edu/revistes/dialectologia1/

B-16 北方方言-lə-中缀及 kəʔ-前缀的来源—〈腋〉义词的方言地图，严翼相主编《中国方言中的语言学与文化意蕴》，韩国文化社，Seoul，2011 年, pp.8-38.

B-17 论词汇变化的非连续性,－类音牵引和同音冲突二例－,《语言教学与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11 年第 5 期, pp.20-29.

B-18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好文出版，東京，2012 年，184p.（岩田礼编）

B-19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紀要》第 12 輯，2013 年，pp.1-22.（共著：岩田礼、刘艳）

B-20 汉语方言中的"口水"和"唾沫"，《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紀要》第 13 輯，2014 年，pp.11-24.（共著：徐建、岩田礼）

B-21 語彙変化に関わる言語地理学的要因の再検討,《方言の研究》3，日本方言研究会，2018 年，pp.185-216.

B-22 方言地图九幅--"伯父""伯母"等亲属称谓在苏皖沪的地理分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2 卷第 6 期，2018 年，pp.45-53.［B-3 的缩略版，由于原书已绝版，故作之。］

B-23 漢語方言における語彙変化の特徴：類推の役割，《国際文化》第 2 号，公立小松大学国際文化交流学部，2020 年，pp.3-27.

B-24 Parallelism in lexical change across languages: The case of time words in Chinese and French,《地理言語学研究》*Studies in Geolinguistics* 1．日本地理言語学会，2021, 123-141.

C. 音声学・音韻論

C-1 Fiberoptic Acoustic Studies of Mandarin Stops and Affricates, *Annual Bulletin, RILP* (Research Institute of Logopedics and Phoniatrics), No.10,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okyo, 1976, 47-60.（共著：岩田礼、廣瀬肇）

［中译］ 王萍译〈汉语普通话塞音和塞擦音光纤及声学研究〉,《南开语言学刊》, 南开大学文学院，2019 年第 1 期, pp.1-11.

C-2 舌歯音二等声母の非捲舌化について，《中国語学》225 号，1978 年，pp.9-19.

C-3 音韻変化と音素（音節素）の頻度－中国語捲舌音をめぐって,『言語学演習'78』, 東京大学大学院柴田ゼミ，1978 年，pp.156-170.

C-4 Laryngeal Adjustments of Fukienese Stops …Initial Plosives and Final Applosives, *Annual Bulletin, RILP*, No.13, 1979, 61-82.（共著：岩田礼、澤島政行、廣瀬肇、新美成二）

C-5 Laryngeal Adjustments for Syllable-Final Stops in Cantonese, *Annual Bulletin, RILP*, No.15, 1981, 45-54.（共著：岩田礼、澤島政行、廣瀬肇）

C-6 An Acoustic Study of Tone, Tone Sandhi and Neutral Tone in Lian-Yun-Gang（連雲港）Dialect of Chinese, Annual Bulletin, *RILP*, No.16, 1982, 37-50.（共著：岩田礼、今川博）

C-7 南部中国語の音節末閉鎖音,《言語研究》87 号，日本言語学会，1985 年，pp.21-39.

C-8 Syllable final “glottal stop” in Chinese dialects -- A fiberoptic and electromyographic study, Annual Bulletin, *RILP*, No.24, 1990, 19-40.（共著:岩田礼、廣瀬肇、新美成二、堀口利之）

C-9 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尾的歷時變化,《第一屆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会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pp.523-537.

C-10 声調言語におけるピッチの“上げ”と“下げ”について―タイ語、蘇州語の筋電図，《音声研究》第1巻第3号，日本音声学会，1997年，pp.14-22.

C-11 北京和連雲港方言的“高降輕聲”及其歷史含義，王旭等編《第五届漢語語言學

国際研討會論文選集》，台灣・文鶴出版，1999 年，pp.139-164.

C-12 Tone and Accent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In Shigeki Kaji ed.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 Tonogenesis, Japanese, Accentology and Other Topics*, ILCAA, Tokyo, 2001, 267-291.

C-13 中国語の声調とアクセント,《音声研究》第 5 巻第 1 号, 2001 年，pp.18-27.

C-14 汉语方言词声调的形成及发展, 石锋、沈钟伟编《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pp.192-202.

C-15 Chinese tonal neutralization across dialects: From typological, geographic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Kubozono, Haruo and Mikio Giriko eds. *Tonal Change and Neutralization*,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Series 27, DE GRUYTER MOUTON, Berlin, 2018, 156-199.

C-16 Tone and accent in Asia. Endo, Mitsuaki, Makoto Minegishi, Satoko Shirai, Hiroyuki Suzuki, and Keita Kurabe eds.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HITUZI SYOBO Publishing, Tokyo, 2021, 232-236.

C-17 吴闽方言连读变调的类型及其历史溯源,《方言比较与吴语史研究——石汝杰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西书局：上海，2022 年刊行予定.

Ⅱ　翻訳

1. 《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 W.A.Grootaers著，岩田礼、橋爪正子共訳, 好文出版，1994年.
2. 《汉语方言地理学》 贺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2012年；修订版，2018年.［上記1の中国語訳］
3. 《汉语方言地图集》前言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Ⅲ　書評

1. 读《山东方言志丛书》六种, 《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pp.236-240.
2. Laurent Sagart *Les Dialectes Gan* (贛方言研究),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Vol.25-1, EHESS-CRLAO, Paris, 1996, pp.151-157; 平田昌司編《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 4》, 平成 5 年度～7 年度科学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 1996 年, pp.71-82.
3. 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语言学论丛》, 北京大学, 第 43 辑, 2011 年，pp.352-371.

Ⅳ　辞典の項目執筆

1.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ditor-in-Chief: Rint Sybesma, Brill, 2017, 執筆担当項目：Dialect/Language Atlases of China, 35-37; Dialect Geography (Geo linguistics), 61-68.
2. 《汉语方言学大辞典》, 詹伯慧、张振兴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執筆担当項目 :《漢語方言地理学》、《日本言语地图》、《苏州方言地图集》、《宣化方言地图》、贺登崧、柯理思(Christine LAMARRE)、平山久雄、楊福綿(Paul Fu-mian Yang).
3. 《中国語学辞典》, 日本中国語学会編, 岩波書店, 2022 年 10 月刊行予定, 執筆担当項目：単音・音節（朱春躍、岩田礼共著、以下すべて単著)、ストレス・軽声、語声調、喉頭特徴、上声（3 声）変調、連読変調、調音結合、分節音・超分節音、発声類型、声調環流説、方言伝播、等語線、地理的分布の型.

Ⅴ　科学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編著)

1. 《漢語諸方言の総合的研究》三分冊, 第 1 分冊「研究篇」, 第 2 分冊「漢語方言資料地点別リスト［附 80 年代漢語方言資料目録(稿)］」, 第 3 分冊「漢語方

言地図(稿)」，岩田礼編，平成 1－3 年度科学研究費総合研究(A)，研究代表者：岩田礼，1992 年.

2. 《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2)：漢語方言地図集》，岩田礼編，平成 5－7 年度科学研究費総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平田昌司，1995 年.
3. 《中国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5)：漢語方言地図集(第 3 集)》，岩田礼編，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暁，1999 年.
4. 《漢語諸方言における語声調の実験音声学的研究》，岩田礼編，平成 16－18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C)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岩田礼，2004 年.
5. 《中国語方言の言語地理学的研究―新システムによる「漢語方言地図集」の作成―》三分冊，第 1 分冊「研究成果の概要」，2005 年，第 2 分冊「方言地図とその解釈(1)」，2006 年，第 3 分冊「方言地圖及其解釋(中文版) ［附 研究成果概要］」，2007 年，平成 16－18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B)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岩田礼，2005-2007 年.
6. 《中国語方言における tone sandhi 生成メカニズムに関する通時的研究》，平成 25－27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C)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岩田礼，2016 年.
7. 《語史再構における言語地理学的解釈の再検討―類型的定式化の試み―》，平成 28－3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B)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岩田礼，2020 年.

Ⅵ 学術会議 Proceedings、科研研究成果報告書、一般誌等掲載研究、近年の主要学会発表

1. 無気音と有気音の発音について，《JIAOXUE7》，日中学院，1979 年，pp.28-32.
2. 福建語子音の音声生理学的特徴，《音声研究会資料》S79-17，日本音響学会, 1979 年，pp.125-132.（共著:岩田礼、沢島政行、広瀬肇、新美成二）
3. 中国語諸方言に於ける音節末“Glottal Stop”について，《音声研究会資料》SP89-150, 電子情報通信学会，1990 年，pp.63-70. (共著:岩田礼、広瀬肇、新美成二、堀口利之)
4. Syllable final stops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 Southern Chinese, Thai and Korean -, *Proceedings of 199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Kobe, 1990 年, pp.621-625.（共著：岩田礼、広瀬肇、新美成二、澤島政行、堀口利之）
5.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of ‘Breathy’ phonation in a Chinese dialect - A Fiberoptic and

Electromyographic study on Suzhou dialect –, *Proceedings of XII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netic Sciences,* Aix-en-Provence, France, 1991, Vol.3, pp.162-165.（共著:岩田礼、廣瀬肇、新美成二、堀口利之）

［中译］石锋、李智強译〈苏州方言浊声母发声的生理特征〉，石锋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出版社，1995年，pp.48-58.

6. 中国語方言の地理学的研究,《しにか》No.4，大修館書店, 1992 年, pp.37-43.
7. 漢語諸方言の言語地理学的研究－PHD（Project on Han dialects）の概要と結果－,《日本方言研究会第 55 回研究発表会発表原稿集》1992 年，pp.27-36.
8. 捲舌音声母方言データベース（RTFL）の作成とその結果--コンセプト、仕様、方言地図作成への応用--，遠藤光暁編《中国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3）：漢語方言学論文集》，科研費研究成果報告書，1998 年，pp.1-17.（共著：岩田礼、佐藤進、大嶋広美、石崎博志、更科慎一、萩原裕敏、松江崇、村上之伸）
9. 方言を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する：中国における方言調査の実例,《しにか》No.5, 1998 年, pp.55-61.
10. Comments on Prof. Shi's Paper: 'A Tone sandhi in Chinese northern dialects', In Shigeki Kaji ed.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 Tonogenesis, Typology, and Related Topics*, ILCAA, 1999, pp.121-125.
11. 現代漢語方言の地理的分布とその通時的形成，遠藤光暁編《中国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7)：言語類型地理論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科学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 2000年，pp.5-49.
12. 江苏东北部方言的语音变化，《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2000年, pp.372-380.（共著：岩田礼、苏晓青）
13. 地図及び解説：項目6ハト、項目12クモ、項目17トンボ、項目18コウリャン、項目19トウモロコシ；論考：コウリャン関連語幹をめぐる諸説，太田斎編《漢語方言地図集（稿）》第4集，科研費研究成果報告書《歴史文献データと野外データの綜合を目指した漢語方言史研究》第３分冊，2004年.（共著：岩田礼、中山里美他）
14. Comments on "The Tone-Syntax Interface in Chinese: Some Recent Controversies" by San Duanmu, In Shigeki Kaji ed.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ne-Syntax Interface, and Descriptive Studies*, ILCAA, 2005, pp.255-267.
15. 閩語連讀變調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第十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成功大学，台南，2014年.

16. Articulation of phrasal stress in Mandarin Chinese, 日本音響学会2015年秋季研究発表会, 2015年, 会津大学.（共著：岩田礼、Donna, Erickson、末光厚夫、澁谷良穂）
17. Typology of Chinese Tone Sandhi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 Mitsuaki Endo ed.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VII "Tone and Accent", Report of ILCA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2016, 66-76.
18. Contrastive Geo-linguistics: its purpose and method, *Methods in Dialectology* 16, Workshop 4 'Contrastive Geolinguisitics', 2017, Ninjal （国立国語研究所）.
19. 词汇的创新与方言之间的距离（试探），汉语方言比较和地理研究论坛，2018年，陕西师范大学.
20. Lexical Innovations in Chinese Basic Words : a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IACL-27, Workshop 'Phylogeny, Dispersion, and Contact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Human Groups',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9.（共著：岩田礼、植屋高史）

Ⅶ　序文

1. 郭风岚《宣化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序一，语文出版社，2007 年.
2. 刘艳《山西文水及边界地区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序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3. 洪惟仁《台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理論與方法》岩田序，前衛出版，2019 年.
4. 支建刚《豫北晋语语音研究》序，中西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年.

Ⅷ　専門教育用サブテキスト

1. 中国語学習者の為の発音の手引き,《昭和 63・平成元年度教育方法等改善経費報告書》, 静岡大学人文学部, 1990 年, pp.42-50.
2. 古代中国に於ける辞書の形態とその役割, 平成 6 年度特定研究《言語文化の歴史的発展に果たした辞書の役割に関する特定研究》, 研究成果報告書(Ⅰ), 静岡大学人文学部言語文化学科, 1995 年, pp.23-32.
3. 切韻の成立, 平成 7 年度特定研究《言語文化の歴史的発展に果たした辞書の役割に関する特定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Ⅱ)》, 静岡大学人文学部言語文化学科, 1996 年, pp.29-40.
4. 中国方言文化資源の保存と活用, 森雅秀編《文化資源情報論》２, 金沢大学人間

社会研究域附属国際文化資源学研究センター，2012 年，pp.99-109.

5.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Geography, 金沢大学人間社会環境研究科人文学専攻学際総合プログラム，E-learning 教材，2013 年.
6. 中国における「方言」－境界と越境－,《言語文化の越境、接触による変容と普遍性に関する比較研究》，金沢大学人間社会学域人文学類，2017 年，pp.11-34.

Ⅸ その他

1. 国際中国語言学学会第 11 回大会，*Annual Report* No.16, The Murata Science Foundation, 2002 年, pp.304-305.
2. 『漢語方言地図集』と曹志耘さんのこと,《東方》338, 2009 年, pp.2-5.
［中译］石汝杰译〈关于《汉语方言地图集》和曹志耘的二三事〉,《南大语言学》第四辑，2012 年，pp.303-307.
3. 中国の方言研究はなにをめざすか？－「首届中国地理言語学暨中日方言保存利用国際学術研討会」報告,《日本中国学会便り》第 1 号(通巻第 19 号)，日本中国学会，2011 年.
4. 特集「アジア東部諸言語の喉頭特徴」まえがき,《音声研究》第 15 巻第 2 号, 2011 年，pp.38-39.

回望路已远

——我所经历的中日汉语方言学交流往事

曹志耘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我是 1978 年考入山东大学的。那时中国刚对外开放，已有少量国外留学生来到中国。我们班里就有好几位来自欧美的学生。日本是从 1979 年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当今日本很多著名的汉学家就是那个时期来中国留学的。

到山东大学来的是太田斋先生。太田（我们平时对年龄相仿的日本同行都只称姓，本文保持这一习惯）是“高级进修生”，所以他并不随我们本科生一起学习。因为他的研究兴趣是汉语方言学，学校请钱曾怡老师担任他的指导教师。钱老师也是我的导师，所以太田算是我的学长。

记得太田住在山东大学老校的一座留学生楼里，我曾经去他那儿找过他几次。他送给我一份日本人编制的词汇调查表，后来我用它去调查记录汤溪大坑的畲话。他也选修一些语言学方面的课程，例如殷孟伦先生、殷焕先先生的课，当然还有钱老师的课，所以我也经常跟他一起听课。太田给我的印象是学习非常努力。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他竟然把钱老师的《烟台方言报告》手稿从头到尾手抄了一遍，这着实让我们惊讶。他还在钱老师的带领下去胶东等地调查方言，我当时还在读本科，无缘一起参加。据说调查时成天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陪同”，连外出散步也不例外。太田的调查非常细致，他对方言中那些特殊的音变现象特别关注，后来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

太田回国后去了东京都立大学任教，后来转到神户市外国语大学。1995 年发生阪神大地震，太田家的屋顶被震塌，据说他就那样头顶着蓝天，继续专心地伏案研究。后来我曾去过太田家里，他的书房在学界号称“太田文库”，那是密密麻麻的几十个大书架，地上装着轨道，每个书架都可在上面来回移动。这又让我大吃一惊。

1981 年，我写了一篇论文《汤溪话的几个语音问题》，这也是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我拿这篇论文参加了山东大学的一个学生学术活动，结果获了奖，论文被收入山东大学的《一九八一年“五四”学生科学讨论会得奖论文集（社会科学版）》。太田把这篇论文带回日本，被平田昌司先生看到了。平田很感兴趣，不久后就写了一篇题为《吴

语帮端母古读考》的长文，分上下两部分发表在日本《均社论丛》第 14 期（1983 年）和第 15 期（1984 年）上。有意思的是，那个杂志上的文章都是由作者自己手写后再复印而成的，平田那工整娟秀的字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3 年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我首次见到平田。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了严州方言的调查研究。1994 年 9 月，平田通过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项目邀请我去日本访问。在短短三周内，我先后访问了静冈大学、国立国语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筑波大学、青山学院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大阪外国语大学、关西大学等，做了四次学术演讲，结识了很多研究汉语的专家，包括岩田礼、柯理思、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等先生。古屋昭弘先生还好心地提出将我的严州方言研究成果作为他主编的《开篇》的单刊之一。经过两年多的实地调查（当时在大阪外大任教的胡士云先生也参加了调查），《严州方言研究》一书于 1996 年在日本好文出版出版。这也是我的第一部方言学专著。

自 1993 年起，平田组织我、刘丹青、冯爱珍、赵日新、木津祐子、沟口正人、谢留文、刘祥柏等人一起参加“新安江流域语言文化调查计划”。其中木津是平田的同事，沟口则是名古屋市立大学建筑学专业的老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徽州方言研究》一书也于 1998 年在好文出版出版。我虽然没有承担徽州方言的调查任务，但始终参与了书稿的研讨和编辑工作。在 1997 年、1998 年那段时间，我和平田的通信联系极为频繁。为了避免邮件丢失或混乱，我们使用《广韵》的韵目来给邮件编号。1998 年 1 月 13 日凌晨 1 点 55 分，平田发给我的邮件里写道：“一先至五肴都收到。这一基本工程即将完成，感触至深。一晃眼 18 年，已经是人生的四分之一了。”在该书的后记里，平田也曾说“这本书的撰写真正做到了日中国际合作研究。从分工到讨论、改稿，大家都认真，气氛很融洽，整个过程是非常愉快的。”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

平田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也是一位具有战略思维的学者。他除了组织“新安江流域语言文化调查计划”以外，还与张双庆、李如龙等先生一起发起了“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计划”。该计划持续开展了十几年，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出版了《动词的体》《动词谓语句》《介词》《代词》等一批著作。他利用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三菱基金会等项目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中国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我第一次去日本，他便安排我去国立国语研究所，考察他们绘制方言地图的情形，今天想起来，似乎也和我们后来编写《汉语方言地图集》有着某种联系。

去国语所是由岩田礼先生陪我去的。1994 年岩田还在静冈大学任教，我到日本的第一站便是静冈，岩田开车带我游览了静冈登吕的水田遗址。在岩田的研究室里，

我看到他从电脑里打印出几张汉语方言地图，记得其中有一张是“儿子”一词的图。当时国内学者连电脑都很少，更不用说用电脑画地图了，我感到十分新奇。在静冈大学的会议上，日本学者们讨论了《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编写问题，那是平田昌司先生主持的“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岩田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就开始画地图了，日本学者绘制汉语方言地图也是从岩田的项目开始的。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日本学者围绕汉语方言地图开展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连续性研究，其中主要的研究项目及其相关成果有：

研究项目	研究期限	主持人	相关成果	编者	印行时间
漢語諸方言の総合的研究	1989-1991	岩田礼	漢語方言地図（稿）	岩田礼	1992
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	1993-1995	平田昌司	漢語方言地図集	岩田礼	1995
中国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	1997-1999	远藤光晓	漢語方言地図集（稿）第 3 集	岩田礼	1999
歴史文献データと野外データの綜合を目指した漢語方言史研究	2001-2003	太田斎	漢語方言地図集（稿）第 4 集	太田斎	2004
中国語方言の言語地理学的研究	2004-2006	岩田礼	1.方言地図とその解釈	岩田礼	2006
			2.方言地图及其解释（中文版）	岩田礼	2007
			3.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岩田礼	2009
			4.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	岩田礼	2012

自 1979 年来华留学至今，岩田几十年如一日，在汉语地理语言学这个冷门的领域里辛勤耕耘，编写了一本又一本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初稿，最后终于在以往多种地图集的基础上编写出了《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及其续集，并正式出版。他简直是具有“神父般”的精神。

的确，除了编写地图集以外，岩田还继承了贺登崧神父的使命，努力地向中国语言学界传播地理语言学的思想。他先是把贺登崧神父的有关论文从法文翻译成日文，

再和石汝杰先生一起从日文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即《汉语方言地理学》）。他也积极组织和参与地理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例如和我们一起举办了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 年，北京）、首届中国方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 年，金泽），并在金泽大学申请设立了接受中国学生赴日学习地理语言学的项目，我的多名学生都曾藉由该项目得到岩田以及其他日本老师的指导，黄晓东、王莉宁、张勇生、支建刚还有幸参与了解释地图的编写工作。

当然，我们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是《汉语方言地图集》。要画方言地图，绝对不能没有岩田的指导和帮助。使我们深感荣幸的是，岩田俯允担任了《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编委。岩田多次参加地图集的编写工作会议，并从他的角度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不乏与我们相左的意见，无论哪种意见，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岩田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地图集的意义重大，可以与《法国语言地图集》、《德国语言地图集》等驰名世界的著作相媲美。《日本语言地图》从开始预备性调查到完成，花费了 20 年时间。其他国家的地图集，有的甚至耗费了 30 多年时间。而曹先生率领的团队只用了 7 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伟业，就像刚才各位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他们废寝忘食、努力奋斗的结果。（岩田礼 2009，石汝杰译）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使我想起 2007 年 11 月，我和几位同事去金泽大学参加岩田主办的“日中两国方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会后到了大阪，我让没来过日本的同事去京都转转，自己则窝在南千里 Hotel Mare，拼命地做着地图集条目的分类工作。从房间的窗户往外，可以看到幽静的湖面和美丽的红叶，但无暇走出一步。那段时间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不过说到进度，实际上主要仰仗于数据库和绘图软件。记得岩田带我去国语所时，看到工作人员仍在用橡皮的符号章绘制《方言文法全国地图》，岩田还热心地对我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买一套。”

如果说岩田是“地图派”，那么秋谷裕幸先生是“田野派”。秋谷无疑是日本学者中调查汉语方言最多的人，甚至超过很多中国的方言研究者。我应该也是 1994 年那次访日时认识秋谷的，当时我们谈到了去浙闽交界地区调查方言的想法。1996 年 8 月，我们第一次一起做田野调查，地点是庆元，位于浙江省最南端，与福建松溪、政和、寿宁等县交界。庆元方言非常特殊，保留很多与闽语相同的特点。后来我们合写了一篇《浙江庆元方言音系》，发表在《方言》上。此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研究，一起调查了浙江庆元、云和、常山、汤溪珊瑚和江西广丰、南丰等地方言，共同编写出版了《吴语处衢方言研究》《吴语婺州方言研究》。秋谷也参加了《汉语方言地图集》的项目，亲自调查了 29 个点。

1997 年夏天浙江云和方言的调查，太田也去了。关于那次调查，我写过一篇笔记，收在《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一书的末尾，其中写到我们三人谦让“你先‘死’”的趣事。结果，凡是看到这本书的读者总要对我说：“里面的调查笔记很有意思！”但没有一个人说里面的方言现象有意思。

秋谷长期在爱媛大学法文学部任教，这个“法文”并非法语，而是法学和文学的意思。由此可见在这个学校文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而中国语言文学就更没几个教师了，至于专门研究汉语的学者除了秋谷估计没有别人。在偏远的四国，秋谷几十年如一日，凭一己之力把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做得具有国际影响，可想而知是多么不容易。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确实令人敬佩！

在“一个人的”方言学王国里，秋谷先是靠打乒乓球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后来又改成了跑马拉松。秋谷还有个爱好就是喝酒，这在中国同行中也颇有影响。他曾经去我老家，跟我父亲两人用大碗对饮，其豪迈气概多年来为村民所称道。

秋谷除了自己坚持不懈地往中国各地农村跑以外，也邀请了很多中国同行去松山交流，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时间精力。我先后去过三次松山，前两次是为了编写《吴语处衢方言研究》，第三次是为了编写《吴语婺州方言研究》。 第三次是在 2004 年，也是我最后一次去日本。为了纪念松山之行，我写了一篇《松山的朋友》（见附录）。

这次的工作任务相对较轻松，所以在此期间还去了京都、东京、金泽等地参加了多个学术会议。其中有一次是去青山学院大学，参加远藤光晓先生主持的研讨会。会后，应刘勋宁先生之邀，我们先去参观了美丽的筑波大学。然后由远藤开车，带着我和秋谷从东京直奔他位于神奈川相模湖的家。那里是一个陡峭的山坡，远藤家的别墅就建在悬崖上面，四周湖光山色，层林尽染，宛如世外桃源，美得令人窒息。不过，更让我感到震撼的则是远藤的书库。太田的书库是可以来回移动的，远藤的书库则是立体的。他把地上地下打通，好几层全用于放书。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世界各国的语言地图，我觉得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看到这么多的方言地图集了，征得远藤的同意后，我拍了不少地图集的照片。

远藤是一位具有敏锐思想和开阔视野的学者。他精通多种外语，开车的途中还在学习泰语。前些年他一直在主持名为“东亚语言地图”的国际性科研计划，并多次邀我参加研讨。只因我深陷语保工程的工作，已无力分身，未能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合作，实感遗憾。

最后，我必须提到古屋昭弘先生。也许是长相的缘故，也许是姓氏里有个“古”字，古屋总给人以长者的模样，所以我不太敢跟他随意交往。古屋也是一位君子型的

学者，几十年间他一直用个人薪水支撑出版《开篇》杂志，这份杂志为中国语言学尤其是汉语方言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好几部专著也是以《开篇》单刊的名义出版的。想到默默奉献的古屋，我不禁有些内疚的感觉。

除了《开篇》外，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中国语学》杂志。在《汉语方言地图集》出版之后，该杂志立即开辟专栏加以介绍，太田斋、柯理思伉俪还分别发表了长篇书评。我本人也曾在上面发表过汤溪话否定词的论文。

时光荏苒，人生如梦，蓦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们这代人也逐渐步入老年。回望来路，路漫漫，阻且长，然而沿途的风景却依然清晰，甚至历久弥新，始终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

附：松山的朋友

2004 年 11 月 4 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赴松山市爱媛大学工作一个多月。登上由北京飞往大阪的 CA927 次航班，坐在宽敞安静的公务舱里（这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脑子里顿时出现一个强烈的念头：该歇歇了。

飞机贴着海平面，向伸展到大海里的松山机场跑道冲去。秋谷裕幸先生夫妇前来接我，不过车是由秋谷太太开的，秋谷虽然有驾照，但并不会开车（也许是乐得有专职司机吧）。我问秋谷："好几年没来了，松山有什么变化吗？"他颇为不满地说："没有！从我来到松山那天起就没变化过！"

松山位于日本四国岛的西北角，隔濑户内海与本州遥遥相望，是一座 50 多万人口的海滨城市。秋谷说他十一年前刚从繁华的东京来到松山工作时，看到那座矮小而冷清的火车站（JR 松山驿），心里感到非常绝望。也难怪，从火车站前往市中心，交通工具竟是在其他城市早已绝迹的有轨电车。更有甚者，在铁轨上行驶的电车中还有一种带蒸汽车头、木制车箱的仿古老爷车，据说是依照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少爷》里面的"小少爷列车"（而不是"老爷车"）而造的。坐在晃晃悠悠的电车上，听着"叮当""叮当"的下车铃声，会让人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

日本人提起松山，首先想到的是道后温泉。道后温泉号称日本三大最古老的温泉之一，据说已有 3000 年的历史。不过它的盛名，多半要拜夏目漱石的文学描写，现在里面还有"小少爷的房间"。不少人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泡一泡道后温泉。几年前，我曾和孟子敏先生进去泡过一次所谓的"神之汤"。只觉得里面人头攒动，有如中国的公共浴池。

真正体验到日本温泉的魅力，是 1999 年底从松山去兵库县西宫市的松山大学温

山会馆开会那次。为了让我们领略沿途的风光，方经民先生自己开车带我和子敏从今治过濑户内海，经广岛的尾道、冈山、姬路一路前往。我们一大早就动身，汽车沿着刚开通不久的しまなみ（Shimanami）海道，驶上世界第一斜拉式跨海大桥——多多罗大桥。站在观景台上，眼前大桥气冲霄汉，四周山海相连，水天一色，鸟语阵阵，红叶点点，花草丰茂而游人罕至，可以说无处不景。在大桥附近，我们拐进一个小村庄，在该村上方的山坡上有一座天然温泉，和大桥的名字一样，叫“多多罗温泉”。由于地处偏僻，来此洗温泉的人很少，里面宽敞而安静，水质也很好，据说是从地下1000 米处涌出的优质泉水，令人神清气爽。一身轻松之后，来到雅致的休息室，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喝茶一边欣赏窗外秀丽的海景，实在是不忍起身离去。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到子敏家吃饭。当时子敏的公子思明（他的名字的日语发音竟和他爸爸的几乎完全相同）才上幼儿园，来日本一两年，已说得一口松山腔的地道日语，而汉语则忘得差不多了。每次摁门铃，思明总是抢着开门，见了我第一句就是“你又来了!”因为中午一直在爱媛大学的食堂里吃那几样从来不变的日本菜，所以尽管子敏的爱人用仅有的几种日本原料凑合做出来的日式“中国料理”，也吃得非常香。至今还记得的一道菜是酸菜白肉，因为买不到酸菜，她就干脆往鲜白菜里倒了小半瓶醋进去，结果菜当然够酸，只不过此酸菜已非彼酸菜了。

有时候，为了让我体验一下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秋谷会带我到小胡同里去泡“居酒屋”。居酒屋大都门窗紧闭，空间逼仄，陈设简陋，大家沿柜台围坐一圈，颇有家庭餐厅的气氛。那种地方通常只有本地人才去，老板娘和食客也都相互熟识。秋谷在结婚前每周都去好几次。那次秋谷带我和子敏去，三人边喝酒边吃火锅。旁边一个粗壮的男人听到秋谷用流利的汉语跟我们交谈，感到非常钦佩。当他知道我们都是大学老师后，甚至买了一瓶啤酒送给我们，以示敬意。秋谷让另一个食客猜我们三人当中谁是日本人，他端详半天，竟说我最像日本人，真不知是该开心还是该伤心。

偌大的松山，我认识的只不过两三个人而已。每天晚上，从学校回到爱媛大学职员会馆，洗个热水澡，换上宽松的和式睡袍，沏一壶日本煎茶，一个人独自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品茶和发呆，有时如灵魂出窍，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松山依旧是那样安静，那样祥和，依旧弥漫着一种亲切而温馨的气息。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城市里，朋友日渐减少，不免颇生惆怅，一如望见爱大校园里缤纷的秋叶。

（2004 年 11 月 13 日写于日本松山）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10 读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方言》第 4 期

施今语 2017 方言地理学的宗旨及其应用——岩田礼教授访谈录，《国际汉语学报》第 8 卷第 1 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石汝杰 2000 徽州方言研究的重要成果——读《徽州方言研究》，《语言研究》第 2 期

童　岭 2020 平田如棋局——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平田昌司教授访谈录，《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21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岩田礼 2009『漢語方言地図集』と曹志耘さんのこと，《东方》第 338 期，日本东方书店

信息-焦点纵横谈:从焦点连续统谈起

石锋

南开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语句焦点的连续统，说明汉语的语句结构和信息焦点的类型具有内在的联系。

引言：信息和焦点

语句焦点问题是自然语言研究的焦点。焦点是典型的语言学跨界问题。焦点是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话语分析等各个学科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语言学各个学派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徐烈炯 2005）信息结构不同于语法结构。语法结构是组词成句的模式。信息结构是信息传递的模式。二者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语言之所以组词成句，就是为了传递信息。一言以蔽之，语言存在的价值，归根结底，就是传递信息。已经有很多学者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过多赘言了。

石锋用实验方法研究语言，提出“信息结构—焦点类型—韵律模式”的分析程序(2019)，采用韵律格局的分析范式，可以为焦点问题的研究增加实验数据的客观实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学术争议（石锋 2021）。焦点分析是韵律格局研究的核心问题。

韵律格局以三条基本原理及其推论为理论基础。三条基本原理即，有声原理(语言中一切内容都通过语音表现出来)、必选原理(焦点的各种表现方式中，语音是必有的)、对应原理(一个语言成分的语音充盈度跟它所负载意义内容的实在程度和所传递的信息量相互对应)。

增量推论：一个语言成分负载的意义或功能的增多表现为语音充盈度的增量叠加；一个语言成分的语音充盈度的增量反映出所负载的意义或功能的增加，反则反是。语音充盈度可以用以下三个量化指标来表现：

・起伏度[1]

[1] 起伏度计算公式：Qx＝(Kx–Kmin) / (Kmax–Kmin)。公式中，Kmax 为句中各字/词调域上线的最大值，Kmin 为句中各字/词调域下线的最小值，Kx 代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各个字音的上线和下线的测算值。最后根据计算得到的各字调域上线和下线的百分比数值做出字调域条形图，再画出词调域的框线，显示跟句调域的联系。

・时长比[2]

・音量比[3]

这三个指标都是百分比标度，便于进行人际和语际的对比和统计。这就是韵律格局的研究理念和分析方法（石锋 2021）。

一、语句焦点连续统

我们基于汉语语调格局和韵律格局的大量实验分析数据和国内外学者对焦点研究的成果，初步概括出语句焦点连续统原理（石锋、夏全胜 待刊）：根据韵律突显程度从弱到强的顺序，可以把不同类型的焦点排列为：自然焦点、强调焦点、对比焦点、疑问焦点、祈使焦点、情感焦点，形成一个连续统。六种焦点排列而成的语句焦点连续统可参见图 1。下面我们就对于这个连续统做出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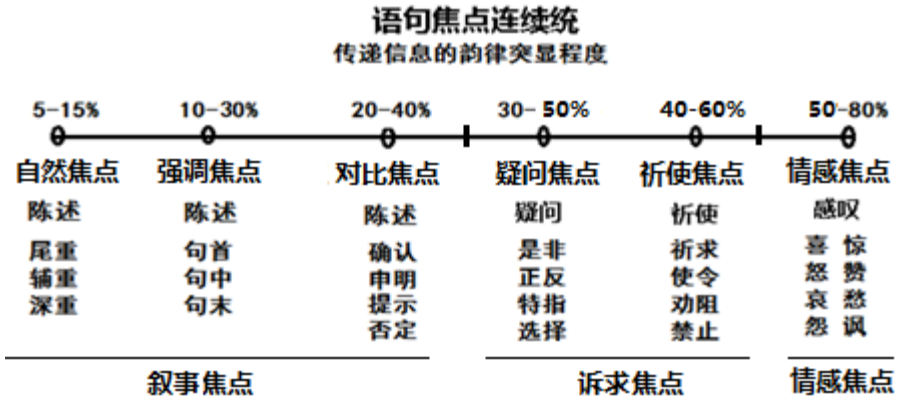


图 1 语句焦点连续统图示

二、单一维度

连续统的条件就是所有的成员共有同一个维度，形成单一维度的格局。图 1 中的语句焦点连续统是以焦点韵律突显程度为单一维度排列而成的，韵律突显程度也就是

[2] 时长比计算公式：Dx = Sx /Smean。公式中，Sx 为某字时长，Smean 为全句单字平均时长。如果时长比 Dx 大于 1，则被认为发生了音段延长。

[3] 音量比计算公式：Ex＝Gx/Gmean。公式中，Gx 为某字幅度积，Gmean 为全句单字平均幅度积。某段语音的幅度积 Gx＝Ax*Sx，Ax 为某段音的平均振幅，Sx 为某段音的时长。同样，如果音量比 Ex 大于 1，则被认为它在音强出现了相对增幅。

语音充盈度。

这个单一维度是一种基于客观量化的综合性指标，包括调域跨度、时长比和音量比。（参见表 1）即，调域跨度的扩展和整体抬高、时长的增长和音强的增强。其中以调域扩展为主，音量增强为辅，时长居中，三者相互补充，并不是同步增减。每提升一级，焦点的韵律突显程度增强约 10-20%。每一类焦点内部都有从弱到强的差异。当然每类焦点内部也是连续的。

表 1　不同类型焦点的韵律突显度对比表[4]

类型		调域跨度	时长比	音量比
自然焦点	陈述句	63(15.5-78.5)	1.03	0.87
强调焦点	陈述句	63(20-83)	1.07	0.9
对比焦点	陈述句(是)	66(17-83)	1.04	1
功能焦点	疑问句（语调）	79(20-99)	1.06	0.92
	祈使句（请求）	88(12-100)	1.18	1.26
情感焦点	感叹句（欣喜）	100(0-100)	(1.1)	(1.4)

三、三类焦点

排列语句连续统就是为了还原语言本来的面貌，认识相邻范畴之间的联系，得到范畴划分的客观依据。经过对六种焦点表现综合考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类：首先在对比焦点和疑问焦点之间划界，前三种合为叙事焦点；然后在祈使焦点和情感焦点之间再划界，中间两种合为诉求焦点；最后的情感焦点自成一类。这样划分出来之后，恰好符合焦点负载的意义内容，焦点的形式特征跟焦点的作用分类是相互联系的。这样，全部焦点分为为三大类：

叙事焦点(叙述客观事件)包括自然焦点、强调焦点、对比焦点；

诉求焦点(发出回应要求)包括疑问焦点、祈使焦点；

情感焦点(宣泄主观情感)单独一类。

实际上这也是信息的三个类别：叙事、诉求、宣泄。其中叙事是信息传递的主要

[4] 调域跨度栏中括号内的数字是调域的上线和下线，时长比和音量比的数据是焦点所在词或短语的平均值。自然焦点、强调焦点的调域跨度来自王萍（2015），时长比和音量比来自王萍、石锋（2019）和谢中仁（2018）。对比焦点的调域跨度来自王萍（2015），时长比、音量比来自王萍等（2019）。功能焦点中的疑问句的调域跨度、时长比和音量比来自阎锦婷、高晓天（2017）、王萍、石锋（2019）和谢中仁（2018）；功能焦点中的祈使句数据来自焦雪芬（2015）。情感焦点数据来自范自霞、成瑶（2018）。

内容，叙述客观事物的状态和变化，不一定需要对方回应，对方是否回应是可选的。诉求是信息传递的重要内容，对客观事物施加主观影响，这往往就是信息传递的目的，向对方发出即时回应的要求，对方回应是必选的。宣泄情感表达说话者的自身感受，含有评价意义的信息，具有引发对方共情的作用。当然，叙事和诉求也有情感因素在内，但只是作为伴随性成分。

四、叙事三类焦点内部的关系

自然焦点是常规焦点，是语调的基本形式。自然焦点没有主观施加的明显的语音突显。自然焦点三原则：1、尾重原则：无标记。2、辅重原则：弱标记。3、深重原则：强标记。这些焦点位置都是跟句法结构位置相对应的。自然焦点语句中，说话人侃侃道来，平铺直叙。焦点表现为音高突显。所以，对于自然焦点，语法学家可以分析，语音学家也可以分析。

强调焦点是在语句特定位置施加人为的语音突显（如句首焦点、句中焦点、句末焦点）。原来的语句结构不变。强调焦点指语音上的加重，是说话人主观突显语句中的某一成分，只有语音表现，没有词汇和语法的标记。这类似于英语中重读音节的音量突显。这是唯一使语法学家无计可施的一种焦点。语音学家却可以大有作为。

对比焦点除了有语音突显之外，都还具有词汇或句法形式标示焦点位置（如是字句、把字句、否定句）。所谓对比，或是跟同型自然焦点句的对比；或是具有潜在的对比项。例如否定句就是以否定词为标示的对比焦点句。对比焦点的语音表现具有多种突显方式，至少有一种韵律成分的突显。对比焦点句大量存在，是语法学家大显身手的地方，语音学家也可以合作共赢。

五、诉求两类焦点内部关系

疑问焦点要对方做出言语的回应。疑问内部有各种分类：

是非问表达求证，只需回应是或否；句末要带疑问语气词“吗”或“吧”，也可以有纯语调问句不用语气词。

特指问是求知，需要对方回应说明特指的内容；句子以疑问代词标示特指内容，句末可带疑问语气词“呢”或“啊”。

选择问是求定，要对方在两种（或几种）可能中做出选择；常用“还是”来连接不同的可能情况，句末可带疑问语气词“呢”或“啊”。

正反问的作用跟是非问类似，需要对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应；采用肯定和否定

连接的“V 不 V”形式提问，句末可带疑问语气词“呢”或“啊”。

疑问焦点韵律表现为音高突显。焦点词调域上线提升、跨度扩展，影响全句语调发生变化。可见疑问焦点都具有语音表现形式。只是因疑问类别不同，表现方式各有差异。另有反问句是以问解疑，采用问话形式强化已有观点。所以反问不需要对方回应。还有设问的方式是自问自答，也不需要对方回应。当然这些只是疑问的活用，不是疑问的主体。

祈使焦点要对方做出行为的回应。命令是强祈使，相对应的逆向强祈使为禁止。请求是弱祈使，相对应的逆向弱祈使是劝阻。队列口令是最强祈使。祈使句的完整结构应该是：第一人称主语+祈使动词+第二人称兼语+动词短语。其中第一人称主语时常被省略，有时甚至祈使动词和第二人称兼语也被省略，只留下兼语后的动词短语。祈使焦点位置通常落在第二人称兼语的动词上。祈使焦点主要表现为音量突显。

疑问焦点和祈使焦点的共同点是：都要求对方的回应。二者的不同点有两个：1、疑问要求言语回应，祈使要求动作回应；2、疑问焦点多是音高突显，祈使焦点以音量突显为主。基于韵律不同步原理，音量突显的实际表现是音量和音高同时增加。

六、情感焦点内部关系

情感焦点是说话人抒发或者宣泄自己的感情。通常伴有极性修饰语和句末语气词。情感焦点一般是由语句动词、形容词的极性修饰语，加上句末感叹语气词共同构成互补焦点。情感焦点的语音表现为音高、音量和时长的综合作用。其中音量突显大于音高和时长。情感焦点的韵律突显度约为 40-80%。极端情感宣泄甚至会达到 100%以上。

情感焦点的喜怒哀乐，实际上是介于语言学跟副语言学之间的表现。在语言学和副语言学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不同情感之间的界限往往比较模糊，而同一情感内部的表现又差异较大，其中的规律性比较弱一些。“语言有一半是驯服的，有一半是没有驯服的。为了理解已经被驯服的或套上语言学缰绳的这一半，我们必须熟悉那狂野的另一半。”（Bolinger 1978）那另一半就是副语言学的内容。

七、三类焦点相互的关系

叙事和诉求的关系：叙事是向对方传递客观事件的状态和变化。这是主要的信息内容。传达了意义，表示交际完成。同时，叙事也可以伴随着潜在的诉求，希望对方有回应。当然这是一种可选的回应，不是必有的，不影响交际完成。

诉求是需要对方做出言语或动作的回应。这是对于客观事件主动干预，施加影响。

疑问是思想意识的干预，抽象反应，深入了解；祈使是动作行为的干预，具体行动，改变现状。诉求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对方回应是必选的，有来有往。若对方没有回应，则表明交际尚未完成。

叙事和情感的关系：叙事是传信，情感是抒情。叙事的同时肯定会有情感在内。抒情本身也是一种情感信息。当然，叙事焦点以传信为主，情感只是伴随成分。情感焦点以抒情为主，同时会有情感信息，但是情感信息并不是信息的主体。二者的相同点：可选回应，不必有来有往。

诉求和情感的关系：跟叙事焦点一样，诉求焦点当然诉求是主导，同时肯定会有伴随情感。情感焦点抒发或宣泄感情，是对于事件的主观情感反应。其中隐含着潜在的诉求：希望引起对方同感共鸣。

八、“回归常识”

我们把自然、强调和对比三者合为叙事类焦点，跟疑问和祈使组成的诉求类焦点与情感焦点并列。这应该是一个有理有据的解决方案。各种焦点有序排列，好学好记好理解。大道至简，把复杂的东西弄简单，是很高兴的事情。

再回头看一下：叙事类焦点都是陈述句；诉求类焦点是疑问句和祈使句；情感类焦点都是感叹句。这样转来转去，又回到使我们当初学的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句子类型。只是把疑问和祈使合为诉求。算是有一点点改变。

这不是闭路循环，而是螺旋式上升。我们从量化排序的焦点连续统出发，重新认识了这四种类型的句子在组成信息结构和实现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人类的认识，社会的发展，往往都是这种螺旋式的上升模式。

现在看来，好多貌似创新的时髦理论，不过只是变出法子操弄术语，真是不如原来的前辈们最初的工作接地气。“回归常识”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回归常识就是回到正常的社会共识，回到事物的本来面貌，回到人们的实际经验。也就是我们提倡的语言学人要走进社会，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只有这样，语言学才能摆脱玄学的羁绊，走上科学的道路。

参考文献

Bolinger, Dwight L. 1978. Intonation across languages, in: Greenberg, Joseph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 2 (Pho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71–524.

范自霞、成瑶 2018 普通话同型感叹句韵律分布模式，《实验语言学》第 7 期。
焦雪芬 2015 汉语普通话祈使句的语调实验研究， 南开硕士学位论文。
石锋 2019 《韵律格局：理念和方法》，《实验语言学》第 8 期。
石锋 2021《韵律格局—语音和语义、语法、语用的结合》，商务印书馆。
石锋、夏全胜（待刊）汉语普通话焦点原理。
王萍、石锋 2019 汉语普通话不同语句类型的时长分布模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王萍 2015“是”字强调焦点句的语调实验研究，《汉语学习》第 3 期。
谢中仁 2018 普通话语调基式与变式的音量比实验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徐烈炯 2005 几个不同的焦点概念，载《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阎锦婷、高晓天 2017 普通话语调问句和“吗”字问句的不同韵律分布模式，《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

On information focus: from focus continuum

Shi Feng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inuum of sentence focus,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re is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sentence structure and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focus.

不同功能角色代词在语句中的时长表现

江海燕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考察自然口语状态下普通话语句中单音节代词的时长表现，以单音节人称代词“你、我、他”和指示代词“这、那”的相对时长为研究对象，发现代词时长普遍短于句中平均音长。但代词的轻读并不稳定，当代词处于对举强调句中；处于边界调位置；处于语义焦点位置或句中情感比较强烈时，会造成音长延长。代词的时长短是造成轻读的基础要素，汉语韵律研究应关注各种轻音现象。

一、前言

1.1 韵律问题是汉语学习的难点

据涩谷周二（2005）对日本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和重点进行调查，发现有不少日本学生缺乏有关汉语句重音的知识，虽然有很多学生意识到语调的重要性，但他们对具体的注意对象，也就是学习目标很不明确，对于汉语语音的韵律，他们不知道该学什么，自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学，使得这方面的学习处于无的放矢状态。实际上不只是日本学生，韵律问题几乎是所有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的难点。《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1]明确把句重音列为初级阶段的教学内容。但实际上，面向留学生的语音教学多集中在声母、韵母、声调上，涉及到韵律问题则以“多听多练”含糊其辞，很少给出如何听、如何练的具体指导建议，有些教材甚至直接回避韵律问题。很多汉语学习者单个音节发音很标准，但一进入语流就“洋腔洋调”。韵律问题实为汉语学习的“老大难”问题。

1.2 时长是音高表现的基础要素

“导致语音变化的最活跃的促动因素就是话语的韵律结构，而话语的韵律表达也总是离不开语音四要素的种种调节变化。”（曹剑芬，2011）在语音的四个要素中，对汉语音高的研究是最多的，因为众所周知汉语是声调语言。事实上，音高因

[1]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素和音长因素密切相关，音长长，音高才有时间充分地展开，音色也更清晰；音长短，音高表现就会出现各种变体，也就是音高的各种过渡状态。

比如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中就提到“在一般会话速度的语流中，三音节组中第二声变成第一声。”例如“梅兰芳”中的“兰”“西洋参”的“洋”“好几种”中的“几”。三音节中间的字发生变调主要是受时长变短的影响，因为处在一个韵律单元中间的音节时长缩短，导致处在这个位置上的音高成为了前后音节的过渡。[2]

曹剑芬老师（2011）以常阴沙话的代词为例，她发现，在韵律域起首位置或重读地位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她或它”读阳平本调的［gi］；在非起首位置或非重读地位则读阳平变调的［ji］，这就是方言中语音的变化体现出韵律结构上差异的典型例子。为什么在韵律域起首位置或重读地位读本调，非起首或非重读地位就读变调？重读地位时长长，足够的时长保证了音高充分地表现，所以读本调，在非重读位置时长短，音高在短时间内不得不发生调整，形成变调。

1.3 语流中的音长表现更能体现韵律特征

作为声调语言，汉语语音学界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音高的各种变化，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但对音节时长的关注显然不够。因为众所周知，汉语有调位没有时位，对于一个音节来说，音高有区别意义的作用，音长却没有（轻声除外）。但进入语流后情况却大不相同，在语流中音高表现可以模糊，各音节间时长的差异表现反而突显出来。尤其是语速快的情况下，整个句子的基频曲线起伏很小，甚至趋于一条直线。

根据 Xu, Y（1997）的研究，每个音节都有自己的音高目标，基频曲线是以渐进线的形式向音高目标靠近的，一旦基本实现音高目标就会进入下一个音节。因此，语流中一个音节的主体走势基本上都不是某音高特征稳定段的持续，而是由前一个音节的终点向某音高目标的过渡过程。正是因为此，在非重读位置，时长压缩，音高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种过渡，以便适应与前后音节的衔接，平调就成了最容易实现的音高走势，因为无论升、降、起、落，都不如平调走势更容易相互衔接过渡，耗时更短。

我们截取了一句乒乓球赛中的普通话解说音频“张燮林把球削到球台的角上。”（见图 1），赛事现场解说的语速非常快，达到每音节 0.101923 秒[3]，在这种情况下各音节间音高区别特征已经很小了，时长的差异却一目了然。实际上单念时，每个音节都有充分的时间展开音高，但只要进入语流，每个音节分配到的时长都会受到限制。

[2] 参见拙作《从三字组时长分布看汉语的词重音问题》（待刊）。
[3] 据吴洁敏、吕士楠《试论感情语调的超常韵律特征》考察，中性语调每音节 0.554 秒。

在整句话时长都受到压缩的情况下，那些处于非重读位置的音节受到压缩的程度更大，各音节间时长的差异就比单念时更凸显出来。而音高差异却被消解了。如图 1，“燮 xiè”是去声，“林 lín”“球 qiú”等都是阳平，但是语流中它们“降”和“升”的特征都大打折扣。因此，在语流中，尤其是在语速快的情况下，关注音高特征不如去关注音长更能体现韵律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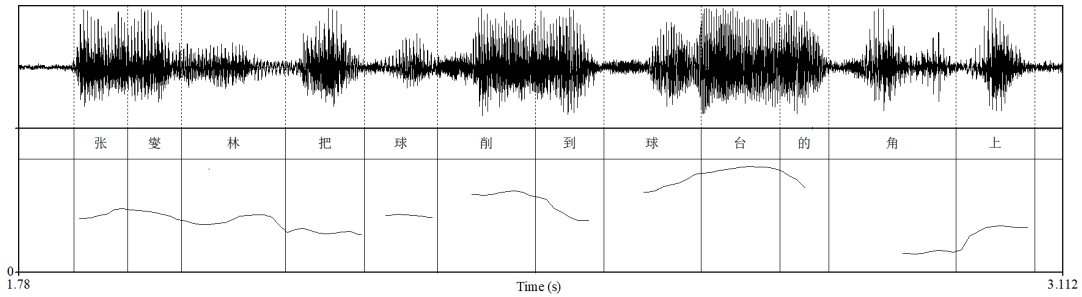


图 1：乒乓球赛事解说的波形与基频曲线分音节对应图

声调的首要目标是传递词汇意义，而当一个一个的音节组成句子，成了更大的语义单位，整体句义的传达就会高于其中的单个词义，词语组合的意义比单个字的意思更容易理解。这也是单个音节进入语流后音高特征可以弱化的基础。成为句子也就成为了更大的韵律单位，音高特征弱化，音长的差异就用来表现韵律特征了。

1.4 代词的语调轻音问题

林焘先生（1989）早就指出：“对一个音节进入语句后韵律特征的变化如果注意不够，即使每个音节都读得很准，听起来必然仍旧是不够流利顺畅。可以说只做到了‘字正’，并没有达到‘腔圆’”曹剑芬先生（2007）认为“这是对对外汉语教学中常见的‘洋腔洋调’现象的最精辟的概括，也是对方言区普通话教学中出现的种种方言口音问题的科学诊断。”并且进一步指出在汉语语流错综复杂的韵律变化中，“轻重音的变化尤其突出”。

所谓“轻、重”是相对而言的一体两面，是分不开的。但是在研究上，汉语对轻音问题的关注远远比不上重音。曹剑芬先生认为“只注意一般的重音设置，缺乏对语流轻音的恰当处理，就必然导致合成韵律结构上的某种失调……”而实际上相比于重读音节，非重读词或音节才是语流中更大量的存在，“这些轻音的存在，不但使得重音更加突显，而且使得话语的结构层次更加分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编的《现代汉语》（2004）就曾明确指出：“汉语里轻重音的概念跟西方语言很不相同。西方语言着重在重音的概念，而汉语恰恰相

反，着重在轻音的概念。”

但是在语音研究实践中，对汉语的“句重音”时有讨论，“句轻音”却少有提及。传统汉语研究在讲到虚词时会提到：像助词、语气词的语音特点有‘永远后附、粘着、轻声’[4]的说法。此外，林焘先生（1962）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曾撰文区分了语调轻音和结构轻音，并提出“人称代词和一些单音节副词都常常读成语调轻音。”

捷克语音学学者 Hana Třísková 认为代词、量词、动词“有、是、在”以及副词“很、都、就”等在句子中都会有轻读的表现（Třísková, 2016）

但这些词的轻读建立在语感基础上，尚缺乏实证考察。如果能用实验的方法证实此类轻读的确存在，就相当于给了汉语学习者何时轻读的明确指导，分清了何时“轻”，也就明确了何时“重”，那么汉语的韵律学习就“有的放矢”了。

因此，本文用语音实验的方法考察汉语代词的时长表现，看它们是否真的具有语音学意义上“轻”的首要表现——时长短，在各种语法位置或不同的语境中，代词的时长短是否是一贯的特点，以及短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首先选择代词作为考察对象呢？一是因为林焘先生和 Hana Třísková 的研究中都提到了代词轻读的问题，二是因为语义虚化的词，语音上更容易轻读，代词在传统词汇研究中归于实词类，与其他几类典型虚词相比，代词的韵律表现“非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本文以语流中的代词为基础，作为研究轻音问题的开始。

二、代词的相对音长语音实验

2.1 语料设计

代词在词类中属于比较简单的一类，成员少，功能也不复杂。在我们的研究中双音节代词暂不考虑，只考察单音节的“你、我、他（她）这、那”这几个典型常用代词。下面以代词“我”为例展示语料设计基本思路。其他代词的例句随文列在了每幅图下面，具体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语料设计依据《现代汉语八百词》（以下简称《八百词》）的分类，并作适当调整。比如代词“我”的用法共有四类，其中两类都只用于书面语，我们的研究只面向口语语流，因此这两种类别就不予考虑。剩下的两种“我”的用法，一是用来称自己，一是用在平行语句中表示许多人共同或相互。我们根据《八百词》中所列语义用法对代词逐项分类，同时考虑代词在句中所处位置（句首、句中或句末），句子的长短（长句、短句）等因素，设计如下例句。

[4] 参见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语法部分。

代词“我”称自己，分两种情况：功能 1、功能 2。其中功能 1 又分两小类，1-1 表示领属关系，对应如下 10 个例句：

1.**我**的钥匙。　　2.**我**的书。　　3.**我**哥哥。　　4.**我**邻居。

5.你路过**我**家怎么不进来？　　6.**我**这里很安静。

7.**我**那儿还有没用完的。　　8.**我**背后那人老是咳嗽。

9.**我**这个风筝是花一个月做成的。10.**我**那点儿本事你还不知道！

功能 1-2 也称自己，但表示跟自己的名字或表示身份的名词连用，“我”在前或在后。带感情色彩。对应如下两个例句：

11.**我**某某某坚决支持你！　　12.你做得对，哥哥（姐姐）**我**赞成！

代词“我”还可以用在平行语句里表示许多人共同或相互。此时“我”并不称呼自己，而是虚指，此类属功能 2：

13.你打扫这间，**我**打扫那间。　　14.你不想唱，**我**不想唱，大家都不想唱。

15.这几个人你让**我**，**我**让你，让个没完。

2.2 实验基本情况

针对代词的语义功能，我们考察的例句直接对应口语中不同用法的句子，从而使实验结果不会只解释一部分情况而失去普遍意义。实验例句音节数以 7 个音节为常态标准，句子短于五音节的为短句，最短的只有 3 个音节；句长大于七音节的为长句，最长的句子达到了 13 个音节。这主要是考虑到句长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句中代词的长度，因此使实验例句在音节数上尽量包含长短各种情况。

语料数量：实验例句共 88 句，涉及五大类。其中代词“我”依据语义功能分为 3 小类；代词“你”分 4 小类；代词“他”分 3 小类；“这”7 小类；“那”7 小类。发音人有 4 位，各读一遍，因此语料总量为 88×4×1=352 句。

发音人：两男两女，普通话一级乙等。

实验设备：数字录音机、PRAAT （4.3）语音分析软件。

录音要求：将语料打乱顺序，事先通过练习让发音人熟悉语料。用自然口语说出语料内容，切忌读成朗读风格。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不要预设情境，不要自行安排强调重音。句与句间隔 4-5 秒。

实验方法：录音并按类别提取四位发音人的代词音长平均值（以秒为单位），将音长绝对值换算成相对值。绝对音长受语速、语言风格等因素影响很多，为了使数据更具有可比性，我们将实验语料中提取出的绝对时长处理成相对时长。相对时长的计算方法如下：相对时长=代词绝对时长/平均时长。其中，平均时长=绝对句长/音节数。

三、不同功能代词的相对音长表现

3.1 代词“我”的相对音长实验结果

各类代词“我”的相对音长见图 2，图中纵坐标“1”代表平均音长，用加粗的横线标示，柱状图中超过这条横线的就表示此句代词音长超过了句中音节平均音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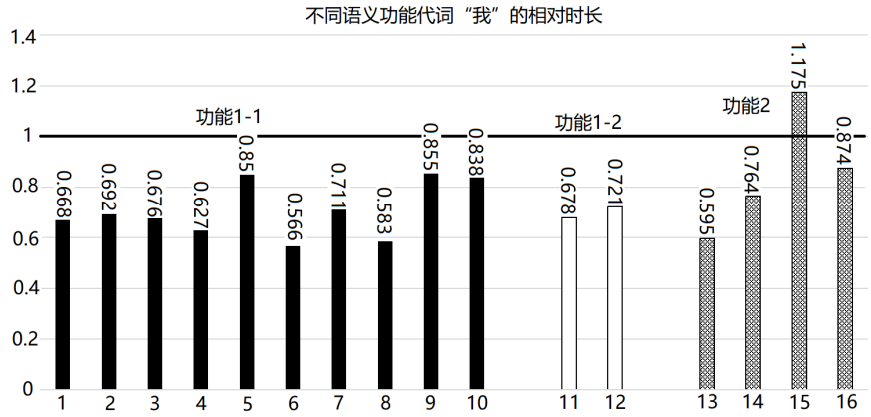


图 2：各类代词“我”的相对音长

3.1.1 各类代词“我”的音长表现探究

图 2 中功能 1-1 对应表领属的代词“我”（具体例句参见 2.1 小节例句 1~10）；功能 1-2 是跟自己的名字或表示身份的名词连用的代词（具体例句参见 2.1 小节句 11~12）；功能 2 是代词“我”用在平行句里表示许多人共同或相互的代词用法（具体例句参见 2.1 小节句 13~16）。

从图 2 所列的代词“我”的 16 个例句（句 15 包括两个代词“我”）的相对音长来看，除了句 15“这几个人你让**我**……”超出了平均音长外，其他例句的代词“我”均短于平均音长。句 15 的“我”表任指义，又处在句子的边界调位置，导致了时长比其他的“我”要长。张慧丽、潘海华（2019）发现“句尾信息焦点虽然缺乏音高凸显，但具备明显的音长显著性和更宽音域。”代词“我”15 和 16 其实在同一句话中（这几个人你让**我**，**我**让你，让个没完。）只是 15 在句尾，16 在句首，位于句尾的例 15 比位于句首的例 16 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时长优势。

但比较而言，我们也从图 2 中看出情感因素对代词时长有一定影响，如功能 1-1 中的句 5（相对音长 0.85）、句 9（相对音长 0.855）、句 10（相对音长 0.838）的音长表现虽然也低于平均值，但略高于其他代词“我”，因为这几句有相对突出的

感情色彩，句 5、10 有嗔怪义，句 9 有夸耀义。

代词“我”的 16 个例句中带有更强烈感情色彩的是功能 1-2 类，《八百词》明确标注了这类例句“带感情色彩”，但功能 1-2 涉及的两个例句中，代词的平均音长分别是 0.678 和 0.721，并没有体现“相对突出的感情色彩带来相对长的音长”。这是因为这类例句中的代词均与名字或表身份的名词并列，“我某某某”和“哥哥我”在句中各自形成一个韵律单元，也就是被打包成了一个整体，作为语音上的一个整体单位，其中各音节时长会缩短，以便使得这个韵律单元粘合成一个整体，从而使整个韵律单元的总时长不至于溢出太多。这就是 Michael Lewis（1993）所谓的“语块”。

3.2 代词“你”的相对音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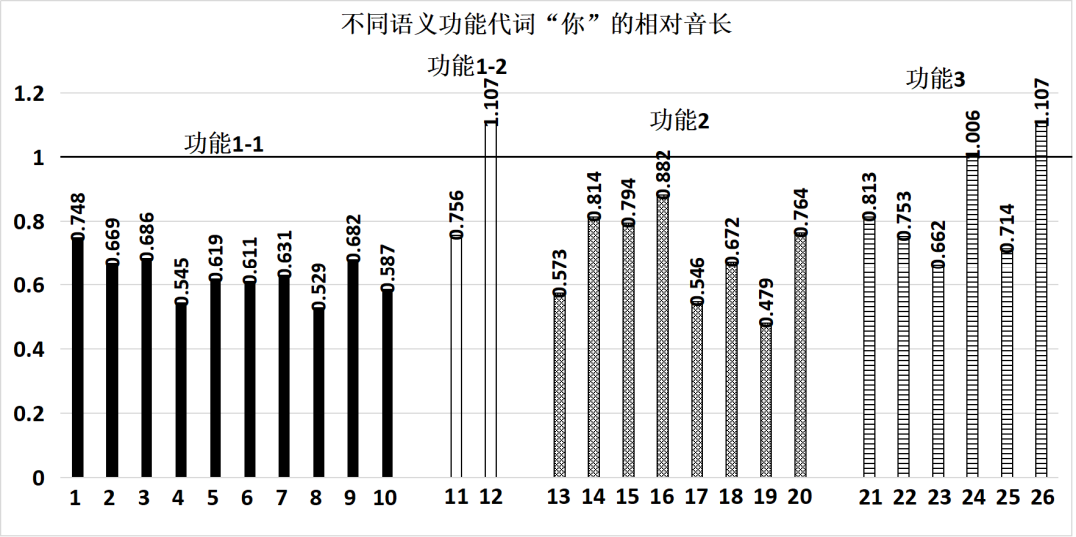


图 3：各类代词“你”的相对音长

3.2.1 代词“你”的功能分类

图 3 所列的四类例句分别对应代词“你”的功能 1-1、功能 1-2、功能 2、功能 3，其中功能 1-1 称对方，表示领属关系，对应如下例句：

1.**你**的要求我不答应。　2.这得看**你**的表现如何。　3.**你**姐姐。　4.**你**同学。
5.**你**家几口人。　6.**你**这儿有报纸吗。　7.**你**前头是谁。　8.**你**旁边是谁。
9.**你**这件衣服新做的。　10.**你**那本书明天还。

功能 1-2 也称对方，但跟对方的名字或表身份的名词连用，带感情色彩：

11.**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　12.这就全在主席**你**了。

功能 2 对应八个代词“你”，不再称对方而是泛指任何人，分布在如下四个句子里，其中例 13 和 14 分布在一个句子里，例 15 和 16、17 在一个句子里，例 19 和 20 在一个句子里：

13.**你**要想做好 14.**你**就得先学好。

15.不论**你**是谁，16.如果**你**骄傲了，17.**你**就很难进步。

18.他的精神叫**你**不能不佩服！

19.**你**问他十句，20.他才答**你**一句。

功能 3“你”用在平行语句里表示对举，分别在四个例句中的六个位置。其中例 23 和 24 分布在一句话中，例 25 和 26 在一句话中：

21.分**你**三把，分他三把，一会儿就分完了。

22.**你**不去，我不去，谁也不去。

23.仨人**你**瞧瞧我，24.我瞧瞧**你**，谁也不说话。

25.**你**推给我，26.我推给**你**，都不想要。

3.2.2 代词“你”的音长表现探究

代词“你”绝大多数时长短于均值，只有三个例句超过均值。首先看句 12 的“主席**你**”。代词“你”的功能 1-2 跟代词“我”的功能 1-2 是一样的用法，与名字或表身份的名词连用，都带感情色彩，前文也解释了功能 1-2 的“我”音长没有延长的原因是连用带来的韵律单元内部紧凑，导致韵律单元内部音节音长缩短。可是代词“你”在例 12 里为什么又有延长？相对时长达到 1.107？这是因为例 12 的“你”虽与“主席”并列，构成了一个韵律单元“主席你”，但这句话中的“你”正好处于语义焦点位置，时长就被延长了。本实验所有例句在设计之初尽量避免处于语义焦点位置，但由于例句以代词的应用功能分类，要求考察对象尽可能覆盖各种口语状态下的功能用法，因此个别句子中的代词处于语义焦点就无法完全避免了。

对举且处于句子边界调位置会延长代词的音长，句 19 的“我瞧瞧**你**”以及句 20 的“我推给**你**”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的相对音长分别是 1.006 和 1.107，同样处于对举的句子，但没有在边界调位置的其他四个代词“你”都没有达到超过时长均值的这种延长。

3.3 代词“他”的相对音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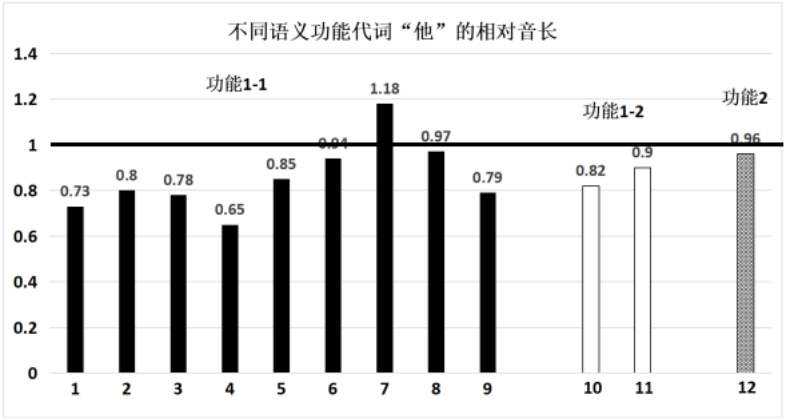


图 4：各类代词“他”的相对音长

3.3.1 代词“他（她）”的功能分类

代词“他”也有三种类型的例句，第一种对应功能 1-1，表示领属关系：

1.**他**的上衣是白色的。　2.墙上是**他**的照片。　3.**他**哥哥。　4.**他**同事。

5.**他**家是刚搬来的。　6.**他**那儿可能有节目单。　7.钥匙在**他**那儿呢。

8.**他**这几句话说得好。　9.**他**就爱显摆他那两句英语。

第二种功能类型 1-2 对应的例句跟这个人的名字或表示他身份的名词连用，带感情色彩：10.这事儿成不成就看**他**李志新了。11.李志新**他**也提前到了。

第三种代词“他”的功能 2 对应的例句用在平行语句里，表示许多人共同或相互：12 你不唱，**他**不唱，谁唱？

3.3.2 不同类型代词“他”的音长表现

代词“他”的相对音长也是基本都小于时长均值，只有功能 1-1 中的例 7 相对时长 1.18，超过了平均值，这是由语义焦点导致的时长延长，因为“7.钥匙在他那儿呢”中“他”显然是新信息，标明了钥匙所在的地方，时长延长突显焦点所在。代词“他”的功能 1-2 例句都没有超过均值，因为这两例中的代词都不在句子边界位置。功能 2 中的例句也因为未处于边界位置，虽是在对举句中，音长的延长也未超过均值。

3.4 代词“这”的相对音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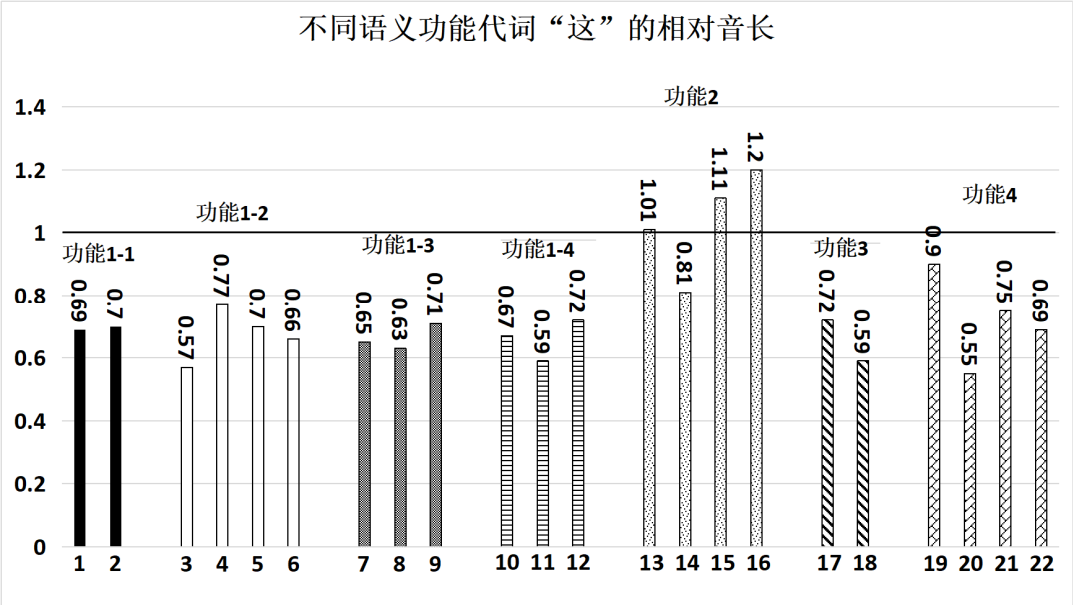


图 5：各类代词“这”的相对音长

3.4.1 代词“这”的功能分类

指示代词“这”的用法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其中第一类“代替比较近的人或事物”又可分为四小类，分别对应图 5 中的功能 1-1、功能 1-2、功能 1-3、功能 1-4：

功能 1-1 代替人，在“是”字句里作主语：1.这是李志新。2.这是新来的同事。

功能 1-2 代替事物，常用作主语：3.这很便宜。 4.这倒不错。 5.这给你。6.这不解决问题。

功能 1-3 代替事物，用在双音节方位词前：7.**这**上面有花纹。 8.**这**里面装的是苹果。9.钥匙挂在**这**下面。

功能 1-4 用在小句开头，复指前文：10.你觉得热，**这**是因为你第一次到海南。11.先种树后浇水，**这**也可以。12.你要能帮我一把**这**就快多了。

功能 2 与“那”对举，表示众多事物，不确指某人或某物。例如：13.怕**这**怕那。14.**这**不看，那不看，啥也不看。15.姐俩**这**事儿那事儿呀说了不少。16.采点儿**这**，摘点儿那，一会儿就装满了。

功能 3 等于“这些”：17.**这**都是一等品。 18.**这**都是流汗换来的。

功能 4 口语中指现在，有加强语气的作用，后面常用“就、才、都”等：19.他**这**

就来。20.**这**都几点了，你还不睡觉？21.凉风一吹，**这**才清醒过来。22.一直玩儿到天黑，**这**才分手回家。

3.4.2 代词“这”的音长表现分析

代词“这”的时长超过均值的全部集中在功能 2 与“那”对举的时候，除了例 14.“这不看，那不看，啥也不看”外，其他三个时长比值都超过了 1，说明“这”在对举时因强调作用而发生了延长。但例 14 处在句首的“这”相对时长只有 0.81，尚未超过均值，说明句首位置的“这”强调性不强，主要是虚指功能，是为了衬托后面与之对举的“那”。

代词“这”的语义功能类型比较多，但除了上述对举的情况外，“这”其他用法的音长都短于平均音长。

3.5 代词“那”的相对音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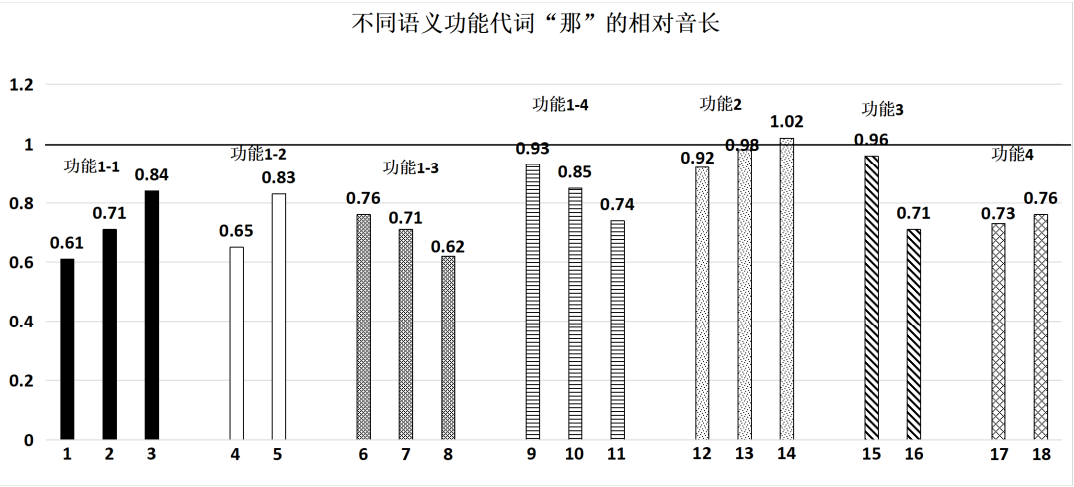


图 6：各类代词“那”的相对音长

3.5.1 代词“那”的功能类别

“那”代替比较远的人和事物。跟代词“这”类似，也分 4 大类，其中功能 1 又分 4 小类：功能 1-1 代替人，限于在“是”字句里作主语：1.**那**是谁？ 2.**那**是我们班李志新。3.**那**是我哥哥。

功能 1-2 代替事物，常用作主语：4.**那**是大操场。 5.**那**是我们宿舍。

功能 1-3 代替事物，用在双音方位词前：6、**那**上面写得很清楚。7.**那**里面都是书。

8.这些树苗全种在**那**周围。

代词“那”的功能 1-4，用在小句开头，复指前文：9.咱们都不用交管理费了。——**那**敢情好！10.你还没说你考多少分儿呢，**那**是他最关心的。11.说起这件事儿，**那**可真有年头了。

代词“那”的功能 2，与“这”对举，表示众多事物，不确指某人或某事物：12.这也不错，**那**也挺好。13.说说这，说说**那**，真高兴！14.这一句，**那**一句，说起来没完。

代词“那”的功能 3，等于“那些”：15.**那**是我的几个朋友。16.你看，**那**都是去年买的。

代词“那”的功能 4，引进表后果的小句，起连接作用。同“那么”如：17.你要是不努力，**那**就什么事儿也做不成。18.他不参加，**那**就得另外找人了。

3.5.2 指示代词“那”的时长表现分析

指示代词“那”的时长分类以及时长表现与“这”类似，除功能 2 的三个例句较长外，其他都没有超过时长均值。功能 2 的三个例句相对时长都超过了 0.9，但只有其中的“这一句，**那**一句……”相对时长 1.02，刚刚超过了均值。这是在对举句子中的强调作用导致其中代词的时长延长。

功能 1-4 中的句 9“**那**感情好！”因为句子有比较强的情感因素，其中的代词“那”时长较长，达到了 0.93。功能 3 中的句 15“**那**是我的几个朋友”相对时长达到了 0.96，接近时长均值。代词“那”与判断动词“是”连接构成的句子是常见搭配，本实验中句 1、2、3、4、5、10、15 均为“那+是”组合，但其中“那”的时长差别还是很大的。最短的“**那**是谁”相对时长只有 0.61，因为“那是谁”句中宾语疑问代词“谁”是全句的语义焦点，又正好处在句子边界位置，句尾时长大大延长，造成句子首、中两个音节的时长相应地压缩。

四、不同功能代词相对时长的结果分析

4.1 时长短是代词的语音特征

我们考察的代词实验例句共有 352 句，涉及汉语的三个单音节人称代词和两个指示代词，分布在句子的首、中、尾不同的位置。除去书面语用法，各类代词几乎涵盖了所有在口语中使用的功能，尽量做到了类别上的多样性。从考察结果来看，以各自句子的平均音长为基准计算相对音长，绝大部分代词的相对音长都没有超过均值。个

别超过均值的例子相对值也很低，据此我们可以说时长短是代词的语音特征。这与前文所述林焘先生（1962）和捷克学者 Hana Třísková（2016）“人称代词轻读”的观点是相互印证的。时长短，导致在这个时间段内展开的音高特征不突出，从而带来了“轻”的听感。也就是说，两位学者的语感得到了本文实验数据的支持。而且不只是人称代词，两个单音节指示代词“这”和“那”大多数情况下也基本遵循了与人称代词类似的语音表现——轻读。

4.2 代词音长“短”的程度问题

众所周知汉语有轻声，比如“东西（指方向）——东 • 西（指物品）”“大意（大概意思）——大 • 意（不小心）”但轻声属词汇层面，与轻音不同。在汉语的研究中，要么不重视轻音的问题，要么把轻音与轻声相互混淆。这给本就复杂的汉语韵律问题带来了混乱。好在汉语语音学界逐渐厘清了两者的界限：轻声稳固失调，轻音不稳固，轻声的声学特征比较一致，轻音的变动范围较大，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轻声”北京人的语感比较一致，而对于“轻音”，北京人的语感往往不一致的原因（朱宏一，2009）

从时长上看，轻声时长是重读音节时长的一半左右（林茂灿、颜景助 1980；林焘 1983），这一结论在语音学界达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但轻音的时长没有如此一致的认可度，相反，它的最大特点是时长短，但短的程度不稳定。句中代词轻音的时长表现就体现了轻音的这一语音特点。本文考察对象中最短的相对时长是 0.479（见图 3），最长的 1.2（见图 5）

因此，轻声读成重读音节的一半即可，但轻音“轻”的程度问题却很难有像轻声那样明确的参考标准。因为轻音只在句中出现，而句子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4.3 影响音长的其他因素

既然音长短是轻音的特征，但短的程度不一，我们就有必要总结一下哪些因素会让代词轻音读得相对长一些。在被考察的 88 个例句中，综合图 2-图 6，我们总结一下影响代词音长的因素：1.情感因素。句意中附带较强烈的情感因素的句子，其中的代词读音略长。2.代词所处位置。处于句末边界调位置的代词轻音会读得略长。3.当代词用于平行句中对举时有强调的作用，此时代词读音略长。这一点指示代词“这”“那”的表现尤其突出。4.处于语义焦点位置的代词会时长增长。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语音本就为传达语义服务，焦点在语义上属于新信息，需要较强的语音来凸显。

五、结语

一般我们很难想象音长表现会与词类因素相关，比如我们很难说句子中的名词发音都比较长，动词都比较短……但代词类比较特殊，代词主要是指代功能，相较于其他实词类别，它的功能一致性较强，语义也相对比较“虚”。语音是为了表现语义的，代词的音长短与代词的语义虚化有关。

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即使单个音节说得很好的外国学生面对汉语句子也会犯难，如果按照把单音节拼接在一起的方式发音，效果就像机器语言。句中各音节的轻重缓急变化多端，很难确定。尤其是很多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到声调的音高表现上，要同时注意音长的分配就更难。实际上进入语流后各音节的音高特征会发生弱化，将每一个音节的升降曲直都发得很到位反而会导致整个句子的洋腔洋调。一个句子除少数语义焦点或强调重音读得比较重外，轻读才是更大量的存在。而轻读的发音首要的是控制音长，当音长压缩，音高自然会调节以便适应，在语速快的句子里音高甚至趋于平调。根据本文的考察，语流中代词的时长基本上处于句子平均音长的 60%到 100%之间，超过均值的主要是指示代词用于对举强调时，或者是代词恰好位于句子的焦点位置或边界调位置。

轻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类（指必读轻声而言），而轻音是一个开放的类，具有不确定性，是导致洋腔洋调的重要原因，有时甚至会影响或转变整个句意的表达。代词是典型的轻音类，即使受某些因素影响而略长，延长程度也有限。掌握了这个读音规律对于学习汉语的韵律有着明确的指导意义。当然，汉语的轻读是系列问题，还有待我们继续深入。

附记：从我跟随苏晓青先生读硕士起，就得到岩田先生的指点和提携。2018 年岩田先生来北京，我有幸送先生去机场登机，在路上，我向先生汇报了本文相关的研究，得到先生的鼓励，现在这篇文章算是向先生交的作业，以表达对岩田先生的仰慕和感谢。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2004 《现代汉语（重排本）》，商务印书馆
曹剑芬 1995 《连读变调与轻重对立》，《中国语文》第 4 期
曹剑芬 2007《加强对轻音特性的研究》，《燕园远去的笛声——林焘先生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

曹剑芬 2008《语音的变化———生成机制和交际意义》，《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曹剑芬 2011《韵律结构与语音的变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 3 期
江海燕、郭旭宏、张琳 2022《从三字组时长分布看汉语的词重音问题》（待刊）
林茂灿、颜景助 1980 《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方言》第 3 期
林　焘 1962《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中国语文》第 7 期
林　焘 1983 《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语言学论丛（第 10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林焘 1989 《汉语韵律特征和语音教学》，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路继伦、王嘉龄 2005 《关于轻声的界定》，《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吕叔湘 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涩谷周二 2005《日本学生汉语学习难点和重点的调查报告》，《汉语学习》第 1 期
邵艳秋等 2006 《自然风格言语的汉语句重音自动判别研究》，《声学学报》第 3 期
王韫佳　2004《音高和时长在普通话轻声知觉中的作用》，《声学学报》第 5 期
魏钢强 2005《北京话的轻声和轻音及普通话汉语拼音的注音》，《中国语文》第 6 期
吴洁敏 吕士楠 2011《试论感情语调的超常韵律特征》，《中国语文》第 6 期
吴宗济 1982《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中国语文》第 6 期
徐世荣 1998《汉语语句中音节的长度与强度的伴随性》，《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许洁萍、初敏、贺琳等 2000 《汉语语句重音对音高和时长的影响》，《声学学报》第 4 期
杨顺安 1992《北京话多音节组合的韵律特性的实验研究》，《方言》第 2 期
赵元任 1979《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张慧丽、潘海华 2019《汉语句尾信息焦点与重音实现》，《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朱宏一 2009《论轻声与轻音之区分》，《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
Michael Lewis. 1993. *The Lexical Approach:The State of ELT and a New Way Forward*,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Třísková, Hana. 2015. De-stressed words in Mandarin – a parallel with English. In: Hongyin Tao ed. *Integrating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a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John Benjamins, 2016. based on NACCL-27 conference paper
Třísková, Hana. 2014. De-stress in Mandarin: clitics, cliticoids and phonetic chunks. In: Istvan Kecskes ed.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based on the paper from the CASLAR 3

conference – Italy, Parma .
Třísková, Hana. 2019. Is the Glass Half-Full, or Half-Empty? The Alternative Concept of Stress in Mandarin Chinese.《韵律语法研究》第 2 期：64-105.
Xu, Yi. 1997. Contextual tonal variations in Mandarin. *Journal of Phonetics* 25, 61-83.

The Duration of Pronoun Words Which has Diffrent Function in Chinese

Haiyan Jiang
Chinese Departmen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experimental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duration types of pronoun words in Chinese. There are three monosyllable personal pronoun words in Chinese: NI (means *you*), WO (means *I* or *me*), TA (means *he* or *she*), and two monosyllable demonstrative pronoun words: ZHE (means *here*) and NA (means *there*). It is found that the total duration of all kinds of pronoun words are all tend to be short and the pitch of a short syllable can't be full shown so that the whole syllable sound weak. But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duration of pronoun words, such as the focus position in a prosodic unit; in comparison with an other pronoun word to emphasize; the duration of boundary position is long and the pitch is fully shown.

日语音高重音和语调互动关系的实验研究

—兼论与汉语声调和语调叠加共现关系的共性和差异*

王 萍[1]　王晓雯[2]

[1,2]南开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 本文对日语东京话独词句和简单句的韵律表现进行了系统的声学考察，得到其底层音高重音和表层语调的叠加共现方式和特征。通过日语独词句和汉语独词句的韵律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两种语言共性和差异并存。共性：“句末调”是两种语言疑问语气表达的最主要的承载者。差异：日语以“调形”变化作为疑问语气表达的手段，汉语则以“调阶”变化作为疑问语气表达的手段。二者的差异说明：日语和汉语底层的超音段特征（音高重音、声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其表层语调的运作方式和机制。

一、引言

韵律类型学（prosodic typology）根据词汇层面的超音段特征将世界语言划分为以下类型：词汇重音型、音高重音型、声调语言、以及兼具音强重音、音高重音、声调三者之中任意两种的语言（Jun, S.-A 2005）。英语、日语和汉语分别是上述三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就日语而言，音高重音是既定词语的固有特征，所以它的分布稳定，变化空间很小。但是，当词汇组成语调短语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如词汇重音、句法结构、焦点、话语结构等。Poser（1984）考察了日语语调的语音和音系层面的表现，认为降阶（downstep）和下倾（declination）两种机制在日语中同时存在，且前者的影响是主导性的。Venditti（2000）基于 AM（autosegmental-metrical theory）理论，通过对日语朗读语料库的考察发现：日语母语者是通过音高范围的变化来标记日语语句中某个部分的凸显的。Kawahara & Shinya（2008）通过研究实验室朗读语句发现：日语语调短语的特征是句末的音高降低、紧喉、停顿，以及句首显著的音高上升和重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类型学视角下汉语、日语韵律互动关系的对比研究”（21BYY190）的资助。

置。木部畅子（2010）比较了日语不同方言的疑问句，发现：东京、京都等方言使用上升调，而鹿儿岛、富山等方言使用下降调。Kubozono（2018）从音系学的角度考察了日语东京方言和鹿儿岛方言的疑问句语调，发现它们最大的差异为：东京方言的疑问句语调为上扬型，词汇层面的音高对比（音高重音）被很好地保留；而鹿儿岛方言的疑问句语调为下降型，词汇层面的音高对比消失。也就是说，词汇韵律特征独立于后词汇过程。在语调的应用研究方面，藤崎博也（Fujisaki）（1984, 2004）等一批日本学者一直致力于基于语音合成的韵律研究。

纵观以往对于日语语调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① 对于语句内部局部高低起伏的微观研究；② 以句子为单位，定量记录日语语调各种要素的宏观研究。相比之下，对于词汇层面的音高重音和语句层面的语调的互动关系探讨则相对较少。Hyman & Monaka (2011)认为词汇韵律与语调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系：（1）共存（accommodation）；(2)顺服（submission）；(3)阻断（avoidance/blockage）。 Venditti（2005）主张：不同语言是以不同方式来实现相似的目标-语调（intonational phrase），这些不同方式主要体现在词汇重音调（lexical accent tone）、重音短语调（accentual phrase tone）等基础层级的韵律特征上。由此可见，不同语言词汇、短语等基础层级的韵律特征（声调、音高重音、力重音）和语句韵律（语调）层级的互动关系，即不同韵律类型语言的语调实现方式研究具有重要的韵律类型学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日语标准语东京话为研究对象，集中考察它的音高重音和语调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和特征。然后基于独词句这个共同的平台，和汉语声调与语调的互动表现进行比较对照。力求发现这两种不同韵律类型的语言，当词汇层的音高重音/声调进入到语句层，它们是如何叠加共现的？其运作的方式和机制是什么？两种语言会表现出哪些共性和差异？希望本文的发现能够为韵律类型学提供必要的语言事实和例证参考。

二、实验说明

2.1 发音人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 8 位东京的在校大学生，4 男 4 女，他们都是在东京都内及周边的千叶县、埼玉县、神奈川县出生长大，母语是标准的东京话，年龄为 18-21 岁。

2.2 语料的设计

为了考察日语音高重音和语调的互动关系，本文选取音段（元音、辅音）完全相

同，只有音高重音不同的最小对比词对。分别将最小对比词对放置于两种语境中[1]：独词句和简单句。然后请发音人分别以陈述和疑问两种语气说出这些实验句。具体的实验句如下：

①独词句：

ハナ。/ハナ？（女子的名字）（hana 1 调）

花。/花？（hana 2 调）

鼻。/鼻？（hana 0 调）

② 简单句：

ハナがきれいだ。/**ハナ**がきれいだ?

（ハナ很漂亮。/？）

花が/きれいだ。/**花**がきれいだ?

（花很漂亮。/?）

鼻がきれいだ。/**鼻**がきれいだ?

(鼻子很漂亮。/?)

2.3 语料录制和数据测算

语料是在安静的环境下录制的，录音软件为 Praat。录音文件的格式为单声道、16 位、采样率为 22050Hz。每位发音人都使用标准的东京话，以自然状态、平稳语速说出实验句，每个句子连续说 3 遍，句与句间隔 4S，共得到 12*3*8=288 个样品句。

使用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speech-Lab）和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分别提取音高、音长和音强数据，然后以 Excel 和 SPSS 22 为平台进行数据的计算和统计。

三、日语独词句的韵律表现

本文分别考察了日语独词句“ハナ。/？”、“花。/？”、“鼻。/？”的音高、时长和音强的韵律表现。考察的目标：由以上最小对比词对构成的独词句，分别负载陈述和疑问语气后，词汇层的音高重音会如何调节？发生哪些变化？以及词汇层级的音高重音和语句层级的句调是如何实现叠加贡献的？

参考石锋、王萍（2014）提出的“语调层级系统”架构，本文以陈述语气的独词句（ハナ。; 花。; 鼻。）为无标记的基本模式（基式），进而观察在其基础上附加疑问语气（疑问句）、以及增加其他句子成分后（简单句）的变化模式（变式）的表现。

[1] 本文的实验句全部由远藤光晓先生过目并修改，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3.1 独词句的音高表现

分别提取 8 位发音人独词句的频率值，然后将频率值转化为半音值[2]。考虑到男性、女性发音生理上的显著差异，将两者分开计算。具体结果见图 1-图 3。

图 1a：男性　　图 1b：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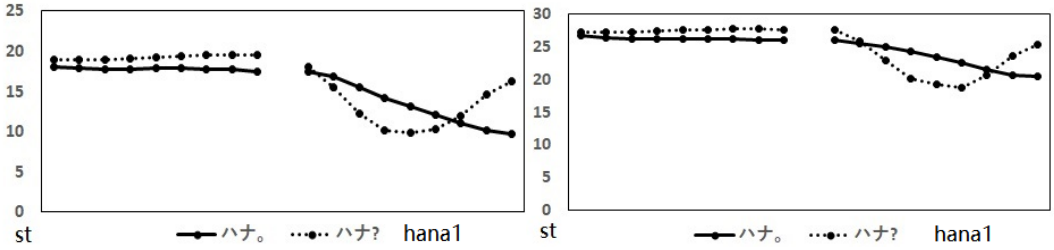


图 1：ハナ的音高表现

“ハナ”（hana1）是 1 调词。图 1 显示：陈述句ハナ，前音节（ハ）是平调，后音节（ナ）是降调。疑问句ハナ，前音节（ハ）依然是平调，只是略高于陈述句，后音节（ナ）为先降后升的曲折调。和陈述句相比，前音节变化不大，仍保持平调调型，且前后音节的位置关系保持不变，即前音节高于后音节[3]；与之相比，后音节变化显著，由降调变成了曲折调，即从音高曲线的中间位置（第 5 或第 6 个点）开始上升，末点的升幅达到最大（相对于陈述句的末点，疑问句的末点升幅，男性为 6.51St, 女性为 4.9St）。

图 2a：男性　　图 2b：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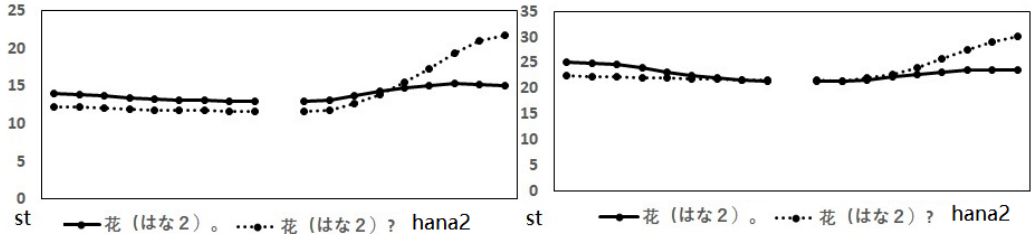


图 2：花的音高表现

[2] 从赫兹值到半音值的转换公式为：St=12*lg(f/fr)/lg2（其中“f”表示需要转换的赫兹数值，“fr”表示参考频率，男性设为 55 赫兹，女性设为 64 赫兹。）

[3] 陈述句ハナ的前音节调域：男，17.52St-18St；女，25.99St-26.69St。陈述句ハナ的后音节调域：男，9.8St-16.82St；女，20.50St-25.99St。疑问句ハナ的前音节调域：男，18.97St-19.60St，女，27.24St-27.74St。疑问句ハナ的后音节调域：男，9.85St-18St；女，18.75St-27.55St。

“花”（hana2）是 2 调词。图 2 显示：陈述句“花”，前音节（は）是平/微降调，后音节（な）是微升调。男性、女性前音节的音高降幅分别为 1St、3.61St；男性、女性后音节的音高升幅分别为 2.41St、2.38St。

疑问句，前音节（は）的降幅小于陈述句（男性、女性前音节的音高降幅分别为 0.67St、0.89St），更趋于平调，且音高略低于陈述句。后音节（な）是显著的升调（男性、女性后音节的升幅分别为 10.12St、8.84St）。

比较“花”的陈述和疑问语调，它们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后音节（な）由陈述句的“微升调”变为疑问句的显著的“高升调”。具体来说，疑问语气是通过提高后音节后半程的音高来实现的（陈述句和疑问句后音节末点/最高点的音高差值，男性为 6.73St，女性为 6.51St）。首音节变化不大。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花。”和“花？”后音节的第 8、第 9 个点的音高差异显著（F（1, 15）=5.345, sig.=.037；F（1, 15）=7.132, sig.=.018），其他各点音高差异均不显著。

图 3a：男性　　图 3b：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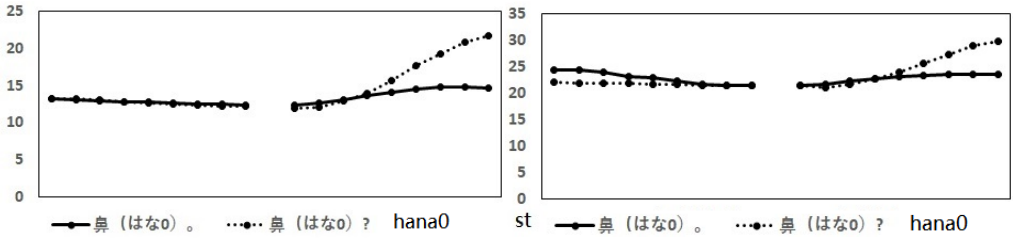


图 3：鼻的音高表现

“鼻”是 0 调词。图 3 显示：陈述句“鼻”，前音节（は）是平/微降调，后音节（な）是微升调。男性、女性前音节的降幅分别为 0.8St、2.86St。男性、女性后音节的升幅分别为 2.37St、2.1St。

疑问句，前音节（は）依然保持平/微降调形，音高位置和陈述句几乎重合。男性前音节的音高降幅和陈述句相同，女性前音节的前半部分略低（前音节的降幅为 0.62St），且降幅小于陈述句。后音节（な）是显著的升调(男性、女性后音节的升幅分别为 9.68St、8.72St。

比较“鼻”的陈述和疑问语调，它们的差别主要集中在后音节的后半程，即由“微升调”变为显著的“高升调”。这与 2 调词“花”的表现是一致的（陈述句和疑问句后音节末点/最高点的音高差值，男性为 6.97St，女性为 6.33St）。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鼻。”和“鼻？”后音节的第 8、第 9 个点的音高差异显著（F（1, 15）=5.254, sig.=.038；F（1, 15）=7.069, sig.=.019），其他各点音高差异均不显著。

3.2 独词句的时长表现

本文分别统计得到独词句“ハナ。/？”、 “花。/?”和“鼻。/？”的时长表现。具体结果见图 4。

图 4a： ハナ。/？的时长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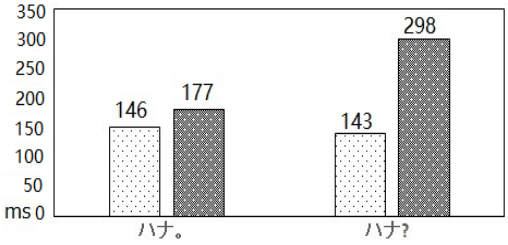


图 4b： 花。/？的时长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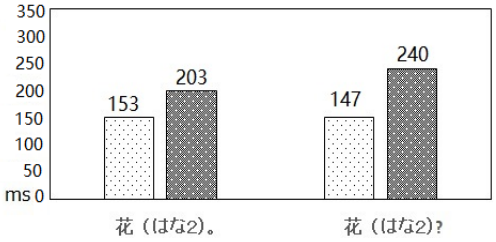


图 4c：鼻。/？的时长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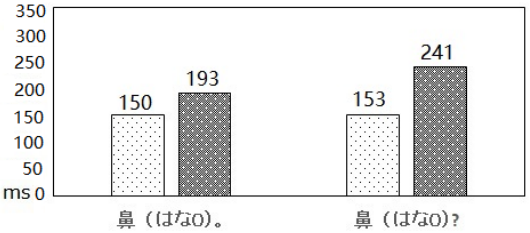


图 4：日语独词句的时长表现

图 4 显示，“ハナ。/？”、 “花。/?”和“鼻。/？”前后音节都呈现“前短后长”的时长分布。它们各自陈述句的前、后音节时长分别相差 31ms、50ms、43ms；它们各自疑问句的前、后音节分别相差 155ms、93ms、88ms，疑问句的音长差值显著大于陈述句。由此可见，后音节的延长是句边界的时长标志。和陈述句相比，疑问语气的表达是通过延长后音节的时长来实现的，前音节的时长变化不大。其中，和陈述句相比，疑问句“ハナ？”的后音节延长幅度最大，为 121ms, “花?”和“鼻？”疑问句的后音节延长幅度较小，分别为 37ms 和 48ms。它们的时长变化幅度与各自的音高重音关系密切，“ハナ”是 1 调，后音节由降调变为曲折调，“花”和“鼻”分别为 2 调和 0 调，后音节由微升调变为高升调。根据发音特点，曲折调比高升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陈述和疑问两种语气的“ハナ。/？”后音节的时长差异显著（F（1, 15）=27.301, sig.=.000），陈述和疑问两种语气的“花。/?”后音节的时长差异显著（F（1, 15）=4.785, sig.=.046），陈述和疑问两种语气的“鼻。/？”后音节的时长差异显著（F（1, 15）=9.317, sig.=.009）。

3.3 独词句的音强表现

本文以幅度积[4]为单位，统计得到独词句“ハナ。/？”、 “花。/?”和“鼻。/？”的音强表现。具体结果见图 5。

图 5a： ハナ。/？的音强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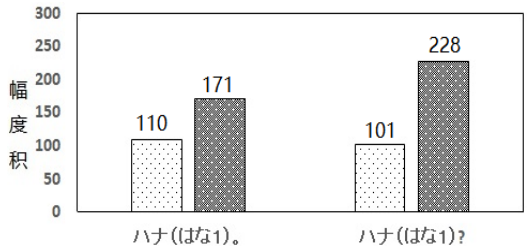


图 5b： 花。/？的音强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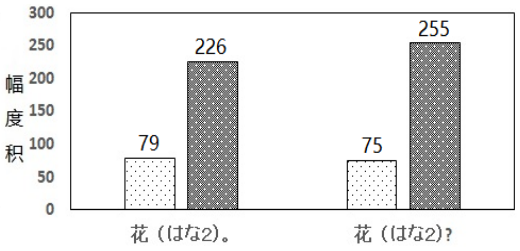


图 5c：鼻。/？的音强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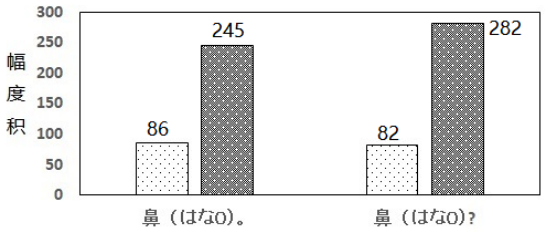


图 5：日语独词句的音强表现

图 5 显示：“ハナ。/？”、 “花。/?”和“鼻。/？”前后音节的音强分布都是前低后高，这与它们的时长分布是一致的。它们陈述句前后音节的音强差值分别为 61、147、159；它们疑问句前后音节的音强差值分别为 127、180、200，疑问句的音强差

[4] 幅度积的计算综合考虑了“振幅”和“时长”这两个对于声音强度感知的影响因素。具体公式如下：

某段语音的平均振幅＝各采样点绝对值之和 /（采样率×时长）（时长为所选段的语音时长，单位为“秒”）

某段语音的幅度积＝平均振幅×时长（时长为所选段的语音时长，单位为“秒”）

值显著大于陈述句。陈述句的边界效应、疑问语气的表达均在后音节的音强上有对应表现。相对于陈述句的后音节，疑问句的后音节音强值分别增加了 57、29、37，“ハナ？”的增幅最大，“花。/?”和“鼻。/？”的增幅较小。总体来看，独词句“ハナ。/？”、 “花。/?”和“鼻。/？”的音强和时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相关分析统计结果显示：“ハナ。/？”、 “花。/?”和“鼻。/？”的音长和音强显著相关（r=.833**，sig.=001）。

四、日语简单句的韵律表现

本文分别将最小对比词对“ハナ”、“花”、“鼻”放置在句首位置，构成陈述和疑问两种语气的简单句。然后测算它们的音高、时长和音强值。目的是考察：①最小对比词对进入简单句后，其音高重音会发生哪些变化；②简单句的语气表达方式是否和独词句一致？

4.1 音高表现

图 6a：男性ハ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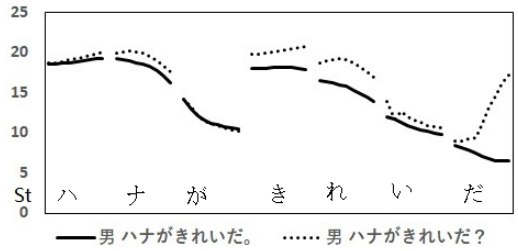


图 6b：女性ハ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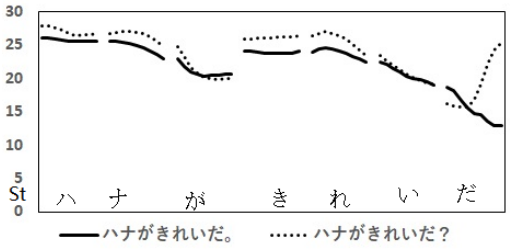


图 6c：男性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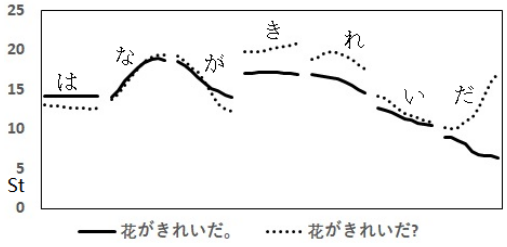


图 6d：女性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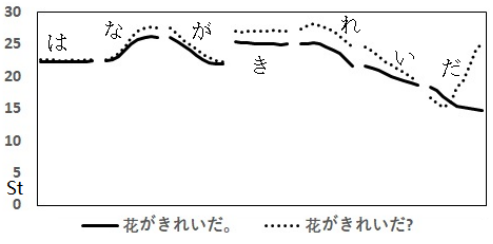


图 6e：男性鼻

图 6f：女性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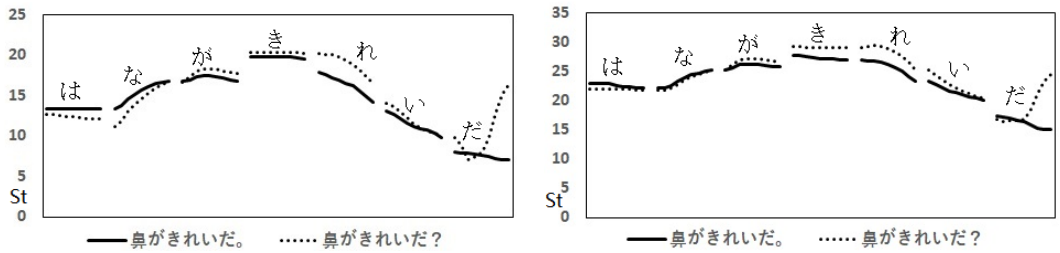


图 6：日语简单句的音高表现

图 6 显示：ハナ、花和鼻的陈述句和疑问句的最大区别就是句尾助词“だ”。疑问句的句尾助动词“だ”由陈述句的降调变为升调，陈述句和疑问句“だ”的终点差值分别为：ハナ，10.77St（男）和 12.47St(女)；花，10.62St（男）和 10.39St(女)；鼻，9.36St（男）和 9.28St(女)。除“だ”外，疑问句其他音节的音高基本以“が”为界分为两种，“が”之前的音节（包括“が”），疑问句和陈述句接近或重合；“が”之后的音节，尤其是“き”和“れ”，疑问句显著高于陈述句。为末尾“だ”的上升做准备，“い”的音高要有所下降，位置靠近陈述句的“い”。除“だ”外，疑问句各音节的调形和陈述句基本一致。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ハナ组、花组、陈述句和疑问句的总体音高差异均显著。具体结果：ハナ组，男性，F（1,125）=5.819, sig.=.017，女性，F（1,125）=6.967, sig.=.009；花组，男性，F（1,125）=5.413, sig.=.022，女性，F（1,125）=8.269, sig.=.005。鼻组，陈述句和疑问句的总体音高差异不显著。三组句末音节“だ”的音高差异（陈述句和疑问句）均显著。ハナ组，F（1,35）=7.571, sig.=.00914；花组，F（1,35）=7.111, sig.=.012；鼻组，F（1,35）=4.224, sig.=.048。

总体来看，疑问句和陈述句的音高差异主要集中在句末音节“だ”。位于句首的ハナ、花和鼻，疑问语气并不会改变它们在陈述句中词调的音高走向，而且调阶位置和陈述句基本相同。但ハナ、花和鼻的词调会显著影响其后的音节（尤其是“だ”），使疑问句和陈述句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具体来说，ハナ组，差异最大，花组其次，鼻组最小。

4.2 时长表现

图7a：ハ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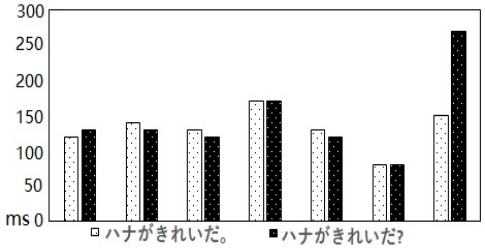


图7b：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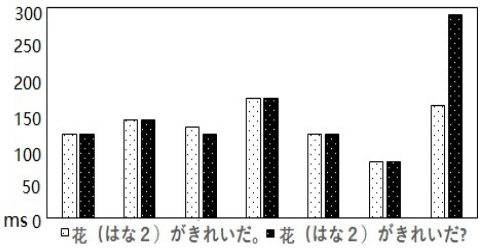


图 7c：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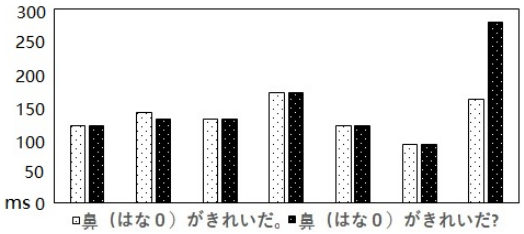


图 7：日语简单句的时长表现

图 7 显示：①比较陈述句和疑问句，二者最显著的时长差异仍然集中在句末助词“だ”。表现为疑问句的“だ”显著提升。和陈述句相比，ハナ、花和鼻组分别上升 119ms、124ms、120ms。②其他音节的时长，陈述句和疑问句相近或相等。③和独词句相比，ハナ、花和鼻三个词进入简单句后，它们各自前后音节的时长差值显著缩小[5]。这与它们在简单句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和独词句相比，它们不再位于边界位置，边界效应也就随之消失。另外，它们位于句首，不是疑问语气的承载者，所以词的末音节时长没有显著增加。④“が”位于句首韵律词（如，ハナが/はなが）的边界位置，但时长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两个非边界位置的音节“は/ハ”、“な/ナ”还短，这与汉语三音节词调域的边界位置上音节的延长是不同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ハナ组、花组、鼻组，各组内部陈述句和疑问句的句末音节“だ”的时长差异均显著。ハナ组，F（1,15）=31.955, sig.=.000 ；花组，F（1,15）=22.705, sig.=.000；鼻组，F（1,15）=25.679, sig.=.000。其他位置的音节时长差异均不显著。

[5] ハナ、花和鼻三个词前后音节的时长差值：独词句， 31ms、50ms、43ms（陈述句），155ms、93ms、88ms（疑问句）；简单句，23ms、23ms、19ms（陈述句），2ms、13ms、16ms（疑问句）。

4.3 音强表现

图8a：ハ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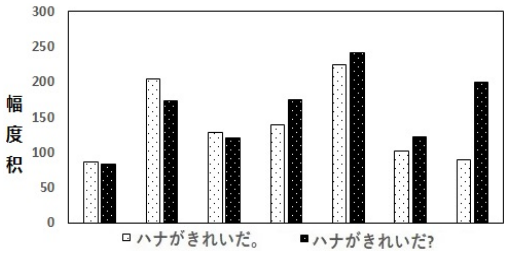


图8b：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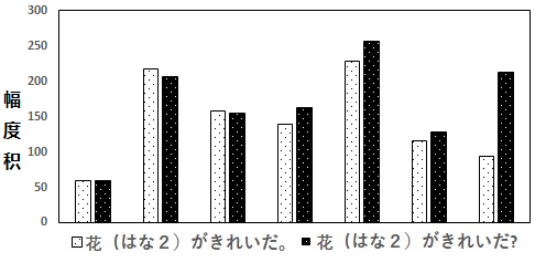


图8c：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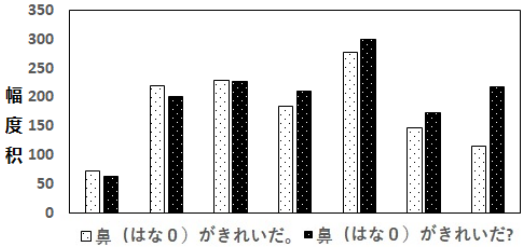


图 8： 日语简单句的音强表现

图 8 显示：①陈述句和疑问句中，音强值最大的音节都是谓语的“れ”，即整体音强走势呈现为以“れ”为峰值的曲线。同时，音强的边界效应不明显。具体来说，每个韵律词内部（ハナ / 花 / 鼻が；きれいだ），音强最大值并不是出现左/右边界位置，而是中间位置。②疑问句和陈述句相比，主语部分（ハナ / 花 / 鼻が）表现为陈述句略高于疑问句，首音节和末音节差距较小（1-10），中间音节差距较大（11-31）；谓语部分（きれいだ）则相反，表现为疑问句高于陈述句，其中“だ”，二者相差的幅度最大（109，119，102），其他三个音节相差的幅度较小（13-35）。由此可见，句末助词“だ”是疑问语气最重要的承载者，音强方面和其音高、时长具有相对应的表现。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ハナ组、花组、鼻组，各组内部陈述句和疑问句的句末音节“だ”的音强差异均显著。ハナ组，F（1,15）=5.244, sig.=.038 ；花组，F（1,15）=8.183, sig.=.013 ；鼻组，F（1,15）=4.620, sig.=.050。其他位置音节的音强差异不显著。

五、日语、汉语独词句的韵律比较

为了回答“日语底层的音高重音、汉语底层的声调和表层的语调叠加时，它们各自的表现究竟会有怎样的共性和差异？”，我们将日语和汉语的独词句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考虑到日语最小对比词对（ハナ／花／鼻）的调形（首音节为平调，末音节分别为平调、升调、降调和曲折调），本文将汉语独词句的语料设计为首音节为阴平，末音节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的四组最小对比对。这四组汉语独词句分别是“天仙。/？”、“天贤。/？”、“天险。/？”、“天线。/？”。邀请 4 位发音人[6]分别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以陈述和疑问两种语气说出以上四组语句。本文分别从音高、时长和音强三个维度对日语和汉语的独词句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

5.1 日语、汉语独词句的音高比较

图 9 是汉语四组独词句的音高表现（陈述句和疑问句），将其与日语独词句（图 1-图 3）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日语和汉语独词句的末音节音高对比参见图 10 和图 11。

图 9a　　图 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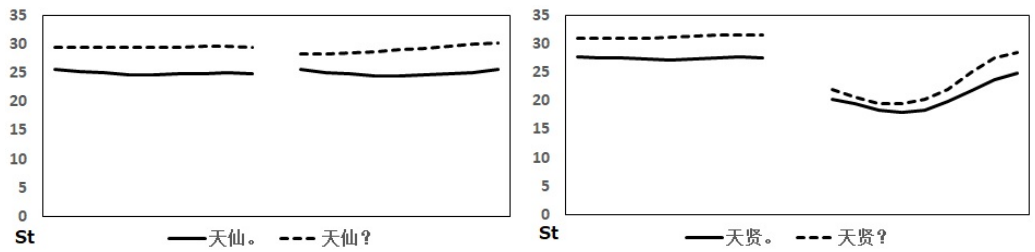


图 9c　　图 9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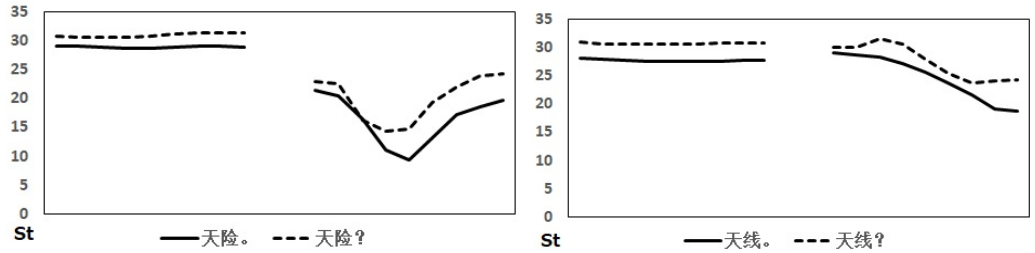


图 9：汉语独词句的音高表现

[6] 这 4 位发音人全部为女性，她们都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地道北京人，年龄在 20-23 岁之间。每个独词句以自然语速连续说三遍，句与句间隔 4s。

对比图 1-3 和图 9，可知：日语独词句和汉语独词句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表现为：句末音节在疑问语气的表达中均发挥着主要作用（“句末调”）。差异表现为：①“句末调”的实现方式不同。日语是通过改变句末调的调形来完成疑问语气的表达。具体来说，降调（ハナ）变为曲折调，平调（“花”、“鼻”）变为“升调”。和陈述句相比，疑问句末音节的调阶（register）并没有显著上升。汉语则是通过抬升“句末调”的调阶来完成疑问语气的表达，同时保持声调调形不变，这种实现方式与汉语声调的表意功能紧密相关。②整体调阶，日语疑问句的整体调阶并没有表现出稳定的升高或降低的趋势，同时变化幅度很小，在 1-1.5St 之间；汉语疑问句的整体调阶则显著升高，且首、末音节均显著升高。其中首音节的升幅为 2.28-4.6St，末音节的升幅为 2.62-4.95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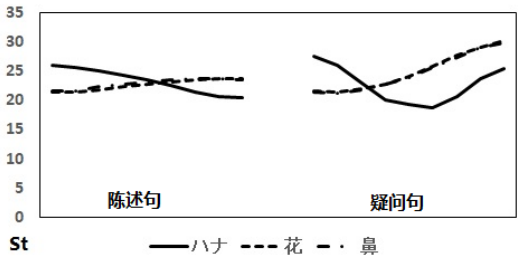


图 10：日语独词句的末音节音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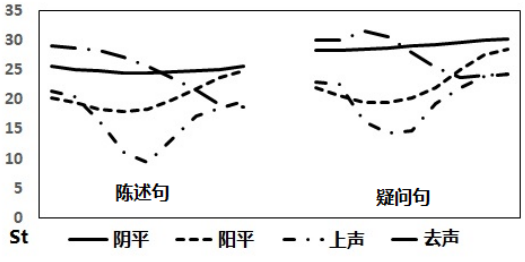


图 11：汉语独词句的末音节音高

赵元任（1933）提出著名的“橡皮带效应”，形象地说明了汉语字调和语调的关系，即字调和语调叠加时，调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疑问句来说，就是整体调域的提升和扩展。吴宗济（1982、1996）、曹剑芬（2002）明确指出汉语字调和语调叠加的结果是改变字调的调阶，而调形则保持不变。

5.2 日语、汉语独词句的时长比较

图 12 是汉语独词句的时长表现，同时与日语独词句的时长表现（图 4）进行对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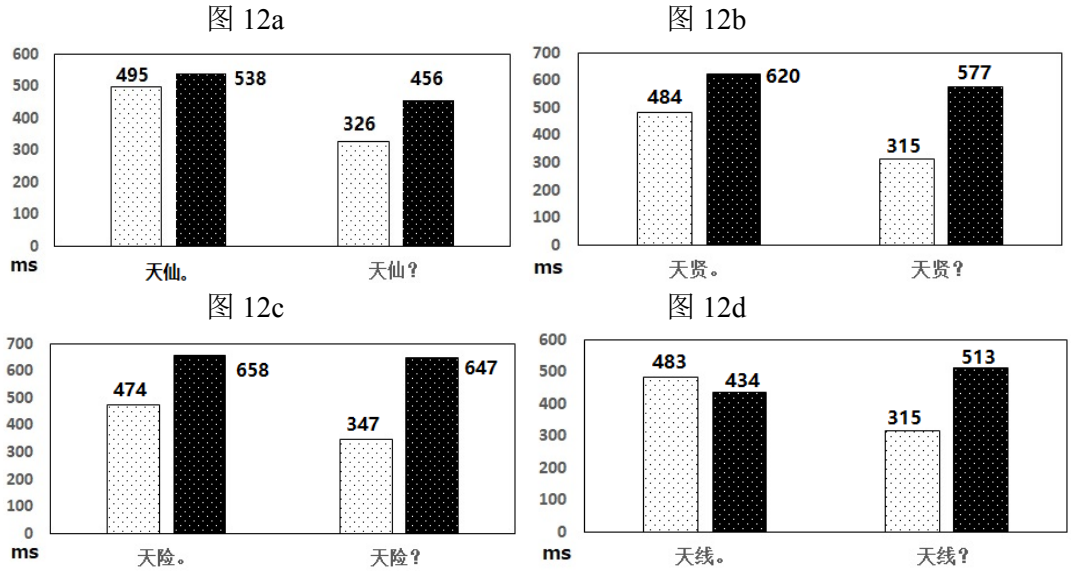


图 12: 汉语独词句的时长表现

比较日语独词句（图 4）和汉语独词句（图 12）的时长表现，可知二者共性和个性并存。共性：由于边界效应的作用，无论日语还是汉语，基本上都是末音节的时长大于首音节。疑问句首、句末音节的时长差值均大于陈述句。个性：两种语言疑问语气的首、末音节时长差值的增长方式不同。具体来说，日语疑问句是通过大幅度延长末音节的时长；汉语疑问句主要是通过大幅缩短首音节时长，小幅缩短或延长末音节时长来实现的。

汉语陈述句首音节时长为 474ms-495ms，末音节的时长为 434ms-658ms，疑问句首音节的时长为 325ms-347ms，末音节的时长为 456ms-647ms；日语陈述句首音节时长为 146ms-153ms，末音节的时长为 177ms-203ms，疑问句首音节的时长为 143ms-153ms，末音节的时长为 240ms-298ms。总体来看，汉语的音节时长是日语的 2-3 倍，这恰恰从实验的角度证实了汉语正常音节（单韵母、双韵母）是双莫拉结构（王洪君 1999：242），日语音节是单莫拉结构（服部四郎 1979）。

总体来看，首、末音节差值的增加是日语和汉语独词句疑问语气的时长实现方式，只是它们的实现方式有所不同（上文已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5.3 日语、汉语独词句的音强比较

图 13 是汉语独词句的音强表现，同时与日语独词句的音强表现（图 5）进行对比分析。

图 1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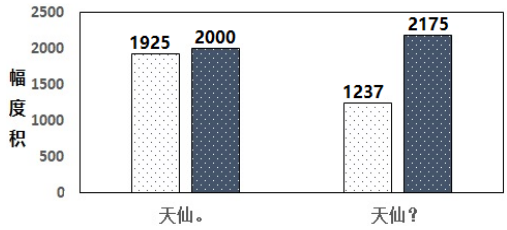


图 1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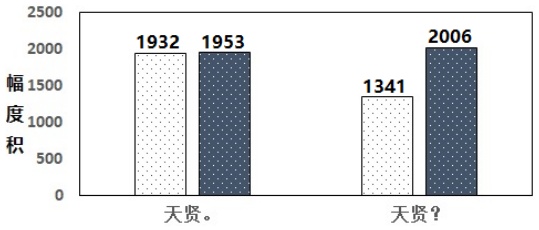


图 13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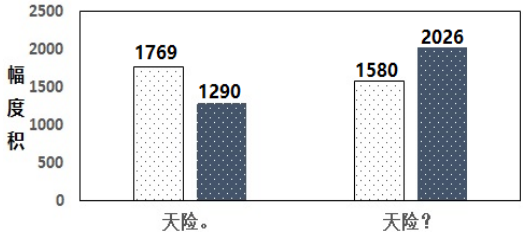


图 13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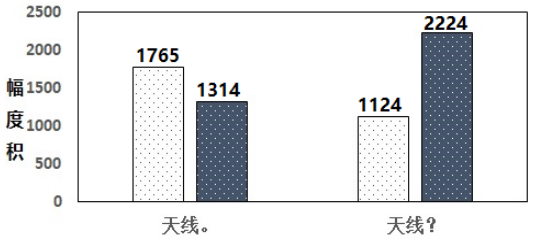


图 13：汉语独词句的音强表现

比较图 13 和图 5，汉语和日语独词句的音强表现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汉语和日语都表现为疑问句的首音节音强值低于陈述句，末音节的音强值高于陈述句，即音强对于疑问语气的表达有显著贡献。差异：①汉语独词句首、末音节的音强值均显著大于日语，前者普遍为后者的 8-20 倍。具体来说，汉语陈述句的音强值，首音节为 1765-1932，末音节为 1290-2000；汉语疑问句音强，首音节为 1124-1580，末音节为 2006-2224。日语陈述句的音强值，首音节为 79-110，末音节为 171-245；日语疑问句的音强值，首音节为 75-101，末音节为 228-282。②汉语陈述句，首、末音节音强的大小关系不稳定，“天仙”、“天贤”均为末音节大于首音节，“天险”和“天线”均为首音节大于末音节。而日语陈述句，均稳定地表现为末音节大于首音节。这说明：对于汉语而言，边界效应在音强上的表现不稳定，而对于日语而言，边界效应在音强上的表现则相对稳定。

六、结语

本文对日语东京话独词句和简单句的韵律表现进行了细致的声学考察，得到了其底层音高重音和表层语调叠加共现的方式和特征。然后以独词句这个共同平台为基础，与典型的声调语言-汉语普通话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两种语言的韵律表现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这一结果说明:虽然不同语言表层的语调表现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陈述句

主要表现为音高下倾（declination），疑问语气的表达主要集中在“句末调”等，但其各自语言内部底层的超音段特征（音高重音、声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其表层语调的运作方式和机制。具体说明如下。

日语独词句：不同音高重音的最小对比词对，负载陈述和疑问语气之后，在音高、时长和音强三个维度上均有变化。和陈述句相比，疑问句的变化（音高的升高、时长的延长、音强的增强）都集中体现在末音节上，末音节是疑问语气表达最重要的承载者，首音节则基本不变。与此同时，不同音高重音的最小对比词对的变化方式和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和陈述句相比，音高，词调为 1 调的“ハナ？”的末音节由“降调”变为“曲折调”，2 调的“花”和 0 调的“鼻”则由“微升调”变为“高升调”；时长和音强，“ハナ？”的末音节时长和音强的增幅均显著高于“花?”和“鼻？”。

日语简单句：从音高的表现来看，疑问语气对于语句的影响是局部的，它的影响范围主要是谓语部分，且句末助词“だ”的变化最显著，即“だ”是疑问语气最重要的承载者，而对于句首的 “ハナ”、“花”和“鼻”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对于陈述句，“ハナ”、“花”和“鼻”后面的部分（“きれいだ”，尤其是“だ”），疑问句音高的上升幅度不同（ハナ组最大，花组其次，鼻组最小），这说明它们的音高重音/词调会对语句音高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汉语的表现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汉语的疑问语气对于语句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表现为全句的音高提升和调域扩展（王萍等，2017）。和音高相同，陈述句和疑问句的时长和音强的最显著差异同样集中在句末助词“だ”，即通过提升句末助词“だ”的时长和音强来完成疑问语气的表达。和独词句相比，“ハナ”、“花”和“鼻”三个词进入简单句后，它们各自前后音节的时长、音强差值大幅度减小，这与它们不再处于边界位置和句末位置有密切关系。另外，日语边界位置的音节“が”没有显著延长，这与汉语边界位置的音节时长延长（孙颖，石锋 2011）、音强增强（谢中仁 2018）的表现是不同的。当然，日语和汉语简单句的对比研究还需要设计更严格、可比性更强的实验句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日语独词句和简单句的表现充分证明：日语疑问语气最重要的承载者是句末音节，即“句末调”。

日语独词句和汉语独词句的对比结果显示：二者的韵律表现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句末音节，即“句末调”是两种语言疑问语气表达的最重要的承载者，这表现在音高、时长和音强三方面。音高共性，日语和汉语句末调的音高变化最显著；时长共性，两种语言都呈现首音节短、末音节长的对比分布；音强共性，两种语言都是通过提升末音节的音强来实现疑问语气的表达。同时，二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音高差异：日语是通过改变句末调的调形来实现疑问语气表达的，而汉语是通过抬升包

括“句末调”在内的整体调阶（“句末调”的抬升幅度大于首音节）、同时保持首、末音节的调形不变来完成疑问语气表达的。这种差异是由日语、汉语底层音高的特性决定的。具体来说，日语是音高重音语言，词内部各音节的高低对比，即“调阶”（register），是区别词义的超音段层面的“区别性特征”，而“调形”是“非区别性特征”。当表层的疑问语调和底层的音高重音叠加时，只要保证词内部各音节的高低位置关系/“词调”不变，就不会改变对于词意的感知和理解。王士元（2002）提出：和采用 5 个调级相区别的“-拱度”声调相比，“+拱度”声调多采用两个调级来区别，它主要是通过“拱度”（调形，如，升、降、曲折）的不同来实现词义的区别。汉语是典型的“+拱度”声调语言，“调形”是“调位”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区别性特征”，所以为了保证词义相互区别的稳定性，其变化是严格受限的。胡明扬（1987）、Nien-chuang Chang（1958）、Xu,Yi（2002）的研究都表明：汉语语调不是音高的升降问题，而是调域高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不改变声调调形的前提下，通过提高或压低声调调域的方式来完成语气的表达。时长差异：日语的末音节时长显著延长，进而和音高形成了较强的对应关系。与之相比，汉语是通过首音节时长的大幅缩短，末音节时长的小幅缩短或延长，从而形成首、末音节更大的差值。日语和汉语的对比结果证明：底层词汇的韵律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表层语句韵律的变化方式和程度，也就是说前者为后者的变化预先设定了很多不可逾越的限制，后者只能在这个限定范围内获得相对的自由。不同语言的超音段特征对于其语调的影响方式和程度是怎样的？它们是否具有类型上的共性和差异？这还需要更多语言的相关实证研究。

从音高、时长和音强的变化步调来看，日语独词句中三者的变化表现得更为同步，关系更加紧密；与之相比，汉语独词句中三者的关系则较为松散，从疑问语气表达的贡献度来看，音高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音强，时长的贡献不明显。当然，这个从声学角度得到的结论还需要后续的感知实验来验证。另外，作为两种韵律类型的语言，从绝对数值来看，汉语音节的时长是日语音节的 2-3 倍，汉语音节的音强是日语音节的 8-20 倍。这一语音实验的结果与音系学上对于日语和汉语的音节类型的分析是吻合的，即日语是“轻音节”，是单莫拉（mora）结构，而汉语是“重音节”，是双莫拉结构。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日语的独词句和简单句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今后还要对日语的复杂句、焦点句、以及其他的功能语气句进行系统考察，并与汉语相对应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从韵律类型学的宏观角度有更多发现。

参考文献

曹剑芬 2002 汉语声调与语调的关系，《中国语文》第 3 期，195-202。

胡明扬 1987 关于北京话的语调问题，《北京话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64。

石锋，王萍 2014 汉语韵律层级系统刍议，《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1-12。

孙颖，石锋 2011 普通话焦点句的时长表现，《中国语音学报》第 3 辑，70-76。

王洪君 1999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萍、邓芳、石锋 2017 较大样本的普通话陈述句和疑问句的音高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 4 期，59-68。

王士元 2002 声调的音系特征，《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147-169。

吴宗济 1982 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中国语文》第 6 期，439-339。

吴宗济 1996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清华大学学报》第 3 期，60-65。

谢中仁 2018 普通话语调基式与变式的音量比实验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赵元任 1933 汉语的字调跟语调，《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34-749。

服部四郎 1979『新版音韻論と正書法』，東京：大修館書店。

木部暢子 2010 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の地域差–疑問文のイントネーション–. 小林隆、篠崎晃一（編）『方言の発見　知られざる地域差を知る』1-20. 東京：ひつじ書房。

Chang, Nien-chuang. 1958. Tone and intonation in the Chengdu dialect (Szechuan, China), *Phonetica*, 2: 59-85.

Fujisaki, Hiroya & Keikichi Hirose. 1984. Analysis of voice fundamental frequency contours for declarative sentences of Japanes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Japan* (E) 5 (4):233-242.

Fujisaki, Hiroya. 2004. Information, prosody, and modeling-with emphasis on tonal features of speech, *Proceedings of Speech Prosody 2004*, Nara, 1-10.

Hyman, Larry M. & Kemmonye C. Monaka. 2011. Tonal and non-tonal intonation in Shekgalagari. In Sonia Frota, Gorka Elordieta and Pilar Prieto (eds), *Prosodic categories: production, perception and comprehension*, 267-290. Berlin: Springer Verlag.

Jun, S.-A. 2005. Prosodic Typology: The Phonology of Intonation and Phras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wahara, Shigeto & Takahito Shinya. 2008. The Intonation of Gapping and Coordination in Japanese: Evidence for Intonational Phrase and Utterance, *Phonetica* 65: 62-105.

Kubozono, Haruo. 2018. Question and Vocative Intonation in Japanese, *UCSC Phonology Colloquiu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Poser, William John. 1984. Th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one and Intonation in Japanese, Ph.D.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enditti, Jennifer J. 2000.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Attentional Salience Effects on Japanese Intonation,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Venditti, J. J. 2005. The J ToBI model of Japanese intonation, In S.-A. Jun (ed.), *Prosodic Typology: The Phonology of Intonation and Phrasing*, 172-200.

Xu, Yi（许毅）. 2002. Sources of tonal variation in connection speech.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7):1-31.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itch Accent and Intonation in Japanese: With a Study of the Common and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Superposition and Co-occurrence in Underlying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and Intonation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Wang Ping [1]　Wang Xiaowen [2]

[1, 2]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acoustic study on the prosodic representation of single word sentences and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Tokyo dialect of Japanese, and obtained the patterns and features of the superposition and co-occurrence of underlying pitch accent and surface intonation. By comparing the prosody of single word sentence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we find that the two languages have both common and different features. Their common feature is that the “sentence final tone” is the main carrier of the interrogative mood in both languages. Their differe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Japanese expresses the interrogative mood using “contours”, while Chinese uses “register”.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ndicates that the underlying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pitch accent and tone)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greatly affect and even determine the method and mechanism of their surface intonation.

上海語窄用式変調の再考

髙橋　康徳
神戸大学

要旨：上海語の窄用式変調には「音声的な弱化現象」と「音韻的な水平化現象」という対立する解釈が提案されており、近年急速に発展した実験音韻論的考察は前者の主張を一貫して支持してきた。本研究では持続時間という要因に注目して再分析を行った結果、窄用式変調は上記解釈の両方を反映する特性を併せ持つことを指摘する。

1.　上海語の基本声調と 2 種類の変調

上海語は漢語呉方言グループに属しており、主に中華人民共和国上海市で使用される。他の漢語方言と同様に声調言語であり、単独音節時には 5 種類の基本声調（citation tone）が実現する。上海語の基本声調の調値を表 1 に示す。なお、本稿では若年層が使用する「新派上海語」のみを考察対象とする。

表 1.　上海語の基本声調の調値（許ほか 1988: 8）

	T1	T2	T3	T4	T5
声調名	陰平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値	53	34	23	55	12

上海語では一部の機能語を除くとほぼ全ての形態素（音節もしくは漢字）で上記の基本声調が指定される。しかし、複数音節から成る語や句には広用式変調（left-dominant sandhi）と窄用式変調（right-dominant sandhi）という 2 種類の変調が適用されるため、実際の発話や文で基本声調がそのまま出現することは多くない。

広用式変調は「第 1 音節の基本声調が語全体のピッチ形を決定し、第 2 音節以降の声調の区別がなくなる」（許ほか 1988: 24）という現象である。変調適用時の 2, 3 音節語の調値を表 2 に示す。音響音声学的分析の結果も表 2 の調値と基本的には一致する（Chen 2008, Takahashi 2013）。

表 2.　広用式変調の調値（許ほか 1988: 24）

第 1 音節	2 音節語	3 音節語
T1: 53	55. 21	55. 33. 21
T2: 34	33. 44	33. 55. 21
T3: 23	22. 44	22. 55. 21
T4: 55	33. 44	33. 55. 21
T5: 12	11. 23	11. 22. 23

2.　上海語の窄用式変調に関する先行研究

本稿では広用式変調ではなく窄用式変調を考察対象とする。窄用式変調を扱った先行研究は広用式変調と比べると数が少ないが、それでも方言記述、生成音韻論（特に韻律理論）、実験音韻論と多様な観点からの分析が行われている。以下では個々の観点ごとに先行研究を整理して紹介する。

2.1 漢語方言学の枠組みによる記述研究

窄用式変調を初めて体系的に記述したのは許ほか (1981)である。彼らの調査グループの成果を総合的にまとめた許ほか (1988: 42)によると、窄用式変調は適用範囲が広用式変調よりも狭く、動詞＋目的語、主語＋述語、動詞＋補語などの句、および述語的な役割を持つ修飾構造の句で起きると指摘している。具体例を(1)に示す。

(1) 窄用式変調の例（許ほか 1988: 42）

	文法構造	例	基本声調	窄用式変調
a.	動詞＋目的語：	打 球 tã. dʑiɤ 「球を打つ」	34. 23 (T2. T3)	**44**. 23
b.	主語＋述語：	雨 大 ɦy. du 「雨が強い」	23. 23 (T3. T3)	**33**. 23
c.	動詞＋補語：	記 牢 tɕi. lɔ 「しっかり覚える」	34. 23 (T2. T3)	**44**. 23
d.	修飾構造：	哈哈 笑 hA. hA. ɕiɔ 「ハハハと笑う」	53. 53. 34 (T1. T1. T2)	55. **44**. 34

(1a–c)のように 2 音節の句では、第 1 音節の声調に窄用式変調が適用される。(1d)は“哈哈”「ハハハ（擬音語）」と “笑”に分かれるが、前部要素の最終音節である第 2 音節に窄用式変調が適用されると許ほか (1988)は考える。前節で扱った広用式変調は第 1 音節の基本声調が語全体のピッチを決定するが、窄用式変調は後部要素の声調がそのまま保持されるため、Zhang (2007)などは前者を“left-dominant sandhi”、後者を“right-dominant sandhi”と主要部（head）に注目した呼称を用いる。変調適用時の調値を表 3 に示す。表 3 では上昇調と下降調が全て水平調（level tone）に変化し、さらに T1 と T2 がともに[44]という同一の調値を取っている。

表 3.　窄用式変調の調値（許ほか 1988: 25）

	基本声調	窄用式変調
T1	53	44
T2	34	44
T3	23	33
T4	55	44
T5	12	22

では、上海語の音韻体系の中で窄用式変調はど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られるべきだろうか。この問題について、石 (1995: 188)は「窄用式変調は単独音節で変調域を形成した際などに発音をスムーズにするため音節末尾のピッチが変化する現象」であり、遅い発話速度では基本声調に近い形式を取るが速い発話速度では「異なる形式」を取ると述べている。これはすなわち、窄用式変調を音声的な弱化もしくは調音結合（coarticulation）として扱う解釈と言える。同様の解釈は銭 (1997: 14)も提案している。

2.2 韻律理論を利用した分析

一方、生成音韻論（特に韻律理論）の枠組みに基づいて窄用式変調を分析した研究では別の解釈が提案されている。上海語の変調に生成音韻論的な分析を初めて適用したのは Zee and Maddieson (1979)だが、考察対象は広用式変調に限定されていた。それ以降の理論的研究も広用式変調のみを考察するものが大半であったが、Chen (2000)は窄用式変調も考慮に入れた総合的な考察を試みた。彼の分析は Duanmu (1993: 26)が提案した上海語のストレス付与規則群に依存しており、句レベ

ルでのストレス付与規則「句レベルでは右側を主要部としてストレスが循環的（cyclic）に付与される」を利用する。例えば(2)に示すように「動詞＋目的語」から成る動詞句では目的語（右側）を主要部として句ストレスが付与される。

(2) 動詞句における句レベルのストレスの付与（x: ストレス; cf. Duanmu 1993）

句ストレス：　　x
打　　球
「球を打つ」

(2)の第 1 音節“打”は句ストレスを持たない「弱」の性格を有することになるが、Duanmu (1993)の提案した上海語のフットは「強弱格（trochee)」に限られるため、第 2 音節“球”と 1 つのフットを形成できずに弱ストレスのまま単独音節でフットを形成するしかない。このような単独音節から成るフットの音声実現について Duanmu (1993: 30)は基本声調がそのまま実現すると主張したが、これでは表 3 の調値と一致しない。この欠点を補完するために Chen (2000: 314–315)は「弱ストレスの単独音節は上昇調や下降調のような曲線声調を保持できず、水平声調に単純化する」と主張し、(3)に示すような音韻規則を提案した。

(3) Chen (2000: 315)が提案した窄用式変調での声調素性の変化（q：入声）

	基底表示		窄用式変調
T1	HL		H
T2	MH		H
T3	LH	→	M
T4	MHq		Hq
T5	LMq		Lq

(3)の規則は声調素性の変化を伴うため、Chen (2000)が窄用式変調を音韻的な水平声調化かつ T1 と T2 の中和現象と見なしているのは明らかである。Chen (2000)の解釈は音声的な弱化現象と見なす石 (1995)の解釈とは対立する。

2.3 実験音韻論的手法に基づいた分析

上記の対立する 2 つの解釈の妥当性を検証したのは、2000 年代から急速に発展

した実験音韻論（Laboratory Phonology）的なアプローチであった。この問題を最初に考察した髙橋 (2011, 2013)は、上海語母語話者に動詞＋目的語構造の枠文を異なる 3 つの発話速度（遅い・普通・速い）で読ませ、窄用式変調が起こる音節の母音部の基本周波数を計測し、異なる発話速度の間でピッチの上昇と下降がどのように推移するのかを分析した。その結果、発話速度が速くなるにつれて上昇調と下降調のピッチの変動幅は小さくなるが、それでも上昇と下降のピッチ型は維持されることを示した。例えば図 1 を見ると、速い発話速度のピッチ曲線“F”は T1 では下降し T3 では上昇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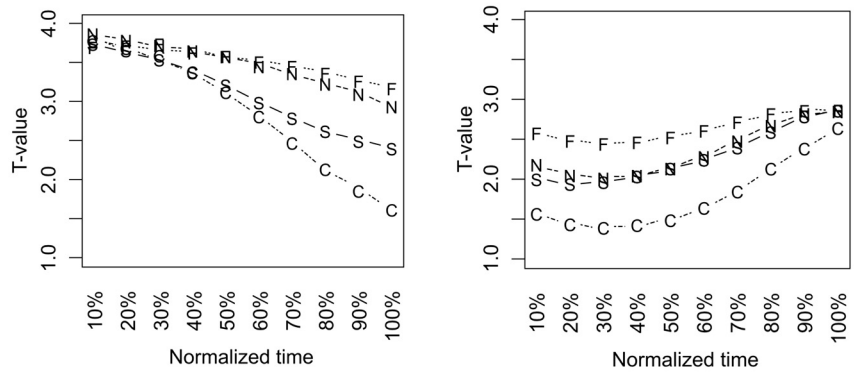


図 1. 髙橋 (2011: 107)による窄用式変調適用時の T1（下降調: 左）と T3（上昇調: 右）のピッチ曲線（X 軸: 正規化時間、Y 軸: 正規化ピッチ（T 値）、C: 単独音節時、S: 遅い発話速度、N: 普通の発話速度、F: 速い発話速度）

加えて、髙橋 (2011: 109)は窄用式変調時の T1 と T2 のピッチ曲線がどの発話速度でも重ならないことを示した。これらの結果に基づいて、髙橋は上海語の窄用式変調を音声的な現象と見なす石 (1995)の解釈が妥当であると結論づけた。

髙橋 (2011, 2013)に続いて Zhang and Meng (2016)や Ling and Liang (2019, 2020)が同様の実験音韻論的分析を行なった。Zhang and Meng (2016)はより多くの母語話者を対象に実在語と無意味語を用いた調査を行い、Ling and Liang (2019, 2020)では発話速度の他に焦点の有無を統制して窄用式変調の音声実現を考察した。これらの実験結果は髙橋 (2011, 2013)とほぼ一致しており、それぞれ「音声的な上昇・下降の弱化（phonetic contour reduction）」（Zhang and Meng 2016: 186）、「連続的な音声弱化（gradient phonetic reduction）」（Ling and Liang 2019: 49）、「声調の調音結合によって

引き起こされる音声的な弱化（phonetic reduction caused by tonal coarticulation）」（Ling and Liang 2020: 216）と髙橋同様の結論に至っている。

その他にも上海語の声調と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統合した音韻記述体系である Sh_TobI（Shanghainese Tones and Break Indices Labeling）を提案した Roberts (2020)も窄用式変調について言及しており、彼の考察対象である 21 名の上海語母語話者全員の発話から弱化的特徴を観察できたと報告している（p. 82）。

2.4 未解決の課題：持続時間とピッチ変動幅の関係

以上見てきたように、実験音韻論的なアプローチを用いた先行研究は「窄用式変調は音声的な弱化現象である」という解釈を一貫して支持してきた。しかし、これらの研究には「音節の持続時間（duration）の分析方法」に問題が残っていることを筆者は指摘したい。前節図 1 で示したように、従来の実験音韻論的研究は持続時間を正規化した上でピッチ曲線を比較する手法を採用している。この手法の利点としては、異なる持続時間を持つトークンでもピッチ曲線の始点と終点を合わせて容易に比較できる点が挙げられるが、同時に各トークンの持続時間の差異が一切反映されないという課題を残す。石 (1995)の解釈では発話速度とピッチ実現の関係性を強調しているが、ここに「発話速度が速くなると各音節の持続時間が短くなる」という音声学的前提を追加すると(4)のような予測を導くことができる。

(4) 窄用式変調が音声的な弱化現象である場合の持続時間とピッチ変動幅の関係性

発話速度：	速い	遅い
持続時間：	**短い**	**長い**
ピッチ上昇/下降幅：	小さい	大きい

予測：（もし窄用式変調が音声的な弱化現象ならば）

持続時間とピッチの上昇/下降幅は正の相関関係となる。

(4)を検証する際には正規化されていない持続時間の分析が必要となるが、先行研究では持続時間とピッチ変動を直接関連づけた考察はまだ行われていない。そこで本稿では、持続時間を正規化しないデータを用いて(4)の予測が成り立つのかを検証する。

3. 調査方法

3.1 音声データ

本研究では、筆者が髙橋 (2011, 2013)を作成する際に収集した録音音声を再分析して利用した。その理由は 2020 年初頭より続く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COVID-19）を原因とする各種措置や制限により、新しいデータの収集が不可能だったためである。

本稿の分析対象としたのは上海語母語話者 7 名（女性 4 名、男性 3 名; 生年 1982–1988 年）の発話である。全員が上海市区出身であり調査時（2010–2011 年）には東京の大学もしくは専門学校に留学中であった。生年と出身区を表 4 に示す。

表 4. 調査協力者の生年と出身区

ID（女性）	生年	出身区	ID（男性）	生年	出身区
HCY	1984	長寧区	WJY	1984	黄浦区
HYJ	1982	普陀区	XLQ	1983	虹口区
SY	1988	徐匯区	ZF	1986	楊浦区
ZZY	1984	黄浦区			

髙橋 (2011, 2013)の音響音声学的データは枠文(5)を用いて収集した。窄用式変調が適用される X 部には試験語(6)を挿入した。試験語は T1, T2, T3 から 2 語ずつ採用した。また、X 部に後続する語には初頭音節のピッチの高さが異なる 3 つの語（青菜[H.L]、韭菜[M.H]、芹菜[L.H]）をそれぞれ配置した。

調査協力者には X 部に試験語を挿入した枠文を「普通の速度→遅い速度→速い速度」の順にそれぞれ 5 回ずつ読んでもらい、その音声を録音した。録音機材はマイクが AKG 社製 C444、録音機がマランツ社製 PMD660 であり、量子化ビット数 16bit、サンプリング周波数 44.1kHz の設定で録音した。

(5) 髙橋 (2011, 2013)が用いた枠文

		青菜 [tɕʰiŋ tsʰɛ] green vegetables	
伊拉 [i la]	X	韭菜 [tɕiɤ tsʰɛ] Chinese chive	勒 [ləʔ]
They		芹菜 [dʑiŋ tsʰɛ] celery	SFP

「彼らは野菜/ニラ/セロリを X した。」

(6) X 部に入る試験語（髙橋 2011, 2013）

T1 [53]: 拿 [nɛ] take, 烧 [sɔ] cook

T2 [34]: 练 [kɛ] choose, 炒 [tsʰɔ] fry

T3 [23]: 汰 [dA] wash, 买 [mA] buy

3.2 計測方法

前節で紹介した録音音声から(6)の試験語の母音部における安定的な声帯振動区間の基本周波数（Fo）と持続時間を改めて計測しなおした。計測の際は Praat (ver. 6.1.50; Boersma and Weenik 2021)と ProsodyPro (ver. 5.7.8.6; Xu 2013) を用いて、各枠文における上記計測区間にラベリングを施し、基本周波数と持続時間を自動計測した。

全てのトークンの基本周波数と持続時間を計測後、計測区間内におけるピッチの上昇と下降の変動幅を計算した。計算の際には下降調（T1）と上昇調（T3）の変動幅の違いを正しく反映させるため表 5 のように正負の値を調整した。

表 5. ピッチ変動幅から上昇幅および下降幅への変換方法

ピッチ変動幅（Excursion size）= Fo Max – Fo Min		
	Fo Max → Fo Min	Fo Min → Fo Max
T1 /HL/ 下降幅（Falling size）	正 (positive)	負 (negative)
T3 /LH/ 上昇幅（Rising size）/	負 (negative)	正 (positive)

下降調 T1/HL/では Fo 最大値（Fo Max）が Fo 最小値（Fo Min）よりも先に現れた場合はピッチ変動幅を正の値として扱うが、逆の順序であれば負の値に換算した。同様に上昇調 T3/LH/では Fo 最小値が Fo 最大値よりも先に現れた場合は正の値として扱ったが、逆の順序であれば負の値に換算した。このような正負の換算を行うことで T1 ではピッチの下降幅、T3 では上昇幅を反映させ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る。

なお、本研究では T2 の試験語と遅い発話速度の発話を分析対象から除外した。その理由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まず T2 は単独音節時でもピッチの上昇が緩やかで「持続時間が長くなるにつれてピッチの上昇幅が大きくなる」という相関関係を担

保しない可能性が高いためである。次に、遅い発話速度を考察対象から除外したのは一部の発話者で持続時間を極端に長くした発話が観察され、ピッチ変動との相関性を考える際に撹乱要因として働く可能性が高いためである。

4. 調査結果

4.1 持続時間とピッチ変動幅の関係

まず声調ごとに各トークンのピッチ上昇/下降幅と持続時間を軸とする散布図を作成した。加えて、持続時間を独立変数、ピッチの上昇/下降幅を従属変数とする単回帰分析を行った。T1 と T3 の散布図を図 2 と図 3、回帰分析の結果を表 6 と表 7 にそれぞれ示す。

まず T1 から見ていこう。図 2 を見ると、全ての発話者で速い発話速度のトークン（×）の方が普通の発話速度のトークン（○）よりも持続時間が短い傾向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また、全ての発話者で回帰係数が正の値を取っており回帰直線が右肩上がりの直線となっている。これらの回帰直線がデータに対して十分な説明力を有していれば(4)の予測を支持すると解釈できるが、表 6 に示した決定係数 R^2 はどの発話者でも低く、7 名中 4 名の発話者では 0.1（10%）すら下回り、回帰式に説明力がほとんど無いことが分かった。図 2 の散布図を詳細に見ると、ZF 以外では持続時間が比較的長くなっても下降幅が小さいトークンが多く分布しており、例えば SY, WJY, ZZY では普通の発話速度においても下降幅が 1Hz を下回るトークンを含んでいる。また、HCY ではトークンが明らかに二層に分かれておりカテゴリカルな変異の存在すら疑われる。以上の T1 の結果は(4)の予測とほとんど一致し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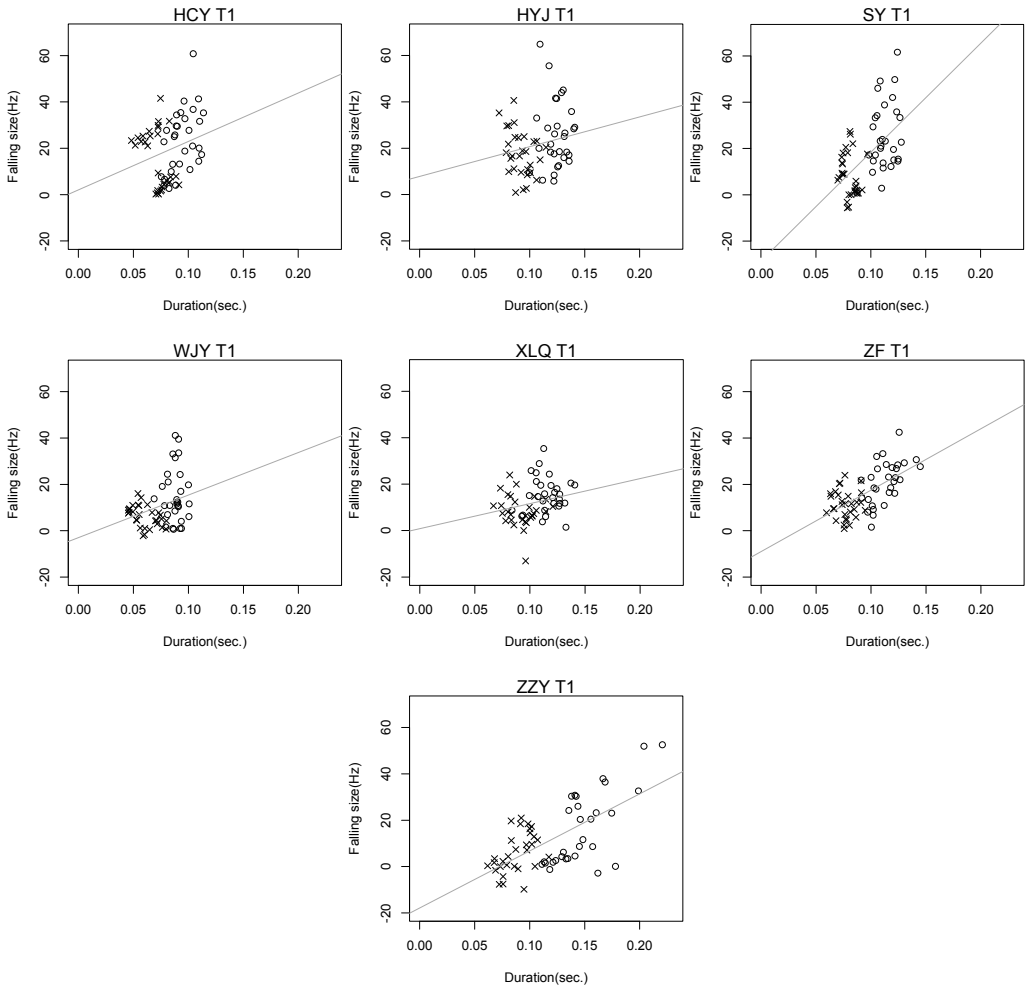


図 2. 持続時間と T1 下降幅の散布図（発話速度○: 普通、×: 速い）

表 6. T1 における回帰分析の結果

発話者	回帰式	決定係数 R^2
HCY	y = 208.92x+2.08	0.061
HYJ	y = 128.17x+7.85	0.036
SY	y = 470.33x-28.68	0.328
WJY	y = 183.60x-2.97	0.098
XLQ	y = 107.76x+0.81	0.058
ZF	y = 264.91x-8.98	0.395
ZZY	y = 246.21x-17.86	0.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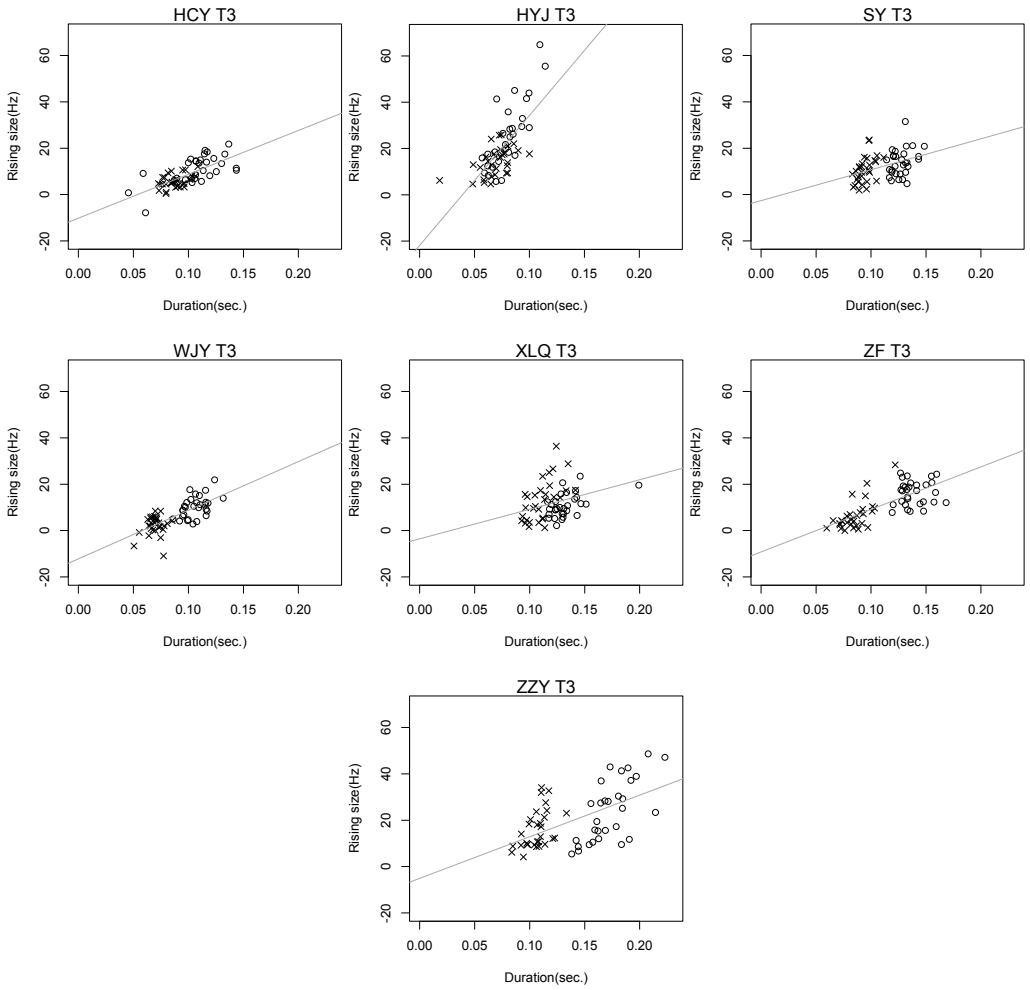


図 3. 持続時間と T3 上昇幅の散布図（発話速度○: 普通、×: 速い）

表 7. T3 における回帰分析の結果

発話者	回帰式	決定係数 R^2
HCY	y = 189.14x-10.175	0.500
HYJ	y = 562.02x-21.93	0.502
SY	y = 133.39x-2.60	0.174
WJY	y = 209.71x-12.18	0.527
XLQ	y = 127.45x-3.54	0.102
ZF	y = 183.37x-9.19	0.525
ZZY	y = 179.24x-5.07	0.335

続いて図 3 の T3 を見てみよう。持続時間については T1 同様に「普通の発話速度 > 速い発話速度」の傾向が明らかである。また、回帰式も全ての発話者で回帰係数が正の値を取って右肩上がりの直線を取るが、決定係数 R^2 は最高の WJY でも 0.5（50%）を少し上回る程度であり、SY や XLQ では 0.2（20%）を下回る。SY や XLQ など一部の発話者では持続時間が長くなっても上昇幅が小さいトークンの密度が高いが、発話者全体で見ると T1 の時ほどは顕著ではない。しかし、散布図と回帰分析（特に決定係数の低さ）を総合すると、持続時間とピッチの上昇幅には強い相関があるとは言えないと筆者は考える。

4.2 ピッチ変動幅の上位/下位 10 トークンの調形比較

前節の分析結果は、上海語の窄用式変調が純粋な音声弱化ではなく、それとは異なる特性も含むことを強く示唆する。ここで筆者が特に注目したいのは「持続時間に関わらずピッチ変動幅が小さいトークンが多い点」である。とりわけピッチ変動幅が 0 に近づいたトークンは Fo 曲線がほぼ水平のまま推移しているはずであり、音声的な弱化ではなくむしろ音韻的な水平声調化（tonal leveling）の特性に近い。仮に音韻的な水平声調化が起きたとすると Fo 曲線にも明確な変化が生じると予想されるため、以下ではピッチ変動幅の上位 10 トークン（上位集団）と下位 10 トークン（下位集団）の Fo 曲線を比較する。T1 と T3 の Fo 曲線をそれぞれ図 4, 5 に示し、集団ごとの持続時間の最小値と最大値を表 8, 9 に示す。

まず図 4 の T1 を見ると、上位集団（黒線）と下位集団（赤線）では Fo 曲線の推移が明らかに異なる。具体的には、上位集団の Fo 曲線は常に下降するが、下位集団はほぼ水平に推移する。また、4 名の発話者（HCY, HYJ, SY, WJY）では計測部初頭において下位集団の Fo の値が明らかに低い。それ以外の 3 名の発話者では計測部初頭の Fo の値は上位と下位で大きな差がないが、上位集団では常に下降が起こるのに対して下位集団ではほとんど下降しない。表 9 の持続時間を見ると上位集団の方が最大値・最小値ともに下位集団よりも大きな値を取るが、「上位集団の最小値 vs. 下位集団の最大値」で比較すると 7 名中 4 名の話者（HCY, WJY, XLQ, ZZY）で下位集団の最大値の方が長くな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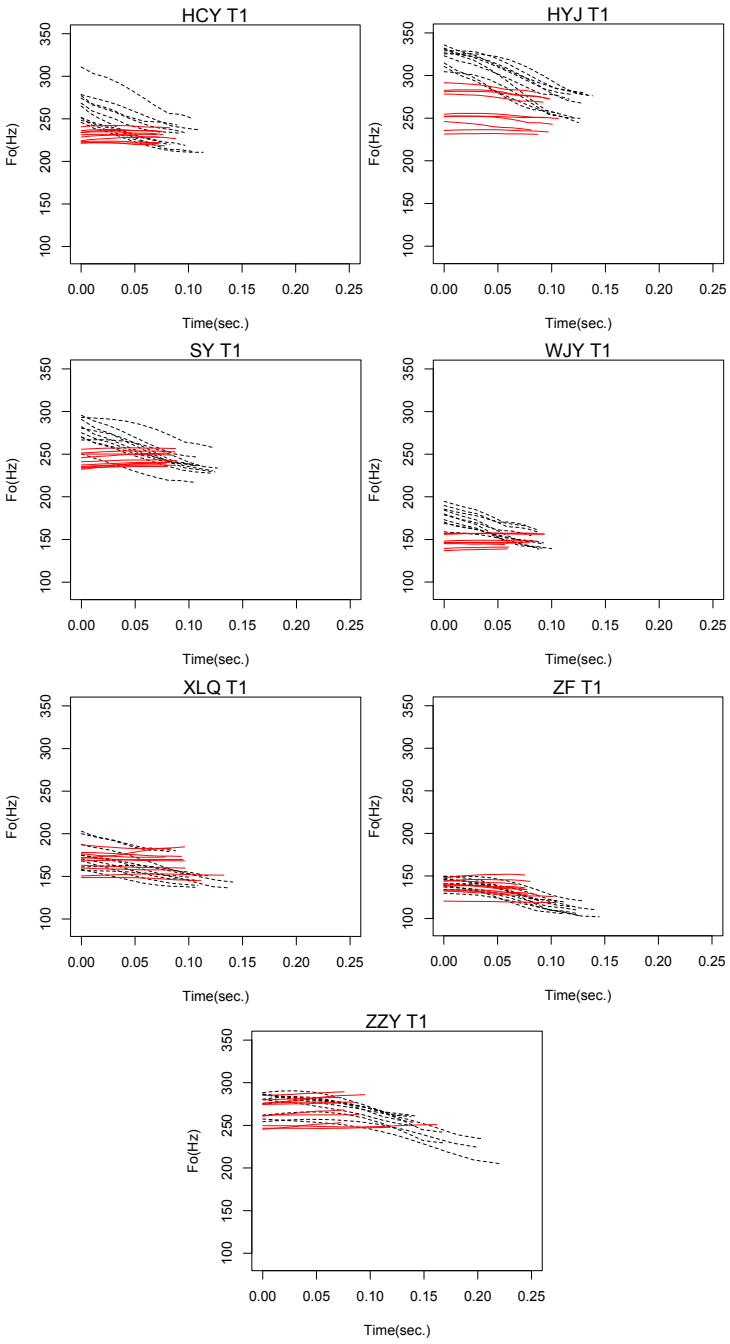


図 4. T1 における各発話者のピッチ下降幅上位 10 トークンと下位 10 トークンの Fo 曲線（黒: 上位 10 トークン、赤: 下位 10 トーク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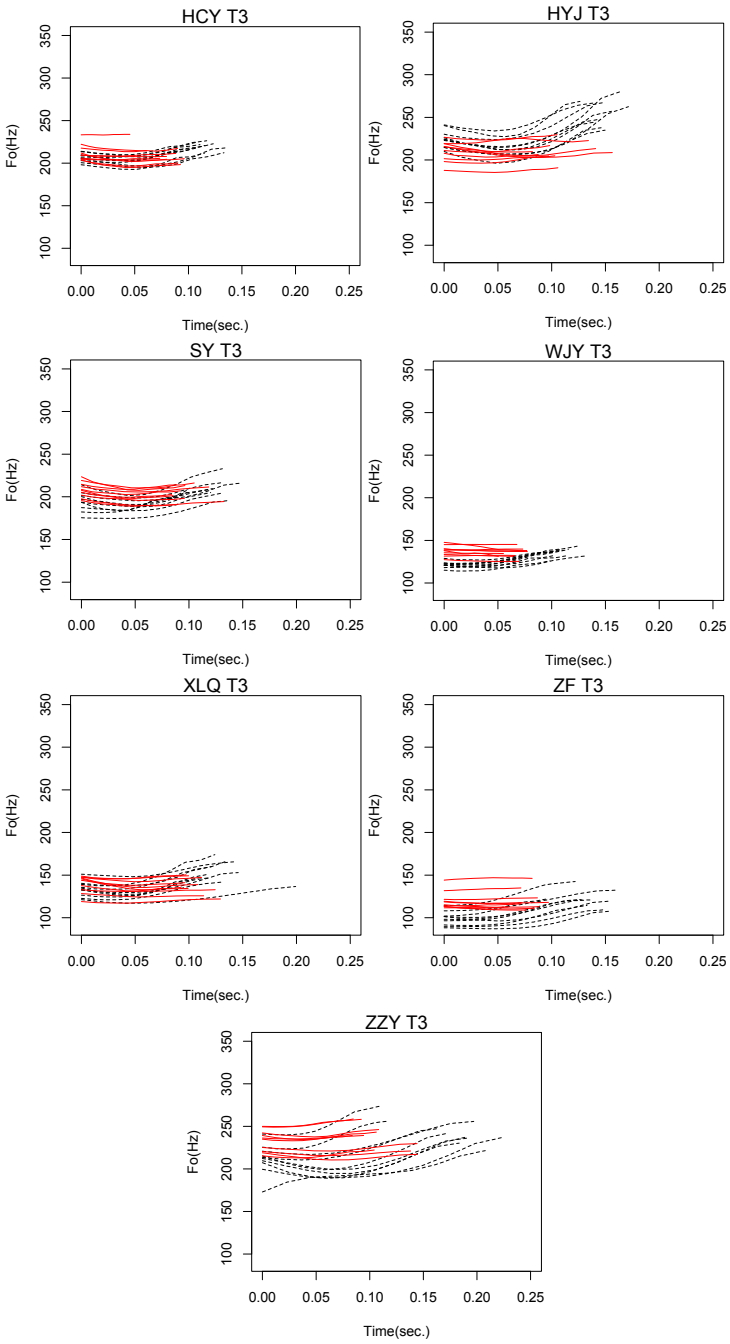


図 5. T3 における各発話者のピッチ上昇幅上位 10 トークンと下位 10 トークンの Fo 曲線（黒: 上位 10 トークン、赤: 下位 10 トークン）

表 8. T1 窄用式変調時の持続時間の最小値と最大値（単位：ミリ秒 ms.）

発話者	T1			
	上位 10 トークン		下位 10 トークン	
	最小値	最大値	最小値	最大値
HCY	74.7	113.8	70.5	88.4
HYJ	106.3	138.0	81.0	106.3
SY	104.0	126.6	78.4	88.7
WJY	76.2	100.0	56.2	93.7
XLQ	81.6	140.7	78.0	132.7
ZF	105.1	144.8	68.2	102.0
ZZY	135.6	220.6	69.0	162.0

表 9. T3 窄用式変調時の持続時間の最小値と最大値（単位：ミリ秒 ms.）

発話者	T3			
	上位 10 トークン		下位 10 トークン	
	最小値	最大値	最小値	最大値
HCY	102.1	136.7	45.5	96.2
HYJ	126.4	171.6	82.2	156.6
SY	98.0	148.5	84.0	132.7
WJY	98.5	131.6	50.6	77.4
XLQ	111.8	199.2	92.7	129.4
ZF	96.4	160.0	59.7	97.1
ZZY	110.8	222.9	83.7	144.4

次に T3（図 5, 表 9）を見てみよう。Fo 曲線では T1 同様の傾向が観察でき、少なくとも 2 名の発話者（WJY, ZF）では計測部初頭における下位集団の Fo の値が上位集団よりも明らかに高い。上位集団の Fo 曲線では「計測部初頭からわずかに下降して Fo 最小値を取り、その後上昇に転じて Fo 最大値を取る」という凹型になるトークンが多いが、下位集団の Fo 曲線は大多数のトークンでほぼ水平に推移する。持続時間についても T1 同様の傾向が見られ、最小値/最大値同士で比較をすると上位集団の方が常に長いが「上位集団の最小値 vs. 下位集団の最大値」で比較をすると、7 名中 5 名の発話者で下位集団の最大値の方が大きくなる。

5. 考察と結論

第 4 節の分析結果を要約すると、ピッチの変動幅と持続時間には弱い相関すら確認できないケースが多く、持続時間が長くなっても Fo がほぼ水平に推移するトークンが大多数の発話者で確認された。以上の結果を踏まえて、本節では窄用式変調の特性を改めて考察しよう。

従来の実験音韻論的研究は、図 1 に示したような Fo 平均値に基づいたピッチ曲線を提示し、ピッチの下降（T1）と上昇（T3）が維持されることから「窄用式変調は音声的な弱化現象である」と結論づけた。一方、本稿で行った音声データの再分析は平均値ではなくトークン単位での Fo 曲線の推移に注目し、Fo の下降もしくは上昇を保持するトークンに加えてほぼ水平に推移するトークンも出現す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水平的なトークンの出現環境が持続時間の短い場合に限定されるのであれば、「ピッチ変動幅と持続時間の相関性」に沿う結果であるため依然として音声的弱化と解釈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ろう。しかし、持続時間がある程度長くなっても水平的なトークンが出現したという表 8, 9 の結果は、窄用式変調が純粋な弱化現象ではないことを強く示唆している。

窄用式変調が純粋な音声弱化現象ではないとすると、音韻的な水平声調化の解釈の方が妥当なのだろうか。(3)で示した水平声調化規則は声調素性の変化を伴うため音韻レベルで適用されるはずだが、生成音韻論の枠組みでは音韻規則は適用条件を満たした場合には例外なく適用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すなわち、(3)の規則を採用する場合には全てのトークンが水平調に変化することが期待されるが、再分析の結果を見ると多くのトークンで Fo の下降もしくは上昇が維持されているため、窄用式変調を純粋な音韻的水平声調化として扱うのも妥当ではない。

以上の議論を総合すると、窄用式変調は音声的な弱化と音韻的な水平声調化のどちらの特性も部分的に有していると解釈できる。今回のような 1 つの現象内で適用レベルの異なる変異が併存する場合は共時的な言語モデルだけでは扱うことが難しく、通時的な観点からの分析も追加することでより適切な説明が可能となるケースも多い。しかし、筆者が利用した音声データは発話者の出生年代が 1980 年代に限定されており、異なる世代間で変異の有無やその出現頻度を比較することはまだできていない。世代間データを加えた更なる分析と共時および通時の両面からの考察は今後の課題である。

本研究は科研費（21H00523）の助成を受けたものである。

参考文献

钱乃荣 1997 《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石汝傑 1995〈吳語連讀變調的兩個問題〉 徐雲揚 編《吳語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185–193.

髙橋康徳 2011「上海語声調音韻論における窄用式変調の地位」『中国語学』258, 99–114.

髙橋康徳 2013『上海語変調の音韻的構造』東京外国語大学博士論文.

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 1981 〈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第 2 期, 145–155.

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钱乃荣、石汝杰、沈亚明 1988《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Boersma, Paul and David Weenik. 1992–2021.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http://www.praat.org)

Chen, Matthew. 2000.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 Yiya. 2008. Revisiting th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Shanghai tone sandhi. *Proceedings of Speech Prosody 2008*, 253–256. Campinas: ISCA.

Duanmu, San. 1993. Rime length, stress, and association domai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 1–44.

Ling, Bijun and Jie Liang. 2019. The nature of left- and right-dominant sandhi in Shanghai Chinese －Evidence from the effects of speech rate and focus conditions. *Lingua* 218, 38–53.

Ling, Bijun and Jie Liang. 2020. Prosodic encoding of contrastive focus in Shanghai Chinese. In Hongming Zhang and Youyong Qian (eds.), *Prosodic Studi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198–223. Routledge.

Roberts, Brice. 2020. *An Autosegmental-Metrical Model of Shanghainese Tone and Intonation*. Ph.D. dissertation, UCLA.

Takahashi, Yasunori. 2013. The phonetic change of tone sandhi in Shanghai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netics of the Languages in China*, 139–142.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Xu, Yi. 2013, ProsodyPro -A tool for large-scale systematic prosody analysis. In Bigi, Brigitte and Daniel Hirst (eds.), *Proceedings of Tools and Resources for the Analysis of Speech Prosody (TRASP 2013)*, 7–10.

Zee, Eric and Ian Maddieson. 1979. 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Shanghai: phonetic evidence and phonological analysis.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etics* 45, 93–129.

Zhang, Jie. 2007. A directional asymmetry in Chinese tone sandhi system.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6(4), 259–302.

Zhang, Jie and Yuanliang Meng. 2016. Structure-dependent tone sandhi in real and nonce disyllables in Shanghai Wu. *Journal of Phonetics* 54, 169–201.

Revisiting the phonetic nature of right-dominant sandhi in Shanghai Chinese

Yasunori Takahashi
Kob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hanghai Chinese, previous laboratory studies have regarded the right-dominant sandhi as phonetic reduction because syllables retained their rising or falling contour shapes in sandhi positions. This study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ration and Fo excursion size of sandhi syll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that a number of tokens lost their falling or rising contour shapes and realized as level tone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ight-dominant sandhi has phonological nature as well as phonetic one.

关于带巴楼本《正字通》

古屋昭弘，和平 译
早稻田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献学的观点来探讨了带巴楼本《正字通》。在复旦大学吴格教授和浙江师范大学张磊博士的协助下，得知“带巴楼”这个名称本身有问题，应该是“带月楼”。文中对带巴楼本早于白鹿书院本的学说展开了讨论。

一、带巴楼本

世上有“带巴楼本《正字通》”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第一次出现于萧惠兰《张自烈著《正字通》新证》（下称“萧文”）。关于发现“带巴楼本”的经过，萧文（p82）有如下的说明：

> 弘文书院本与白鹿书院本孰先孰后当时笔者还未及考察，但据序已意识到“带巴楼本”才应是现存所有版本中最早的，甚至可能就是初版。惊喜之余，还存一疑，“带巴楼本”是否会是弘文书院本的残本。……此后几位同志又北上访书，带着我的疑问再往北京图书馆分馆查阅所藏《正字通》，访得六部，重复者不计，共四种版式，即弘文书院本、潭阳成万材本、清畏堂本、芥子园本。访书的同志特别核查了弘文书院本书中缝不见“带巴楼”字样，复印回有关资料。如此，某图书馆所藏书中缝有“带巴楼”字样《正字通》就不可能是弘文书院本的残本，应当是一种新发现的版本，此前诸家从未论及，查旧官私家目录及当代目录书亦未见著录。得到证实之后，笔者对这个版本进行了初步考查，进一步发现它对于确认该书的著者极具价值。

文中只说“某图书馆”，没有写明收藏于哪所图书馆。此文一出，“带巴楼本”之说渐渐传开了，后来的研究概况都提到这个版本。朱莹莹 2016《正字通研究述评》（p47）有如下的介绍：

> 萧蕙兰在《张自烈〈正字通〉新证》一文中介绍了带巴楼本，此版本书封无字，卷首仅张贞生一序，张序之后接十二字头引，再后署《正字通姓氏》，姓氏后列引证书目。张序以下每页骑中缝有“带巴楼”字样。并判断此版本非弘文书院残本，而应当是《正字通》最早的版本。

单志鹏/孙建2017《〈正字通〉研究概况析论》（p75）说：

> 萧惠兰发现“带巴楼本”的《正字通》，认为此新版本的发现对于确认《正字通》的作者具有很高的价值[1]。

蔡英杰主编2020《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p52）也说：

> 据古屋昭弘的研究，白鹿书院本、刘炳补修本和三畏堂本基本上是同版，前者最早，统称为‘白鹿书院系版本’。三[2]是年萧惠兰提出一种版本－“带巴楼本”，她据序文推断，该版应是最早的版本。

先声明一下，古屋1995没有说“三畏堂本”是‘白鹿书院系版本’，这里说的“三畏堂本”应该是“清畏堂本”。古屋1995讨论《正字通》的版本时没有提到带巴楼本。2003年萧文发表后，古屋2009（p43）以怀疑的态度提到了带巴楼本，也顺便提到了带月楼本。我认为白鹿书院内阁文库本（下称“白鹿内阁本”）是现存最早的（很可能是初印本），是最能反映真正作者张自烈《正字通》原面貌的版本。既然萧文认为带巴楼本是早于白鹿书院本的版本，那么我也不得不讨论萧文的观点。

这次承蒙吴格教授指教，得知“带巴楼”这个名称本身有问题，应该是“带月楼”。吴格教授指出，中国国内收藏带月楼本《正字通》的机构有三处：辽宁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数据库》）[3]。温州市图书馆藏的带月楼本，版心刻篆文“带月樓[4]”三字，其“月”字有些像“巴”字，因此导致萧文的

---

[1] 单志鹏/孙建 2017（p74）说：“喻剑庚、古屋昭弘、董琨和萧惠兰等学者也认为《正字通》的作者当是衡山张尔公（张自烈，字尔公）无疑。”但张自烈不是“（湖南）衡山”人，而是（江西）宜春人。第一个说张自烈为衡山人的可能是钮琇《觚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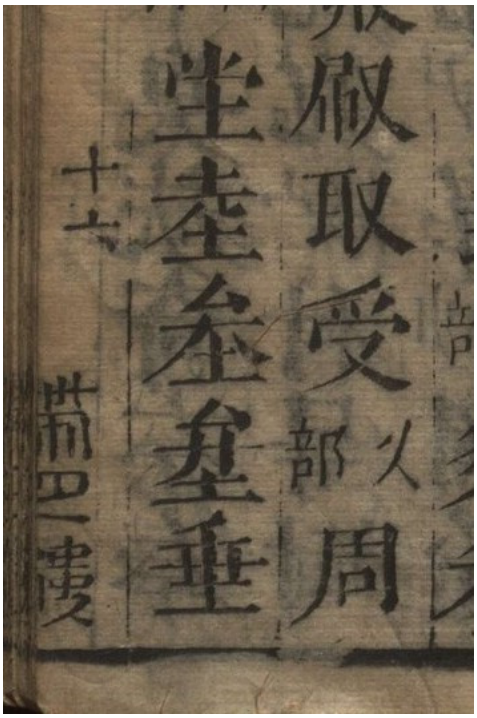
[2] 据此文的分类，《正字通》的版本分三个阶段：一是白鹿书院本、弘文书院本、三畏堂本、芥子园本等。二是潭阳成万材本，即刘炳补修本的阶段。三是带巴本。按照这个说法，此文的作者似乎认为带巴本晚于刘炳补修本。

[3] 《中国古籍总目》只著录辽宁省图书馆藏本。

[4] 本文有必要时用繁体字，如：一部分引文、书名、反切等。

误会。

后来张磊博士告诉我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一部带月楼本《正字通》，而且该图书馆东亚数字资源库上可以看到公开发表的原书图像[5]。内封（扉页）说“廖百子先生輯 正字通 帶月樓梓”，版框上有“新鐫”二字。下面是其内封和版心篆书“帶月樓”三字（旧本首卷 16a）的图像。



＜图 1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图书馆藏带月楼本《正字通》

萧文说所看的版本是缺内封的。没有内封的情况下，难怪把版心下方的篆字“帶月”看成“帶巴”。

[5] https://www.digitale-sammlungen.de/de/view/bsb00104374?page=6 ， https://www.digitale-sammlungen.de/de/view/bsb00104374?page=219（阅览日期 2022 年 1 月 15 日）。关于原书图像的利用，已经得到该图书馆的许可，谨此致谢。原书洋装封面背面（封 2）有手写的“Klaproth”几个字。可能曾经是十九世纪有名的汉学家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所藏。

二、带月楼

带月楼究竟是何时何地的书坊呢？吴元丰 2008《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所举 60 余处出版满语书籍的清代书坊中能见到其名[6]。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也收藏一部带月楼本《正字通》，该图书馆的目录说“帶月樓梓，雍正十二年”[7]。雍正十二年是 1736 年，但不知有何根据（→附记）。此外，张磊博士提供了很多有关带月楼的信息。下面是写明刊年的一些书：

《廣輿記》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带月楼刻本　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四書釋義》清乾隆九年（1743）带月楼刻本
《六科證治準繩》清乾隆十四年（1749）带月楼刻本　河南省图书馆
《行廚集》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带月楼刻本
《增補滿漢篆書字彙》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带月楼刻本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增補四書人物聚考圖解》清乾隆四十年（1772）带月楼刻本
　苏州大学图书馆（存 10 卷）、临海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

虽然乾隆年间的刊本多，但还有一些据说是明版的书，如：收藏带月楼刻本《證治準繩》的宝鸡市图书馆著录说“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张磊博士说[8]：“如果时贤的结论可信，那么带月楼至迟自明末就开始经营，其地点也许在南京。但究竟是明末还是顺治，时贤与《贩书偶记续编》的看法并不一致，参见聂尚恒编撰，傅海燕等校注《医学汇函》第 1140 页。明末和顺治虽然分属不同朝代，但前后非常接近，也

[6] 当时刊印满文图书的书坊有听松楼、宛羽斋、秘书阁、尚德堂、奇畅斋、天绘阁、文盛堂、四合堂、三义堂、尊古堂、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永魁堂、秋芳堂、清宜斋、炳蔚堂、五云堂、聚珍堂、品经堂、**帶月楼**、存之堂、文兴堂、柳荫山房、崇礼堂、镜古堂、彩盛刻字铺、文真堂、圣经博古堂、文光堂、名贵堂、宝名堂、积古斋、保萃斋、玉树堂、文渊堂、书业堂、先月楼、少酉堂、文宝堂、尚友堂、文翰斋、京都翻译书坊、二酉堂、精一堂、修锦堂、文英堂、聚星堂、槐荫山房、双峰阁、大酉堂、文萃堂、绍衣堂、藜照阁、文瑞堂、英华堂、紫竹阁、名德堂等 60 余家。这就决定了坊刻本的多样化，不仅图书种类庞杂，而且版本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民间书坊，绝大部分在北京，只有少部分在沈阳、南京、荆州等地，体现了北京在传播满文化方面的中心地位。

[7] Libraries of the U of M - zheng zi tong (umn.edu)（阅览日期 2022 年 1 月 7 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也收藏一部带月楼本《正字通》（古屋 2007, p43）。

[8] 带月楼出版的书当中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明刻本的，如：《醫學彙函》（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重鐫官板地理天機會元》（温州市图书馆），《新鍥重訂出像通俗演義東西兩晉志傳題評》（有人说是清初重刊本）等。

很难说清具体的时间。”

“带月”可能取自陶渊明《歸園田居 其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三、最早的版本

萧文说“带巴楼本”卷首有《十二字头引、正字通姓氏》[9]。这是弘文书院本和芥子园本的特点。萧文起初也怀疑“带巴楼本”是否弘文书院本的残本，之后提出了现存《正字通》中最早的版本这个结论。其根据是“带巴楼本”的序文只有张贞生的一篇。弘文书院本除了张贞生（康熙九年十二月，1670）的序文以外还有王震生（康熙十年十二月，1671）、黎元宽（康熙十年四月）、史彪古（康熙十年四月）、姚子庄（康熙十年六月）的序文。萧文的逻辑是：既然只有张贞生的一序，那么应该早于弘文书院本。但是序文的数目不能当作决定性的证据。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如贰臣、禁书等问题）后人会抽掉一些序文。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带月楼本《正字通》在张贞生序后头有龚鼎孳（康熙十一年正月，1672）的序文。萧文的“带巴楼本”明显地是抽掉龚鼎孳序的带月楼本。

白鹿内阁本收廖文英（康熙九年七月，1670）、张贞生、尹源進（康熙十年五月，1671）、黎元宽、姚子庄等五序。刘炳修补本是与白鹿书院本同版的后印本，卷首说：“廖氏初行是書，原序尚多”，可见在《正字通》最早的阶段已经有很多序文。很难想象廖文英刊行的《正字通》没有康熙九年七月廖氏自序，反而只有康熙九年十二月的张贞生序。

萧文说“带巴楼本”在序文和“正字通姓氏”中间有《十二字头引》[10]，这也意味着“带巴楼本”不会早于白鹿内阁本。因为白鹿内阁本的《十二字头引》和《十二字头》是具有自己内封的单行本。到了白鹿东大本的阶段，《十二字头引》和《十二字头》被编在序文后头（本文附表 2）。

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上能找到更具决定性的证据，即反切等音注。下面以“带巴楼本”就是带月楼本为前提，把带月楼本的音注跟其他几种版本的音注对照一下：

[9] 《正字通姓氏》（下称《姓氏》）包括《鑒定、較閱、同志諸名流姓氏、白鹿書院受業姓氏》诸项。

[10]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带月楼本也在序文和凡例后收录《十二字头引》和《十二字头》。

＜表 1＞		增補字彙	白鹿内阁本	清畏堂本[11]	弘文书院本	带月楼本
子上 20a7	丸	戶煩切音完	戶煩切音完	胡瞞切音完	胡瞞切音完	胡瞞切音完
子中 9a4	令	力恨切林去聲	力恨切林去聲	力正切零去聲	力正切零去聲	力正切零去聲
子中 25a8	倏	虛茫切音降	虛茫切音降	俗字舊音降	俗字舊音降	俗字舊音降
子中 28b6	倰	伊齊切音彝	伊齊切音彝	與夷通音彝	與夷通音彝	與夷通音彝
子中 71a4	僯	力永切鄰上聲	力永切鄰上聲	力引切鄰上聲	力引切鄰上聲	力引切鄰上聲
子中 80a1	儖	力恨切音吝	力恨切音吝	力刃切音吝	力刃切音吝	力刃切音吝
子下 1b2	允	羽敏切音尹	羽敏切音尹	羽敏切音隕	羽敏切音隕	羽敏切音隕
子下 36a3	澺	延齊切音夷	伊齊切音倰	伊齊切音夷	伊齊切音夷	伊齊切音夷
子下 38a8	凡	符寒切音帆	符寒切音帆	符咸切音帆	符咸切音帆	符咸切音帆
子下 45b2	分	敷因切音芬	敷因切音芬	敷溫切音芬	敷溫切音芬	敷溫切音芬
子下 46b3	刈	視技切音藝	倪技切音藝	倪詣切音藝	倪詣切音藝	倪詣切音藝
子下 75b3	勤	其銀切音芹	其銀切音芹	其吟切音芹	其吟切音芹	其吟切音芹
子下 98b7	卜	博木切音不	博木切音不	博木切音樸	博木切音樸	博木切音樸
子下 115b6	屭	伊齊切音倰	伊齊切音倰	伊齊切音夷	伊齊切音夷	伊齊切音夷
子下 117b4	厷	公昏切音觥	公昏切音觥	公訇切音觥	公訇切音觥	公訇切音觥
子下 125a7	受	神呪切壽去聲	神呪切壽去聲	神呪切收去聲	神呪切收去聲	神呪切收去聲

仅仅 16 例也能说明带月楼本不会早于白鹿内阁本。《增補字彙》（康熙二十九年，1690）反映张自烈编《正字通》的中间过程（古屋 1993）。如果带月楼本是最早的版本，应该比其他版本更接近《增補字彙》。事实上最接近《增補字彙》的是白鹿内阁本。

即使出版时间晚于《正字通》的《增補字彙》不能当作证据，也不能否认清畏堂本是与白鹿书院本同版的后印本这个事实。从上表能看出内阁本到清畏堂本之间在内容上有被修订的明显痕迹，既然修订的结果跟弘文书院本和带月楼本等一致，就无法认为带月楼本是最早的版本。

楊義騰 2013《正字通與歷代重要字書之比較研究》(p317)也说：“從張貞生〈序〉文僅出現在弘文書院刊本，筆者猜測此「帶巴樓本」與弘文書院刊本可能有所淵源，也不是最早的刊本”[12]。

[11] 据清畏堂原板本。

[12] 只是“張貞生〈序〉文僅出現在弘文書院刊本”这个说法有问题。请看本文附表 2。

四、廖文英的修订工作

白鹿内阁本到清畏堂本之间的修订到底谁做的呢？白鹿书院本除了白鹿内阁本以外还有东京大学图书馆藏（下称“白鹿东大本”）。卷首冠以礼部尚书龚鼎孳的序文（康熙十一年，1672），版框上有“禮部鑒定”四字，与白鹿内阁本（没有龚序）同版，但本文中处处可以看到改修的痕迹，可以称作“白鹿书院补修本”。有关音注的改修处多达约 630 条（古屋 2009 附录）。在白鹿内阁本和白鹿东大本的对照中最显著的是前者的很多“佷”字有时改刻作缺末笔的“玄”字，有时并不改刻，而是直接削去“佷”字的单立人和末一笔；“倱”字有时改刻作“夷”字，有时并不改刻，而是直接削去“倱”字的单立人。

原来白鹿书院本（白鹿内阁本）避开康熙帝讳“玄”[13]为“佷”，也避开晚明时意味着满族的“夷”为“倱”[14]，而白鹿东大本反而往不避讳的方向进行了改修。

另外，训释部分也有改刻的例子。如：

＜表 2＞		**白鹿内阁本**	**白鹿东大本**
丑上 35b7	咺	詩衛風:嚇兮咺兮, 大學引詩作烜[15]	詩衛風:嚇兮咺兮, 一説咺當作烜
寅上 20b4	定	頰也	額也
巳上 105a2	灞	拘倱山中有流水亦如之	漢書霸上與灞同今从灞

第一例：因为《詩經》此句不见于《大學》，把“大學引詩”四字改刻为“一説咺當”。第二例：表示鼻梁的“頰”字正确地改刻为“額”字（“定”有“额头”之意）。“額”写成“頰”是张自烈的用字习惯，比如清初刊张自烈《芑山文集》（旅诗第 34 首）里有“不能中頭頰”句，后来的豫章丛书《芑山文集》（芑山诗集）改为“不能中頭額”。第三例：“拘倱（夷）山”之名会得罪满族统治者，因此改为无关紧要的内容。

对于这些情况，最自然的解释是：廖文英康熙十年（1671）刊行白鹿书院本（白鹿内阁本）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修订工作，把修订的结果反映在版片上后再一次印刷的就是白鹿书院补修本（白鹿东大本）。后来印行清畏堂本的吴源起在自序里说：“（廖）

[13] 已集“燁”大字，白鹿内阁本把缺末一笔的“燁”的小纸片贴在上边，其他版本“燁”没有缺笔。“燁”的异体字“爗”字虽然跟一般的字体不同，似乎都没有缺笔。

[14] 另外有时避开“玄、胡”为“鉉、湖瑚”，有时也避开晚明时意味着满族的“虜、奴”为“鹵、孥”（古屋 2009, p18）。这些“鉉湖瑚”在后来的版本中有一些被改作“玄胡”。

[15] 现行《詩經》作“赫兮咺兮”。

先生購其本於衡州[16]，晨夕較定，受梓南康”。当然这不一定是描写补修本时的情况，但至少可以说廖文英有一段时间确实从事过校订工作。改修的结果不仅反映在与白鹿东大本同版的刘炳补修本和清畏堂本上，而且也反映在弘文书院本、芥子园本、三畏堂本等其他所有版本上。下面用见于各集的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表 3＞		**白鹿内阁本**	**（与内阁本同版的）白鹿东大本、刘炳补修本、清畏堂本**	**弘文书院本、芥子园本、三畏堂本、带月楼本**
子下 38a8	凡	符寒切音帆	符咸切音帆	符咸切音帆
丑上 15b1	吝	力恨切音藺	力刃切音藺	力刃切音藺
寅中 43b4	帎	敷因切音芬	敷溫切音芬	敷溫切音芬[17]
卯中 47b7	掕	力恨切音令	力正切音令	力正切音令
辰中 78a7	楗	苦減切乾上聲	九輦切乾上聲	九輦切乾上聲
巳上 50a8	渙	湖慣切音喚	湖貫切音喚	湖貫切音喚
午上 42a4	瓻	力恨切音吝	力刃切音吝	力刃切音吝
未上 36b6	簥	祁堯切音喬	居宵切音娇	居宵切音娇
申上 119a2	薨	呼昏切音轟	呼肱切音轟	呼肱切音轟
酉上 46b6	誑	居況切光去聲	苦謗切狂去聲	苦謗切狂去聲
戌上 47a8	鐏	徂悶切存去聲	祖悶切存去聲	祖悶切存去聲
亥上 25b7	骨	古忽切古入聲	古忽切昆入聲	古忽切昆入聲
全书多处		佷	①偏右且细小的“ ” 在版片上削去单立人的结果 ②一般大的“”[18]	①稍偏右且稍细小的“” 模仿削去单立人的字形而刻印的结果 ②一般大的“”
全书多处		倎	①偏右且细小的“夷” 在版片上削去单立人的结果 ②一般大的“夷”	①稍偏右且稍细小的“夷” 模仿削去单立人的字形而刻印的结果 ②一般大的“夷”

据此也可以知道带月楼本不可能是最早的版本，它是出于白鹿书院补修本的很多翻刻本之一。弘文书院本也不例外[19]。

16 廖文英 1658 年由洪承畴的提拔任衡州府同知。张自烈 1662 年去过衡州。

17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带月楼本东亚数字资源库的原书图像缺寅集。

18 古屋 1995 说过，白鹿内阁本往往在这些字上边贴上了印着（一般大的）“”字和“夷”字的小纸片。白鹿东大本往往按着小纸片的指示来进行改刻。

19 弘文书院本卷首有《正字通姓氏》，列举了鉴定的礼部尚书龚鼎孳、侍读学士张贞生等很多高官的名字，还有白鹿书院受业姓氏，列举了受业于廖文英的很多人的名字。弘文书院本

约在康熙十四年（1675）[20]廖文英任满回家乡广东连州，三藩之乱当中死于他地（根据刘炳补修本[1679 年]的吴盛藻序），那么白鹿书院补修本的印行应该在初印本刊行以后，刘炳补修本印行以前，即康熙十年（1671）后半年到康熙十八年（1679）之间，如果还要缩少范围的话，可以推定在龚鼎孳写序文的康熙十一年（1672）一月到廖文英离开白鹿书院的康熙十四年（1675）之间。

问题在于，从康熙十年（1671）到康熙十二年（1673）之间，《正字通》的真正作者张自烈也住在白鹿书院，而且他和廖文英父子也有一段时间在书院共同生活。因此也不能排除张自烈参与上述的修订，尤其是训释的修订的可能。这个问题我想等作完对白鹿内阁本和白鹿东大本训释的全面对照后再讨论。

五、关于“潭阳成万材本”

中国学术界往往把“潭阳成万材本”这个名称和白鹿书院本、弘文书院本等名称相提并论(董琨 1996 等)，其实这是误导人的。廖文英在他所管辖下的白鹿书院出版张自烈赠(卖?)给他的《正字通》时，得到了福建建阳（＝潭阳）的书贾成万材的协助，因此在白鹿书院本的内封刻了“潭陽成萬材梓行”七字。版片保存在书院里[21]。

廖文英任满后把版片运回家乡广东连州。这套版片自然是白鹿书院补修本（白鹿东大本）的。后来得到版片的刘炳修复了残缺处后[22]把内封改刻为“張爾公先生輯”，这就是在中国往往被称作“潭阳成万材本”的版本。既然白鹿书院本内封已有“潭陽成萬材”五字，还是应该用“刘炳补修本”等别的名称来加以区分。

黄沛榮 1998《正字通之版本及其作者問題》正确地区分了“康熙潭陽成萬材刊本”（＝白鹿内阁本）和“潭陽成萬材刊本”（＝刘炳补修本），但两者都是康熙年间的刊本，所以产生了像楊義騰 2013 那样的误会。单志鹏/孙建 2017 说：

> 杨义腾认同古屋昭弘考证康熙十年白鹿书院本是最早版本的观点，但指出古屋昭弘所考证依据的版本不是最早的版本，“其实是康熙十七年刘炳重新补修的，然

很可能就是廖文英的朋友、同事和受业弟子为了表扬廖文英对南康府和白鹿书院的贡献而重新翻刻白鹿书院补修本的。翻刻出版的时间不会太晚。萧文认为弘文书院是康熙末年黄州府知府蒋国祥主领的书院。萧文的根据是蒋国祥《重修白鹿书院志序》中的“匪惟弘文教于一时…”一句，但这一句应该理解为“弘”和“文教”的动宾结构，跟弘文书院无关。

[20] 廖文英康熙七年（1668）任南康府知府。同治年刊《南康府志》卷二说“在任七年”。

[21] 廖文英自序说：“會坊人鳩貲就版于白鹿洞。”《正字通》内封“潭陽成萬材梓行”上押有“白鹿書院藏板”阴文朱印。

[22] 担任修复的是阿字和尚（古屋 1995, p308）。

而此一版本并非是最早的刊本。”

因为古屋 1995 在说明白鹿内阁本时提到内封上的“潭陽成萬材梓行”七字[23]的存在，所以楊 2013 以为这是一般所谓的“潭阳成万材本”（＝刘炳补修本）。古屋对白鹿书院本进行考证时依据的是白鹿内阁本（康熙十年刊）和白鹿东大本，而不是康熙十七年刘炳重新补修的版本。

六、结语

近 20 年来陆续出版了几种《正字通》的影印本，是非常可喜的事，只是有时存在说明不够或不准之处，利用时应该多加注意。如：单志鹏/孙建 2017 说：

现通行版本有：

1. 北京工人出版社 1997 年影印弘文书院刊本。
2. 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湖北图书馆藏康熙二十四年清畏堂刊本。
3.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 1 月影印弘文书院刊本。
4. 济南齐鲁书社出版 《四库全书存目》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对以上四种影印本的说明，我想一一加以纠正和补充：

1. 这部影印本说是弘文书院本，其实只有张贞生序是弘文书院本（编者说自序据清畏堂本补入），其他大部分内容（約 1400 頁）是三畏堂本。
2. 这部影印本的扉页说“清畏堂藏板”，其实是清畏堂原板本。
3. 这部影印本不是弘文书院本，而是清畏堂藏板本。《正字通姓氏、十二字头》是据芥子园本补入的，本文的影印部分也有一些用芥子园本的地方[24]。
4. 这部影印本根据的是清畏堂原板本。

另外，东京代代木的东丰书店于 1995 年影印出版了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弘文书院本。解题（古屋所写）说卷首有《十二字头》，其实该博物院藏本卷首没有收《十二字头》[25]，因此另外附录了三畏堂本的《十二字头》影印及修补表[26]。

---

[23] 古屋 1995 错写为“成万才”。
[24] 也有可能原来已经是这种状态。
[25] 解题说卷首《正字通姓氏》里有《同官諸名公參訂、鑒刻》两项，其实没有。→注 37
[26] 另外“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字典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线上）”分别收录《正字通》，两者似乎都是清畏堂藏板本。

最后要介绍一下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的另外一种《正字通》，内封说“长洲汪份武曹先生增訂 正字通 培德堂梓行”，版框上有“梅誕生先生原本”七字。卷首有汪份序，署“康熙己亥（1719）”，子集题:“宣城梅膺祚誕生音釋 長洲汪份武曹增補”，从内容来看，是以梅膺祚《字彙》的翻刻为主每集后面加上增补字的字典[27]，跟《正字通》几乎没有关系。可见有的书坊觉得取“正字通”这个名字比取“字彙”这个名字更能促销[28]。

下面把白鹿书院系版本的刊印过程和廖文英的经历列为简表（附表 1），并总结包括带月楼本在内各种版本的特征（附表 2）。

＜附表 1＞**白鹿书院系版本与廖文英**

顺治十五年（1658）	廖文英由洪承畴的提拔任衡州府同知。	
康熙七年（1668）	廖文英由衡州府同知转任南康府知府，在任七年。	
康熙十年（1671）	张自烈应廖文英的邀请移居白鹿洞书院。 后半年“白鹿书院初印本正字通”（白鹿内阁本）刊行，内封有“潭陽成萬材梓行”七字，出版时廖文英附录了儿子廖纶玑的单行本《十二字头》。	
康熙十一年（1672）	正月张自烈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會昆湖公（廖文英）正字通成”。	
康熙十二年（1673）	张自烈因病死于书院，享年七十七岁。礼部尚书龚鼎孳此年九月去世。 廖文英继续修订“白鹿书院初印本正字通”后重印的是“白鹿书院补修本”（白鹿东大本），收龚鼎孳序。弘文书院本、三畏堂本等版本应该是翻刻“白鹿书院补修本”的。此年廖文英重修《白鹿書院志》。 不久后（约在 1675 年[29]）廖文英任满回故乡广东连州。	三藩之乱 1673-1681
康熙十七年（1678）	此年冬天廖文英已经不在世[30]。廖纶玑把《正字通》的版片赠给保卫连州的将军（总兵）刘炳，将军托阿字和尚修复版片残缺处后重印的就是“刘炳补修本”，内封仍有“潭陽成萬材梓行”七字。印行时间可能是次年前半年[31]。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吴源起买到刘炳补修本的版片后重印的是“清畏堂藏板本”。	
	后来别人得到清畏堂藏板本的版片后重印的是“清畏堂原板本”。	

[27] 新增的字比《正字通》对《字彙》所增多得多。如《正字通》午集对《字彙》的增字有只有 29 字，这部培德堂本的增字达 526 字之多。
[28] 这时《康熙字典》（1716 年）已经出版，但可能还没有普及到民间。
[29] 康熙十六年南康府知府已经是别人（伦品卓）。
[30] 刘炳补修本卷首的钱捷序说：“戊午冬，百子(廖文英)亦已淪亡。”
[31] 钱捷序写于康熙戊午（1678）十二月，在刘炳补修本的很多序中时间最晚。

＜附表 2＞各种版本简介

白鹿书院本系统（同版）	内封 “正字通”三字以外的信息	序	卷一 题	十二字头 十二字头引	区别性特征	其他
白鹿内阁本（白鹿书院初印本）	廖百子先生輯 潭陽成萬材梓行 朱印: 白鹿書院藏板	张/尹/黎/姚/廖	連陽廖文英百子輯	单行本 第六满文 ak ek 误作“阿忒厄忒” 末一行作“十二字頭終”	子上 43a3 亾[32]（其他版本均作“亡”）	无《引证书目、姓氏》（其他版本均有《引证书目》）
白鹿东大本（白鹿书院补修本）	禮部鑒定 廖百子先生輯 潭陽成萬材梓行 朱印: 白鹿書院藏板	龚/张/尹/黎/姚/史/王/陈/文	連陽廖文英百子輯	編在序文后[33] 第六 ak ek 改为“阿客厄客” 末一行作“十一字頭終”	文德翼序只见于东大本	有《姓氏》
刘炳补修本	禮部鑒定 張爾公先生輯 潭陽成萬材梓行 朱印: 嶺南廣居堂藏板	龚/廖/钱/王令/吴盛/高/李/刘	南昌張自烈爾公輯連陽廖文英百子梓	无《十二字头》与《十二字头引》	内封“張爾公先生輯”只见于刘炳补修本	无《姓氏》
清畏堂藏板本	南昌張爾公 連陽廖百子 兩先生全輯 清畏堂藏板	吴/廖/龚	南昌張自烈爾公輯連陽廖文英百子梓[34]	无《十二字头》与《十二字头引》	廖序“今上”的“今”字还清晰可见。原板本已漫漶不清或完全不见	无《姓氏》
清畏堂原板本	南昌張爾公 連陽廖百子 兩先生全輯 清畏堂原板	吴/廖	南昌張自烈爾公連陽廖文英百子全輯	不与白鹿书院本同版 第一字头 ya 缺“丫”字 第六 阿忒厄忒 十二字頭終	十二字头第一 ho 作“黍”，第八作“直舌而使”（其他版本均作“禾、直舌而旋”）	无《姓氏》

[32] “亾”作为古字是对的，但作为以“亠”为部首的字不合适。
[33] 白鹿内阁本以外的其他版本均同，只是编排的位置各不相同。
[34] 其他清畏堂藏板本中也有作“南昌張自烈爾公、連陽廖文英百子全輯”的。

翻刻本	内封 “正字通”三字以外的信息	序	卷一 題	十二字头	区别性特征	其他
弘文书院本[35]	新鐫 廖百子先生輯 弘文書院藏板	张/王/黎/史/姚	連陽廖文英百子輯	第六 阿忒厄忒 十二字頭終	凡例：“…什之一□，□義…”缺“二精”二字[36]	有《姓氏》[37] 版心：弘文書院
芥子园本	廖百子先生輯 芥子園重鐫	龔	連陽廖文英百子輯	第六 阿忒厄忒 十二字頭終	子下87b8音丿（其他版本均作“音卞”）[38]	有《姓氏》 版心：芥子園重鐫
三畏堂本	廖百子先生輯 三畏堂重梓	张/王/陈/黎	連陽廖文英百子梓	缺“yo 岳” 第六 阿客厄客 十一字頭終	酉上57b5趙謁（其他版本均作“趙談”）[39]	无《姓氏》
带月楼本[40]	新鐫 廖百子先生輯 帶月樓梓	龔/张	連陽廖文英百子輯	第六 阿忒厄忒 十二字頭終	引证书目中“玄”均不缺笔（其他版本均作“玄”）	有《姓氏》 版心：帶月樓

序文年月：廖文英 1670/07(康熙九年七月) 张贞生 1670/12 黎元宽 1671/04 史彪古 1671/04 尹源进 1671/05 姚子庄 1671/06 文德翼 1671/10 陈年毅 1671/11 王震生 1671/12 龚鼎孳 1672/01 刘炳 1678/02 王令 1678/08 高光夔 1678 秋 钱捷 1678/12 吴盛藻 李蕡 吴源起 1685

附记：我第一次介绍《正字通》中赣方言色彩的音注，是在岩田礼先生主持的研究会上。最近我找到了当年手写的讨论提纲，上面写着 1989 年 8 月 3 日。希望岩田先生不介意我 33 年后又老调重弹。

35 还有一种“弘文书院本”，卷首收龚鼎孳、张贞生二序，收《十二字头引》与《十二字头》，无《姓氏》一项。版心没有“弘文書院”四个篆字。大阪大学图书馆藏。

36 其他版本均作“…什之一二，精義…”。

37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弘文书院本《姓氏》末尾有《同官諸名公參訂、鑒刻》两项。其他弘文书院本似乎均无此两项。

38 这种例子很多，请参看古屋 2009, p42。

39 这种例子很多，请参看古屋 2009, p46。

40 各种版本的翻刻过程、先后关系等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目前我认为弘文书院本、三畏堂本是翻刻白鹿书院补修本的，芥子园本、带月楼本是翻刻弘文书院本的。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吴格教授、张磊博士、早稻田大学西田文信教授、Carleton College 邓琳助理教授的热情帮助，并此致谢。邓琳助理教授特意替我们调查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所藏带月楼本《正字通》，并确认了其内封版框上方有“雍正拾贰年镌”六字。

参考文献

蔡英杰主编 2020《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中国书籍出版社

董琨 1996《正字通》一书及其作者，《辞书研究》1996 年第 3 期

古屋昭弘 1993 張自烈《増補字彙》について，《中国文学研究》19

古屋昭弘 1995 正字通版本及作者考，《中国语文》1995 年第 4 期

古屋昭弘 2009《張自烈《正字通》字音研究》好文出版

黃沛榮 1998 正字通之版本及其作者問題，第九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单志鹏/孙建 2017《正字通》研究概况析论，《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9 卷第 4 期

萧惠兰 2003 张自烈著《正字通》新证，《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

楊義騰（杨义腾）2013《正字通與歷代重要字书之比較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台北）

吴元丰 2008 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 年第 1 期

朱莹莹 2016 正字通研究述评，《语文月刊》2016 年 8 月

A bibliographic exploration into the Daibalou version of *Zheng zi tong*

Akihiro Furuya Translated by He Ping
Wased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bibliographic exploration into the Daibalou version of *Zheng zi tong*. With the help and guidance of Professor Wu Ge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Dr. Zhang Lei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term Daibalou itself is erroneous, and it should have been Daiyuelou. I also argued against the theory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very first editions of the book, which is in an earlier stage than the Bailu Shuyuan edition.

慧琳音義中四家文本引《切韻》考

丁鋒
大東文化大學

内容摘要：小文は唐代学僧慧琳所編《一切経音義》全百巻に引用されている《切韻》の訓釈を全て収集の上、現存する《切韻》の長孫訥言箋註本、王仁昫刊謬補闕本、孫愐撰《唐韻》のテキストを利用して、比較分析を行ったものである。窺基、慧苑、雲公、慧琳など学僧四人が夫々製作した佛教音義から見た《切韻》の引用事情と引用態度により、唐代《切韻》を巡る佛學史や文化史の一面が窺える。

一、開題

成書於隋仁壽元年（601）的陸法言《切韻》是漢語音韻史上最重要的韻書。其分韻在唐代被奉為朝廷科舉應試的標準，可謂“時俗共重，以為典規[1]”。在宋初大中祥符元年（1008）陳彭年等依據《切韻》《唐韻》編就《廣韻》刊刻之前，《切韻》風行四百多年，多種修訂本傳抄本行極一時，成為隋唐五代音韻風氣之主流，凸顯漢語音韻之社會影響。

印度佛教自後漢末年傳入東土，經過三國魏晉南北朝隋等近六個世紀譯經事業的發展和譯經數量的累積，形成具有數千卷收藏規模的“一切經”。伴隨譯經數量不斷增長的趨勢，詮釋佛經語言以促進信眾對佛典深入理解之社會需求亦成為佛教界的緊要課題。發軔於楊隋，盛行於李唐，式微於五代的佛經音義應運而生。開創期的佛經音義早已散逸，現存的唐五代佛經音義除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661-663）、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807）、後晉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三十卷（940）和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987）外，尚存數種單經音義。

多種佛經音義著作為了詮釋佛經詞語之語音語義大量引用世存韻書字書，故《切韻》的引用為唐五代佛經音義之通常情況，但也有例外。上述四種音義書引用《切韻》之次數分別為慧琳 123 次、可洪 110 次、希麟 623 次，而玄應全無。又慧琳音義雖引用《切韻》總數不菲，但除去合編納入的慧苑音義（第 21 卷到 23 卷）、雲公音義（第

[1] 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序》。

25 第 26 兩卷）、窺基音義（第 27 卷）三家引用部分，慧琳自身編寫部分引用《切韻》僅 17 次。玄應慧琳兩大長安出身的高僧對《切韻》所持敬而遠之態度蓋與《切韻》夾雜江東“吳音”不合長安“秦音”有關。如慧琳音義之景審序所謂“吳音與秦音莫辯，清韻與濁韻難明；至如武與綿為雙聲，企與智為疊韻。近有元廷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韻》，今之所音取則於此。”以京都長安音為準繩，乃為其宗旨，亦為《切韻》在長安失勢失評之原因。

拙文擬對慧琳音義百卷中所見窺基、慧苑、雲公、慧琳四家單經音義文本中的《切韻》引用實例作文獻學意義和音韻學意義上的考釋，藉助現存多種《切韻》傳本實施對比，分析考察其引用情形及引用性質。唐代所存《切韻》多為殘缺本，信息雖不能盡合人意，期“抱殘守闕”之餘小有補益。

二、窺基音義中的《切韻》引用

慧琳音義第二十七卷卷首題：翻經沙門大乘基撰　翻經沙門慧琳再詳定。卷內窺基《法花音訓序》言：“音以《說文》為正，微訓採於餘籍”，雖未言及《切韻》，但其全卷引用《切韻》八十六次，為四種音義中之最，重視《切韻》之程度可見一斑。窺基為玄奘弟子，據《宋高僧傳・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窺基於永淳元年（682）五十一歲示寂，《法花音訓》的完成至少早於慧琳音義成書一百二十多年。以下依據年代順序逐條排列《切韻》文本表述，包括長孫訥言箋註本、王仁昫刊謬補闕本、唐韻殘本[2]等，進而逐一作出對比分析。

2.1 引用部分相同例

窺基音義引用《切韻》的部分與唐本《切韻》文本材料有多元關聯。既文字上同異互見，內容上亦有形音義之分，而且在不同種類的《切韻》文本間呈現不同分佈。同異共存中“同異輝映”，與《切韻》文本的歷史形成過程密切攸關，以下以形音義為主軸列例解析。

2.1.1 一項相同例

字形以及小韻收字字數相同例有：

[2] 今存箋註本敦煌殘卷數量甚多，故寫本信息從省。王仁昫本相對完整，依據《〈切韻〉匯校》以王一、王二、王三稱之。《唐韻》等參照整理本，其他多取用《十韻彙編》。謹深謝關長龍、徐朝東等所有相關學者。

(1)旃檀：下《切韻》作栴，非也[3]。

仙韻章母[4]箋註本王一王三：栴，栴檀，香木。案《切韻》作“栴”，與窺基所引字形合。

(2)魑魅：上勅知反，《說文》作螭，《三蒼》諸字書作螭，《玉篇》《切韻》作魑。

支韻徵母王一王二王三：魑，丑知反，魑魅。案“魑”之字形與窺基所引合。

(3)一滴：下丁歷反，《切韻》作滴。

錫韻端母箋註本未收。王一王三：滴，都歷反，水滴。王二：滴，滴水，亦滴。唐韻：滴，都歷反，水滴。《廣韻》：滴，水滴也，亦作滴。案《切韻》字形作滴，與窺基所引合。

(4)魦捕：上語居反，亦捕也。《玉篇》魦，語去，亦捕魚也，有作漁。《說文》亦捕魚也，古作獳。《切韻》應古獳也。

魚韻疑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三：獳，語居反，捕魚，或作漁魚魦”（箋註本作“或作瀫魦”，王三作“或作魦”）。案如窺基所言“獳魦”為古今字，《切韻》收古體“獳”。

(5)繚戾：上力小反。《切韻》唯有了達、蓼菜、目晴明暸、長鬚鬌四字之外，更無了音之字。

窺基言及“了”小韻所收“四字”問題。案篠韻來母王一：了，盧鳥反，畢。蓼，菜，亦作〔⁺⁺下翏〕。暸，目精朗。鬚口[5]口口。口，裛。鄝，屯名。王三：了，盧鳥反，畢。蓼，菜，亦作〔⁺⁺下翏〕。暸，目精朗。鬚，鬚鬌，長皃。撩，抉，又力彫反。瀏，小水。磟磟，鳥垂。憔，拭。衧，衼衧。鄝，地名。憭，心朗，又力彫反[6]。今王一收六字，王三收十一字，多有增補。且據今本，窺基音義引文“了達”當為“了，畢”之誤，“目晴明暸”當為“暸，目晴明”或“暸，目精朗”之誤，“長鬚鬌”當為“鬚，鬚鬌，長皃”之誤。窺基所見《切韻》文本中“了”小韻僅有“了蓼暸鬚”四字，蓋出自陸法言原本或切近原本之傳本。案諸《切韻》殘本中，箋註本篠韻來小韻可視為與窺基參照原本最為相似也是保存最完整之文本。全文如下[7]：了，盧鳥反，四。蓼，菜。暸，目精朗。鐎，鐎鬌，長皃。

音切相同的有：

---

[3] 為便於閱讀，引文恕以字條為單位分句，不加引號。

[4] 此處以韻部聲紐指稱小韻，以下皆同。

[5] “口”處為殘缺空白字，以下數處同。

[6] 以上引文因比較之需，多處依據徐朝東 2021 注釋作了改定。

[7] 張湧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五冊小學類韻書之屬（1），關長龍撰，第 2211、2464 頁。

(1)蚖：《字林》五官反，《切韻》亦愚袁反。

元韻疑母箋註本王三：蚖，愚袁反，蠑蚖，蜥蜴別名，又五丸反。寒韻疑母箋註本未收。王一王三：黿，五丸反，似鼈，又愚袁反。與窺基所引反切相同。

(2)靉靆：上愛下代，《埤蒼》《切韻》同。

代韻影母王二王三唐韻“愛”小韻：靉，烏代反，靉靆。定母王二王三唐韻代小韻：靆，徒戴反，靉靆，雲氣（王三唐韻作“雲狀”）。案窺基“愛、代”為“靉靆”二字小韻首字（代表字），用於指稱《切韻》讀音，與《切韻》合。

釋義相同的有：

(1)不豫：余據反，入也，安也。《切韻》逸作豫。

御韻以母王一王三：豫，余據反，逸。又質韻以母小韻：逸，夷質反，失。《唐韻》：豫，逸也，備也，亦獸名，《說文》云象屬，又姓，《史記》晉有豫讓，羊洳反。案與窺基所引“逸作豫”合。

(2)隤：《說文》大迴反，下墜也。《切韻》若作穨，暴風也;若作頹，禿也；若作㡌牘,舍屋破也。

灰韻定母箋註本王三：穨，杜回反，暴風。墳，下墜。牘，㡌牘，屋破狀。頹，禿。案諸同小韻字群與窺基所引釋義甚合，均有破壞義。

(3)齮齧：上相傳在詣反，謂沒齒齩也。《切韻》：甞至齒。

霽韻從母王一：嚌，在詣反，嘗至齒。王二：嚌，在細反，嘗至齒。王三：嚌，在計反，嘗至齒。王二：齮，齮齧。王一王三唐韻未收齮字。案王韻與窺基所引釋義“甞至齒”合。

(4)搏撮：下倉捋反，《切韻》：手取也。

末韻清母箋註本王一：撮，七活反，手取。王二王三：撮，七括反，手取。唐韻：撮，倉括反，六十四黍為圭，四圭撮，撮，手取。案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5)嗺喍：下音柴。《切韻》：齒不正曰齹。

佳韻崇母箋註本：齹，士佳反，齹齟，齒不正。王二：齹，士佳反，齒不正皃。王二：齹，士佳反，齒不正。案窺基釋義與王二合。

(6)頌瘦：上《說文》口沒反。《切韻》：白禿曰頌。

沒韻溪母箋註本王一王三唐韻：頌，苦骨反，白禿。案均與窺基所引釋義合。

(7)矬陋：上徂戈反，《廣雅》《切韻》：短也。

歌韻從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二王三：矬，昨和反（王二“昨禾反”），短（王韻作“矬短”）。案箋註本切三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8)估賈：估音公戶反。《切韻》：估，市稅也。

姥韻見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估，姑戶反，市稅。案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9)坦：他誕反。《廣雅》及《切韻》：平也。

旱韻透母箋註本王一王三：坦，他但反，平（箋註本作“坦平”）。案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10)傭賃：上勇恭反，《切韻》：亦賃也。

鍾韻以母箋註本：傭，餘封反，傭賃。王二王三：傭，餘封反，賃。案王韻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11)灑，所買反，《切韻》：灑掃也。

紙韻生母箋註本王二王三：灑，所綺反，灑掃。又寘韻生母王一王三：灑，所寄反，灑掃。王二：灑，灑掃，亦洒，又所綺反。《廣韻》卦韻生母：洒，所買切，洒埽。案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12)俞急：上戈朱反，有作逾。《切韻》：逾，越也；俞，然也。

虞韻以母箋註本王三：逾，羊朱反，越。俞，羊朱反，然。案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13)衒賣：上玄麵反，《切韻》：自媒。

霰韻匣母王一王二王三唐韻:衒，黃練反，自媒。案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14)輕蔑：下莫結反。《說文》：相輕侮。《切韻》：無也。

屑韻明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唐韻：蔑，莫結反，無（王三無釋義）。案王一王二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15)討伐：下房越反。《切韻》：征也，有作罰。《說文》：罪之小者曰罰，《廣雅》：罰折伏也。《切韻》罰非此之[8]義。

月韻奉母箋註本王二王三唐韻：伐，房（唐韻誤作“戶”）越反，征也（王三作“問罪”，唐韻作“征伐也，斬木也，由自矜曰伐。”）。案釋義除王三唐韻外均與窺基所引合。同小韻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唐韻：罰，罪罰（箋註本作“罪”，王二作“罰罪”）。“伐”或作“罰”，合於窺基所引。

(16)除愈：下臾乳反。《切韻》作愈，差也。

麌韻以母箋註本王二王三：愈，以主反，差（箋註本作“若勝”）。案王二王三釋義與窺基所引合而箋註本不合。

(17)繽紛：上匹仁反，下孚云反。《字林》：繽紛盛皃也。《切韻》：飛也。

真韻滂母箋註本：繽，敷賓反，飛。王三：繽，敷賓反，亦[9]繽紛。文韻敷母箋註本王三：紛，撫云反，紛紜。翻，撫云反，繽翻，飛，或作紛。《切韻》“繽紛”

[8] 高麗藏本“此之”誤作“之此”，茲正。

[9] “亦”為衍字。

或作“繽翡”，有“飛”義。案釋義與窺基所引合。

(18)曲戾：下《字林》力計反，亦曲也。《切韻》：乖也。

霽韻來母箋註本王韻：戾，魯帝反。箋註本：戾，乖。王一：戾，求。王二：戾，苂，又呂結反。王三：戾，佷求。唐韻：戾，郎計反，乖也，曲也，字從犬，出典下身曲。窺基所引“乖也”有出自箋註本唐韻之可能。屑韻來母王二：戾，練結反，曲戾，又魯帝反。王三不收此又音。《唐韻》屑韻來母：戾，練結反，罪也，曲也，又力計反。王二王三唐韻釋義均不作窺基所引“乖也”。

2.1.2 兩項相同例

字形反切都相同的有：

(1)縱：即容子用二反，《切韻》唯作蹤縱轂三字。

鍾韻精母箋註本：綜，即容反，又子用反，縱橫，三。蹤，迹。轂，車迹。小韻收“縱蹤轂”三字。又《切韻》鍾韻[10]：縱，即容反，又子用反，橫，三。蹤，迹。轂，車迹。又《十韻彙編》切二：縱，～橫，即容反，字用反，三。蹤，迹。轂，車迹。反切上字“字（從母）”疑為“子（精母）”之誤。案切韻殘本箋註本字數與字形均合於窺基所引。

王三：縱，即容反，又子用反。小韻收“縱蹤轂磩篵”五字。又王二：三加二。收“從（從橫，又縱）蹤轂篵樅”五字。窺基所引“三字”當為“三加二”之前“縱蹤轂”三字。王三：縱，～橫，即容反，又子用反，三。蹤。案反切與字數雖與窺基所引合，脫一字。王二王三保留王仁昫增字之前小韻字數，並與窺基所言字數一致，此為窺基使用本為王韻之前早期文本，包括《切韻殘本》和箋註本之明證。

(2)十方剎：下初鎝反，《切韻》作刹。

鎝韻初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刹，初鎝反，柱（王三作“幡柱”）。案音切與俗體俱合乎窺基所引。《唐韻》鎝韻不收“剎”字。

(3)憔悴：上昨焦反，下疾醉反。《三蒼》《切韻》並顦顇。

宵韻從母箋註本王三：憔，昨焦反，憔悴。至韻從母王一王三：顇，疾醉反，顦顇。王二：顇，疾醉反，顦顇，憂也，或悴。案“顦顇”二字字形音切與窺基所引合。

反切釋義都相同的有：

(1)阿兔：下奴溝反，《切韻》：兔子也，或作豗也。

侯韻泥母箋註本切三：豗，女溝反，兔子。王一王三：豗，奴溝反，兔子。案窺基所引音義（反切與釋義）與王一王三一致而與箋註本切三反切不合。

[10] 關長龍 2008《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5 冊第 2090 頁。

(2)圮：字林父美反。撿《切韻》符鄙反，上聲音，岸毀也。

旨韻並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圮，符鄙反，岸毀。案音義與窺基所引合。

(3)椽桷：下力舉反。《切韻》：桷，桷端木。

語韻來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桷，力舉反，桷端木（王三誤作“桶木”）。案與窺基所引音義合。

(4)樝掣：上《字林》側加反。《切韻》：樝，似梨而醋。

麻韻莊母箋註本王三：樝，側加反，似梨而醋。案與窺基所引音義合。

(5)土埵：《切韻》：丁戈反[11]。作陖，小堆。

歌韻端母箋註本：垛，丁戈反，小堆。王一王二王三：陖，丁戈反，又丁果反。小堆，亦埵、垛。案與窺基所引音義合。

(6)繒纊：上疾陵反，下苦謗反。《說文》《切韻》：繒，帛也；纊，絮也。

蒸韻從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繒，疾陵反，帛。案與窺基所引音義合。宕韻溪母王二：纊，苦謗反，絮，又絖。唐韻：纊，苦謗反，絮，莊子作絖。案王二唐韻與窺基所引“苦謗反，絮也”無異。王三：纊，苦浪反，絮。案王三反切下字不同。

(7)氈：徒協反。《切韻》：細毛布。

怗韻定母箋註本王二唐韻：氈，徒協反，細毛布。案均與窺基所引音義合。王三：徒協反，細布。疑脫“毛”字。

(8)痟瘦：上相焦反。消亦渴，病名。《切韻》：渴病也。

宵韻心母箋註本：痟，相焦反，痟，渴病。切三王三：痟，相焦反，痟，渴病。案與窺基所引音義皆合。

(9)伶俜：上郎丁反，下匹丁反。切韻：行不正曰跉蹁。跉亦郎丁反，蹁亦普丁反。行不正作跉趕。跉，呂貞反；趕，勅貞反。《切韻》：趕，行不正也。

青韻來母箋註本：伶，郎丁反，樂人。跉，郎丁反，跉蹋，行不正。王二：伶，郎丁反，樂人，伶俜。跉，郎丁反，跉蹋，行不正。王三：伶，郎丁反，樂人。跉，郎丁反，跉蹋，行不正皃。又青韻滂母箋註本：蹋，薄經反，跉蹋。王二王三：蹋，普丁反，跉蹋，行不正。或作俜（王二“亦伶俜”）。又清韻來母王二王三：跉，呂貞反，跉趕。清韻徹母王二王三：趕，敕貞反，跉趕，行不正。案以上諸反切與釋義，皆與窺基所引相合。

(10)奮迅：上俯問反，揚也。下私閏反，疾也。《切韻》亦息晉反，信音同，同疾也。

問韻非母王一王二王三：奮，府問反，揚（王三作“揚奮”）。震韻心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迅，私閏反，疾也。案二字音義與窺基所引合。

[11] 此處原缺“反”字，參照徐時儀 2010 補入。

震韻心母王一王二王三：信，息晉反。迅，息晉反，疾，又私閏反。箋註本：迅，疾，又私閏反。箋註本其他文字殘缺。案王韻音義均與窺基所引合。

(11)擣篅：下《集類》所佳所飢二反。《說文》：竹器也，可以除麁取細。《切韻》：所綺反，羅也。又所宜反，下物。古文籬、簏二形，同。

支韻生母箋註本未收。王一王二王三：篅，所宜反，下物。又同小韻王一王三：籬，盛，亦作篅；又所佳反，亦作篩簏。王二：籬，盛。又紙韻生母箋註本王二王三：篅，所綺反，籮（王三作“籮篅”），案箋註本王二釋義與窺基所引合，王三不合。

(12)量旋：下似泉反，還也。《切韻》：若如水回，作淀，辝選反，又似泉反。

仙韻邪母箋註本：旋，似宣反，還。淀，回淵，又辝選反。王一：旋，似泉反，還。淀，似泉反，回流。王三：旋，似宣反，還。淀，似宣反，回流。又線韻邪母箋註本缺。王二：淀，辝選反，迴側。王三唐韻：淀，辝選反，回（唐韻作“迴”）泉。王三釋義不作“若如水回”。“辝選反”與王二王三唐韻合，“似泉反”與王一合，與王三不合。案窺基音義“旋，下似泉反，還也”與王一全同。

(13)囑累：上之欲反，屬，託。《切韻》託作囑。

鐸韻透母他各反，箋註本唐韻無釋義。王二：託，付。王三：託，囑。窺基音義“託作囑”，案燭韻章母箋註本王一王三：囑，之欲反，託，俗作嘱（箋註本無“俗作嘱”釋義）。王二：囑，之欲反，託，今囑。唐韻：嘱，託，亦作囑。“囑囑”古今字，“囑嘱”正俗字。案與窺基所引音義合。

(14)祝詛：上之授反，《說文》作詶。其詶，《切韻》：市流反，以言答也。

尤韻禪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詶，市流反（王二“市州反”），以言荅（箋註本此後作“又之又反”）。案箋註本王一王三音切釋義與窺基所引皆合。

(15)紺青：上古暗反。《切韻》：青赤色。

勘韻見母箋註本殘缺。王一王二王三唐韻：紺，古暗反，青赤色（王三唐韻“赤青色”）。案王一王三音義與窺基所引合，王三唐韻不合。

(16)繚戾：上力小反。繚字有二，力小力召反，一繚繞，二繚炙。繚炙或作繚戾，魯帝反也。

窺基言“繚字有二，力小力召反，一繚繞，二繚炙。”案《切韻》小韻來母箋註本：繚，力小反，繚遶，或作〔多奈〕。王一：繚，力小反，繚繞。又王三：繚，力小反，繞。王一音義“繚，力小反，繚繞。”“繚繞”義與窺基所引一致。又案《切韻》笑韻來母小韻，箋註本唐韻：膫，力召反，炙也，出《說文》。王一：燎，力召反，又力小反，照也。鐐，力召反，炙。王二：燎，力召反，又力小反，照也。鐐，力召反，炙，又繚。王三：燎，力照反，又力小反。鐐，力照反，炙鐐。王二音義“鐐，

力召反，炙，又繚。”音義與窺基所引合。

又窺基言“繚炙或作繚戾，魯帝反也。”案霽韻來母箋註本王韻：戾，魯帝反。反切相同。其釋義箋註本作：戾，乖。王一：戾，求。王二：戾，苂，又呂結反。王三：戾，佷求。屑韻來母王二：戾，練結反，曲戾，又魯帝反。反切與窺基所引合。

字形釋義都相同的有：

(1)陁：《說文》丈尒反。有作褫，《說文》《切韻》：奮衣。正作陊，《切韻》山崩也。

紙韻澄母箋註本：褫，舊衣。陊，山崩。王一：褫，奮衣。陊，山崩。王二：陁，落。褫，舊衣。陊，山崩。王三：褫，奮衣。陊，山崩。陁，落陁。箋註本王二“舊衣”與王一王三“奮衣”均為“奪衣”之訛。案《說文》衣部：褫，奪衣也。窺基所本之誤與王一王三一致。“正作陊，切韻山崩也”與箋註本王韻均合。又以上小韻，王一：陊，山崩。王二：陁，落。陊，山崩。王三：陊，山崩。陁，落陁。案與窺基所引“陁陊”二字釋義合。

(2)觸嬈：下《說文》乃了反，《切韻》：戲相擾，作嬲。

篠韻泥母箋註本王一王三：嬲，奴（箋註本作“乃”）鳥反，戲相擾。案與窺基所引形義合。

2.1.3 三項相同例

形音義都相同的有：

(1)唼：子荅反，《通俗文》《切韻》作呷，入口曰呷。

合韻精母箋註本王二王三唐韻：呷，子荅（唐韻作“合”）反，入口。案箋註本王韻形音義俱合窺基所引，《唐韻》反切與窺基所引不合。

2.2 引用部分不同例

釋義不同的有:

(1)塔：《切韻》：塔即佛堂、佛塔，廟也。

盍韻透母箋註本殘缺[12]。王二王三唐韻：塔，吐盍反，佛圖。案釋義不作窺基所引“佛堂、佛塔，廟也”。

(2)欻然：上許物反，《切韻》：暴起皃。

物韻曉母箋註本王二唐韻：欻，許物反，暴起。案不作窺基所引“暴起皃”。

(3)嗥吠：上胡刀反。切韻：熊羆虎聲也。

豪韻匣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嗥，胡刀反，熊虎聲。案所引釋義衍“羆”字。

[12] 箋註本字條有漫漶不清處視為殘缺。

(4)土埵：《字林》丁果反，《切韻》：小土聚隅。

哿韻端母箋註本：埵，丁果反。無釋義。王一王三：埵，丁果反，堆。案窺基所引釋義“小土聚隅”與《切韻》不合。

(5)妧湎：《切韻》亦嗜著亂。

獮韻明母箋註本王三：湎，無兗反，酗酒。覃韻端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妧，丁含反，妧樂。案與窺基所引釋義“嗜著亂”不合。

(6)背傴：下《字林》一父反，《切韻》：傴，背曲不伸也。

麌韻影母箋註本王二王三：傴，於武反，不申。《廣韻》麌韻：傴，於武切，不伸也，尪也，荀卿子曰周公傴背。案《切韻》釋義“不申”與所引“背曲不伸”不合。

(7)塵坌：《切韻》：塵，穢也。

真韻澄母箋註本切三王三：塵，直珍反，埃（王三作“土埃”）。案與窺基所引釋義不合。

(8)悋惜：上力晉反，《切韻》：鄙，悋也。

旨韻幫母箋註本無釋義，王一王二王三：鄙，邑。案釋義不作窺基所引“悋也”。

(9)毀呰：《切韻》毀作訾。

紙韻箋註本曉母王二王三：毀，許委反，壞（箋註本無釋義）。案釋義不作窺基所引“訾”。

(10)眇目：上弥了反。《切韻》：視不正。

小韻明母箋註本王三：眇，亡沼反，小眇（箋註本無釋義）。案與窺基所引釋義“視不正”不合。

(11)荷負：上何可反，又胡歌反。《切韻》《韻英》：荷，擔也。

歌韻匣母箋註本：荷，胡歌反，荷。王一王三：荷，韓柯反，蓮葉。王二：荷，胡哥反，芙蓉。《廣韻》歌韻：荷，胡歌切，《爾雅》曰荷，芙蕖。又胡哿切。其哿韻：負荷也，胡可切，又戶哥切。案《切韻》諸本不收上聲哿韻音義，與窺基所引“荷，擔也”不合。

(12)枯槁：下《字林》苦道反，《切韻》：古枯也。

皓韻溪母箋註本：槁，苦浩反，枯。王三：槁，苦老反，枯。案釋義不作窺基所引“古枯”。

(13)瓦礫：下力的反，《切韻》：沙也。

錫韻來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唐韻：礫，閭激反（唐韻作“郎擊反”），砂礫（王一“沙礫”）。案《切韻》諸本作“砂”或“砂礫”，不作窺基所引“沙也”。

(14)三界獄免出：免，無遠反。《切韻》：引也。

獮韻明母箋註本切三王三：免，亡辯反，黜。案不作窺基所引“引也”。

(15)相扠：下勅佳反，以拳加人。案《切韻》：拳加人。

麻韻初母箋註本不收“扠”字。王二：扠，初牙反，扠把。案不作窺基所引“拳加人”。王三未收“扠”字。

音切不同的有:

(1)孚乳：下而注反。《切韻》：濡主反。

麌韻日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二王三：乳，而主反，肉津（王二作“肉汁”。箋註本切三無釋義）。案諸《切韻》反切上字“而”與窺基所引反切之上字“濡”不合。

(2)出內：上昌遂反。《切韻》亦赤律反。

質韻昌母箋註本切三王二：出，尺聿反，狂走（箋註本切三無釋義），又尺季反。唐韻“出”字移至術韻：出，尺律反，又尺季反。案窺基所引“赤律反”與諸《切韻》“尺聿反”不合。

(3)匾匾：《韻集》《切韻》上鞭沔反，下體奚反。

銑韻幫母王三：匾，方繭反，匾，匾字湯嵇反。齊韻透母箋註本王三：匾，匾匾，薄，匾字方典（箋註本作“顯”）反。案窺基言匾匾二字“上鞭沔反，下體奚反”，與王三不合。或為《韻集》音切耶？

2.3 引用部分同異共存例

音同義異的有:

(1)說應：下憶興反，《切韻》又於證反，物謂契應也。

蒸韻影母箋註本切三王二：應，於陵反，當。又證韻影母箋註本：應，於證反，物相應。切三王二：應，於證反，物相應當，又於陵反。唐韻證韻影母：膺，於證反，以言對，又音應。案諸本反切與窺基所引相合，窺基所引釋義“物謂契應”疑為切三王二釋義“物相應當”之訛。

(2)懈怠：上古隘反，下徒亥反。《切韻》疲也，作怠，懈。

卦韻見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唐韻：懈，古隘（《唐韻》誤作“益”）反，嬾。海韻定母箋註本切三王二王三：怠，徒亥反，懈。案二字反切與窺基所引合，《切韻》無“疲也”釋義。

(3)增上慢：下莫晏反，《切韻》欺為謾，緩為慢。

諫韻明母王一王二王三唐韻：慢，莫（唐韻作“謀”）晏反，怠。謾，欺。縵，緩。案“謾，欺。”王韻反切與窺基所引相合，釋義“欺為謾”相合。窺基“緩為慢”疑為“緩為縵”之誤，“縵”訛作“慢”。

義同音異的有:

(1)搏撮：下倉捋反，《切韻》：手取也。有作子括反，音非此義。《切韻》：手把，作攥，子活反。

末韻精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唐韻：攥，子括反，手把（王二另有“亦撮”二字）。與窺基所引合，即所言“有作子括反，音非此義”。窺基所引“子活反”之反切下字“活”有誤，當作“括”。

義同字異的有:

(1)癵躠：上呂員反，手拘病也，有作孿。《切韻》：癵綴也。

仙韻來母箋註本：孿，呂員反，孿綴狗。王一：孿，呂緣反，孿綴，鷹狗。亦作巒。《切韻》不收“癵”字，收異體字“孿巒”，故“癵綴”即“孿綴”。《廣韻》亦作“孿，呂員切，孿綴。”案《切韻》不收“癵”字，釋義則與窺基所引合。

兩音中一同一異的有：

(1)囑累：下力委力僞二反。屬，託。《切韻》託作囑。

紙韻來母箋註本王二王三：累，力委反，多（箋註本王二無釋義）。案與窺基所引“力委反”反切相同。又寘韻來母小韻箋註本“累”字音註殘缺，王一王二王三均作“羸僞反”，釋義為王一：累，緣坐。王二：累，重也，相屬託也，古絫厽，又力委反。王三：累，緣累。案與窺基所引“力僞反”不合。

兩義中同異互見的有：

(1)木櫁：下《字苑》民一反。《切韻》樹名，作榓。

質韻明母重紐密小韻箋註本未收。王一王三：櫁，美筆反，香木。又質韻明母重紐蜜小韻箋註本王一唐韻：榓，民必反，木榓，樹名。王二：榓，木名。王三：榓，木榓。唐韻：榓，弥畢反，木榓，樹名。今存蔣藏本《唐韻》不收“櫁”字而日本文獻《倭名抄》存其輯佚條目“櫁，香木[13]”，釋義與其他《切韻》一致。案“櫁、榓”二字多種《切韻》均為不同小韻，窺基混而為一。窺基所引《切韻》“樹名，作榓。”與箋註本王一《唐韻》相合而與王二王三不合。

(2)狖：《字林》余繡反。《切韻》：蟲名，似鼠，作鼬。獸名，似猨。作貀，狖是古字。有作狚不知所從。依此應為鼬貀，非惡性故也。《玉篇》：貀似貍，捕鼠。與《切韻》別。

宥韻以母箋註本：狖，餘救反，獸名，似猨。鼬，餘救反，虫名。王一王二王三唐韻：狖，余救反，獸名（王二脫“名”字），似猨。鼬，余救反，蟲名，似鼠。案窺基所引“蟲名，似鼠，作鼬。獸名，似猨。”與諸王韻同。又窺基所引“作貀”與

[13] 參見徐朝東 2012 第 226 頁。

《切韻》實際上“作狖”相異。同小韻“狖”字釋義王一作“禺屬”，王三作“虫屬”，王二不收。案窺基以“狖貀”為古今字，而箋註本王一王三唐韻指稱不同動物。

多音義中同異互見的有:

(1)咀嚼：上慈呂、情呂二反。《切韻》：噬也。

語韻從母箋註本切三王一：咀，慈呂反，咀嚼。王三：咀，慈呂反，嚼。王二：咀，茲呂反，咀嚼。案與窺基所引“慈呂反”相合而“情呂反”未見，疑有誤。釋義“噬”疑為“嚼”之形譌。

(2)繒纊：《三蒼》雜帛，坐以餞客，如失耨華氈，故名茵蓐。有作鞇，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為之，有文彩，因下與相連著。《切韻》：鞇，虎皮也。以鞇為蓐。有作裀，《切韻》：衣身。三蒼：蓐，薦也。《切韻》：草蓐也。有作褥，氈褥也。

《廣韻》真韻影母：茵，茵褥。鞇，上同。箋註本王三真韻影母：茵，於鄰反，褥茵（箋註本作“褥”）。案釋文不作窺基“虎皮也。以鞇為蓐。”。王三：裀，於鄰反，衣身。案與窺基所引釋義同。又燭韻日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三唐韻：蓐，而蜀反，草蓐。案與窺基所引音義合。王二“草蓐”作“草名”，疑有誤。又同小韻箋註本王一王二切三唐韻：褥，氈褥。與窺基義合。王三：褥，氈類。不合窺基所引。

(3)梨黮：上力脂反。《切韻》：梨班駁色。有作黧。《切韻》：黔，黮色。又脫感反，桑葚之色。

脂韻來母箋註本未收。王二王三：黧，力脂反，黑。案與窺基所引反切合，王二王三無釋義“梨班駁色”。切二切三不收“黧”字。感韻定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黮，徒感反，黭黮，雲；又他感反。但感韻透母“他感反”小韻不收“黮”字並釋義“桑葚之色”。窺基所引《切韻》“黔，黮色”，查《切韻》不收“黔”字。

(4)註記：上竹句反，下之喻反。《切韻》作注，陟住、之戍二反。

遇韻知母王一王三：註，中句反，解。王二：注，陟句反，又之戍反。註，解。遇韻章母王三：注，之戍反，記。王一：注，之戍反，水注，又丁住反，注記。王二：注，之戍反，水注，又陟句反。唐韻遇韻：注，之戍反，又丁住反，註記也。註，口射，出埤蒼，又音口。註：解，口句反，音注。案窺基所引“注”字音切接近王二“陟句反，又之戍反”，唯反切下字有“句、住”之不同。亦與章母王一唐韻“之戍反，丁住反”接近，“丁陟”端知二母類隔，或反映中古早期聲母特徵。本條反切“之戍反”與窺基所引合，“陟句反”不合。

(5)魁膾：上《切韻》：苦回反，師也，首也。

灰韻溪母箋註本王一王三：魁，苦回反，師，一曰北斗星。案反切“苦回反”與釋義“師”合乎窺基所引，《切韻》存本無釋義“首也”。

音義均不同的有:

(1)犛：夘交反，《切韻》作犛，其毛作氂[14]，犛牛也。

肴韻明母箋註本：氂，莫交反，氂牛名，又力口反。豪韻明母箋註本：氂，莫袍反，氂牛，又莫交反。王三：犛，莫交反，牛名，又力支反。又切三王二王三豪韻明母小韻：氂，莫袍反，氂牛，又莫交反。《廣韻》豪韻“氂，犛牛尾也。”案與窺基所引反切不合，所言“其毛”疑為“其從毛”之訛。

(2)貤：《切韻》以角能入水行，虓音斯。

窺基所引“以角能入水行，虓音斯。”查《說文》虎部，“虓：委虓，虎之有角者也。”支韻心母箋註本未收“虓”字。王二王三：虓，息移反，似虎，有角，能入水行。案窺基所引疑有脫字，音切亦不同。

(3)屏處：上俾領反。《切韻》若隱僻，作偋，卑政反。

青韻並母箋註本王一王三：屏，薄經反，屏風，又音必郢反。靜韻幫母箋註本：屏，必郢反，又薄經反。無釋義。王三：屏，必郢反，蔽，亦作帡屏。案不作窺基所引“若隱僻，作偋，卑政反”之音義。

三、慧苑音義中的《切韻》引用

慧琳音義景審《一切經音義序》言：“次有沙門慧苑，撰《新譯花嚴音義》二卷，並編於《開元釋教錄》”，編撰年代遠遠早於慧琳音義。慧苑，京兆人，華嚴藏法師法藏上首門人，唐玄宗開元 20 年（732）前後撰成《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慧琳音義卷第二十一卷首言“大唐沙門慧苑撰”，題《音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將原二卷分為上中下三卷，全三卷引《切韻》十四條。又慧苑音義另存單行本，據查其中引用《切韻》較慧琳納入本多四條（瑩、跂、聳、櫓），均出現在卷首。可見慧琳“詳定”慧苑音義時曾試圖刪除其中引用《切韻》文字，但僅刪四條就中止了，後續部分仍存原本之舊。慧苑的《切韻》引用分析如下。

慧苑引用中最多為釋義，釋義相同的用例有：

(1)光瑩：《切韻》稱：瑩，飾也。

庚韻云母箋註本：瑩，玉色，《詩》云“琇耳秀瑩”，又烏定反。徑韻影母：鎣，烏定反，鎣飾。切三王二王三：瑩，永兵反，玉色，又烏定反。徑韻影母烏定反小韻王一：鎣,鎣飾，或作瑩，瑩玉光，非鎣飾字。王二：鎣,鎣飾，亦瑩。王三：鎣,玉光。

[14] 原本作“犛”，依徐時儀 2010 作“氂”。

唐韻徑韻影母：鎣，烏定反，飾，又作瑩。案“鎣瑩異體”均可釋“飾也”，慧苑間接引用《切韻》諸本。

(2)爭聳擢：息勇反，《切韻》聳，高也。

腫韻心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二：聳，息拱反，高（王三作“高聳”）。案與慧苑所引合。

(3)樓櫓卻敵皆悉崇麗：櫓，郎古反，《切韻》：城上守禦曰櫓也。

姥韻來母箋註本切三王二王三：櫓，郎古反，城上守禦。案與慧苑所引音義合。

(4)妓樂：妓，渠倚反，《切韻》：妓，女樂也。

紙韻群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二王三釋作“女樂”。王二：渠倚反，箋註本切三王三：渠綺反。案與慧苑所引釋義合。

(5)偉哉：偉，于鬼反，《切韻》：偉，大也。

尾韻云母箋註本王一王二：偉，韋鬼反，大（王三作“大偉”）。案與慧苑所引釋義合。

(6)袨服莊嚴：袨，胡練反，《切韻》稱：好衣曰袨。

霰韻匣母王一王三唐韻：袨，黃練反（王二作“玄絢反”），好衣。案與慧苑所引釋義合。

(7)憧惶：憧，諸羊切，《切韻》：憧，懼也。

陽韻章母箋註本切三王二：憧，諸良反，懼。案與慧苑所引釋義合。

(8)犗牛：犗，加邁反，《切韻》：犗，犍牛也。

夬韻見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唐韻：犗，古邁反（唐韻殘缺反切），犍牛。案與慧苑所引釋義合。

音義皆合的有：

(1)渾濁：渾，戶昆反，《切韻》：渾，濁也。

魂韻匣母箋註本王三：渾，戶昆反，濁。又胡本反。案與慧苑所引音義合。

(2)紹隆：紹，市沼反，《切韻》：紹，繼也。

小韻禪母箋註本王一王三：紹，市沼反，繼也。案與慧苑所引音義合。

(3)永訣：訣，古穴反，《切韻》稱：訣，別也。

屑韻見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二王三唐韻：訣，古穴反，別。案與慧苑所引音義合。

(4) 嬉戲：嬉，許其反，《切韻》稱：嬉，遊也。

(5) 簸弈嬉戲：嬉，許其反，《切韻》稱：嬉，遊也。

之韻曉母箋註本王一王三：嬉，許其反，美，一曰遊。案與慧苑所引音義合。

音切相合的有：

(1)樹歧：歧，矩羈反，兩股間也。枝，《字書》作岐，謂枝橫首也。今經本有從山邊作支，及《切韻》音之為歧，並誤。

支韻群母箋註本切二王二王三:岐，巨支反，山名，又渠羈反；歧，巨支反，歧路。切韻各本皆合慧苑所言“歧岐同音”。王三更在“歧”後附言：合從山，從止非。以為“歧路”之字當作“岐山”之“岐”，尤與慧苑相左。案《切韻》“歧岐”音群母而慧苑“歧”音見母，“岐”音群母；慧苑音義清濁聲母變異或反映盛唐時代（712-765）全濁清化的聲母演變進程。

音同異義的有：

(1)藤羅所罥：藤，但登反；罥，古泫反。《切韻》稱：卦也，藤性緣物自織成羅也。

登韻定母箋註本王一：藤，徒登反，藤弦，又草名。王三：藤，徒登反，藤弦，草名。銑韻見母王三：罥，古泫反，挂罥。箋註本切三：罥，古泫反，挂。《廣韻》：罥，姑泫切，挂也。案慧苑所引“卦”當為“掛”或“挂”字之誤。

釋義同異互見的有：

(1)深入法旋澓：旋，徐攣反，《切韻》旋，洄也。《三蒼》曰：澓，深也；謂深水下有深穴，則令水有洄澓也。經本旋字從方者音徐緣反，《切韻》還也。

仙韻邪母箋註本：旋，似宣反，還。淀，回淵，又辝選反。王一王三：旋，似宣反，還。淀，似宣反，回流。切三：旋，還，似宣反。淀，回淀，似宣反，又辭選反。案慧苑所引釋義“還”與《切韻》一致，釋義“洄”不見“旋”字下，頗疑慧苑所引釋義取自《切韻》“淀，回流”。慧苑“徐攣、徐緣”與《切韻》同音異切。

釋義相異的有：

(1)樓閣延袤：袤，莫搆反，《切韻》稱：袤，廣也。

候韻明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袤，莫候反，廣袤。《唐韻》袤：廣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袤。案釋義“廣袤”與慧苑所引“廣”相異，“廣袤”異義，“袤”無“廣”義，疑慧苑所引有誤。

慧苑引用《切韻》以旁證釋義為主體（10 例），其次纔是音義同引（5 例），旁證反切的最少（2 例）。慧苑的引用準確率甚高，差互很少（2 例），採信度甚高。

四、雲公音義中的《切韻》引用

慧琳音義卷第二十五卷首題：開元二十一年壬申歲終南太一山智炬寺集　釋雲公撰　翻經沙門慧琳再刪補。開元二十一年(733)為慧苑撰成《新華嚴音義》之翌年，早於慧琳音義撰成七十四年。雲公自序言：“遂觀《說文》以定字，檢《韻集》以求

音，訓詁多據《玉篇》，傳梵先資金簡，糅為音義兩卷。”參考辭書中並未提及《切韻》，檢索正文有三處引用，均屬釋義用例。

釋義相同的有兩條：

(1)熏修：上許君反，《切韻》：火氣也。

文韻曉母箋註本切三王三：熏，許云反，火氣。案與雲公所引釋義合。

(2)作倡妓樂：妓，渠倚反，《切韻》：女樂也。

紙韻群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二王三釋作“女樂”。王二：渠倚反，箋註本切三王三：渠綺反。案《切韻》諸本與雲公所引釋義合。

釋義不同的一條為：

(1)天諸嫾女：嫾，以招反，《切韻》：長好貌也。

宵韻以母箋註本切三：嫾，餘招反，美好。王三：嫾，余招反，美好。《廣韻》：餘昭切，美好。雲公所引釋義“長好貌”與《切韻》諸本作“美好”不合。

雲公作音義，根據序文，在字形字音字義上主要遵從《說文》《韻集》《玉篇》，作品中引用《切韻》僅限於釋義，其功能與《玉篇》相近似，並不把《切韻》當作韻書，視為取音之模範。這一點，在唐代似具有普遍性，《切韻》之韻書地位的急劇上升，是後來的事情。

五、慧琳自身所作音義中的《切韻》引用

上述三家音義之外，慧琳自身編寫的音義部分引用《切韻》十次，引用“陸法言”兩次,引用“唐韻”六次，共十八次。另引用張戩《考聲切韻》十一條，恕不贅述。引用《切韻》《唐韻》的用例分析如下。

5.1 引用《切韻》例

字形相同的有：

(1)鹹酢：上洽緘反，下麁素反。今俗用却為酬酢字，藏各反。經文從昔作醋，俗傳用為酸酢之字也。酢音昨。《說文》《玉篇》《字統》皆音酢，倉固反。醋音酢，《切韻》及時俗用即反上音。

(2)鹹醋：下倉固反，此字非正且依經義音之，俗用醬醋字也。近代切韻諸家字書並同上音。若依《說文》《玉篇》《古今正字》《文字典說》《廣雅》《切韻》《字統》《字林》七本字書，醬醋字並從乍作酢，音倉固反。

暮韻清母王一：醋，倉故反，醬，又作酢。王三：醋，倉故反，醬醋，亦作酢。

唐韻：醋，倉故反，醬醋，《說文》作酢。以上各文本醋酢同音，與慧琳所引字形合。
(3)偠掠：下力尚反，又音略。《字書》云：拷擊也,《考聲》云：強取也。《蒼頡篇》搒也,笞也，或從刀作剋。訓釋並同上，准經義。時俗並音略，《切韻》略字韻中無此字。

藥韻來母王三：掠，離灼反，抄掠，又力尚反。與慧琳所引“下力尚反，又音略”合。唐韻：略，離灼反，簡略，謀略，又姓，出《何氏姓苑》，云今零陵人。擽，離灼反，從手，《字統》云擊也。作掠，劫人財，又音亮。案箋註本王二同小韻未收“掠”字，如實反映慧琳“《切韻》略字韻中無此字”之情形。
(4)麵麩：上音浮，下偷口反，俗字也。諸字書本無此字，顏之推《證俗音》從食作餢飳。《字鏡》與《考聲》、祝氏《切韻》等並從麥作麵；麩，音與上同。

案厚韻並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麵，蒲口反，麵麩，餅（王一“麵麩”）。又厚韻透母箋註本：麩，他后反，麵麩，今作此餢飳。王一王二王三：麩，他口反，麵麩（王二作“麵麩，今作餢飳，通。”）。王韻諸本反映窺基所言“祝氏《切韻》”收字情形。祝尚丘增字本《切韻》其成書時代在唐代鳳儀二年（677）長孫訥言箋註本之後，天寶十年（751）孫愐《唐韻》之前。日本僧人禪覺《三僧及記》“如《東宮切韻》十三家”中言祝尚丘《切韻》五卷撰年為“天寶五載（749）”[15]，早於慧琳音義成書的貞元二十年（804）五十多年。
(5)燈炷：下音注，即今之燈心也。西國多撚白氎縷為燈炷。案炷者引油麩火為明者曰燈炷。本無此字，譯經者以意書出，唯《集訓》《切韻》《新集》入韻。

麌韻章母箋註本王一王三未收“炷”字。王二唐韻[16]：炷，之庾反，燈炷。案收字與慧琳所引合。
(6)經笏：下彼列反。案笏，分別之謂也。《埤蒼》云：笏謂種穊，分移蒔之也。《字書》無此字，《考聲》或從竹。《廣切韻》從草從別。

薛韻幫母箋註本：笏，憑列反，分笏，或詖，方列反。王二：笏，變別反，分笏，亦詖。王三：笏，兵列反，或作詖。唐韻：笏，方列反，或作詖。蒻，方列反，種穊移蒔之，出《埤蒼》。慧琳引文“《埤蒼》云：蒻謂種穊分移蒔之也”，字形釋義與《唐韻》合。《廣切韻》書名，佛經音義唯見此一例，殆為《切韻》增補本之一種，實情待考。

字音相同的有：
(1)苜蓿：上音目，下音宿，草名也。陸氏《切韻》等音莫六反，今不取也。

[15] 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第 483-484 頁。
[16] 此條參照徐朝東（2012）第 239 頁。

屋韻明母箋註本王二王三唐韻：莫六反，苜蓿（王三唐韻作“苜蓿菜”）。王一不收“苜”字。案與慧琳所引音切合。

(2)浮囊：上附無反。《玉篇》音扶尤反，陸法言音薄謀反；下二皆吳楚之音也，今並不取。

尤韻奉母箋註本王一王三切三：浮，薄謀反，虛（箋註本無釋文）。王二：浮，父謀反，泛也。諸文本與慧琳所引“陸法言音薄謀反”合。

字形相異的有：

(1)齗腭：上牛斤反，《說文》齒肉也。下腭字，《玉篇》《說文》等諸字書並無此字，俗用音我各反。近代諸家《切韻》隨俗。案腭者口中上腭也。

鐸韻疑母箋註本未收。王二：齷，五各反，齷齷。王三未收。《唐韻》《廣韻》鐸韻疑母：喔，五各反，口中齗喔。《廣韻》又：齷，同上。案諸韻書收“齷喔”二形而不收“腭”，與慧琳所引作“腭”有異。

釋義相異的有：

(1)直濈：《字書》音節。濈，灑也。《切韻》云：濺也。

屑韻精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二王三《唐韻》《廣韻》：濈,子結反，小（王二王三“小”誤作“山”）灑。案慧琳所引釋義“濺”疑為“灑”之誤。

字音相異的有：

(1)檛打：上茁瓜反。《考聲》：檛，擊也，馬策也。下德耿反。《廣雅》：打，亦擊。《埤蒼》：棓也。陸法言云都挺反。吳音，今不取也。

梗韻端母箋註本切三王三：打，德冷反，又都定[17]反，擊（箋註本無釋義）。又迥韻端母王三：打，丁挺反，擊。箋註本無此小韻。案慧琳所引“陸法言云都挺反”與《切韻》迥韻“丁挺反”異切。

5.2 引用《唐韻》例

釋義相同的有：

(1)縹等：上疋曉反。《說文》云縹者，帛作青黃色也。《唐韻》亦云縹青黃色也。

小韻滂母箋註本切三王一王三：縹，敷（箋註本切三脫“敷”字）沼反，青黃色（王三“黃”誤作“白”）。與慧琳所引釋義合。

(2)採摘：下張革反。《考聲》：拓取也。《唐韻》：手取也。

麥韻知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唐韻：摘，陟革反，手取。與慧琳所引釋義合。

多音切釋義中同異互見的有：

[17] 王三“定”誤作“行”。

(1)荏苒：上而枕反，下而琰反。孫愐《唐韻》：荏苒猶展轉也。

寢韻日母箋註本王一王三：荏，如甚反，菜。琰韻日母箋註本王一王二王三：苒，而琰反，草盛，又荏苒（箋註本王二無“又”字，王三作“草盛皃”，箋註本王三無“又荏苒”三字）。箋註本王韻“而琰反”反切與慧琳所引合，與慧琳所引釋義“荏苒猶展轉也”不合。

釋義不同的有：

(1)甘蝀：下怛太反。《考聲》：蝀，蛇也。《唐韻》亦蛇也。

霽韻端母箋註本殘缺。王一王二王三唐韻：蝀，都（唐韻“都”誤作“許”）計反，蝀蜳，亦作〔虫互〕（唐韻王二釋義作“虹別名”）。與慧琳所引釋義不合，疑“蛇”為“虹”之誤，《王韻》《唐韻》“〔虫互〕字”疑為“虹”之訛。

(2)白鷴皛，黠鴃反。《考聲》：白鷴，鳥名也，似雉白色，有細墨黑文頰，赤頂，有青毛如絲，腹下烏。孫愐《唐韻》云尾長五六尺也。

山韻匣母箋註本切三王三：鷴，胡山反，白閒鳥鷴（箋註本作“白鷴鳥”，切三作“白鳥”）。《廣韻》“鷴，戶閒切，白鷴似雉而尾長四五尺。”與慧琳所引釋義異。

以上五條六字慧琳引自《唐韻》卻因《唐韻》傳本殘闕太多，唯去聲入聲的“蝀摘”二字得以引證，平聲上聲“鷴縹荏苒”四字釋義尚無法確證。

慧琳引用《切韻》《唐韻》偏重釋義（7 字）和釋字（6 字），較少釋音（4 字）。釋音用例中或言“皆吳楚之音也，今並不取也”、“吳音，今不取也”，對《切韻》《玉篇》的音切頗顯排斥態度，對《切韻》字形亦見“時俗用、俗用”等表述，而且如前所述，在合編慧苑音義時有刪除《切韻》引用例之作為，可見對《切韻》的認可度是很有限的。同時，歷史上慧琳首開在佛經音義中引用《唐韻》之風氣[18]，孫愐《唐韻》成書於天寶十年（751），比慧琳“建中（780-783）末年創製”《一切經音義》早三十年。自中可窺見《唐韻》在眾多《切韻》文本中脫穎而出聲名鵲起之一端。

六、结语

（1）四家音義引用《切韻》比率

慧琳音義中四家引用《切韻》的條目分佈如表一。

[18] 其後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均有引《唐韻》之實績。

表一：四家音義條目總數與引用《切韻》次數比率比較表

音義	條目總數	引用次數	引用比率
窺基音義	600	86	14.33
慧苑音義	1250	18	0.144
雲公音義	1100	3	0.033
慧琳音義	27000[19]	17	0.006
合計	約 30000	124	0.413

表格中以窺基音義的引用次數和比率為最高，反映窺基極為重視《切韻》的引用價值。其次是慧苑和雲公，慧琳最低，引用比率才萬分之五。前文提及慧琳為長安人，對《切韻》的所謂“吳音、吳楚音”難以接受，事出有因。但窺基出生於長安望族尉遲家，十七歲出家後精進佛門，跟隨玄奘法師譯經注經，畢生活躍於京兆，也是十足的“皇城根人”。可見對《切韻》之認識非以長安出身為轉移，窺基與慧琳在對待《切韻》上可謂兩個極端，發人深醒。無獨有偶，《宋高僧傳》亦記載慧苑為“京兆人”，所編《新譯華嚴音義》雖不特別偏重《切韻》，但並不刻意迴避，其不偏不倚的立場值得評價。

（2）四家音義引用《切韻》傾向

文獻引用是有目的之行為。對於佛經音義的引用來說，有對字詞的形音義引證說明，以下列出所有單項統計數，各條複數項作累加處理。

表二：四家音義引用條目中形音義引證次數及其與《切韻》一致度比較表

音義	字形	反切	釋義	合計
窺基音義	15（13/2）	67（55/12）	94（67/27）	176（135/41）
慧苑音義	0	7（7/0）	17（14/3）	24（21/3）
雲公音義	0	0	3（2/1）	3（2/1）
慧琳音義	8（7/1）	5（3/2）	3（2/1）	16（12/4）
合計	23（20/3）	79（65/14）	117（85/32）	218（170/48）

表格中可見窺基音義引用《切韻》作釋義說明為首要選擇，其次為反切，最後為

[19] 該數字為總數減去其他三種音義詞條數的結果。蒙慧琳音義研究著名學者徐時儀教授賜教，謹致謝意。

字形。四種音義的總傾向亦如此。慧苑與雲公以釋義說明為主旨，慧苑亦涉及反切。慧苑與雲公都不引用《切韻》說明字形，但慧琳自身所作音義則重視引證字形，這大概與慧琳重視自作反切，不重視《切韻》反切而凸顯字形引證有關。另一方面，慧琳即使引用《切韻》反切亦不重在採納，如前文所言是用來作批評的。四家中，窺基對《切韻》的重視是“音義並重”的，把《切韻》既當作韻書也當作字書來充分發揮作用，這是慧琳甚至慧苑，都是望塵莫及的。

上表的括號內為引證總數中與現存主體《切韻》傳本表述一致與否的數量統計。總體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的誤差。最突出的是慧琳音義引用中形音義均有誤差，而以反切尤多。這固然與引用風格有關係（引用態度等），但與《切韻》文本的相關性也是不能忽視的方面。窺基音義的誤差集中在釋義與反切兩項，反而字形上誤差較少。這或與現存佛經音義文本與《切韻》殘本都有影印本或較完美的字形支持相關。釋義與反切的引證為何與傳世本有較大距離，尚值得繼續深入探究。

（3）三種《切韻》傳本的引證相關屬性

現存的《切韻》殘卷總量甚豐，主流的只有經過“拼湊”的長孫訥言箋註本、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和孫愐《唐韻》去入兩卷殘本。其中王仁昫本有全本倖存，彌足珍視。以下為上述三種《切韻》的引證相關數據。

表三：三種《切韻》傳本形音義相同引證項數據表

音義	形音義相同引文數	箋註本（677）（形/音/義）	王仁昫本（706）（形/音/義）	唐韻（751）（形/音/義）
窺基音義(682)	13/55/67	8/35/31	9/30/44	2/8/13
慧苑音義(732)	0/7/14	0/7/14	0/7/14	0/1/4
雲公音義(733)	0/0/2	0/0/2	0/0/2	0/0/0
慧琳音義(807)	7/3/2	4/3/2	5/3/2	1/1/2
合計	20/65/85	12/45/49	14/40/62	3/10/19

表格中慧苑、雲公兩家引用數量少，但箋註本與王仁昫本均有完美一致的分佈，足見編者使用的箋註本王仁昫本之文本規範性。兩種文本在慧苑、雲公的時代已經問世半個世紀前後，哪怕只使用其中一種，相信都能獲得如此好的統計結果。

慧琳音義完成最晚，在字形的引證方面箋註本與王仁昫本呈現相互補完的狀況，

可以窺測到九世紀初，箋註本與王仁昫本的文本差別已經增大，而慧琳的引用亦有多文本性。慧琳音義是四家中與《唐韻》接點最多的一家，不僅因為慧琳關注《唐韻》，更大的理由應該是《唐韻》作為“後起之秀”，“存在感”已非箋註本王仁昫本可以“望其項背”有關。只可惜《唐韻》現存不足兩卷，可用於證明之數據微乎其微。

最後說到窺基音義，其引用重點看上去在箋註本和王仁昫本兩種之間，但當時王仁昫本尚未問世，和《唐韻》欄顯示的數據一樣，只是虛擬性對比，顯示《唐韻》中猶存《切韻》文本之舊文而談不上有真正的歷史認識價值。現存的長孫訥言箋註本殘本殘片數量不菲，但仍不能拼合成一部完整的韻書。基於箋註本引證項數據（字形 8/字音 35/字義 31）實現對窺基引用全部數據（字形 13/字音 55/字義 67）中尚未確證部分（字形 5/字音 20/字義 35）的考察研究，是最終完成窺基音義所引《切韻》文本歷史探究的關鍵點，乃是本課題的後續任務。（完）

附记：小文顯為恭賀學長岩田禮教授榮譽退休而作。學長學富五車，精於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方言地理學等眾多學術領域，著述甚豐。小弟蒙學兄近三十年如一日關懷指教，感銘至深。本文嘗試以《切韻》存世資料探討與唐代佛經音義之機緣關連，篳路藍縷，力不從心，維念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執此拜教學長，謹表慶賀愫懷。

参考文献

丁治民 2015《〈永樂大典〉小學書輯佚與研究》商務印書館
范祥雍點校 1987《宋高僧傳》（上下，宋：贊寧撰）中華書局
黃仁瑄 2021《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校注》中華書局
蔣一安 1973《蔣本唐韻刊謬補缺》廣文書局
劉復等 1973《十韻彙編》台灣學生書局重印 1935 年版
李瑄根編著發行 1976《高麗大蔵経》所收慧琳《一切經音義》東國大學校譯經院
龍宇純 1968《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香港中文大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正續一切經音義附索引兩種》（獅谷白蓮社據《高麗藏》重刻慧琳《一切經音義》本之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孫猛 2015《〈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考證篇・小學家）》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朝東 2012《蔣藏本〈唐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徐朝東點校 2021《〈切韻〉匯校》（全三冊）中華書局
徐時儀校註 2008《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遠藤光暁 2001《中国音韻学論集》白帝社
張金泉、徐建平 1996《敦煌音義匯考》杭州大學出版社
張湧泉主編審訂 2008《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5・6 兩冊（關長龍撰）中華書局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 1993《中華大藏經》（第 58・59 冊所收慧琳音義）中華書局
周祖謨 1994《唐五代韻書集成》台灣學生書局
佐伯良謙 1925《慈恩大師傳》京都市內外出版株式會社印刷部

[English title] A Study on the Reference Material about *Qieyun* from Huilin's *Yiqiejingyinyi*

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ける Sanskrit の/v/の音訳について

橋本　貴子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要旨： 6 世紀末以降のインド東部では/v/と/b/が同一の字形で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変化にはインド東部の方言に生じた発音の変化が関係している。7 世紀後半にインド東部で 10 年間留学し、帰国後 7 世紀末から 8 世紀初頭にかけて訳経を行った義浄の音訳漢字では Sanskrit の/v/が漢語の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傾向が強い。この音訳傾向は義浄が滞在したインド東部の方言的特徴を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

1. はじめに

唐代以降の梵漢対音を扱った漢語音韻史研究では、一般に Sanskrit（以下 Skt）の現存テキストと音訳漢字との対照作業によって音類上の対応関係を確定させた上で、音訳時に依拠した漢語音の音価を推定する、という方法が採られている。但し各音類の具体的な音価を推定する際、場合によっては、漢語音韻史側の議論に加えてインド側の何らかの現象が関与している可能性を考慮する必要がある。

従来、梵漢対音を扱った研究によって、初唐期に軽唇音声母の唇歯音化が起きていた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きた。その主な根拠は、(1) Skt の両唇音/p/ /ph/ /b/ /bh/ /m/が初唐期の梵漢対音では専ら漢語の重唇音字で音訳され、軽唇音字で音訳されないこと、(2) Skt の/v/に対して唐代以前は並母字による音訳が見られたのに対し、初唐期の梵漢対音では従来の並母字に加えて奉母字によっても音訳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にある。

(1)の点から初唐期には重唇音と軽唇音との区別があったと推察される。橋本 2021 では、初唐期の梵漢対音だけでなく初唐末期の成立と目されるマニ教の音訳讃歌においても重唇音字と軽唇音字の使い分けが見られることを指摘した上で、初唐末期までには軽唇音声母の唇歯音化がかなりの程度進行していた可能性が高いとの考えを示した。

(2)の点も奉母の唇歯音化を示している。だが初唐期以降も一部の梵漢対音では、依然としてSktの/v/を並母字で音訳する傾向が見られる。この点は当時進行していたはずの軽唇音声母の唇歯音化と矛盾するかのように見えるため、何らかの説明を行う必要がある。

2. /v/の音価及び/v/を表す字形の歴史的・地理的状況

2.1 インドにおける/v/と/b/

Sktの/v/は本来、両唇接近音（半母音）[w]であったが、紀元前5世紀頃までに幾つかの方言においては唇歯接近音[ʋ]、唇歯摩擦音[v]になっ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ており、古代インドでは他に両唇有声摩擦音[β]のような発音もあった（Allen 1953 : 57 ; Chatterji 1960 : 75-76）。現代インドにおいて/v/は[ʋ]や[β]と発音されるが、同じ音節内で何らかの子音に後続する場合は[w]のように発音される（Whitney 1896 : §57 ; Chatterji 1960 : 76）。但しWestern and Eastern Uttar Pradesh、Bihar、Bengal、Assam、Orissaなどのガンジス河中流域からインド東部に及ぶ地域では、Sktの/v/を語頭では両唇有声閉鎖音[b]で発音し、語中や語末の/v/もしばしば同様に発音するという（Chatterji 1960 : 76）。この現象はこれら地域の方言の影響を受けたものと思われる。Masica 1993 : 459のFigure II.10によれば、インド北西部、西部、南部に分布するKashmiri、Lahnda、Punjabi、Sindhi、Rajasthani、Gujarati、Marathi、Sinhaleseでは/v/と/b/の区別が保存されているのに対し、ガンジス河中流域およびインド東部に分布するWestern Pahari、Central Pahari、Nepali、Western Hindi、Eastern Hindi、Bihari、Assamese、Bengali、Oriyaでは失われている。

ガンジス河中流域およびインド東部における/v/の発音の変化は、/v/と/b/を表す字形の変遷に現れている。Dani 1963によると、6世紀末のガンジス河中流域およびBengalでは/v/と/b/の字形に混乱が生じて、/b/を表す字形が消失し、/v/を表す字形で/v/と/b/の両方を表すようになった[1]。そして、この現象は周辺地域にも拡がりを見せている[2]（Dani 1963 : 128、130、154、164 ; Dani 1963 : Pl. Xb、XIb、XIVb）。

---

[1] Bühler 1904 : 74はこの現象が碑文では7世紀以降に見られるのに対し、写本ではそれ以前に起きていたと述べる。だがその根拠は「法隆寺貝葉」の字形にあるため、Bühler 1904の考えには問題がある。「法隆寺貝葉」については本稿脚注12で後述する。

[2] ギルギット写本に見られる7世紀～10世紀頃のGilgit/Bamiyan type II（シッダマートリカー系統の書体。Proto-Śāradāとも言う）および9世紀以降のシャーラダー体（Śāradā）でも/b/を表す字形がなく、/v/を表す字形のみが見える（Sander 1968 : TAFEL 21-26）。ちな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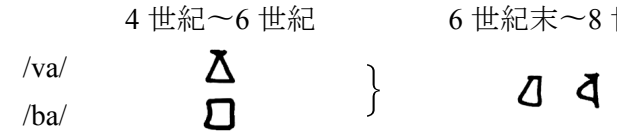


図 1：ガンジス河中流域および Bengal における/va/と/ba/を表す字の変遷[3]

しかし中央インド、Rajasthan、ネパール[4]では 7 世紀以降も依然として/v/（横画の下に三角形または半月形を有する字形）と/b/（四角形）の区別を保存していた（Dani 1963：Pl. XIb、XIIIb）。

2.2 悉曇写本における/v/と/b/

唐代にインドから直接中国にもたらされた梵本は、中国ではほぼ失われてしまったが、留学僧が持ち帰ったと思われる極めて貴重な貝葉写本が日本に数点保存されている[5]。それらはいずれも 6 世紀から 10 世紀頃まで北インド全域で使用されていたシッダマートリカー文字（Siddhamātṛkā）で書かれている。また中国や日本で書写された梵本も日本には数多く伝わっており、それらはシッダマートリカー文字の東アジア的変種である悉曇文字[6]で書かれている。以上の状況から、唐代の訳経に

に原民族宮蔵写本（11 世紀頃）のシャーラダー体では/v/と/b/が区別されている（葉少勇 2005：44）。また Melzer 2014 は早期シャーラダー体（early Śāradā）で書かれたラサの写本において/v/と/b/が区別され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Gilgit/Bamiyan type II とは対照的であるとして注目している（Melzer 2014：264-268）。

[3] Dani 1963：Pl. Xb、XIb を参考に本稿筆者が作成したもの。

[4] ネパールの後グプタ体（Post-Gupta）の写本では/b/は四角形で/v/の字形とは区別されており、また 8 世紀のネパールの碑文でもなお/v/と/b/の区別が見られる（葉少勇 2005：21；Ye 2008：162）。/v/は上部に横画を冠する三角形であったが、7 世紀前半に半月形を有する字形が現れ、7 世紀後半には半月形の字形が三角形の字形に取って替わった（葉少勇 2005：21-22；Ye 2008：163）。

[5]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会 1980：3-9 に高貴寺、四天王寺、知恩寺、海竜王寺、清涼寺、東寺の貝葉写本の図版が収録されている。松田和信氏はこれら写本と玉泉寺の貝葉写本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ている（松田 1982、松田 1989、松田 2021）。従来これらの貝葉写本は『阿毘達磨倶舎論』の断簡と考えられていたが、松田氏の研究によって高貴寺、四天王寺、知恩寺、玉泉寺の写本が実際には『世間施設論』の断簡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なお海竜王寺、清涼寺、東寺の写本については未同定とのこと。

[6] 研究者によってはシッダマートリカー系統の書体全般を指して「悉曇文字」と言うことがある。しかし本稿で言う「悉曇文字」は日本や中国等の東アジア地域で書写されたもののみを指す。悉曇文字で書かれた写本は筆記具（中国式の毛筆、墨、紙）、書字方向（しばしば縦書きされる）の点でインドの写本とは様相が異なる。更に一部の字形にはインドの字形との違いが見られる（橋本 2018）。よって本稿ではインドのシッダマートリカー文字と悉曇文字とを区別し、後者を前者の東アジア的変種として扱う。

用いられた梵本の多くはシッダマートリカー文字で書かれていたと考えてよいだろう[7]。

悉曇文字はシッダマートリカー文字に由来し、日本で長らく伝習されてきた。悉曇文字の/v/と/b/の字形は酷似しているが、半月形の書き方のわずかな違いによって区別されている。/va/では半月形が左方向に張り出すように書かれた後、右下方向にまわして後に書く縦画に納められる。/ba/では半月形が左下方向にやや垂れ気味に書かれた後、終筆が右上がりにまわして押し上げられる[8]。

/va/　　/ba/

図 2：悉曇文字における/va/と/ba/の書き方の違い

平安後期の写本である東京大学国語学研究室所蔵『仏母大孔雀明王経』[9]の悉曇文字で書かれた陀羅尼でも、一部に混乱が見られるものの、基本的には上に述べた半月形の書き方の違いによって/v/と/b/が区別されている。実際の字形についてはHashimoto 2015：265-266 を参照されたい。

しかしながら、/v/と/b/の区別がない（或いは区別が明瞭でない）悉曇写本も存在する。9 世紀頃の書写で唐写本と推定されている東洋文庫蔵『梵語千字文』[10]の悉

[7] 場合によってはシッダマートリカー文字以外の文字で書かれた梵本が訳経に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と思われる。武后期には提雲般若や実叉難陀などコータン出身の僧侶がコータンから梵本をもたらし、更に訳経も行っている（段晴 2013：46；同書：169-184）。彼らが中国にもたらした写本の中には恐らくコータンのブラーフミー文字で書かれたものが含まれていたであろう。

[8] 『悉曇字記』（T54, No. 2132）では、/va/について「一云字下尖（一説には字の下部が尖っていると言う）」（T54 : 1188b8）、また/ba/については「下不尖（下部が尖っていない）」（T54 : 1188b1）と説明されている。この『悉曇字記』は、唐代に漢人僧の智広が南天竺出身の般若菩提というインド僧のもとに行って教わった悉曇文字とその発音について記したもので、日本悉曇学において長らく重要視されてきた。

[9] 東京大学国語研究室 1986：1-208 所収。『仏母大孔雀明王経』は不空（Amoghavajra。705〜774）の訳。

[10] 東洋文庫・石塚・小助川 2014 : 1-47 に影印が収録されている。装丁様式と料紙の材料から唐写本と目されている（東洋文庫・石塚・小助川 2014：77-79；石塚 2015：334-337）。なお『梵語千字文』は義浄撰と伝えられている。この写本で/v/と/b/が区別されていないこ

曇文字では/v/と/b/がどちらも図 2 の/va/のように半月形が左側に張り出た字形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の写本の悉曇文字の表記は後世の『梵語千字文』テキストと比べてはるかに正確であることから[11]、誤写や誤解によって/v/と/b/が同じ字形で書かれたとは考えにくい。また東京国立博物館所蔵『梵本心経並びに尊勝陀羅尼』(所謂「法隆寺貝葉」）[12]でも/v/と/b/の区別が無く、どちらも/v/を表す字形で書かれている（Dani 1963：154；同書：Pl. XIIb. 12)。これら資料における/v/と/b/の表記が、上述した 7 世紀以降のインドでの表記をそのまま受け継いでいる可能性は十分にある。

3. 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ける/v/の音訳状況

玄奘（602〜664）の梵漢対音では Skt の/v/が並母字と奉母字とで音訳される。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のは多くが/v/に前舌母音が後続する場合で、奉母字で音訳されるのは/v/に後舌母音が後続する場合である[13]（施向東 1983：31；施向東 2009：23)。7 世紀末の菩提流志訳『不空羂索呪心経』に至っては「部」vo の 1 例を除き/v/が悉く奉母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李建強 2017a：18；李建強 2017b：95)。これら奉母字による音訳は唇歯音化していたことの反映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ところが、7 世紀末〜8 世紀初頭に訳経を行った義浄の音訳漢字では Skt の/v/が漢語の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ことが多い。以下では、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ける/v/の音訳状況を整理して/v/が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傾向が顕著であることを示し、更にそれがインド東部の方言的特徴を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について論じたいと思う。

とは、義浄が滞在したインド東部の文字状況と合致し、義浄撰であることを支持するかに見える。しかし現時点では『梵語千字文』の作者に関する手掛かりが少なく、義浄撰であるかどうかは引き続き慎重に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11] 松本 2007：35；東洋文庫・石塚・小助川 2014：77

[12] この写本の画像は東京国立博物館のウェブサイトで閲覧可能である（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57878（2021 年 12 月 10 日確認））。また梵字貴重資料刊行会 1980：2 にも図版がある。この資料はこの資料は当初 6 世紀の貝葉写本として紹介されたが、その後の研究では 8〜9 世紀頃の書写で、中国または日本で制作されたものと推定されている。この辺りの議論については、橋本 2018：9-10 を参照。

[13] 施向東 1983：41-47 および施向東 2009：72-79 の表を見ると、vi、ve は確かに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ことが多いが、va に対しては「婆」（並母）と「縛」（奉母）、van に対しては「槃」（並母）と「飯」（奉母）のように、a が後続する場合は時に並母字で、また時に奉母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

3.1 義浄について

義浄は斉州（現在の山東済南一帯）山荘の人。671 年に海路でインドに向かう。途中シュリーヴィジャヤ国（Śrīvijaya。現インドネシア、スマトラ島パレンバン付近）に半年間滞在し、梵語文法を学習する。その後、マラーユ国（Malāyu）等を経由して 673 年に東インドのタームラリプティ国（Tāmralipti）に上陸する。この国に 1 年間滞在して梵語を学んだ後、ナーランダー（Nālandā）の地を中心に約 10 年間修学した。帰途、シュリーヴィジャヤに 687〜693 年の間滞在して『南海寄帰内法伝』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伝』を著述し、幾つかの翻訳も行った。695 年に洛陽に入り、以後は洛陽と長安で訳経活動に従事した（王邦維 1988 : 253-267 ; 王邦維 1995 : 1-26 ; 宮林・加藤 2004 : 444-450）。

3.2 先行研究

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ける/v/の音訳状況を調査する前に、これまでに行われた義浄の音訳漢字に関する音韻学的研究について簡単に紹介しておく。

Coblin 1991 は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同訳『金光明最勝王経』および義浄撰『南海寄帰内法伝』の音訳状況について整理を行っている。但し Coblin 1991 には『南海寄帰内法伝』からの挙例が無く、当該資料における音訳漢字の具体的な状況は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ない。

劉廣和 1994 は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と不空訳『仏母大孔雀明王経』とを比較し、両者の間に見られる音韻的特徴の違いについて論じている。また劉廣和 2011 は義浄訳『仏説仏頂尊勝陀羅尼経』と他の同本異訳の音訳状況について分析と比較を行っている。

王思齊 2015 は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の音訳漢字が反映する声母の特徴について、また王思齊 2017 は韻母の特徴についてそれぞれ論じている。

以上の先行研究では、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いて Skt の/v/が並母と奉母とで音訳されていることは示されているが、/v/が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は特に注目されていない。また Skt の/v/が唇歯摩擦音[v]のような音価であったことを前提に漢語の奉母の音価が議論されており、Skt の/v/の音価そのものに対する検討は行われていない。

なお、義浄の音訳漢字が依拠した方言音については、中原北部方言の一種（Coblin 1991 : 69）、北方東部地区の方言（劉廣和 1994 : 414 ; 劉廣和 2002 : 146 ; 王思齊 2015 : 258）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本稿筆者もまた、橋本 2019 で述べたように、義浄の訳場

では当時の洛陽および長安の仏教界において主流とされた北方音の一種が使われていたと考えている。

3.3 資料

本稿で用いる資料は、(1) 義浄撰『南海寄帰内法伝』、(2) 同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伝』、(3) 義浄訳『仏説仏頂尊勝陀羅尼経』の三種である。

(1)(2)について、音訳漢字の表記および対応する Skt 語形は王邦維 1995（略称『南海』）と王邦維 1988（略称『高僧』）に拠る。これら資料に時折見られる非 Skt 的な形式[14]や非インド語の語形については分析の対象としないが、場合によっては脚注で言及することがある。王邦維氏が原語について判断を保留している音訳は扱わない。なお『南海』と『高僧』の出典における数字は校注部分の頁数を表す。

(3)は 710 年に長安の大薦福寺にて訳出されたものである（王邦維 1995 : 29）。陀羅尼部分の音訳漢字のみを取り上げる。テキストは『大正新脩大蔵経』第 19 冊所収本（No. 971。略称『尊勝』）を用い。音訳が対応する Skt の語形については畝部 2015 : 120-121 を参照する。

以上の他、先行研究で用いられた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の音訳状況も、必要に応じて取り上げる。

3.4 /v/の音訳状況

今回用いた資料では Skt の/v/に対する並母字による音訳例の異なり語数が奉母字のそれを大きく上回っている。以下ではその具体的な状況を見ていくことにする。但し既存の音訳を踏襲したと判断されるもの、例えば「提婆」deva、「跋摩」varman、

---

[14] 例えば、朱儞 Cūrṇi（『南海』: 200）は Prākrit の-rṇ- > -ṇṇ- の変化を反映している（Brough 1973 : 257-258）。また伐掇呵利 Bhartṛhari（『南海』: 201）Prākrit form である Bhaṭṭihari に基づいた音訳と考えられ（Brough 1973 : 258）、-rt- > -ṭṭ- の変化（Pischel 1981 : §289）および -ṛ- > -i- の変化（Pischel 1981 : §50）を示している。

子音+r の r が先行子音に同化（Pischel 1981: §268 ; 同書 : §287）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す音訳も見られる。例えば、莫訶夜那鉢地已波 Mahāyānapradīpa（『高僧』: 88）、耽摩立底 Tāmralipti（『南海』: 56 ; 『高僧』: 88）等。これらは精度の低い音訳とは考えにくい。なぜなら他の箇所では、鉢喇特崎拏 pradakṣiṇa（『南海』: 166）、鉢剌婆剌拏 pravāraṇa（『南海』: 116 ; cf. 同書 : 264）のように pra を「鉢喇」「鉢剌」と音訳しており、仮に原音が pra や mra であったならば「羅」「囉」「剌」「喇」等の来母字を加えることは十分可能だ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である。なお『南海』『高僧』の注釈では諸本間の字句の異同が詳細に記されているが、上に挙げた問題の音訳についてはいずれも字句の異同に関する指摘が無く、「羅」「囉」「剌」「喇」等の字が脱落した可能性は低い。

「涅槃」nirvāṇa、「薩婆」sarva、「毘訶羅」vihāra、「毘奈耶」vinaya 等は分析の対象としない。

(1) 並母

/v/は主に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全ての並母字による音訳例を以下に挙げる。

「婆」

安呾婆娑 Antarvāsa（『南海』: 75）

阿離耶慕攞薩婆悉底婆拖尼迦耶 Āryamūlasarvāstivāda-nikāya（『南海』: 11）

地婆羯囉蜜呾囉 Divākaramitra（『南海』: 207）

泥婆娑 nivāsa / nivāsana（『南海』: 100）

鉢剌婆剌拏 pravāraṇa（『南海』: 116 ; cf. 同書 : 264）

娑多婆漢那 Sātavāhana（『南海』: 180）

婆哆 vāta（『南海』: 157）

納婆毗訶羅 Navavihāra（『高僧』: 11）

颯麼三曼多阿婆婆(引)娑 samasamantāvabhāsa（『尊勝』: 362c2-3）

瑣婆(引)婆毘戍(商聿下同)睇 svabhāvaviśuddhe（『尊勝』: 362c3-4）

「畔」

制底畔彈那 caityavandana（『南海』: 145）

制底畔睇 caityavande（『南海』: 144 ; cf. 同書 : 258）

畔憚南 vandana（『南海』: 150 ; cf. 同書 : 268）

畔睇 vande（『南海』: 139）

「伴」

輸婆伴娜 Subhavana（『高僧』: 36）

「跋」

跋臘毗 Valabhī（『南海』: 198）

蘇揭多跋囉跋者那 sugatavaravācana[15]（『尊勝』: 362c4-5）

跋折囉(引)迦也僧喝旦那戍睇 vajra-kāya-saṃhatana-śuddhe[16]（『尊勝』: 362c10-11）

鉢喇底儞跋戴也 pratinivartaya（『尊勝』: 362c11-12）

---

15 チベット訳（畝部 2015 : 121）に依った。梵本は sugatavacanā（畝部 2015 : 120）となっている。

16 仏陀波利訳「跋折囉–迦耶–僧訶多那–秫提」から復元された形式（畝部 2015 : 120）に依った。梵本は vajrakāyasaṃghātaśuddhe（畝部 2015 : 120）となっており、「喝」との対応に問題がある。なおチベット訳は vajrakāyasaṃhatana（畝部 2015 : 121）となっている。

跋折囉跋折囉(引)揭鞞(引) vajri vajragarbhe（『尊勝』：362c16-17）

跋折藍婆跋覩 vajraṃ bhavatu（『尊勝』：362c17）

「薄」

薄迦(択也反) Vākya（『南海』：203）

「陛」

阿離耶悉他陛攞尼迦耶 Āryasthāvira-nikāya（『南海』：10-11）

「薜」[17]

悉他薜攞 sthavira（『南海』：130）

薜舍 Vaiśālī（『南海』：8）

薜舍離 Vaiśālī（『高僧』：88）

薜世 Vaiśeṣika（『南海』：2）

薜陁 Veda（『南海』：206）

薜攞斫羯攞(弾舌道之) velācakra（『南海』：167）

---

[17] 「薜」（霽韻並母）が vi、ve、vai に対応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は説明が必要である。王思齊 2017：43 の整理状況からは、義浄の音訳漢字では齊韻（および薺韻、霽韻）の字は一般に e に対応し、i (ī)に対応することも比較的多いことが窺われる。よって霽韻字「薜」が vi と ve に対応する点は問題ない。他方 vai との対応については、Prākrit における ai > e の変化（Pischel 1981：§60）を考慮すべきである。インド原音において Prākrit の影響で vai が ve と発音されることがあり、それを「薜」で音訳したものと思われる。なお Prākrit では ai > e と並行して au > o の変化も起きており（Pischel 1981：§61）、更に e、o（長母音）は子音連続の直前で ĕ、ŏ（短母音）となり、時に i、u となることもある（Pischel 1981：§84）。これらの変化は義浄訳以外の音訳にも反映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る。

梁初に編纂された、仏典音義書の原型とも言うべき『出要律儀』音義の佚文が、近ごろ船山 2020 によって網羅的に収集された。収集された佚文は南朝梁の梵語学資料として貴重であり、またそこに含まれる音訳は『切韻』以前の梵漢対音として参考になる。同論文は更にこの資料の音訳語を研究し、『出要律儀』を含む六朝期の音訳では Skt の ai、au に対し i、u を表す漢字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と指摘した上で、この種の音訳方法が「音素還元主義」に基づくものと解釈している（船山 2020：168-172）。Skt には母音階梯（vowel gradation）という現象があり、動詞語根から語幹や派生形を作る過程で i→e→ai、u→o→au と母音の交替が起きる。船山 2020 が提案する「音素還元主義」とは、この母音の交替を遡る形で、つまり ai や e を i に、au や o を u に戻して音訳することを言う。この解釈について、梵漢対音による漢語音韻史研究の立場からは次のように考える。Skt と漢語との間に対応上の体系的なズレが見られる場合、まずはインド側と漢語側双方の音韻史的背景を考慮する必要がある。船山 2020 が問題視する音訳のうち、支韻や齊韻の字（i および e に対応しうる）で Skt の ai に対応するもの、および虞韻字（u および o に対応しうる）で Skt の au に対応するものについては、上述した Prākrit における ai > e、au > o の影響を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が検討されてもよいと思われる。

「毘」「毗」

毗輸安呾囉 Viśvāntara（『南海』: 184）

毗何羯喇拏 Vyākaraṇa（『南海』: 188）

毗睇陀羅必[18]栺(丁澤反)家 vidyādharapiṭaka（『高僧』: 138）

鉢喇底毘失瑟吒(引)也 prativiśiṣṭāya（『尊勝』: 362b29-c1）

毘輸馱(唐左)也 viśodhaya（『尊勝』: 362c2）

瑣婆(引)婆毘戍(商聿下同)睇 svabhāvaviśuddhe（『尊勝』: 362c3-4）

伽伽那毘戍睇 gaganaviśuddhe（『尊勝』: 362c7）

烏瑟膩沙毘逝也戍睇 uṣṇīṣavijayaśuddhe（『尊勝』: 362c7-8）

迦也毘戍睇 kāyaviśuddhe（『尊勝』: 362c18）

「鼻」

鼻窣怖吒勃地戍睇 visphuṭabuddhiśuddhe（『尊勝』: 362c14）

鼻逝也鼻逝也 vijaya vijaya（『尊勝』: 362c15）

「芯」

攝拖芯馱(停夜反) śabdavidya（『南海』: 188）

芯力叉 vṛkṣa（『南海』: 192）

芯栗底蘇呾羅 Vṛttisūtra（『南海』: 196）

(2) 奉母

Skt の/v/を奉母字で音訳する例は、並母字と比べると圧倒的に少ない。今回扱った資料では「伐」と「佛」の 2 字のみにとどまる。

「伐」

支伐囉 cīvara（『南海』: 65；同書：76）

鉢里薩囉伐拏 parisrāvaṇa（『南海』: 76）

薄伽伐帝 bhagavate（『尊勝』: 362b29）

薩婆痾伐刺拏毘戍睇 sarvāvaraṇaviśuddhe（『尊勝』: 362c11）

「佛」

尸利佛逝 Śrīvijaya[19]（『南海』: 13；cf. 同書：207）

---

[18] 『高僧』：133 は「必」字を欠くが、校注本における脱字と思われる。大正蔵本の表記（T51：6c22）を参考にして「必」を補った。

[19] Śrīvijaya は Skt 由来の地名ではあるが、その音訳である「尸利佛逝」「室利佛逝」「佛誓」はインドではなくシュリーヴィジャヤ現地での発音に基づいた可能性も考えられる。

室利佛逝 Śrīvijaya（『南海』: 168 ; cf. 同書 : 207 ;『高僧』: 45）
佛誓 Śrīvijaya（『南海』: 207）

以上の例では奉母字「伐」「佛」が語中の/v/に対応している。

(3) 匣母合口字および合口介音

以上で見た並母字および奉母字による音訳の他、更に/v/が匣母合口字および合口介音で音訳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それらは子音に後続する/v/が[w]と発音されたのを反映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橋本2019 : 72-73)。

匣母[20]合口字「和」
杜和羅鉢底 Dvārapati（『高僧』: 88）
杜和鉢底 Dvārapati（『南海』: 12）
杜和羅 Dvārapati（『南海』: 153 ; cf. 同書 : 15）
三摩戍和娑阿地瑟恥帝 samāśvāsādhiṣṭhite（『尊勝』: 362c19-20）

合口介音による音訳[21]
俱俱吒譬説羅 Kukkuṭeśvara（『南海』: 23 ;『高僧』: 40）
毗訶羅莎弭 vihārasvāmin（『高僧』: 113）
莎揭哆 svāgata（『南海』: 148）
瑳婆(引)婆毘戍(商聿下同)睇 svabhāvaviśuddhe（『尊勝』: 362c3-4）
薩婆薩埵難(引) sarvasattvānāṃ（『尊勝』: 362c18）

虞韻字「輸」
毗輸安呾囉 Viśvāntara（『南海』: 184）

[20] 義浄の頃、匣母がまだ有声性を保存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とについては、橋本 2019 で詳しく論じた。
[21] 肥爪 1993 : 47-48 および劉廣和 1994：412（劉廣和 2002 : 140）は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において子音に後続する v が合口介音によって音訳されていること、その理由が子音に後続する v が[w]と発音されていたことに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王思齊 2017 : 45 は『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において果摂字「埵墮莎鎖」等の合口介音が Skt の/v/に対応する点に言及してはいるが、対応の理由について説明は行っていない。

最後の例は、子音に後続する/v/が[w]と発音されていたのを「輪」の韻母全体で表したものと解される。

4. 考察

前章で見たように、Skt の/v/は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いて、子音に後続する場合を除くと、多くは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奉母字による音訳も一部見られるが、並母字の音訳と比べるとはるかに少ない。以下ではこのような音訳傾向について考察を加えることにする。

4.1 インド側の方言的特徴

今回用いた資料のうち『南海』と『高僧』は義浄がシュリーヴィジャヤ滞在中に執筆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ら資料に見られる義浄独自の音訳は、恐らく義浄が旅行中およびインド滞在中に実際に聞いた発音に基づいて作成されたであろう。この推測はこれら資料に時折 Prākrit 的な語形や非インド語の音訳が見られることによって支持される。もちろん義浄が『南海』と『高僧』を執筆する際にインド文字で書かれた何らかの資料を参照した可能性は否定できない。しかしこれら資料は梵本から翻訳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いので、音訳を行う際のインド文字への依存度は比較的低かったに違いない。従って『南海』と『高僧』において Skt の/v/が多く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主な理由は、義浄が滞在先で実際に聞いた Skt の/v/の音価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

義浄の音訳漢字では Skt の/v/が主に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ことから、/v/は漢語の並母に最も近いと感じられたと推察される。ちなみに並母字は後述するように Skt の/b/ /bh/にも対応する。また少数ながら Skt の/v/を奉母字で音訳する例も見られる。今回扱った資料では、奉母字による音訳例は全て語中に集中しており、並母字による音訳例が語頭、語中のどちらにも見られるのと対照的である。あたかも位置によって/v/の音声的現れが異なっていたかのように見える。

では義浄が依拠した Skt 音の/v/の音価は一体どのようであったのだろうか。本稿筆者は[b]のように発音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る。

上述したように、現代のインド東部では/v/と/b/が共に[b]と発音されており、これは/v/と/b/の字形の変遷から 6 世紀末までに遡る現象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義浄が滞在した 7 世紀後半のインド東部では/v/と/b/がいずれも[b]と発音されており、

それらを義浄は並母字で音訳した。但し時に、特に語中では[b]の閉鎖性が弱まって[v]や[β]のような摩擦音的な発音が/v/の異音として現れることがあり、それを唇歯音化していた奉母の字で音訳した、と解釈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4.2 梵本における/v/と/b/の字形

『尊勝』は梵本即ちインドの文字で書かれた Skt のテキストに基づいて漢訳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よって『尊勝』において Skt の/v/が多く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理由として、漢訳時に基づいた梵本において/v/と/b/の字形に混乱が起きていた可能性を考える必要がある。

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でも並母字は Skt の/v/（および/b/ /bh/）に対応する（王思齊 2015：260）。王思齊 2015 は/v/と/b/がどちらも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理由について、梵本の版本の違いによるもの、或いは伝写の過程で発生した誤写（悉曇文字では/v/と/b/の字形が極めて近いため）によるもの[22]と考えている。

王思齊 2015 の言う「梵本の版本の違い」とは、義浄訳が依拠した梵本と王思齊 2015 が用いた梵本との間で/v/と/b/の表記に異同があるという意味ではないかと推測する。また「伝写の過程で発生した誤写」については、確かに悉曇文字の/v/と/b/は酷似しているため、漢訳時に基づいた梵本において/v/が/b/と誤って書かれていたのを、そのまま/b/と認識して並母字で音訳することはあったであろう。

しかしながら王思齊 2015 : 260 によると、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において Skt の/v/の音訳に用いられている並母字は婢跋毘菩婆鞞薜苾槃薄陛頻傍仳畔僕鼻勃と多種に及ぶが、一方奉母字の使用は伐縛乏吠梵[23]のみにとどまる。『尊勝』においても/v/は並母字（婆跋毘鼻）で音訳されることが多く、奉母字による音訳例は薄伽伐帝 bhagavate、薩婆痾伐剌拏毘戍睇 sarvāvaraṇaviśuddhe の 2 例のみであっ

---

22 王思齊 2015：261。中国語原文は次の通り。「至於並母字既對 b，又對 v 的現象，我們認為，可能由於梵文版本不同，或者傳抄中出現錯誤，悉曇字 va、ba 字形近似。」

23 Coblin 1991：70-71 は奉母字の対応する音節に母音 a が含まれる（但し吠率怒 viṣṇu は例外）ことに注目している。なお実際の奉母字による音訳例を見ると、語中の/v/に対応することが多いように思われる。例えば僧侍伐儞 saṃjīvani（T19：461b19；田久保 1972：8）、雞伐帝 kevaṭṭe（T19：462a3；田久保 1972：10）等。だが次のように語頭の/v/に対応する例も見られる。縛芻 Vakṣu（T19：470c18；cf. 田久保 1972：40）、吠率怒 Viṣṇu（T19：467b2；cf. 田久保 1972：25）、乏怖魯 vaphulu（T19：460b5；田久保 1972：4）。語頭の/v/も奉母字で音訳される点は『南海』『高僧』『尊勝』と異なるが、それが果たして資料の性質の違いによるものか、それともデータ量の違いによるものか、現時点では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の点は今後義浄訳のデータを蓄積して引き続き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た。このように並母字による音訳例は非常に多く、それら全てを梵本における悉曇文字の異同や誤写によって説明するのは難しい。同時に上述したインド側の方言的特徴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も考慮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われる。

4.3 漢語側における軽唇音の状況

以上では、義浄の音訳漢字に見られる Skt の/v/の音訳傾向にインド側の方言的特徴および梵本における字形の問題が関係している可能性を指摘した。だが、そもそも漢語側において軽唇音化の唇歯音化が起きておらず Skt の/v/と/b/を区別できなかったために、/v/が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疑問も持たれる。

劉廣和 1994 は並母と奉母が共に Skt の/b/に対応し、また明母と微母が共に Skt の/m/に対応することを理由に、これら声母の分化を認めない。非母については非母字「發」が/ph/に対応することから、幇母から分化していたと考える。そして並母・奉母[b-]、明母・微母 [m-]、非母（および敷母）[pf-]と推定している（劉廣和 1994：410；劉廣和 2002：136）[24]。しかし劉廣和 1994：409 の対応状況を見ると、/b/に対応する奉母の例は「佛」のみ、また/m/に対応する微母の例は「文」のみであり、これらわずかな例を根拠として並母・奉母、明母・微母が分化していないと言えるかは疑問である。

一方、Coblin 1991：71 は義浄訳が依拠した漢語音において軽唇音の非母と奉母は重唇音の幇母・並母とは区別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ている。微母についても明母とは何らかの音声的な区別があったと推測している。

また王思齊 2015 : 261 は微母以外の軽唇音は分化していたと考えており、奉母については Skt の/v/に対応することから、その音価を[v-]と推定している。

今回扱った資料でも Skt の/v/が奉母字で音訳される例が少数ながら見られる。それらは奉母の唇歯音化の直接的な根拠と言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が、データ量として十分とは言い難い。よって、他の状況と合わせ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る。

(1) 初唐期の他の対音資料に反映される唇歯音化

橋本 2021 では初唐末期までには軽唇音の唇歯音化がかなりの程度進行していた可能性が高いことを指摘した。それは 7 世紀中葉の玄奘訳以降、Skt の/v/が漢語の奉母字で音訳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こと、また 7 世紀末頃の成立と考えられる漢訳マニ

[24] 劉廣和 2011：68 に示された中原音の声母表でも並母・奉母[b-]、明母・微母 [m-]、非母（および敷母）[pf-]と推定されている。

教文献中の音訳讃歌においても中期ペルシア語の[f]が漢語の非・敷母字で、中期ペルシア語の[β]が漢語の奉母字でそれぞれ音訳されること、更に音訳における重唇音字と軽唇音字の使い分けがこれらほぼ同時期の複数種の対音資料に共通して見られることから推察される。従って、7 世紀末〜8 世紀初頭の義浄の音訳漢字が依拠した漢語音においても同様に軽唇音の唇歯音化が起きていた可能性が高い。

(2)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ける重唇音と軽唇音の使い分け

今回扱った資料ではSktの両唇音/p/ /ph/ /b/ /bh/ /m/は基本的に重唇音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以下、既存の音訳を踏襲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と判断した、Sktの両唇音に対する全ての音訳例を挙げる。

/p/：幫母[25]

「鉢」

阿鉢底鉢喇底提舍那 āpattipratideśana（『南海』: 115）

鉢履曼荼羅 Parimaṇḍala（『南海』: 100）

鉢里薩囉伐拏 parisrāvaṇa（『南海』: 76）

鉢喇特崎拏 pradakṣiṇa（『南海』: 166）

鉢剌婆剌拏 pravāraṇa（『南海』: 116；cf. 同書 : 264）

三鉢羅佉哆 saṃpragata（『南海』: 54）

蜜栗伽悉他鉢娜 Mṛgasthāpana（『高僧』: 103）

那伽鉢亶那 Nāgapatana（『高僧』: 182）

鉢喇底毘失瑟吒(引)也 prativiśiṣṭāya（『尊勝』: 362b29-c1）

鉢喇底儞跋戴也 pratinivartaya（『尊勝』: 362c11-12）

呾闥多步多孤揥鉢唎戍睇 tathatābhūtakoṭipariśuddhe（『尊勝』: 362c13-14）

薩婆揭底鉢唎戍睇 sarvagatipariśuddhe（『尊勝』: 362c18-19）

三曼頞鉢唎戍睇 samantapariśuddhe（『尊勝』: 362c21）

「半」

半者蒲膳尼 pañcabhojanīya（『南海』: 60）

[25] Skt の/p/が非母字「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例もある。即ち、提婆弗呾擺 Devaputra（『南海』: 161）、提婆弗呾羅 Devaputra（『高僧』: 103）。この中に見られる弗呾羅および弗呾邏は既存の音訳を踏襲したものである。なお「弗」は玄奘訳の陀羅尼において/p/に対応することがある。但しわざわざ反切を付してこの字を幫母に読むように指示していることから、玄奘当時「弗」の声母はもはや[p-]ではなくなっ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橋本 2021 : 131）

半者珂但尼 pañcakhādanīya（『南海』: 60）

「波」

波尼你 Pāṇini（『南海』: 190-191）

波剌斯 Pārasī[26]（『南海』: 91）

波顛社攞 Patañjali（『南海』: 200）

波呾囉 pātra（『南海』: 76）

鄔波馱耶 upādhyāya（『南海』: 131）

鄔波三鉢那 upasaṃpanna（『南海』: 127）

泥波羅 Nepāla（『高僧』: 10）

鄔波馱耶 upādhyāya（『高僧』: 181）

毘訶羅波羅 vihārapāla（『高僧』: 113）

「卑」

迦攝卑 Kāśyapīya（『南海』: 28）

「畢」

畢哆 pitta（『南海』: 157）

迦畢施 Kāpiśī[27]（『高僧』: 11）

「必」

毘睇陀羅必[28]栺(丁澤反)家 vidyādharapiṭaka（『高僧』: 133）

「補」

補嚕灑 補嚕縛 補嚕沙 puruṣaḥ puruṣau puruṣāḥ（『南海』: 192）

「晡」

晡堤木底鞞殺社 pūtimuktibhaiṣajya（『南海』: 163）

「褒」

褒灑陀 poṣadha（『南海』: 115）

/ph/：滂母

「跛」

燮跛 kapha（『南海』: 157）

---

[26] 宮林・加藤 2004 : 123 を参照。なお王邦維氏は原語を Pārasa としている（『南海』: 92）。

[27] 王邦維氏は原語の候補として他に Kapiśa、Kāpiśa、Kapiśā を挙げる（『高僧』: 32）。

[28] 『高僧』: 133 は「必」字を欠くが、校注本における脱字と思われる。大正蔵本の表記（T51 : 6c22）を参考にして「必」を補った。

「怖」[29]

鼻窣怖吒勃地戍睇 visphuṭabuddhiśuddhe（『尊勝』：362c14）

「撥」

颯撥[30]囉拏 spharaṇa（『尊勝』：362c3）

/b/：並母[31]

「盤」

蘇盤多 subanta（『南海』：192）

「勃」

勃陀(引)也 buddhāya（『尊勝』：362c1）

鼻窣怖吒勃地戍睇 visphuṭabuddhiśuddhe（『尊勝』：362c14）

薩婆勃陀阿地瑟恥多戍睇 sarvabuddhādhiṣṭhitaśuddhe（『尊勝』：362c15-16）

勃陀勃陀(停也反) budhya budhya（『尊勝』：362c20）

「菩」

菩駄也菩駄也 bodhaya bodhaya[32]（『尊勝』：362c20）

---

[29] 「怖」は現代方言では[p-]と発音されることが多いが、『広韻』では滂母（普故切）である。

[30] 「撥」は『広韻』で幫母と滂母の読みがある。今、後者の読みを採る。大正蔵本およびその底本である高麗蔵本（綫装書局 2004：560a）では「撥」に作る。大正蔵本の脚注に記された宋本、明本、東寺三密蔵古写本は「發」（非母）に作る。また房山石経本（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 2000：71）、磧砂蔵本（易行 2005：233）も「發」に作る。よって大正蔵本の「撥」が「發」（非母）の誤りである可能性もある。ちなみに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に/ph/を非母字「發」で音訳する例が見られる。

發麗 phale（T19：462c7；田久保 1972：13）

窒里發里 triphālī（T19：467c4；田久保 1972：27）

[31] 例外として般彈那 Bandhana（『南海』：51）がある。一般に「般」は幫母字として Skt の/p/に対応する。だが「般」には並母の読みもあるので、ここでは並母字として/b/の音訳に用いられ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また「盤」「槃」等の誤字である可能性もある。

なお以下の非インド語的地名の音訳は考察の対象としない。

婆魯師 Baros（『高僧』：45）

跋南 Bnam（『南海』：17；『高僧』：1）

縛渴羅 Baktra（『高僧』：11）

[32] 仏陀波利訳「蒲駄耶蒲駄耶」から復元された形式（畝部 2015：120）およびチベット訳（畝部 2015：121）に依った。梵本は vibhodaya（畝部 2015：120）となっている。

/bh/：並母[33]

「婆」

蘇婆師多 subhāṣita（『南海』：175）

呾他揭多揭婆 Tathāgatagarbha（『南海』：207）

輸婆伴娜 Subhavana（『高僧』：36）

颯麼三曼多阿婆婆(引)娑 samasamantāvabhāsa（『尊勝』：362c2-3）

瑳婆(引)婆毘戍(商聿下同)睇 svabhāvaviśuddhe（『尊勝』：362c3-4）

跋折藍婆跋覩 vajraṃ bhavatu（『尊勝』：362c17）

「跋」

曷羅社跋吒 Rājabhaṭa /Rājarājabhaṭa（『高僧』：169）

「薄」

薄伽伐帝 bhagavate（『尊勝』：362b29）

「毘」

跋臘毘 Valabhī（『南海』：198）

阿毘詵者 abhiṣiñcya（『尊勝』：362c4）

「步」

呾闥多步多孤揥鉢唎戍睇 tathatābhūtakoṭipariśuddhe（『尊勝』：362c13-14）

「蒲」

半者蒲膳尼 pañcabhojanīya（『南海』：60）

「鞞」

晡堤木底鞞殺社 pūtimuktibhaiṣajya（『南海』：163）

---

[33] 次の 2 例は Skt の/bh/が並母以外の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

伐揥呵利 Bhartṛhari（『南海』：201）

尸羅鉢頗 Śīlaprabha（『高僧』：133）

一つ目の音訳が Prakrit form “Bhaṭṭihari”に基づい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本稿脚注 14 を参照。/bh/が奉母字「伐」で音訳されているのは奉母の摩擦的調音によって/bh/の帯気性を表現したものであろうか。

二つ目の例では/bh/が滂母字「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広韻』では「頗」に三種の読みがあるがいずれも滂母である（滂禾切、普火切、普過切）。ここで/bh/に対して並母字ではなくわざわざ滂母字「頗」を用いた理由は不明である。なお「頗」はしばしば/bh/の音訳に使われる。例えば、僧伽婆羅訳『孔雀王呪経』波羅頗莎羅 Prabhā-svara（T19：451b19；田久保 1972：22)；真諦訳『婆藪槃豆法師伝』波羅頗婆底 Prabhāvati（T50：188a19；船山 2021：31；同書：67）；真諦訳『隨相論』毘（防夷反）頗（判何反）沙 vibhāsa（T32：158b19；cf. 船山 2021：93）。また唐初の訳経僧の名である波羅頗蜜多羅（或いは波羅頗迦羅蜜多羅）は Prabhāmitra（或いは Prabhākaramitra）の音訳である。

阿蜜栗多鞞師計 amṛtâbhiṣeke[34]（『尊勝』: 362c5）

跋折囉跋折囉(引)揭鞞(引) vajri vajragarbhe（『尊勝』: 362c16-17）

/m/：明母、微母

「摩」

摩咥里制吒 Mātṛceta（『南海』: 178）

三摩近離 sāmagrī（『南海』: 114）

三摩戍和娑阿地瑟恥帝 samāśvāsādhiṣṭhite（『尊勝』: 362c19-20）

「麼」

颯麼三曼多阿婆婆(引)娑 samasamantāvabhāsa（『尊勝』: 362c2-3）

三麼耶阿地瑟恥帝 samayādhiṣṭhite（『尊勝』: 362c12-13）

麼麼 mama（『尊勝』: 362c17）

「曼」

三曼頞鉢唎戍睇 samantapariśuddhe（『尊勝』: 362c21）

「末」

末睇 madhya（『南海』: 141）

室羅末尼羅 śramaṇera（『南海』: 124）

末儞末儞麼末儞 maṇi mamaṇi（『尊勝』: 362c13）

三末囉三末囉 smara smara（『尊勝』: 362c15）

「莫」

阿離耶莫訶僧祇尼迦耶 Āryamahāsaṃghika-nikāya（『南海』: 10）

「弭」

毗訶羅莎弭 vihārasvāmin（『高僧』: 113）

索訶薩囉曷喇濕弭珊珠地帝 sahasrakaraśmisaṃcodite（『尊勝』: 362c8）

「蜜」

阿離耶三蜜栗底尼迦耶[35] Āryasaṃmitīya-nikāya（『南海』: 11）

地婆羯囉蜜呾囉 Divākaramitra（『南海』: 207）

---

[34] 仏陀波利訳「阿嚕嘌多毘曬爾」から復元された形式（畝部 2015 : 120）に依った。梵本は amṛtābhiṣaikaiḥ（畝部 2015 : 120）、チベット訳は amṛta-abhiṣekair（畝部 2015 : 121）となっている。

[35] 「三蜜栗底」は saṃmitīya（正量部）の音訳としては「栗」字が余分である。『南海』の校記によると、敦煌本では「栗」字を欠いており（『南海』: 11）、こちらのほうが saṃmitīya に合致する。しかし、いずれの表記が本来のものであるかは分からない。

曷羅戶羅蜜呾囉 Rāhulamitra（『南海』: 85）

蜜栗伽悉他鉢娜 Mṛgasthāpana（『高僧』: 103）

阿蜜栗多鞞師計 amṛtâbhiṣeke[36]（『尊勝』: 362c05）

「木」

晡堤木底鞞殺社 pūtimuktibhaiṣajya（『南海』: 163）

「没」

沒姪囉 mudre（『尊勝』: 362c10）

「目」

阿目羯寫 *amoghasya[37]（『尊勝』: 362c17）

「謨」

阿奴謨栘 Anumoda[38]（『南海』: 68）

南謨 namo（『尊勝』: 362b29）

「慕」

阿離耶慕擺薩婆悉底婆拖尼迦耶 Āryamūlasarvāstivāda-nikāya（『南海』: 11）

慕擺健陀俱胝 Mūlagandhakuṭī（『高僧』: 115）

更に微母字「文」が/m/に対応する。

文荼 Muṇḍa（『南海』: 192）

微母字による音訳例はこの 1 例のみであるが、これは既存の音訳を踏襲したものではなく、当時の発音に基づいた音訳であると思われる。橋本 2021 で指摘したように、初唐期の複数の対音資料に微母字「文」「勿」が外国語の m に対応している例が見られ、それらは微母字「文」「勿」の声母部分が当時まだ十分な摩擦音化や脱鼻音化を起こしておらず鼻音性を保存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橋本 2021 : 135-138）。

以上のように、義浄の音訳漢字では Skt の両唇音/p/ /ph/ /b/ /bh/ /m/を音訳する際、

[36] 仏陀波利訳「阿嚕嘌多毘曬爾」から復元された形式（畝部 2015 : 120）に依った。梵本は amṛtābhiṣaikaiḥ（畝部 2015 : 120）、チベット訳は amṛta-abhiṣekair（畝部 2015 : 121）となっている。

[37] 本稿筆者の推定による。仏陀波利訳では該当箇所に「受持者於此自稱名」（T19 : 352b18）とあり、ここで陀羅尼の受持者自身の名前を唱えるように指示されている。梵本は doyagasya（畝部 2015 : 120）となっている。

[38] 宮林・加藤 2004 : 87 を参照。王邦維氏は原語を Anumata とするが（『南海』: 69）、音訳と合わない。

基本的に重唇音字を用いており、ごく一部を除き軽唇音字は用いない。義浄訳『仏説大孔雀呪王経』でも同様である[39]（Coblin 1991：70；劉廣和 1994：409；劉廣和 2002：134；王思齊 2015：259-260）。要するに義浄の音訳漢字では重唇音と軽唇音がほとんど混じていない。このことは義浄当時の軽唇音がすでに唇歯音化を起こしていたことを間接的に示している[40]。従って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いて Skt の/v/が並母で音訳される傾向は、漢語側において軽唇音が唇歯音化以前の状態にあったことを示すものではなく、インド側の音声面および字形面における/v/と/b/の混乱を反映したものと考えるのが妥当であろう。

5. まとめ

本稿では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ける Skt の/v/に対する音訳方法を分析し、/v/が並母字で音訳される傾向が強いことを示した上で、その理由がインド東部の方言的特徴にある可能性を指摘した。

梵漢対音を用いた従来の漢語音韻史研究では漢語側の音価の議論に終始することが多く、Skt の/v/の具体的な音価についてはあまり考慮されてこなかった。本稿では Skt 音の音価を検討することで、これまで十分に説明できていなかった義浄の音訳漢字における/v/の音訳方法について新たな視点をもたらし、また同時に梵漢対音研究においてインド原音を検討することの重要性をも示す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う。

本稿は日本学術振興会令和元年度～令和 3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活動スタート支援 19K23046：研究課題「対音資料による唐代音韻史の研究――初唐期を中心に」による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39] Skt の両唇音が軽唇音字で音訳されている例も少数見られるが、いずれも既存の音訳を踏襲したものである（王思齊 2015：259-260）。

[40] 対音資料を用いて軽唇音の唇歯音化を示すことはできても、軽唇音声母の音価が破擦音（非母[pf-]、奉母[bv-]等）と摩擦音（非母[f-]、奉母[v-]等）のいずれであったか、音韻的に独立していたかを推定することには限界がある。また対音資料に現れない一部の軽唇音が唇歯音化していなかった可能性は否定できない（橋本 2021：134）。微母は対音資料において外国語の m に対応することが少ないことから唇歯音化していた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が、摩擦音化や脱鼻音化は生じ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われる（橋本 2021：137）。ただ 8 世紀以前の反切資料では微母と明母の通用が比較的多いことから、微母の唇歯音化の進行が他の軽唇音声母よりも遅れていた可能性は引き続き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参考文献

日本語文献（五十音順）

畝部俊也 2015「梵文『仏頂尊勝陀羅尼経』と諸訳の対照研究」，『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61：97-146 頁

田久保周誉 1972『梵文孔雀明王経』，東京：山喜房仏書林

東京大学国語研究室編 1986『古訓点資料集 1』，東京大学国語研究室資料叢書 15，東京：汲古書院

東洋文庫監修、石塚晴通・小助川貞次解題 2014 『梵語千字文／胎蔵界真言』，東京：勉誠出版

橋本貴子　2018「悉曇文字の字形から見た『悉曇字記』の問題点—語頭の長 ī, cha, ḍha を表す文字の字形を中心に—」，『東洋学報』100 (3)：1-23 頁

———　2019「対音資料から見た初唐期の匣母の音価について—義浄の音訳漢字を中心に—」，『開篇』37：67-80 頁

———　2021「対音資料から見た唐代の軽唇音化について：附論　日母の脱鼻音化」，『神戸外大論叢』73(3)：121-146 頁

肥爪周二 1993「悉曇学とワ行」，『国語と国文学』70 (2)：42-57 頁

船山徹 2020「『出要律儀』佚文に見る梁代仏教の音写語」，『東方学報』95：522-402 頁

———2021『婆藪槃豆伝—インド仏教思想家ヴァスバンドゥの伝記』京都：法藏館

梵字貴重資料刊行会編 1980『梵字貴重資料集成 図版篇』，東京：東京美術

松田和信 1982「梵文断片 Loka-prajñapti について—高黄寺・玉泉寺・四天王寺・智恩寺貝葉・インド所伝写本の分類と同定—」，『仏教学』14：1-21 頁

———1989「東寺・海竜王寺貝葉考—アビダルマ写本研究 (3)—」，『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7(2)：909-905 頁

———2010「中央アジアの仏教写本」，奈良康明、石井公成編 2010『文明・文化の交差点』119-158 頁，東京：佼成出版社

———2021「清涼寺貝葉」，『仏教学部論集』105：47-53 頁

松本照敬 2007『梵語千字文』の原語比定，『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紀要』30：35-101 頁

宮林昭彦・加藤栄司訳 2004『現代語訳 南海寄帰内法伝—七世紀インド仏教僧伽の日常生活—』，京都：法藏館

中国語文献（ピンイン順）

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24-1932《大正新脩大藏經》全 88 卷，東京：大藏出版【略称：T】

段晴 2013《于闐•佛教•古卷》，上海：中西書局

李建強 2017a《敦煌•對音•初探—基於敦煌文獻的梵、藏漢對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17b 《菩提流志主譯《不空羂索》咒语聲母對音比較研究》，《語言科學》16(1)：89-99 頁

劉廣和 1994《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唐代中國北部方音分歧初探》，《語言研究》1994 年增刊：408-414 頁

——— 2002《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国廣播電視出版社

——— 2011《《佛頂尊勝陀羅尼》大正藏九種對音本比較研究—唐朝中國北部方音分歧再探》，《中國語言學》5：57-70 頁

施向東 1983 《玄奘譯註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摘要），《語言研究》1983（1）：27-48 頁

——— 2009 《玄奘譯註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全文），施向東 2009《音史尋幽 ——施向東自選集》1-79 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石塚晴通 2015《從 Codicology 的角度看漢文佛典語言學資料》，徐時儀・梁曉虹・松江崇編《佛經音義研究：第三屆佛經音譯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32-342 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王邦維校注 198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 校注 1995《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王思齊 2015《義淨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經》中的唐代北方方言聲母系統》，《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8：257-264 頁

———2017《佛說大孔雀明王經》中的北方方言韻母系統，《古漢語研究》2017（4）：42-55 頁

綫装書局影印 2004《高麗大藏經》21，北京：綫装書局

葉少勇 2005《原民族宮藏梵文寫本的字體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

易行編輯 2005《磧砂大藏經〔影印宋元版〕》第 35 冊，北京：綫装書局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編 2000《房山石經》（遼金刻經）第 11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

欧文文献（アルファベット順）

Allen, W. S. 1953. *Phonetics in Ancient Ind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ugh, J. 1973. I-ching on the Sanskrit Gramm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36(2): 248-260.

Bühler, G. 1904. *Indian Paleography*, English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F. Fleet, reprinted in 2004,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Chatterji, S. K. 1960. The Pronunciation of Sanskrit. *Indian Linguistics* 21: 61-82.

Coblin, W. S. 1991. A Survey of Yijing's Transcriptional Corpus（義淨梵漢對音探討）. 《語言研究》1991(1)：68-92 頁。

Dani, A. H. 1963. *Indian Palaeography*, reprinted in 1986,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Hashimoto, T. 2015. Siddham Script 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anuscript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Ārya-Mahā-Māyūrī Vidyā-Rājñī*.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18: 263-273.

Masica, C. P. 1993. *The Indo-Aryan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lzer, G. 2014. A Palaeographic Study of a Buddhist Manuscript from the Gilgit Region: A Glimpse into a Scribes' Workshop. In: Quenzer, J., Bondarev, D. and Sobisch, J. eds. *Manuscript Cultures: Mapping the Field*. Berlin, München, Boston: De Gruyter: 227-272.

Pischel, R. 1981. *A Grammar of the Prākrit Language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reprinted in 1999,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Sander, L. 1968.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Supplementband 8,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Whitney, W. D. 1896. *Sanskrit Grammar*, third edition reprinted in 2003,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Ye, S. 2008. A Paleographical Study 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and Buddhapālita's Commentary.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11: 153-175.

On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Sanskrit /v/ in Yijing's Works

Takako Hashimoto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6th century, due to a sound change of /v/ in eastern Indian dialects, the sounds /v/ and /b/ were represent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eastern India. A Chinese Buddhist monk, Yijing (義浄), spent about 10 years in the late 7th century in eastern India, and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translated the Buddhist canons into Chinese from the end of the 7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8th centur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Yijing's transliteration of Sanskrit /v/,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at he tends to be transliterate /v/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bing* initials, which may reflect the pronunciation of /v/ in the dialect of the part of eastern India where he resided.

揚雄『方言』所収の「北燕」「朝鮮」方言語彙の性質

松江　崇
京都大学

要旨：本稿は、前漢末の揚雄『方言』を資料として、「北燕」「朝鮮」に分布する 60 語の語彙の性質を検討するものである。具体的には、これらの語彙の意味と音形とを推定した一覧表を提示した上で、当該の語彙に検討を加え、次の二点を指摘する。(1)「北燕」「朝鮮」に分布する語彙は、同時に他の地域にも分布する割合が少なく、強い独自性を有する。(2)「北燕」「朝鮮」語彙は、そのほとんどが漢語の方言語彙として解釈し得る。

1.　はじめに

周知のように、『方言』は前漢末に揚雄が編纂したと伝えられる中国最古の方言辞典である。『方言』を資料とした言語学的研究のうち、区画論的研究は林語堂(1927)以来の蓄積を持つが、いくつかの区画においては、その地域に漢語のみならず、非漢語系言語の話し手が少なからず存在したと推定される。そのような方言区の語彙の内実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漢語あるいは周辺の民族語の歴史を研究する上で、重要な意味を持つものと考える。

以上のような問題意識のもと、本稿では、『方言』において「北燕」「朝鮮」などと表現される地域の語彙に着目する。この二地域は互いに共通して分布する語彙が多いため、林語堂(1927)、丁啓陣(1991)、 劉君恵他(1992)などの先行研究では一つの方言区画として扱われている[1]。ただし「北燕」「朝鮮」方言の語彙の内実については、林語堂(1927)が、自身の区画地図の「北燕」に相当する地域に、「東胡語勢力」を示す記号を付したことがあるものの、そのような非漢語的要素が『方言』所収の語彙に具体的にどのよう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かは、必ずしも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ない[2]。

[1] Serruys (1959)による『方言』の区画では「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dialects」という方言区が設けられ、そののなかに「燕」「燕代北燕」「朝鮮洌水」「晋」「趙」方言が収められており、「北燕」「朝鮮（洌水）」のみを一つの区画とする態度はみられ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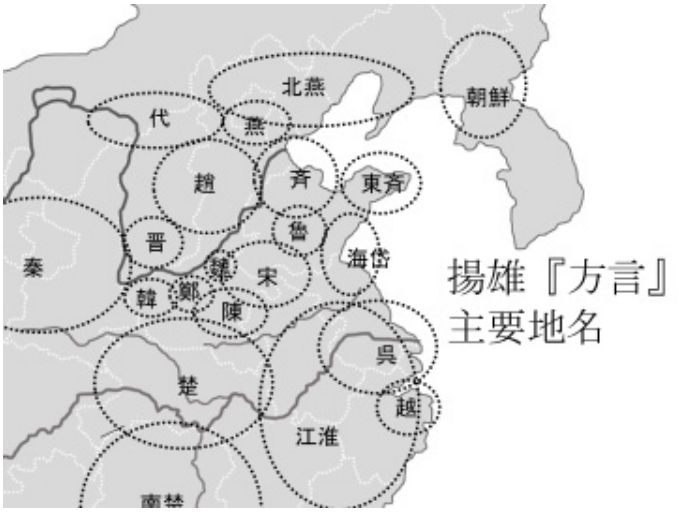
[2] 李敬忠 1987 は『方言』における「楚」方言などの南方方言語彙と少数民族語語彙との関

本稿では、「北燕」「朝鮮」にその分布が指定される語彙をリストアップし、意味・音形を推定した上で、北燕」「朝鮮」語彙の方言的性質と非漢語系であることが疑われる語彙の有無とを検討する。

2. 『方言』における〔北燕〕〔朝鮮〕

2.1 地理的範囲の推定

『方言』において語彙の分布地域は地名によって指定される。しかしそれらは、漢代以前の古代の国名、漢代の国名・郡県名、古代の州名、山岳・河川名など、時代も分類基準も異なる地理的概念を含む。それぞれの地名が具体的にどの範囲を示すかは重要な問題であるが、本稿ではこの種の議論は割愛し、主として劉君恵他(1992)の考証に基づいて地理的範囲を推定した松江(1999)の結論を示すに止める（上図は松江 1999 による主な地名の地理的範囲の推定結果）[3]。



「北燕」については、実在の古代国名である「燕」から考える必要がある。劉君恵他(1992:113)は、『方言』の「燕」は戦国時代の版図を表すのではなく、「薊」（現在の北京市西南）を含む漢代の広陽郡とその周囲の部分的地域を含むにすぎないとする。そして燕の北部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といった「燕」と「朝鮮」との間の地域を「北燕」の地域に比定する。「北燕」以外に、「燕之外鄙」「燕之北鄙」「燕之北鄙」「燕之北郊」「燕之東北」「北燕之郊」「北燕之外郊」「東北」「幽」

係を論じている。筆者は、現段階では李氏の個々の語彙に判断を論評する準備がないが、李氏の研究は『方言』語彙全体について非漢語系言語の観点から包括的に論じたものとはみなせない。

[3] 劉君恵他(1992)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は、頻出する地名の関係性を検討し、異なる語彙の分布が指定される頻度が高い地名については、その地理的範囲が重ならないように推定していく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なお上記「揚雄『方言』主要地名」の地図では、「江淮」の地理的範囲を松江 2013 の議論を踏まえて、劉君恵他(1992)よりも広く推定している。

などの表現で用いられる地名も同様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本稿ではこれらを〔北燕〕という表記で包括的に指すこととする。

劉君恵他(1992:113)は、「朝鮮」の地理的範囲を現在の遼寧・吉林の一部分の地域と朝鮮半島の北部一帯と推定する。本稿では、かりに朝鮮半島の北部一帯だけを指すものとしておく。なお「洌水」は、劉君恵他(1992:138)が指摘するように現在の朝鮮半島の大同江と推定されるが、『方言』では必ず「朝鮮」と並挙されるため、独立した地理的範囲を与えないことにする。以下、「朝鮮」と「朝鮮洌水」とを、〔朝鮮〕という表記で包括して指すこととする

2.2 〔北燕〕〔朝鮮〕方言と他方言との関係

前節で示した〔北燕〕〔朝鮮〕を表す地域に分布する語彙を抜き出してみると、〔北燕〕〔朝鮮〕のいずれかに分布する語彙は 60 例あり、そのうち〔北燕〕に分布する語彙は 55 例、〔朝鮮〕に分布する語彙は 32 例ある。両地域は言語的に密接であり、〔北燕〕語彙 55 例のうち、27 例が同時に〔朝鮮〕にも分布している。逆に、同一の語彙項目において〔北燕〕と〔朝鮮〕に異なる語彙が分布することはない。以下、両地域と他方言との言語的関係を【表 1】に整理しておく。

【表 1】〔北燕〕〔朝鮮〕語彙の独自性

	A	B	C
	当該地域に分布が指定される語彙	A のうち、他地域にも分布するもの	A のうち、他地域に同義の別の語彙が分布するもの
＋〔北燕〕、＋〔朝鮮〕	27	2	20
＋〔北燕〕、－〔朝鮮〕	28	16	16
－〔北燕〕、＋〔朝鮮〕	5	2	2

＊「A」「B」「C」は条件、数字は当該の条件に符合する数（語彙数）を表す。

＊「＋〔北燕〕、＋〔朝鮮〕」は語彙が〔北燕〕〔朝鮮〕双方への分布が指定されることを、「〔＋〔北燕〕、－〔朝鮮〕」は語彙が〔北燕〕への分布は指定されるが、〔朝鮮〕への分布は指定がないことを、「－〔北燕〕、＋〔朝鮮〕」は語彙が〔北燕〕への分布の指定はないが、〔朝鮮〕への分布は指定されることを表す。

＊「他地域」は〔北燕〕〔朝鮮〕以外の地域を指す。

注目に値するのは、ある語彙が｛北燕｝｛朝鮮｝の双方に分布する時（27 例)、その語彙がさらに他の地域にも分布することは非常に少ない一方（2 例)、しばしばその語彙と同じ意味の別の語彙が他地域に分布する（20 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後者の 20 例の状況は、｛北燕｝｛朝鮮｝と他地域との間に等語線が存在することを含意するものであり、これらのことは、｛北燕｝｛朝鮮｝の双方に跨がって分布する語彙は、強い独自性を備えていることを示すものと言えよう。

3. 『方言』における｛北燕｝｛朝鮮｝語彙の内実

本節では、以下に｛北燕｝｛朝鮮｝語彙の具体例を検討するために、｛北燕｝｛朝鮮｝語彙を一覧表にして提示する（【表 2】)。凡例は次のようである。

・「B」は、【表 1】の条件 B に符合するか（＋)、符合しないか（－）を表す。

・「C」は、【表 1】の条件 C に符合するか（＋)、符合しないか（－）を表す。

・「巻－条」は、底本とした周祖謨(1993)の巻数と条番号を表す。「1-8」であれば「1 巻 8 条」ということ。ただし一条が複数の語彙項目を含む場合があり、その場合は、松江(1999)の地図の分類に従って、条数に A・B・C といった下位分類を付す。

・「語彙」「分布地域」は、原則として底本の漢字表記に従う。ただし、戴震『方言疏証』、華學誠他(2006)等の先行研究の議論を参照して、修正を加えた箇所もある。その場合は当該字の直前に「*」を付す。

・「原文の語彙項目（母題)」は、『方言』の条文において語彙項目名と認識されていると思しき語句。おおよそ濮之珍(1966)の言う「母題」の概念に相当する。表記は底本に従うが、やはり先行研究を踏まえて修正することがある（当該字の直前に「＊」を付す)。

・「意味」は、語彙の日本語の意味を推定したもの。清朝以来の諸研究を参照して推定したが、とりわけ丁啓陣 1991 所収の「《方言》方言字(詞)表」(pp.124-194)および華學誠他(2006)の研究に負うところが大きい。

・「後漢音形」「上古音形」は Schuessler (2009)の体系に拠る推定音形（それぞれ LHan、OCM に相当)。Schuessler (2009)の LHan は「B」「C」によって上声・去声を表すが、下表では「上」「去」を小字で音節の後につけて表す（平声・入声は声調を表記しない)。また、当該語（字）が Schuessler (2009)に収録されていない場合、郭璞注あるいは諧声系列などを考慮しつつ個別に推定作業を行ったものが少なくない。なお、「(/)」は、直前の音形以外に可能性のある音形を示す（音節単位でつける)。

「lap(/lep)」であれば、「lap」或いは「lep」の意。推定音を表示する「*」は省略。
・1 巻 12 条「京」「將」については、『方言』では「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と解説され、古語であると認識されている。

【表 2】『方言』における〔北燕〕〔朝鮮〕語彙一覧

B	C	巻一条	語彙	分布地域	母題	意味	後漢音形	上古音形
-	+	1-8	咺	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	痛〈少兒泣而不止〉	子供が泣きやまない	kəŋ 去	kə̂ŋh
+	+	1-12	京	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皆古今語也）	大	大きい	kɨaŋ	kraŋ
+	+	1-12	將	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皆古今語也）	大	大きい	tsiɑŋ	tsaŋ
+	+	1-16	虔	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	殺〈賊〉	殺す	gian	gan
+	+	1-18	梨	燕代之北鄙	老	老いたさま	li	ri
+	-	1-24	墳	青幽之間	大〈凡土而高且大者〉	土が高く大きく積まれたもの	bun	bən
+	-	2-2B	豐人	趙魏之郊燕之北鄙	豐〈凡大人〉	背が高く体が大きい人	pʰuŋ nin	phuŋ nin
+	+	2-5	盱	燕代朝鮮洌水之間	*矎	目を見張る	hyɑ	hwa
+	+	2-5	揚	燕代朝鮮洌水之間	*矎	目を見張る	jɑŋ	laŋ
-	+	2-8C	策	燕之北鄙朝鮮洌水之間	小〈木細枝〉	細い木の枝	tʂʰɛk	tshrêk

-	+	2-29	葉*褕	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	毳	（物が）もろく壊れやすいさま	jap jo	lap(/lep) *lo
-	+	2-34	搖扇	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	疾	すばやい	jɑu śan 去	jau nhans
+	-	3-5A	臧	齊之北鄙，燕之北郊	奴婢賤稱〈凡民男而堉婢〉〈亡奴〉	はしためはしための夫・脱走した男のしもべ	tsɑŋ	tsâŋ
+	-	3-5A	獲	齊之北鄙，燕之北郊	奴婢賤稱〈女而婦奴〉〈亡婢〉	しもべの妻・脱走したはしため	ɣuak	ɡwrâk (/wrâk)
-	-	3-6	涅	*北燕朝鮮洌水之間	化	変化する・形を変える	ŋet	ŋêt
-	-	3-6	譁	*北燕朝鮮洌水之間	化	変化する・形を変える	hua	hwrâ (/hwâ)
-	+	3-7	斟	北燕朝鮮洌水之間	汁	協調する・心を合わせる	tśim	təm
-	+	3-10	*莥	北燕	雞頭	オニバス（スイレン科の水草）の実	wek	wek
-	+	3-11	菉	北燕朝鮮之間	凡草木刺人	（植物のトゲが）刺さる	tʂʰɛk	tshrêk
-	+	3-11	壯	北燕朝鮮之間	凡草木刺人	（植物のトゲが）刺さる	tʂɑŋ 去	tsraŋh

-	+	3-12	癆	北燕朝鮮之間	凡飲藥傅藥而毒	薬の服用後に苦みや痛みを感じる	lɑu 去	râuh
-	+	3-20	班	北燕	列	並べる	pan	prân
+	+	4-44	鞘角	東北朝鮮洌水之間	履〈粗者〉	（？）緒のついた履き物	ŋiɑŋ 上 kɔk	ŋâŋʔ khôk
-	+	5-1	鍇	北燕朝鮮洌水之間	鍑	釜の一種	tʰen 上	thânʔ
-	+	5-1	鉼	北燕朝鮮洌水之間	鍑	釜の一種	pieŋ 上	peŋʔ
+	+	5-4	益	海岱東齊北燕之間	*盂	鉢（容器）	kʰyan 去	kons
-	+	5-11	甌	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	罃	小さなかめ（容器）	ḍiɑŋ	dranŋ
+	-	5-24	槱	梁宋齊楚北燕之間	櫪	飼い葉桶	ṣuk	sruk
+	-	5-24	皁	梁宋齊楚北燕之間	櫪	飼い葉桶	dzou 上	dzûʔ
-	+	5-27	斛	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	臿	鋤	tʰeu 去	lhiâuh
-	-	5-32	椵	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	橛	しきみ（門の下に内外の境として敷く横木）	duɑn 去	dons
-	+	5-36B	樹	北燕朝鮮之間	牀〈其杠〉	腰掛け用の台の前の横木	dźo 去	doh
-	-	6-31	徥	朝鮮洌水之間	行	歩くさま	dźe 上	deʔ
-	+	7-7	讙	北燕	讓	叱責する	huɑn	hwân

-	-	7-9	侔莫	北燕之外郊	強〈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	努めて励む	mu mɑk	mu mâk
-	+	7-10	傑傲	燕之北郊	罵	罵る	guoŋ zioŋ	goŋ s-loŋ
-	+	7-12	*播	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	離	分ける／分かれる	pɑi 去	pâih
+	-	7-13	噬	北燕	逮	及ぶ	dźas	dats
+	-	7-15A	*膊	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	暴〈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	（人の秘密を）暴く・（牛羊の内臓を）さらけだす	pʰɑk	pâk (/phâk)
+	+	7-15B	晞	東齊北燕海岱之郊	暴〈暴五穀之類〉	（穀物を）陽に曝す	hɨi	həi
-	-	7-18	*嫈盈	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	怒〈凡言呵叱者〉	（大声で）叱る	kye jeŋ	kwe leŋ
+	-	7-19	踞蹙	東齊海岱北燕之郊	立〈詭〉	（両膝を地につけて）跪く	ɖiɑŋ muo 去	draŋ moh
+	-	7-19	隑企	東齊海岱北燕之郊	立〈委痿〉	（足が悪くて）進めずに立ちつくす	ŋəi kʰie 上	ŋâi kheʔ
+	-	7-22	平均	燕之北鄙東齊北郊	賦〈凡相賦斂〉	税を徴収する	bɪɛŋ kuin	breŋ kwin
-	+	7-24	釗	燕之北郊	遠	遠い	keu	kiâu
-	-	7-25	漢漫	朝鮮洌水之間	懣〈煩懣〉	いらいらする	hɑn 去 mɑn 去	hâns mâns
-	-	7-25	賑眩	朝鮮洌水之間	懣〈顛眴〉	正気を失う(?)	tśʰin ɣuen	thin gwên

+	+	7-30	膂	燕之外郊越之垂甌吳之外鄙	儋	担ぐ	liɑ 上	raʔ
-	-	7-31	樹植	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	立〈凡言置立者〉	立てる	dźo 上 dźik	doʔ dək
-	+	8-2	貊	北燕朝鮮之間	貔	ヤマネコ	pʰiə	phrə
-	-	8-4	抱	北燕朝鮮洌水之間	雞〈伏雞〉	卵を温めている鶏	bou 上	bûʔ
-	+	8-5	豭	北燕朝鮮之間	豬	ブタ	ka	krâ
-	+	8-9A	鶹*鴙	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	*鳧鳩	（？）ヤツガシラ（鳥類）	puk puə	pək pəʔ
-	+	8-9B	鵴*鶹	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	*鳧鳩〈鴛鴦〉	（？）雁の類の水鳥	wɨk puk	wək pək
-	+	8-10	蠽蠶	北燕	蝙蝠	コウモリ	tśɨk mək	tək mâk
-	+	8-15	祝蜓	北燕	守宮〈其在澤中者〉	イモリ	tśuk jan	tuk lan
-	+	11-15	蚍蜚	北燕	蚰蜒	ゲジゲジの類の虫	ṇu 上 ṇi	ṇruʔ nri
-	+	11-16	蝳蜍	北燕朝鮮洌水之間	黿蝘	クモ	douk jɑ	dûk la
-	-	11-18	蛆螶	北燕	馬蚿	ヤスデ	tsiɑ gɨɑ	tsa ga
-	+	13-151	糪	北*燕	麴	こうじ（糀）	bie	be

4. 『方言』における｛北燕・朝鮮｝の位置づけ

4.1 個別語彙の分類：漢語語彙の認定

上述のように、｛北燕｝｛朝鮮｝語彙は独自性が強いのであるが、そのこと自体はこれらの語彙が非漢語的性質を備え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わけではない。「独自性」の内実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今、かりに当該の語彙が「漢語」かどうかという判断を、①当該の語彙（或いは当該の語彙と方言変異形の関係にある語彙）が、前漢までの漢語文献にその用例がみられるか、②当該の語彙と方言変異形の関係にある語彙が、『方言』において中原地方を含む広い範囲への分布が指定されているか、③当該の語彙の語構成が漢語（前漢漢語）のそれに符合するか、という三点を基準に行い、これらの基準を満たした場合に漢語である可能性の高いものと認定していくことにする。なお、この基準では、前漢までに漢語語彙体系に広く受容された非漢語系語彙が「漢語」と認定されてしまうといった問題があるが、筆者にはより適切な基準を設定する能力がない。以下、「漢語と認定し得る語彙」(4.2)、「漢語の枠内で解釈可能な語彙」(4.3)、「漢語の枠内では解釈が難しい語彙」(4.4) に分けつつ、その内実を紹介していく。『方言』原文を引用することがあるが、郭璞注は原則として省略する。ただし当該の語（字）が問題になる場合には、適宜［　］内にこれを示すことがある。

4.2 漢語と認定し得る語彙

｛北燕｝｛朝鮮｝語彙 60 語のうち、その多くが（51 語）この類とみなされる。実例を 3 語あげる。

〇「晞」

『方言』7 巻 15 条：膊，曬，晞，暴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僇爲膊。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暴五穀之類，秦晉之間謂之曬，東齊北燕海岱之郊謂之晞。

「晞」の意味は「（穀物を）陽に曝す」、推定音形は、後漢*hii 平・上古*həi である。「湛湛露斯，匪陽不晞」（たっぷりとついた露は、太陽が出なければ乾かない）（『詩経』「小雅」「湛露」）などの前漢以前の用例があり、文献上「（太陽に照らして）乾かす」という意味を表す用例が確認される。この意味は、『方言』所収の当該語彙の「（穀物を）陽に曝す」という意味との連続性を認め得るであろう。よって前漢までの漢語文献に実例があるケースとみなし得る。

○「釗」

『方言』7 巻 24 条：釗，超，遠也［釗上*已音］。燕之北郊曰釗，東齊曰超。

「釗」の意味は「遠い」、推定音形は、後漢*keu 平・上古*kiâu である。「釗」は「遠い」意味での文献的な用例はみられないが、その推定音形が、「遙」（後漢音形*jɑu 平・上古音形*jau）と近く（華學誠他 2006 は「釗」「超」ともに「遙」の「方音転語」だと指摘する）[4]、その方言変異形である可能性が少なくない。そして「遙」は、「遠い」意味で前漢までの文献で常用される語彙であるため、間接的ではあるにせよ、前漢までの文献言語と結びつけ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り、漢語語彙であるとみなし得よう。

○「蝳蜍」

『方言』11 巻 16 条：鼅鼄，鼄蝥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鼅鼄，或謂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

「蝳蜍」は、意味は「クモ」[5]、推定音形は、後漢*douk 入 jɑ 平・上古*dûk la である。この語形は、同条の「自關而東趙魏之郊」という中原地方を含む地域に分布する「蠾蝓」（クモ、後漢音形*dźok 入 jo 平・上古音形*dok lo）と音形が類似しているため、その方言変異形だと推定できよう。「蝳蜍」「蠾蝓」ともに前漢までの文献言語の裏付けはないが、「蠾蝓」の音形をみると、「指小(diminutive)」の意味を付帯し、昆虫を表す漢語語彙にも多くみられる「順行重畳」（孫景濤 2008:58-76）の語構成であると解釈できる。「蠾蝓」が漢語式の語構成を持つのであれば、その方言変異形と推定される「蝳蜍」も漢語語彙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

4.3 漢語の枠内で解釈可能な語彙

この類に属する語彙は、語形全体またはそれを構成する各形態素が、前漢までの文献言語に結びつけ難いものの、推定音形などからみて、漢語語彙として解釈することが十分に可能なものである。本稿の認定では 8 語あり、器具・動植物など、モノ自体に地域差があるような語彙が多い。

○「錪」「鉼」

『方言』5 巻 1 条：鍑，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或謂之錪，或謂之鉼。江淮陳楚之間謂

---

[4] 「遙」は、『方言』6 巻 21 条に「遙，廣，遠也。梁楚曰遙。」とあり、「梁楚」の方言語彙とされている。なお東斉に分布が指定される「超」は、後漢音形*ṭʰiɑu 平・上古音形*thrau である。

[5] 丁啓陣(1991)「《方言》方言字（詞）表」は、「蝳蜍」の意味を「侏儒」〔背が異常に低い人〕と解釈するが、本稿はこれに従わない。

之錡，或謂之鍑。吳揚之間謂之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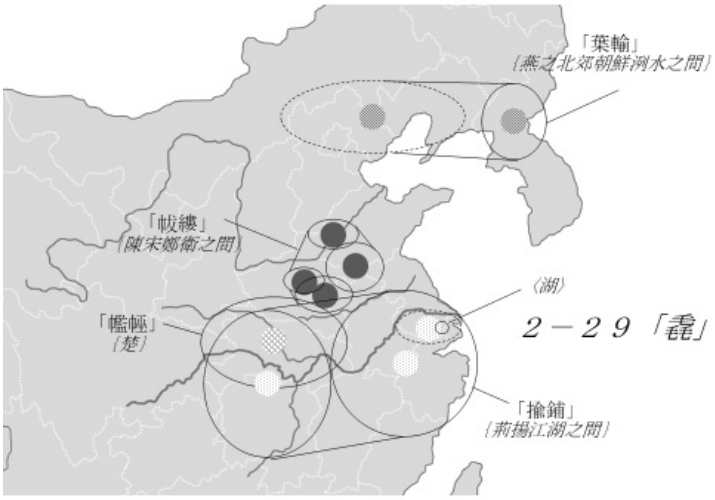
「鉇」「鉼」の意味はいずれも「釜の一種」。「鉇」の推定音形は、後漢*tʰen 上・上古*thə̂nʔであり、「鉼」の推定音形は、後漢*pieŋ 上・上古*peŋʔである。「鉇」も「鉼」も、前漢までの文献に実例はなく、母題に採用された通語語形（標準語的語形）たる「鍑」（後漢音形*pu 去・上古音形*pukh）の方言変異形ともみなし難い。しかし、他の方言語彙と同じく、単音節の音形であり、なおかつこれらが前漢までの文献にみられないのはこれらが日常語であり、モノ自体に地域性があるためだ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ように、地域によって指示するモノが異なり得る語彙のうち、前漢までの文献言語との結びつきが確認されないものに、5 巻 11 条「甈」（小さなかめ、後漢音形*ḍiɑŋ 平・上古音形*dranŋ）、8 巻 15 条「祝蜓」（イモリ、後漢音形*tśuk 入 jan 平・上古音形*tuk lan）、11 巻 18 条「蛆蠁」（ヤスデ、後漢語形*tsiɑ 平 gɨɑ 平・上古語形*tsa ga）がある。

以上のほか、この類に属する語彙にも抽象概念を表すものがある。以下の 2 巻 29 条「葉*褕」がそれであり、他に 3 巻 12 条「癆」（薬の服用後に苦みや痛みを感じる、後漢音形*lɑu 上、上古音形*râuh）があげられる。

○「葉*褕」

『方言』2 巻 29 条：揄鋪［音敷］，艦［音藍］甌，帗［音拂］縷，葉*褕[音臾]，毳也[音脆.皆謂物之行*敝也]。荊揚江湖之間曰揄鋪，楚曰艦甌，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帗縷，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褕［今名短度*絹為葉*褕也］。



「葉褕」の意味は「（物が）もろく壊れやすいさま」、推定音形は、後漢*jap 入 jo 平・上古*lap(/lep)　lo である。

「葉褕」の「褕」は宋刊本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版本で「輸」に作るが、戴震『方言疏

證』が「褕」に改めるのに従う[6]。「葉褕」という語形全体あるいはそれを構成する各形態素は、いずれも語源不明で、漢語文献の言語と結びつけることは難しい。母題「毳」が単音節であるのに対して複音節であるため、非漢語語彙である可能性も排除できない。ただし、この語彙はその音形をみると、「入声音節＋流音声母音節」であり、孫景濤(2008:116-131)の言う上古漢語の「裂変重畳」の形式に符合する。他地域の語彙の音形も「揄鋪」（後漢音 jo 平 pʰuɑ 平・上古音 lo pha）、「檻衊」（後漢音 lɑm 平 muɑ 平・上古音 râm ma）、「帗縷」（後漢音 pʰut 平 lio 上・上古音 phət roʔ）のように複音節であり、この条の語彙は「（物が）もろく壊れやすいさま」をリアルに描写するものであると推定される。そうであれば、孫氏が「裂変重畳」の機能として「意味の具体化(specialization)」（孫景濤 2008:109）があるというのと矛盾しない。漢語語彙の語構成構造を持つのであれば、漢語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ろう。

○「*嫳盈」

『方言』7 巻 18 条：*嫳盈［上已音］，怒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呵叱者謂之*嫳盈。

「嫳盈」の意味は「大声で叱る」、推定音形は後漢* kye 平 jeŋ 平、上古*kwe leŋ である。「嫳盈」の「嫳」は各刊本では「魏」に作るが、戴震『方言疏證』に基づいて改める[7]。「嫳盈」という語形或いはこの語形を構成する各形態素に対応する漢語は、前漢までの文献言語には見出し難い。戴震『方言疏證』は、「玉篇云「嫳，盛貌」則嫳盈為盛氣呵叱」として、『玉篇』の訓詁を根拠に、「嫳」を「盛氣呵叱」（激怒してどなりつける）と解釈するが、字書の訓詁ではない漢代以前の実際の文献上の用例の裏付けがなく、必ずしも説得的ではない。

しかし「嫳盈」の音形をみると、孫景濤(2008)のいう「裂変重畳」に符合する（孫景濤 2008:130 では「嫳盈」の例を挙げる）。「嫳盈」の意味が「具体化」のニュアン

---

[6] 戴震『方言疏證』が「葉輸」を「葉褕」に改めた根拠は、本条を踏まえた『玉篇』「葉褕，端度絹也」という条文が存在すること、さらに「輸」（後漢音形*śo 平、上古音形*lho）では、郭璞音「音臾（後漢音形*jo 平・上古音形*jo）と符合しないことである

[7] 戴震『方言疏證』は、まず『方言』2 巻 6 条の「魏，笙，摯，摻，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或曰徥。…」の「魏」について、字音が郭璞の音注「羌箠反」と符合せず、『方言』のこの条文を踏まえた『説文解字』『廣雅』の該当箇所では「嫳」に作る（『説文解字』「女部」「嫳，媞也。从女規聲。讀若癸。秦晉謂細為嫳」など）ことを根拠に「嫳」に改める。その上で、7 巻 18 条の「魏盈」の「魏」に郭璞の音注「上已音」とあるのが、2 巻 6 条のことを指すとして「嫳」に改める。なお、かりに「魏盈」に対応する推定音形を示せば、後漢*ŋui 去 jeŋ 平・上古*ŋwəih(/ŋwəis) leŋ になる。

スを含むものであるのかは疑いが残るものの、漢語の枠内で解釈可能な語彙に含めてもよいであろう。

4.4 漢語の枠内では解釈が難しい語彙

本稿の調査では、以下の 1 例しかない。

○「傑傞」

『方言』7 巻 10 条：傑傞，罵也［羸小可憎之*兒也。傑,音*邛竹］。燕之北郊曰傑傞。

「傑傞」の意味は「罵る」、推定音形は、後漢*guoŋ 平 zioŋ 平・上古*goŋ s-loŋ である。「傑傞」という語形或いはこの語形を構成する各形態素に対応する漢語は、前漢までの辞書以外の文献には容易には見出し難い。

王念孫『廣雅疏證』は、『廣雅』「釈詁三」「傑傞，罵也」に関して「『方言』「儓，賤，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又云「庸謂之傞，轉語也」義與「傑傞」亦相近」[8]と指摘する。「傞」を「庸」（卑賤な者、後漢音形*joŋ・上古音形*loŋ）の方言変異形と理解し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が、「傑」に「罵る」意味があることを証するに足る根拠があげられておらず、俄には従い難い。

ただし、「傑傞」の音形をみると、前後の音節の主母音と韻尾が一致しており、何らかのタイプの漢語の重畳語形である可能性もある。もし条文全体の意味を、郭璞注「羸小可憎之*貌也。」[9]（痩せて小さく嫌悪されるようなさま）のように解釈すれば、意味的には、状態をリアルに描写する「裂変重畳」（孫景濤 2008）である可能性も考えられる。しかし、「裂変重畳」は第一音節が陽声韻であるものは含まれないために（孫景濤 2008:134）、「傑傞」の語構成を「裂変重畳」の重畳形式と解釈することは難しい。現段階では、漢語の枠内では合理的な解釈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考える。

5. 結論

本稿では、『方言』の｛北燕｝｛朝鮮｝に分布する語彙について、意味と音形を推

[8] この箇所の『方言』の引用文は、それぞれ 3 巻 46 条と 3 巻 47 条である。

[9] ただしこの箇所の郭璞注は、周祖謨(1993)の底本では「羸小可憎之名也」に作るが、その注で『玉篇』の「傑」条に「形小可憎之貌」とあることなどを指摘した上で、『方言』の当該の郭璞注の「名」は「貌」（＝貌）の誤りではないかと述べる。本稿もこれに従う。

定した一覧表を提示した。その上で、初歩的な分析を加え、以下のような結論を得た。

①｛北燕｝｛朝鮮｝は、他地域の諸地域とは言語的関連性が少なく、独自性が強い。この傾向は、とりわけ二地域に跨って分布する語彙について顕著にみられる。

②｛北燕｝｛朝鮮｝の語彙は、そのほとんどが（59 語）、漢語語彙と認定し得る語彙か、漢語の枠内で解釈可能な語彙である。

③ただし｛北燕｝｛朝鮮｝のなかには、漢語の枠内では解釈が難しい語彙もわずかながら（1 語）存在する。

二点補足しておきたい。②については、揚雄が方言語彙を蒐集した際、長安に集まった各地域出身の官僚から聞き取りを行ったこと（揚雄『答劉歆書』参照）に起因すると考える。『方言』所収の語彙は、必ずしも当該地域の民衆の言語を直接反映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よって本稿の結論は、｛北燕｝｛朝鮮｝地域の一般の人々が、漢語を使用していたことを直接に意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③については、本稿で「漢語の枠内で解釈し得る」としたもののなかにも、非漢語系語彙が存在する可能性も否定できないであろう。今後は、アルタイ系・ツングース系言語・朝鮮語などの研究者との連携が必要である[10]。

参考文献

伊藤英人 2021「濊倭同系論」,『KOTONOHA』第 225 号，pp.1-70.

佐藤進 1998「揚雄『方言』究導論」,『現代中国語学への視座』（新シノロジー 言語編，pp.123-144，東京：東方書店.

松江崇 1999『揚雄《方言》逐条地図集』，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4 分冊：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暁.

〔清〕戴震《方言疏證》；戴震研究会編.1997《戴震全集》五巻，pp.2304 -2487，北京：清華大学出版社.

丁啟陣 1991《秦漢方言》，北京：東方出版社.

[10] 朝鮮語学の専家である伊藤英人氏は、『方言』所収の｛朝鮮｝語彙一覧（筆者の口頭発表の原稿。｛北燕｝語彙は未掲載）を閲覧後、「来源不明のそれらの語が Japonic 或いは Koreanic の語と類似を示すことはない」（伊藤 2021:10）と指摘する。伊藤氏の指摘は、｛朝鮮｝語彙についてだけのものであるが、本稿が「漢語の枠内では解釈が難しい語彙」としたものなどを、実際に非漢語系言語の特定の語彙と結びつけるのは、容易ではないであろう。

華學誠他 2006《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李敬忠 1987《《方言》中的少數民族語詞試析》,《民族語文》1987 年第 3 期.
林語堂 1927《前漢方音区域考》;《語言論叢》pp.16-44, 上海：開明書店，1933.
劉君惠他 1992《揚雄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濮之珍 1966《《方言》母題重見研究》,《中國語文》第 1 期，pp.30-33.
松江崇 2006《漢代方言中的同言線束－－也談根據方言的方言區劃論》，華學誠他 2006《揚雄方言校釋匯證》，pp.1509-1533.
松江崇 2013《浅談揚雄《方言》中的語言層次問題－以“江淮”方言為例》，曹志耘主編《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pp.295-305.
孫景濤 2008《古漢語重疊構詞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孫玉文 2011《揚雄《方言》折射出的秦漢方言》,《語言學論叢》44;《上古音論叢》，pp.402-443，2015.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張其昀點校《廣雅疏證》(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
遠藤光暁 1998《従編集史的角度剖析揚雄《方言》》,《語文攟英－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寿辰学術論文集》,pp.153-26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周祖謨 1993《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Serruys, Paul L.-M. 1959.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Words Recorded for the Beiyan or Chaoxian Dialects in the *Fangyan*

MATSUE, Takashi
Kyoto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ld Chinese words recorded in the *Fangyan*, compiled by Yang Xiong, who lived in the late Former Han period, and more specifically investigates 60 regional words recorded as being distributed in Beiyan or Chaoxian. First, a list is

compiled illustrating these 60 regional words, on which basis we examine the meanings and reconstruct the sound forms of these words. Second, based on this list, two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are adduced: (i) The words distributed in the Beiyan or Chaoxian dialect generally do not occur in other dialects; and (ii) most of these words can be presumed to be old Chinese words.

再論秦文字系統中的「於」

——試談秦與六國書面語的接觸影響秦文字書寫的一例

宮島和也
成蹊大學

内容摘要：本文討論的是秦文字系統當中「於」字字形、用法的特徵及其形成的原因和過程。本文認為，用「烏」字記錄介詞{yu}這個用字習慣首先是在秦國以外的東方地區產生的，在「烏」字形體逐漸變成「於」之後，傳播到秦國，使用在書面語書寫當中。結果秦文字系統中「於」「烏」在字形上没有聯繫，成為不同的兩個成員，且功能上有所分工。這反映出戰國時代秦國書面語演變的複雜過程。

一、前言

本文討論秦文字系統當中「於」[1]字字形、用法的特徵及其形成的原因和過程，以試圖揭示出戰國時代各地書面語之間的接觸以及由此帶來的變化。第二節描述秦文字「於」的特徵以指出問題所在；第三節對比秦和秦以外的東方六國文字系統中的「于」「於」「烏」等相關字及其用法；第四節解釋秦文字「於」的諸特徵形成的原因和過程；第五節談談西漢時代出土簡帛資料中用「於」來記錄{嗚}這個用字的現象或許是戰國時代東方地區用字的遺留。本文所討論的雖然是一個文字上的細節問題，但對於了解中國古代書面語的複雜性應會有所啟發。

二、秦文字「於」的特徵

宮島和也（2015:125）、（2017:350）曾指出過，秦簡[2]中的「于」和「於」的分布，在律令條文、行政文書等官方文書中與被學者們認為包含其他地域因素的秦簡中，是

[1] 下面「X」表示字形、{Y}則表示某個字形所記錄的詞或義項。
[2] 本文"秦簡"一語包括統一前後的秦國簡牘資料。其實需要注意的是，秦統一六國前後在書面語上有所變動、調整（參見大西克也，2013）。

很不一樣的，後者中「於」字多見。表 1 是官方文書中「于」和「於」的分布情況，即使是在楚國故地等地方抄寫的文獻，這種文獻的語言應當體現的是當時秦國標準書面語的面貌。[3]雖然睡虎地秦簡《南郡守騰文書》[4]未見「于」，但仍然可見這些官方文書類型的文獻中「于」比較多這個傾向；關於表 2 所列舉的文獻，則已有研究者指出過其包含楚國或六國的因素[5]，這種文獻裡「於」比較多。這個情況似乎暗示秦簡中「於」的分布情況與文獻的性質有關[6]：

表 1：秦簡官方文書中「于」「於」之分布[7]

	睡虎地秦簡				龍崗秦簡	嶽麓秦簡			里耶秦簡
	效律	法律答問	秦律十八種	南郡守騰文書		為獄等狀四種	數	秦律令（壹）-（參）	
于	1	5	5	0	4	2	1	29	8
於	1	1	2	6	1	0	0	5	2

表 2：含有非秦因素文獻中「于」「於」之分布[8]

	睡虎地秦簡			嶽麓秦簡	放馬灘秦簡			北大秦簡
	為吏之道	日書・甲	日書・乙	占夢書	日書・甲	日書・乙	丹	魯久次問數于陳起
于	0	4	0	0	1	7	1	1
於	2	28	7	6	0	13	1	1

[3] 參見大西克也（1998:7-8）、（2006:148-149）。

[4] 陳侃理（2015）主張應該把睡虎地秦簡中整理者所謂《語書》的簡 9-15 編連在《為吏之道》後面。本文從此說，此處所說的《南郡守騰文書》是指整理者所謂《語書》的簡 1-8。

[5] 參見大西克也（2006）、（2013:130、147 注 15）、（2014:18-19），田煒（2016b）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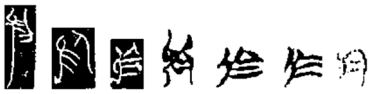
[6] 下表 1、2 針對宮島和也（2015）、（2017）所做的統計進行了一些修正，且加上後來所發表的新材料之統計結果，因此與宮島和也（2015）、（2017）的統計有所出入；表 1、2 中不舉未見「于」「於」的文獻。

[7] 需要注意的是里耶秦簡包括書信類簡牘，其中可見與秦國官方文書語言不合的一些特徵（參見宮島和也，2018:118）；里耶秦簡 9-1884 還見 1 例「于」，但因為此簡是習字簡，未歸入統計中。

[8] 除了表 1 和 2 所舉的例子以外，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有 2 例「於」（簡 46、52），未見「于」。《為吏治官及黔首》內容與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有關（參嶽麓書院藏秦簡整理小組，2010。但陳侃理，2015：255-256 認為有可能兩者的性質不同），或許可以歸入表 2 中。

在表 2 的文獻中，放馬灘秦簡「于」也比較多，這可能是因為放馬灘所處是秦國故地，所以更頑強地保留秦國的特徵[9]。

就「於」的字形本身來講，裘錫圭（1988:72）指出，楚文字和秦文字的「於」字形相似，存在秦國受到楚國的影響的可能性。後來郭永秉（2015:94）進一步為裘氏的看法作補充，他認為，「於」是從「烏」分化出來的，「於」在六國文字（如楚文字）中可以看到由「烏」到「於」演變的脈絡；然而秦文字中「烏」和「於」的聯系是模糊的、突變的，肯定不是自然的演變，有理由認定秦文字「於」受到六國文字的影響。此說頗有啟發性（下圖引自郭永秉，2015:94）[10]：

楚文字： 

秦文字：「烏」 /「於」

綜上所述，秦文字的「於」字，其特徵可歸納為：①秦簡中「於」的分布有所偏差；②秦文字「於」與楚國（或六國）文字的「於」字形相似；③秦文字中看不出「於」和「烏」字形之間的聯系。

宮島和也（2015:125-126、2017:350-351）主要根據如表 1、2 秦簡中「於」的分布情況和裘錫圭（1988:72）所說的楚文字和秦文字「於」字字形的相似性，加上戰國時代東方地區基本上用「於」的可能性很大[11]，推測秦國用「於」來表示介詞{yu}[12]可能是從東方地區傳播到秦國的習慣。我認為這種看法不失為一種解釋上述①②③三點的可能的思路。然而就此觀點，特別是關於秦文字「於」字字形上的特徵，文章未能仔細討論；裘錫圭（1988）、郭永秉（2015）似乎都没有討論秦文字「於」受六國

[9] 大西克也（2010）指出放馬灘秦簡的用字與秦國官方書面語所使用的文字系統基本上一致。

[10] 郭永秉（2015:94）對此作如下描寫："秦隸'於'字左側類似'丩'或'从'之左半的形體，很清楚來自於烏頭部分和軀幹前部的訛變，這部分的訛變過程在戰國楚系文字中還能看得清楚（表示烏身和烏尾的三道横筆如何從整體脱落，簡化為兩横筆也非常清楚），但是在秦系文字中，這些緩解都是模糊的、突變的，甚至因為並非出於自然演變，'於'字左半直接變成了跟烏頭烏身毫無聯繫，並迅速向其他成字偏旁靠攏了"。

[11] 主要的依據是：戰國中晚期的楚國書面語基本上只用「於」，且可能保存了戰國時代中原地區語言面貌的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横家書》前半 14 章（參見大西克也、大櫛敦弘，2015:38）只用「於」。

[12] 本文據宮島和也（2015）、（2017）認為「于」「於」是同一個詞的不同記錄形式，以下没有特別的需要時用{yu}來代表這兩個字所記錄的介詞。

文字影響的具體情況，因此本文試圖重新進行探討。

三、六國文字和秦文字的「于」「於」「烏」等相關字之對比

正如已有的不少研究指出的那樣，從古文字資料來講，介詞{yu}本來是用「于」來記錄的，早已見於甲骨文中[13]：

（1） 貞：作大邑于唐土。（《合集》40353 正）

「烏」則表示{烏}{嗚}[14]，據風儀誠（2007:82 注 3），「烏」用為表示嘆詞{嗚}的最早例子見於西周早期的何尊：

（2） 烏（嗚）虖（呼），爾有雖小子亡識，視于公氏，有庸[15]于天，徹命，敬享哉。（《集成》6014）

而東周以後可見「於」（「烏」）表示{yu}，目前在古文字資料中較早用「於」來記錄{yu}的例子是春秋中期的鄬鎛[16]：

（3） 世萬至於辟孫子，勿或渝改。（《集成》00271）

六國文字不區分「烏」和「於」[17]，可見（3）用「於」來表示{yu}實際上等於用「烏」來表示{yu}。也就是說，東周以後用本來表示{烏}{嗚}等的「烏」，來記錄{yu}而已[18]。再如（4）（5）係戰國楚簡的例子，「於」可表示{嗚}，亦可表示{yu}，并没

[13] 介詞{yu}是由表示移動的動詞語法化而來的，但甲骨文中已不見或極其罕見動詞用法的「于」（參見裘錫圭，2010/2012:527-538；户内俊介，2018：38-41 等）。
[14] 可以認定「烏」字為象形字，但在早期古文字中似乎未見用「烏」來表示{烏}的例子。
[15] 「庸」字釋讀參見裘錫圭（1980/2012：36 注②）、陳劍（2008）。
[16] 聞宥（1984:48 注 4）不贊同此器年代為春秋中期之說。
[17] 季旭昇（2014:310）云“「於」是由「烏」分化出來的字，先秦二字無別”。
[18] 參見田煒（2016b:258-259）；聞宥（1984:45）亦云“在使用上先作為嘆詞‘嗚虖’的‘烏’，再晚才用作介詞”。如下引聞宥（1984:46）等所說，「于」和「烏/於」讀音不同，此用字上的變化或許與語音變化有所關聯，宫島和也（2015）（2017）推測{yu}的合口性的消失促使以「烏/於」記錄{yu}這個用字的產生。

有字形上的區別[19]。與秦國文字相比，這是一個典型的六國文字的特徵：

（4） 於（嗚）乎！前王不忘。（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簡 6）[20]
（5） 關雎則以色喻於禮（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簡 10）[21]

並且如上舉（3），六國文字中用「於」（=「烏」）表示{yu}這個用字出現比較早，除了（3）以外還有春秋晚期的例子：

（6） 晉人救戎於楚境（ 鎛鐘，《集成》00038）[22]

與此不同的是，就秦文字而言，未見用「烏」來表示{yu}的例子。為了記錄{yu}，用「于」（7、8、9、10）或「於」（11）。然而從目前發表的資料看，在戰國末期的睡虎地秦簡之前，未見用「於」來記錄{yu}之例：

（7） 秦子之光，昭于□（夏？）四方（秦子姬簋蓋）[23]
（8） 吾以隮于邍（石鼓文）[24]
（9） 肇敷蠻夏，亟事于秦（秦景公石磬）[25]
（10） 使其宗祝邵馨布橂告于丕顯大神厥湫。（《詛楚文》）[26]

---

[19] 上博簡《弟子問》簡 4 有用「 」（引自馬承源，2005:102）表示{嗚}的例子，其字形比較古老、保守，似當隸定為「烏」：
烏（嗚）！莫我知也夫。
另外，上博簡《逸詩・交交鳴烏》、清華簡《赤 之集湯之屋》中用「鴮」表示{烏}，有可能在戰國中晚期的楚地有時候使用在「於（烏）」上加義符「鳥」的「鴮」字來記錄{烏}，以與表示｛嗚｝｛yu｝等的「於」區分開來（參見禤健聰，2017:337-338）。
[20] 釋文參見季旭昇（2009:77），有所調整之處。
[21] 釋文參見季旭昇（2009:39）。
[22] 據董珊（2012），此器是前 490、489 年的兩年間所製造的（但關於此器的年代，也有戰國中期之說，參見林清源，2003：16）。
[23] 引自董珊（2005:28）。董氏推測此器製作年代為前 703 年-前 698 年之間（董珊，2005:32）。
[24] 釋文參見徐寶貴（2008:808-809）。石鼓文年代歷來有不少討論，本文暫從徐寶貴（2008:654）之說，即春秋中晚期之際——秦景公時期（前 576 年至前 537 年）。
[25] 釋文參見王輝、焦南鋒、馬振智（1996）。此石磬中見“唯四年八月初吉甲申”一句，王輝、焦南鋒、馬振智（1996）認為這“四年”是指秦景公四年（前 573 年）。
[26] 關於《詛楚文》的真偽、年代，歷來有所爭論。陳昭容（2003：213-246）進行全面考察而論證《詛楚文》當不偽;且就其年代指出，由其內容來看秦惠文王後元十三年（前 312 年）之說是可信的，文字上也可以認為是戰國中晚期的秦地作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詛楚文》中

（11） 有債於公及貲贖者居它縣，輒移居縣責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76）

就{烏}而言，如果排除地名、人名，雖然字形不太清晰，但有一例可以確定用「烏」表示{烏}[27]：

（12）其黑如烏。（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簡 296）

在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中也可見表示與鳥名有關的{烏}，馬王堆帛書是從西漢早期的墓葬中所發現的，但《五十二病方》的抄寫年代有可能追溯到秦代[28]：

（13） 取牛胆、烏喙、桂，冶等，殽□灸以□病。（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67）

另外雖然不是表示與鳥名{烏}有關的詞，而表示訓為"何"的{烏}，但下例也是秦簡中「烏」的用例：

（14） 吾欲為怒烏=不=耐=（烏不耐，烏不耐），良久良久，請人一杯。（北大秦簡《酒令》木牘一）

就{嗚}而言，目前雖未見秦國資料中用「烏」來表示{嗚}的實例，但如上所述，西周、春秋金文等早期古文字用「烏」表示{嗚}，且一般來講秦文字比較保守，由此可以推測頗有可能秦文字也用「烏」表示{嗚}。雖然是漢代的資料，在北大漢簡《周馴》中也可見用「烏」表示{嗚}的例子[29]，這應該就是從秦文字裡沿襲下來的用字習慣：

（15）烏（嗚）呼！戒哉！尚勉承教，而謹慎勿慢。（北大漢簡《周馴》簡 89-90）

也有一些與秦國語言特徵不合的特徵（參見宮島和也，2018：119）。

[27] 王輝（2011:60）。

[28] 參見李裕民（1981）。

[29] 韓巍（2015:249）推測《周馴》的抄寫年代為漢武帝、昭帝之間。北大漢簡《周馴》也有用「於」來表示{嗚}的例子（詳下文）。

以上討論給我們的結論是，秦文字當中没有用「烏」來表示{yu}的例子，也未見用「於」表示{烏}{嗚}之例，與不區分「於」和「烏」的六國文字不同，秦文字中「於」和「烏」的分工很明確；並且用「於」來表示{yu}，與六國文字相比，在秦文字當中很有可能是時代較晚近才有的現象。

四、秦文字中「於」形成過程估測

根據上面所討論的情況，以下嘗試推測秦文字「於」的形成過程。我認為，很有可能用「於」(=「烏」) 表示{yu}的用字習慣先在東方地區出現，此時秦國文字中尚未出現此用字習慣，仍舊遵循傳統用「于」的習慣[30]：

	秦	六國
{烏}{嗚}	烏	烏
{yu}	于	于 /烏

秦文字和六國文字的「烏」字應當都源於以西周金文代表的西周文字正體這個共同祖先（16），其字形應該本來很相似。秦文字「烏」的字形很傳統、規整[31]，相比西周金文而言，其變化不那麼厲害（17）；但六國（如楚國）文字的「烏」，至少到戰國中晚期在形體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結果演化出「於」形（18）：

（16） 西周金文[32]： （沈子它簋蓋，西周早期） (毛公鼎，西周晚期)

（17） 秦文字： （秦印）[33] （北大秦簡《酒令》木牘一）[34]

（18） 楚文字：[35] （鄂君啟舟節） （包山楚簡 簡 16）

[30] 據研究，上古漢語方言也呈現出東西對立。比如大西克也（2006）指出戰國時代在語法上秦國與其他六國之間有對立；松江崇（2006）用揚雄《方言》的詞彙做方言地理學研究，指出當時漢語方言是以東西對立為主的，秦晉和代（趙）之間存在較明顯的界限，但是楚－陳－宋－魯－齊的彼此間有連續性。

[31] 郭永秉（2015:94）。

[32] 引自董蓮池（2011:453-4）。

[33] 引自王輝（2015:617-8）。

[34] 引自李零（2015:18）。

[35] 引自李守奎（2003:246）。

用「烏」記錄{yu}這個習慣首先在東方地區產生，且六國文字的「烏」逐步變成「於」形，在這種情況下秦國接受六國文字的「烏」（=「於」）記錄{yu}的用字習慣的話－－可注意如上述目前秦文字資料中「於」是戰國末期突然出現的－－對於秦文字來說「於」（即六國文字的「烏」）與秦文字本身的「烏」形體截然不同，是看不出兩者之間的關聯的。結果造成秦文字中「烏」和「於」成為不同的兩個字，在其文字系統當中增加了一個成員「於」，並且秦文字系統當中呈現出互相分工的情況，即「烏」表示{烏}{嗚}、「於」表示{yu}：

	秦	六國
{烏}{嗚}	「烏」	「於」＜「烏」
{yu}	「于」／「於」 ←	「於」＜「烏」

也就是說，在六國文字系統當中「烏」和「於」没有區別，「於」就是從「烏」演變過來的簡省寫法，對六國文字來說，「於」完全與「烏」等同，不是兩個字，且{烏}{嗚}{yu}都可以用此字（「於」=「烏」）表示；但對秦文字來說，「於」字是六國文字「烏」變成「於」形之後傳播到秦國的結果，「於」和「烏」的形體全然不一樣，在其文字系統當中作為兩個不同的成員共存，且其用法有所分工。[36]田煒（2016a:258）云"'烏''於'二字本是一對狹義的異體字。……在秦漢文字中，'烏''於'這一對異體字出現了分化，'於'字用於表示介詞{于／於}，而'烏'字則表示'孝鳥'、'黑色'等意義的{烏}"；如果本文看法屬實，雖然六國文字中「烏」和「於」確實是異體字，但實際上在秦文字中，「烏」「於」就其來源而言，並不是異體字的關係。秦漢以後「烏」「於」的"分化"也是由上述特殊情況所帶來的。

這種現象類似於在某一個語言中的同源異形、異義的詞——雙式詞（doublet），即源於同一個來源的兩個詞，由於某種原因（如借入時間的不同）作為形態、語義不同的詞共存在某一個語言中[37]。秦文字系統當中「烏」「於」似是一種"雙式字"。

若據此再推測，如上舉裘錫圭（1988:72）所指出的那樣，秦文字和六國文字「於」相似，是因為秦文字的「於」這個字源自「烏」的六國文字的寫法，即秦文字和六國文字「於」字形相似可能不是因為本來在秦文字裡已有簡化的「於」，進而受到六國

[36] 也有可能秦國語言中介詞的「於」和「烏」的讀音不同。

[37] 譬如英語的 shirt 和 skirt 是同源詞，然而後者是從古諾斯語借入到英語的，結果兩者在英語中成為形態、語義不同的兩個詞了（參見龜井孝、河野六郎、千野榮一，1995:1036-7）。

文字的影響形成的，而是「於」字本身就是從東方地區借用過來的。

聞宥（1984:46）根據當時他能看到的金文資料中「於」都見於在東海岸一帶（如齊國）所製造的、時代較晚的器物上，所以認為：“可見‘于’是歷史悠久而且是全國通行的文字，而‘於’則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才出現於東海岸一帶的地方文字。這個地方文字原來並不作介詞用，後來為了在東方口語裡讀音和‘于’相近，所以也借作介詞用。再接下去，由於儒家經典都是由齊魯一帶的儒生傳寫開來的，所以這個東方的‘於’字愈用而愈廣”，其思路似與本文有相近之處。我認為，因為「於」也見於楚、三晉等地的資料，難以斷定「於」最初出現於東海岸一帶、其推廣與儒家經典有無關係，「於」字的產生時代也有商榷的餘地。然而就秦國和其他東方地區之間的關係來講，聞先生所說，是文化交流使得「於」傳入到秦國，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於」傳入秦文字裡，頗有可能與當時秦國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與東方國家相比，秦國文化很保守或者相對“落後”，本來與東方國家交往應當不那麼頻繁[38]。而公元前 4 世紀中葉，秦國進行變法，急速改革政治體制。這時期的秦國從東方地區接受的東西，不但有與法律、行政有關的內容，在文學、思想等文化方面上亦應當同時有之。秦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也不斷地吸收融匯了各地文化。實際上，據梁雲（2007）、（2020:5-6），考古學研究表明在戰國中期秦文化發生巨變。梁雲（2020:5-6）云：

> “秦文化在戰國中期發生了跳躍式的巨變，此前此後像兩個文化，脫胎換骨。除了葬俗沒變，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銅器在內全部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戰國中期之後，秦文化有大量東方色彩，青銅器和三晉的銅器看起來很像，但和之前的銅器在發展脈絡上不銜接。這種文化跳躍式發展的現象，我稱之為文化發展的斷裂。它發生在商鞅變化之後，在東周列國中是獨一無二的。東方其他列國的文化是連續性的發展，從器物的演變來看，舊器物的消失和新器物的產生是此消彼長的，是漸變式的；秦文化卻發生突變或巨變。”[39]

另外，海老根量介（2012:168-169、2014）從其內容、用字、詞彙等來推測放馬

---

[38] 《史記・秦本紀》“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參看王輝、陳昭容、王偉（2016：406）以及張蔭麟（2012:102-103）。

[39] 甚為有趣的是，戰國中期在秦國青銅器、陶器等上所發生的巨變，恰恰與本文所討論的「烏」「於」相似。也就是說，如上所述，秦文字中的「烏」和「於」字形上是非連續性的突變；東方六國文字當中「烏」到「於」的演變則是連續性的、漸變性的。

灘秦簡的所謂《鐘律式占》[40]及《日書》中的《盜者》篇[41]很有可能源自三晉（魏國）；海老根氏也指出，不光是《日書》，由文獻記載可見秦與魏在法律制度上也有密切的關係，如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包含魏律（注意《為吏之道》只見「於」），《晉書・刑法志》有魏國李悝編《法經》而商鞅將它帶到秦國的記載。

我認為頗有可能是在這種背景下，秦國書面語接受了其他地區文字的書寫習慣[42]，「於」當是其中一個例子。如本文第二節表 2 所舉的文獻那樣，在秦簡中與六國有關的文獻「於」比較多，這並不是偶然的，頗有可能體現出這種書面語上的交流。雖然如海老根氏所指出的，秦與魏在法律上有關係，但本文第二節表 1 所舉的法律文獻中「於」比較少，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秦國公文書會更頑強地保留秦國本來的習慣[43]。

五、西漢出土文獻中的「於」—{嗚}

漢代出土文獻中也可見用「於」來表示{嗚}的例子[44]，如：

（19）於（嗚）呼危哉！得主之哉！（馬王堆帛書《九主》34/385）
（20）於（嗚）呼慎哉，神明之事，在於所閉。（馬王堆竹書《天下至道談》7-8）
（21）於（嗚）呼！謀念哉！（銀雀山漢簡《六韜》677）
（22）於（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余故畢告汝於得國失國，廢興之所以。（北大漢簡《周馴》簡 135）

就（19），《九主》的著作年代被推測為戰國中期[45]，馬王堆帛書《九主》中可見六國文字寫法的痕迹（如「法」寫成「企」）[46]；例（21）銀雀山漢簡《六韜》，出土於齊國故地且其內容與齊國密切相關；例（22）北大漢簡《周馴》，雖然是漢代文獻，但韓巍（2015:254-256）認為其文本形態在戰國晚期已經基本定型，也能見到一些似

[40] 程少軒（2011）。
[41] 是指根據地支占卜與盜人有關內容的簡牘，如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簡 30-41、《日書・乙》簡 66-77、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簡 69-80 等（參見海老根量介，2014：21-22）。
[42] 大西克也（2013:138）推測，秦國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接觸其他地區的書面語，這促使反思秦國本身的書寫系統，進行秦國內部書面語系統的調整和改正。
[43] 還有宮島和也（2015）（2017）認為秦國文獻「于」比較多，與其使用{yu}的頻率低有關。
[44] （19）-（21）的用例參見白於藍（2012：262）。白氏還舉馬王堆帛書《九主》46/397，銀雀山漢簡《六韜》簡 691、696，以及《六韜》殘簡的例子。
[45] 參見齋木哲郎（2007:xx-xxi）。
[46] 參見凌襄（1974:25）、裘錫圭（2014：第貳冊 101）。

隸定六國古文寫法的例子；例（20）《天下至道談》，裘錫圭（2014:第陸册 164、170）指出書中可見一些與楚文字寫法相合的文字[47]，這些證據雖不足以作肯定性的斷定，但我認為其文本也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在楚地流傳的文獻。由此推測，（19）—（22）所見的用字，有源自六國文字習慣的可能性。秦漢以後「於」表示{嗚}這個用字似與先秦東方地區有密切的關係[48]。

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所舉的例子似未能代表漢代資料的全部情況，並且西漢邊地遺址以外的墓葬多屬於六國故地，由在秦故地的西漢墓葬所出土的古書數量很有限。因此此說目前還不能斷定，在此附帶一提。

六、結語

通過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六國文字「烏」變成「於」形後，作為表示{yu}的用字「於」傳播到秦文字裡，結果秦文字系統當中「烏」和「於」成為在字形上沒有聯繫的兩個不同的成員，並且用法上也有區別了；秦文字和六國文字字形相似，也是因為秦文字由這樣的途徑借用六國文字「於」。秦文字中的「於」字以及「於」和「烏」之間的關係體現出秦國書面語複雜形成過程的一個側面。

其實本文中包含了一些假定和推測，比如，秦文字用「於」表示{yu}的最早例子見於戰國末期的睡虎地秦簡中，與本文所提出的六國文字「烏」變成「於」形後傳播到秦國這個假說雖然相合，但此前的秦國文字資料還不是很充分，因此也有可能我們現在的知識尚處於"缺環"的狀態，希望以後有新的資料出現，能檢驗或修正我們的結論。

附記：本文曾在"中國古代文獻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 年 9 月 21-22 日，西北大學）上宣讀過，承蒙與會學者的指正；大西克也教授、郭永秉教授審閱本文初稿並提出寶貴意見；寫作過程中也得到羅盛吉先生的幫助，在此謹致謝忱。

[47] 裘錫圭（2014：第陸册 164）云"楚文字「天」寫法與之（引者按：即簡 6「天」字）同，此當是受楚系抄本的影響"； 裘錫圭（2014：第陸冊 170）云簡 50「百」"與楚文字寫法相合"。

[48] "於陵"、"商於"等地名現在寫成「於」，也許與六國用字習慣有關。"於陵"在原來的齊地；"商於"之地雖然在戰國時代屬秦國，但與楚國密切相關，位於秦、楚的邊界（參看程恩澤《國策地名考》、錢穆《史記地名考》）。有可能這些「於」源自六國文字寫法的「烏」，秦漢以後的人直接"隸定"其地名而傳至今。

参考文献

白於藍 2012《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建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2015《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參）》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劍 2008《金文字詞零釋（四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 月 5 日

陳侃理 2015《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應更名“語書”：兼談“語書”名義及秦簡中類似文獻的性質》《出土文獻》6:- 246-257

陳偉（主編）2014《秦簡牘合集》武漢大學出版社

陳昭容 2003《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清）程恩澤《國策地名考》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 1991 年版

程少軒 2011《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大西克也 1998《「殹」「也」の交代：六國統一前後に於ける書面言語の一側面》,《中國出土資料研究》2：4-24

大西克也 2006《戰國時代の文字と言葉：秦・楚の違いを中心に》,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編《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146-174，雄山閣

大西克也 2010《放馬灘秦簡用字的幾個特點》,《第二十一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75-392，東吳大學， 4 月 30 日-5 月 1 日

大西克也 2013《秦の文字統一について》, 渡邊義浩編《中國新出資料學の展開》127-149，汲古書院

大西克也 2014《嶽麓書院秦簡をめぐって：赤外綫スキャンと『占夢書』》,《書法漢學研究》15：13-19

大西克也、大櫛敦弘 2015《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　戰國縱橫家書》東方書店

董蓮池 2011《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

董珊 2005《秦子姬簋蓋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6：27-32

董珊 2012《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釋》,《江漢考古》3：87-94

風儀誠 2007《戰國兩漢“於”、“于”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2：81-95

宮島和也 2015《戰國楚・秦における前置詞「于」「於」をめぐって》,《中國語學》262：114-133

宮島和也 2017《從戰國楚簡、秦簡來看上古漢語的“于”與“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341-352，中西書局

宮島和也 2018《試論合音詞“諸”在出土文獻中的分佈及其含義》,《東洋文化》98：

113-128
龜井孝、河野六郎、千野榮一 編 1995《言語學大事典 第 6 卷 術語編》三省堂
郭沫若（主編）1982《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
郭沫若 1982《詛楚文考釋》,《郭沫若全集》第九卷 275-342，科學出版社
郭永秉 2015《談談戰國楚地簡冊文字語秦文字值得注意的相合相應現象》,《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2 月 12-13 日
海老根量介 2012《放馬灘秦簡钞寫年代蠡測》,《簡帛》7:159-170
海老根量介 2014《「盜者」篇からみた「日書」の流通過程試論》,《東方學》128：21-38
韓巍 2015《西漢竹書〈周馴〉若干問題的探討》，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參）249-298，上海古籍出版社
戶內俊介 2018《先秦の機能語の史的發展－上古中國語文法化研究序說》研文出版
季旭昇 2014《說文新證》藝文印書館
季旭昇（主編）2009《〈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零 2015《北大藏秦簡〈酒令〉》,《北京大學學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16-20
李守奎 2003《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李裕民 1981《馬王堆漢墓帛書抄寫年代考》,《考古與文物》4：99-101
梁雲 2007《從秦文化的轉型看考古學文化的突變現象》,《華夏考古》3：103-113
梁雲 2020《西垂有聲：〈史記・秦本紀〉的考古學解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林清源 2003《楚國金文資料分期彙編》,《興大人文學报》33：115-148
凌襄 1974《試論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文物》11：21-47、44
馬承源 2005《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錢穆《史記地名考》商務印書館 2001 年版
裘錫圭 1980/2012《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鞉”》,《裘錫圭學術文集》第 1 卷 36-50，復旦大學出版社
裘錫圭 1988《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
裘錫圭 2010/2012《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裘錫圭學術文集》第 1 卷 527-551，復旦大學出版社
裘錫圭（主編）2014《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華書局
松江崇 2006《漢代方言中的同言綫束：也談根據方言的方言區劃論》，華學誠等《揚雄方言校釋匯證》1509-1533，中華書局
田煒 2016a《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田煒 2016b《談談北京大學藏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的一些抄寫特點》,《中山大學學报（社會科學版）》5：45-51
王輝 2011《〈天水放馬灘秦簡〉校讀記》,《簡帛》6：55-68
王輝（主編）2015《秦文字編》中華書局
王輝、陳昭容、王偉 2016《秦文字通論》中華書局
王輝、焦南鋒、馬振智、1996《秦公大墓石磬殘銘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2：263-321
聞宥 1984《"于""於"新論》,《中國語言學報》2：44-48
徐寶貴 2008《石鼓文整理研究》中華書局
禤健聰 2017《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科學出版社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1985《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
嶽麓書院藏秦簡整理小組 2010《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
張蔭麟 2012《中國史綱》中華書局
齋木哲郎 2007《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 五行・九主・明君・德聖－〈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東方書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7《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formation of "於" in the Qin (秦) writing system: Case study of a contact between written languages affecting Qin (秦) writing

Kazuya MIYAJIMA
Seike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usage of the character "於" in the Qin (秦) writing system.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u* "烏" came into use through a phonetic loan to express the preposition *yu* "于"; however, this may only have happened in the writing systems of eastern regions not including Qin (秦). Thereafter, the character "烏" transformed into "於" in the writing systems of eastern regions and subsequently came into use in the Qin (秦) writing system. Consequently, we can no longer se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s "烏" and "於" in the Qin (秦) writing system, and the two characters began to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e Qin (秦) writing system.

殷代单位词刍议

户内 俊介
二松学舍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殷代甲骨文和殷金文中有哪些单位词(measure word)。本文的结论是：集体量词有“丰、朋、丙”，容器量词有“卣”，殷代至少有这四个单位词。本文还认为殷代的单位词基本属于名词。

一、引言

什么是量词呢？要确定它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容易。在类型学上，量词也被称为类别词(classifier)。Aikhenvald (2000：13)把类别词定义为：

> Classifiers are defined as morphemes which occur ‘in surface structures under specifiable conditions’, denote ‘some salient perceived or impu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ity to which an associated noun refers’ (Allan 1977：285), and are restricted to particular construction types known as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are understood as morphosyntactic units (which may be noun phrases of a particular kind, verb phrases, or clauses) which require the presence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a morpheme, the choice of which is dictated by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erent of the head of a noun phrase.
>
> 〔类别词被定义为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在表层结构中的语素，表示相关名词所指实体的一些突出的感知特征或归属特征(Allan 1977：285)，并被限制在称为 "类别词结构 "的特殊结构类型中。类别词结构被理解为形态句法单位(可以是特定种类的名词短语、动词短语或小句)，需要有特定种类的语素存在，其选择是由名词短语的中心语所指的语义特征决定的。〕

也就是说，从类型学来看，计数和计量不一定是类别词的主要功能。根据Aikhenvald (2000)的考察，承担计数、计量功能的量词这一语法范畴相当于数量类别词(numeral classifier)，是类别词的一个子类。

现代汉语无疑是一种具备量词系统的语言。正如贝罗贝(1998：99)所述，量词是由句法分布来定义的，即“在理论上是必须放在名词前面，且在指示词或／及数词后面。”然而，光是这个定义未必辨别得清楚个体量词和单位词 (measure word，或称为量度词)的不同。单位词是对非个体和非离散事物的计量概念，即度量衡量词(长度、重量、体积、面积等单位)、集体量词(作为单位的群体)、容器量词(作为单位的容器)等，必须在语义上与个体量词区分开来。个体量词是对个体和离散事物的计数概念。

当然，还有一种立场是设置“广义的(数量)类别词”，将个体量词与单位词视为类别词的子类。例如，Lyons (1977：463)将类别词结构(classifier-construction)分为两类：分类类别词(sortal classifier)和计量类别词(mensural classifier)。前一个类别词是根据名词所指的天然属性分类，如有生、形状，表示事物所属的类(张赪 2012：15)，相当于个体量词；后一个则是根据事物的数量和暂时的物理状态(如排列顺序)分类，表示事物的量(张赪 2012：15)，相当于单位词。

然而单位词的定义并不符合本文开篇所举出的类别词定义，即“表示相关名词所指实体的一些突出的感知特征或归属特征”。因此有些学者指出，必须把单位词看作跟类别词不同的语法范畴[1]。

再者我们应该注意到，单位词常见于世界各地的语言中，而个体量词主要分布于汉语以及其他汉藏系语言中。贝罗贝(1998：117)据此认为个体量词才是纯正的量词，张赪(2012：1)也只根据个体量词探讨了汉语量词的形成机制。因此本文也把个体量词和单位词分开讨论。

那么，汉语里的个体量词范畴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对这个问题主要有如下两个观点。

第一，刘世儒(1965：5)说：“这种量词(即个体量词：笔者注)[2]虽然在南北朝以前就逐渐出现，但真正形成一种稳定的范畴则是到了南北朝时代的事。”郭锡良(2005：36)也持有这一观点，并说：“到了魏晋以后，名词变得不能直接同数词结合了，中间必须加上一个单位词(即个体量词：笔者注[3])；而单位词却总是直接同数词结合成数量结构，用作句子中的一个成分。这时单位词和一般名词的语法功能、语法作用有了明

[1] 比如，Tai (1994：481)说：“However,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ategorization in a classifier system, it is not only desirable but also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classifiers from measure words.…In simple term, while a classifier is used to ‘categorize’ an object in reference to its salient perceptual properties, a measure wor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quantity of an object or a collection of objects.” Gil (2005：226)也将计量类别词排除在类别词之外。

[2] 刘文把个体量词称为陪伴词。

[3] 郭文据王力(1990)把个体量词称为单位词。

显的区别，才能说单位词已经从名词中分化出来，成了独立的一类词——量词。”

后来有些学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个体量词的使用尚未成规范，其范畴的完全成熟应该是唐代以后。持这一观点的有贝罗贝(1998)、吴福祥(2007)、张赪(2012)、李计伟(2017)等。比如吴福祥(2007：258)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量词范畴整体上还显示较低的语法化程度，量词范畴的完全成熟应该是唐代以后。”这是第二个观点。

这些观点无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都以“管后”的立场为前提。“管后”就是指以个体量词与名词完全分离为名量词成立的标准(姚振武 2015：156)。也有一种立场以个体量词与名词分离的开始点为个体量词成立的标准，姚文把它称为“管前”。姚氏从“管前”的立场出发，认为个体量词殷商时期仅露端倪，东周以后走向发展成熟时期(姚振武 2015：11)。

有些学者从“管前”的立场出发，认为甲骨文就有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芽。持有这一观点的，除了姚振武(2015)以外，还有管燮初(1953)、陈梦家(1988)、黄载君(1964)、Kryukov (1980)、Wang (1994)、Ito & Takashima (1996)、李宇明 (2000)、张玉金 (2001)、李曦(2004)、Campbell (2004)等。而也有些学者仍然认为甲骨文还没有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芽。持有这一观点的，有游顺钊(1988)、王力(1990)、沈培(1992)、贝罗贝(1998)等。他们均认为个体量词在西周以后才产生。

采取前者立场的许多学者认为，甲骨文的〈名词 1+数词+名词 2〉格式中(比如“贝一朋”、“马二丙”、“羌十人”、“伐十羌”等)的〈名词 2〉基本上是量词。尤其关键的量词是“丙”，黄载君(1964：432)从“丙”是计马的个体量词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殷商时期就有个体量词。但正如后文所述，“丙”不是个体量词，而是集体量词。笔者目前倾向于后者的观点，认为甲骨文还没有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芽。

笔者的最终目的在于阐明殷商汉语[4]中是否有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芽这一问题，换言之，笔者想探究构成〈名词 1+数词+名词 2〉的数量表达中，〈名词 2〉仍然是名词还是已变为个体量词。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准备工作，本文拟梳理殷商时期的单位词(即集体量词、容器量词和度量衡量词)，以便把个体量词和单位词分开讨论。

贝罗贝(1998：102)和姚振武(2015：124—125)等学者说，甲骨文中单位词的出现一律采取〈N+Num+MW〉[5]，即〈名词+数词+单位词〉的格式[6]，因此本文只以用于这

[4] 本文所言的殷商汉语就是殷代甲骨文和殷金文中所反映的一种语言。

[5] “MW”是“measure word”的简称。

[6] 先秦汉语中有〈名词+数词+单位词〉和〈数词+单位词+名词〉两种形式。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390—395)主张，前者是真正的计量性数量结构，大都出现在“清单”类语域(register)；后者的功能是描写(或定性)而非计量，这类格式大多出现在论证体语域里。同时，

种格式中的单位词为调查对象，不用于这种格式中的则不包括在调查范围之内。比如，殷人时常用牛胛骨进行占卜，在甲骨文中把左右一对的胛骨称为“ （屯）”，有些学者把它看作是计骨的(集体)量词(黄载君 1964：433；张玉金 2001：22；杨逢彬 2003：177；李曦 2004：273)。但“屯”不构成〈名词+数词+“屯”〉，只构成〈数词+“屯”〉结构，因此本文不把“屯”纳入讨论。本文认为“屯”不是一个量词，而是一个普通名词。

“屯”字还可以联系“ (丿)”字来讨论。一般认为“屯”表示一对胛骨，“丿”表示一块胛骨。有些学者除了“ (屯)”以外，把“(丿)”字也看作是计骨的(个体)量词(黄载君 1964：433；张玉金 2001：20：杨逢彬 2003：177；李曦 2004：273 等)。但“丿”不构成〈名词+数词+“丿”〉，只构成〈数词+“丿”〉结构。“丿”也不是一个量词，而是一个普通名词。

〈数词+名词〉是在甲骨文中最常见的数量表达形式，虽然有些学者把后一〈名词〉看作是量词，但笔者认为它和普通名词毫无二致，此格式只是名词受数词修饰的偏正结构[7]。

甲骨文中我们时常看到“一牛、二牛、一羊、二羊”这种〈数词+名词〉结构，但没有人说“牛／羊”是量词。难道说〈数词+“屯／丿”〉的“屯／丿”是量词，而〈数词+“牛／羊”〉的“牛／羊”是名词？

关于“屯”字的字义，白玉峥先生说：

> 屯，宜为纯之初文，纯为后起从糸屯声之形声字；为屯即纯，束也，究不若直取集韵之“纯，包束也”之说较为妥适也。至一包何以仅包一牛之两胛骨？检仪礼士昏礼“腊一肫”注云：“肫，或作纯。纯，全也”。又乡射礼“二筭为纯”注亦云：“纯，全也”。又礼记投壶：“二筭为纯，一筭为奇”，疏谓“二筭合为一全”。是纯有全之义也。集韵：“算，或作筭”。说文段氏注云：“筭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则算即筭，为计数之工具。算，盖即笺之义也。二算既为一全，则一牛之两肩胛骨当可表示为一全牛之义矣。……
>
> 礼记投壶谓：“一筭为奇”，奇，盖即数之奇零者。既以一牛之两胛骨为一捆屯，表示一头全牛，则奇零之一枚胛骨以 (骨曰刻辞之专字)示之，于事、于理、于字说解，辞义之通常无碍，宜无可疑矣。 (李圃 1999：366)

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397—398)还指出，甲骨文中之所以只能见到〈名词+数词+单位词〉形式，是因为甲骨卜辞里的数量结构通常见于清单类语域，也就是说，甲骨文的文本性质和语域类型对〈数词+单位词〉的语序起着制约作用。但是姚振武(2008)批评这些观点站不住脚。

[7] 这一点笔者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讨论。

笔者据此认为："屯"表示全套的胛骨，"丿"表示一半的、奇零的胛骨，均是属于事物范畴的名词，并不是计骨的量词。

本文着重探讨〈名词 1+数词+名词 2 / 单位词〉格式。关于这种格式，太田辰夫(1981：155—156)指出，古汉语中〈名词+数词+名词〉和〈名词+数词+量词〉格式是由两个的体词构成的"复体词句"。沈培(1992：207—208)据此认为，卜辞中的〈名词+数词+量词〉的内部是〈名词〉和〈数词+量词〉的同位关系。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390—391)还指出，先秦汉语中〈VP+名词+数词+单位词[8]〉格式里的〈数词+单位词〉也是一种述谓成分，这个格式里的〈名词〉和〈数词+单位词〉不是构成名词短语的直接成分，也就是说，〈名词〉和〈数词+单位词〉分别是两个独立成分。此外，姚辰武(2015：123)说："C 式的结构(即〈动词+名词 1+数词+名词 2〉结构，例如"俘人十有六人"、"执羌十人"等：笔者注)是'动名+数名'，而不是'动+名数名'。"也就是说，姚先生也将〈名词 1+数词+名词 2〉格式里的〈名词 1〉和〈数词+名词 2〉看作两个不同的成分，而不是构成名词短语的直接成分。Campbell (2004：28 —30)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名词 1+数词+名词 2〉是由〈名词 1〉和〈数词+名词 2〉这两个 DP (determiner phrase，限定词短语)构成的同位结构。

本文也基本赞同这一思路，即认为殷商时期〈名词 1+数词+名词 2 / 单位词〉的内部构造是〈(名词 1)+(数词+名词 2 / 单位词)〉，也就是说〈名词 1〉和〈数词+名词 2 / 单位词〉分别是两个独立的成分。

二、殷商时期的单位词

2.1 集体量词

集体量词用于由两个以上的个体组成的事物。

2.1.1 "丰"

"丰"字能构成〈名词+数词+"丰"〉结构，比如：

(1) 王赐雟[illegible]玉十丰、璋一[9]。 (亚雟作祖丁簋 / 集成 3940)[10]

---

[8] 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所言的单位词是指"标准度量衡单位词(如'尺、里')、表示集体概念的单位词(如'乘、双')以及由部分容器名词(如'箪、瓢')、动作动词(如'束、堆')转用而来的临时单位词。"

[9] "章(璋)"下的"一"字前人多忽略、漏释。姚萱(2011：41)补上"一"字，可从。

[10] 本文引用古文字资料其释文皆采用宽式，如无必要即不严格隶定。

这是引自殷金文的例子。这种〈名词+数词+“丰”〉结构不见于甲骨文，但有时可以看到〈数词+“丰”〉结构：

(2) 其鼎，用三丰、犬、羊。 (合集 30997)【何组】

此外，还有如下的〈数词+“丰”+“臣”〉结构：

(3) 贞：“其宁秋于帝五丰臣，于甲告。” (屯南 930)【历组】
(4) 癸酉贞：“帝五丰臣其三宰。” (合集 34149)【历组】

“丰”字写作“ ”一类形，旧有释为“介”、“玉”、“珏”和“工”等不同看法。管燮初(1953：25)、黄载君(1964：434)均指出“”是个体量词，“五臣”是〈数词+量词+名词〉结构。但周法高(1972：329)、刘世儒(1956：86)、沈培(1992：205)等从语法史的角度加以批评，说甲骨文中不可能有〈数词+量词+名词〉格式的数量表达。

对于“”字，姚萱(2011)讨论得全面且深入，所论多是很有道理的。姚文把“”隶定为“丰”，将卜辞“五丰臣”中的“丰”读为“介”，释为当“副”、“次”讲的形容词，并说：“卜辞‘介臣’当与居于主要地位的‘冢臣’(或如后世的‘冢宰’、‘冢卿’一类称呼)相对，即地位较低的、处于‘副’、‘亚’、‘次’地位的臣。”(姚萱 2011：40—41)。也就是说，“五丰臣”不是〈数词+量词+名词〉结构。

至于亚鬲作祖丁簋铭文中“玉十丰”的“丰”，姚文把其字形看作形象以丝绳贯串起几块玉(即一串玉之形)，并说：

> 前人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花东 275+517 中的“多丰(介)臣”的“丰”写作“”，中间竖笔上下不出头，而与普通的“玉”字之形完全相同：笔者注)跟两类字形的密切关系，但他们多是将“丰”形混同于“玉”，而不将其认识独立的“丰”字(参见于省吾 1996：3281—3283)。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反过来作“玉”形的也可以是“丰”、因此应该将“丰”字本身直接跟“玉”相联系。花东甲骨的“丰()”与“玉”形同，则为此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据，由此可知“玉”跟“丰”两形最初应该字形不甚区别、系“一形两用”的情况。……属于这类情况的文字，即使后来分化成为不同的字，其各自所对应的不同写法在最初也往往区分并不严格。所谓“玉一系”即“一串玉”之形，即适合于表示作为物品本身的“玉”这个字，也适合于表示其

单位即“(与两串玉之“玨”[11]相对的)一串玉”“𢦏”这个字。独立成字的“玉”形用为“𢦏”，花东卜辞之例提供了确证；独立成字的“𢦏”形用为“玉”，则在现有古文字资料中还没有可以肯定的例子。这可能反映出二者在殷代已经处于分化的过程之中，但尚未彻底定型。(姚萱 2011：46)

也就是说，姚氏认为“玉十𢦏”的“𢦏”是计量“玉”的一个单位词。

笔者基本赞同姚萱(2011)的观点。虽然〈名词+数词+“𢦏”〉的“𢦏”所包含“玉”的具体数量不确定[12]，但“𢦏”总是表示出“几块一套”这一量范畴，从这点来看，它是一个集体量词。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描绘出“𢦏”所表示的“以丝绳贯串的几块玉”这个具体形状，从这点来看，它也表示一个事物范畴，是个普通名词。又，如例(2)所示，“𢦏”也能构成〈数词+“𢦏”〉结构，这种句法行为和普通名词毫无二致。而且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名词 1+数词+名词 2 / 单位词〉中的〈名词 1〉和〈数词+名词 2 / 单位词〉分别是两个独立的成分。这种〈数词+名词 2 / 单位词〉既然是一个独立成分，那么在形式上跟前边不加名词的〈数词+名词〉结构毫无二致，由此可知位于〈名词 2 / 单位词〉位置的词基本上都是名词。

贝罗贝(1998：101)说：“单位词是名词”，杨逢彬(2003：172—177)也认为单位词是名词的一种。本文的观点也跟贝文和杨文一致。笔者认为“𢦏”是一个原本就包含集体这个量范畴的名词。

有些学者把亚㠯作祖丁簋“玉十𢦏”隶定为“玉十玉”，并把后一“玉”分析为通过复制名词而形成的量词，即拷贝型量词(金福芬、陈国华 2002：9)。但是在亚㠯作祖丁簋中“玉( )”和“𢦏( )”的写法不同，它并不是拷贝型量词[13]。更进一步说，“玉”是一个纯粹表示事物范畴的名词，而“𢦏”则是一个除了表示事物范畴外，同时也具有集体概念的名词，也就是说，后者并不是前者的拷贝。

2.1.2 “朋 / 玨”

甲骨文中还有重复书写两个“𢦏”的字，写作“ 、、”等字形，一般隶定为“玨”。姚萱(2011：45)认为此字表示两件玉器或两串玉。

---

[11] “玨”字详后文。

[12] 王国维(1976：160)说“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陈梦家(1988：572)云“象三玉成之形”，李孝定(1965：131—132)认为“象多玉之连”。

[13] 姚萱(2011：44)指出“玉”和“𢦏”两形原本就是一字异体，因此有人可能会说，“玉十𢦏”的“𢦏”是“玉”的拷贝。但姚萱(2011：46)还说：“独立成字的‘𢦏’形用为‘玉’，则在现有古文字资料中还没有可以肯定的例子。” 由此可知“玉十𢦏”并不是拷贝型量词结构。

“玨”字还必须联系“朋”字来讨论。甲骨文中“朋”字一般写作“ 、 ”类形，连两个“丰”以成左右对称。

关于“玨”字和“朋”字的关系，王国维在〈说珏朋〉(《观堂集林》卷三)中说：

> 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玨，于贝则谓之朋，然二者于古实为一字。……余意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合二系为一玨若一朋。(王国维 1976：159—160)

下面本文据此一律用“朋”来表示“玨 / 朋”字。甲骨文中“朋”能构成〈名词+数词+“朋”〉结构，比如：

(5) ☐征(围？)不殟(殉)[14]，赐贝一朋。 (合集 40073)【宾组】
(6) 叀贝十朋。 (合集 29694)【无名组】

〈“贝”+数词+“朋”〉结构还见于殷金文。比如：

(7) 赐贝二朋。 (遹簋 / 集成 3975)
(8) 甲寅，子赏小子省贝五朋。 (小子省卣 / 集成 5394)
(9) 王呪宰甫贝五朋。 (宰甫卣 / 集成 5395)

此外，〈数词+“朋”〉结构也多见于甲骨文。例如：

(10) 车不其以十朋。 (合集 11442)【宾组】
(11) 贞：“［酒］于二朋五人，卯十牛。”
“五人卯五牛于二朋。” (合集 1052)【师宾间类】
(12) 其五朋。其七朋。其八朋。其三十朋。其五十朋。其七十朋。
(补编 2799＝怀特 142) 【宾组】

无论是由两串玉构成还是由两串贝构成，“朋”字均带有表示复数的功能。从这点来看，“朋”是一个集体量词。但就其具体数目而言，目前还无法确定。有人认为 “一

[14] “ ”字过去或释为“死”，或释为“囚”，而陈剑(2007：427—436)把它读为“殟 / 殉”。其说可从。

朋”有两枚，有人认为有五枚，有人认为有十枚，还有人认为无定数。

虽然其具体数量不确定，但“朋”总是表示“两串一套”这一量范畴，从这点来看，它是一个集体量词。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描绘出“朋”所表示的“连两串玉或两串贝以成左右对称”这个具体形状，从这点来看，它也表示一个事物范畴，是一个普通名词。而且“朋”往往构成〈数词+“朋”〉结构，这种句法行为和普通名词毫无二致。因此可见，“朋”跟“丰”一样是一个原本就包含集体这个量范畴的名词。

2.1.3 “丙”

甲骨文中“丙”也用在〈名词 1+数词+名词 2〉结构的〈名词 2〉的位置，比如：

(13) ☐宁延马二丙，辛巳雨以雹。 (合集 21777)【子組】

(14) ☐马二十丙屮(又)□。 (合集 1098)【宾组】

(15) ☐马五十丙☐。 (合集 11459)【宾组】

(16) ☐小臣墙比伐，擒兗(卞)髦☐〔人〕二十人四，馘千五百七十， (蠶)百☐丙，车二丙，橹百八十三，函五十，矢☐。

(合集 36481 正)[15]【黄组】

此外，〈数词+“丙”〉结构也见于甲骨文。例如：

(17) ☐卜：“ 以马自薛。”十二月。允以三丙。

(合集 8984)【师宾间类】

“丙”往往跟“马”和“车”字搭配。因为其句法行为最像量词，所以许多前人把它视为是一个量词。但是“丙”相当于个体量词还是相当于集体量词，换言之，它是表达单数还是表达复数，这一点一直未达成共识。

陈梦家(1988：94)说：“金文马的单位是匹，而金文‘两’字系两个相并立的‘丙’，所以甲骨文的‘丙’可能是单数。”黄载君(1964：433)指出车没有用集体单位计算的必要，从来都用“一两”作为计算单位的，至少“车若干丙“必为表个体单位的量词。黄文还引例(14)，并认为：“这是记俘获敌方的马匹，而且‘丙’还有零余之数，战争俘获本

[15] 这一卜辞的解释基本依从刘钊(2009)的观点，而只有“(兗、卞)”字的解释依从赵平安(2009：7)。

无一定，不可能成双或成驷，所以此处计马单位之‘丙’也应该是表个体单位的量词”。姚振武(2015：126)也同意黄载君、陈梦家的观点。

Ito & Takashima (1996：205)将“丙”释为马臀部的象形，并说：“the Shang perceived the buttocks as the most salient part of the horse, and the appropriate portion to abstract into a classifier.(殷人认为马的臀部是最突出的部分，也是适合抽象成类别词的部分)”，把“丙”归属于类别词(即个体量词)。李曦(2004：273)也将“丙”分类为个体量词。

另一方面，王力(1990：34)认为“丙”是表集体单位(若干马为丙)。Wang (1994：78)认为“丙”是一个单位词，当表示 4 匹马。李若晖(2000：80)指出：“‘丙’必为双数”，也就是说，李氏似乎认为“丙”是集体量词。王子杨(2013b：234)把“丙”读为“兩”，并指出：“‘丙(两)’要看成跟卜辞的‘屯’等像似，讲成一对，凡自然成对皆可称‘两’。‘马两’，即一对马，‘马十两’当指马二十匹，余此类推。《合》11364 有辞曰：‘惠丙(两)玉用。’‘丙’似可读为‘两’。‘两玉’即一玨(毂)。”李建平、龙仕平(2018：32)指出：“殷商甲骨文“丙”的本义当为与衡或轭相关之名词，基于转喻语法化为称量马的集体量词，指‘马二匹’，商代晚期用于所驾之车”。李建平、龙仕平(2018：36)还说：“‘丙’与‘两’二字形音义关系密切，使用时代互补，皆可证金文‘两’为‘丙’的分化字，其量词用法继承自量词‘丙’。”

此外，关于例(16)“车二丙”，贝罗贝(1998：102)说：“我认为‘丙’应该是单位词(换句话说是一个名词)，而不是量词(即个体量词：笔者注)。……大概 Djamouri (1988：85)的解释更合适：‘一套有两匹马的车’。”

笔者认为，甲骨文中基本没有个体量词(这一点笔者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说只有“马”和“车”有专门的个体量词，在逻辑上是不可理解的。笔者认为，“丙”不是个体量词，而是集体量词，即包含集体这个量范畴的一个名词[16]。就其具体数量而言，我们认为王子杨(2013b)和李建平、龙仕平(2018)的思路最有说服力，本文采用“丙”指“两匹马”这一解释。至于例(16)“车二丙”,本文做出如下解释：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殷商时期的车一般为一车二马(王巍 2003：395；林巳奈夫 2018：178—206)，从这个事实来看，“车二丙”应是“两个‘二丙(两匹马)’的车”，即“两车四马”。

2.2 容器量词

容器量词以容器为计量单位，一般用来表示一种大略的容量(杨伯峻、何乐士 2001：210)。

[16] 王子杨(2013b：234)指出“丙玉”是“两玉”，即一玨。从这一例子来看，殷商时期“丙(两)”字也许已开始语法化为数词。

2.2.1 “卣”

“卣”也能构成〈名词＋数词＋“卣”〉结构，比如：

(18) ［父］丁岁鬯一卣。 (合集 23227)【出组】

(19) 蒸鬯二卣，王受祐。 (屯南 766)【无名组】

(20) 祖丁、木丁鬯三卣。 (合集 30815)【无名组】

甲骨文“卣”字一般写作“、”类形，从其字形来看，是一种盛酒容器的形象。“鬯”指供祭祀用的酒，是非个体和非离散的事物名词。可见，“卣”的本义是盛酒的容器名，其前加了数词，把“卣”转化为计量鬯酒的容器量词。

“卣”有时跟“ ”搭配使用。

(21) 其蒸新鬯二 一卣，王⿴。 (合集 30973)【无名组】

“ ”字旧有释为“勺”、“升”、“必”等不同意见。由于这个形体看似一种勺形器的形象，与后世的“升”字形酷似，所以释“升”的意见最具影响力，得到多数学者的信从。因此许多前人依旧释把“ ”字隶定为“升”，看作是一个容器量词(Ito & Takashima 1996：208；张玉金 2001：19；姚振武 2015：125；郭旭东、张源心、张坚 2020：409 等)。反之，于省吾(1979：40)、沈培(1992：217 注 7)则均认为它并不是量词。陈梦家(1981)在 111 页把“升”列入了量词清单中，而在 471 页说它是“藏庙主之所在”。另外，贾连敏先生从文字学上系统论证了古文字中的“祼”、“瓒”二字的构形以及其演变等相关问题，并指出“ ”不是“升”字，而是“瓒 / 祼”字(何景成 2017：313—316)。王子扬(2013a：335—346)也同意贾文的意见，把“ ”释为“祼”，否定了“”为“升”的可能性。同时指出，“ ”表示宗庙类建筑，“二”当表示祭祀关系亲密之祖先的宗庙建筑的合称。

如果“ ”是“升”的话，它和“卣”之间在语序上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正如 Ito & Takashima (1996：208)所指出的，汉语在列举单位时，基本上都是由大到小进行的。如果“ ”是容器量词的话，那么由“”和“卣”构成的〈数词+“”+数词+“卣”〉这一语序就说明“”大于“卣”。但从道理来讲，难以想象勺形器的“升”大于盛酒的容器“卣”。

笔者认为王子杨先生的分析最有说服力，因此本文不把“”看作量词。

下面也是〈“鬯”+数词+“卣”〉的例子。

(22) ☒人，鬯一卣，卯牢又一牛。(合集 35350) 【黄组】

(23) 王宾文武丁，伐三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吝[17]。(合集 35355) 【黄组】

这两个〈“鬯”+数词+“卣”〉，其前后都与〈祭祀动词+数词+名词〉词组并列(如“卯牢又一牛”、“伐三十人，卯六牢”)，这意味着例(22)“鬯一卣”和例(23)“鬯六卣”均是动宾结构，即“鬯”是一个动词，“一卣／六卣”是其宾语。可见(22)(23)的〈“鬯”+数词+“卣”〉的内部结构跟(18)—(20)的“鬯二卣”“鬯一卣”大不相同。这种动词“鬯”不多，在黄类卜辞中只有几个[18]。

此外，〈数词+“卣”〉结构也见于甲骨文。

(24) 用十卣又五卣。 (屯南 110)【历组】

(25) 三卣，王受祐。 (屯南 766)【无名组】

“卣”指一种容纳液体的容器，很容易就可以描绘出其形状。从这点来看，它仍然是一个普通名词。另一方面，“卣”既然是容纳液体的容器，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容量。也就是说，虽然“卣”是一个名词，但也可以用来表示量范畴。因此可以说“卣”是包含量范畴的一个名词[19]。

如上文所说，“鬯”既能用作名词，也能用作动词。用作名词时，它不是时常带有容器量词，有时构成〈数词＋“鬯”〉和〈“鬯”＋数詞〉，比如：

---

[17] “ (吝)”字传统解释为“尤”。但陈剑(2007：59—80)将其改读为“吝”，其说可从。

[18] 由于“鬯”很少用作动词，所以是否把它视为是祭祀动词，各家看法颇有出入。赵诚(1988：242)说：“甲骨文用作祭名”，而郑继娥(2007：36 注 1)说：“此例(本文的例(23)：笔者注)“鬯”与“伐、卯”并列，似乎也为动词。但只此一片三例，暂存疑。”

[19] 容器量词是把表示容器的名词临时转用于表示容量单位的借用量词，而“丰、朋、丙”等集体量词是原本就包含集体这个量范畴的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容器量词“卣”可能是比集体量词“丰、朋、丙”进一步经历了量词化的历程。

(26)　丙寅贞：“今日其用五十鬯于父丁。”　　(合集 32686)【历组】

(27)　乙丑酒，禦于伐二十、鬯三十。　　(合集 22227)【圆体类】

Ito & Takashima (1996：213)据此认为“鬯”也是一个单位词。但〈数词+名词〉和〈名词+数词〉是在甲骨文中最常见的数量表达形式，因此构成这种结构的“鬯”应该说是一个普通名词。

三、结语

构成〈名词 1+数词+名词 2〉的〈名词 2〉当中，本文将如下四个词看作是单位词：

集体量词：𢦏、朋、丙[20]

容器量词：卣

而且本文认为，这些单位词均基本属于包含量范畴的名词。

前人举出的甲骨文量词(包括个体量词和单位词)有：“人、羌、犬、丙、卣、升、鬯、屯、丿、𢦏、朋、骨、奠、祟”这十四个[21]。但通过本文的考察，我们发现“屯、丿、升、鬯”原本就不是量词，而“𢦏、朋、丙、卣”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量词，由此可知剩余的量词只有“人、羌、犬、骨、奠、祟”这六个。本文的主旨在于梳理殷代的单位词，以便把个体量词和单位词分开讨论。至于剩余的这六个之中究竟有无真正的个体量词，笔者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讨论。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 JSPS 科研费 18K00532 与 18H05219 的资助。又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承蒙东北大学张佩茹副教授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20] 关于下引殷金文的“品”字，张桂光(2009：23)看作是一个集体量词。

王令寝农省北田四品。(寝农鼎 / 集成 2710)

但张文对此“品”没有给予具体解释，而且甲骨文中没有相关例子。因此本文不把“品”列入讨论范围。

[21] Wang (1994：81)还指出“窠”字也是一个单位词，但他没举出任何例子。又，许多学者不把“窠”列入量词清单中。因此本文也不把它纳入讨论。

参考文献

贝罗贝 1998〈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语言学论丛》第 21 辑，99—122 页，商务印书馆

陈剑 2007《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

陈梦家 1988《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

管燮初 1953《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

郭锡良 2005〈从单位名词到量词〉,《汉语史论集(增补本)》，34—38 页，商务印书馆

郭旭东、张源心、张坚主编 2020《殷墟甲骨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景成 2017《甲骨文诂林补编》中华书局

黄载君 1964〈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中国语文》1964 年第 6 期，432—445 页

金福芬、陈国华 2002〈汉语量词的语法化〉,《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增 1 期第 17 卷，8—14 页

李计伟 2017《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名量词形成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

李建平 2017《先秦两汉量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建平、龙仕平 2018〈量词"丙""兩"的语源及其历时演变〉,《古汉语研究》2018 年第 3 期，32—38 页

李圃 1999《古文字诂林 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若晖 2000〈殷代量词初探〉,《古汉语研究》2000 年第 2 期，79—84 页

李孝定 1965《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李曦 2004《殷墟卜辞语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宇明 2000〈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中国语文》2000 年第 1 期，27—34 页

［日］林巳奈夫著、冈村秀典编 2018《中国古代车马研究》临川书店

刘世儒 1956〈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

刘钊 2009〈"小臣墙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4—11 页

沈培 1992《殷墟甲骨卜词语序研究》文津出版社

［日］太田辰夫 1981《中国语历史文法》朋友书店

王国维 1976《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台湾大通书局

王力 1990《汉语语法史》,《王力文集(第 11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巍 2003〈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商文化论集》，395—404 页，文物出版社
王子杨 2013a《甲骨文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
王子杨 2013b〈甲骨文所谓的“内”当释作“丙”〉，宋镇豪《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231—23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 2006〈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中国语文》2006 年第 5 期，387—400 页
吴福祥 2007〈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范畴的语法化程度〉,《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三)》，246—268 页，商务印书馆
杨伯峻、何乐士 2001《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修订本)》语文出版社
杨逢彬 2003《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花城出版社
姚萱 2011〈从古文字资料看量词「个」的来源〉,《中国文字》新 37 期，35—51 页
姚振武 2008〈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读后〉,《中国语文》2008 年第 3 期，247—253 页
姚振武 2015《上古汉语语语法史》上海古籍出版
游顺钊 1988〈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中国语文》1988 年第 5 期，361—365 页
于省吾 1979《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
于省吾 1996《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
张赪 2012《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桂光 2009〈商周金文量词特点略说〉,《中山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22—28 页
张玉金 2001《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
赵平安 2009〈释甲骨文中的“”和“”〉，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3—9 页，商务印书馆
周法高 1972《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Rod. 2004. Focus, classifiers and quantificational typology: A brief account of cardinal expressions in Early Inscriptional Chinese. *Meaning and Form: Essays in Pre-Modern Chinese Grammar* (ed. by Ken-ichi Takashima Jiang Shaoyu), 19-41. Lincom Europe
Gil, David. 2005. Numeral classifiers.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ed. by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S.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226-22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to, Michiharu (伊藤道治) & Takashima, Ken-ichi (高岛谦一). 1996. *Study i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vol1+vol2)*. Kansai Gaidai University Publication

Kryukov, M.V. 1980 *The Language of Yin Inscription*. Nauka Publishing House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i James H.-Y. 1994.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and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ed. by M. Chen and O. Tzeng), 479-494. Pyramid Press

Wang Liangqin 1994.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引书目录

［甲骨文］

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7 年—1982 年

屯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 年—1983 年

补编：中国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7 年

花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花园庄动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金文］

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 1 册—第 18 册，中中华书局，　1984 年—1990 年

A Humble Opinion on Measure Word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Shunsuke TONOUCHI
Nishogakush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what measure words (collective measure words and container measure words) are found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in Yin dynast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measure words in the Yin dynasty, namely “丰”, “朋” and “丙” for collective measure words and “卣” for container measure words. Moreover, we argue that the measure words in Yin dynasty are basically nouns.

漢語繫詞「是」的歷史發展——由禪宗語錄《臨濟錄》切入觀察

陳怡君
臺灣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內容摘要：有關漢語繫詞「是」的來源，一直以來都是眾說紛紜，「是」在上古漢語中本為指示代詞，主流的論點認為繫詞「是」的用法是由指示代詞「是」帶有的回指功能演變而來。然而，同時代具有同樣句型結構以及回指功能的其他指示代詞，卻沒有發展出如「是」一般的繫詞用法，這是耐人尋味之處。本文試著以禪宗語錄《臨濟錄》中所出現的「是」為觀察對象，試圖從唐五代以來具有口語特色的語錄體文本中觀察「是」字句的演變特徵，整理出中古到近代間「是」發展的軌跡。我們發現漢譯佛經中將繫詞「是」放置句末的特色「NP1，NP2+是」句型以及與某些具有及物動詞搭配的「是」所造成的句型會有隱性繫詞，造成「是+NP」句型，可與上古判斷句「NP1，NP2(+也)」類比，也有可能是造成「是」演變為繫詞的因素。

一、前言：有關繫詞「是」的研究

有關漢語繫詞的討論，目前主要的研究還是集中在探討典型的漢語繫詞「是」上。「是」在上古漢語本用作指示代詞，其何時及如何演變為繫詞也是各家討論的對象。王力(1937)對漢語的繫詞作了全面的探討，同文除了探討「是」字的來源以外，也探討了其他的繫詞如「為」、「非」以及繫詞句式。而關於「是」演化成為繫詞的時間點，也有許多學者提出討論。洪誠(1957)認為是在漢初，馬忠(1959)認為在東漢初年。裘錫圭(1979)由出土文獻的證據，認為「是」出現年代應可提早至戰國後期。郭錫良(1997a)總結有關於「是」的產生時代和來源的相關問題，也認為「是」在西漢或戰國末期就已經產生，但使用「是」的判斷句新形式直到六朝時期才取代舊形式。

關於「是」演變為繫詞的動因和機制，Yen (1971)、周法高(1988)都曾提出，與繫詞「是」相對的否定詞「非」可能為「不唯」的合音。Yen (1986)更進一步認為，「是」的繫詞用法是由於常充當否定詞「非」的相對語所觸發而產生的。郭錫良(1997a)認為繫詞「是」來源於表示複指(指代前文事物，重述一次的功能)的指示代詞「是」，並且受到本身作為

表"正確"義的形容詞功能影響而演變為繫詞。石毓智(2001)也認為「是」由於本身指示代詞回指的功能(指代前文事物的功能)誘發，在中古漢語由「名數量」演變為「數量名」的限定語語序改變的時期，經歷結構重析而成為判斷詞「是」。

既然繫詞「是」來源於指示代詞「是」，那麼耐人尋味的是，在上古漢語中指示代詞眾多，為何惟獨「是」能演變為繫詞？在鈴木直治(1994)和郭錫良(1997b)都提到指示代詞的「是」和「此」在語法學上的分別一直難以定論的問題。但「此」並沒有發展出繫詞的功能。郭錫良(1997b)認為這是由於「此」的指示性比較強的緣故。然而，郭錫良(1997b)也提到指示代詞「之」和「是」同樣也有複指的功能，指示性也不似「此」強，卻也沒有演變出繫詞的用法，繫詞的演變應該還有除了語義以外的因素。除了前述所提到的「是」作為否定詞「非」的相對語所觸發而產生繫詞意義以及「是」受到本身作為表"正確"義的形容詞功能影響而演變為繫詞的解釋以外。Feng (1993)則認為引發指示代詞「是」變為繫詞是由於主語之後有停頓的結構空缺，才誘發其演變成繫詞。「是」成為繫詞的原因至今仍眾說紛紜，可見指示代詞演變成繫詞的動因或是繫詞本身的定義還有討論的空間。

從漢語文獻語料中可以發現指示代詞有許多近似繫詞的用法。郭錫良(1997)在討論到「是」和其他指示代詞的異同時，提到其他的指示代詞在句法表層的表現跟繫詞「是」無異。如與否定詞「非」對舉的例子：

(1)故王之不王，非狹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梁惠王上)

(2)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戰國策・魏策四)

(3)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莊子・人間世)

郭錫良(1997a)認為繫詞「是」別於其他指示代詞，而演變為繫詞的關鍵在有「複指」的功能，並且受到本身作為表"正確"義的形容詞功能影響。這個複指的功能，跟廣義繫詞句式有相當關聯。而根據郭錫良(1997a.b)同樣有複指功能的指示代詞還有「之」、「此」。關於「之」，見以下例：

(4)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

(5)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莊子・養生主)

郭錫良分析這種複指是用來提示「之」前面的成份和後面的成份是一種偏正關係，即連接中心語和定語的功能。而後此種「之」虛化為連詞。

我們若以連接的功能來看，例句(4)(5)中的「之」的功能已經很接近繫詞。然而，繫詞主要的功能是連接主語和謂語，而「之」是連接名詞組中的中心語和定語，以致於在虛化過程中沒有演變出繫詞的功能。就「之」而言，作為指示代詞在上古雖有用作定語的例子，但大多數還是用於賓語，可能在賓語位置下要演變成為連接主語和謂語的繫詞的機

會不大。

郭錫良(1997a)指出「此」作為複指功能與「是」的句式相似，見例(6)(7)：

(6)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知所同也。(荀子・天論)

(7)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莊子・逍遙遊)

郭錫良認為，「此」之所以沒有演變為繫詞，是因為其本身的指示性(近指)強烈，不易虛化為繫詞，而「是」是一個指示性較弱的代詞，加上「是」同時形容詞"正確"之義，促使其演變成為繫詞。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漢語指示代詞在演變為繫詞時除了結構上的因素，語義(s-selection)因素也有一定的重要性。然而，雖然郭錫良沒有特別討論到指示代詞「其」，然而這個指示代詞也和「之」一樣，有複指的功能，並且也可以和「非」對舉，見前文例(3)。根據筆者考察的上古文獻語料，「其」作複指功能之例，列舉數例如下：

(8)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齊物論)

(9)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莊子・逍遙遊)

(10)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莊子・大宗師)

(11)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其」在表層結構和複指功能跟「是」相似，在遠近指示性上也不若「彼」、「此」強，但卻也沒有發展至如「是」般的繫詞用法。再者，郭錫良(1997a)中提到，在 1973 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彗星圖》中有兩個「是」連用，第二個「是」疑似繫詞。見下例(12)：

(12)是是帚慧，有內兵，年大熟。

由於上古文獻中"是是"連用僅見於此文獻，郭錫良對此「是」是否為繫詞採保留的態度。然而，事實上指示代詞兩兩連用的現象在上古並不少見，尤以「指示代詞 + 其」的例子為多。如：

(13)其濟洛河穎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國語)

(14)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管子)

(15)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左傳)

(16)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莊子)

指示代詞兩兩連用的現象，可能是指示代詞虛化，經歷了葉式循環現象(Jespersen's cycle。Jespersen 1971)而產生。而指示代詞虛化後，如在例(15)(16)中兩兩連用的第二個指示代詞「其」，事實上也有連接主語(彼)和謂語(髮短、道遠而險)的繫詞功能。而「其」終究沒有演變為繫詞。「其」和「之」在上古是出現頻率且高遠近成對的指示代詞(陳怡君 2015)，如前文所述「之」主要是連接名詞組中的中心語和定語，且而後的發展亦多作賓語，以致

於在虛化過程中沒有演變出繫詞的功能。「其」可能與「是」相對，連接名詞組中的中心語和定語的功能比較被特化，以致「其」多用於領屬的用法，沒有發展出繫詞的用法。

由陳怡君(2015)對指示代詞文獻的考察，在上古文獻《尚書》、《論語》、《莊子》中，「是」是三本文獻中所出現的最普遍的近指代詞。《尚書》不用「斯」，《論語》不用「此」，《莊子》不用「茲」。這種差異可能反映的個文獻的方言差異。然而，在三本文獻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近指代詞是「之」，遠指代詞是「其」，而「是」是在三本文獻中都存在的近指代詞，並且使用頻率僅次於最高的「之」。使用頻率高的詞彙通常語法化的進程較快速，「是」在漢語文獻的高頻率，可能也是促發其比其他指示代詞更容易在複指功能句中語法化的因素，此外，「是」，除了繫詞以外也演變有疑問詞的用法，這個現象還保留在閩南語中(連金發 2015)。上古漢語指示代詞的虛化似乎對後世的功能詞帶來很關鍵的影響。

二、繫詞的句型分析

周法高(1972)提到，古代漢語的判斷句依記號的有無，可以有四種形式：

1. A=B: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論語顏淵)

2. A=Bp (p 表記號)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孟子滕文公上)

3.Ap=B

   虎者=戾蟲；人者=甘餌。(戰國策秦策二)

4.Ap=Bp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其中「者」為判斷句中的主語作記號，「也」為判斷句中的表語(determinators)作記號。另一種構成判斷句的方式就是利用繫詞連接主語和謂語。以繫詞構成判斷句的方式如前文所述是較晚產生的，直到六朝時代才逐漸取代上述的舊型式。

Higgins (1973:204-293)將繫詞句式分為四種：

1.謂語性繫詞句式(predicational clauses)：表明主語指稱對象的屬性。繫詞前的名詞組為指稱性，繫詞後的名詞組是非指稱性。

   a.路很寬。

   b.我買的東西很貴。

2.定值式繫詞句式(specificational clauses)：對於主語指稱的對象賦予價值，繫詞前的名詞組是非指稱性，在後頭的名詞組是指稱性。

a.我喜歡的人是金城武。

b 我買的東西是鉛筆。

3.指認性繫詞句式(identificational clauses)：繫詞前有指示代詞的存在，指示代詞是語言事件現場的指示指稱性，可以比手畫腳，也可以問答方式表現。繫詞前後的名詞組都是指稱性。

a.那個人是小明。

b.這是鉛筆。

4.等同性繫詞句式(equation clauses)：繫詞兩端的名詞詞組有等同的關係。繫詞前後的名詞組都是指稱性。

a.那個人是他。

b.全家是你家。

三、《臨濟錄》中「是」的句型分析

《臨濟錄》是記載唐代臨濟宗開創者義玄禪師言行的一部禪宗語錄。其刊行的過程與如唐五代許多禪師語錄一樣，經過了許多傳抄流傳的階段，最早的刊本推測在北宋初期。本文考察所採用之版本為《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所收錄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此一版本為根據北宋宣和二年的版本覆刻之版本，為目前最為通行的宣和本。

禪宗語錄的特色在保留了許多口語的用法，在本次考察中，主要目的在觀察語錄體《臨濟錄》中出現的「是」字句型，以觀察在中古和近代交界期的「是」在演變上有何特色及變化，在分析時亦可與同時期的禪宗語錄《祖堂集》作比較。以下即以《臨濟錄》出現的句型分別探討之。

3.1 繫詞用法

3.1.1 疑問句

在疑問句中，主要可分「疑問詞+是」以及「是+疑問詞」。其中疑問詞在繫詞前的「如何是」有 32 例，「云何是」2 例，「那箇是」4 例。疑問詞在繫詞後的「是什麼」有 5 例，「是阿誰」1 例。其餘為選擇問句「是 X 是 Y」共 5 例，和反詰問句「莫是」共 2 例的例子。

3.1.1.1 疑問詞+是

a.如何是

(17)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禮拜。師云。這箇師僧。卻堪持論。

(18)上堂。僧問。如何是劍刃上事。師云。禍事禍事。僧擬議。師便打。

(19)師晚參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時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煦日發生鋪地錦。瓔孩垂髮白如絲。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b.那箇是

(20)師因一日到河府。府主王常侍請師升座。時麻谷出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云。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麻谷拽師下座。麻谷卻坐。師近前云。不審。麻谷擬議。師亦拽麻谷下座。師卻坐。麻谷便出去。師便下座。

(21)師為黃蘗馳書去溈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這箇是黃蘗底。那箇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

(22)平云。黃蘗有何言句。師云。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云。直透萬重關。不住清霄內。

c.云何是

(23)如今參學道流。也秖為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
是法。法者是心法。

(24)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若有意。自救不了。云既無意。云何二祖得法。師云。得者是不得。云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底意。師云。為爾向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所以祖師言。咄哉丈夫。將頭覓頭。你言下便自回光返照。更不別求。知身心與祖佛不別。當下無事。方名得法。

3.1.1.2 是+疑問詞

a.是什麼

(25)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爾目前歷歷底。勿一箇形段孤明。是這箇解說法聽法。

(26)師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是神通妙用本體如然。普化踏倒飯床。師云。太麤生。普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

b.是阿誰

(27)道流。大丈夫漢更疑箇什麼。目前用處更是阿誰。把得便用。莫著名字。號為玄旨。與麼見得。勿嫌底法。

3.1.1.3 選擇問句及反詰問句

a.選擇問句：是 X 是 Y

(28)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化入來。師便問。汝是凡是聖。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卻具一隻眼。師云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29)某甲荒虛粗習百法論。師云。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

b.反詰問句：莫是(~否)

(30)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眾僧云。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出。師云。大眾道。汝未參長老。覺云不審。便自歸眾。

(31)一切諸天神仙阿修羅大力鬼亦有神通。應是佛否。道流莫錯。秖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莫是聖否。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不然。

3.1.2 判斷句

3.1.2.1 「NP1+是+NP2」

(32)如今參學道流。也秖為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

(33)佛與祖師是無事人。所以有漏有為。無漏無為。為清淨業。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

(34)爾欲識三界麼。不離爾今聽法底心地。爾一念心貪是欲界。爾一念心瞋是色界。爾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爾屋裏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

另外有一種句型比較特別，以「之」表賓語提前。如：

(35)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也。

原句還原應為「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是此也。」故應算此類型。

3.1.2.2 「NP1，NP2+是」

這個句型中繫詞「是」在句末，例(36)(37)的例子，可能是 NP1 主題化提前至句首的結果。就句型結構來說，表現很像上古漢語常見的使用句末助詞「也」的判斷句句型「NP1， NP2 也」(即周法高 1972 所述之判斷句句型 2 或 4)。在《祖堂集》中仍有 37 例「NP1， NP2 是也」的句子(張美蘭 2003:67)，然而在《臨濟錄》中，句型「NP1，NP2 是也」並沒有出現，僅出現繫詞「是」在句末的判斷句例子「NP1，NP2 是」。張美蘭(2003)認為「NP1，NP2 是」句型是漢譯佛經的特色，可能有受到外來語言的影響，但後來還是依照漢語 SVO 的特色，「NP1+是+NP2」最終還是成為主流的判斷句。

例(38)「秖爾面前聽法底是」是回應前句問句的內容，NP1 已出現在前句的疑問句裡(指「祖佛」)，「秖爾面前聽法底是」是省略了舊信息 NP1 而成。

(36)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垂開示。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寔有。如真正學道人。念念心不間斷。

(37)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乞師指示。師云。大通者。是自己。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名為大通。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為智勝。佛者。心清淨光明透徹法界。得名為佛。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密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

(38)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爾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爾欲得識祖佛麼。秖爾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

3.1.2.3 否定詞+是

在《臨濟錄》中「不是」共出現 11 例，「非是」共 1 例，值得注意的是「莫是」的「莫」雖然也是否定詞，書中共出現 2 例，但均用在疑問語氣上，參照 3.1.1.3。

a.非是

(39)秖如諸方說六度萬行以為佛法。我道是莊嚴門佛事門。非是佛法。乃至持齋持戒。擎油不[氵閃]。道眼不明。盡須抵債。

b.不是

(40) 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鳳林便休。師乃有頌。大道絕同。

(41)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爾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揀貴賤老少。

(42)是爾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修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教他莊嚴。一切物即莊嚴得。爾且莫錯。

3.2 指代詞用法

在《臨濟錄》裡，仍可以看到不少指示代詞「是」的用法，結構上多為指示形容詞「是+NP」，相當於「此+NP」，如「是故」「是日」「是般」「是人」「是境」…。

(43)道流。如禪宗見解。死活循然。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主客相見。便有言論

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喚作客看主。

(44)爾秖麼認他著底衣為寔解。縱經塵劫秖是衣通。三界循還輪回生死。不如無事。相逢不相識。共語不知名。今時學人不得。蓋為認名字為解。大策子上抄死老漢語。三重五重複子裹。不教人見。道是玄旨。以為保重。大錯。瞎屢生

有些指示代詞「是」語例當作賓語的，如例(45)中，其中「為是真道」意即「謂此真道」。這個句型「VP(謂)+指示代詞(是)+NP(真道)」，在指示代詞「是」和 NP 之間有著隱性的繫詞。

(45)爾取這一般老師口裏語。為是真道。是善知識不思議。

3.3 表肯定、正確意

這個用法即與否定詞「非」相對表肯定、正確的意思。在《臨濟錄》中出現的表肯定、正確意的「是」皆與有致使語義的動詞「取」「認」搭配。

(46)是爾若取不動清淨境為是。爾即認他無明為郎主。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也。爾若認他動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動。

另外，在前述「是」作為指示代詞賓語時，在指示代詞「是」和 NP 之間有著隱性的繫詞。然而，當「是」緊接在認識動詞「知」後，可能有兩種解讀上。一是有隱性繫詞的句型「VP(知)+指示代詞+NP」；二是肯定、正確義構成的句型「是+NP」，表示不是別的東西，正是 NP。這裡對「是+NP」的歧義有可能是造成「是」解讀為肯定義，再轉化成繫詞的因素之一。另外，在「知」的句型裡，還可以注意的是與「知」結合的副詞，有副詞的存在，可能讓韻律改變造成斷句上的歧義，以下列舉的例子有「明知」、「始知」、「方知」。

(47)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

(48)山僧見處法身即不解說法。所以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

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拳黃葉用誑小兒

(49)不與飯噢。不安不樂。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遞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肯。

(50)爾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為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

(51)往日曾向毘尼中留心。亦曾於經論尋討。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說。遂乃一時拋卻即訪道參禪。

(52)人能著衣。有箇清淨衣。有箇無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大德。但有聲名文句。皆悉是衣變。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成其句義。明知是幻化。大德。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以思有念。皆悉是衣。

四、結語

本文觀察在《臨濟錄》中出現的「是」的句型。我們觀察到其中有兩種句型可以連結到上古漢語無繫詞的句型，此兩種句型為「是」演變成為繫詞結構前過渡的句型。一是 3.1.2.2 的「NP1，NP2+是」句型，可以類比上古漢語常見的使用句末助詞「也」的判斷句句型「NP1， NP2+也」，這種句型亦即周法高(1988)所提到的上古漢語無繫詞但有句末助詞的句型 2 或 4。二是 3.2 中指示代詞的「是」與具有及物特性的動詞如「謂」、「知」等搭配時，會產生在指示代詞和名詞組之間有隱性繫詞的句型「VP+指示代詞「是」+NP」，而這種有隱性繫詞的句型會形成歧義，使「是+NP」首先解讀為肯定義，而後再轉化為繫詞。而這兩種句型，提供了繫詞「是」在中古時代除了由指示代詞演變而來的另一種因素。

附記：本文為筆者於岩田禮老師門下撰寫之博士論文時，深感興趣但未於博士論文中討論的議題。筆者自金澤大學畢業回到臺灣後，在科技部計畫"繫詞與指示代詞在語法演變上的關聯性——從閩南語的觀察"(MOST 105-2811-H-007-002)資助下撰寫此文。執筆期間感謝國立清華大學連金發教授指導與協助，本文疏漏之處一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陳怡君 2015〈文献より見た漢語指示代名詞の歴史的変遷〉《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vol.14：5-43。

郭錫良 1997a〈關於"是"產生時代和來源論爭的幾點認識〉《漢語史論集》:116-135 頁。

_____ 1997b〈試論上古漢語指示代詞的體系〉《漢語史論集》：82-105 頁。

洪誠 1957〈論南北朝以前的繫詞〉《語言研究》vol.2：1-22 頁。

黃丁華 1958〈閩南方言裡的否定詞〉《中國語文》vol.70：189-196。

_____ 1963〈閩南方言裡的疑問詞〉《中國語文》vol.125：299-307。

黃正德 1988〈說「是」和「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vol.59-1：43-64.

連金發 2013〈明清時期荔鏡/荔枝記閩南方言指示詞的演變：從指示詞到程度加強副詞或篇章標記〉鄭秋豫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語言資訊和語言類型》:129-150。

_____ 2015〈十九世紀南洋福建話疑問和否定語式的探索〉，發表於「季風亞洲東南亞的過去與現在」國際研討會暨 2015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會議論文。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中心，2015/6/11-12。

鈴木直治 1994《中国古代語法の研究》汲古書店。

呂叔湘著、江藍生補 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學林出版社。

馬忠 1959〈"是"字的用法演變〉《語法論集》vol.3：55-99 頁。

裘錫圭 1979〈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語文》vol.6：437-422 頁。

石毓智 2001《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形態句法發展的動因和機制》北京大學出版社。

太田辰夫 1985《中國語歷史文法》朋友書店。

湯廷池 1981〈國語的「分裂句」與「準分裂句」〉《語言學與語文教學》393-414。

王力 1937〈中國文法中的繫詞〉《清華學報》vol.12-1：1-67 頁。

志村良治 1984《中国中世語法研究》三冬社。

張美蘭 2003《祖堂集》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

周法高 1972《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九》臺聯國風出版社。

_____ 1988〈論上古漢語中的代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vol.59-1：89-113 頁。

Citko, Barbara. 2008. Small clauses reconsidered: Not so small and not all alike. *Lingua* 118:

261-295.

Dikken, Marcel den, and Alma Naess. 1993. Case dependencies: The case of predicate inversion. *The Linguistic Review* 10:303–336.

Dikken, Marcel den, and Alma Naess. 1993. Case dependencies: The case of predicate inversion. *The Linguistic Review* 10:303–336.

Dikken, Marcel den. 2006. *Realtors and Linkers: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 Predicate Inversion and Copula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Feng, Li. 1993. The copula in Classical Chinese declarative sentenc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2.: 255-276.

Higgins, Roger Francis. 1973. *The Pseudo-cleft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New York: Garland.

Jespersen, Otto. 1971. *Negation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Copenhagen: Andr. Fred. Høst.

Lien, Chinfa.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Min Demostratives + Type Classifier/Quantifier Constructio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ext: From Demostratives to Intensifi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4: 495-512.

Mikkelsen, L. 2004. *Copular clauses: Specification, Predication and Equ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Mikkelsen, L. 2011. Copular clauses. In Klaus von Heusinger, Claudia Maienborn, and Paul Portner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1805-182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Yen, Sian L. 1971. On negation with Fei in Classical Chine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1-3: 409-417

_____1986. The origin of the copula shi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2: 227-242.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Chinese Copula '*shi4* (是)':
Some Observations from *The Record of Linjin*

I-Chun, Che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debate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opula '*shi4*'. In ancient Chinese, '*shi4*' was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with an anaphoric function. It is intriguing, however, to note that other demonstrative pronouns with the same sentence structure and anaphoric function in the same period did not develop the usage of copula like '*shi4*'. This article, thus, intends to investigate how '*shi4*' has been evolved from middle Chinese to modern Chinese by analyzing *The Record of Linji*, an essential tex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Zen Buddhism written in Tang-dynasty colloquial Chinese.

「把」字句から見る長崎唐通事資料

木津祐子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

要旨：本稿では、長崎唐通事が残した官話資料をもとに、そこで用いられる「把」字句の使役用法に焦点を当て、その語用上の特徴について分析を試みた。その結果、「把」字句の使役用法では、行為者に物品や条件または恩恵が与えられることが前提として存在するという点で、他の「叫」「教」などの使役動詞を用いた使役文とは大きく異なる現象が見られ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また、これら唐通事資料を「把」字句の現れ方により分類する中で、一部の資料には、同じ機能の「給」と並存する現象が見られ、並存しない資料とは対照的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

1. はじめに

長崎唐通事が官話学習に用いた資料の言語様態には、ある種の方言的色彩が含まれることは、これまでの研究によって各種指摘されている。筆者もかつてその言語的特徴の中から、（1）介詞「替」の用法、（2）給予義の介詞「把」の用法を取り上げ、東南方言に同種の特徴が分布することを指摘、地域を特定するのは困難であるが、唐通事資料のこれらの特徴は、何らかの東南方言話者が話す官話から学び取った要素を反映した可能性を論じたことがある（木津祐子 2012、同 2018）。

本稿では、引き続き長崎唐通事の資料をより全面的に分析し、特に（2）給予義「把」の用法を軸に、資料間の特徴や相違点について、検討していくこととしたい。

2. 資料説明

本稿で使用する唐通事資料を以下に列挙する。すべて写本で伝わる。

『瓊浦佳話』全四巻（早稲田大学、東北大学蔵本を校勘の上使用）

『唐通事心得』（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蔵本）

『唐話』（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蔵本）
『鬧理鬧』（早稲田大学蔵本）
『小孩兒』（早稲田大学蔵本）
『養兒子』（早稲田大学蔵本）
『三折肱』上下二巻（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蔵本）
『医家摘要』上下二巻（京都大学附属図書館蔵本）
『医生通話』（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蔵本）
『官話纂』（早稲田大学図書館蔵本）
『訳家必備』（『唐話辞書類集』巻 20 所収）

長崎唐通事が残した資料群の中では、中国の話本小説の体裁を模した『瓊浦佳話』全四巻（以下『瓊浦』と略称）が、量的にも質的にも際だって優れた性格を有する。内容は、長崎の歴史や事件簿、また来航唐船や来舶唐人に関するエピソード、対中貿易や長崎の唐三寺に関する事柄など多岐にわたり、一つの話柄は相当の紙幅を費やして語られる。また分量の点では『瓊浦』には及ばないものの、『鬧理鬧』（以下『鬧』と略称）はやはり話本小説を模した資料である。ここで話本小説の体裁というのは、基本的に語り手による一人語りでエピソードが進行し、会話は間接話法によって記され、話の転換部分には一対の韻文が挿入され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段落が変わるごとに、「却説」「正是」など、話本小説にお決まりの常套句も用いられる。同じく語り手一人が物語るスタイルの資料としては、『小孩兒』『唐通事心得』『唐話』が挙げられる。『小孩兒』（以下『小』と略称）と『養兒子』（以下『養』と略称）は資料全体に一つのテーマが貫く（『養兒子』もエピソード間の繋ぎには韻文が用いられる）。『唐通事心得』（以下『心得』）『唐話』は短編随筆集とも呼びうる性格であるが、一つ一つのエピソードは非常に短く、その点で『瓊浦』とは大きく異なる。

また、唐通事には、唐船の来港に付随する各種の外交的・貿易的任務が課せられていたが、その中でも、長崎滞在中の唐人が医者にかかる際の仲介という任務は重大であったようで、医者の見立てや薬の処方などの専門知識を官話で通訳するための教本が各種残っている。『三折肱』上下二巻（以下『三』と略称）、『医家摘要』上下二巻（以下『医家』と略称）、『医生通話』（以下『医生』）などが現存するが、中でも『三』の上巻は、馮夢龍『古今小説』所収の小説を巧妙に節略したものが基礎となっており、その筆致は『瓊浦』と相通ずる特徴を多く備える（木津祐子 2021）。

また、通事職の業務上で必要な文案も盛り込まれた『訳家必備』（以下『訳家』と略称）も豊富な用例を含む。この資料は、語り手による一人語りではなく、基本的に対話形式で話柄が進行するという点で、口頭語の特徴を多く備えると同時に、通事が作成した文案には文言的表現や慣例的言い回しも多く、内容が必ずしも均質的でない点に注意が必要である。或いは書き手の唐話学習の基盤が、『瓊浦』など一人語りの資料とは異な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が、現時点では成立背景などの詳細は未詳である。

上記資料の成立年は、すべてが写本で伝わり著者名も不明のものが多く、考証は困難である。『瓊浦』については、語られるエピソードの時代考証を通して、1718年から1723年に遠くない時期に書かれたと考えられ（木津祐子 2018）。『訳家』は18世紀中盤以降に書かれたとも見なされるが（奥村 2016）、その他の資料の年代特定は困難である。

3. 唐通事資料における「把」字句

さて、上述の通り、長崎唐通事資料には、「把」字句が多様な用法で用いられる。普通話と同じく所謂処置用法も広く見られ、唐通事資料においても、それが主要な用法である。例えば、下のような例がそれに当たる。なお、写本では異体字や俗字が混用されるが、引用に際しては印刷上の便宜を考慮し、現在一般に用いられる近似の字体に置き換えて入力した。繁体字に統一などの措置は敢えて行っていない。

1．那人把身上的雪児抖淨了。（『三』上巻）
　その人は身体に積もった雪を払い落とした。
2．把包裹放在卓上。（『三』上巻）
　荷物を机の上に置いた。
3．就把這地方開闢起來做個大馬頭，地名改做長崎。（『瓊浦』巻一）
　この土地を開いて大きな船着き場とし、地名を長崎に改めた。
4．新王家到任之後，把旧例更改了做起新例来。（『瓊浦』巻一）
　新しい奉行殿が着任され、旧法を改めて新法を立ち上げられた。

その上で、唐通事資料では、それ以外の用法、中でも動詞と共起して給予の対象（被授与者とここでは呼ぶ）を導く用法、さらにその被授与者に、与えた物または

条件を利用して動作を行わせる使役用法が目を引く。この機能は、普通話では、「給」が担う用法に近い。例を下に挙げる。

５．　王家新造一个唐館把唐人住在裏頭不許出外。(『瓊浦』巻二)
御奉行様は新たに唐人屋敷を建造して唐人を中に住まわせ(勝手に)外に出ることを禁止され。

６．　(頭目)主意準多少把他領進, 餘下來的仍舊結封放在庫中。(『瓊浦』巻四)
頭目の意図はその者に幾ら受け取らせるかを定めたら、残りの物品は従来通り庫内に厳重に保管するのである。

７．起初生下一個孩兒，軟綿綿的衣服把他穿，把他吃乳。(『養』)
子供が生まれたばかりの時は、暖かな衣服をその子に着せ、乳を飲ませてやる。

８．那掌櫃的驗了號籌開了衣櫃交把衣服。(『鬧』)
その番台係は番号札を点検すると衣装棚を開けて衣服を渡してやる。

以下、具体的に「把」字句の用例に基づき、特徴を整理していくこととする。

3.1 給予義の動詞に後続し、被授与者を導く「把」

この用法は、文全体としては給予動詞の一部となり、「把」は与える対象―被授与者―を導く。

９．小厮捧過壺來斟上一盃，雙手遞過父親，然后篩把自己。(『三』上)
若者は徳利を持って来て盃に注ぐと、両手で父親にわたし、それから自分にも酒を注ぐ。

10. 撮了兩帖藥劑送把你。(『三』下)
二服の薬を調合してあなたに差し上げます。

11. 原來兵器是日本大犯禁, 看也不許外國人看, 何況賣把外國人。(『瓊浦』巻一)
そもそも武器は日本では最大の禁止事項で、見ることも外国人には許されない。況んや外国人に売るなどもってのほかだ。

12. 把所藏的貨物逐一點潯明白交把本街街官。(『瓊浦』巻三)
貯蔵してある貨物を一つ一つきっちり点検して町年寄にわたす。

13. 你錯開了我的衣櫃交把別ヶ。(『鬧』)

お前さんは私の衣服棚を間違って開けて他人に（服を）わたしたんだ。

前節で挙げた例８もこれに相当する。「把」に前置される動詞としては、この８や 12、13 に見える「交」（わたす）の出現数が最も多い。

これらの「動詞＋把」の構文では、「把」で導かれた被授与者が、さらに続く動詞句の行為者となる文も多く出現する。つまり、「V1＋把＋N＋V2」の使役形式である。以下に例を挙げる。

14. 把房子租把唐人居住。（『瓊浦』巻一）
家を唐人に貸して住まわせる。
15. 後来発貨的時節仍旧称起来称把商人收。（『瓊浦』巻二）
後で貨物を蔵から出す時には、やはり目方を量って目方通りに商人に受け取らせる。
16. 当日起貨的行李什物堆在大門口逐件験浔明白方纔交把唐人收拾。（『瓊浦』巻三）　荷下ろし当日の行李や雑多な荷物は大門に積み上げてしっかり点検してから唐人に片付けさせる。
17. 且把那大畧的話頭説把你們聽着。（『医家』）
ともかく大体の話をあなた方に話して聞かせます。
18. 方纔寫完了，交把當年老爹看。（『訳家』舩進港）
さっき書き終わり、年行司（通事）殿にわたして見てもらう。
19. 衣服也是自己穿得不冷不寒餘下的都送把人家穿。（『心得』、『唐話』）
服も自分は凍えぬ程度を身につけ、残りはすべて人に贈って着せてやる。

このような用例の「把」は使役動詞に類する特徴も備えるが、ここでは、まず人に何かを与える、授けるという動作行為（動詞が意味を担う）が存在することに注意したい。その前提条件については、次節でさらに検討する。

3.2 使役動詞「把」

唐通事資料には、前節に挙げた動詞に後置する「把」だけではなく、「把」が単独で使役動詞として用いられる例も存在する。ただ、これらの使役的用法の多くは、まず何かを付与し、それを用いて、或いはそれを前提として何らかの動作を行わせる例が圧倒的に多い。下にいくつか具体例を挙げる。下線部分が行為者に与えられ

る物品ないし前提である。

20.將軍老爺聽見如此作怪，即忙一道旨意下来吩咐王家新造一个唐館把唐人住在裏頭不許出外。(『瓊浦』巻二)
将軍様はこのような不埒を耳にされ、急いでお触れを出し、長崎奉行に新たに唐人屋敷を設営し、唐人をその中に住まわせ外出を禁じるよう命じられた。

21.説罷便叫財副写一張甘結把衆人打个花押。(『瓊浦』巻二)
言い終わると、財副に一枚の契約書を書かせ、皆に花押を書かせる。

22.先将告示掛在大桅上叫財副高声朗誦念起来把衆人聽。(『瓊浦』巻二)
まず告示を帆柱に掲げ、財副に大声で朗唱させ、人々に聞かせる。

23.在王府裡叫我們通事來翻好了，繙把商人抄去。(『訳家』舩進港)
奉行所で我々通事に翻訳させ、それを商人に書き写させる。

24.所以在唐山替他賣了還了銅錢把他收了。(『訳家』護送日本難人)
そのため、中国で彼ら（難民）のために（難破船に残った貨物を）売りさばき銅銭に換えて彼らに受け取らせた。

25.會館發出銀子來把他收去。(『訳家』本舩起貨)
会所では銀子を出して彼らに持ち帰らせた。

26.劉公便把一大壺湯水燒得滾熱，送到房裡扶起來，把他吃了兩碗。(『三』上)
劉公は、そこで大きな薬罐に水を熱々にわかし、部屋に持っていって彼を助け起こし、二碗飲ませた。

このように、「把」を用いた使役文では、先に何かの条件を与え、その上でそれを用いた（活用した）行為を行わせるのである。一方、明確に与えられる物品や前提が示されない使役用法も見られ、下の例がそれに当たる。

27. 縦有私貨船，無物可賣無貨可買，不把他犯法的意思了。(『瓊浦』巻二)
たとえ密貿易船があっても、売買できる貨物が無ければ、それらの者に法を犯させなくてもすむ、という考えである。

28.走到老姑身辺把好話安慰老人家，不把他驚恐。(『鬧』)
老婆のそばに近寄って話しかけて老人を慰め、怖がらせないようにした。

29.又吩咐街管時常留心看顧寡婦，不把他難為。(『鬧』)
さらに町年寄に、常にその寡婦を気にかけ見守り、彼女に辛い思いをさせない

ように言いつけた。

しかし、これらの例でも、やはり「把」で導かれる対象には然るべき条件が与えられている。27 は「何も与えない、持たせない」ことは、違法行為を起こさせないための措置となり、28 と 29 において、そばで話しかける、常に気にかけて見守るという行為も、当人に付与される恩恵と言える。具体物の授受は伴わないものの、やはり行為者に付与される条件の存在が確認でき、この行為者は被授与者と見なし得る。なお、この三例はすべて否定詞を伴う用法であるが、現時点で、否定詞との共起に何らかの意味があるかは不明である。

また、下の例のように、「把」で導かれる対象の行う行為が、行為者当人にとって受益となる場合にも、「把」が用いられる。下に見るとおり、30 の学問を修める、31 の商いの修行に出る、32 の乳を飲む（この場合は不用意に乳を飲ませることだが）は、すべて行為者の利益となる行為である。

30.素新（＝索性）把你不要讀書。(『小』)
いっそのことお前には学問をさせないことにする。
31.个麼，連生意也不敢把你去学。(『小』)
それでは、お前には商いであっても修行にいか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32. 這様不謹慎把兒子吃奶，所以做了疳疾癖疾。(医家)
このように不用意に子供に乳を飲ませるので、子供が疳病（胃腸の病）を患うのだ。

また、先に挙げた例 7 の「起初生下一個孩兒，軟綿綿的衣服把他穿，把他吃乳」も、「軟綿綿的衣服」は「他」に与えて「穿（き）」せる物として動詞に前置して提示されるが、「把他吃乳」は「吃乳」という動目構造で恩恵を示す。

以上、行為者に物や条件が恩恵として与えられ、行為者はその被授与者として動作を行うのが、「把」を用いた使役構造の基本的機能となる。このような「把」の用法は、当然のことながら給予義動詞との深い関係が想起される。しかし、唐通事資料では、「動詞＋把」の形式は多く見られるものの、「把」が独立して動詞として用いられる例は決して多くはない。今回調査した範囲では、下の数例が見られるのみである。なお、32 は、「把」一字ではなく、「把與」という二字の動詞形である。

29.要多收兩分錢,你多寫一分把他。(『訳家』本舩起貨)

幾らか取り分を増やしたいのなら、もう一枚申請を書いて彼に渡しなさい。

30.老爹那箇手爐紅珠兩様，為什麽不把我呢。(『訳家』貨庫)

お師匠さまのあの手爐（携帯火鉢）と赤い数珠の二つは、どうして私にはくださらないのか。

31. 拿出一件黑色的衣服把他。(『養』)

一着の黒い服を取り出して彼に与えた。

32.或者有人多把與他，他便勾了自己的價錢，餘下來的定然退還了。(『三』上)

あるいは誰かが彼に多く与えると、彼自身は自分の金銭が十分足りるので、余った分は決まって受け取らず返却する。

唐通事資料には、使役表現としては他に使役動詞「叫」や「教」を用いる例も出現するが、それらには、何らかの物品や恩恵が行為者に与えられる前提は見られない。例えば、

33.叫肥筑兩國的王家掌管長崎。(『瓊浦』巻一)

（将軍は）肥筑領国の大名に長崎を管理させた。

34. 頭目叫通事查點真假。((『瓊浦』巻二)

頭目は通事に（牌照が）本物か偽物かを点検させる。

35.先教二十來個人去，餘者的且停一停。(『訳家』本舩起貨)

まず 20 人あまりを行かせ、残りの者は暫し止まらせる。

36.要看戲，叫戲子做吹彈歌舞，不用自己動手動腳。(『養』)

芝居を見るなら、役者に歌舞音曲をやらせ、自ら手を下す必要はない。

37.叫掌櫃的開了那人的衣櫃一看。(『鬧』)

番台係にその人の衣装棚を開かせて見てみる。

このように、使役動詞「叫」「教」を用いた使役文では、行為者は前提として特に恩恵を授けられることはない。「把」の使役用法との大きな違いはここにある。

4. 「把」字句における資料間差異

今回、「把」が担う機能を調査する中で、興味深いことに、これら唐通事資料には、大きく二つの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一つは、受益者（被授与者）を導く介詞と給予義動詞（動詞に後続する形式も含む）に普通話と同じ「給」を用いるグループで、もう一つはそれを用いないグループである。今、便宜的に「給」を用いないグループを A、用いるグループを B と分類する。A は、これらの用法に「把」または「與」を用い、B の多くは、「把」も用いるが「與」はほとんど用いることがない。

	資料名	「給」	「把」	「與」	総字数（概数）
A	瓊浦佳話	0	28	11	約 32400
	三折肱	0	7	5	約 15000
	鬧理鬧	0	10	1	約 8000
	唐話	0	7	1	約 6800
	小孩兒	0	3	0	約 3500
	唐通事心得	1	6	2	約 6600
B	訳家必備	64	22	1	約 50000
	医家摘要	4	4	0	約 17300
	養兒子	3	7	2	約 12400
	医生通話	3	6	0	役 4200
	官話纂	1	0	0	約 2400

これまで唐通事資料を扱ってきた経験から、全く「給」を用いない A グループが、唐通事資料としてはより早い段階で成立したもの、または早い段階で成立したものを抄写したものと見なしうる。冒頭で紹介した『瓊浦佳話』はその代表である。A グループの中で、『唐通事心得』のみ一例「給」が出現するが、この資料は『唐話』と重複するエピソードを多く含み、どちらかが一方を継承、あるいは祖本を同じくする等の関係を有する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ここでは同じグループに分類した。

この『唐通事心得』に現れる「給」は、38a の一例だが、同じ話は『唐話』にも

見られる。

38a. 唐話是通事家的本等了，主家給他大々俸祿教他做職事，難道特□送他花哄上用掉了不成。(『心得』)
唐話は通事家の本分だ。お上が十分な俸禄を与えて彼に仕事をさせるのも、まさか遊びに使い切ってしまわせる為であるはずはない。

38b. 講話是通事家的本等了，王家大俸大祿叫你做職事，難道特々送你花哄上用掉了不成。(『唐話』)

『唐話』の例では、「お上がたっぷり俸禄をくださる」部分に動詞が用いられないため、「王家」と「大俸大祿」の関係が曖昧なままとなっている。中国語としては、何らかの給予義動詞が入るのが自然であろう。推測であるが、動詞を欠いていた祖本から転写する際に、『唐通事心得』ではその時点で新たに伝わっていた動詞「給」を付加して、言葉としての整合性を高めた可能性もある。しかし、現存の資料からはこれ以上の判断は不可能である。

ここで、B グループにおける「給」の用例も確認しておくこととする。64 例を有する『訳家必備』からは数例を選び、それ以外は全用例を列挙する。

『訳家必備』

39.先把二十個條款給他看看。【舩進港】（まず二十の条款を彼らに見せる。）

40.撈起了海裡的貨，一邊搭起蓬子給晩生們住了。【護送日本難人】（御奉行様は……海中の貨物を掬い上げ、傍らに仮小屋を掛けて、私たちに住まわせてくださいました。）

41.朝廷也有給他皇賞的銀子。【護送日本難人】（朝廷も彼に褒美の銀子を与えました。）

42.束腰邊的紅紗那箇是整疋的，頭目不肯給他拿去。【本舩起貨】（腰に結んだ紅紗、あれは一段そのままの（裁断していない）もので、頭目は彼には持ち帰らせようとはしない。）

43.把這一包賞給他充得酒錢，使得麽。【本舩起貨】この銭一包みを褒美として与えて酒代に充てさせたら、それで良いだろうか。

『医家摘要』

44. 晩生猜説是他感冒了什麽風寒,給他一碗姜湯吃。（私が推測するに、彼は何か

風寒に罹ったので、生姜湯を一杯飲ませてやりなさい）

45. 我藥籠裡頭有一ケ丸藥會醫三十六種中風病的，也一併給他吃。（私の薬箱に三十六種の中風病に効く丸薬が有るので、併せて彼に飲ませなさい）

46.我有一ケ方子給他吃。（私に薬方が有って処方するので、彼に飲ませなさい）

47.把米湯給他吃。（お粥を彼に飲ませる）

『養兒子』

48. 一郷的人都感他的孝心，時常給他酒飯。（郷里の人々はみな彼が親孝行なことに感心し、常日頃彼に酒や飯を振る舞った）

49.時有一個喜捨的給他棺材。（その時、有る人が彼に棺桶を喜捨した）

50.忽有一個和尚來托鉢討米，那老母不給他。（そこに１人の和尚が現れ托鉢して米を求めたが、その老母は米を与えない）

『官話纂』

51d.只人家來求做一首詩，便把詩賦給他。（人が詩を一首作って欲しいと所望すると、詩賦をその人に与えてやった。）

『訳家必備』の用例が、給予から使役を示す介詞、二重目的語動詞などの多様性を見せる一方、他の例の多くは「食べさせる」場面での用例に限るなど、資料ごとに造語面で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は異なるが、これらの用例が、すべて上で検討した「把」の用法と共通する性格を有してい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

B グループで一定数の「給」が出現することは、唐通事資料で用いられる官話が、東南方言的色彩を弱めていく一つの傾向を表す事象と見なす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

5. おわりに

以上、本稿では長崎唐通事が用いた官話資料を題材に、そこで用いられる「把」字句の使役用法に焦点を当て、その語用上の特徴について分析を試みた。その結果、「把」字句の使役用法では、行為者に物品や条件または恩恵が与えられることが前提として存在し、その条件を利用した行為を行うという点で、他の「叫」「教」などを用いた使役文とは現れ方が大きく異な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

また、「把」字句を通して唐通事資料を見なおすと、一部の資料には、「給」と「把」とが、同じ使役機能を担う字句として並存することが確認され、「給」を用いない

資料と対照的であることも確認された。この使役用法「給」の有無による分類は、判明している資料の成立背景に関する要素と照らし合わせるならば、一定の有意味な傾向を示す。

漢語方言における「把」字句の使役機能が如何に獲得されたかについては、様々な研究成果が存在する（黄晓雪/李崇兴 2004、石毓智 2008、陈瑶 2011 など）。それらの方言文法研究の成果を踏まえつつ、唐通事資料の言語特徴を分析することは今後の課題となる。

参考文献

陈瑶 2011〈“给予”义动词兼做处置标记和被动标记的动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5, 96-101

黄晓雪/李崇兴 2004〈方言中“把”的给予义来源〉,《语言研究》24-4, 86-88

石毓智 2008〈汉语方言中被动式和处置式的复合标记〉,《广西师范大学学报》44-2，48-51

奥村佳代子 2016「18 世紀長崎における口頭中国語―初進館」の内容に基づく『譯家必備』再考―」,『東アジア文化考証研究』9, 37-46

木津祐子 2012「「官話」の現地化：長崎通事書の二重他動詞「把」と琉球通事書の処置文」,『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51, 129-147

木津祐子 2018「唐通事の語る長崎唐三寺：クレオール文学の担い手としての唐通事」,『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文化交流――黄檗宗を中心に』（日本学研究叢書第 30 号，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39-271

木津祐子 2021「唐話による医学書『三折肱』における馮夢龍『醒世恆言』受容」,『内田慶市教授退職記念論文集：文化交渉と言語接触』（沈国威・奥村佳代子編，東方書店）

“洗手去”（手を洗ってこい）再考：南北対立を超えて

ラマール・クリスティーン
フランス国立東洋言語文化学院・東アジア言語学研究センター

要旨：漢語方言間の差異のうち、語順が注目されがちであるが、その語順差を左右する言語現象の解釈は必ずしも簡単ではない。本稿はその具体的な事例として、従来「南北差」の軸でとらえられてきた「手を洗ってこい」にあたる移動表現“去洗手”と“洗手去”を取り上げて、「北型」に見られる後置の“去”の位置づけを論じる。趙元任（1968）の助詞説が受け入れられなかった背景に、共起する動作動詞句と異なるイベントとしての移動意が保たれているという点が挙げられる。本稿ではこの問題は類型論の分野から提示された「関連移動」という文法範疇から見ると無理なく説明がつくということを提起し、併せていわゆる「方言文法」現象のとらえ方の変遷を振り返る。

1. はじめに

1.1 中国諸方言間の相違点を VO・OV 言語の尺度で見る構え

中国諸方言は大体において分析的な言語で、各変種間の文法現象を比較しようとする際、先ず「語順」の差が目に付く。橋本萬太郎著『言語類型地理論』（1978）は、1960、1970 年代に展開した基本語順をめぐる類型論をいくつかの言語現象に当てはめた代表作である。その後の中国諸方言の記述研究の進展によって全体像が徐々に見えてきて、現象の地理分布そのものが確認できた項目も少なくない。しかし、南北の分布と統辞構造の「逆行」と「順行」を結びつけて解釈を試みた言語項目のうち、当時提示された VO 型対 OV 型言語との関連については問い直すべきだという声が上がった。

例えば、橋本氏が注目した家畜の種名を表す形態素とその性別（オス・メス）を表す形態素の相互位置の南北対立は（橋本 1978、67-71 ページ）、曹志耘（2008）の漢語方言地図集第三巻の地図 76 によって実証された。しかし、南型の「種名+性別」という語構成を「被修飾語＋修飾語」という「順行構造」とは別の解釈を採る研究

が現れた（例えば項夢氷 1988、丁邦新 2000）。性別形態素をヘッドとして解釈する立場を採れば、その語構成を順行構造の残存と見なす必然性はなくなる。

本稿が取り上げる「～しに行く・～しに来る」という意味を表す表現も、「語順」の南北差として注目をあびてきた。

1.2 直示移動動詞関係の語順への指摘

移動表現に関して、『言語類型地理論』（橋本 1978、41-52 ページ）は「～へ行く」に対応する表現の南北差を取り上げて、広東語では目的地を後置させる“去……”を用いるのに対して、北方語では“到……去”が用いられると指摘している。確かに、“去上海”という言い回しを広東語の文法特徴として記す研究はあり（袁家骅 1960、235-236 ページ）[1]、また曹逢甫（Tsao 1987、395 ページ）も台湾で話されている国語の通常の言い方で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橋本氏は、“到中国去”は前置詞句を動詞の前に置かれた構造、つまり比較構文や“把”構文と並行したケースとみて、広東語と北方語のその差異を順行構造と逆行構造の対立として捉えている。

これについては少なくとも三つの疑問点が生じる。

まず、VO、OV という語順と関連する現象であれば、なぜ北方語では直示移動に限って、目的地を表す名詞句を前置詞句として動詞の前に回し、“进屋”や“回学校”などに平行した現象が生じないかという点である。

もう一つは、劉丹青（2000）が指摘するように、上海語も“去南京”とは言えず、“到南京去”の方を好むという問題の解釈である。

三点目は“到”の前置詞処理であるが、これは意見が割れていることがよく知られている。“到……去”や“上……去”の“到”、“上”を動詞として処理するなら、“去”を「方向詞」（方向補語）として処理することになる。例えば吕叔湘（1980、127 ページ）や《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266 ページ）などはその“到”を動詞とみなしている。その立場に立てば、“到北京去”、“上北京去”、“去北京”のいずれも「V+場所」という語順を示すもので、違うのは方向詞をそれに加え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方向詞（directional、太田辰夫 1958、221-222 ページのいう「趨向助動詞」）とはつまり動詞よりは一歩文法化が進んだ言語形式であり、韻律上も独立性を失っている。こうした分析こそが、晋語の“去北京去”も難なく説明できる。

---

[1] 普通话里，现在也常听见“我去上海”，“你来北京”一类的句子，这显然是受了南方方言的影响。（袁家骅 1960、235-236 ページ）

次節で取り上げる“洗手去”の“去”もまさに、どこまで文法化しているか、そして文法化しているならばどういうタイプの助詞（機能語）として扱うべきかという問題をかかえている。

2.“洗手去”と“去洗手”の分布

2.1 “去洗手”と“洗手去”を南北差の軸でとらえた文献研究

前節で振り返った「北京へ行く」と同様に、目的の動作と「来る」、「行く」の直示移動を組み合わせた表現も南北の対立を示していることがよく知られている。例えば太田辰夫氏は「北京語の文法特点」（1965）で、北京官話を反映する『官話指南』の初版（1882 年）と、長江流域には通用しにくい箇所を改めた九江本（1893 年）とを比較対照し、北京語独特の「VP 去」型の表現を南京官話でより受容され易い「去 VP」に改めたところが数か所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その後、張美蘭氏も（张美兰 2011、372-378 ページ、2017、1293-1299 ページ）補足調査を行っており、それによれば初版の『官話指南』の「VP 去」型の文型の 47 例は、九江本の『官話指南』及び上海語訳の『土話指南』に対応する文が残る場合、「去 VP」型に改訂されている。その他、目的地と目的動作の両方が表示された「到+場所+VP 去」も 11 例が九江本では「到+場所+去 VP」に改訂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つまり、単純型の“我要叫你買東西去”（買い物に行く、使令通話十九章）が“去買東西”に改められるケースのほかに、目的地と目的動作の両方が表示された“可以到他那棧裏買去”タイプの表現（彼の店に買いに行ってもよい、官商吐屬第二章）を“可以到他那店裡去買”タイプの表現に改めた例がある。張美蘭氏はほかのいくつかの清朝の文献調査結果も加えて、同じようにこの「～しに行く」のパターンを北方官話と南方官話の違いを代表する項目の一つと見なす。

以上の観察で指摘されている南北差は、前節で論じた現象、つまり「北京に行く」タイプの表現（直示移動と目的地の組み合わせ）と地理的分布の上で関連しながらも、別次元の現象であ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おり、興味深い。また、劉丹青（2000）の指摘と照らし合わせると、上海語でも、南京官話でも、“到+場所名詞+去（VP）”を用いており、北京語・広東語という二分化した対立を想定することの限界がうかがわれる。『官話指南』の上海語訳『土話指南』を見ると、「VP 去」を「去 VP」へ改めるだけでなく、「VP 来」を「来 VP」へと改訂する例も見られる：

過幾天我再上您這兒**取來**罷。(『官話指南』官商吐屬 18 章)
隔幾日，我再**來擔**罷。(『土話指南』官商吐屬 18 章)
…dans quelques jours, je reviendrai les prendre.（同上仏語訳）
（あと数日したらあらためて取りに来る。）

趙元任氏が伝えている 1920 年代の胡適家における次のエピソードがこうした南北差を象徴的に示している（Chao 1968、479 ページ)。胡適氏は北京語を使う召使とのあいだで氏のいとこが芝居の切符を取りに来るべきという内容の会話をしていて、相手の言った“他取来”（彼が取りに来る）を場違いの「彼が取ってくる」と理解して、“叫他来取！”（彼に取りに来るように伝えなさい）と正したという。ちなみに趙元任氏は「取りに来る」のこうした“取来”の“来”及び“买菜去”の“去”が①軽声で発音される、②意味機能が方向補語と異なる、そして③「去 VP 去」のようにさらに前に動詞“去”が現れうる、という三点の根拠を挙げて、北型の“洗手去”の“去”を動詞でも方向補語でもなく「目的助詞」(particle of purpose）と処理している。この点は第 3 節で改めて論じる。

しかし、一見きれいに見える南北対立型の分布には多数、未解決な問題点が残されている。まずその分布の実態は期待されるほど一般的な南北の境界線と重ならない。そして目的動詞句の前にも後ろにも“去”が現れるパターンは必ずしも北型と南型の接触による破格的な混合型であるとはとらえにくい分布を示している（2.2 節)。それに、従来の文法体系において、北型の“洗手去”(手を洗いに行く)の“去”の処理が未解決のままである（2.3 節）という大きな問題点も残る。

2.2 “买菜去”と“去买菜”（買い物に行く）の分布の新しい側面

曹志耘（2008、文法巻）の地図 78（“我去买菜”～“我买菜去”）をみると確かに閩、粤、客家などの方言が話されている地区では均質的に“去买菜”型、つまり「行く」（恐らく「来る」もそうである）の移動を表す動詞が目的動作を表す動詞句の前に置かれる典型的な連動文の形をとっている（図１)。

しかし中国北部には意外な分布も見られる:河北省南部と河南省北部の中原官話（または晋語）分布域で、東南部方言と同じ“去买菜”が集中して現れる地域がある。これは方言志などの記述からも確認できる（図２)。関係記述を一つだけ挙げると例えば宋玉柱は（1982)、河南省北部の林県の特徴として“我买菜去”、“他看

我来”ではなく、“我去买菜”、“他来看我”というとわざわざ指摘してい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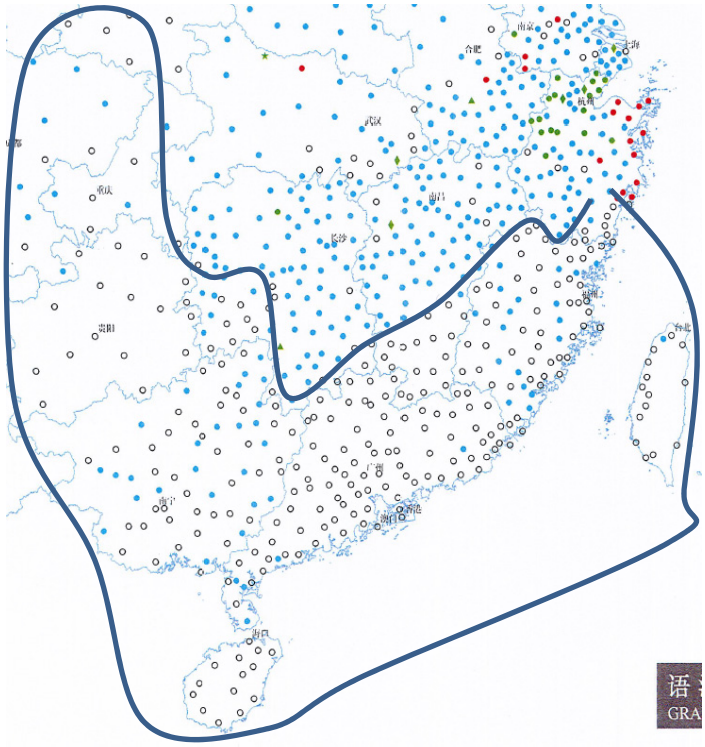


図１：《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 2008、文法卷）の地図 78 に見られる、青い線で囲った「去 VP」(“去买菜”)のみを用いる地域。中部中国は「去 VP」と「VP 去」のどちらでも良い（青い丸）。混合型の「去 VP 去」も散見する（緑の丸）。浙江省東北部の沿岸地域は典型的な「北型」とされてきた「VP 去」が固まって分布している（赤い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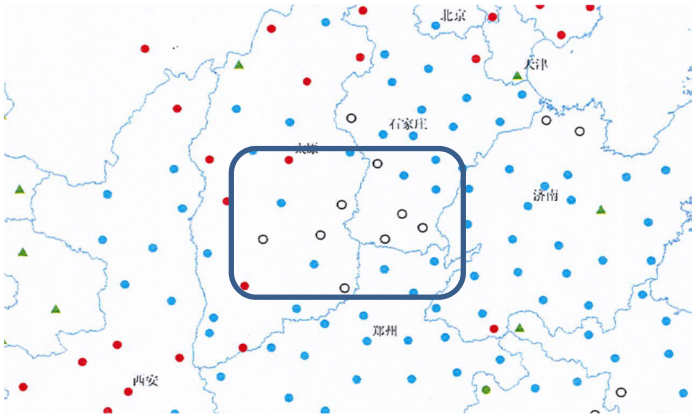


図２：曹志耘（2008、文法卷）の地図 78 は、「去 VP」（去买菜）が河北省と山西省（中原官話、晋語）の分布域にも用いることを示す。

[2] 河南北部の浚县、河北南部の魏县（いずれも中原官話）も同じく「去 VP」一型だけであるとそれぞれ辛永芬先生と吴继章先生からご教示頂いた。

このほか、陝西省北部の山岳地域で話されている晋語に関して、「去 VP 去」の詳細な報告例がある（黑维强 2003、邢向東 2011）。これを「北方型」と「南方型」の接触による「混合型」に由来すると見るにはやや無理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これらの記述にはさらに、目的地、目的動作の前後に置かれた（直示）移動を表す語はそれぞれ音声形式が異なると明記されている。例えば陝西省北部の神木方言（晋語）では「どこどこへ何かをしに行く」は「到+場所+VP+去」ではなく「去+場所+VP+去」となり、二つの“去”はそれぞれ[kʰəʔ^{4}]と[kəʔ^{0}]と発音され、取り替えられない（邢向東 2011、567 ページ）。

そこで、目的動作を表す動詞の後ろに置かれるものをどう位置付けるかという問題に直面することになる。これについては次節で論じる。

2.3 「VP 去」型を OV 型言語の影響ととらえる試み

こうした北型の「VP 去」をアルタイ語との言語接触による言語変化として捉えられないかという問題意識から、綿密に漢訳仏典から明代までの歴史文献における「VP 去」と「去 VP」の出現頻度を調べた楊永龍氏の研究が 2010 年代に登場した。楊氏（杨永龙 2012、2013）は周辺の満州語、モンゴル語、東郷語、羌語などの表現にも着目し、「VP 去」パターンの出現と定着を第 1 節でとり挙げた語順の観点から分析している。楊氏の慎重な議論は興味深いものではあるが、やはり以上の 1.2 で触れた「去北京」型の語順と同じ疑問に答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状況に直面している：なぜ OV 型の語順の影響がほかでもなく、直示移動動詞の“去”と“来”と移動目的を表す動詞句の組み合わせの“去买菜”という連動文に作用するのか。なぜ“回家吃饭”が“吃饭回家”にならないのか。たとえ言語接触による「アルタイ化」を認めても、言語体系にはその受け皿が、つまり動作と関連する移動を助詞で表すという仕組みがなければ、そうした周辺の OV 言語が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は考えにくいであろう。

3. “洗手去”の“去”は助詞？

3.1 “洗手去”の“去”の処理の難点

周知のごとく共通語には「手を洗ってこい」を言うのに“洗手去”と“去洗手”の両方の言い回しが共存している上、その混合型とも思える“去洗手去”も見られる。陸倹明（1985、1989）がそれぞれの言い回しの文体・地域特徴に関する観察の

ほか、「V 来」が動詞に方向補語が付いたものとして解釈されうる動詞、目的構文として解釈されうる動詞、そして両方の解釈が可能である動詞をリストアップして綿密に考察したこともあって、これらの「移動+目的」構文の記述が不足し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しかし、一般に“去洗手”を連動文として分析することについて意見が一致しているのに対して、北方独特の“洗手去”における“去”の処理については紛糾している。朱徳熙(1982、165-166 ページ)も[3]、陸倹明（1989）も北方型の“去”はストレスを受けないと指摘してはいるが、1980 年代から 2010 年代にかけての中国国内の研究は、趙元任の「助詞」説を取り入れることはなく、あくまで連動文の第二動詞として扱った（例えば甘露等 2009)。

一方、各方言志を読んでいくと、少なからぬ方言学者がこの“去”を本動詞ではなく機能語であると見做して、そして多分、直示移動の意味を保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より、「方向補語」として処理していることに気づく。例えば晋語の文法記述に当たった侯精一、温端政（1993、14-15 ページ）がその一例である。これは恐らく、中国語の従来の文法体系において、目的動作に向かう仕手の移動を表す「助詞」の帰属できる文法範疇が欠けていることによるのだろう。なじみやすいヨーロッパ諸語にもこうした範疇はない。こういう「助詞」の適切な処理に希望の光を与えてくれたの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原住民及び中米アマゾニアの原住民の言語記述から生まれた「関連移動」範疇である。

3.2 関連移動助詞の提示

関連移動とは、1980-1990 年代に、オーストラリア原住民を記述研究する言語学者が提示した動詞の「新たな」文法範疇である(Koch 1984、Wilkins 1991)。2000、2010 年代に入って、中南米の言語及びアフリカの言語を研究する学者がその類似性に気づきその概念を取り入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早期研究は関連移動接辞を豊富に持つ言語に集中した。それらの接辞の機能は方向接辞（directionals）と違って、日本語の「上っていく」や「飛んできた」のように動きの方向を表すのではなく、動作者が動作を行う前後の特定の移動を表す機能をもつものである。その移動の多くは「行く」「来る」「帰る」と関係する移動で、日本語の「パンを買ってくる」「パンを買っていく」、「一杯飲んでかえる」のように動作のあとの移動、あるいは中国

[3]「后置的表示目的的“来”和“去”都读轻声，这是一种虚化了的动词，因此前头还可以有“来”“去”出现：我去买菜去[…]、你去打电话去、他来帮我修电视来了。」(朱德熙 1982:165-166)

語の“洗手去”のように動作の前の移動を表す接辞が多い。動作動詞に付くこうした接辞が十数個にも及ぶ言語も報告されている。最近ではチベット・ビルマ語（Genetti 等 2021、Jacques 等 2021）、ツングース諸語（Pakendorf & Stoynova 2021）という東アジアの言語記述にその概念を適用する研究が増えてきている。これを見ると、北方中国語の「目的助詞」の存在はもはや驚くようなものではない。筆者（Lamarre 2020）は北方中国語にその分析方法を適用することを試みた。なおここでいう「助詞」とは付属語、つまりクリティックで、狭義の接辞とは異なるが、韻律の面では独立性を欠く、一定の文法化を経ている言語形式である。

言語によっては、直示移動動詞が目的動作動詞と構文レベルの「目的構文」をつくると同時に、動詞に接辞を付けるという二重マーキングが報告されている。となると“去洗手去”のように移動が動詞と助詞の両方にマークされるパターンもさほど驚くこと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南北型の言語接触による混合型と並ぶ分析が可能になる。またこれらの一連の研究では、「来る」系の標識が単に「来る」という移動を表すか、どこかへ行って何かをしてから戻るという往復を表すかを考察すべき項目として挙げている。これは本稿のタイトルに選んだ“洗手去”と「手を洗ってこい」の違いを考える際に参考できると思われる[4]。

以上、論じてきたことから、特定の方言の記述にあたって、“去”と“来”の本動詞、方向補語、目的助詞という三種の用例と音声形式をそれぞれ明記する調査票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と思う。それによって、今後中国語の諸方言のデータは「関連移動標識」（associated motion markers）と「趨向標識」（directionals）に同じ形式をあてる言語の対照研究に大きな寄与を成すことになるだろう[5]。

なお、「去 VP 去」のそれぞれの「去」の発音の違いは晋語に限ったことではない。1895 年に刊行された、河北の献県のことばを記述する教科書『漢語入門』に、「目的助詞 ti」の用法と多くの用例が紹介されている。たとえば“你去找的罷”（仏語訳は va chercher「探しに行け」となっている）。著者の Wieger 神父はこの助詞の漢字表記に当て字の“的”を用いているが、語源は“去”であろうと述べている。献県は北京から南へ約 160 キロ離れており、現地のことばは冀魯官話に分類されている。ちなみに、最近『方言』に掲載された論文で、同じく冀魯官話に属する山東の淄川方言にも、同じ用法の ti が存在する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る（孙克敏 2021）。これらの研究のいずれもが「目的助詞説」を支えるものと考えてよい。

[4] 中国語の言い回しにより近い「手を洗いに行け！」も可能である。

[5] 最前線の研究動向をまとめた Guillaume & Koch 2021 を参照。

4. 終わりに

岩田氏は『漢語方言解釈地図（続集）』の前書きで（2012: iii）、地図を一枚書きあげると新発見があって、解釈作業の見直しを迫られたと振り返る。本稿が取り上げた「買い物に行く」という日常的な表現の地理的分布の解釈作業も、これから二転三転しつつ続いていくことであろう。

参考文献

岩田礼 2012《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好文出版

太田辰夫 1958『中国歴史文法』江南書院

太田辰夫 1965 北京語の文法特点『久重福三郎先生坂本一郎先生還暦記念中国研究』（神戸市外国語大学）、『中国語文論集　語学篇、元雑劇編』所収、1995、汲古書院、243-265 ページ。

曹志耘主编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商务印书馆

丁邦新 2000 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一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中国语文》第 3 期 194-197 页。

甘露、甘霖 2009 浅析由“来”、“去”构成的连动句《中州大学学报》第 4 期 79-81 页。

黑维强 2003 晋语“去”的词性研究《语文研究》第 4 期 57-59 页。

侯精一、温端正主编 1993《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劉丹青 2000 粵語句法的類型學特點《亞太語文教育學報》第 3 卷第 2 期 1-29 页。

陆俭明 1985 关于“去+VP”和“VP+去”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18-33 页。

陆俭明 1989“V 来了”试析，《中国语文》第 3 期 161-69 页。

吕叔湘主编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宋玉柱 1982 林县方言的语法特点《语言研究论丛》第 2 辑 296-302 页。

孙克敏 2021 山东淄川方言离心型直指位移的表达手段《方言》第 1 期 82-89 页。

项梦冰 1988 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语言研究》第 2 期 81-94 页。

邢向東 2011 陝北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及其語法化《語言暨語言學》12.3: 565-593 页。

杨永龙 2012 目的构式“VP 去”与 SOV 语序的关联《中国语文》第 6 期 525-536 页。

杨永龙 2013 汉语周遍语言与“VP 去”有关的语序关联《历史语言学研究》第 6 期

342-358 页。
袁家骅等 1960《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张美兰 2011《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張美蘭 2017《《官話指南》匯校與語言研究——《官話指南》（六種）異文比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土話指南》Boussole du langage mandarin traduite et romanisée en dialecte de Chang-hai. 1908. 上海，土山灣慈母堂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 Sè W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netti, C., K. Hildebrandt, N. Sims & A. Z. Fawcett. 2021. Direction and associated motion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Typology* 25(2): 345-388.
Guillaume, A. & H. Koch. 2021. Introduction: Associated Motion as a grammatical category in linguistic typology. In A. Guillaume & H. Koch (Eds.), *Associated motion*. 3-30. De Gruyter Mouton.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692099-001
Jacques, G., Lahaussois, A., & Zhang, S. 2021. Associated motion in Sino-Tibetan, with a focus on Gyalrongic and Kiranti. In A. Guillaume & H. Koch (Eds.), *Associated motion*. 819-853. De Gruyter Mouton.
Koch, Harold. 1984. The category of "associated motion" in Kaytej. *Languages in Central Australia* 1. 23–34.
Lamarre, C. 2020. An Associated Motion Approach to Northern Mandarin MOTION-CUM-PURPOSE Patterns. In J. Xing (ed.)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East meets West*. 131-163. De Gruyter Mouton.
Pakendorf, B., & Stoynova, N. 2021. Associated motion in Tungusic languages: A case of mixed argument structure. In A. Guillaume & H. Koch (Eds.), *Associated Motion*. 855-897. De Gruyter Mouton.
Tsao, F-. 1987. Re-Identifying the Norm for Guóyǔ. In A. Bramkamp, Y-C. Fu, A. Sprenger, & P. Venne (eds.), *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385-406. Fu Jen University.
Wieger, L. 1895. *Rudiments de parler et de style chinois. Dialecte du* 河間府, *premier volume : Introduction, mécanisme, phraséologie.*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Wilkins, D. 1991. The semantic, pragmatics,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associated motion in Mparntwe Arrernte, *Buffalo Papers in Linguistics*, 91-1: 207-257.

Yue, A. O. 2003. Chinese Dialects: Grammar. In G. Thurgood & R.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107-14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Go and wash your hands’ beyond the North-South divide

Christine Lamarre

Inalco (National 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CRLAO (Research Center on East-Asian Linguistics)

[Abstract] Word order-rel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Sinitic languages are easy to notice, but the specific linguistic phenomena that lay behind these variations may sometimes be less easy to interpret. We discuss here the case of purposive patterns which combine a motion morpheme and a VP, such as *qù xǐ shǒu* (go – wash – hands) “go and wash your hands”. We suppose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analysis of the motion-expressing clitic *qu* in the “northern” pattern *xǐ shǒu qu* (wash – hands – go) as a “particle of purpose” (Chao 1968) was not adopted by later descriptions lays in the fact that *qu* still clearly expresses motion in this pattern, while its meaning differs from that of a deictic directional. Recent advances in typology on the category of associated motion provide a stimulating explanatory tool for these clitics. This new approach is likely to prove more fruitful than the previous North-South opposition (based on VO vs OV word order harmony) to analyze this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汉语方言“漏斗式”的地理演变模式

王 莉 宁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地理演变模式”的概念，并以《汉语方言地图集》为依据，阐释了汉语方言北方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一种地理演变模式——漏斗式。漏斗式是北方方言向东南方言扩散的演变模式之一，它意味着当某个语言特征或语音演变规律进入一个连续分布区时，分别向前方和两侧扩散，离起源地越近的地区发生变化的面积越大，离起源地越远的地区发生变化的面积越小，从而形成一个 V 字型，与漏斗的形状相似。文章最后指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除了漏斗式以外，汉语方言的地理演变模式还有台阶式、通道式以及岩田礼先生提出的“北方方言江东侵入式”“江淮方言词的逆向传播”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引言

地理演变模式（geographical evolution norms）指方言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来的传播、扩散、融合、变化的方式，主要研究导致语言特征地理分布类型（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s）的形成机制。

曹志耘（2011）提出“地理分布类型”这一概念，指方言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来的、与具体的地理因素相联系的分布特点和形状；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可分为对立型和一致型，对立型主要包括秦淮线型、长江线型、阿那线型；一致型主要包括长江流域型、江南漏斗型和东南沿海型。从理论上说，上述演变类型都可以提炼出一种或若干种演变模式。

本文以曹志耘（2008）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为依据，阐释“漏斗式”的含义和演变方式，以此探讨如何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的地理演变模式研究，发挥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揭示语言演变规律的独特作用。

二、定义和动因

2.1 “漏斗式”的定义

根据曹志耘（2011），汉语方言地理分布类型的“一致型”有三种表现，第二种为“江南漏斗型”，指当北方方言的特征向东南方言扩散时，长江以南以江西北部、湖南东北部为中心的 V 字形地区最先发生变化。从形成机制来看，本文将这种演变模式称为“漏斗式”，表现为当某个语言特征或语音演变规律进入一个连续分布区时，分别向前方和两侧扩散，离起源地越近的地区发生变化的面积越大，离起源地越远的地区发生变化的面积越小，从而形成一个 V 字型，与漏斗的形状类似。这一路径与岩田礼（2009：18）提出的“古老的传播路线”[1]的两条支线大致相当。

“漏斗式”的形成与以江西、湖南等地所处的地形地势有着密切关系。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南地区，武夷山、南岭、雪峰山构成了一个漏斗形屏障，其中心是鄱阳湖水系和洞庭湖水系，山脉阻挡了语言特征向东南方言区的东南方向、西南方向全面扩散，而水路却有利于语言特征的传输。

2.2 北方化是“漏斗式”演变的动因

从宏观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方言“差异性”和“一致性”并存。差异性指的是汉语方言内部差异巨大，有官话、晋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徽语、平话和土话等十大方言，还可进一步细分为 97 个方言片，101 个方言小片，很多方言土语之间无法通话，对此，罗杰瑞先生（1995：165）曾有如下评价：“汉语更像一个语系，而不像有几种方言的单一语言，汉语方言的复杂程度很像欧洲的罗马语系”。不过，从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来看，这种看似纷繁复杂的差异性可用“南北差异”一词概括，即多项语言特征在方言地图上以“长江线”为分界线，形成了南北对立面貌（参看岩田礼 2009：13-14，曹志耘 2011）。一致性指的是汉语方言的发展方向是融合和趋同，演变方向是“北方化”（岩田礼 2009：14），这既是现代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格局产生的动因之一，也是当前最重要、最显著的演变趋势。在方言地图上，有两项直接线索反映出北方化的演变趋势：

第一，汉语方言南北对立分界线南移至长江流域，导致“秦淮线”[2]几乎消失。

---

[1] 一是经过江西赣语区抵达福建西部山岳地带或广东客家地区的路线，二是经过湖南湘语区抵达岭南地区的路线。

[2] 岩田礼（2009：13）称为“淮河—秦岭线”“淮河线”，曹志耘（2011）称为“秦岭—淮河线”，都指从江苏东部开始，经过淮河、秦岭一直蔓延到甘肃的分界线。

“秦淮线”最早由俄罗斯的扎维雅洛娃（Olga Zavjalova）教授发现，指出这是区分官话方言的南北分界线。在汉语方言中，最为重要的“秦淮线”型特征是“汉语方言入声是否发生了全次浊分调”，具体表现为，在“秦淮线”以北，全浊入字与次浊入字较为系统地分化为不同的调类（例如北京话全浊入归阳平[35]，次浊入归去声[51]），在“秦淮线”以南，同类现象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地区（详见 3.2 节），大部分的东南方言没有此类音变的连片分布。声调的演变规律辖字众多，入声的全次浊分调显示了这条地理分界线曾对汉语方言的地理分类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在“蛇”（词汇 035）[3]、“炕”（词汇 106）、“俩你们～”（语法 006）、“大家”（语法 009）、“谁你找～”（语法 016）等方言地图上，也能发现“秦淮线”曾经存在的痕迹（曹志耘 2011）。

第二，“长江线”正在消失，导致南北对立的格局发生改变。“‘手’和‘脚’的词义”（词汇卷 068）是一张典型的“长江线”图，两类词义大致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为“专指手、脚”，长江以南为“专指上肢、下肢”，长江以南出现的“江北型”仅有 49 个点，长江以北出现的“江南型”仅有 20 个点，大部分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不过，目前对汉语方言“南北差异”的界定实际上是“官话与东南方言的差异”，这意味着长江流域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方言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北方化的演变。从演变速度来看，位于长江上游的西南官话更为迅速，“长江线”上游缩减，成为北方化入侵长江以南地区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当北方型特征到达长江中游后，“漏斗式”便正式启动继续向南推进，其结果是导致长江线中游沦陷，长江线濒临消失。

本文所说的“漏斗式”，是汉语方言北方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地理演变模式之一，从宏观方向来看，传播扩散的方向为自北向南，是单向且不可逆的。

三、演变方式

本节以一系列方言地图为依据，观察“漏斗式”是如何在东南方言北方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

3.1 初始阶段

[3] 笔者认为，在除了山西及其毗连地区以外，“秦淮线”以北将“蛇”改称为“长虫”，与这一带官话方言古全浊入字今归阳平，故导致了“蛇”与“折”发生同音冲突有关。具体参看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地图 24。

在方言地图“跳青蛙～起来”（词汇卷 136）上，“蹦”系是来自长江以北的词形，长江以南多为“跳”系，湘赣粤三省交界处以及广东北部为“猝”系的连片分布，其他说法多呈散点状分布。本图长江线在上游、下游地区仍保持得较为完整，词形以南方的“跳”系为主，长江线自重庆至南京一带则为“蹦～跳”两说或“跳”“蹦”交错分布，体现出南北两种词形在此区域交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蹦”系已悄然越过长江流域，到达湖南东北部的长沙、江西北部的南昌周边地区，请看图 1。

图 1 显示了漏斗式演变的初始阶段，北方型刚刚越过长江线，还未来得及扩散到东南方言中；从地理分布类型来看，此阶段还未形成典型的“江南漏斗型”。

同类地图举例如下（内部北方型|外部南方型）[4]：

跑慢慢儿走，别～！（词汇卷 139）：跑|走、逃、奔

他～姓张（语法卷 003）：他|渠、伊

的我～东西（语法卷 041）：的|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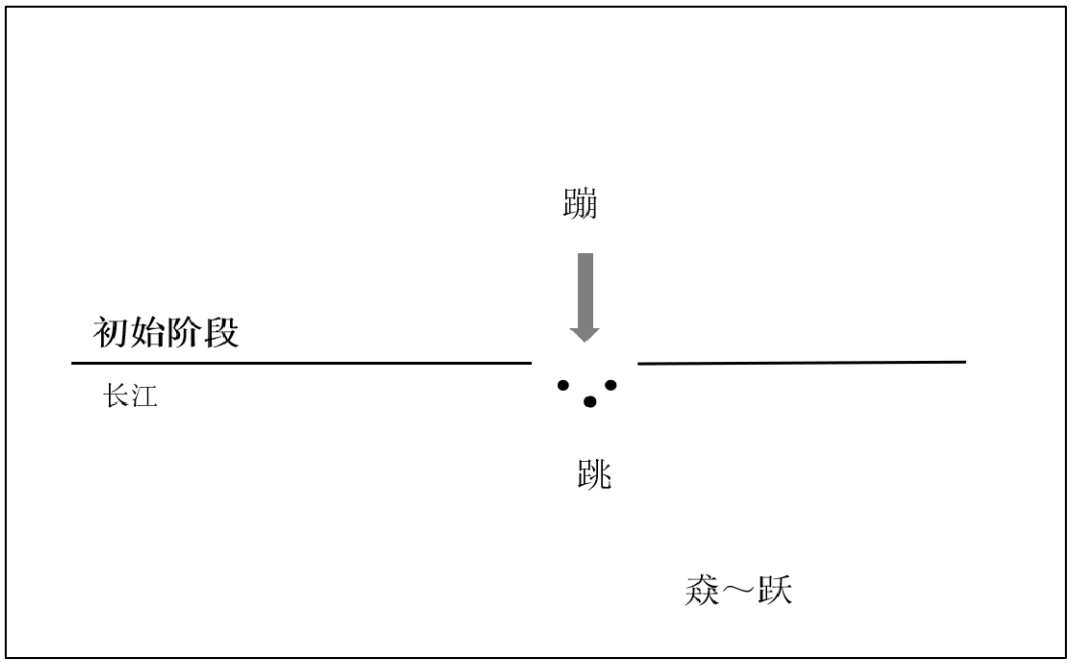


图 1：“漏斗式”的初始阶段

3.2 逐步扩散

[4] 在这 3 张地图上，长江上游地区已被北方的形式“跑”“他”“的”占领，“长江线”已退化为“下江线”。

在否定副词“不明天我～去”（语法卷 028）这张地图上，“不”系是北方型，东南方言为“弗”“唔”“冇”等。目前，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原来说“唔”的地区已被来自北方的“不”覆盖，湖南北部的汨罗、江西北部的奉新、宜丰、高安、万载、上高、丰城、东乡等地为“唔”“不”两说，是“唔”系曾在此处连片分布的证据；同时，“不”系继续向南扩散，一直延伸至湖南东南部的祁阳、常宁、新田、郴州，江西中部的莲花、安福、吉安、吉水、永丰、广昌等地。从图 2 可见，此阶段“江南漏斗型”已初见雏形，但来自北方方言的形式仅进入到湖南、江西北部，尚未能深入东南方言腹地。（参看图 2）

前文 2.2 节提到，汉语方言入声的全次浊分调现象以“秦淮线”为界呈南北对立分布，据笔者（2015）的研究，“秦淮线”以南的例外点恰好集中在长江流域鄂东南、皖西南、赣西北三省交界的西南官话、赣语，以及湖南北部的西南官话里，大多数地点表现为部分次浊入字归阴入，从而与全浊入字声调不同，推测为受官话的影响所致，目前，湖南、江西南部也有少量地点发生了全、次浊入相分的现象，说明这一音变现象在逐渐向南扩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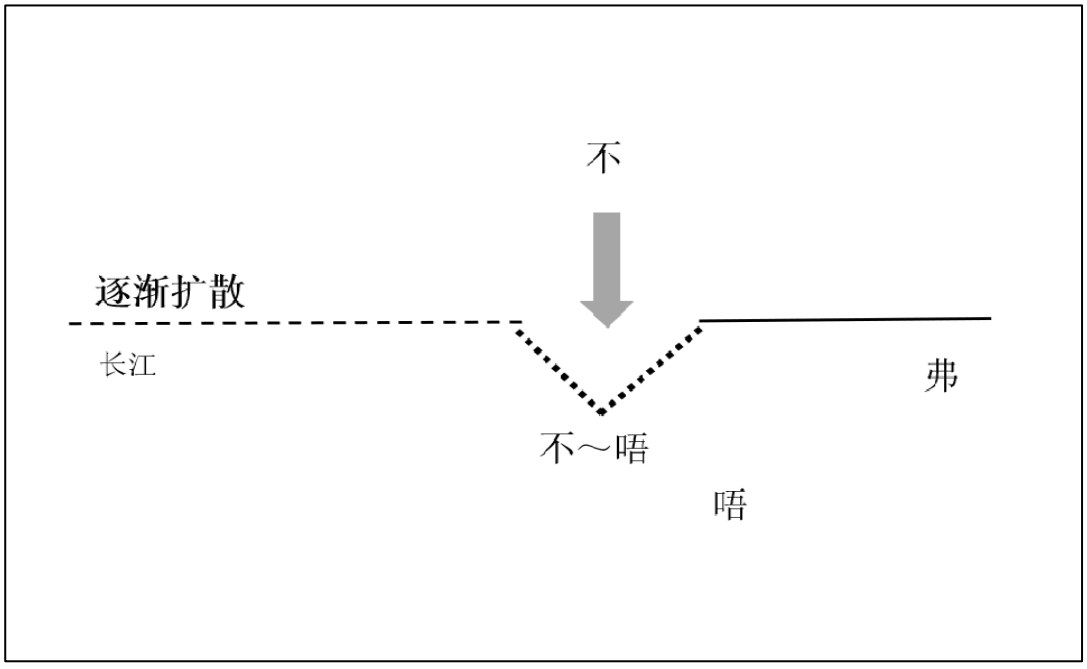


图 2：“漏斗式”向南扩散[5]

[5] 本图长江上游已为北方型的“不”系，故用虚线表示“上江线”已消失的部分，下同。

3.3 “江南漏斗型”形成

“阿”前缀位于亲属称谓前或名字前的现象，目前多集中在东南方言里。在“阿<方>名词前缀，用于亲属称谓前”（语法卷 044）的地图上，来自官话的“无‘阿’前缀”在东南方言区里形成了一个标准的“江南漏斗型”分布，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区，乃至广西东北部，浙江、福建西部都已出现了“无‘阿’前缀”的分布。不过，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湖北大冶、嘉鱼、咸宁，湖南平江、岳阳以及江西武宁、修水、永修、靖安、奉新等地，仍保留着“阿”的用法，是漏斗内部地区被北方形式冲刷后留下的残迹。这一演变在“阿<方>名词前缀，用于名字前”（语法卷 043）进行得更为迅速，“无‘阿’前缀”扩散的范围更大，湖南、江西境内基本上没有“阿明”“阿英”这样的形式了。同时，与 044 图相比，043 图漏斗开口在逐步扩大，安徽南部，浙江中部、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也成了“无‘阿’前缀”的分布区，“漏斗”底部近乎被北方型冲破，在此阶段，长江线已几近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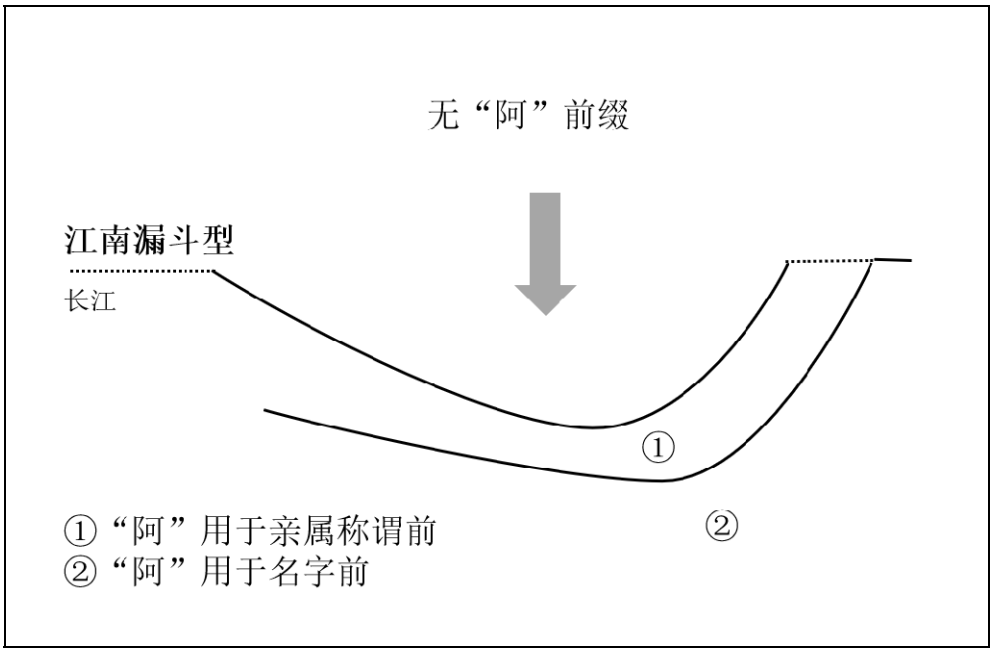


图 3：“江南漏斗型”形成

目前，在多张方言地图上都能观察到“漏斗式”在这一阶段的典型表现，如将不同的语言特征都反映到一张地图上，“江南漏斗型”其实是一个同言线束集中分布的地区，漏斗内部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南地区已成为北方型的领地。限于篇幅无法将所有

地图一一列举，仅列出以下几张供读者参考（内部北方型|外部南方型）：

柄特字的声调（语音卷 034）：来自上声|来自去声

问微的声母（语音卷 052）：零声母|m

今特字的声母（语音卷 109）：腭化音|舌根音

繫～鞋带（词汇卷 080）：繫|缚、绑、结、綯

煮～鸡蛋（词汇卷 089）：煮|煠、炆

走慢慢儿～（词汇卷 138）：走|行、跑、跳

宽路～（词汇卷 169）：宽|阔

把～衣服收回来（语法卷 093）：把|拿、将、帮、拔

值得一提的是，从不同地图上“江南漏斗型”的形状来看，显示了不同的方言特征在洞庭湖水系（即湖南东北部）与鄱阳湖水系（江西北部）的传播速度是不一致的。例如，“柄”字的声调在湖南全境范围内几乎都读同“饼”（来自上声），但在江西东北部与江淮地区接壤的地区，仍然读同“并”（来自去声）；“煮～鸡蛋”“宽路～”则更为明显，在湖南全境几乎都为“煮”系或“宽”系，但江西仍然是“煠”系或“阔”系的领地（后者在江西北部和西部地区还分布着“阔”“宽”两说），入声韵尾的演变及其音值类型（语音卷 123、124）里也体现出洞庭湖水系及其以南地区演变更快的特点。不过，在“繫～鞋带”的地图上却出现了反例，漏斗内部江西北部地区已基本是北方型的“繫”系，而湖南东北部只有紧邻长江的临澧、安乡、华容、岳阳、临湘、浏阳、平江、汨罗以及长沙为“繫”，长沙周边地区多是“缔”或“缔”“繫”两说，这说明了“繫”在湖南的传播和扩散才刚刚开始。由此可见，“漏斗式”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南地区传播的具体路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4 漏斗消失

在“你看看清楚<方>单音节动词重叠加补语”（语法卷 061）、“只鸡死了<方>量词定指”（语法卷 014）里，漏斗内部来自北方的形式继续向南、向东扩散，除了湖南、江西以外，福建、台湾、广东、海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单音节动词重叠加补语的语法形式了；而量词定指的特殊形式在大部分东南方言里已经消失，现仅主要保留在浙江、两广的部分吴语、粤语、平话、闽语等方言里。从地理分布类型来看，此阶段已由“江南漏斗型”变成了“东南沿海型”（曹志耘 2011），这意味着漏斗式的演变已经完成，汉语方言南北对立的分界线——长江线已消失。从演变的结果来看，“漏斗式”对长江线发生了根本性的破坏，南北对立的面貌仅保留在部分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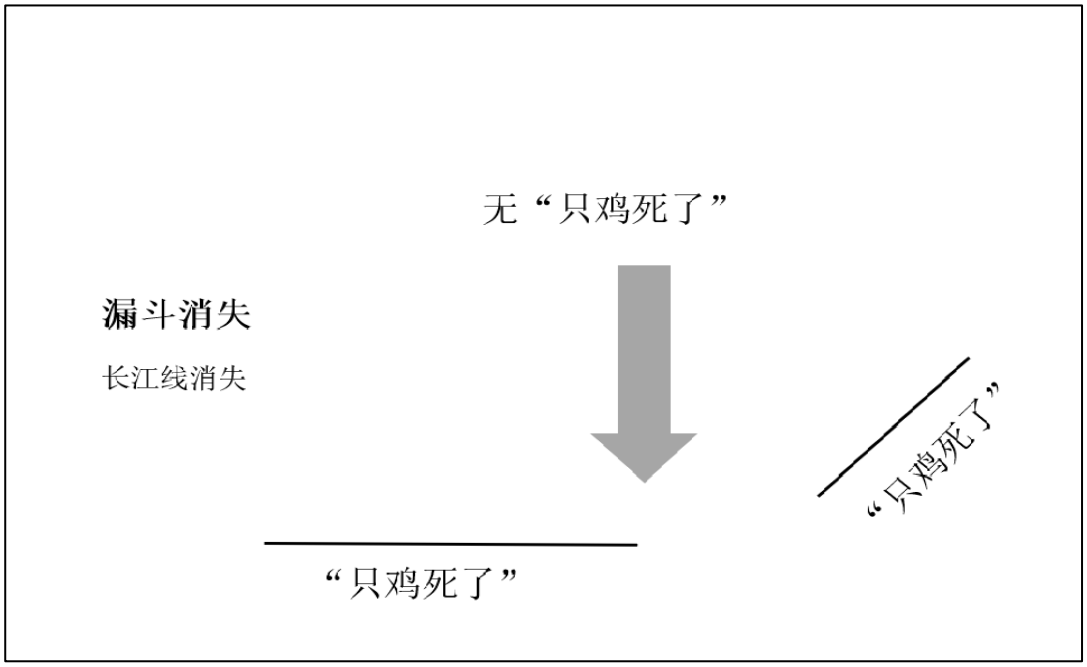


图 4：“漏斗式”演变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第 3.1-3.4 节列举的例证虽然都是个案式的，但源自北方的重要音变规律不乏按此模式演变的例证。例如“精见组细音声母的分合”（语音卷 066），除了胶东地区、河北南部及河南中北部地区以外，北方地区尖团合流的比例都大于 50%，而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合流比例在 34%以下，湖南、江西则介于二者之间，是东南方言率先发生尖团合流的区域[6]；又如，在“调类的数目”（语音卷 001）的地图上，“漏斗”内部是东南方言调类合并较快的区域，目前多为 5-6 个声调，比其他东南方言的调类数目要少。此外，根据笔者（2012）对汉语方言古全浊上与次浊上字分合关系的研究，发现“上声的全次浊分调”是一种北方型音变，它是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由官话方言向东南方言扩散的，进入长江流域后，上声的全次浊分调首先占领了与北方官话区毗邻的江西北部及湖南等地区，这些地区目前已属于“系统分化”，形成了典型的“江南漏斗型”分布；目前正逐渐深入东南方言的其他地区，湖南、江西最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及海南等地区属“部分分化”，表现为白读音合、文读音分（即文读层与官话方言相同），目前只有江苏南部、上海、浙

[6] 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东南方言尖团合流比例较高，可能是按照岩田礼先生提出的“北方方言的江东侵入式”演变的，本文暂不讨论。

江，以及广东北部、广西东部属“上声无全次浊分调现象”，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远隔分布”。

四、余论

本文以“漏斗式”为例，对汉语方言的地理演变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漏斗式”是北方方言特征进入长江流域后，进一步向东南方言扩散的重要方式。“漏斗式”与“侧翼区域模式”（项梦冰、曹晖 2005：58）或“ABA”分布（岩田礼 2009：20）有相同之处，即“漏斗内部”（相当于“非侧翼区”“B 区”）是后起的新形式，破坏了旧形式的连片分布。不过，“漏斗式”强调新形式从一个突破口进入旧形式的分布区，并对旧形式造成了漏斗形的覆盖。同时，对于汉语方言的宏观演变而言，新形式只能来自北方，扩散的方向自北向南，是不可逆的。而“侧翼区域模式”没有约定扩散的方向，“ABA 分布”强调新形式“B”是由中心地区发起的，其形成方式拥有多种可能性。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汉语方言主要的地理演变模式还有“台阶式”“通道式”等。“台阶式”是某个语言特征或某项语言变化在传播和扩散过程中，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渐变的特点，离起源地（北方）越近的地区变得越快，离起源地越远的地区变得越慢，与一级一级的台阶相似。由于目前南北对立的格局还未彻底消失，漏斗式还在进行当中，因此汉语方言在地理空间上至少会呈现出三级台阶：（1）第一台阶主要是长江以北地区，这是演变的起源地，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2）第二台阶在本文所说的漏斗内部，这是目前正在发生北方化进程的区域；（3）第三台阶在漏斗外部，这是北方化演变还未完全占领的区域，这一区域总体语言面貌较为存古，有时甚至还会发生特有的创新变化。“通道式”则是语言特征在河流、公路等交通要道内互相扩散传播的演变模式，目前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京杭大运河等都有相关现象（参看岩田礼 2009：19，曹志耘 2011）。此外，对汉语方言影响较大的地理演变模式还有岩田礼先生提出的“北方方言江东侵入式”“江淮方言词的逆向传播”，说明了江淮地区既是北方方言特征南渐的通道，也是东南方言特征向北挺进的源头之一。关于汉语方言其他重要的地理演变模式，我们将另文论述。

附记：本文研究得到了导师曹志耘教授的悉心指导；在研过程中，通过学习并有幸参与岩田礼先生主持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等项目，深受启发；本文主要观点得益于二位先生的言传身教，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文章如有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
曹志耘、王莉宁、张燕芬 2008 汉语方言里的“手”和“脚”《汉藏语学报》第 2 期
曹志耘 2011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美）罗杰瑞（Jerry Norman）著，张惠英译 1995《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
王莉宁 2012 汉语方言上声的全次浊分调现象《语言科学》第 1 期
王莉宁 2015 汉语方言入声的全次浊分调现象《语言学论丛》第 51 辑
王莉宁 2016《汉语方言声调分化研究》语文出版社
项梦冰、曹晖 2005《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
徐通锵 2001《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岩田礼 2012《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好文出版

The Funnel Norm of Geographical Evolution Norms in Chinese Dialects

Wang Lining
Center for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of Language Resources of Chin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geographical evolution norms, and explain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 evolution norms in the north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dialects, that is the Funnel Norm, based on the *Linguistics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Funnel Norm is one of the evolution norms representing the diffusion of northern dialects to southeastern dialects, which means that when a certain language feature or phonological evolution rule enters a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area, it diffuses to

the front and sides respectively, and regions closer to the origin have a larger changing area, and regions farther away from the origin have a smaller changing area, thus creating a V-shape changing area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shape of a funnel. The article finally points out that, from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besides the Funnel Norm, the geographical evolution norms of Chinese dialects include the Step Norm, the Channel Norm, the Diffusion Norm of northern dialects to southeastern dialects from Jiangdong area and the Reversal Diffusion Norm of Jianghuai region dialects to northern dialects proposed by Ray Iwata. The geographical evolution norms in Chinese Dialects are worth studying in depth.

“长江型词”与汉语词汇史研究

汪维辉[1] 王文香[2]
1.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2.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摘要：岩田礼先生提出的汉语方言“长江型分布”中有一小类，我们称之为“长江型词”，就是明代以后向北逆流的江淮方言词。“长江型词”学说对汉语词汇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价值。本文列举学界论述过的“长江型词”实例，对“天”和“进”是否“长江型词”做出补充论证。

一、“长江型词”学说及其实例

岩田礼先生是继贺登崧神父（Willem Grootaers，1911－1999）之后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主要开拓者，[1] 影响所及超出了方言学界，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有重要启示。限于能力和时间，本文仅就岩田先生提出的“长江型词”学说略作申述。

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及其《续集》是日本学者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此外还有岩田先生的一系列专题论文（详见“参考文献”）。其中《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绪论》是关于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总结，归纳了汉语方言的主要边界线（如南北对立的淮河线和长江线、东西对立的天目山－武夷山线和山西线）和分布类型（如“长江”型、古老“长江”型和楚地型）、方言词的传播及其传播路线（如以江淮为起点的传播路线和北方的传播路线）、词形分布的类型（如 ABA 分布、周圈分布和远隔分布）、连续性分布的原则和语言史的构拟以及语言地理学的几种概念（如通俗词源、推移性分布、类推牵引、类音牵引、同音冲突、同义冲突、混淆形式、污染、所指的转移等）。这篇绪论提纲挈领，纵横捭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1“长江型分布”和“长江型词”

汉语方言中有一种特殊的地理分布类型，表现在长江流域地区的方言呈现出很多

[1]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前言》提到的重要学者还有平田昌司、远藤光晓、太田斋等多位。

共同的语言特征，构成“长江型分布”[2]。岩田礼《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绪论》最早提出这一分布类型，下面摘引其相关论述并略作评论。

长江流域处于华北和华南的中间，在语言方面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过渡性，二是创新性。……长江流域方言的特点在于其创新性质。如下所论，语言的创新也会在被封闭的地区内产生，但很少传播到外地。本书所说的“长江”型分布则与此不同，分布领域竟达一千多公里，自下游至上游形成连续性的分布。

作为一种地理分布类型，长江型不仅体现在词汇方面，在某些语音和语法特征上也显示出惊人的一致。这种特殊的地理分布类型是何时、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岩田先生解释道：

这些词形的历史根源，至少多数是较浅近的，也就是说，这一分布类型的形成是属于晚期的，与自明朝初期以来汉人在云南的大规模移民有关。不用说，长江在明代以前就是人流和物流的要道：沿岸的要地有港口，其腹地则形成了用于运输的陆路网。14 世纪开始的云南开发必定加强了这一交通要道的功能。这里要指出一个事实：河水总是从上游到下游的顺流，人和物质以船运为媒介的移动则是顺流和逆流都会有的，而语言特征沿着长江的移动却总是以逆流为主的。所有方言都会产生新词，云南等西南方言也不例外，但那里产生的新词顺流传播到长江下游的机会必定甚少。不可否认，表现出“长江”型的词形多数都是江淮起源的，尤其是以南京和扬州为中心的一带应是语言创新的发源地。这一地区也可以称作“南方的核心地区”。

江淮起源的词有不少现在成了普通话的词汇，如“冰雹”、“早上”、“晚上”以及指定日子的“今天”、“明天”、“昨天”等时间词（按，“晴天”、“每天”、“春天”等有可能不是江淮起源的）。这些词在北方地区也有所分布，但较为零散。此乃标准语或权威方言的典型分布模式，但也会暗示江淮起源的一些词形有向北逆流的可能性。

就汉语方言来说，一般情况是，北方的形式处于优势，而南方的形式处于劣势。当然也有南方的形式向北传播的例子，尤其突出的是明清时期江淮官话对京师的影响。

“以江淮为起点的传播路线”如图 1：

[2] 曹志耘（2011）称之为“长江流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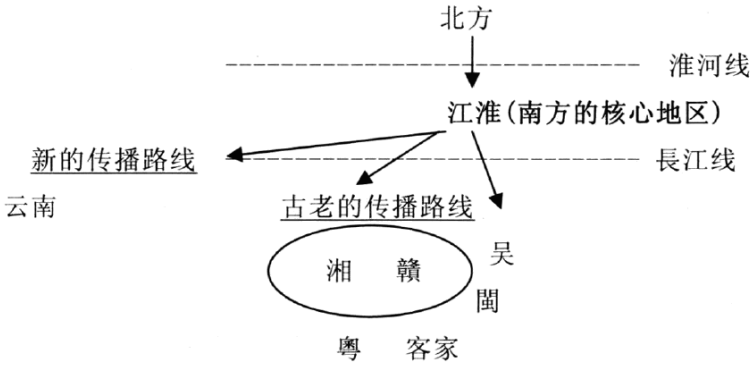


图　1

主要有三条传播的大道，均对华南地区的“北方化”颇有贡献。所谓“新的传播路线”主要于明代以后才开始起作用，表现在“长江型”分布的形成。

在“3.近代时期江淮方言词的逆向传播”一节，他对图 1 所示的传播模式做了补充：

图 1 所说“新的传播路线”，即江淮方言沿着长江向西的传播，是从“长江型”分布这一事实直接归纳出来的，其实有些地图暗示着近代以后，尤其是明代以后，以“南方的核心地区”为起点的语言放射至北方。上文指出，“冰雹”、“早上”、“晚上”、“今天”、“明天”、“昨天”等普通话词很可能是江淮起源，但一定程度也分布在北方，尤其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京师地区，我们认为多数是明代以后的逆向传播所致。[3]……不管变化的细节如何，肚脐一词的分布让我们要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其他词汇条目中也会有江淮方言词向北逆流，以致形成较为广大的分布领域的。[4]

划线部分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特别有启发，我们把这种明代以后向北逆流的江淮方言词称为“长江型词”。需要指出的是，岩田先生并没有使用过“长江型词”这一名称，这是根据我们对其学说的理解而提出的一个概念，[5] 相当于他所说的“长江型分布”中的一小部分，即起源于江淮地区，传播扩散并进入通语的词汇。根据这类词的

[3] 这种推测间接地支持了鲁国尧（1985）提出的“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当时的南京话”这一假说。
[4] 这是作者通过与汪维辉先生的学术交流得来的观点。
[5] 最早使用“长江型词”这个术语的是汪维辉、秋谷裕幸（2010）。

产生时间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代以前便已产生但鲜有用例，直到明清时期才在江淮地区呈现“井喷式”爆发，继而向北扩散到其他方言的词汇（如下文讨论的“进”等）；另一类是明代以来在江淮地区新产生并向北扩散进入通语的词汇（如下文讨论的“牲口”等）。[6] 这条传播途径图 1 中没有标出，我们认为可以增加一条箭头向上的竖线。

1.2“长江型词”的实例

有多少实例能证明“长江型词”的存在呢？底下分两个方面概述已有的研究。

1.2.1 岩田礼先生及其团队的相关讨论

1）时间词“今天、明天、昨天”与“早上、晚上”

岩田礼（2007a）指出汉语方言早期存在“今日”“明日”等中心语素为“日”的系统及〈明天〉[7] 说“明朝”、〈昨天〉说“昨夜”的系统这两个时间表达系统，而“天”类时间词是新兴起的词形，他推测：“‘今天’和‘昨天’很可能产生在长江下游的核心地区。这一推测的依据是，这两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其实也分布在北京、东北等北方地区，但是这些可能是后世从江淮移植所致。”又根据“淮河－秦岭以北以及江淮地区‘天’与‘个’的分布领域互相重叠或邻接”，推测“‘天’用以充当七个时间词的中心语素，首先开始在‘个’尾使用地区，即‘个’＞‘天’”，而且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江淮地区。作者给出两个理由：“第一，江淮方言的旧词多数缺少‘日’或‘儿’，如‘今个’、‘明个’等，如上所说，‘个’与中心语素相当，应该说方言内部就有条件接受‘天’。第二，江淮地区‘个’和‘天’的分布重叠。”[8] 通过考察“早上”“晚上”的地理分布，岩田礼（2007a、2009：76）认为这两个词都是江淮起源的，因为它们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尤其是江苏和安徽境内的江淮地区，但是在淮河以北的地区分布既少又分散。

2）月亮

岩田礼（2009：66，本条作者松江崇）指出：普通话词“月亮”（B 系），分布范围最广。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都有这个词形，但在山西中南部和山东中部则出现一

[6] 参看王文香（2019）。为避免术语相混，该文将这类词称为“江淮起源型词”。

[7] 岩田礼先生以“”表示词形，以〈〉表示词义所指，必要时辅以英文表示词义。本文遵循这一格式，下同。

[8] 关于“天”类词是否起源于江淮流域的问题，何亮（2017）有不同意见。下文 2.1 节将详细讨论。

些空白地区。在长江以南，“月亮”主要分布在浙江（包括江苏、安徽南部）以及湖南北部、贵州、广西、云南一带。“亮月”（C 系）主要分布在江苏，其分布区域被“月亮”所包围，且和“月亮”并用的点较多。由此可以推测，“亮月”是“月亮”基于某种原因发生语素倒位而生成的。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江淮地区起初应该是“月亮”集中分布的区域。

3）肚脐眼

岩田礼（2009：17）认为汉语中〈肚脐〉义词的方言分布是“肚脐眼”或“肚脐”逆流向北传播的见证。“就是说，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的‘肚脐（眼）’与北方原有的‘脖脐’冲突，致使‘脖脐’或者前带‘肚’或者后带‘眼’。从‘肚 p-/m-脐’类多数不带‘眼’这一事实看，向北传播的也可能是‘肚脐’，那么‘肚 p-/m-脐’类的产生应早于‘肚脐眼’，可能是明代以前。”岩田先生并未讨论变化的细节。《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依据“肚脐”义词的前置成分的不同，分为“肚-/腹-”系和“p-/m-脐”两系，两系大致以淮河为界，呈南北对立分布。A-1 类（多数是“肚脐眼”）分布在东北地区以及河南、山东、河北的部分地区。“肚脐眼”一词最多分布的是长江流域。作者据此认为，“肚脐眼”产生于江淮地区，后来传播到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岩田礼 2009：228，本条作者植屋高史）

4）冰雹

岩田礼（2009：72）认为：普通话词“冰雹”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虽然也出现在北方，但分布点除了甘肃以外都较为零散，据此可以肯定“冰雹”一词的发源地是江淮地区。“冰雹”在江淮地区分布最密集，但在安徽和湖北也出现“雪雹（子）”等“雪-”类（C-1），而这类最多出现在长江上游的四川、贵州和云南。此“雪-”很可能来自“冰-”，也是出于说话者在词义上的联想。长江上游也有“白-”类（C-2），即“白雨”、“白雪”等。“冰-”、“雪-”、“白-”这三种历史上互为有关的语素形成了典型的长江型分布。

5）臂拐

岩田礼（2009：192）认为：“拐、弯、倒”这三种语素的分布领域颇大，主体在长江沿岸地区，但也分布于山东半岛，总体来看形成连续性分布。这暗示着“拐”、“弯”和“倒”三种语素历史上互为关联。……基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断言“臂拐”的诞生地是江淮，后来沿着长江传播到西南地区，可能向北也传至山东半岛。

6）孤拐

岩田礼（2009：204）认为：[kukuai]可能是江淮起源的词，后世向北扩散。此词指踝子骨的用例，《汉语大词典》举了两例，一是元代宫天挺的戏曲，二是《西游记》第 32 回（第 15 回也有一例）。按，宫天挺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宦居南方。

7）“拐”词族

岩田礼（2009：206）认为：“胳拐”后来按音变规律变成[kəʔkuai]，然后也变成“孤拐”[kukuai]。发生这一变化的地区可能是江淮，后来也扩散到北方地区，可能是明代以后。在 14 世纪汉人迁入云南以前，长江流域广泛地存在 ankle 和 elbow 都说“guguai”的方言。总之，“guguai”来源于“胳拐”。此乃中古时期存在的俗语。这个词后来在淮河以北地区几乎被淘汰，但在江淮地区一直保留并变成“guguai”。现在“guguai”也分布于北方地区，用以指称四种肢体部分，此乃近代江淮的方言词向北逆流的结果。

8）脾寒、摆子

岩田礼（2008a；2009：236）认为：“脾寒”和“摆子”可能都来源于古官话，也就是，产生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淮方言区。先产生的是“脾寒”，它先遍及江淮，然后也向山东及江西传播。“摆子”的诞生较之晚些，但传播的范围较之广得多，主要依靠明代以后发达的传播路径，即长江。

9）老鼠

岩田礼（2012：64，本条作者王莉宁）认为：A-1“老鼠”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整个东南方言区和西北官话区，在东北与西南地区，它与“耗”系呈交错分布状态。“耗”系在黄河以南至秦岭－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出现了分布的断层，从而呈现出“东北－西南”型远隔分布的面貌。从秦岭－淮河线南也有少量“耗”系分布的情况看，一种可能的演变途径是中原地区曾被“耗”系占领，晚期来自江淮地区的“老鼠”向北逆流，冲破了“耗”系的连续性分布并再次扩散至华北平原。

10）蜘蛛

岩田礼（2012：77）认为：A-1 类“蜘蛛”在长江流域分布最多，而除了晋东南，它在淮河-秦岭以北地区的分布较为零散。长江流域多见的另一种形式是 A-6 类，即“结蛛”、“织蛛”等，其首位音节均为舌齿音声母开头的入声音节，定是来自“蜘”，

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促化。A-1、A-6 二类的分布互为邻近或叠加，构成“长江型分布”。

11）西红柿（“洋”系修饰成分）

岩田礼（2012：102，本条作者铃木史己）指出：修饰成分 C“洋”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延伸到四川、云南，也零星分布于东南地区。修饰成分“洋”在其他外来植物的称呼中也出现，呈现出类似的分布倾向。[9] 从分布情况来看，C 系很可能起源于江淮地区。

12）早饭

岩田礼（2012：114，本条作者张勇生、岩田礼）指出：“早饭”的分布面积较广，但在江淮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表现为集中分布，《第一集》地图 4 的解说认为，“早上”一词发端于江淮地区，从地图分布来看，“早饭”一词也可能源于江淮地区。但呈现长江型分布的词形不一定都是江淮起源。并且据我们所知，江淮起源的普通话词在文献出现的年代一般是明代以后，如“今天”、“明天”等时间词（岩田礼 2007）。然而，“早上”的用例已在南宋的《朱子语类》出现几例。如，“早上看了，晚间又看。”（《朱子语类》第 10 卷）“早上”是否江淮起源，尚需做进一步的探讨。

13）“房”和“屋”的类型（地图 38）

岩田礼（2012：124）认为：北方早期存在“原型”（“屋－房”），而后来“南京型”（“房－房”）传至北方地区。这致使“原型”中 house 义的“屋”由“房”代替，但“屋”并未因此消失，反而转移到 room 义上了。换言之，“原型”和“南京型”的冲突导致了推链式的词汇变化。[10] “南京型”可能先在江淮地区产生，然后由陆地传至山东，并产生了“屋－屋”。

14）口水

徐建、岩田礼（2014）考察了汉语方言“口水”“唾沫”义词的分布，“口水”是目前标准语的形式，但它密集分布在苏北和西南地区，呈现出“长江型”分布，文章据此认为“口水”可能起源于江淮地区，分别向南北方扩散。[11]

---

[9] 参看《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地图 24，马铃薯的修饰成分 A-4“洋”类主要与“芋”结合，其分布领域以长江下游为中心，沿着长江一直延伸到云南。

[10] 荆亚玲、汪化云（2018）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该演变是在历时发展中“房”“屋”二者互相渗透造成的，是词义的类同引申。

[11] 遗憾的是文献中“口水”一词在清代以前的用例极少，难以检验方言地理学的这一推论。

1.2.2 汉语史学界论述过的“长江型词”

岩田先生的“长江型词”学说引起了汉语词汇史研究者的兴趣，在他的影响下，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发掘了一批“长江型词”的个案，[12] 有的直接受惠于方言地图（包括《汉语方言地图集》《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及其《续集》），通过与历史文献的互证来确认“长江型词”，有些则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进行探讨。下面大致以成果发表时间为序作一简单介绍。[13]

1）站

汪维辉、秋谷裕幸（2010）根据“在官话方言区中，江淮官话基本都说‘站’”以及“从文献来看，‘站’的早期用例主要集中在江淮官话区作家的作品中”两个因素，推测“站”很可能是“长江型词”。这应该是最早从词汇史的角度对“长江型词”进行讨论的文章，此后的研究大体都采取这一思路。

2）太阳、月亮

根据汪维辉（2014b/2018b）的研究，“月亮”出现在明代，很可能是一个“长江型词”[14]；“太阳”也呈现出长江型分布的特点，它的出现较早，可能并非起源于江淮地区，“但是在通语中与‘日头’形成竞争并扩散开来则是明代以后的事情”。

3）抬

殷晓杰、宋小磊（2012）讨论“两人或两人以上合力举物”义词的分布与演变，指出：“‘抬’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逐渐成为新的通语主导词，‘抬’很可能起源于江淮官话，然后往北往南扩散”。

4）店

殷晓杰、胡寻儿（2021）讨论“店铺”义词的演变情况，认为明清时期“肆”基

---

[12] 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此类现象，虽未明确使用“长江型词”这样的概念。如杨荣贤（2017：91）认为晚唐五代时期“挑”表肩挑义已经萌芽，“到南宋用例比较普遍，而且集中见于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作家作品中……而同时期其他方言地区的作品则极为少见”，但到元代“挑”字用例反而罕见，“到元末明初具有江淮方言背景的《水浒全传》中，‘挑’的用例却又迅速增加，一举替换了‘担’，而且替换较为彻底”，文章认为“挑”的发展与官话基础方言的变更有密切联系。

[13] 同一作者的成果排在一起。有些学者没有直接使用“长江型词”这一名称，或者对“长江型词”有不同的理解，只要是符合我们的“长江型词”定义的成果均在介绍之列。

[14] 引用了《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的材料和看法。

本消亡，“店/铺”的竞争达到高峰，最终形成“南店北铺”的格局。“店”多用于南方方言，或源于江淮官话向南扩散，与江淮官话临近的吴方言区用“店”最多。而普通话的书面语在“店/铺”中却选取了南方的“店”，其原因较为复杂，可能也与“旧官话”有关，“店”以早期官话（南音）为基础成为通语词。[15]

5）撂（撩）

刘宝霞、张美兰（2013）指出：虽然“撂（撩）”产生于中古时期，但再次使用却是从明代的南方开始的，且用例多集中在江淮地区作家作品中。“撂（撩）”的传播途径符合“长江型”词的传播特点。

6）接

刘宝霞、张美兰（2014）认为表示“娶妻”义的“接”的传播途径符合“长江型”词的传播特点，“接”萌芽于中古，宋元时期用例增多，明代的江淮方言作品中，“接”先取得优势地位，藉助当时江南地区发达的文化优势向北方传播，并迅速扩散，逐渐渗透到通语中。

7）端

晁瑞（2014：76）根据“端”的“搬移”义最早主要出现于《西游记》，也多出现在清代中叶扬州话文献《清风闸》中，认为“端”是江淮官话方言词，“掇”是南方型词。“端”作为“长江型词”，明代借助江淮官话的优势地位北播，并与通语中的“搬”产生竞争，导致词义分工的调整。

8）屁股

王文香（2015/2019）、张爱云、徐建（2021）均讨论了“屁股”的使用情况，除去元杂剧宾白中的用例，“屁股”较早出现在《西游记》等文献中。王文香（2019）根据作者、作品成书及文献用例等情况进行列表梳理，明代用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情形：作者或编者为江浙籍、作者曾寓居南京、作品间有因袭关系（如《西游记传》《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与《西游记》中用例同）、作品或经江浙籍作家改定（如《三遂平妖传》用例见于冯梦龙所补四十回本）。除上述四类外，明代用例仅余《金瓶梅词话》（42 例）和佚名的《醉醒石》两种。可见就作者籍贯和早期用例而言，“屁股”

[15] 结合江淮官话中的扬州话和南京话用“店”不用“铺”的情况，作者引用了岩田礼（2009）关于“长江型词”的论述，但认为“‘店’早在晋代出现，应不属于‘长江型词’”。

一词在明代多出自江浙籍或在江浙活动的作家笔下。结合现代方言中的地理分布，认为“屁股”起源于江淮地区，是一个“长江型词”。

9）牲口

王文香（2019）提出“江淮起源型词”的说法，文章考察了“牲口”“嘴巴”“玩耍”“陌生”“解手/方便”“躲避”“捉弄”“上当”等词语，从历史演变和共时分布的角度，论证这些词语属于江淮起源型词。以“牲口”为例，元杂剧宾白中虽有用例，但不能作为“牲口”一词始见于元代的早期例证，“牲口”的确切例证较早见于明初洪武年间编制的《大诰》等系列诰书，而同时期北方文献多用“头口”“头匹”，结合后期文献用例和方言分布情况，文章认为“江淮地区很可能就是‘牲口’一词的源生地”。（王文香 2018，2019）限于篇幅，其他例子不再一一赘述。

10）很（狠）

汤传扬（2017）推测程度补语“很（狠）”（即“好得很”的“很”）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向北向西扩散。这一推测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在官话区中，江淮官话基本都有“X 得很（狠）”结构，而在其他官话方言该说法分布有限，若程度补语“很（狠）”源于其他官话方言，则不好解释；二是从文献来看，早期用例主要集中在带有江淮方言色彩的《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等作品中，北部官话文献中几乎看不到。据此，文章推断程度补语“很（狠）”的发源地在江淮官话区，“明中期以后，程度补语‘很（狠）’借助江淮官话的优势地位向周边扩散，有些地区已被完全覆盖，有些地区被部分覆盖，有的则尚未波及。”

11）抓

曾昭聪、曾文斌（2021）认为“抓挠”义的“抓”很可能是“长江型词”。“抓”的早期用例主要在南方使用，明代方言背景下很可能是南系官话的《训世评话》以及主要由南方通语写就的“三言”中只用“抓”，而且现代汉语方言中“抓”集中分布在江淮官话地区，并以江淮官话为中心向其他区域扩散。

学者们所指出的以上这些“长江型词”，是否都确凿无疑，还需要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1.3“长江型词”与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形成

从上述二十几组个案不难看出，“长江型词”学说对研究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形成

有着重要的意义。汪维辉（2018a）以《训世评话》（代表南系官话）与《老乞大》《朴通事》（代表北系官话）的比较为出发点，讨论近代官话词汇系统的形成，认为南北官话的融合并非始于民国时期，而是早在明代就开始了。文章梳理了“物事/东西，立、立地（的）/站，入/进，走/跑，饥/饿，（天）明/（天）亮，便/就”7 组常用词，认为都是南系官话的词语取代北系官话进入了通语。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长江型词”个案补论

哪些是“长江型词”、哪些不是，有时会有不同意见，需要进一步考辨；还有哪些未被发现的“长江型词”，也需要继续研究。下面各举一例来说明。

2.1 “天”类词的源生地及其对“日”类词的替换

如上所述，岩田礼（2007a）指出汉语方言早期存在“今日”“明日”等中心语素为“日”的系统及〈明天〉说“明朝”、〈昨天〉说“昨夜”的系统这两个时间表达系统，而“天”类时间词是新兴起的词形，推测“‘今天’和‘昨天’很可能产生在长江下游的核心地区”。

在岩田礼（2007a）的基础上，何亮（2017）结合方言分布及历史文献，对汉语方言的[昨天][今天][明天]来源重新做了梳理，他对“天”类词起源于江淮流域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其理由可概括如下：①“今天”“明天”分布广泛，不仅包括长江流域，还包括中原、冀鲁官话等地区；②长江下游地区分布最密集的是“今朝”“明朝”；③“昨天”“明天”宋元明未见用例，较早的用例出现在河南人李绿园的《歧路灯》。他据此认为：“直到清代，北方的一些地区才开始发生‘昨天’‘今天’‘明天’对‘昨日’‘今日’的替换，因而在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明日’与‘明天’、‘昨日’与‘昨天’等词语交错分布乃至同时存在；……江淮官话区有的地方说‘明朝’也说‘明天’，则是‘明天’扩散的结果。”

对何亮（2017）提出的疑问和结论，我们认为可以解释和商榷。

首先，“今天”“明天”的分布区域，我们认为地图上反映出的中原官话、冀鲁官话等广大地区的用例，是后来“天”类词传播扩散和“普通话化”的结果，“天”类词分布最集中的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点可从下文“天”类词较早出现的文献用例得到佐证。

第二，长江中下游“今朝”“明朝”的分布，应该是汉语史上“昨朝、今朝、明

朝”系统的历史遗留，岩田礼（2007a）认为“历史上曾有一个时期‘明朝’遍及大部分汉语方言地区，不管南北”。“朝”在长江流域还用于表“后天”或“前天”，“这就说明，‘明朝’的‘朝’转用于表其他时间词，这种创新的潮流发源于长江下游一带，后来扩散到长江中游及南方地区。”而“今朝”的分布，岩田礼（2009：15）认为属于“古老长江型”。“朝”类词的产生和分布并不影响“天”类词来源于江淮地区，二者是不同历史层次的反映，“天”类词的产生时间是比较晚近的。

第三，何文根据“天”类时间词的始见年代及书证，推测晚至清代北方地区才开始发生“天”类词对“日”类词的替换，这是对文献资料掌握不全面而作出的判断，这涉及“天”在何时何地产生“日”的意义这一关键问题。[16] 汤传扬（2018）已对何文的结论提出不同看法。据他考察，专指白天的“天”已见于明代文献，引例如下：

（1）具官臣杨延和谨奏:……炎暑长天，困卧床褥，奄奄待尽，以日为年……正德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杨延和《杨文忠三录》卷七，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五年序刊本）

（2）看他春归何处归，春睡何曾睡?气丝儿怎度的长天日?把心儿捧凑眉，病西施。小姐，梦去知他实实谁?病来只送的个虚虚的你。（汤显祖《牡丹亭·诊祟》，明万历刻本）

汤文所引“天”的用例出现在“长天”“长天日”中，表示“白天”义还不够典型。据笔者考察，明代确已出现相当于“日”的“天”，《露书》卷九《风篇（下）》（明天启刻本）：“一天：一日也。蜀中。”《露书》为明代莆田姚旅所作，“风篇”记述风俗人情及各地方言，可见“一天”表“一日”已在蜀地使用，蜀中地区“一天”的用法很可能不同于通语或姚旅自身的方言，故记录之。较早用例又如：

（3）及查津门晒扬，直为插和，浥烂之辈，间一行之，实未能逐帮晒扬，且亦未若京通晒二天、扬一天之事也。（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 11《题议漕粮剔蠹裕储十款疏》，明崇祯刻本）

（4）晒扬米色，必欲如法，该臣等看得漕粮晒二天，扬一天。有灌和者，晒扬

[16] 蒋绍愚（2012）考察了“天”的意义的演变，也认为直到清代“天”才开始取代“日”，引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用例。他指出，从“一天”发展到“今天/昨天/明天”是非常自然的，认为清代魏秀仁《花月痕》（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序）中的“今天”“明天”“昨天”是较早的用例，汤传扬（2018）还提供了《聊斋俚曲集》中“昨天”“明天”“前天”的用例，可参看。

各加一天。(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16《覆六仓监督条奏立法厘弊疏》，明崇祯刻本)

(5)单玉是同事之人，晓得其中诀窍，遗生未去之先，他早有此意，只因意思不决，迟了一两天，所以被人占了先着。(李渔《连城璧》戍集)康熙写本及日本钞本均作“天”，无异文。

可见至迟在明代，“天”表示“一昼夜”已在口语中行用。上述用例多见于南方地区，汤传扬(2018)通过考察杨延和、汤显祖的籍贯履历，认为可能是受南京官话的影响。我们新发现的3例，毕自严(1569—1638)虽是山东淄博人，但(3)(4)两例都出自“云南司”的文件，李渔(1611—1680)，浙江金华兰溪人，生于南直隶雉皋(今江苏如皋)。结合历史文献与方言分布，推测“天”类词源于江淮地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此外，“昨天”“今天”“明天”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用例较多，也可以作为旁证。何亮(2017)推测清代北方地区出现“天”类词对“日”类词的替换，主要是基于《歧路灯》的用例，早期用例的发现可以否定这种说法。

关于“天”类词对“今儿(个)”“明儿(个)”“昨儿(个)”的替换，汤传扬(2018)对比了几部北京话小说，其统计数据如下：

表2 “今儿(个)”与“天”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四部北京话小说中的使用情况

	儿女英雄传	春阿氏	二马	四世同堂
今儿(个)	32	5	4	10
今天	0	16	44	327
昨儿(个)	9	5	3	0
昨天	0	24	11	20
明儿(个)	9	6	3	4
明天	0	23	24	71

汤传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明天”“昨天”的使用频率增加，成为普通话的词语。这与太田辰夫(1991：300)的判断一致，太田先生在讨论《小额》的词汇特征时说：“说到‘今日’、‘明日’时，多用‘今儿’‘今儿个’‘明儿个’，但‘今天’‘明天’等也可看到。‘今天’等可认为是从南方引进的，但已能看出普通话的倾向。”另外一部北京话小说《北京》的用词也受普通话影响较大，“本书表示日期用‘今天’‘明天’‘昨天’等，不用北京话的‘今儿’‘今儿个’。只有‘明儿’，但它作为‘将来’义的副词来使用。”(太田辰夫1991：320)同样，老

舍后期的作品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天”类时间词起源于江淮地区的推测是可信的，可以得到汉语史和方言地理学的支持，广大北方地区及其他方言区“天”类时间词的广泛使用，应该是“长江型词”传播扩散的结果。

2.2 “进”是否“长江型词”

关于“进”对“入”的历时替换，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李宗江 1997，董志翘 1998，李宗江 1999，汪维辉 2001，陈莉 2006，谭代龙 2008：117，马云霞 2009 等），讨论的重点在“进”表“进入”义的早期用例以及“进”对“入”的替换情况。本文概述已有的研究，并对“进”是否“长江型词”再做一点探讨。

汪维辉（2000/2017：291）对“进”表“进入”义的早期历史有如下论述：

> 管“进入”叫“进”的始见年代应从目前所认为的晋代提前到东汉；在魏晋南北朝，这种“进”字已颇为常见。但此时“进”字意义单一，用法颇有局限，尚处于跟“入”竞争的初级阶段。“进”侵入“入”的义域是从“（人或动物）进入建筑物”这一点上开始，然后再扩展到其他方面的。至迟在梁初的金陵一带口语里，“进”在“进入建筑物”这一义位上已经取代了“入”。

汪维辉（2007）指出：《齐民要术》不用“进”只用“入”，而《周氏冥通记》“进”的用例多达 7 例，“用例之多在同时代文献中很值得注意”，“从本书这组词的使用情况来看，表达‘进入房屋’这一概念在陶弘景的口语里应该已经是说‘进’了。在梁初任昉（460－508）《奏弹刘整》所录的诉状供词部分，4 处讲到进屋，都用‘进’而不用‘入’，这是当时南朝金陵一带口语在这种场合说‘进’而不说‘入’的铁证”。不过“由‘入’到‘进’的转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汪维辉 2001）。

李宗江（1997）认为：

> 表示“内行”义的“进”在六朝产生以后，当时使用的不多；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没有发展，在唐宋时很难见到，只有个别用例，且不典型。[17]

[17] 董志翘（1998）则认为“唐宋时代趋向动词‘进’表‘内行’义的例子触处可见”，李宗江（1999）不同意其看法。陈莉（2006）认为并非“很难见到”，但也不是“触处可见”：“在浩若烟海的唐宋文献中，笔者仅发现了 20 多例较为典型的‘进 $_1$’。”应该说，唐宋时代“入”占绝对优势，“进”只有少量零星用例，这是基本事实。

比较典型的“进”在元代重新出现，并较多地与“来”、“去”搭配使用，……但在元代尚不多见，……“进”的用例到元末明初开始增加，如《汇编》（元明）所收明初语料，《正统临戎录》就见19例，而“入”只有7例，可见“进”在当时口语中已很常用。

“进”对“入”的替换过程从元代开始，到明末已基本结束。下表“进”和“入”数量变化的对比，具体反映了这个替换过程。

表一

文献	取例范围	取例总数	入数	进数
水浒	43—49回	100	87	13
西游	36—42回	100	39	61
醒世	1—7卷	100	37	63
拍案	1—7卷	100	30	70

文献	取例范围	取例总数	入数	进数
金瓶	38—46回	100	23	77
红楼	3—12回	100	26	74
儒林	5—11回	100	8	92
儿女	2—11回	100	4	96

到明末，在实际口语里，“进”对“入”的替换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清代文献中“入”的用例已属于在书面上的残留。

上述结论总体可信。陈莉（2006）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研究，调查了更多的明代文献，补充了“入一进”在明代的更替过程。因为明代的演变情况对于判断“进”是不是一个“长江型词”特别重要，加之原文不易获见，所以下面详引她的相关论述。

到了明代，“进$_1$”[18]开始飞速发展，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替代“进$_2$”成为“进”这个词的中心义项，同时，它也逐渐替代“入”成为“进入”义的主导词。如表：

明（表1）

文 献	三 遂	水浒传(前90回)	秘 史	临戎录	训世评话	老谚	朴谚
入：进$_1$	137：17	963：139	60：0	6：19	12：5	9：1	27：0
进$_1$：进$_2$	17：2	139：165	0：11	19：2	5：8	1：0	0：0

（表2）

文 献	西游记	金瓶梅（前60回）	型世言	山歌
入：进$_1$	564：539	197：591	179：262	12：16
进$_1$：进$_2$	539：120	591：12	262：53	16：1

[18] “进$_1$”表“进入”义，“进$_2$”表“前进”义。

在《三遂平妖传》中，虽然“进$_1$”还很少，但它已经成为“进”这个词的中心义项。在《水浒传》中，“进$_1$”的用例也已经接近“进$_2$”，达到了139例。从书中“进$_1$”和“入”的使用情况来看，“进$_1$”已经发展成熟，……但是，在与“入”的竞争中“进$_1$”仍然处于弱势。

比《水浒传》时代稍晚的一些明初文献则呈现出3种情况：

1. 在《元朝秘史》、《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入”还是表示“进入”义的绝对主导词。

2.《训世评话》中，“进$_1$”有一定数量，但未超过“入”，与“进$_2$”相当。这种情况与《水浒传》保持一致。

3.《正统临戎录》中，“进$_1$”已经占据“进”这个词的中心地位，在使用数量上也已经远远超过“入”。从“进$_1$”占据“进”这个词的中心地位这一点看，与《三遂平妖传》相同。

同是公认的北方语料，《正统临戎录》与《元朝秘史》、《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在这组词的替换上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前者相当超前，后者则非常保守。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立—站”[19]这组词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正统临戎录》并非纯正的北方语料？[20] 因为它的作者哈铭虽为蒙古人，但他幼年即随父在明朝为通事（参看刘坚《古代白话文献选读》）。而据《语言自迩集·译序》：“日本的汉语教学，从江户时代到明治九年，无论官办民办，各学校教的都是‘唐通事时代的南京话’。”可以推断，当时中国官方外交正式用语应该还是南京话，作为通事，哈铭说的应该也是南京话，当然，受母语影响，其中也会夹杂蒙古语成分。既然“至迟在梁初的金陵一带口语里，‘进’在‘进入建筑物’这一义位上已经取代了‘入’”，那么，在明代的南京话中，“进$_1$”应该相当常见，哈铭书中“进$_1$”超前的现象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管见，要证实这一推测，还有待于对全书语言事实作进一步的考察。

到了明中晚期，“进$_1$”继续发展，逐渐超过了“入”，表现出以下特点：

1. 在《西游记》、《金瓶梅》中出现了“进”、“出”对言的用例。到了《型世言》、《山歌》中，“进”、“出”对言更是经常见到。

2. 重言形式“入进”消失，固定为“进入”。

3.“进$_1$”的比例开始超过“进$_2$”，成为“进”这个词的中心义项，在《金瓶

[19] 参看陈莉（2006）“立—站”条。

[20] 引者按：汪维辉、秋谷裕幸（2010）发现《正统临戎录》“站”出现2例，未见“立”，跟北方文献不同，而与《训世评话》一致，指出：“《正统临戎录》的方言背景暂时无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梅》、《型世言》、《山歌》中，“进$_2$”的比例远远低于“进$_1$”。

4. “进$_1$”的词义开始虚化，出现了复音词“进门”、“进赘”。

到了清初，“入”已经基本被“进$_1$”取代。

以四种版本《老乞大》为例，在《原本老乞大》中没有“进$_1$”，《老乞大谚解》中出现1例，而《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谚解》中“入”分别有2例，可能是修改者修改不彻底而残留下来的，除此以外，全部都用“进$_1$”，如：

行李都搬入来者。把马每松动者，且休摘了鞍子。你去问主人家索几个席子蒿荐来，就待（带）个苫幕来拂绰。行李且休搬入去。等铺了席荐时，一就搬入去。(《原本老乞大》)

行李都搬入来着。把马们都松了,且休摘了鞍子。你去问主人家要几个席子稾(稿)荐来，就拿苫帚来扫地。行李且休搬入去，等铺了席荐时，一发搬入去。(《老乞大谚解》)

行李都搬进来，把马拴了，且不要摘鞍子。你去问主人家要几领席子草荐来，就拿笘篦来扫地。行李且不要搬进去，等铺了席子草荐，再搬进去。(《老乞大新释》)

行李都搬进来，把马拴了，且不要摘鞍子。你去问主人家要几领席子草荐来，就拿笘篦来扫地。行李且不要搬进去，等铺了席子草荐再搬进去。(重刊老乞大谚解)

但是，“进$_1$”在明清时期的南部方言中并没有发展。在明嘉靖刻本的《荔镜记》中，“进$_1$”仅8例（包括3例“进赘”），而“入”则有62例。到了清代的《俗话倾谈》中，“进$_1$”仅1例：“守者曰：‘系老哥的知己吗？随便进去。’”（二集）其它全部用“入”。现代汉语方言中，南部方言区的梅县、广州、厦门、雷州仍然用“入”表示“进入”义。

虽然“进$_1$”在用法上递有发展，但从上文的考察看，它在文献中的使用数量呈现出升一降一陡增的趋势。“进$_1$”在六朝已经有相当的用例(参看汪维辉2000,2001；李宗江1997)，但整个唐宋元时期，它在文献中极为少见，到明初，它却突然发力（集中在以江淮官话为背景的文献中),开始飞速发展,很快就超过了“入”。汪维辉(2001)推测：“‘进’本来在南方口语里已经取代了‘入’（仅就‘进入建筑物’这一点而言，下同)，但随着隋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向北方的转移，南方话势力衰落，‘进’只能在有限的地盘内自生自灭,因此在此后很长时间里一直未能成为文献语料中‘进入’义的主导词。”笔者认为这种推测是合情合理的。而它在明初江淮官话文献中的突然发展，也应该和明初江淮官话地位的上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明初“进$_1$”的使用情况也可以得到印证：它在北方语料《元朝秘史》和《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用例极少，而在江淮官话区文献《三遂平妖传》、《水浒传》中却已有相当多的用例。

很明显，在明初，“进$_1$”在江淮地区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北方地区。

陈莉对明代文献所反映的南“进”北“入”整体格局的论述是很清楚的，唯一没有论及的例外是《金瓶梅词话》。作为一部山东方言背景的明末小说，《金瓶梅词话》用“进”的比例之高甚至超过了一些南方作品，这在北方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金瓶梅词话》的用词往往跟北系官话不一致而与江淮官话和北部吴语区的作品趋同，这一现象的原因还有待解释。[21]

在李宗江（1997）和陈莉（2006）的年代，还没有“长江型词”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的研究表明，“进”就是一个典型的“长江型词”。它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不晚于东汉产生（最初的源生地不明），至迟在梁初的金陵一带方言里已经取代“入”成为口语常用词，唐宋元时期一直“潜伏”在江淮地区（可能也包括部分北部吴语区），用法不断丰富，明初开始“发力”，北上西进，在大部分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取代了“入”，这个过程到明末已经完成。但是它并没有继续南下，今天的闽语、粤语、客家话不少地方还是说“入”，没有受到“进”的覆盖。

2.3 “日→天”“入→进”的更替原因及其与“长江型词”的关系

最后顺便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长江型词“天”“进”的兴起及其对“日”“入”的替换，有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原因——避讳。人类语言通常要避讳与性有关的词汇，汉语一般会采用改变读音或词汇替换的避讳方式。这两组词都属于词汇替换型，避讳的是同一个亵词，就是“𠯿（入、日）”（男子的性交动作）。

蒋绍愚（2012）曾提出“用‘一天’替换‘一日’为什么那么晚”的问题。我们认为，大概元代以后，“日”与亵词“入”才同音，在此之前还无需避讳。汪维辉（2018b）曾经指出：“到了近代汉语阶段（大概从元代开始），‘日’在北方地区与亵词‘𠯿’（又写作‘入’等）同音，所以逐渐被‘太阳’所取代。……这也正是‘太阳’一词今天主要分布在官话区和吴语的原因。……在大部分非官话区，‘日’字不需避讳，所以就没有改称为‘太阳’的必要。”“太阳”对“日”的替换很晚，到《红楼梦》时代使用频率仍不相上下，直至今天替换也还未完成。刘曼（2021）考察了阳历记日词“日、号”的来源和传播，对二者的语体对立、形成分工的过程进行了描写。认为“号”退出书面语、专用于口语的演变动因是象似性、经济原则和民族主义的排外心理。笔者认为，该文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避讳对演变的影响。这一点石汝杰（2016）已指出，表示“一个月内的某一天”这一义项的“日”，在口语中说成

[21] 参看汪维辉（2014）。

“号”，原因也在于要尽量避开“日”这个音。

关于“进”替换“入”的原因，李宗江（1997）认为：

> “入”在元明之际被“进”所替换，可能还与“入”本身的某种弱点有关，在元代，“入”的主要弱点是用于禁忌字眼儿。虽然还不能说在元代以前“入”绝不这样用，但说它从元代起才较多地用于脏字儿是没有问题的。（马思周 1992）因为“入”是一个相当常用的动词，如果读音和字形都与常用的脏字相同，在交际中造成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与过去“入”同义的禁忌字眼儿没有同音字，也是这个道理。

汪维辉（2001）指出：“南北朝时期‘进’的用例明显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状态。”“至迟在梁初的金陵一带口语里，‘进’在‘进入建筑物’这一义位上已经取代了‘入’。”可见“进”可能一直是一个江淮地区的方言词。前文已经指出，“天”的早期用例也多出现在江南文献。就现在的分布来看，“进”对“入”的替换完成较早，如今已成为通语词；“太阳”主要分布在官话区及吴语区；“天”的分布与之有很大的重叠部分。“太阳”和“天”集中分布的地区，也正是“入”读作 rì 的地区，李荣（1982/1994）指出“入”本来是专用的禁忌字，现在流行于长江以北和西南各省区市，在吴语区也有分布，这些地区专用的“入”字音“rì”，写作“日”。所以，江南地区为避讳“日”的读音，可能发生了“日→天”“日头→太阳”“入→进”这几组平行的替换，是语言创新的策源地。在此过程中“天”产生了新义，“太阳”和“进”则是沿用了东汉就有的旧词。

岩田礼先生对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长江型词”只是其中一端，本文所述还难免挂漏和谬误，敬请岩田先生和读者斧正。《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及其《续集》所收录的 95 幅地图（49+46），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每一幅地图都值得从史的角度去深入探讨。岩田先生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不考虑历史文献所反映的事实，“旨在打破传统词源学的框架”（岩田礼 2007a），虽然必要时也会援引汉语史上的材料。我们认为方言地理学与汉语史的研究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构拟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虽然有时限于文献的数量及反映口语的程度，方言地理学的构拟得不到文献的左证，但是在有文献可考时，还是应该尽量与历史文献的记录相结合以求互证。

参考文献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曹志耘 2011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晁　瑞 2014 《〈醒世姻缘传〉方言词历史演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　莉 2006 《〈训世评话〉词汇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董志翘 1998 《再论“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与李宗江先生商榷》，《中国语文》第 2 期。

何　亮 2017《汉语方言[昨天][今天][明天]的时间表达系统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 5 期。

[比利时]贺登崧著，石汝杰、[日]岩田礼译 2012/2018 《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晓东 2012 《汉语方言地理学大有可为——岩田礼教授访谈摘录》，《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蒋绍愚 2012 《汉语“天”的意义的演变》，载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荆亚玲、汪化云 2018 《“房”“屋”的方言分布与历时演变》，《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李　荣 1982/1994 《论“入”字的音》，《方言》第 4 期。

李宗江 1997 《“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中国语文》第 3 期。

李宗江 1999 《关于〈“进”对“入”的历时替换〉的几个问题——答董志翘先生》，收入其《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刘宝霞、张美兰 2013 《近代汉语“丢弃”义常用词的历时演变与地域分布》，《古汉语研究》第 2 期。

刘宝霞、张美兰 2014 《“迎接”义动词的历时演变和地域分布》，《语文研究》第 3 期。

刘　曼 2021 《阳历记日词“日、号”演变研究》，《辞书研究》第 2 期。

刘　艳、[日]岩田礼 2017 《山西中部方言“兄”和“姊”同音冲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马云霞 2009 《“进”对“入”的历时替换补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施今语 2017《方言地理学的宗旨及其应用——岩田礼教授访谈录》，《国际汉语学报》

第 8 卷第 1 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石汝杰 2016《从音节表观察汉语的若干避讳现象》,《北斗语言学刊》第 1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太田辰夫著，江蓝生、白维国译 1991 《汉语史通考》，重庆：重庆出版社。
谭代龙 2008 《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汤传扬 2017 《程度补语“紧”“很”的历史与现状》,《汉语学报》第 2 期。
汤传扬 2018 《也论汉语方言[昨天][今天][明天]的时间表达系统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 6 期。
汪维辉 2000/2017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汪维辉 2001 《汉魏六朝“进”字使用情况考察——对〈“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一文的几点补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 2 期。
汪维辉 2007 《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中国语文》第 2 期。
汪维辉 2013 《说“鸟”》,《太田齋·古屋昭弘兩教授還曆記念中國語學論集》,《中國語學研究 開篇·单刊》No.15，东京：好文出版。
汪维辉 2014 《说“日”“月”》,《中国语言学报》第 16 期，北京：商务印书馆。
汪维辉 2018a 《近代官话词汇系统的形成——以〈训世评话〉与〈老乞大〉〈朴通事〉的比较为出发点》,《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
汪维辉 2018b 《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汪维辉、[日]秋谷裕幸 2010 《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中国语文》2010 年第 4 期。又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0 年第 11 期。
王文香 2015 《“屁股”考源》，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2015 年 12 月 22 日。修订稿又见《江淮起源型词的历史与语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 6 月。
王文香 2018 《“牲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问题》,《中国语文》第 3 期。
王文香 2018 《语体缺位与词汇替换——基于近代汉语“牲畜”义词演变的考察》，待刊稿。
王文香 2019 《江淮起源型词的历史与语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徐 建、[日]岩田礼 2014 《汉语方言中的“口水”和“唾沫”》,《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第 13 輯。

[日]岩田礼 1986 《言語地図と文献によろ語彙史再構——“ひざがしら”の狭域的/広域的言語地図を中心に（语言地图及根据文献进行的词汇史构拟——以“膝盖”的小区域和大区域的语言地图为中心）》，《伊藤漱平教授退官記念中国学論集》，东京：汲古書院，47－72 页。

[日]岩田礼 1989 《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中國語學研究 開篇・单刊》No.1，东京：好文出版。

[日]岩田礼 1995 《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中国语文》第 3 期。又，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5 年第 9 期。

[日]岩田礼 2003 《方言地図の作成とその解釈—中国語言語地理学序説（続）－》（方言地图的制作及其解释——汉语语言地理学序说，续），《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第 7 輯，1－32 页。

[日]岩田礼 2007a 《汉语方言〈明天〉、〈昨天〉等时间词的语言地理学研究》，《中国语学》254 号，日本中国语学会，1－28 页。

[日]岩田礼 2007b 《方言接触及混淆形式的产生——论汉语方言“膝盖”一词的历史演变》，《中国语言学集刊》第 1 卷第 2 期，纪念李方桂先生中国语言研究学会，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编，北京：中华书局，117－146 页。

[日]岩田礼 2008a 《从“疟疾”的方言地图看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南大语言学》第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65－182 页。

[日]岩田礼 2008b 《中国語の言語地理学——歴史、現状及び理論的課題》，《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第 11 輯，1－25 页。又，《汉语方言地理学——历史、现状与理论课题》，王曹杰译，载《中国语言地理》，萧红主编，武汉：崇文书局，154－173 页。

[日]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

[日]岩田礼 2011a 《论词汇变化的“非连续性”——类音牵引和同音冲突二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又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2 年第 1 期转载。

[日]岩田礼 2011b 《书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语言学论丛》第 43 辑。

[日]岩田礼编 2012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东京：好文出版。

[日]岩田礼 2017a 《方言地图九幅——“伯父”“伯母”等亲属称谓在苏皖沪的地理分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日]岩田礼、刘 艳 2013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金沢大学中国語

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第 12 輯。
杨荣贤 2017《汉语肢体动词发展史研究：以六组基本词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
殷晓杰、宋小磊 2012《“抬”类词共时分布的历时考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殷晓杰、胡寻儿 2021《汉语“店铺”义词的历时演变及相关问题研究》，《古汉语研究》第 1 期。
曾昭聪、曾文斌 2021《“抓挠”义动词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语文研究》第 4 期。
张爱云、徐　建 2021《汉语“屁股”义词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语言学论丛》第 63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Iwata Ray 2000 The Jianghuai Area as a Core of Linguistic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A Case of the Kinship Term “ye 爺”（江淮地区是语言创新及扩散的核心区域——以亲属称谓“爷”为例）,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语言变化与汉语方言 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Academia Sinica,179-196.

滇川藏交界处藏语支语言中的“狗”

——相关语音形式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铃木博之

青山学院大学地理语言学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滇川藏交界处的康巴藏语各种土话中名词“狗”的词形开展地理语言学分析。研究表明，不同土话中该词词形的来源大致相同，基本上与藏文 khyi 相对应。然而，从语音对应来讲，大部分土话中该词词形呈现出例外的对应关系。文章把相关词形分为正常对应和例外，并重点对后者进行详细的解释。

一、前言

属于藏文化圈的滇川藏交界处为藏语支（Tibetic）语言的分布区域。那里的语言都被划入康巴藏语，但其方言差异较大。按笔者近期的分类（Tournadre and Suzuki 2022），该区域包含数个方言群，即：南路方言群、崩波岗方言群、乡城方言群、得荣德钦方言群、香格里拉方言群、察隅方言群等等。其中，南路方言群的次分类研究尚未深入，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涉及的土话分布范围为云南藏区北部、四川甘孜州西南角、西藏自治区东南角，各个土话的地理分布见图 1。由于文章不涉及方言土话的系属分类原因，故图 1 不标注方言分类。图 1 还包含有安多藏语的分布地区（参见铃木博之 2018），但本文的讨论范围限为康巴藏语，故安多藏语方言点亦不显示。

在图 1 所示土话中，名词“狗”的词形比较相似，其来源大致相同，基本上与藏文[1]khyi 相对应。然而，从语音对应来讲，大部分土话中的词形却呈现为例外的对应关系。文章将关注以下两种语音特征，并绘制语言地图进行分析：

（一）各个土话中的声母调音部位是否与多数语音对应一致

（二）各个土话中的声母是否送气

[1] 藏文的拉丁转写依据 de Nebesky-Wojkowitz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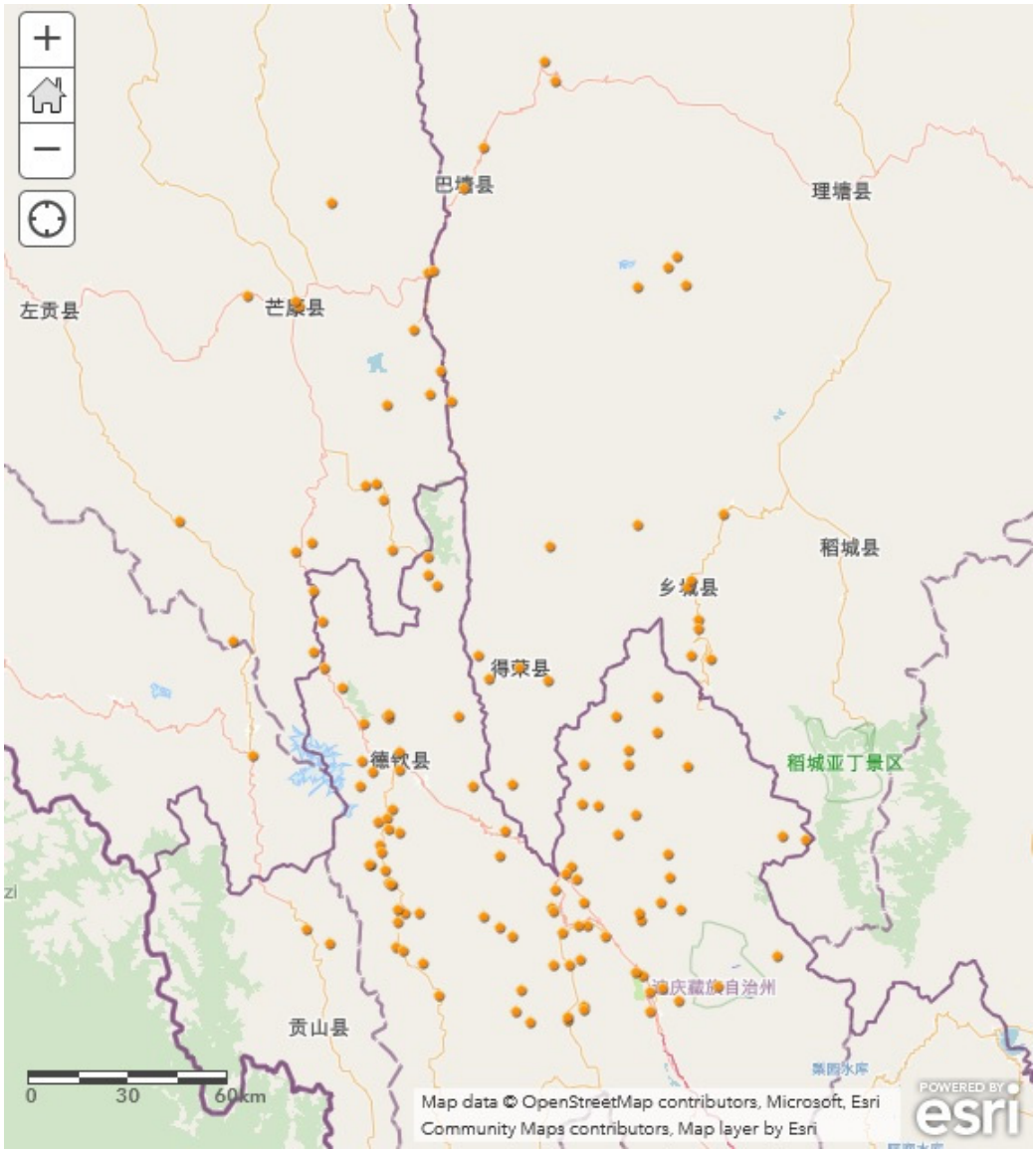


图 1：本文涉及的土话地点

第一个特征针对藏文 khy 声母的语音对应中，“狗”词形的声母调音部分是否呈现特色。比如，khyod“你”、’khyag“冷”、rkya“骑”、gyang“墙”、mgyogs“快”等词形都具有腭前塞擦音/tɕʰ, tɕ, dʑ/。因此，如果“狗”的声母也呈现为/tɕʰ/的话，就可以判断其与其他词所体现的语音对应规律一致；如果“狗”的声母呈现为/tsʰ/的话，则可判断为不一致。有关该藏文声母组合在各种藏语支语言中的语音对应可参考张济川(2009)、Tournadre and Suzuki (2022)等研究。

第二个特征针对藏文 khy 的声母是否表现为送气。我们注意到，在土话中所遇到的不送气形式/ts/在古藏文或其他藏语支语言中也有发现。古藏文直接写成 kyi，具有无送气字。但在古藏文时期，送气和不送气之间的音位差别尚未固定，呈现出互相交替的关系（Hill 2007）。在当代藏语支语言中，日喀则话、乡城话等的“狗”含不送气声母（Haller 2000；铃木博之 2007:318；瞿霭堂、劲松 2017:492）。

二、名词“狗”的语音形式

滇川藏交界处藏语支语言中，名词“狗”的词形[2]按声母的性质大致分为以下七种。虽然有一些形式带名词后缀，但此处不考虑该特征及其差异。该词形声母可以分为腭前音类、齿-龈音类、硬腭音等三类，各有送气和不送气之分还有塞擦音和擦音的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一）送气腭前塞擦音/tɕʰ/作声母

例如：娘义¯tɕʰə；西当`tɕʰə koʔ；古龙¯tɕʰə；理塘`tɕʰə ʱgẽ；章纳¯tɕʰə ʱgɛ̃；夏琼`tɕʰə；莽岭¯tɕʰə 等

（二）不送气腭前塞擦音/tɕ/作声母

例如：罗仁`tɕə；独拉顶`tɕə；改那西¯tɕə 等

（三）送气腭前擦音/ɕʰ/作声母

例如：翁水`ɕʰə；普吕`ɕʰə；新联`ɕʰə 等

（四）送气齿-龈塞擦音/tsʰ/作声母

例如：霞给`tsʰə；祖莫顶¯tsʰə；亚浪`tsʰə；吉仁¯tsʰə；粗丁¯tsʰə；尼汝¯tsʰə；翁上¯tsʰə；阿木¯tsʰə；普上`tsʰə；浪都¯tsʰə；捧八¯tsʰə；斯嘎¯tsʰə；巴拉`tsʰə；丙中洛`tsʰə；八日`tsʰə；察瓦龙¯tsʰə 等

（五）不送气齿-龈塞擦音/ts/作声母

例如：色丛`tsə；乡城¯tsə；沙贡¯tsə；然乌¯tsə；热打`tsə；日龙¯tsə 等

（六）送气齿-龈擦音/sʰ/作声母

例如：永支¯ʰsʰə（仅有一例）

（七）送气硬腭塞擦音/cçʰ/作声母

例如：直仁¯cçʰə（仅有一例）

[2] 有的藏语支语言使用两个或以上的词根表达“狗”义（参见 Ebihara et al. 2022）。但是，滇川藏交界处藏语支语言的“狗”尚未发现存在数个词根，仅表现为和藏文 khyi 有关的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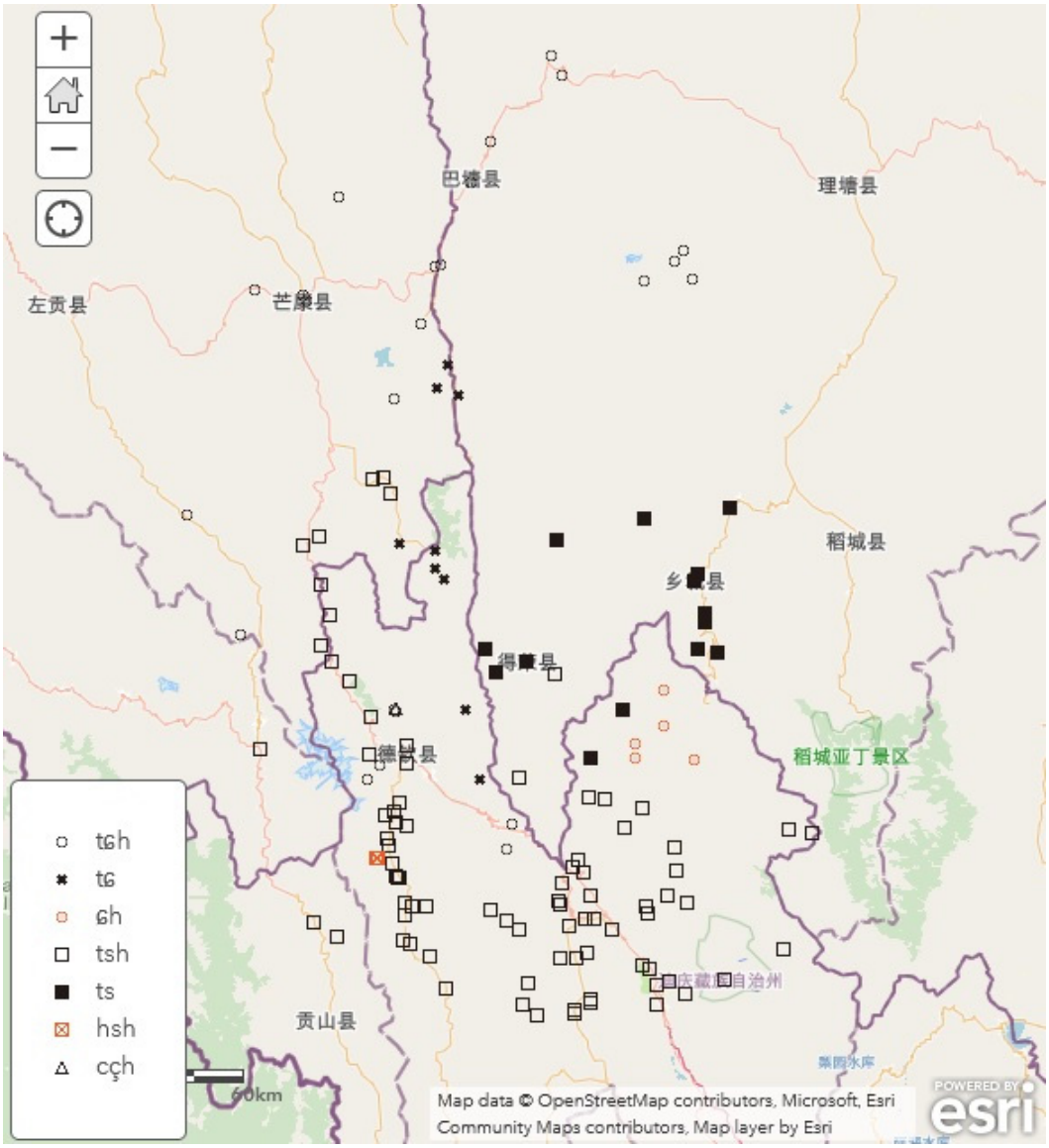


图 2：名词“狗”的声母类型

图 2 为按照上述分类绘制的语言地图。从数量上来说，属于第四类的土话最多，分布地域也最广；其次为第一类。第三类、第六类（擦音声母）及第七类分布区域较为局限。

需要注意是，上述分类无法显示各个语音形式是否属于普通的语音对应关系。本文探讨的目的是要阐明语音对应关系和地理分布是否有关。下面将针对关键语音特征绘制各个语言地图并进行讨论。

三、语言地图与分析

上文揭示了在滇川藏交界处的藏语支语言中名词“狗”的声母形式，包含七种不同的声母。此处探讨的是其声母的语音对应与普通的语音对应关系之间的异同。本节将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相关地理分布的意义。

3.1 声母调音部位是否与多数语音对应一致

从音变的原则来看，语音变化理应呈现系统性的对应关系，若发现异常的对应关系就要深入讨论。我们首先探讨“狗”的声母形式是否和其他藏文词中声母 khy 的语音对应一致。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辨识出词形是否受借词影响。图 3 是基于“狗”的声母调音部位而绘制的语言地图。

图 3 中，Y 表示相关词形的声母调音部位与多数语音对应一致，N 表示不一致。如图 3 所示，云南藏区的多半调查点为 N 类。这意味着除了“狗”之外的藏文 Ky 形式存在另一种对应关系。从分布地域来看，N 呈现连续分布。除了在德钦县城附近的交叉分布以外，可以用同言线划出 Y 和 N 的区域。德钦县城附近的情况可以认为是 Y 在 N 区域内的分布，即正常的对应关系呈现零散分布。此情况说明，德钦县城周边土话中的对应不一致情况是后起的，很有可能意味着，由 N 演变为 Y 的转换过程还没完毕。

目前，相关土话中“狗”是否是个借词这一问题尚未解决。假如有借词情况，借词“狗”首先出现在云南藏区的中心位置，之后以此为圆心向四周辐射扩散开来，就形成了目前的分布形态。Suzuki (2018, 2022)、铃木博之(2022)等研究显示，现香格里拉市（原中甸县）建塘镇在语言发展上也承担了中心位置的角色即以建塘镇为中心，藏语土话的语音特征（限于香格里拉方言群建塘组[3]）以及词汇特征都呈现了 ABA 分布。然而，就名词“狗”的广泛分布，不一定能采用以建塘镇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解释其状况。与图 2 相比，云南藏区多半调查点的 N 表现为/ts^{h}/声母形式。作为“正常”的语音对应现象，该形式仅在得荣县、乡城县等地区分布。鉴于地理、文化等因素，云南藏语和其他地方的藏语常存在接触关系，但是我们目前还无法弄清该区域内“狗”义词的借用情况。

[3] 详细的方言分类参见 Suzuki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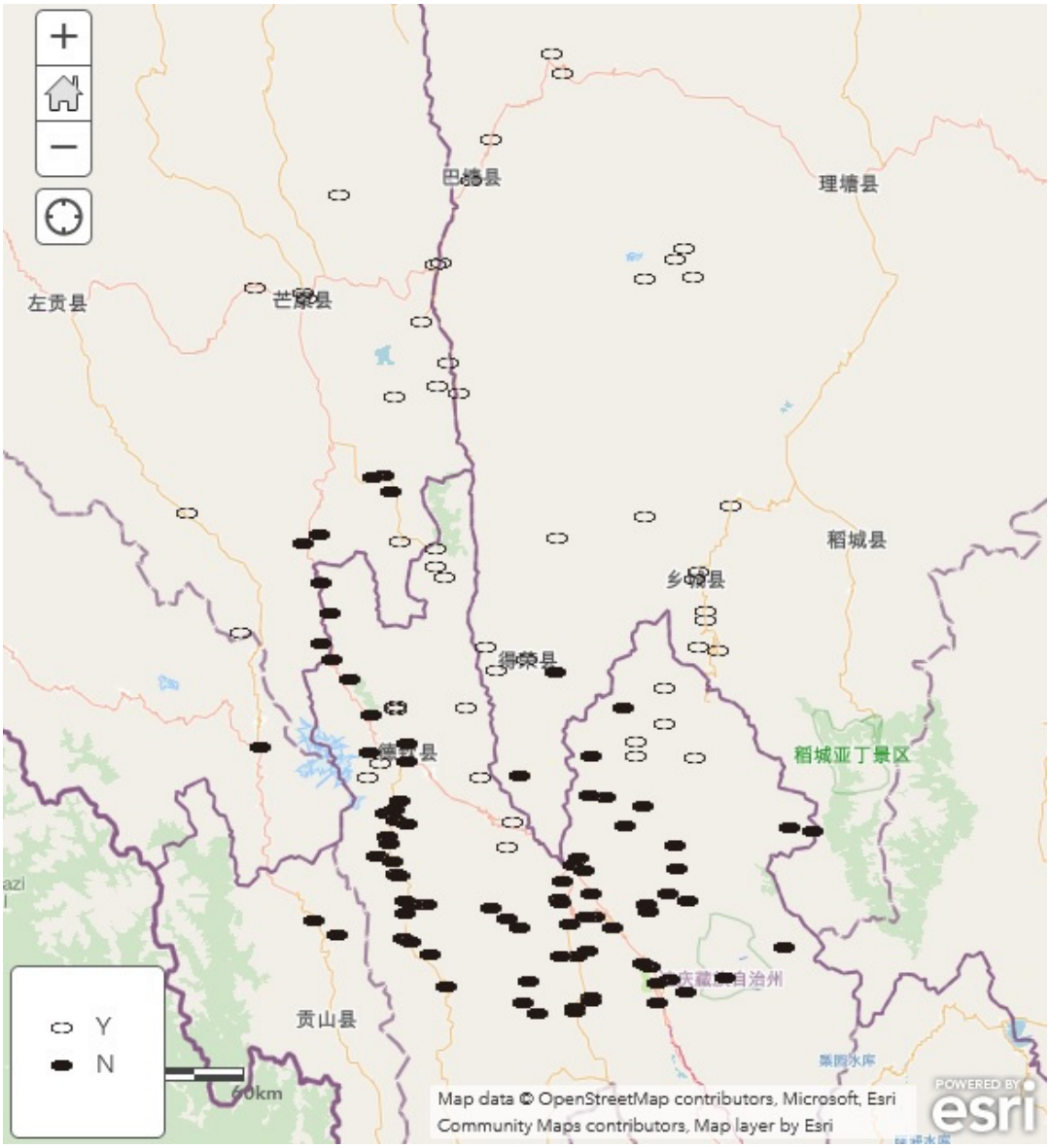


图 3：名词“狗”声母调音部位的分类

3.2 声母是否送气

如藏文形式显示，名词“狗”*khyi* 应有送气音声母。然而，在当代方言中有个别土话存在不送气音声母，如 Haller (2000)报道的日喀则话及铃木博之(2007:318)报道的乡城县内各种土话。

上文介绍的滇川藏交界处康巴藏语土话中的“狗”体现出两种不送气音声母。为

了关注送气性质及其地理分布，图 4 把具有送气音声母的土话和具有不送气音声母的土话区分开来，以便下文对送气性质进行讨论。

图 4：名词“狗”声母的送气性

图 4 中，Y 表示相关词形声母的送气性与多数语音对应一致，N 表示不一致。如图 4 所示，滇川藏交界处以及乡城县等地出现了不一致的案例。根据铃木博之(2011)

等以往研究报道，滇川藏交界处金沙江边的土话中，双音节词的首音节存在送气音变成不送气音的现象。该“送气变不送气”现象是由特定的韵律特征[4]所促发的，需要两个或以上音节数作为条件，且理论上不会见于单音节词。虽然“狗”的藏文为单音节词，但是无法确认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双音节形式，正如理塘话、章纳话等土话中所体现的“词根+后缀”形式。然而，乡城话等土话却没有此韵律特征，因此，不送气音声母或许在各个土话中有不同的来源。

3.3 综合讨论

图 5 是基于图 3 和图 4 综合绘制的地图。

图 5 包含名词“狗”声母的调音部位和送气性的四类关系：

YY：名词“狗”声母的调音部位和其他 Ky 类藏文形式相对应，声母为送气

YN：名词“狗”声母的调音部位和其他 Ky 类藏文形式相对应，声母为不送气

NY：名词“狗”声母的调音部位和其他 Ky 类藏文形式不对应，声母为送气

NN：名词“狗”声母的调音部位和其他 Ky 类藏文形式不对应，声母为不送气

根据图 5，YY 类土话分布在地图的北部及中部，NY 类土话则分布在地图的南部。其余两类土话见于地图的中部，其中 YN 类土话占多数，NN 类土话仅见于两个调查点。从和藏文形式的语音对应关系来讲，YY 类反映的是通常的对应关系。虽然 NN 类和 YY 类在类型上是相反的，但从地理分布来看，两类土话并存于一个山沟中，相关土话系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 NN 类和 NY 类（大致分布于南部）、YN 类（大致分布于北部）等形成交界地带，因而也存在 NN 类是兼容后两者特征而演化出的可能性。

NY 类和 YN 类的交界处还包括德钦县（羊拉乡）和芒康县（徐中乡）之间的地带，此地带建有交通道路，却没有出现 NN 类。我们也可以关注两类的分布和当代的行政区域划分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还需要考虑现设行政区划之前的历史情况。

从图 5 来看，NY 类分布地域较为广，难以厘清其分化过程，历史来源无法确定。虽然 YN 类在地理上呈连续分布，但至于其来历（如 3.2 节的讨论），会有几种可能性，根据地图较难确定。

[4] 有关藏语支语言的韵律问题可参考 Caplow (2016)及意西微萨·阿错(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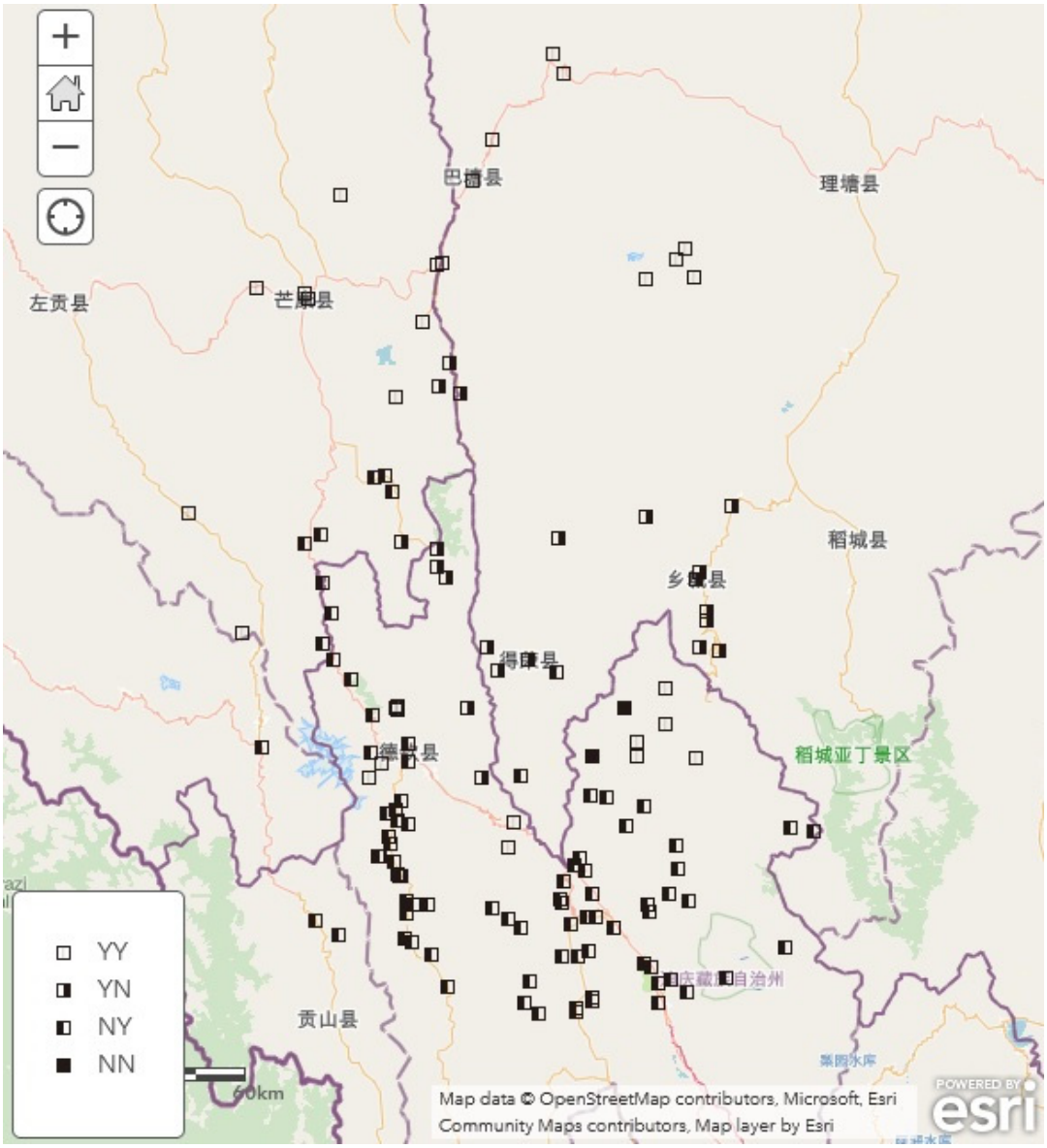


图 5：名词“狗”声母的调音部位和送气性的关系

四、结语

本文针对滇川藏交界处藏语支语言中名词“狗”的词形进行了地理语言学分析。文章依据“狗”的语音形式，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各个土话中“狗”的词形的声母调音部位是否与多数语音对应一致，二是各个土话中“狗”的词形的声母是否

送气。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我们绘制了综合性的语言地图。此图展示出该区域土话中“狗”的词形可以大致分为北、中、南三个地理类型。北部的特征与藏文形式有着常见的语音对应关系，南部则出现较为特殊的形式，目前找不出其历史来源。中部是兼具了南、北部特征的中介形式，其背后的成因既有个别的语音变化，也可能源自同其他各类土话的接触。

附记：本研究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A）“阐明藏文化圈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17H04774）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利用高精度广域地图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多语言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18H0067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瞿霭堂、劲松 2017《藏语卫藏方言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8《理塘县及其周边藏族语言现状调查与分析》载《民族学刊》第 2 期 35-44+106-109.

铃木博之[Suzuki, H.] 2022《语音演变的地理语言学解释：以云南香格里拉藏语为例》载《常熟理工学院学报》第 1 期 54-60.

意西微萨·阿错 2018《藏语韵律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私家版

张济川 2009《藏语词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丰富发展他们的词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鈴木博之 2007「川西民族走廊・チベット語方言研究」京都大学博士論文. doi: https://doi.org/10.14989/doctor.k12734

鈴木博之 2011「四川・雲南境界部金沙江流域のカムチベット語における有気音の無気化現象」『ニダバ』40, 75-81. URI: http://ir.lib.hiroshima-u.ac.jp/00045555

Caplow, N. 2016. Reconstructing stress in Proto-Tibetan: Evidence from Balti and Rebkong Amdo.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9.2, 180–221. doi: https://doi.org/10.1075/ltba.39.2.01cap

Ebihara, Sh., K. Iwasa, K. Kurabe, S. Shirai, and H. Suzuki. 2022. ‘Dog’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and Africa I*. In press.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Haller, F. 2000. *Dialekt und Erzählungen von Shigatse*. Bonn: VGH Wissenschaftsverlag.

Hill, N. 2007. Aspirated and non-aspirated consonants in Old 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8.2, 471–493.

de Nebesky-Wojkowitz, R. 1956.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s-Gravenhage: Mouton.

Suzuki, H.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 list of Tibetic languages from Yunnan*. Fuchu: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Online: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Suzuki, H. 2022. *Geolinguistics in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An introduction*.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5989176

Tournadre, N. and H. Suzuki. 2022.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X. Becker and A. Brucelle for the cartography). Villejuif: LACITO Publications.

‘Dog’ in Tibetic languages of the boundary area of Sichuan, Yunnan, and Tibet: A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its word form

Hiroyuki Suzuki

Research Centre of Geolinguisics,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noun for ‘dog’ in varieties of Khams Tibetan spoken in the border area of Yunnan, Sichuan, and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etymon of this noun is basically identical in the varieties. Howev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we find exceptions in most varieti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gularity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and interpret irregular forms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说｛狗｝

秋谷裕幸　汪维辉　野原将挥

日本爱媛大学　中国浙江大学　日本京都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的｛狗｝义词有两大类：“犬”类和“狗”类。｛狗｝义词的共时分布和历史演变都显示“犬”早于“狗”。在民族语当中我们能够发现“犬”和“狗”的同源词或相似的词。“狗”很可能是在原始汉语阶段以后从苗瑶语中引进的借词，“犬”则为能够追溯到原始汉藏语的汉语固有词。这个观点与在汉语史上“犬”早于“狗”相符。

一、前言

｛狗｝[1]属于人类语言的基本词之一，被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列入 200 核心词表（序号 21 dog）。

关于汉语的｛狗｝义词“犬”和“狗”，谭晓平（2006：59）曾得出如下结论：

> 汉语的“狗”可能如罗杰瑞所说，是早期苗瑶语借词。借入后，逐渐将与之同音的表示“小兽”意的“狗”挤出流通范围。“犬”则为中土固有词。后来“狗”、“犬”相争，“狗”终于赢得通名地位，“犬”则仅在闽东地区、浙南、湖南沅陵等地使用。

除了以上第二句以外，我们基本上赞同这个结论。本文的目的是在谭晓平（2006）这个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汉语中｛狗｝义词的演变史。

本文首先讨论｛狗｝义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和历史上的情况，并尝试对两者的关系作出解释。由于在苗瑶语以及藏缅语当中也有同源词或相似的词出现，本文还要探讨汉语的｛狗｝义词和苗瑶语、藏缅语的｛狗｝义词之间的历史关系，以更全面地描述汉语｛狗｝义词的历史。

[1] 本文中用大括号｛ ｝表示意义，而双引号如“狗”“犬”表示实际的词语。

二、汉语的｛狗｝义词

本章从共时分布和历史演变的角度描述汉语里的｛狗｝义词。

2.1 共时分布——现代汉语方言里的｛狗｝义词

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029 狗”地图（下文简称《图 029》）和其他资料，可以把方言中｛狗｝义词的分布概况归纳成表 1。方言分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8）。

[表 1]｛狗｝义词的分布概况

词　项		方　言　区
“犬”类	犬 1	闽语闽东区（多数）、闽南区大田、湖南省乡语
	老犬 1	闽语闽东区（屏南、宁德、罗源、周宁）
	犬 2	吴语处衢片（庆元、龙泉、遂昌、松阳）
	犬缺语音材料	官话（江苏涟水、安徽马鞍山、芜湖市、河南信阳、四川北川、富顺、华蓥）、赣语（湖北通山）、吴语（安徽泾县）
“狗”类	狗	大多数汉语方言
	街狗	吴语处衢片（少数）、婺州片（少数）、瓯江片（文成）、台州片（仙居）
	黄狗(儿)	浙江省北部的吴语太湖片（旧宁波府一带）
	狗子	江淮官话、西南官话（湖北境内、湖南张家界、龙山、永顺）、赣语（永丰、吉安县）、客家话（兴宁）、平话桂北片（资源）、客家话（明溪）
	狗＋X	狗儿：晋语（河北张北、山西平遥） 狗娃(儿)：晋语（山西平陆）、中原官话（青海西宁、湟源）、西南官话（湖北郧县） 狗囝：闽语闽南区（福建云霄） 狗公：闽语琼文区（海南乐东）

｛狗｝义词可以分成两大类，“犬”类和“狗”类。由于大多数方言材料里只有｛公狗｝和｛母狗｝这两个词条而没收入｛狗｝的统称，难以详细地介绍“狗子”的具体读音。

2.1.1“犬”类

按照“犬”的音值，可以分成 3 小类。

2.1.1.1“犬 1”

这个小类的特点是“犬”的韵母读洪音，分布在闽东区和邻近的大田以及湖南的乡话。例如福州：犬 $k^heiŋ^{31}$；古田大桥：犬 $k^heiŋ^{41}$；泰顺：犬 k^he^{455}；尤溪中仙：犬 $k^hueŋ^{214}$；（以上闽语）；古丈：犬 k^huai^{25}；沅陵：犬 $k^huæ^{53}$（以上乡话）。

“犬”的中古拟音是 $k^huen^{上声}$。从韵母读音来看，“犬 1”代表了四等韵还没有增生出介音阶段的读音。绝大多数闽东区方言的读音都是开口呼。不过，从尤溪方言的读音来看，“犬”的早期读音应该带有合口介音*u。原始闽语中“犬”的读音可以拟作$*k^huan^{tone2}$（参 Jerry Norman1981：64-65）。闽东区方言在原始闽语阶段以后才脱落合口介音*u。目前学者还没有尝试构拟原始乡话音系。不过“犬”的读音大致上可以拟作$*k^huai^{上声}$。*i 可以理解为*a 和*n 之间增生出滑音的进一步发展。闽语的$*k^huan^{tone2}$和乡话的$*k^huai^{上声}$都接近中古音 $k^huen^{上声}$ [2]。

2.1.1.2“老犬 1”

宁德一带的闽东区方言说“老犬 1”。这是在“犬 1”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说法。例如：古田杉洋：老犬 $lau^{44}uɛiŋ^{41}$；宁德九都 $lau^{24}en^{41}$。多数闽东区方言里“老犬”表示｛较老的狗｝。例如古田大桥：老犬 $lau^{55}k^heiŋ^{52}$。周宁咸村方言｛狗｝既说“老犬”[$lau^{35}uen^{11}$]也单说“犬”[k^hen^{11}]，表现出过渡状态。

2.1.1.3“犬 2”

这个小类的特点是“犬”的韵母读齐齿呼的[iɛ̃]韵或[iɛ]韵。例如庆元：犬 $tɕ^hiɛ̃^{33}$；龙泉：犬 $tɕ^hiɛ^{53}$；遂昌：犬 $tɕ^hiɛ̃^{533}$；松阳：犬 $tɕ^hiɛ̃^{213}$。早期读音可以拟作$*tɕ^hiɛ̃^{阴上}$。

一些中古合口三四等见晓组字在普通话里失去圆唇特征而读成齐齿呼。这个现象发生在《韵镜》的四等字（如“遗以母、季重纽四等、尹以母、县四等韵、血四等韵”），是在中古四等韵增生出介音与重纽四等合并以后的现象。当时这一组字的介音带有很强烈的腭化性质，难以与圆唇特征并存，导致转为齐齿呼[3]。参看有坂秀世（1940/1992）和三根谷彻（1976/1993：122-123）。“犬 2”的细音韵母应该也是相同来历的、代表了唐代中期以后的读音，显然晚于“犬 1”的洪音韵母。

---

[2] 本文中中古拟音根据平山久雄（1967）。

[3] 闽语闽东区方言中还有其他例子。比如，中古合口四等蟹摄齐霁韵“圭、桂、惠”等字读[ie]韵，合口三等支韵（重纽四等）“规”也读[ie]韵，合口三等脂韵（重纽四等）“葵”读[i]韵，均没带合口特征。

2.1.1.4 其他

“犬”还零星的分布在其他方言，都并用“狗”类。可惜，目前都没有具体的语音材料，不知具体的读音如何。

2.1.2“狗”类

这大类可以分成单说的“狗”和以“狗”为词干的说法。后者当为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说法。

2.1.2.1 单说的“狗”

大多数的汉语方言单说“狗”。例如北京：狗 kou^{214}；苏州：狗 kʏ^{52}；厦门：狗 kau^{51}；广州：狗 kɐu^{35}。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闽语闽北区的“狗”。因为这个词的声母是原始闽语的“弱化声母”，音值比较特殊。例如建瓯：狗 e^{21}。这种带有弱化声母的读音留待 3.4 进行讨论。

2.1.2.2 浙江省中部、北部的吴语

浙江省中部、北部的吴语说“街狗”或“黄狗（儿）”。例如丽水：街狗 kuɒ^{54}kɯ^{544}；景宁：街狗 ka^{55}kɐɯ^{33}；余姚：黄狗 ɦuɔŋ^{13}kø^{34}；舟山：黄狗 ɦuð^{22}kai^{35}、狗 kai^{35}。“黄狗”的分布只限于旧宁波府一带[4]。

2.1.2.3“狗子”

以“狗”为词干的说法当中分布最广的是“狗子”。分布在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以及赣语、客家话、平话桂北片的个别方言。例如武汉：狗子 kou^{42}tsɿ^{0}；扬州：狗子 kɤɯ^{42}tsɛ^{0}、狗 kɤɯ^{42}。《图 029》的“狗嗬”、“狗哩”、“狗欸”里的“嗬、哩、欸”笔者认为都是后缀“子”的变体。参看秋谷裕幸（2015）。

2.1.2.4 其他

其他还有“狗儿”、“狗娃（儿）”、“狗囝”、“狗公”等。

2.1.3 分布的解释

2.1.3.1“犬”类和“狗”类的先后

“犬”类集中分布在福建东部、中部、浙江南部以及湖南西部，构成相当明显的 ABA 分布，即：A 犬福建、浙江—B 狗—A 犬湖南。从这个地理分布来看，“犬”类早于“狗”类。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犬”类区以外，“犬”还有个别零星的分布，当为一种残留现象。

[4] 承蒙盛益民副教授告知。

总之，绝大多数的汉语方言中曾发生过“犬＞狗”的替换。

2.1.3.2“犬 1”和“犬 2”

“犬 1”和“犬 2”的地理分布是连续的，但是具体读音的性质很不一样。“犬 2”所代表的是唐代中期以后的读音，“犬 1”则代表更早阶段的读音。由于这两类的地理分布连续，所以我们认为“犬 2”是在“犬 1”的基础上发展下来的读音。

2.1.3.3“狗子”

在上文 2.1.2.3 里，笔者指出以“狗”为词干的说法是在单说“狗”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说法。不过，“狗子”的分布与这个推论矛盾。“狗子”最集中分布的是江苏南部的江淮官话以及湖北境内的西南官话。这两个“狗子”分布区被单说的“狗”所割断，结果形成了“A 狗子江苏—B 狗—A 狗子湖北”的 ABA 分布。那么，“狗子”是否早于“狗”？“狗子”里的“子”是一个十分常用的名词后缀。哪些名词要添加“子”尾在各地方言之间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两个“狗子”区也有可能各自独立地给“狗”添加“子”尾。本文倾向于认为“狗”早于“狗子”。在文献上“狗子”是在唐朝才出现的新形式。参看下文 2.2

2.2 历史演变——汉语史上的｛狗｝

在 2.1.3.1 里，笔者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当中的地理分布推测绝大多数的汉语方言中曾发生过“犬＞狗”的替换。这个推测可以得到汉语史上｛狗｝义词演变的支持。

关于汉语史上“狗”对“犬”的历时替换，已有多位学者做过研究[5]。“犬”产生早，甲骨文中已常见；“狗”产生晚，始见于《左传》，如《闵公二年》：“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古人多谓“犬”和“狗”有大小之别，据今人考证文献用例，发现两者的词义并无明显差别，它们其实只是一对“古今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同义词，后来“犬”被“狗”所取代。至战国末，“狗”的使用频次迅猛升高，“犬”使用渐少，呈衰落趋势。（魏德胜 1995：54、赵学清 2004：45、胡波 2015：363）大概不晚于西汉后期，口语中“狗”对“犬”的替换已经完成，这从《说苑》这组词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全书“狗”25 见，其中约一半例子来源无考，当出刘向自撰或改写，另一半则系承用旧籍；“犬”9 见，其中“犬羊”（1 见）、“犬吠”（2 见）、“犬马”（3 见）都是成词，有一例则出现了 3 次“北犬”，真正单用的一例也没有。这说明“狗”替换“犬”应该早已完成[6]。

[5] 参看王凤阳（1993：100/2011：109）、魏德胜（1995：54）、池昌海（2002：170）、赵学清（2004：45）、谭晓平（2006：58-59）、汪维辉（2007）“犬/狗”条、徐志林（2007）、王彤伟（2013）、胡波（2015）等。

[6] 参看汪维辉（2007）“犬/狗”条。王彤伟（2013：35）认为“东汉三国时期，‘犬’的用量

“狗”的双音形式“狗子/狗儿”大概都是唐代产生的。唐以前偶见“狗子”，都是词组，指“狗之子”或“小狗”，如东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卷四：“譬若狗子从大家得食，不肯食之，反从作务者索食。”《古小说钩沉》引《述异记》：“宋元嘉（《御览》《广记》引作元徽）中，吴县中都里石玄度家有黄狗生白雄子，母爱其子，异于常犬，衔食饴之，子成大狗。子每出猎未反，母辄门外望之。玄度久患气嗽，转就危困，医为处汤，须白狗肺（《御览》引作犬牙），市索卒不能得，乃杀所养白狗，以供汤用。母向子死处，跳踊嗥呼，倒地复起，累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与客共食之，投骨于地，母亲辄衔置窟中（已上亦见《类聚》九十四），食毕，移入后园大桑树下，掘土埋之，日向树嗥唤，月余乃止。”唐代则已用同“狗”，如《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六“卢顼表姨”条引《玄怪录》：“洛州刺史卢顼表姨常畜一狗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又如《祖堂集·福州西院和尚》：“有僧到大沩，师指面前狗子云：‘明明个，明明个。’”宋代则颇为常见，且常与“猫儿”并称。“狗儿”的例子如：《全唐诗》卷八七八载《李后主童謡》：“索得娘来忘却家，后园桃李不生花。猪儿狗儿都死尽，养得猫儿患赤瘕。”

还值得注意的是用“犬”类{狗}义词的方言一般用“吠”表示{狗叫}的{叫}。例如：

	{狗}	{狗叫}
闽语闽东区福清	犬 $k^{h}ɛŋ^{322}$	吠 $puɔi^{41}$
吴语处衢片庆元	犬 $tɕ^{h}iɛ̃^{33}$	吠 pai^{221}
乡话泸溪	犬 $k^{h}uɛ^{53}$	吠 fi^{33}

贾燕子（2014：16、22-23）指出先秦西汉时期“狗叫”说“吠”，但这个词到唐宋时期已经衰微。“犬”一般和“吠”结合起来使用。这也说明“犬”的来历较为古老。

2.3 本章的结论

{狗}义词的共时分布和历史演变都表明“犬”是表示{狗}的旧词，“狗”则是新词。可惜目前我们还不明白促使“犬＞狗”这一替换的原因。

反而超过了‘狗’，显示出新旧词激烈竞争的实际”，他所依据的语料是《论衡》和《三国志》。如果我们换用口语性更高的东汉翻译佛经，数据就完全不同了：狗 11，犬 2。可见《论衡》和《三国志》“犬”多于“狗”主要是由语体因素造成的，并不能准确反映实际口语。一般来说，词汇新旧更替具有单向性（或者叫不可逆性），前期已经完成的替换，不可能到后期又倒回去，除非有特殊原因。参看汪维辉、胡波（2013）。

三、苗瑶语的｛狗｝义词和“狗”

本章讨论苗瑶语的｛狗｝义词和汉语“狗”之间的历史关系。

3.1“狗”的上古音

“狗”的中古音是流摄开口一等厚韵见母，即 kəu 上声。从这个中古音来看，“狗”只能来自上古侯部。《说文·犬部》：“孔子曰：叩也，叩气吠以守。从犬句声。”“狗”的声符“句”常作为谐声符。它们都是见系侯部的字。“句”和由它得声的字在《诗经》里往往入韵。比如，“句”和“鍭”、“树”、“侮”押韵，“耇”和“主”、“醹”、“斗”押韵（以上《诗经·大雅·行苇》）；“枸”和“楰”、“耇”、“後”押韵（《诗经·大雅·南山有台》）；“笱”与“後”相韵（《诗经·邶风·谷风》、《诗经·小雅·小弁》）。均为侯部字。

在战国出土文献中，由句得声字与见系侯部字有通假关系。比如，“句（ ）”得声字可以表示：

见母

｛苟｝　“子曰： （苟）又（有）车”上博楚简《缁衣》第 20 号简

｛姤｝　“ （姤）”上博楚简《周易》第 40 号简

｛拘｝　“室鬼欲狗（拘）”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第 176 号简

匣母

｛厚｝　“ （厚）臧（藏）必多 （亡）。”郭店楚简《老子》甲 36

｛后｝　“句（后）稷之見貴也，卽昌（以）文武之悳（德）也”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第 24 号简

｛後｝　“ （待）勿（物）而句（後）乍（作）”上博楚简《性情论》第 1 号简

在楚简中尚未发现表示｛狗｝义的“狗”。在秦简中则有“狗肉”： （狗肉）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第 164 号简、“犬恒夜入人室，执丈夫，戏女子，不可得也，是神狗伪（化）为鬼”：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48 背壹/119 反壹日书[7]。

总之，历史文献所表示“狗”的上古音当为*Kˢoʔ [8]。在此大写的“K”代表了发音方法待定的舌根音声母。

---

[7] “狗”在楚简和秦简里的分布也许表示地域性的差异。胡波（2015：373）则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应该只是偶合”。

[8] 按照 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2014a）的上古音系统。

3.2 苗瑶语的｛狗｝义词

接着我们观察苗瑶语当中表示｛狗｝的词。各家对原始苗瑶语的拟音如下：

王辅世、毛宗武（1995：341、496）　*qlᴀu^{B}

Martha Ratliff（2010：104）　*qluwX

Weera Ostapirat（2016：143）　*klu^{B}

他们都构拟了复辅音声母*ql 或*kl 以及与汉语的上声对应的调类。以下使用Weera Ostapirat（2016）所构拟的*klu^{B}。目前还有很多苗瑶语的方言仍保存着这个词的复辅音声母。例如：苗语复员 qlei^{B} | 瑶语三江 klu^{3}（王辅世、毛宗武 1995：341）。

3.3 苗瑶语的*klu^{B}和汉语的“狗”

由于词义相同，语音形式也较为相似，所以部分学者认为苗瑶语的*klu^{B} 和汉语的“狗”是关系词。参看 Axel Schuesller（2003：14）、谭晓平（2006：58-59）、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2014a：215）等研究[9]。问题是汉语方面不存在给“狗”的上古音构拟出像*kl 或*kr 之类复辅音声母的内部证据。这促使一部分学者认为汉语的“狗”是引自苗瑶语的借词或者苗瑶语的底层词。参看 Axel Schuessler（2007：257-258）。Weera Ostapirat（2016：143）除了“狗”以外还发现了三个平行对应例。即：

词义	调类	原始苗瑶语	上古音	汉字
Cucumber	A	*kl^{ʏ}a	*kwra	瓜
To cross over	C	*kl^{ʏ}ai	*kwaih	過
Wide	B	*kl^{ʏ}aŋ	*kwaŋʔ	廣
Dog	B	*klu	*koʔ	狗

由于汉语都不能构拟*l 或*r，因此他认为这四个词都有可能是汉语引自苗瑶语的借词[10]。对“狗”来说，汉语还有另外一个｛狗｝义词，即“犬”。它有可能追溯到原始汉藏语。参下文第四章。这也表明“狗”更有可能是个借词。

3.4 闽北区方言的“狗”[11]

闽语闽北区方言中“狗”的读音很值得注意。因为我们在这个方言的读音中也许仍能观察到*l 的痕迹。

---

[9] 金理新（2012：330-331）把原始苗瑶语里的｛狗｝义词拟作*q-rɯːʔ，并认为它与汉语的“獳”（《广韵》平声模韵落胡切：“韩獳，犬名”）有关。

[10] Guillaume Jacques（2021）则认为“瓜”“过”和“广”的原始苗瑶语声母是*qw-，而流音成分是后起的。他所假设的是*qw-＞*qɬ-＞*ql-的语音演变（第 505 页）。

[11] 在这一节里上标数字均表示调类。

以下是部分闽北区方言里“狗”的读音：峡阳 ɐu^{9} | 迪口 heu^{9} | 松溪 hu^{9} | 镇前 hu^{9} | 石陂 ɦu^{3} | 建阳 eu^{3} | 崇安 wu^{3} | 枫溪ʔu^{3} | 临江 u^{6}。原始闽北区方言的形式可以拟作*ɦ(ə)u^{3}。松溪、镇前、石陂、崇安的读音来自*ɦu^{3}，峡阳、迪口、建阳的读音则来自*ɦəu^{3}。参看秋谷裕幸（2017：59-60）。

Jerry Norman（1986：384）很早就指出苗瑶语的｛狗｝义词和闽语的“狗”读音十分接近，并推测了原始闽北区方言中“狗”的弱化声母[12]源于*kl 之类的复辅音[13]。

我们发现除了“狗”以外，表示｛菜老｝的“过”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这个词的声母也是弱化声母。例如峡阳 kua^{9} | 迪口 kua^{8} | 松溪 kua^{8} | 镇前 kua^{5} | 石陂 ɡuai^{2} | 建阳 kuoi^{9} | 崇安 wuai^{1} | 枫溪—— | 临江——[14] 。本字是“过”，《广韵》平声戈韵古禾切：“经也。又过所也。”与去声“过”（《广韵》去声过韵古卧切：“误也。越也。责也。度也”）之间的派生关系是很清楚的。原始闽北区方言的形式可以拟作*ɡuai^{1}（秋谷裕幸 2017：41-42）。试比较：

	原始闽北	原始苗瑶（Ostapirat 2016）
过菜老	*guai^{1}	*kl^{ɣ}ai^{C} (to cross over)
狗	*ɦ(ə)u^{3}	*klu^{B}

闽北区方言里“狗”和“过菜老”声母的特殊表现很可能是由*kl 的*l 造成的。由于正如 Weera Ostapirat（2016：143）所指出上古音当中我们找不到给“狗”和“过”构拟出*l 或者*r 的证据，只好认为借贷的方向是“苗瑶语→汉语”。只是原始闽北区方言里*ɡ（过菜老）和*ɦ（狗）的分化目前无法解释。

顺便提一下。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2014a：215）把“狗”的上古音拟作*Cə.k^{ʕ}roʔ [15]，“过菜老”拟作*Cə.k^{wʕ}aj（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 2014b：38）。他们一律用*Cə 来解释闽北区方言等山区闽语当中的弱化声母的表现。不过，在笔者看来，弱化声母的来源其实是多元的。带有*l 或*r 的复辅音应该也是它的来源之一。“反”和“铰剪”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只是这两个字不能追溯到原始苗瑶语，所以难以肯定。请参看秋谷裕幸（2017：43、49）。

闽北区方言中能观察*l 的痕迹，那么“狗”的上古音声母应该也是*kl 或*kr 之类的复辅音。

---

[12] 在笔者看来“弱化声母”的本质是出现在阴调的浊音声母。请参看秋谷裕幸（2017）。

[13] 这个观点来自包拟古（Nicholas Bodman）教授。参看 Jerry Norman（1986：384）的脚注 6。

[14] 枫溪方言说“老”[lɑɔ^{3}]，临江方言也说“老”[lɑɔ^{4}]。

[15] 此处“C”代表任意辅音。

3.5 小结

相关研究逐渐证明汉语的“狗”是在原始汉语阶段以后引自苗瑶语的借词[16]。这一观点与汉语史上“狗”晚于“犬”不相悖。还需要指出的是对苗瑶语来说*klu^{B}有可能也是引自南亚语的借词或者底层词[17]。Axel Schuessler（2007：257）列出了一些相关材料。可以参看。

四、藏缅语的｛狗｝义词和“犬”

本章接着讨论藏缅语的｛狗｝义词和汉语“犬”之间的历史关系。

4.1 藏缅语的｛狗｝义词

Paul Benedict（1972：44）把原始藏缅语的｛狗｝义词拟作*kwiy，也可以是*kwəy。James Matisoff（2003：448）基本上沿用这个原始形式而拟作了*k^{w}əy。此举一些现代藏缅语的例子：贵琼语 k^{h}u^{55} | 景颇语 kui^{51} | 拉祜语 p^{h}ɯ^{55} | 克伦语 t^{h}ui^{31}。藏文是 khji，缅文是 khwe[3]。以上引自黄布凡（主编）（1992：97）。

大多数现代藏缅语的｛狗｝义词来自同一个来源：*k^{w}əy。白语的｛狗｝义词则与众不同。汪锋（2012：155）把它的原始白语形式拟作了*q^{h}uaŋ^{2}。

4.2 原始白语的*q^{h}uaŋ^{2}和汉语的“犬”[18]

白语的｛狗｝义词应该是和汉语的“犬”同源。它们是否真正的同源词还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与白语的谱系位置息息相关。汪锋（2013：133）认为与白语关系最密切的语言是汉语而设立了汉白语支。这一观点能够成立，*q^{h}uaŋ^{2} 就很可能不是借词而是真正的汉白同源词。请注意，原始白语的“狗叫”义词是*bræ^{4}（汪锋 2012：171），大概跟汉语的“吠”有关。与汪锋（2013）的这一假设相反，如果证明白语的谱系位置离汉语较远而更接近于藏缅语当中的某种｛狗｝义词用*k^{w}əy 的语言，*q^{h}uaŋ^{2}乃是汉语借词。目前汉藏诸语言当中汉语的谱系位置尚无定论。参看 George van Driem（2008）。总之，原始白语*q^{h}uaŋ^{2}的来历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

[16] Laurent Sagart（1999：190）曾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汉语的“狗”与 Proto Western Malayo-Polynesian 的*u(ŋ)kuq 有关。关于这个问题，也参看谭晓平（2006：59）。

[17] 那么，汉语当中的“狗”也有可能来自南亚语。由于苗瑶语和汉语之间除了“狗”以外还有三个平行例，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汉语是从苗瑶语借“狗”的。

[18] 在这一节里上标数字均表示调类。

4.3 原始藏缅语的*kʷəy 和汉语的“犬”

Paul Benedict（1972：157）很早就提出了*kʷəy 和汉语的“犬”同源的观点。“犬”的上古音是*[k]$^{wh\varsigma}$[e][n]ʔ（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 2014a：277）[19]。Paul Benedict（1972：157）认为这个 n 是个后缀。James Matisoff（2003：443-453）则展开了很详细的讨论。他认为藏缅语的有些后缀*n 具有表示“collective or pluralizing”的功能。在汉语里也有这种后缀 n。“犬”的 n 尾原来也是这种后缀 n[20]。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民”。James Matisoff（2003：449）把原始藏缅语的“man, person”义拟作了*r-mi(y)。而把这个词和汉语的“民”进行比较。“民”的上古音是*mi[ŋ]（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 2014b：76）。只是，鼻尾不能决定是*n 还是*ŋ。Axel Schuessler（2003：11-15）和 Axel Schuessler（2007：74-76）也举出了一些汉语里 n 后缀的例子，可以参看[21]。

Zev Handel（2009：256-258）大致上也同意了这个观点，即原始藏缅语的*kʷəy 和汉语的“犬”同源，均源自原始汉藏语*kwi。

4.4“犬”的上古音

“犬”的中古音是山摄合口四等铣韵溪母，即 kʰuen ^{上声}。从这个中古音来看“犬”既可以来自上古元部也可以来自真部。“犬”一般不入韵，也很少作谐声符，因此拟测它的上古音比较困难。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2014a：277）把它的上古音拟作*[k]$^{wh\varsigma}$[e][n]ʔ。*e 是元部的主要元音之一。此处把它用方括号括起来是因为相关证据不够充分难以肯定“犬”是否确实属于元部。

Axel Schuessler（2007：547）认为“畎”和“泫”是一组同源词。《说文》：“泫，潜流也。从水玄声。上党有泫氏县”；“畎，篆文㕣从田犬聲”。“泫”由真部合口“玄”得声。如果“畎”和“泫”构成一组同源词，“畎”和其声符“犬”就更有可能来自上古真部，即 inʔ（“畎”，姑泫切，今读 quǎn 是半边读）。在传世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甽”字。譬如《说文》说解为“甽”是“㕣”的古文（“古文㕣从田从川”），“畎”是其篆文（“篆文㕣从田犬聲”）。“犬”“畎”“甽”的通假例不少，在此不必赘言。据《说文》和通假例，“川”也有可能作为“甽”的声符。“川”是上古文部的字，那么“川”“甽”“畎”“犬”也可以来自文部，即*unʔ[22]。“犬”在传世文献中还跟文

[19] “[ ]”表示证据不够充分的拟音。

[20] James Matisoff（2003：448）还认为不加后缀的形式与“狗”有关。

[21] 谭晓平（2006：58）认为这个后缀没有任何来自上古汉语的内部证据。

[22] 笔者也认为“川”和“甽”在音韵上有可能没有任何关系，“川”不是“甽”的声符，因为“川”和“甽”在意义上显然有关（两个词都跟“水”有关），古人只是把其声符“犬”字改写成“川”字而已。

部“昆”、“混”等通假，此举一例。《诗经・大雅・緜》“混夷駾矣”，《说文・口部》引“混”作“犬”（“犬夷呬矣”）。总之，我们难以根据传世文献确定“犬”的上古音韵部。“犬”来自元、真、文部都有可能[23]。

有些学者则从汉藏语系的角度去研究“犬”的上古音。

Zev Handel（2009：256-257）根据汉语和原始藏缅语之间的对应关系推测“犬”是真部字。Axel Schuessler（2007：437）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也有支持“犬”来自元部的证据。汪锋（2012：119、121-122）归纳了原始白语和上古真元部之间的对应关系。真部主要与原始白语的*en 对应，元部则常与*aŋ 对应。例如（上标数字均为调类）：

词义	原始白语	汉字	上古韵部	上古音
辣	*ts^{h}jen^{1}	辛	真部	*[s]i[n]
柴火	*sjen^{1}	薪	真部	*[s]i[n]
肝	*qaŋ^{1}	肝	元部	*s.k^{ʕ}a[r]
蒜	*s^{h}uaŋ^{3}	蒜	元部	*[s]^{ʕ}o[r]-s

可见，白语“犬”*q^{h}uaŋ^{2}这一读音所示的应该是元部。

分布在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的蔡家话是一个语族未定的语言。蔡家话的｛狗｝义词是 k^{h}ui^{55}（薄文泽 2004：78）。郑张尚芳（2010：396）认定为“犬”，并把它归属于元部。蔡家话里元部有 ui 韵的表现（郑张尚芳 2010：395）：

词义	蔡家话	汉字	上古韵部	上古音
狗	k^{h}ui^{55}	犬	?	*[k]^{whʕ}[e][n]ʔ
疲劳	k^{h}ui^{33}	倦	元部	? [24]

“倦”是古去声字，而汉语的去声和蔡家话的 33 调一般不对应。此外，k^{h}ui^{55}与藏缅语里的｛狗｝义词有点相似。所以，k^{h}ui^{55}是否确实与汉语的“犬”同源还不能肯定。

参照藏缅语的语言材料我们还是不能解决“犬”的上古韵部问题。尽管如此，藏缅语的材料能够提供线索，很值得汉语上古音的研究关注。关于这个问题，参看 Zev Handel（2004）。

[23] 如果能够证明“犬”属文部，我们就要假设上古文部发展为中古铣韵合口这一不规则演变。关于“犬”的上古音，也参看谭晓平（2006：57-58）。

[24] “倦”不入韵。据谐声、通假关系，我们认为主要元音应该是*o。

4.5 小结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原始藏缅语的*kʷəy 和汉语的“犬”同源，同时也认为藏缅语和汉语之间存在亲缘关系。那么，汉语的“犬”能追溯到原始汉藏语[25]。这一观点与汉语史或汉语方言史上“犬”早于“狗”不相悖。至于白语*qʰuaŋ[2] 的来历，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五、结论

汉语的｛狗｝义词有两大类：“犬”类和“狗”类。｛狗｝义词的共时分布和历史演变都显示“犬”早于“狗”。

在民族语当中我们能够发现“犬”和“狗”的同源词或相似的词。“狗”很可能是在原始汉语阶段以后才从苗瑶语中引进的借词，“犬”则为能够追溯到原始汉藏语的汉语固有词。这个观点与在汉语史上“犬”早于“狗”相符[26]。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研究汉语词汇史时其他语系的语言有时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证据，使得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描述汉语基本词的演变史。

附记：本文初稿曾在第九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2017 年 8 月 26 日，云南民族大学）宣读。撰写本文期间，承蒙汪锋、沈瑞清、盛益民三位教授提供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汉语方言材料来源

福州、北京、苏州、厦门、广州、建瓯、武汉、扬州：北京大学（2005）；古丈：伍云姬、沈瑞清（2010）；沅陵：杨蔚（1999）；龙泉、遂昌、松阳、丽水、景宁：王文胜（2012）；余姚：肖萍（2011）；舟山：方松熹（1993）；泸溪：王辅世（1985）。其他汉语方言材料均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

---

[25] 谭晓平（2006：57-58）不同意这个观点。Laurent Sagart（1999：190-191）则认为汉语的“犬”与部分台湾的南岛语有关，如 Puyuma 语的｛狗｝义词 kurkur。

[26] 印欧语当中的｛狗｝义词也值得注意。Thomas Gamkrelidze & Vjačeslav Ivanov（1995：505-507）把原始印欧语里的｛狗｝义词拟作*k̂ʰwon-/*k̂ʰun-，并指出汉语的“犬”是引自印欧语的借词。风间喜代三（1993：91）则介绍了与此相反的观点，即原始印欧语里的｛狗｝义词是从汉语等亚洲语言引进的借词。如果汉语“犬”*[k]ʷʰˢ[e][n]ʔ的*n 是后缀，借贷的方向只能是“汉藏语→印欧语”。此外，桥本万太郎（1979：27）曾提醒印欧语的｛狗｝义词和汉语的“犬”也许都是象声词。

参考文献

薄文泽 2004　蔡家话概况，《民族语文》2004 年第 2 期，68-81 页。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重印本），1995 年第二版，语文出版社。

曹志耘（主编）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

池昌海 2002　《〈史记〉同义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方松熹 1993　《舟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风间喜代三 1993　《印欧语の故乡を探る》，东京：岩波书店。

胡　波 2015　常用词“犬”和“狗”的历时替换考——基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巴蜀书社）第二辑，357-381 页。

黄布凡（主编）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贾燕子 2014　“叫”的上位化及｛叫｝概念域词汇系统的历时演变，《东方语言学》第十四辑，13-29 页。

金理新 2012　《汉藏语系核心词》，民族出版社。

荆门市博物馆 1998　《郭店楚墓竹书》，文物出版社。

马承源 200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马承源 2003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平山久雄 1967　中古汉语の音韵，收录于《中国文化丛书 1・言语》（东京：大修馆书店），112-166 页。

桥本万太郎 1979　欧亚をさまよう犬と狗——印欧语族とシナ・チベット语族をむすぶ——，《月刊言语》（[东京]大修馆书店）8:8，18-27 页。

秋谷裕幸 2015　浦城县观前、临江方言的子尾、子变音和小称变调，《语言研究集刊》第十四辑，254-268 页。

秋谷裕幸 2017　闽北区方言的阴调浊声母字考察——兼评白-沙上古新系统，《语言学论丛》第五十六辑，20-75 页。

三根谷彻 1976/1993　唐代の标准语音について，收录于《中古汉语と越南汉字音》（东京：汲古书院），115-129 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1990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谭晓平 2006　汉藏语系的“狗”，《古汉语研究》2006 年第 4 期，57-61 页。

汪　锋 2012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以白语为例》，商务印书馆。

汪　锋 2013　《汉藏语言比较的方法与实践——汉、白、彝语比较研究》，北京大学

出版社。
汪维辉 2007/2011 《说苑》与西汉口语，《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年，293-305 页。
汪维辉、胡 波 2013 《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2013 年第 4 期，359-370 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2013 年第 10 期全文复印。
王凤阳 1993/2011 《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华书局（增订本）。
王辅世 1985 再论湖南泸溪瓦乡话是汉语方言，《中国语文》1985 年第 3 期，171-177 页。
王辅世、毛宗武 1995 《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彤伟 2013 常用词“犬、狗”的递嬗演变，《语文研究》2013 年第 2 期，30-35 页。
王文胜 2012 《吴语处州方言的地理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
魏德胜 1995 《〈韩非子〉语言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伍云姬、沈瑞清 2010 《湘西古丈瓦乡话调查报告》，上海教育出版社。
肖 萍 2011 《余姚方言志》，浙江大学出版社。
徐志林 2007 《“犬/狗”的历时嬗变》，《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 6 期，101-104 页。
杨 蔚 1999 《沅陵乡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有坂秀世 1940/1992 唇牙喉音四等に於ける合口性の弱化傾向について，收录于《国语音韵史の研究 增补新版》（东京：三省堂），359-364 页。
赵学清 2004 《〈韩非子〉同义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张尚芳 2010 蔡家话白语关系及词根比较，《研究之乐——庆祝王士元先生七十五寿辰学术论文集》（潘悟云、沈钟伟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389-400 页。后来题目改为“蔡家话白语关系及平行词根比较”后收录于《语言的演变与变异——首届历史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潘悟云、吴安其、吴福祥主编，2013 年，中西书局），307-319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8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Baxter, William & Sagart, Laurent 2014a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xter, William & Sagart, Laurent 2014b 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1 (20 September 2014). Online at:

http://ocbaxtersagart.lsait.lsa.umich.edu/BaxterSagartOCbyMandarinMC2014-09-20.pdf. Accessed 2015. 6. 18.

Benedict, Paul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iem, George van 2008 To which language familiy dose Chinese belong, or what's in a name?, *Past Human Migrations in East Asia: Matching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Edited by Alicia Sanchez-Mazas, Roger Blench, Malcolm D. Ross, Ilia Peiros and Marie Lin), 219-253,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Gamkrelidze, V. Thomas & Ivanov, V. Vjačeslav 1995 *Indo-European and the Indo-European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Handel, Zev 2004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ibeto-Burman comparis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W4,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603-620.

Handel, Zev 2009 *Old Chinese Medials and Their Sino-Tibetan Origins: A Comparative Stud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18,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Jacques, Guillaume 2021 The lateralization of labio-dorsals in Hmongic, *Folia Linguistica Historica*, 42(2): 493–509, https://doi.org/10.1515/flin-2021-2022

Matisoff, James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Acamedia Sinica), 35-73.

Norman, Jerry 1986 The origin of the Proto-Min softened stops, *Contributions to Sino-Tibetan Studies* (Edited by John McCoy & Timothy Light), 375-384, Leiden: E. J. Brill.

Ostapirat, Weera 2016 Issu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affiliation of Proto-Miao-Ya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1), 133-145.

Ratliff, Martha 2010 *Hmong-Mien Language History*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8), Pacific Linguistic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Schuessler, Axel 2003 Multiple origins of the Old Chinese lexic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1),1-71.

Schuessler, Axel 2007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dog’ in Chinese

AKITANI, Hiroyuki WANG, Weihui NOHARA, Masaki
Ehime University, Japan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Kyoto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The Chinese word meaning ‘dog’ has at least two forms, ‘quǎn 犬’ and ‘gǒu 狗.’ Based on synchronic data and chronological evidenc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use of the word ‘quǎn’ came earlier than that of ‘gǒu.’ In addition, we can find some cognates with ‘quǎn’ and ‘gǒu’ in other languages, Hmong-Mien (known in Chinese as Miao-Yao) as well as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t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word ‘gǒu’ is a borrowing from the Hmong-Mien language in the Proto-Chinese stage, whereas ‘quǎn’ can be traced back to Proto Sino-Tibetan cognates. This observ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hronological changes of ‘quǎn’ and ‘gǒu’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现在”义词试探

太田 斋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

内容摘要：有的常用口语词里发生特殊音变，有的因为常用的缘故保存古音，加之以代用字来代写，因此词义亦间或离开原义辗转演变，以至于难以认识到本字了。这类词几乎没有平行的例子，不容易得到十分有说服力的答案。本文对一系列拟测为同源的“现在”义方言对应词加以分析，讨论各种方言词的演变过程。

一、前言

很多方言里表示“现在”义的时间副词各不相同，来历未详，间或有以代用字记录甚至有音无字，而只能用方框来记录的情况。本文将把其中的一系列词语看作来自“眼望”，并以一种演绎法式的统一观点来说明各个对应词的演变过程，然后又使用循环论证排除矛盾。如果最后能够圆满解释目前所有的例子的话，那么，这虽然不是逻辑严密的证明方法，但可以暂且看做一种合理的解释。为了在同一个平台上说明各个方言的演变过程，本文暂且用超方言宽式音标。这是约等于改注音字母为罗马字的初步拼法。但单元音 ɿ、ʅ 记作 ï。不记声调。以下所引用方言例中的送气符号以 ʰ 统一标记。加 * 的原始形式拟音亦只不过是为了理解大体的演变过程所表示的而已，并不是经过严密验证之后定下的。使用拼音字母的标音放在//里，以分别于国际音标。

二、讨论

1.1 “眼看”

河南有如下词例：

河南兰考：眼望 iau^{51} uɤ̃r^{0}　　现在　44[1]

河南商丘：眼望儿 ian^{42} uar^{31}　　现在　406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 iã$^{213\text{-}21}$ veŋr^{30}　　现在　458

“眼望(儿)” ian vaŋ(r) →ian vəŋ(r)

[1] iau^{51} 应是 ian^{51} 之讹。

Cf. 河南内黄：眼下 ian^{55} ɕia^{312}　　现在　153

普通话词典一般不收“眼望”，即使收录，释文也为“眼睛看着”，并不脱离如字解释。但通过以上方言例子可知，以“眼望”为本字的词获得了“现在”义。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构词的“眼看”，引申为“马上、立刻”义了。从此可以了解到，“眼”+“看”义词组合的复合词很容易引申为“现在”、“马上”等义。以下开封、安阳、新乡、杞县等例子都含有这两种词义，可看作例证。那么就很容易理解，新乡市红旗区的例子大概也来自“眼望儿”。何时带了儿化，这个问题没有线索，先不详细讨论，只在原始形式“眼望”后面加上“(儿)”。

下面一系列“现在”对应词都可以认为本字是“眼望(儿)”：

1.2 类型 I　ia/iə uan(r) 系

山东曹县：夜晚 / yè wan /　　现在　592

河南上蔡：迓晚 / ya^{53} wê^{55} /　　现在　644

河南商水：牙晚儿 (缺音标)　　现在　377

眼望　　牙晚(儿)　　夜晚

ian uaŋ → iaŋ uan(→ iau uan) → ia uan → iə uan

兰考　　商水　　曹县

眼望　　迓晚

ian uaŋ → iaŋ uan(→ iau uan) → ia uan → ia uə

兰考　　上蔡

值得注意的是，上蔡例子“晚”读 / wê^{55} /，没有鼻音韵尾。一般来说，-n 尾韵儿化后失去鼻音成份。商水例子“晚儿”的读音很可能亦可用代用字写作“瓦儿”。

1.3 类型 II　iaŋ ua(r)/ uaŋ(r) 系

河南原阳：阳往儿 (缺音标)　　现在　671

河南汲县：样往儿 / jang wangr /　　和普通话“现在”“目前”差不多　22

河南长垣：洋旺儿 (缺音标)　　现在、眼望　571

河南太康：洋晚儿 / yang^{53} wanr^{24} /　　(含义)眼前的时间 (规范词)现在　576

河南淮阳：阳晚儿 / iang^{53} uar^{0} /　　现时　874

河南开封：阳往儿 iaŋ^{53} uar^{0}　　现在　省志 177[2]

[2] 原文缺“儿”，今补。

阳晚儿 iaŋ^{53} uar^{0}　　马上　省志 239[3]

河南安阳：阳晚儿 iaŋ^{53} uar^{0}　　马上　省志 239

如上节所说，-n 尾韵儿化后失去鼻音成份。太康的“晚儿”/ wanr^{24} / 实际上没有鼻音成份，可以和淮阳的“晚儿” / uar^{0} /、安阳的“晚儿”同等看待。-ŋ 尾韵与此相反，一般儿化后作为元音的鼻化成份遗留。开封的“阳往儿 iaŋ^{53} uar^{0}”记音似乎不准确，所据文献里，-ŋ 尾基本韵的儿化一律不加鼻化符号。据刘冬冰(1997)，开封方言的 aŋ,əŋ；iaŋ,iŋ；uaŋ,oŋ；yŋ 儿化后分别成为 ɤ̃r；iɤ̃r；uɤ̃r；yɤ̃r(第 273 页)。“往儿”的 uar^{0} 可能不是内部差异的反映，应该改为 uãr^{0}(或 uɤ̃r^{0})。不然，“现在”义词需要和“马上”义词同样写作“阳晚儿”。看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那么以上例子可以如下统一解释：

眼望　　阳/样往儿、洋旺儿　　洋晚(儿)、阳晚儿

ian uaŋ　→　iaŋ uaŋ　　→　iaŋ ua

兰考　　原阳、汲县、长垣　　太康、淮阳、开封、安阳

未见属于此类型的例子中第二音节记作 uan 的。如果存在，我们就也要考虑如下韵尾换位的可能： ian uaŋ→iaŋ uan。但该字记作“晚”的例子都带“儿”字，先不必考虑它了。

1.4 类型 III　ian/iaŋ uə(r)/ə(r) 系

河南开封郊区：眼窝儿 / yán wér /　　现时　639　→←“眼窝”

眼望　　眼窝儿

ian uaŋ(r)→*ian uan(r) →*ian ua(r) →ian uə(r)

兰考　　开封郊区

对于开封郊区对应词的第一字是否经过隔位同化(韵尾一致，即不完整的叠韵化)这一问题，由于未见 ian uan 词形的实存例，因此现在无法确认。也许是从 ian uaŋ 直接弱化成为 ian uə 的。当然也需要考虑与“眼窝”之间的类音牵引现象。我们也要注意“眼窝儿”因有些本字意识反映或类音牵引特意如此记录，由于语流音变，一般会话速度的情况下很可能经常读作/ yáng wér /，亦可写作“洋窝儿”的音值。那么这些词例可以与下面例子同样看待。

河南开封：洋窝 iaŋ^{41} uɤ^{0}　　现在　FY97-4/285

[3] 原文缺“儿”，今补。

河南开封：□□ iaŋ^{55} uər^{312}　　现在　县志 548
河南鹤壁：□□ iaŋ^{41} uor^{312}　　现在　1591
“眼望” ian uaŋ(r)→iaŋ uaŋ(r) →iaŋ ua(r) →“□□” iaŋ uə(r)
河南安阳：阳儿 iaŋ^{53} ər^{0}　　现在　省志 177
河南安阳：阳儿 / yáng er /　　现在　词典 57

类型 III 可看作**类型 II** 的进一步演变的阶段，即：

眼望(儿)	阳/样往(儿)等		洋窝(儿)	阳儿
ian uaŋ(r)	→ iaŋ uaŋ(r)	→ *ian ua(r) →	iaŋ uə(r)	→ iaŋ ər
兰考	原阳、汲县等		开封、鹤壁	安阳

如上所说，ian ua(r)未见实存例，也先可以排除。

1.5 类型 IV　iau ua(r)/uə(r) 系

河南长垣：摇旺儿 (缺音标)　　现在、眼望　571
河南杞县：要晚儿 iɑu^{42} uar^{0}　　立即、现在　849
河南安阳：姚喔儿 / yào wǒr /　　现在　安阳县界以东　词典 57
河南封丘：要我 (缺音标)　　现在　655

以下例子是可以看作发生逆同化的。ian uaŋ(r) 直接变为 iau uaŋ(r)，还是经过 iaŋ uaŋ 的环节，会有两种解释。笔者认为由于邻接同化的变化中 -n>-u 不如 -ŋ>-u 多，因此设定 iaŋ uaŋ 的环节说服力更强。

眼望	阳/样往儿等	摇旺(儿)	要晚(儿)	姚喔(儿)/要我
ian uaŋ(r) →	iaŋ uaŋ →	iau uaŋ(r) →	iau ua(r) →	iau uə(r)
兰考	原阳、汲县等	长垣	杞县	安阳、封丘

或经过**类型 II** iaŋ ua 的阶段而成立，即:

眼望	阳/样往儿等	洋晚(儿)等	要晚(儿)	姚喔(儿)/要我
ian uaŋ →	iaŋ uaŋ →	iaŋ ua →	iau ua(r) →	iau uə(r)
兰考	原阳、汲县等	太康、淮阳等	杞县	安阳、封丘

后者不能包括长垣例子“摇旺儿”。原文缺音标，虽然无法了解具体音值，但大体读音应该离 iau uaŋ(r) 不远吧。

1.6 类型 V　i maŋ/ma/mə 系

山西平陆：以口　$i^{?-13}$ $maŋ^{?-41}$　　现在 (洪池)　县志 577　←“眼望”？

山西平陆：一马　i^{13} ma^{55}　　现在、马上　研究 157

山西平陆：已吗　　现在　词汇集 3/204

山西临猗：一么　i^{31-13} mo^{0}　　现在　研究 101

山西临猗：一么　i^{24} mo^{24}　　现在　县志 637

山西永济：依么　　现在　词汇集 2/110

山西芮城：移末　　现在 (东区)　978

　　义末　　现在 (西区)　978

山西运城：以末啊　i^{13} mo^{31} a^{0} , i^{13} ma^{31}　　现在　668

据笔者所知属于这种类型的 i maŋ 只有上面一例，其他都丢失了鼻音韵尾。演变过程大概如下：

　　眼望　　**以口**

*(ŋ)ɪan mʏaŋ　→　*ian maŋ → i maŋ　→　i ma　→　i mə

　(兰考)　　**平陆(洪池)**　**平陆、运城**　**临猗、永济、运城等**

上面例子第二字都可以看作微母保留 m- 声母。

微母字在北方方言当中大都变为零声母合口或 ʋ- 母，但部分字还保留着 m- 母，如：

“望”

山东文登：$maŋ^{53}$ **望**忙芒　　26

山东荣成：$maŋ^{42}$ 忙**望**芒　　方言志 42

山东牟平：$mɑŋ^{51}$ 忙芒茫**望**($uɑŋ^{51}$)　　方言志 40[4]

“忘”

山东文登：$maŋ^{33}$ **忘**　　26

山东荣成：$maŋ^{44}$ **忘**　　方言志 42

山东牟平：$mɑŋ^{131}$ **忘**($uɑŋ^{131}$)　　方言志 40

此外张卫东 1982，第 32 页也介绍了“万”字读 uan(去)之外，万家庄(文登村名)的“万”读 man(去)。又连庆江 1982〈文荣词汇〉同样报告了“望”(第 157 页)、“忘”(第 154 页)读 m- 母的例子。此文所谓“文荣”包含文登县、荣成县、威海市、乳山县东部、牟平县东北部等地区。看来在胶东地区较为多见。但该例的分布地区并

[4] 括号内是又读音。下同。

不限于胶东地区。其他地区也能找到虽然韵母磨灭变样，但是仍然保留 m- 母的例子，如：

“微”

山东德州：穴码儿 ɕyə^{42} mar^{55}　　稍微　　172 ←“些微”

cf. 河南洛阳：些微 syɛ$^{34\text{-}44}$ vi^{54}　　稍微　　71

些微(儿)　　穴码儿

*sia mɪəi(r) → sia məi(r) → s/ɕia ma(r) → s/ɕya ma(r) →ɕyə ma(r)

德州

些微

*sia mɪəi → sia vəi→ sya vi →syə vi

洛阳

些微　　屑微

*sia mɪəi → sia vəi→ sia/sya uəi →ɕiə/ɕyə uəi

临清

河北河间：撂么儿 liɑu^{31} mor^{0}　　略微　773 ←略微儿

山东无棣：了么 liɔ$^{55\text{-}213}$ mə^{0}　　稍微　274 ←“略微”

cf. 山东临清：略微 liɔ^{31} uei^{55}　　稍微　141

屑微 ɕiə$^{323\text{-}34}$[ɕyə$^{323\text{-}34}$] uei^{55}　　141

略微(儿)　　撂么儿

*liak mɪəi(r) → liau məi(r) → liau mə(r)

河间、无棣

略微

*liak mɪəi → liau vəi → liau uəi

临清

古微母字“网”读 m-的例字分布于山西、内蒙等西北地区，这个问题曾在太田 1999 里讨论过。虽然现不介绍具体内容，但是可以把它加入该例之一。

保留 m- 母的例子大都失去原有的细介音，下面的例子可能是保留细介音的例子：

“味”

山东利津：咸打味儿 ɕiɑ̃$^{53\text{-}55}$ tɑ^{0} mir^{0}　　简单的咸菜　　91

吃打味儿 tʂʰʅ$^{44\text{-}23}$ tɑ^{0} mir^{0}　　可吃的东西　　91

cf. 味儿 veir^{21}　①味道，气味。②专指不好的味儿　119；“味”vei^{21}(去)　27

cf.河南巩县：味儿 viər^{31}　　笔者调查

“晚”

河南卢氏：免辈儿 / mian bei r/　　晚辈　843　←“晚辈儿”

根据这些举例，可以说**类型 V** 解释本字为“眼望”十分具有说服力。查看**类型 I** 的例子，*ian maŋ 可能有过(→) *ia maŋ →*iə maŋ(→)的环节，但未见实例，先不把它放在上面的拟定过程中。

1.7 类型 VI　iaŋ ma(r) 系

河南辉县：阳麻儿 iã^{42} mar^{0}　　现在　811　←“眼望”

河南新乡：阳码儿 iaŋ^{53} mar^{0}　　现在　省志 177[5]

　　阳马儿 iaŋ^{53} mar^{0}　　马上　省志 239

安徽铜陵：养末子 iã^{51} mo^{0} tsɿ^{0}　　现在　116　←“眼望子”

上面例子第二字也都可以看作微母保留 m- 声母的类型，演变过程大概如下：

眼望　　**阳麻/码**　　**养末**

(ŋ)ɪan mʏaŋ　→　*iaŋ maŋ　→　iaŋ ma　→　iaŋ mə

(兰考)　　**辉县、新乡**　　**铜陵**

此类型与上面**类型 V** 相反，第二音节韵母弱化。铜陵方言无 -ŋ 尾韵，中古阳韵一律读 iã，如“iã^{55} 央殃秧；iã^{11} 羊洋阳杨扬烊；iã^{51} 养痒；iã^{35} 样恙”（王太庆 1983，108 页），顺便参照中古山咸摄三四等舒声韵，如：“iɪ̃^{55} 淹阉醃蔫烟燕~京焉冤渊；iɪ̃^{11} 炎盐阎檐延筵圆员缘沿铅倭~，~笔，~山，地名元原源袁园援垣演；iɪ̃^{51} 掩兖远；iɪ̃^{35} 厌靥艳焰晏堰燕嚥宴院愿怨”（同 108 页）。从音位论的观点来说，iã 也可以解释为 iaŋ，不必特意看作 ian。

三、结语

本文集中于可看作来自“眼望”的方言词讨论了其演变过程。这种论证方法总是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再加上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河南方言材料记音、描写不一定精确。顺便想提醒一下同道学者，方志所收方言志的确质量差的不少，但间或收录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研究报告以及方言专志没注意到的词语，把它们慎重处理之后再利用的话，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要提高本文假设的可靠性，今后必须继续收集

[5] 原文缺“儿”，今补。

有关材料进行检证。这就是“现在”的结论。

四、余论

以上讨论的例子都可以看作来自“眼望”。下面顺便介绍似是而非的无棣例子。可能是来自“眼目前儿”的：

山东无棣：拗么前儿 niou$^{31\text{-}55}$ mə^{0} tɕʰiɛr^{0} ①现在②表示时间晚 105
目前儿 mu^{31} tɕʰiɛr^{0} 目前，当前 105

河北秦皇岛：眼目前儿 ian^{214} mɤ^{0} tɕʰiar^{35} 眼前 113
黑龙江讷河：眼目前儿 (缺音标) 眼下 610
黑龙江牡丹江：眼么前儿 iɛn^{213} mɤ^{33} tɕʰiɛr^{35} 眼前 1536
Cf.**“跟前”**
河北安次：眼目前儿 (缺音标) 距离更近的地方 (=天津) 河北词汇 622
河北乐亭：眼目前儿 “目”音“/mei/” 距离更近的地方 河北词汇 623

无棣的开头两个音节“拗么”看上去像是来自“眼望”，其实不是。上面作为来自“眼望”的对应词大都是分布于河南、山西地区的。无棣在黄河河口，面临渤海，离河南、山西地区较远，并且中间绝不分布可解释为来自“眼望”的词例。举例中的山东曹县邻接河南，曾经还有过划归于河南的时期。即便如此，也根本见不到记作“眼望前(儿)”的例子。附近方言有“眼目前儿”。上面秦皇岛、牡丹江以及乐亭例子里的“目”相当音节都发生变读，这完全可以解释为“目”字在此词形里发生弱化、同化的结果，并不必考虑来自“眼望前(儿)”。无棣例子很可能是与此“眼目前儿”同类，其演变过程大概如下：

眼目前儿 **眼么前儿**

(ŋ)ian mu tsʰ/tɕʰian(r) → (ɲ)ian mə tsʰ/tɕʰian(r) → (ɳ)iau mə tsʰ/tɕʰian(r)

(讷河?) **牡丹江、秦皇岛**

拗么前儿

→ (ɳ)iəu mə tsʰ/tɕʰian(r)

无棣

未见 iau mu tsʰ/tɕʰian(r)，所以先排除 (ŋ)ian mu tsʰ/tɕʰian(r) → (ɲ)iau mu tsʰ/tɕʰian(r)

→ (ŋ̍)iau mə tsʰ/tɕʰian(r) → (ŋ̍)iəu mə tsʰ/tɕʰian(r) 如此演变顺序的解释。据《无棣方言志》所记载，除了部分和普通话同读 n-以外，中古疑母字都读零声母。“眼”亦不例外，如：

捂眼子 vu$^{55\text{-}213}$ iã^{0} tsɿ^{0} 140

魔眼 mə^{31} iã^{55} 磨上层用来放入粮食的两个圆孔 141

眼眉 iã^{55} mei^{55} 122

眼眵 iã^{55} tsʰɿ^{213} 122

鼻子眼儿 pi^{55} tsɿ^{0} iɛr^{55} 鼻孔 122

鼻子眼子 pi^{55} tsɿ^{0} iã$^{55\text{-}213}$ tsɿ^{0} 鼻孔 122

耳朵眼儿 ər$^{55\text{-}213}$ tuə^{0} iɛr^{55} 123

耳朵眼子 ər$^{55\text{-}213}$ tuə^{0} iã$^{55\text{-}213}$ tsɿ^{0} 123

嗓子眼儿 saŋ$^{55\text{-}213}$ tsɿ^{0} iɛr^{55} 125

嗓子眼子 saŋ$^{55\text{-}213}$ tsɿ^{0} iã$^{55\text{-}213}$ tsɿ^{0} 125

嗓喉眼子 saŋ$^{55\text{-}213}$ xou^{0} iã$^{55\text{-}213}$ tsɿ^{0} 125

心眼儿 ɕiẽ^{213} iɛr^{55} ①心脏②心计 126

腚眼儿 tiŋ^{31} iɛr^{55} 肛门 126

腚眼子 tiŋ^{31} iã$^{55\text{-}213}$ tsɿ^{0} 126

窗户眼子 tʂ̍uaŋ$^{213\text{-}21}$ xuə^{0} iã$^{55\text{-}213}$ tsɿ^{0} 窗洞 162

但牟平有如下例子：

研墨 ŋ̍ian^{51} mo^{213} 细细地磨墨 词典 259

加之，可供参考下面类似构词法的例子：

山西临汾：眼前 ŋ̍ian^{453} tɕʰian^{0} 现在 206

山西新绛：眼前头 ŋ̍iã^{44} tɕʰiã$^{325\text{-}35}$ tʰəu$_{11}$ 目前 33

山西方言中古疑母读 n- 的例子较为多见。虽然除了无棣例子之外，未见山东方言里“眼”读 n/ŋ̍- 的，但我们可以认为无棣的例子是由于发生了特殊音变，很难认定本字为“眼”， 或者是由于开始使用代用字，因而脱离了古疑母的一般历史演变途径(即 ŋ > ɲ > ŋ̍ > 零声母)，声母停步在前一个阶段了。

参考文献

太田斋 1999“蜘蛛”的“网”－微母字特殊演变例－,《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　首届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蓝生 侯精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87-296 页

方言材料

安徽

铜陵：铜陵方言记略，王太庆,《方言》1983 年第 2 期，99-119 页

河北

安次：《河北方言词汇编》，李行健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955+1 页　(略称 河北词汇)

乐亭：同上

河间：《河间县志》, 方志编委会,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753-782 页

秦皇岛：《秦皇岛市志》第十卷, 方志编委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89-144 页

河南

安阳 :《河南省志》11・方言志, 省志办公室,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285+5 页　(略称　省志)

安阳：《安阳方言词典》， 赵文龙，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473 页　(略称 词典)

长垣：《长垣县志》，方志编委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563-577 页

封丘：《封丘县志》，县志编委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647-657 页

鹤壁：《鹤壁市志》，市志编委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571-1609 页

淮阳：《淮阳县志》，邵士杰 王守德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868-882 页

辉县：《辉县市志》，市志编委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803-820 页

汲县：河南方言词汇，任均泽收集,《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三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16-29 页

开封：《开封县志》，县志编委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529-552 页

《河南省志》11・方言志, 省志办公室,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285+5 页　(略称　省志)

开封方言记略，刘冬冰《方言》1997 年第 1 期，271-285 页　(略称 FY97-4)

开封郊区：《开封市郊区志》，区志编委会，开封市新闻出版局，1999，639-642 页
兰考：兰考方言语汇拾零，王学森，《开封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43-48 页
卢氏：《卢氏县志》，县志编委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22-847 页
洛阳：《洛阳方言志》，市史志办公室，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17 页
内黄：《河南内黄方言研究》， 李学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65 页
杞县：《杞县志》，县志编委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43-858 页
商丘：商丘方言常用词语简释，袁德业，《汉语论丛》第一辑，河南省语言学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405-420 页
商水：《商水县志》，县志编委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361-386 页
上蔡：《上蔡县志》，县志编委会，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5，631-658 页
太康：《太康县志》，县志编委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557-600 页
新乡：《河南省志》11·方言志，省志办公室，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285+5 页 （略称 省志）
新乡市红旗区：《红旗区志》，区志编委会，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2，451-460 页
原阳：《原阳县志》，县志编委会，中州古藉出版社，1995，655-675 页

黑龙江

牡丹江：《牡丹江市志》，市志编委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1533-1544 页
讷河：《讷河县志》，县志编委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608-611 页

山东

曹县：《曹县志》，县志编委会，中华书局，2000，589-596 页
德州：《德州方言志》，曹延杰，语文出版社，1991，241 页
利津：《利津方言志》，杨秋泽，语文出版社，1990，184 页.+3 幅地图
临清：《临清方言志》，张鸿魁，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229 页
牟平：《牟平方言志》，罗福腾，语文出版社，1992，203 页 (略称 方言志)
《牟平方言词典》，罗福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428 页 (略称 词典)
荣成：荣成方言，张卫东，北京大学 1982 年研究生毕业论文，136 页
《荣成方言志》，王淑霞，语文出版社，1995，274 页+1 幅地图
文登：《文登话》，连疆，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6，568 页
文荣：文荣词汇，连庆江，《语言学通讯》第五期，山东省语言学会，1982，148-167

页
无棣：《无棣方言志》，张金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广东有限公司，2015，400 页

山西

临汾：《临汾方言》，陈宇中，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238 页
临猗：《临猗县志》，县志编委会，海潮出版社，1993，625-646 页 (略称 县志)
《临猗方言研究》，王临慧，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94 页 (略称 研究)
平陆：《平陆县志》，县志编委会，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563-588 页 (略称 县志)
《平陆方言研究》，李雅翠，九州出版社，2009，242+1 页 (略称 研究)
《山西方言常用词汇集》第三辑，山西省公安厅方言研究小组，1987，太原，235 页 (略称 词汇集 3)
芮城：《芮城县志》，县志编委会，三秦出版社，1994，963-988 页
新绛：《新绛方言志》，朱耀龙，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64 页
永济：《山西方言常用词汇集》第二辑，山西省公安厅方言研究小组，1986，太原，127 页 (略称 词汇集 2)
运城：《运城市志》，市志编委会，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4，657-681 页

汉语“追赶”义词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

李雪敏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追赶”义的主导词有 3 个：追、赶、撵。它们在共时平面的分布特点是:“撵”的分布地域最大，其次是“追”，再次是“赶”。汉语史上“追赶”义词在各时期的主导词不一。文章通过绘制并描写“追赶”义词的共时分布地图，同时对其历时演变进行考察，初步揭示“追赶”义词的共时分布情况与历时演变过程。

表示“追赶”义的词语是汉语中的常用词之一，本文在绘制现代汉语方言“追赶”义词共时分布地图的基础上对分布的具体情况进行描写，同时对其在汉语史上的历时演变情况进行考察，初步解释其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之间的关系。

一、共时分布

本文在收集大量现代汉语方言资料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辞书[1]和大量方言志以及其他方言研究专著的基础上，利用日本金泽大学岩田礼教授等人开发的信息软件系统(PHD System)[2]绘制了一幅“追赶”义词的共时分布地图（详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示“追赶”义的词形非常丰富，并不统一。在调查方言用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追”“赶”“撵”出现频率较高，“断”“猎”“趯[3]”“逐”“揸”“执”次之，此外还有一些词由于出现频率很低，本文不做研究。以下是对该地图的基本解释。

[1] 相关资料还有《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和《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等。

[2] 所载地图使用日本金泽大学岩田礼教授等人开发的“PHD System”软件绘制，PHD 是 Project on Han Dialects（汉语方言研究计划）的缩写。“PHD System”及主要参照方言资料目录等相关信息见岩田礼（2009、2012）。

[3] 由于“PHD System”系统所限，“趯”在地图中表示为“｛走+复｝”。

1.1 目的

通过解释“追赶”（to chase）义动词的方言地图来分析各种词形的地理分布及词义的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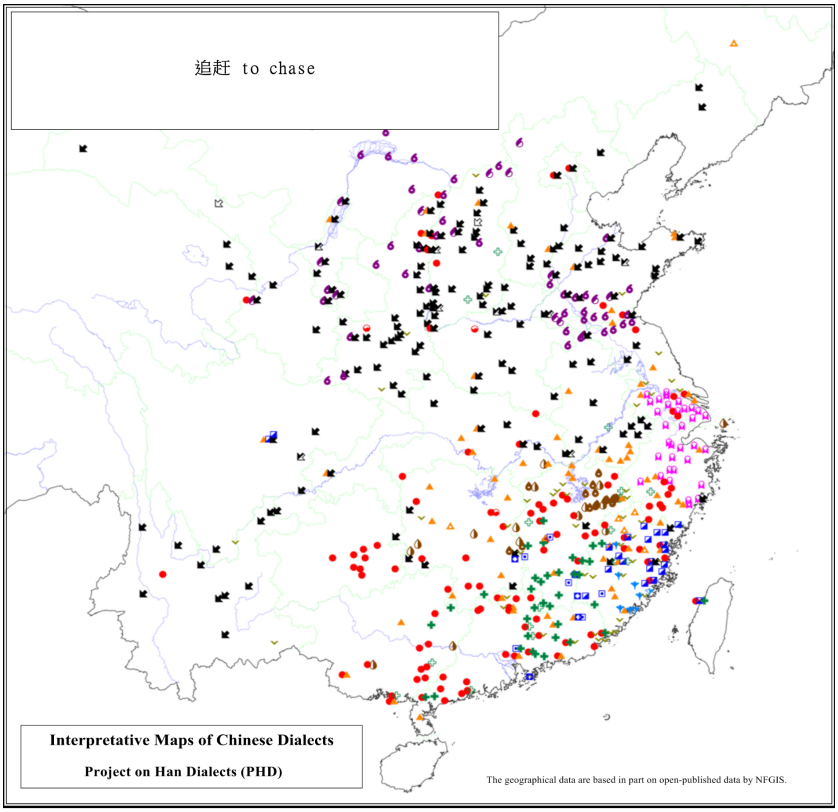


图 1：“追赶”义词的共时分布地图

1.2 词形分类

A.“追”系（110）[4]：追[tʂuei]、[tuei]、[tsei]、[tsui]、[tɕyei]等；追赶[tʂuei kan]、[tɕyei kan]

B.“赶”系（82）：赶[ka]、[kan]、[kɔn]等；界[kai]；尬[ka]；贯[kuaŋ]；解[kæ]；继[kai]；赶出去[kaN tɕʰy kʰə]、[kø tsʰəʔ kʰi]

C.“撵”系（164）：撵[nian]、[niæN]、[ɳian]、[lian]等；辇[niɛn]、[niæ]；躣[niæN]；捻；撵断[niɛN tuɔN]、[ɳiei tuɛ]

D.“断”系（55）：断[tua]、[tuæN]、[tuaN]等；踹[tuæN]；段[tuan]；躖[tuæN]；掇[tuæ]；

E.“猎”系（55）：猎[lieʔ]、[liɛp]等；邋[liɛʔ]、[liap]等；躐[liɛp]、[ŋia]；趔[liaʔ]、[lEʔ]

F.“趯”系（34）：[bai]、[biəʔ]、[bieʔ]、[biɪʔ]等

G.“逐”系（35）：逐[tɕʰiəʔ]、[tøk]、[tsʰəʔ]、[tyʔ]等；趣[kiuk]、[tɕiək]等

H.“挷”系（29）：挷[pʰɑŋ]、[pʰɛN]、[pʰəŋ]、[pʰuŋ]等；羿[pʰɛN]；梆[pɔŋ]

I.“执”系（7）：执[tsiaʔ]、[tsip]；缉[tsep]、[tsip]

J.其他（45）：逼[pi]、抄[tsau]、蹙[dʑiok]、趋[ziəu]、笛[tiak]、嗲[tia]、赴[hou]、趭[ziou]、辽[liau]掠[lʌu]、驱[kʰy]、趋[tsiəɯ]、趄[sæN]、闩[sueN]、拴[ɕuæ]、栓[suæ]、趯[tɪk]、腆[tʰiæ]、走掠[tsau liaʔ]、〈走+复〉[soŋ]等

1.3 现状

“追”表示“追赶”义的用法从甲金文时期一直沿用至今，其分布地域是仅次于“撵”的第二大分布地域。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如贵州、湖南、湖北、江西西部、广西和广东西北部、福建省东北部、上海周边等地，同时还散见于北方的一些地区。“赶”也多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与“追”成毗连分布之势。主要分布于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北方的一些地区。“撵”的分布地域最大，主要分布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等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越过长江分布于安徽南部地区和湖南省西南部，同时沿着长江上游分布于四川东部以及云南地区，并且有进一步向南方扩散的趋势。

“断”系主要分布于山东省西南部、河南省东北部、江苏省北部一带、山西和陕西省的交界处、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地区以及宁夏南部地区。“猎”系主要分布于江西南部、福建与江西省交界的西部地区、广东省东部和广西省东部地区，多为客

[4] 括号内数字表示用该词的方言点的数量。下同。

家话的分布地区。“趱”系是吴语的特征词之一，分布很集中，主要分布于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的一些地区。“逐”也是从甲金文时期就用来表示“追赶”义，现在主要分布于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和广东省东部、江西省南部的一些地区以及四川省成都市。“揨”系主要分布于江西省东北部、西北部、江西与湖南交界的西南部以及湖南省的西南部。“执”系主要分布于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惠安县、大田县、顺昌县、永春县，都位于福建省南部。

“追赶”义词分布的南北对立情况比较明显，“追”系和“赶”系分布于大部分南方地区，“撵”系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在南方地区也有一定的分布。此外，各方言区表示“追赶”义还有独特的词语，并不统一，福建地区用“逐”系表示“追赶”义是一种存古现象。各方言区还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使用“追”和“赶”。

二、历时演变

语言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新词新义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伴随着旧词旧义的减少甚至消失。本文将“追赶”义词的历时演变过程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着重刻画近代汉语阶段“追赶”义词中“追”“赶”“撵”三者的演变轨迹，从历时角度对其共时分布作出初步解释。由于上古和中古时期未见表示“追赶”义的“撵”与“赶”，故这两个时期只调查“追”、“逐”二词的文献用例情况。

2.1 追、逐

2.1.1 上古[5]（西汉以前）

虽然“追”系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地域不如“撵”系，“逐”系也只保留在福建省，但在上古时期“追”、“逐”却是“追赶”语义场中的重要成员，二词在甲金文中已有用例。“追”多用于战争中追击敌军的情况，“逐”的本义多用于追捕动物。王凤阳（2011:747）指出“追”和“逐”的不同点在于：“‘追’的双方可以处于敌对关系、角逐关系中，也可以是友好关系；‘逐’的双方，一般处于敌对关系或者竞争、角逐关系中。”

本文考察了“追”、“逐”在上古时期几部典型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详见表 1[6]。

[5]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考察上古出土文献的情况。

[6] 表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词在所在文献中作“追赶”义的次数，表 2、表 3 同。

表 1：上古时期表示“追赶”义的“追”“逐”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文献名	追	逐
尚书	3（0）	2（2）
诗经	4（0）	0（0）
左传	44（34）	91（15）
国语	4（2）	18（5）
韩非子	7（6）	26（6）
吕氏春秋	9（9）	16（7）
史记	165（139）	147（46）
淮南子	19（15）	20（10）

“追”在春秋以前的传世文献中用于“追配”“追孝”等搭配，不见“追赶”义的用例。由表 1 可知，春秋以前只有两例“逐”表示“追赶”义：

（1）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尚书·费誓》）

（2）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尚书·费誓》）

进入战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处于混战局面，战争频繁，二字的用例均有所增加。虽然“追”的用例总体不如“逐”，但“追”表“追赶”的比重却有与“逐”表该义的比重相抗衡的趋势。丁喜霞（2004）指出：“‘追’有了‘追回’义，与‘逐’的原始义重合，挤占了‘逐’的对象空间，……‘逐’的中心意义发生转移，表示使对象离开的‘驱逐、放逐’义。”可知《左传》中“追”的总数虽不如“逐”，但“追”基本用于“追赶”，而“逐”常用于“驱逐、放逐”，二者在用法上已经有所侧重。如：

（3）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4）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戌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戌来奔。（《左传·定公十四年》）

此时“追”多与敌国军队和需要被追捕的人搭配，后常带有对追赶结果的描述，而“逐”多与被驱逐的具体人名相搭配。西汉时期二词用例大量增多，就《史记》而言，165 例“追”中已有 139 例表示“追赶”，还出现了“追击”、“追杀”、“追捕”等词组，大大超过“逐”表示“追赶”义的用例。“逐”仍常用作“驱逐”义，多用于“放逐”、“驰逐”、“逐利”等固定搭配中。随着“追”的用例和用法的增多，一些原本与“逐”搭配的语素也能够和“追”搭配成词。如《庄子·则阳》中表示“追击败兵”的“逐北”一词在《吕氏春秋》中已有“追北”一词与之对应。《史记》中“逐北”共出现 6 次，而“追北”出现了 9 次。

2.1.2 中古（东汉—隋）

中古时期“追”“逐”词义各有侧重的情况愈加明显，据表 2 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古时期表示“追赶”义的“追”并未完全替代“逐”，但优势地位十分显著，详见表 2。

表 2：中古时期表示“追赶”义的“追”“逐”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文献名	追	逐
汉书	202（121）	197（51）
论衡	17（9）	44（5）
风俗通义	13（9）	5（2）
东汉佛经	23（6）	9（5）
三国志	346（142）	33（13）
世说新语	18（14）	5（3）
贤愚经	17（12）	33（18）

《汉书》中“追”共 202 例，其中 121 例表示“追赶”，与其他词语的搭配形式也非常丰富。“逐”共 197 例，表“追赶”有 51 例，还有表“逐捕”、“取得好处”、“跟随”等义的用例，此外，还出现了“追逐”连用的用例：

（1）为一马自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汉书·赵充国传》）

可知《汉书》中表示“追赶”的词已经主要是“追”，而“逐”多用于表示“驱逐、放逐”，二词的主要用法已经很明确。

《论衡》中“追”共 17 例，“追赶”义 9 例。“逐”共 44 例，“追赶”义仅有 5 例，且 5 例“相逐”都出自《论衡·语增》中关于纣王的故事。经过对比明显可以看出，“逐”在《论衡》中倾向于表示“驱逐”，而“追”表示“追赶”。如：

（2）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论衡·骨相》）

（3）桥梁之设也，足不能越沟也；车马之用也，走不能追远也。（《论衡·程材》）

（4）林中幽冥，人时走戏其中，则言裸相逐。（《论衡·语增》）

《世说新语》里有两例“追”与“逐”对举，但总体用“追”来表示“追赶”，“追”“逐”对举也从侧面说明“逐”的“追赶”义尚未完全被“追”取代。如：

（5）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据木，此必死矣。”遂

罢追。玄竟以得免。(《世说新语·文学》)

(6)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世说新语·方正》)

《世说新语》虽然不能算作纯粹的口语材料,但比较接近口语,可以作为魏晋中土文献语言的典型代表,《贤愚经》口语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魏晋译经语言的代表。《贤愚经》中“追赶”义多用“逐”来表示，亦可知口语中“追赶”义的“逐”尚未完全被“追”取代。刘曼(2014：13)认为:“隋代以前，‘追’相对于‘逐’处于优势地位，但二者在对象搭配范围和文献分布范围上均存在互补，‘追’并未排挤替代‘逐’。”总体而言中古“追”成为“追赶”语义场的主导词已毋庸置疑。

2.1.3 近代(唐五代—清初)

近代汉语“追赶”语义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古时期表示“追赶”义的主导词“追”的用例在近代汉语中大幅度减少，出现了新的成员“撵”和“赶”，这时期的主导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此时期“追赶”义各词的用例的变化详见表3。

表3：近代时期表示“追赶”义的词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文献名	追	逐	趁	撵	赶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16(1)	1(1)	7(2)	/	/
八卷本搜神记	4(0)	5(3)	/	/	/
祖堂集	9(1)	20(3)	35(12)	/	/
朱子语类	83(12)	52(4)	8(1)	/	30(10)
元刊杂剧三十种	8(4)	8(2)	13(0)	/	20(11)
崇祯本金瓶梅	44(3)	62(0)	56(1)	17(0)	168(51)
醒世姻缘传	27(3)	37(0)	54(0)	32(0)	270(78)
西游记	24(18)	13(0)	54(0)	/	320(225)
平妖传	6(4)	11(0)	23(0)	/	108(78)
红楼梦前80回	18(4)	17(0)	106(0)	30(0)	199(67)

唐代中期口语性较强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共出现16次“追”，其中仅1例表“追赶”义，1例“逐”(例2)仍是“追赶”义，如：

(1)廿七日，卯时，去淮口七十余里，逆潮，暂停。余船随后追来。(卷一)

(2)访金珍船：其船已往登州赤山浦讫。见留书云：“专在赤山相待。”既

如此，不免向乳山趁逐彼船。（卷四）

八卷本《搜神记》中共 4 例“追”，没有一例“追赶”义，共出现 5 例“逐”，有 3 例“追赶”义。其他近代汉语文献中表“追赶”义的“追”或“逐”用例都甚少，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该时期“追赶”语义场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与下文出现的新成员密切相关。

2.2 撵

“撵”在《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010:2096）中的首见例证为明代《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趁早与我出去，我不着丫头撵你。”“撵”表“驱逐，赶走”义，“追赶”义用于现代文学作品之中，时间很晚。明代文献中“撵”表示“驱逐，赶走”义例证很多，如崇祯本《金瓶梅》中就出现了 16 例，可见“撵”的“驱逐，赶走”义至迟于明代已产生。《红楼梦》前八十回共出现“撵”46 次，没有“追赶”义的用例。

清代前期有“撵”表示“追赶”义的用例。康熙年间徐震所著《照世杯·百和坊将无作有》中有一例“撵”表示“追赶”义，见例（1）：

（1）可怜欧滁山被那大汉捉住，又有许多汉子来帮打，像饿虎撵羊一般，直打得个落花流水。

嘉庆初年小和山樵的《红楼复梦》里出现 10 例“撵”表示“追赶”义，例如：

（2）修云笑道：“你们走的好快，咱们这么撵也撵不上。”（第二十回）

刘晓梅、李如龙（2003）指出“追赶”义的“撵”是“现代汉语官话方言的一级特征词”，图 1 如实的反映了这一结论。其实关于“撵”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趁”，前贤已有诸多研究。王云路、方一新（1992:78）“趁”字条指出：“‘蹸’、‘踗’、‘撵’三字均为赶、驱逐义，音 niǎn，与乃殄切或尼展切的读音正合，当即‘趁’字此义在后世的同词异写。……今北方方言中尚把追赶、驱逐称为‘撵’，是古语之遗留。”王凤阳（2011:747）指出：“利用机会的‘趁时’、‘趁势’义应是从‘走’、‘彡’声的 chèn；‘趁车’、‘趁船’义应是从‘走’‘尔’声的 niǎn。两字在字形上混淆。……这类‘趁’都应读 niǎn，即今天语中的‘撵’或‘赶’，它兼有‘追’和‘逐’的主要含义。”张文冠（2014：253）指出：“事实上，‘撵’这个词至迟在唐代即已产生，……‘撵’是后起字。”武建宇、高玉敏（2015）指出：“‘趁’与六朝时出现的‘蹸’和明代出现的‘撵’有着极其对应的意义关系。……所以六朝时期‘丑刃切’的‘趁’与‘尼展切’的‘趁’从一开始就有混用的现象，《玉篇》《广韵》的材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后来‘丑刃切’的‘趁’使用渐广，对‘尼展切’的‘趁’

的使用造成影响，所以明代新造了‘撵’来替代‘尼展切’的‘趁’和‘捻’，使得音、义统一。”真大成（2015）对“追赶”义的“趁”做了研究，认为：“至晚在中晚唐时期，‘趁’已行用南北，成为通语词。……同时‘趁’在追逐语义场中与‘追’、‘逐’展开竞争，以其强烈的口语性表现得相当活跃。”

真大成（2017）在《“趁”之来源补论》中对“趁”的来源和读音重新做了考释，他指出：“表追逐义的‘趁’字五代以来仍读丑刃切。……表追赶义的‘趁’，音义均无关于‘蹸（捻、撚、撵）’，只是其形与‘蹸’的异体‘趁’偶同而已。……要之，从词汇史的角度看，表追逐、驱赶义的‘趁’和‘撚/蹸/捻/撵’均为相应时期来源于方言的新词，二者之间只是历史同义词，没有词源意义上的联系。”

我们赞同真大成的观点，即表追赶义的“趁”唐五代以来仍读“chèn”，“趁”最早记载于 5 世纪的文献表示“追赶”义，并且在中晚唐时期行用南北，成为通语词，与“追”“逐”展开了竞争。但由于“趁”（chèn）的字形与“蹸”的异体字“趁”（niǎn）偶同，二者成为了同形字，“趁”和“撚/蹸/捻/碾/撵”就产生了关系，导致人们将“趁”（chèn）和“趁”（niǎn）混为一谈，这种混用现象应该在唐代就已经产生。

据调查，从南宋开始“趁”（chèn）已多用来表示“赚”、“挣”义，并且在明清小说中大量使用，导致其词义负担过重，“追赶”义与“赚”、“挣”义产生了冲突，而最终结果“趁”以表达“赚”、“挣”义为主，“追赶”义需要词义分担。所以人们以“撵”系的词来替换了“趁”（chèn），分担了“追赶”义。至于常用“撵”表“追赶”义，原因可能在于“撵”本有“驱赶”义，“追赶”义与“驱赶”义又密不可分，所以人们选择了“撵”作为“撵”系的主要写法。这种词义分担很可能在明代就已完成。“追赶”义的“撵”辗转沿袭了唐代“追赶”义“趁”的用法，因而能够分布于广大的北方地区和部分南方地区，前贤时彦确有灼见。

2.3 赶

近代汉语中表示“追赶、追逐”义的词还出现一个“赶（趕 gǎn）”，《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010:3720）中“赶（趕）”字出现在唐代，表“追赶、追逐”的首见例证是唐代张鷟《朝野佥载》[7]卷二：“时同宿三卫子被持弓箭，乘马赶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唐五代文献中“赶”出现频率不高，且主要用来表示“驱赶”义，《朝野佥载》卷二中还有另外一例（例 3）表示“追赶”义。

[7] 承蒙真大成教授告知：“今本《佥载》已非原书本貌，文字或经后人改动，并不一定可靠。……唐末孙棨《北里志》“王苏苏”条有“留住青蚨热赶归”语、五代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有“莫可驱赶”语，可能是目前所见时代稍早且较可靠的例子。”

（1）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唐·王苏苏《和李标》）

（2）厨人馈食于堂，手中盘馔皆被众禽搏撮，莫可驱赶。（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

（3）庄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二）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010:3706）中涉及与“追赶”的“赶 gǎn”的同形字字“赶 qiǎn”：

（一）qiǎn《广韵》巨言切，平元羣。又其月切。元部。

①兽畜翘着尾巴奔跑。《说文·走部》：“赶，举尾走也。”朱骏声通训定声：“谓兽畜急走。字亦作趕。”

②马走貌。《集韵·先韵》：“赶，马走。”《五音集韵·仙韵》：“赶，马走皃。”

（二）gǎn《正字通》古览切。

①赶趁。《篇海类编·人事类·走部》：“赶，赶趁也。”

②追逐。《正字通·走部》：“赶，追逐也。”

③围棋术语。指连续断绝对方棋子的连络。宋徐铉《围棋义例·诠释》：“打，击也。谓击其节曰打，连打数子曰赶。”

④“趕”的简化字。

上述材料中的“赶 qiǎn”与现代简化字的“赶”只是字形偶合，实则语义无涉。本文所讨论的“赶”是“趕 gǎn”的简化字。

李乐毅（1996:82）指出：“从现有的文字材料看，‘赶’作为‘趕’的简体字，首见元代的《京本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十种》和《全相三国志平话》……在字书中，最早明确指出‘赶’是‘趕’的简体字的，是明末张自烈的《正字通》。这本书注：‘赶，追逐也’，又注明‘趕同赶’。”

宋代“追赶”义的“趁”已不常用，在《朱子语类》中只有一例，并和“赶”连用，其他都表示“赚、挣”义。“赶”的用法和词汇组合有所增加，既有表示“驱逐”之义，也有表示“追赶”义的用例，且和“追”连用组成“追赶”，和“趁”组成“赶趁”的用例也很频繁。如：

（4）窃见朝廷虽差使臣领兵追捕，而凶贼已遍劫江淮。深虑赶趁不及，徒党渐多。（欧阳修《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

（5）有探骑报曰：“夜来三更，兀术（改作乌珠）并韩常将军等人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侯欲乘势追赶。（《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七）

（6）闻前面有人马声，恐是来赶他，乃下马走入麦中藏。（《朱子语类》卷

一百三十八）

《汉语大词典》（1989-1993：10 卷 791 页）“追赶”条首见例证为元代高文秀《襄阳会》第一折：“俺奉着二公子将令，着俺二人追赶刘备。”引证过晚，宋代就有“追”与“赶”连用的例证，《三朝北盟会编》中已出现 10 例“追赶”，可以推测南宋时“追赶”已凝固成词。《朱子语类》中“赶”的用法也比较多样，用“赶”表示“追赶”的用例已经超过了用“逐”表示的数量，除表示实际的“驱逐”义和“追赶”义外，也有表示意义较虚的“比得上、及的上”义的例子：

（7）看程门诸公力量见识，比之康节横渠，皆赶不上。（《朱子语类》卷一百一）

（8）汪丈为人淳厚，赶张子韶辈不得，又有许多记问经史典故，又自有许多鹘突学问义理，又恋着鹘突底禅。（《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

对比近代汉语中表示“追赶”义“追”、“逐”、“撵”、“赶”的使用频率，加之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四种《老乞大》全部用“赶”表示“追赶”义，可以明显看出元代时“逐”的“追赶”义已经很少使用，而“赶”则占据了“追赶”语义场的重要地位。从本文调查的崇祯本《金瓶梅》等数据来看也支持这一结论，《金瓶梅》中基本上用“赶”表示“追赶”义，“趁”只有一例该用法，并且是和“赶”连用。《西游记》中有“追”“赶”对举的例子，但明显“赶”的口语性更强。见例（9）：

（9）行者驾云,随后赶来,叫声：“那里走!你若上天,我就赶到斗牛宫!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狱!”（第十八回）

“赶”的语义进一步发展，还产生了一些意义更加虚化的用法，比如表示“加快或加紧从事某项工作”、“趁，利用”、“赶紧”等义。近代汉语中“赶”在“追赶”义词中异军突起，从用法到用例数量都表现得非常活跃，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至少元代“赶”已经成为表示“追赶”义的主导词，这种现象在明清的文献中继续存在。

2.4 断、猎、趕、揸、执

“断”在《广韵》中有三个反切，徒管切、都管切和丁贯切。在一些方言中，“断”根据读音的不同来区分意义，比如江苏省的连云港市和东海县、宁夏固原县、山西忻县、甘肃山丹县、山东曲阜县、安徽砀山县等在地图上表示“追赶”的“断”都读为去声。《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1995:423）研究表明用“断”来表示“拦截”义时都读为上声，比如武汉、成都、合肥、扬州、长沙、双峰、南昌和梅县等地。据《紫阳县志》记载陕西省紫阳县用“断”表示“拦截”义时读 duǎn，且该县志的编纂者认为《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 “把小的驴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中“短”应

作“断”，该县志中表示“追赶”义的词有音无字，读音为 duàn，我们认为其实也是“断”字。

猎、躐、躐三字可以互通，由“打猎、捕捉禽兽”可以自然引申为“追赶”义。“趯”是吴语的特征词之一。《集韵·职韵》：“趯，走也。”《集韵·庚韵》：“揨，打也。”“趯”和“揨”能用来表示“追赶、追逐”义的原因尚未明了。“缉”和“执”可能是由于“缉拿、追捕”义而引申为“追赶”义，也有可能和“逐”关系密切而可以归入“逐”义，我们暂将其单列一系。

三、结语

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词语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有趣，将共时平面所呈现的情景加以历时的考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通过考察“追赶”义地图可以了解到“追”、“逐”、“撵”、“赶”之间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着的演变。汉语史上“追赶”义词的演变情况比较复杂，各个时期的主导词不一。上古“追”、“逐”的使用情况不相上下，后来用法各有侧重，中古时“追”成为“追赶”义词的主导词。中晚唐时期“趁”成为“追赶”义词的主导词，由于“趁”（chèn）的字形与“蹔”的异体字“趁”（niǎn）是同形字，“撵”系和“趁”就有了瓜葛，明代“撵”替换了“趁”成为“追赶”义的重要词语。宋元时期兴起并发展的另一个表示“追赶”义的“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该语义场的主导词。“追赶”义词在现代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上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正是方言存古的重要证据，也证明了共时与历时结合研究的重要价值。

附记：本文是日本金泽大学大学院人间社会环境研究科“中国方言文化研究短期研修プログラム”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词汇通史”（14ZDB093）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受到岩田礼教授和汪维辉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文中尚存问题概由笔者负责。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 199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 语文出版社

丁喜霞 2004 《〈左传〉“追”“逐”的意义和用法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 1 期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0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 崇文书局、四川辞书出版社
李乐毅 1996 《简化字源》 华语教学出版社
刘 曼 2014 《词义流变与常用词兴替研究——以八组个案为例》 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刘晓梅 李如龙 2003 《官话方言特征词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方言词为例》《语文研究》第 1 期
罗竹风主编 1986-1993 《汉语大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王凤阳 2011 《古辞辨》（增订本） 中华书局
王云路 方一新 1992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 吉林教育出版社
武建宇 高玉敏 2015 《说“撵、撚、蹂、趁、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第 1 期
岩田礼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白帝社
岩田礼 2012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 好文出版
张文冠 2014 《近代汉语同形字研究》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真大成 2015 《说“趁”——基于晋唐间（5-10 世纪）演变史的考察》《中国语文》第 2 期
真大成 2017 《“趁”之来源补论》《语言研究》第 1 期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words indicating “to chase” in Chinese

LI Xue-min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verbs “Zhui (追), Gan (赶) and Nian (撵) ” are the dominant words in the semantic fields of “to chase”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re different. “Nian (撵)” has the largest distribution area，followed by “Zhui (追)”, then “Gan (赶)”. The dominant words of “to chas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period. In this paper, we draw and describe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map of the“to chase”, and investigate its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reveal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to chase”.

试论汉语词汇的系统化——以表〈玉米〉义词为例

铃木史己
南山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绘制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玉米（corn）〉义词的词形分布地图，以〈玉米〉义词与〈高粱（sorghum）〉义词之间的关联为线索，通过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构拟出其历时演变，旨在探讨汉语词汇系统的形成及其变化。新传入的事物被归类于某一原有事物，参照原有事物的称呼创造指称新来事物的新词形。这一造词法可以视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分类所致，新词与原有词形从开始就包含着同形冲突的可能性。因此，给新来事物赋予与原有事物相似的称呼，同时有意识地对词形加以操作把两者区别开来，以免同形冲突。新来事物及其词语形式借助于原有事物的称呼列入词汇系统中，新词的加入也意味着新词汇系统的产生。既然列入词汇系统中，即使其词语形式有所变化，也会对该系统内部的其它成员加以操作，以重新调整其系统性。

一、前言

词汇具有“开放系统（open system）”，其成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因此，与音韵、语法等“封闭系统（closed system）”相比，要搞清词汇的系统性是非常困难的。近年来，在汉语词汇史领域，以语义场（semantic field）为单位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演变模式及其机制。本文将着眼于杂粮的语义场，以表〈玉米（corn）〉义词为例，探讨汉语词汇系统的形成及其变化。玉米是到明代才传入中国的一种杂粮，由于其高产性取代了原有的杂谷，使杂粮语义场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尤其是玉米与高粱（sorghum）的生态以及用途相似，两者的称呼也有着甚为密切的关联。因此，本文以〈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之间的关联为线索，试图考察新来事物的称呼是如何被列入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并进一步归纳出词汇系统化的途径。有关玉米的历史记载虽然较多，却大多很简单，难以只靠历史文献描写其演变过程。因此，本文将绘制现代方言的词形分布地图，主要通过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构拟〈玉米〉义词的历时演变，需要时还将论及历史文献的用例，以提供相应的参考信息。

有关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玉米〉义词的词形分布，目前有两篇文章对此做过分析：岩田・吉田（2004）和铃木（2009）。两者都将词形分为修饰成份和词根，分别绘制方言地图，并分析了表〈玉米〉义词的历时演变。此外，铃木（2018）绘制了〈高粱〉义词的词形分布地图，构拟出其历时演变。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绘制三幅词形分布地图，据此考察汉语词汇的系统性。曹志耘（2008：13）也收入了〈玉米〉义词的方言地图，但其信息来源与本文所使用的地图不同，在有必要时可以作参考。

本文所使用的方言地图是利用 PHD 系统（数据库 ROOTS 与地图软件 Wonderland，参看 Hayashi 2009）绘制而成的，方言材料来自于已出版的方言调查报告。“　”内表示词语形式，〈　〉内表示词义或所指。

二、语言外因素：玉米在中国的传播

玉米（学名为 Zea mays L.）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禾本科植物，大约在 16 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关于玉米的传入路线，主要有以下三条途径（梅雪芹等 2019：359-362）：

1）东南海路：由南洋群岛传入福建、广东

2）西南陆路：由印度、缅甸传入云南

3）西北陆路：由波斯、中亚传入甘肃

与其它美洲作物相同，玉米也通过不止一条途径传入中国。

根据梅雪芹等（2019：363-366）研究，传入初期仅在零星地点有玉米种植，大致上北方种植规模小于南方，南方又集中在山区种植。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玉米种植得到了迅速推广，19 世纪中叶以后逐渐由山区向平原扩散。现在，玉米成为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作物，其主产地是东北、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在南方生产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和华北的玉米种植集中地区主要是在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形成的。本文将根据以上情况，着重于玉米种植地区的变迁以及作为粮食的地位提升进行考察。

三、地图的解释

下面将具体分析〈玉米〉义词。铃木（2008、2015）指出，外来事物的称呼在构词法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往往采取偏正结构，以原有事物的名称为词根，加上修饰成份来创造新词。指〈玉米〉义的词形也不例外，大部分都采用偏正结构。我们首

先把词形分为修饰成份和词根，分别绘制词形分布地图（地图 A、B），纵观〈玉米〉义词的构词法以及分布倾向，以此梳理出〈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综合地图（地图 C）的分析，以〈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之间的配对关系为线索，尝试构拟〈玉米〉义词的历时演变，并进一步考察表〈玉米〉义的早期词形是如何形成的。

3.1 〈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

3.1.1 修饰成份（地图 A）

表〈玉米〉义的词形根据修饰成份的有无可以分为 A“偏正型”与 B“非偏正型”。A“偏正型”的修饰成份主要有：A-1“玉”系（表〈玉石〉）[1]、A-2“包”系（表〈包裹〉）[2]、A-3“珍珠”系、A-4“金”系（表〈金黄色〉），以上来自玉米的籽实或子房的形态特征；A-5“番”系和 A-6“西”系都表示〈外来〉义；A-7“六”系和 A-8“大”系来自于玉米与其它谷物的关系。

B“非偏正型”大多是由其它谷物的称呼转用过来的。譬如，B-2“粟米”原指〈小米（millet）〉，B-3“黍”来自表〈黍子（broomcorn millet）〉义词，B-4 系的词形（“茭茭”、“t^hao 黍”、“秫秫”等）都来自表〈高粱〉义词。B-1“棒”系的形成过程与其它三类有所不同。“棒”表示玉米秆的形状，有“棒子”、“棒头”、“棒棒”、“棒槌（子）”等词形。其中最多出现的“棒子”一词不带修饰成份，可以判断为由词根和词缀构成的附加形式，很可能是由指称〈玉米秆〉的“玉米棒子”简略而成的，其它“棒”系词形可以解释为“棒子”的变体：“棒头”是替换词缀的形式；“棒棒”是“棒”的重叠形式；“棒槌（子）”可能是从洗衣服时捶打衣服用的棒子转用过来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 B-1“棒”系。岩田（1992：43）在按照语音形式绘制的江苏东北部的狭域地图中指出，指〈高粱〉的“芦秫”弱化为“芦子”，“棒子”也可能是“棒秫”的弱化形式。据其所论，这一带的“棒子”原本是偏正结构，后来才变为附加结构。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A-1“玉”系（43％）和 A-2“包”系（46％），B-1“棒”系

[1] 周振鹤 • 游汝杰（2006：109）指出，“玉”的本字是“御”，由于“御”与“玉”在北方同音，因而写成“玉”。盛益民先生还列举了三个根据：其一，“玉”系词形的语音形式在吴语中跟“御”字一致；其二，明 • 田艺蘅《留青日札》、明 • 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初期文献中被写成“御米”、“御麦”；其三，中国人的心目中对玉石的印象是青绿色，与玉米的色彩特征不一致（2016 年 3 月 2 日私人通信）。

[2] “包”系词形在若干方言点被写成“苞”（表〈子房〉）。“苞”与“包”均可视为描述子房的词素。

（16%）次之。在淮河以北，A-1“玉”系主要分布于山西至陕西、河南，B-1“棒”系集中分布在河北、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呈现出“东西对立”[3]。在淮河以南，A-2“包”系占优势，与北方的 A-1“玉”系和 B-1“棒”系呈现出“南北对立”[4]。东北地区、河北东部以及山东东部也分布着 A-2“包”系词形“包米”。这有可能是在晚清到民国时期扩大玉米种植的时候从南方引进过来的。

3.1.2 词根（地图 B）

〈玉米〉义词的词根主要归于三类：A“谷物型”、B“高粱型”和 C 其它。A“谷物型”来自粮食的名称，例如 A-1“米”、A-2“麦”、A-3“黍”、A-4“粟”、A-5“谷”[5]、A-6“豆”、A-7“粟米”（指〈小米〉）。鉴于〈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之间的密切关联，本文特意标出 B“高粱”型，如“茭”、“蜀黍”、“t^hao 黍”、“t^hao 秫”[6]、“芦”。

〈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是在多数方言点配对的：在北方，〈玉米〉义词以〈高粱〉义词为词根，附加修饰成份“玉”；在南方，附加修饰成份“包”。例如，在山西东部，〈高粱〉用“茭子”，〈玉米〉则用“玉茭子”；在山西西部至陕西，〈高粱〉用“t^hao 秫”，〈玉米〉则用“玉 t^hao 秫”；在河南，〈高粱〉用“秫秫”，〈玉米〉则用“玉蜀黍”、“玉秫秫”、“玉黍黍”。

〈玉米〉 / 〈高粱〉

山西太原：玉茭子[y^{45} tɕiau^{53} tsəʔ^{0}] / 茭子[tɕiau^{11} tsəʔ^{0}]（沈明 1998：35、143）

山西高平：玉茭[y^{53} tɕiɔ^{33}] / 茭子[tɕiɔ^{33} tsʔ^{33}]（白静茹等 2005：109）

山西万荣：玉䅟秫[y^{55} t^hɑu^{0} fu^{0}] / 䅟秫[t^hɑu^{51} fu^{0}]（吴建生・赵宏因 1997：62、219）

山西孝义：玉䅟黍[y^{53} t^hɔ^{11} su^{312}] / 䅟黍[t^hɔ^{53} su^{312}]（侯精一・温端政 1993：221）

山西河津：玉稻秫[y^{44} t^hau^{31} fu^{0}] / 稻秫[t^hau^{31} fu^{0}]（史秀菊 2004：186）

山东定陶：玉蜀黍[y^{31} fu^{53} fu^{0}] / 黍黍[fu^{53} fu^{0}]（山东省定陶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9：701）

河南鹤壁：玉秫秫[y^{312} su^{41} su^{0}] / 秫秫[su^{41} su^{0}]（鹤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8：

[3] 至于“东西对立”的含义，参看岩田（2009：16-17）。在东西对立的情况下，山西相当于过渡地带。值得注意的是，〈玉米〉义词使用与西部一致的 A-1“玉”系词形。

[4] 参看岩田（2009：13-14）。

[5] “谷”一般表示〈粟〉。A-5“谷”系与指〈稻〉义的方言词“谷子”分布区域大体上一致（参看曹志耘 2008、Endo et al. 2021），有可能来自〈稻〉义词“谷子”。

[6] “t^hao”主要有三种书写形式：“䅟”、“稻”和“秈”。三者的语音形式都有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要确定词源是非常困难的。关于“黍”与“秫”，由于轻声化难以确定。在曹志耘（2008：13）所载的表〈玉米〉义词的地图上一律写成“玉稻秫”，值得参考。本文依照铃木（2018）的处理方法，尽量按照该资料的书写形式输入信息。

1593）

河南周口：玉黍黍[y^{31} su^{53} su^{0}] / 秫秫[su^{53} su^{0}]（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1995：198）

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南部以及福建北部，〈高粱〉用“芦秫”、“芦穄”、“芦粟”等带有“芦”的词形，〈玉米〉则用“玉芦”、“包芦”等以“芦”为词根的词形；在江西、广东一带，〈高粱〉用“粟”、“高粱粟”等带有“粟”的词形，〈玉米〉则用“包粟”。

〈玉米〉 / 〈高粱〉

安徽霍山：玉芦[y^{53} lu^{45}] / 芦稷[lu^{45} tsɿ^{0}]（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826）

安徽祁门：包芦[pɔ^{11} lu^{55}] / 芦穄[lu^{55} tsi:ə^{213}]（平田 1998：221）

江西宁都：包粟[pau^{43} siuk^{2}] / 粟子[siuk^{2} tsə^{213}]（李如龙・张双庆 1992：233-234）

江西于都：包粟[pɔ^{31} siuʔ^{5}] / 粟子[siuʔ^{5} tsɿ^{0}]、高粱粟[kɔ^{31} liõ^{44} siuʔ^{5}]（谢留文 1998：75、84、251）

广东增城：包粟[pau^{44} suk^{1}] / 高粱粟[kau^{44} liɔŋ^{11} suk^{1}]（王李英 1998：211）

根据以上的分布倾向可以得知，随着玉米种植的普及，〈玉米〉义词吸收当地的〈高粱〉义词做为词根，取得了新的词语形式。

3.1.3 L 系词形（地图 C）

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湖南东北部至福建北部，分布着带有边音[l-]的词形：A-6-1“玉芦”、A-6-2“玉榴”、B-3-1“包芦”和 B-3-2“包罗”（下文统称为 L 系词形）。此四类词形呈现出南北方向的推移性分布。在这一带表〈高粱〉义的词形基本带有修饰成份“芦”，如“芦秫”、“芦穄”、“芦粟”等（下文称为“芦”系词形）。E-1“六谷”把 L 系词形的分布区域分隔成南北两边，与 B-1“包谷”连接。岩田・吉田（2004：117）根据此分布情况提出了以下三点推定：

1）L 系词形比 E-1“六谷”古老。进入 L 系词形分布区域的原本是 B-1“包谷”，B-1“包谷”由于通俗词源变成 E-1“六谷”。E-1“六谷”很可能是由“五谷”联想而成的。

2）B-1“包谷”与〈高粱〉义的“芦”系词形接触，以“芦”为词根，演变成为 B-3-1“包芦”。B-3-1“包芦”由于通俗词源变成 B-3-2“包罗”。“罗”有可能是“箩”。

3）B-3-1“包芦”与 A-1“玉米”接触，产生了 A-3-1“玉芦”。玉米的粒子与石榴相似，这一通俗词源引发了 A-3-2“玉榴”一词的产生（天野 1979：55）。

对于推定 1），指〈玉米〉义的“五谷”可以做为旁证。1990 年代出版的方言调

查报告显示，安徽太湖用 E-2“五谷[u^{31} ku^{35}]”（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257），与 E-1“六谷”毗连分布。在曹志耘（2008：13）绘制的地图中，安徽太湖不用“五谷”一词，但是湖南蓝山、江永用“五谷/五谷崽”，并且在此附近分布着“六谷”（湖南临武、江华）、“六谷-”（湖南嘉禾、广东连州）、“六谷包/六谷匏”（湖南宁远）的说法。

此外，清代的地方志中有如下记载（引自《清史资料》第 7 辑）：

(1) 御麦俗呼六谷，土人谓五谷之外又一种也。（钱大昕《鄞县志》卷 28 • 物产）：乾隆 51 年（1786）、现浙江宁波

(2) 苞芦，俗名芦音陆谷子。（汪荣等《安吉县志》卷 8 • 物产 • 谷属）：同治 12 年（1873）、现浙江安吉（湖州市西部）

用例(1)正说明了“六谷”的得名之由，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有理可据的。用例(2)对“芦”字以“陆”字加注，“陆”与“六”都属于《广韵》力竹切。“芦谷子”或“陆谷子”可视为“六谷子”的记音字。

至于推定 2）B-3-1“包芦”的形成过程，铃木（2009：170）认为：B-1“包谷”与〈高粱〉义的“芦”系词形接触，导致了混淆形式“包芦 X”（X 为“黍”、“秫”等）的产生；随着词源被遗忘，第三音节 X 脱落，从而有了“包芦”一词。但目前无法找到相当于“包芦 X”的形式，只发现了“玉芦 X”一说。

〈玉米〉 / 〈高粱〉

安徽安庆：玉芦稷[y^{53} nəu^{35} tɕi^{31}] / 芦稷[nəu^{35} tɕi^{31}]（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据此可以推测，A-3-1“玉芦”的成立早于 B-3-1“包芦”，形成“玉芦”之前还存在中间形式“玉芦 X”。“玉芦 X”是“玉”系词形（“玉米”等）和〈高粱〉义的“芦”系词形接触而成的，“芦”这一词素在第三音节 X 脱落后变为词根。A-3-1“玉芦”与 B-1“包谷”接触，从而产生了 B-3-1“包芦”。

B-3-2“包罗”在曹志耘（2008：13）的地图上一律写成“包萝”，但“罗”或“萝”的来源很难确定。值得注意的是，B-3-2“包罗”与 B-3-1“包芦”毗连分布，在两者交界的几个方言点，“芦”、“罗”和“萝”三字是同音的。例如，浙江建德采用“包萝[pɔ^{21} lu^{55}]”（曹志耘 1996：139），“芦”、“罗”和“萝”在建德方言的单字音都是[lu^{334}]。至少可以说，语音上的关联给 B-3-2“包罗”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条件。

关于推定 3），A-3-2“玉榴”还影响了指称〈高粱〉义的词形，〈高粱〉义词中出现了带有修饰成份“榴”的“榴粟”、“榴秫”等说法。

〈玉米〉 / 〈高粱〉

安徽岳西：玉秅[ʮ^{53} liəu^{0}] / 秅稷[liəu^{35} tɕi^{0}]（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257）

湖北英山：玉榴[ʯ^{35} liəu^{55}] / 榴粟[liəu^{55} ɕiəuʔ^{213}]（陈淑梅 1989：155）

湖北广济：玉稆[ʯ^{35} liu^{31}] / 稆秫[liu^{31} siuʔ^{21}]（卢源斌等 1985：140）

虽然书写形式不同，但〈玉米〉义词的第二成份和〈高粱〉义词的首位成份都具有边音[l-]和介音[-i-]。此现象说明〈玉米〉义词和〈高粱〉义词的配对关系甚为密切。

根据以上分析，L 系词形的形成及其变化如下（参看下图 1）：

1）“玉”系词形（“玉米”等）与〈高粱〉义的“芦”系词形接触后产生了“玉芦 X”（“玉芦秫”、“玉芦稷”等），又因第三音节 X 脱落变为“玉芦”。“玉芦”由于通俗词源变为了“玉榴”，与此同时，〈高粱〉义词也出现了“榴”系词形。

2）“玉芦”与“包谷”接触而变为“包芦”，又由于通俗词源变为了“包罗/萝/箩”。

3）“包谷”隔断了 L 系词形的分布区域，又由于通俗词源变为了“六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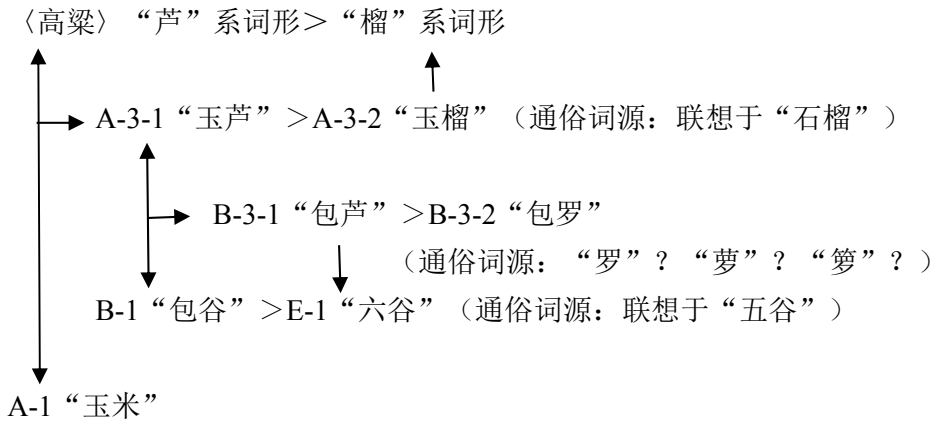


图 1　L 系词形的形成及其变化

3.1.4 转用词形

玉米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杂谷，尤其是在生态和用途上极其类似的高粱。以此语言外因素为背景，表〈玉米〉义词中出现了由〈高粱〉义词直接转用的形式。这一情况引发了同形冲突的危机。

在山西南部至河南北部的几个方言点，玉米沿用表〈高粱〉义词，为了避免同形冲突，指〈高粱〉的词语被加上了修饰成份“红”，或索性采用另一个词形。“红”来自高粱的籽实的颜色。

〈玉米〉 / 〈高粱〉

河南济源：茭茭[tɕiau^{13} tɕiau^{0}] / 红茭茭[xuŋ^{31} tɕiau^{13} tɕiau^{0}]（济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3：517）

山西临猗：豁黍[t^hau^{53} fu^{53}] / 红豁黍[$xuŋ^{24}$ t^hau^{31} fu^{20}]（临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637）

A-8“大”系是以〈高粱〉义词为词根，加上修饰成份“大”的词形，主要分布在安徽中北部。值得注意的是，配对的〈高粱〉义词也带有修饰成份“小”。“大”/“小”来自于玉米、高粱的籽实或者子房的大小。

〈玉米〉 / 〈高粱〉

安徽凤阳：大秫秫[ta^{53} $ʂu^{53}$ $ʂu^{0}$] / 小秫秫[$ɕiɔ^{24}$ $ʂu^{53}$ $ʂu^{0}$]（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59）

安徽天长：大芦秫[ta^{55} lu^{35} su^{0}] / 小芦秫[$ɕiɔ^{42}$ lu^{35} su^{0}]（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154）

江苏泗洪：大芦黍[ta^{51} lu^{55} $ʂu^{0}$] / 小芦黍[$ɕiɔ^{224}$ lu^{55} $ʂu^{0}$]（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355）

“红”、“大”、“小”都反映着语言外因素。不得不强调的是，“大”/“小”构成反义词语义场，如果“大 X”成立，就很容易联想到“小 X”。修饰成份的性质促使了系统化作用，导致与转用词形/“红”系词形形成了不同的演变模式。对于“大”系/“小”系的形成，可以提出以下两种解释[7]：

1）为了避免同形冲突，〈玉米〉采用“大秫秫”，而后〈高粱〉义词加上“小”，以调整系统。

〈高粱〉 “秫秫”＞“秫秫” ＞“小秫秫”

〈玉米〉 — ＞“大秫秫”

2）〈玉米〉被称为“秫秫”，为了避免同形冲突，〈高粱〉义词前置“小”，而后〈玉米〉义词加上“大”，以调整系统。

〈高粱〉 “秫秫”＞“小秫秫”

〈玉米〉 — ＞“秫秫” ＞“大秫秫”

“红”系词形和“大”系词形都可以看成为同形冲突的痕迹，只是这两个系列的词形属于临时形式。虽然玉米和高粱在作为农作物的地位上有优劣之分，但这两种植物同时存在，所以还是需要区分两者的称呼的。本文绘制的地图中还有十几个方言点使用“大”系词形，可是曹志耘（2008：13）所载的地图上只有六个方言点。由此得知，这些词形的过渡性很强，因此很快就被淘汰了。

[7] 太田（1999：20）指出，“燕子”和“雁子”的词根有着类音关系，在北方的若干方言里，〈燕子〉义词加上“小”，〈雁子〉义词则加上“大”，以此避免同音冲突。此现象与〈玉米〉义词/〈高粱〉义词相似。

3.2 指称〈玉米〉义的早期词形

与〈高粱〉义词配对的词形是玉米种植普及后才出现的。下面以玉米的传入途径为线索，探讨玉米刚传入中国时的称谓。

3.2.1 “包谷”与“玉麦”、“玉米”（地图 C）

B-1“包谷”广泛分布于湖北、湖南以西，如果把 E-1“六谷”包括进去，其分布区域以浙江北部为东端，沿着长江延续到四川、云南，呈现出类似“长江型”[8]的分布格局。“长江型”的词形大多起源于江淮地区，沿着长江从东到西传播，但是 B-1“包谷”未见于江淮地区至长江下游。四川、云南等内陆地区是玉米种植的初期主产地。据此可以推测，B-1“包谷”一词很可能起源于内陆地区，然后从西到东传播开来。

A-2“玉麦”分布在云南、四川、陕西，其分布区域被 B-1“包谷”隔断。由此得知，A-2“玉麦”的分布区域曾经更为广泛，后来被后起的 B-1“包谷”所取代。云南被认为是玉米最初传入的地区之一，并且根据农业史研究（天野 1979 等），云南的明清地方志里多次记载着“玉麦”一词。那么，“玉麦”有可能是属于玉米最早期的词形。并且可以推测，修饰成份“玉”的产生比“包”更早。

A-1“玉米”虽然集中的分布区域不广，西部的分布地点也不多，但见于整个中国大陆，显示出一种周圈分布的现象，地理分布上似乎与 A-2“玉麦”形成了互补。据此可以推测，A-2“玉麦”由于类推作用替换词根变成了 A-1“玉米”。在玉米种植普及之前，即意识到玉米与高粱之间的共同点之前，〈玉米〉可能被泛指为 A-1“玉米”或 A-2“玉麦”。

3.2.2 “番”系词形（地图 A）

罗常培（1950：30）指出，从域外传来的事物的称呼往往带有“胡”、“洋”、“番”、“西”等词素，被称为“描写词”。高晓虹 • 刘晓海（2008：68）则称之为“描写借词”。指〈玉米〉的词语中也能看到前置“番”和“西”的词形，但其分布情形不同于其它外来事物的方言地图。

A-5“番”系与词根“麦”的结合分布于陕西、甘肃、长江下游和福建南部。此外，“番黍”、“番豆”分布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番粟”则分布在湖南西南部。

由外来成份“番”与词根“麦”构成的词形可见于有关玉米的早期文献。

(3) 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具曾经进御，故曰御麦。（明 • 田义蘅《留青日札》卷

[8] 参看岩田（2009：13-14）。

26）：隆庆 6 年（1572）

(4) 西番麦、形似稷而枝叶奇大，结子累累，煮食之，味亚芡实。（明•王世懋《学圃杂疏》荁疏）：万历 15 年（1587）自序

目前，“番麦”呈现出远隔分布。这很可能是各自独立引发的。陕西和甘肃的“番麦”与 A-6“西”系词形分布区域不远。A-6“西”系与词根“麦”结合，零散分布于甘肃和宁夏。除了“西麦”以外，还有“西番麦[ɕi^{44} fə^{0} mia^{13}]”（宁夏中卫、林涛 1995：108）、“西风麦[ɕi^{44} fəŋ^{44} mia^{13}]”（宁夏中宁、李树俨 1989：87）等。西北地区的“番麦”可能与“西番麦”有所关联。

值得关注的是，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番黍”与指〈高粱〉义的“番黍”呈现出地理上的互补分布。指〈高粱〉义的“番黍”跟“黍”、“芦黍”等由“黍”构成的词形毗连分布。

〈玉米〉 / 〈高粱〉

福建福清：番黍[huaŋ^{55} sø^{21}] / 穄黍[tsie^{21} sø^{21}]（冯爱珍 1993：174）

福建仙游：番黍[huon^{22} nø^{32}] / 无记载（李如龙 2001：167）

福建漳平：番黍[huan^{24} sei^{31}] / 无记载（张振兴 1992：134）

福建永春：玉穗[giɔk^{21} tsui^{22}] / 番黍[huan^{22} sue^{53}]（林连通•陈章太 1989：149）

福建泉州：玉穗[gioʔ^{24} sui^{41}] / 番黍[huan^{33} sue^{55}]（林连通 199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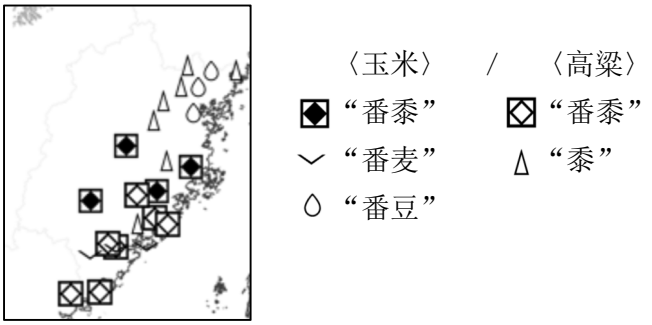


图 2 “番”系词形的分布

据此可见，指〈玉米〉义的“番黍”可能是以指〈高粱〉义的“黍”为词根，附加了修饰成份“番”的一种形式。在表〈高粱〉义的词形中原本没有带有“番”的词形，但是由于〈玉米〉义词的类推，用“番黍”指称了〈高粱〉。

在新来事物的称呼中，修饰成份“番”一般以东南地区为主，广泛分布（参看高晓虹•刘晓海 2008 等），反映着该事物的传入途径，即由海路传入的事物用“番”这

一词素来命名。这是新来事物最早期的构词法之一。修饰成份“洋”也是新来事物特有的词素，在〈马铃薯〉义词、〈肥皂〉义词的方言地图中，带有修飾成份“洋”的词形起源于江淮地区，沿着长江向西扩散（参看铃木 2008、2015）。〈玉米〉义词的“番”系词形分布区域并不广泛，并且修飾成份“洋”也没有出现。在〈玉米〉义词中，长江流域分布着起源于内陆地区的“包谷”，以玉米的初期种植为背景，从西到东扩散。因此，“番”系词形没能扩大其分布区域，甚至“洋”系词形也没有产生。

3.3 〈玉米〉义词的历时演变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考察了表〈玉米〉义词的演变过程。与玉米种植的发展过程相对应，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玉米的传入

由海路传入的玉米以“番麦”、“番黍”等“番”系词形称呼，由陆路传入的玉米则被称为“玉麦”。“玉米”有可能是由“玉麦”演变过来的。稍后“包谷”产生于西部的内陆地区。

2）玉米的普及

着眼于玉米与高粱之间的类似性，在各地吸收〈高粱〉义词而创造〈玉米〉义词。北方分布着“玉”系词形，南方则分布着“包”系词形，这一分布格局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3）玉米的地位提升

以作为粮食的高产性为背景，剥夺〈高粱〉义词形成“转用词形”，但是其临时性很强，很快就被淘汰了。

四、“同形冲突”与分类

铃木（2008）提出新来事物的两种构词法：其一，以原有词形为词根，加上修饰成份而构成，称为“援用方式”，新词的分布情况与原有词形几乎一致；其二，沿用原有词形作为称呼，称为“转用方式”，新词与原有词形呈现为地理上的互补分布，为避免同形冲突而对词形进行增添。此两种方式都见于〈玉米〉义词。“玉”系、“包”系等偏正型词形是由“援用方式”形成的，以高粱等原有杂谷的称呼为词根，加上标示玉米的形态特征的修饰成份（参看 3.1.1、3.1.2）。围绕〈高粱〉义词发生的同形冲突是由“转用方式”引起的，〈玉米〉义词剥夺〈高粱〉义词，以致〈高粱〉义词附上修饰成份保持区别，或采用另一个词语形式（参看 3.1.4）。

无论援用方式或转用方式，都与原有词形有着密切关联，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从词汇系统的角度来看，新的义位（或所指）及其词语形式借助于原有词形列入词汇系统中，新词的加入也意味着新词汇系统的产生。其典型例子就是〈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之间的配对关系。随着玉米种植的普及，玉米被视为高粱的一种，〈玉米〉义词吸收当地的〈高粱〉义词做为词根，取得了新的词形（参看 3.1.2）。此现象与同一个词形的传播有所不同，意味着人们把〈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归于同一个系统，这一词汇系统本身被扩散到各地。

既然列入词汇系统中，即使其词语形式有所变化，也会对该系统内部的其它成员加以操作，以重新调整其系统性。例如，L 系词形“玉芦”是与〈高粱〉义的“芦”系词形配对的，“玉芦”由于通俗词源变为“玉榴”，〈高粱〉义词也随之改为“榴”系词形（参看 3.1.3）。“番”系词形的产生导致了〈高粱〉义词加上多余的修饰成份“番”（参看 3.2.2）。〈高粱〉义词的“榴”和“番”都只有对比〈玉米〉义词与〈高粱〉义词才能解释清楚。这些例子都是为保持词汇系统而发生的。

蒋绍愚（1999）讨论了词汇系统及其变化，并从认知的角度指出两种分类：把哪些事物、动作、形状概括为一个义位，称为“第一次分类”；哪些义位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词，称为“第二次分类”。新来事物的命名属于“第二次分类”。人们先参照性质相近的原有事物，给新来事物赋予与原有事物相似的称呼，同时有意识地对词形加以操作把两者区别开来，以免同形冲突。

几个义位（或所指）采取同一个词形，这一现象在地理语言学研究中备受瞩目，一般利用“同音冲突”进行说明。岩田（2009：24）对“同音冲突（homonymic collision）”下了如下定义：“为争夺一个形式而开展的两种意义（所指）之间的斗争。”本文所述的“同形冲突”也可归于广义的同音冲突，但严格来讲还是有所不同的。作为同音冲突的典型例子，岩田教授列举了避免禁忌语的机制，可是抵触禁忌语往往是一种偶然现象，虽然其语音形式相近，但两者在词汇系统中占据的领域毫无关联（也参看 Iwata 2006）。同形冲突则特意对类似的意义或所指采用同一个形式，从而使其发生冲突。笔者认为，从词汇系统的角度来看，两者需要区别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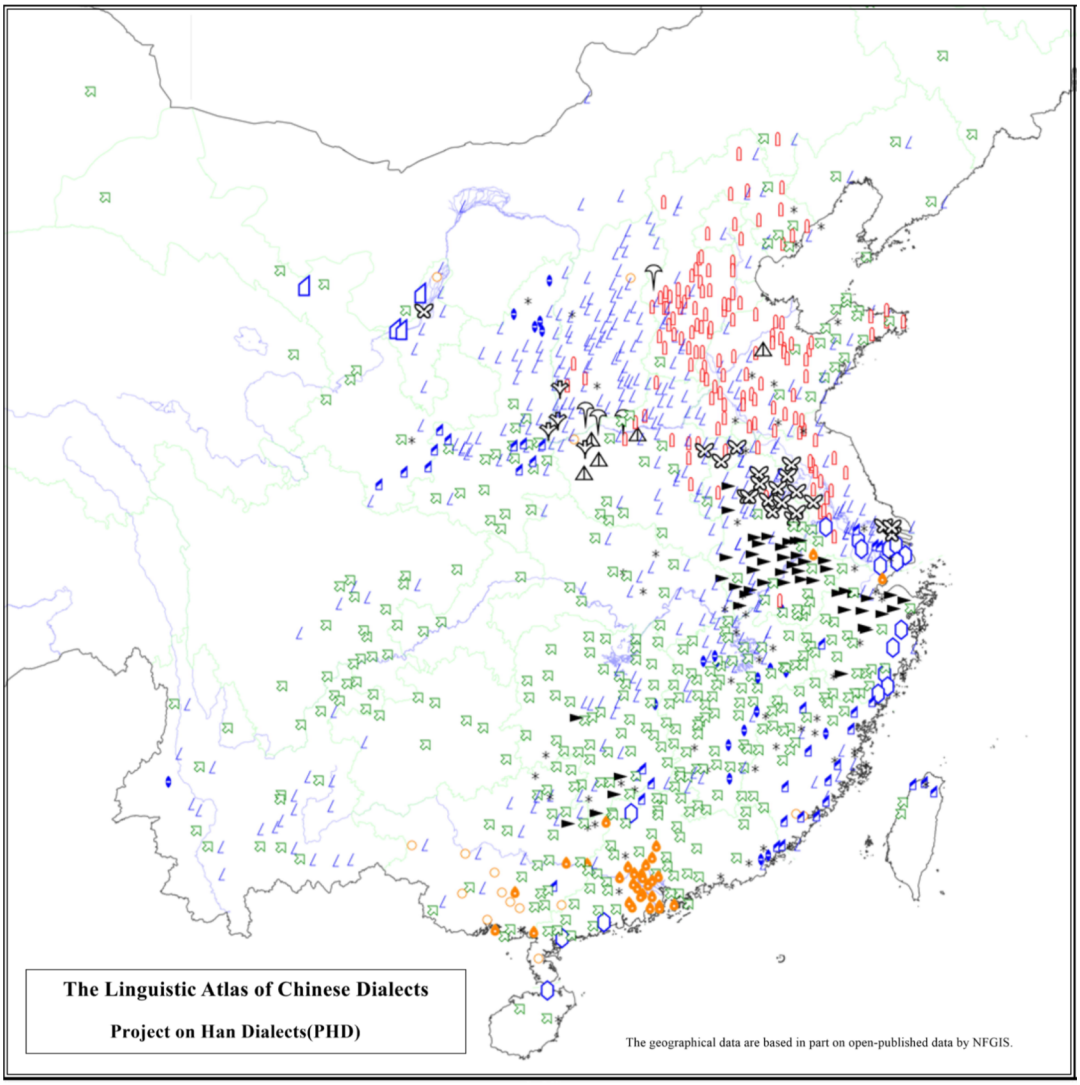
五、结语

本文通过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玉米〉义词的分析，考察了词汇系统的形成过程。新传入的事物被分类于某一原有事物，参照原有词形创造指称新来事物的新词形：即以原有词形为词根，加上修饰成份而构成，或直接沿用原有词形作为称呼。新来事物

及其词语形式借助于原有事物的称呼列入词汇系统中，新词的加入也意味着新词汇系统的产生。这一造词法可以视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分类结果，新词与原有词形从开始就包含着同形冲突的可能性。因此，给新来事物赋予与原有事物相似的称呼，同时有意识地对词形加以操作把两者区别开来，以免同形冲突。既然列入词汇系统中，即使其词语形式有所变化，也会对该系统内部的其它成员加以操作，以重新调整其系统性。

本文所分析的现象虽然属于现代口语，但在历史文献中也能够看出类似现象。汪维辉教授从历史文献研究的角度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常用词在历史上的新旧更替，就是方言词跟方言词或方言词跟通语词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果。”（汪维辉 2017：406）在分析词汇更替时，同形冲突的影响也值得一考。通过这些现象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也可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附记：本文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 JSPS Grants-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AKENHI) 19K13187 的资助。



地图 A 表〈玉米〉义词：修饰成份

A. 偏正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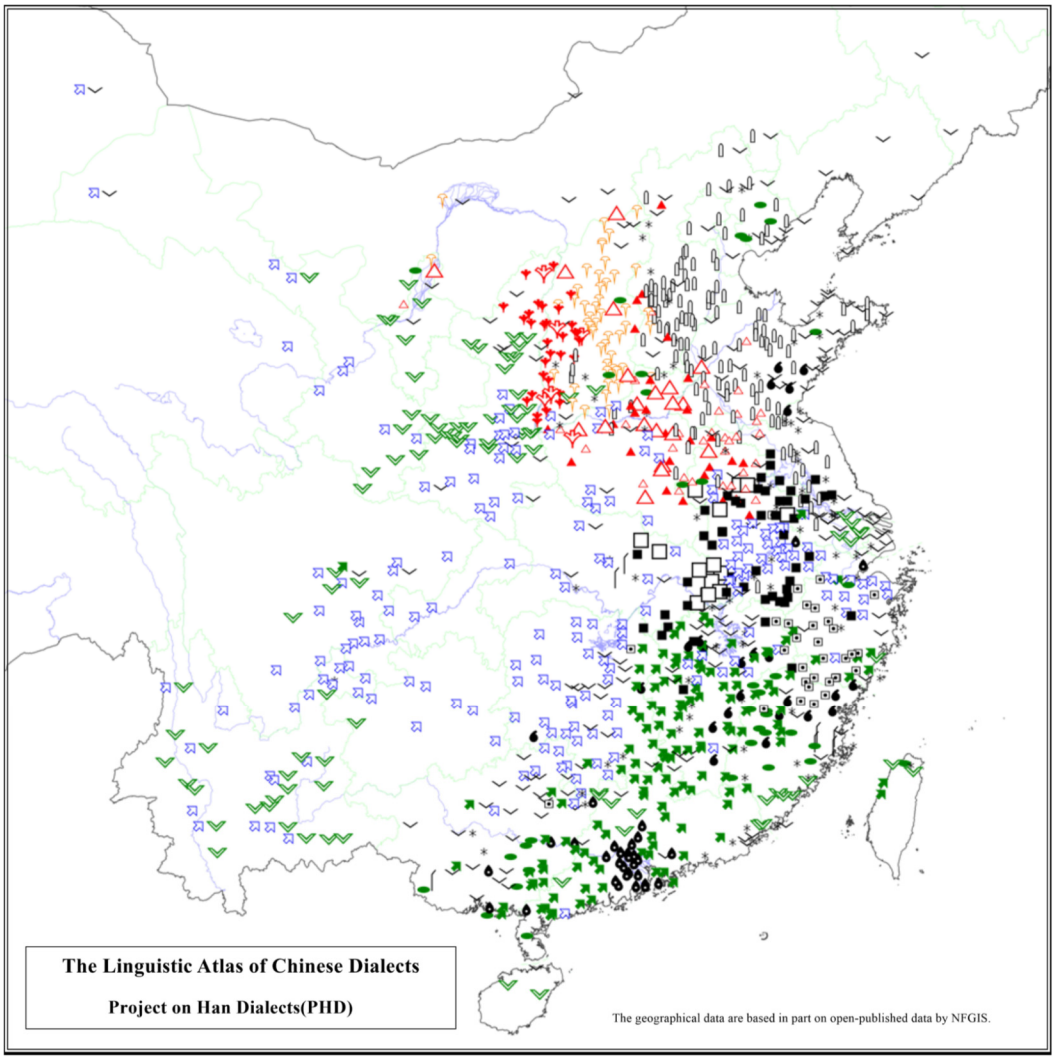
- A-1“玉”系
- A-2“包”系
- A-3“珍珠”系
- A-4“金”系
- A-5“番”系
- A-6“西”系
- A-7“六”系
- A-8“大”系

B. 非偏正型

- B-1“棒”系
- B-2“粟米”
- B-3“黍”
- B-4-1“茭茭”、“茭草”
- B-4-2“t^hao 黍”、“t^hao 秫”
- B-4-3“秫秫”、“蜀黍”

C. 其它

- ＊ “油天炮”、“观音豆”等



地图 B 表〈玉米〉义词：词根

A. 谷物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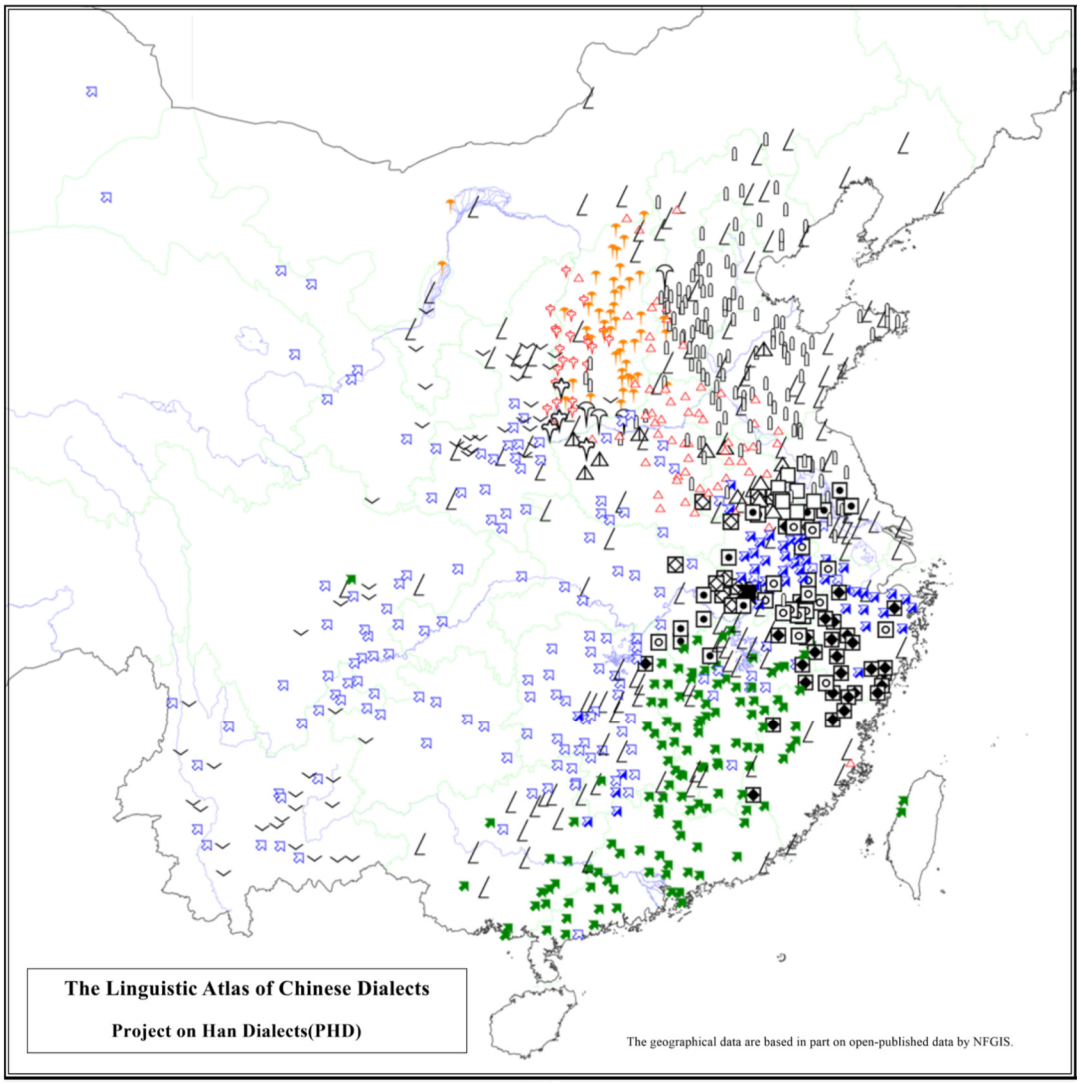
- A-1“米”系
- A-2“麦”系
- A-3“黍”系
- A-4“粟”系
- A-5“谷”系
- A-6“豆”系
- A-7“粟米”系

B. 高粱型

- B-1“茭”系
- B-2-1“蜀黍”系
- B-2-2“黍黍”系
- B-2-3“秫秫”系
- B-3-1“t^hao 黍”系
- B-3-2“t^hao 秫”系
- B-4-1“芦”系
- B-4-2“榴”系
- B-4-3“罗”系

C. 其它

- C-1“棒”系
- C-2“油天炮”等
- C-3 其它：“玉穗”等



地图 C 表〈玉米〉义词：综合地图

A. “玉”系
A-1“玉米”
A-2“玉麦”
A-3“玉茭”
A-4“玉 t^hao 黍”
A-5“玉蜀黍”
A-6-1“玉芦”：L 系
A-6-2“玉榴”：L 系

B. “包”系
B-1“包谷”
B-2“包粟”
B-3-1“包芦”：L 系
B-3-2“包罗”：L 系

C“棒子”
D-1“大秫秫”
D-2“大芦秫”
E-1“六谷”
E-2“五谷”
F-1“茭茭”、“茭草”
F-2“t^hao 黍”
F-3“秫秫”、“蜀黍”

参考文献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安徽省志 • 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白静茹 • 原慧艳 • 薛志霞 • 张洁 2005《高平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曹志耘 1996《严州方言研究》好文出版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陈淑梅 1989《湖北英山方言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冯爱珍 1993《福清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晓虹 • 刘晓海 2008《汉语描写借词的地理变异——以“水泥、肥皂、西红柿、马铃薯”等为例》,《世界汉语教学》2008 年第 1 期：68-76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1995《河南省志 • 方言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鹤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8《鹤壁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侯精一 • 温端政 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霍山县志》黄山书社

济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3《济源市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江苏省志 • 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

蒋绍愚 1999《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1999 年第 5 期：323-330

李树俨 1989《中宁县方言志》宁夏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 2001《福建县志方言志 12 种》福建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 • 张双庆 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林连通 1993《泉州市方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连通·陈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林涛 1995《中卫方言志》宁夏人民出版社

临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临猗县志》海潮出版社

铃木史己 2009《地图 26 玉米》，岩田礼《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166-171

铃木史己 2018《试论表名物词多样化的成因——以表〈高粱〉义词为例》,《开篇》36：179-192

卢源斌 • 史纪 • 刘启宇 1985《广济方言志》湖北省广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罗常培 1950《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 年版

梅雪芹等 2019《中国环境通史 第 4 卷 清—民国》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平田昌司 1998《徽州方言研究》好文出版

山东省定陶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9《定陶县志》齐鲁书社
沈明 1998《太原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史秀菊 2004《太原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太田斋 1999《论汉语方言中的“类音牵引”和“同音词冲突”》,《神戸外大论丛》50(5):19-36
汪维辉 2017《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王李英 1998《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吴建生・赵宏因 1997《万荣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谢留文 1998《于都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张振兴 1992《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1989《清史资料 第 7 辑》中华书局
周振鹤・游汝杰 2006《方言与中国文化（第 2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天野元之助 1979『中国農業史研究 増補版』御茶の水書房
岩田礼 1992「中国語方言の地理学的研究」,『月刊しにか』4 月号：37-43
岩田礼・吉田絵美 2004「トウモロコシ」,『歴史文献データと野外データの綜合を目指した漢語方言史研究（3）：漢語方言地図集（稿）第 4 集』, 平成 13-15 年度科学研究費総合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3 分冊（研究代表者：太田斎）：114-120
鈴木史己 2008「方言分布から見る新語形の成立方式について―新来事物ジャガイモ・サツマイモを例として」,『中国語学』第 255 号：19-38
鈴木史己 2015「新語成立における修飾成分の消長について―セッケンを表す語を例として」,『中国語学』第 262 号：134-152
Endo, M., Minegishi, M., Shirai, S., Suzuki, H. & Kurabe, K. 2021.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ひつじ書房
Hayashi, T. 2009. Introduction to the PHD System. 岩田礼《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330-341.
Iwata, R. 2006. Homonymic and Synonymic Collisions in the Northeastern Jiangsu Dialect – On the Formation of Geographically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s -. 何大安・张洪年・潘悟云・吴福祥《山高水长：丁邦新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1035-1058

On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Chinese Lexicon: The Case of Words Denoting "Corn"

SUZUKI Fumiki
Nanz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linguistic geography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Chinese lexicon, using Sinitic words denoting "corn" as an example. The majority of word forms denoting "corn" are composed of existing word forms denoting native grain (stems), especially sorghum, and prepositional components (modifiers); some words are derived from native grain names. This type of word formation reflects the result of classification of foreign things. Word forms denoting foreign things are organized into the lexical system through existing word forms denoting native things. The new and existing words involve the risk of homonymic collision. Therefore, people assign the similar word form of native things to foreign things and perform a conscious operation for word forms to distinguish both words simultaneously. Even if the word forms change after they are organized in the lexicon, the lexical system is maintained by adjusting the word forms of other members.

小议介词语法化进程中“往”与“于、向、到、在”的共现现象

王周明
大阪大学言语文化研究科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往、向、到、在、于”这五个介词的语法化进程进行回顾梳理的基础上，从“往”与“于、向、到、在”的共现组合来考察分析它们各自的句法特点、语义虚化和语法化进程的不均衡性。

一、前言

1.1 选题的问题意识

汉语语法界对介词的研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止主要是从结构主义出发，围绕着介词和介词结构的各种共时用法来展开。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从历时角度来考察介词的历史形成和变化；近三十年来，对介词语法化问题的讨论更是从未中断过。

活跃于现代汉语的介词，几乎无一不是由动词演化而来，并与动词之间保持着大面积的兼类关系。石毓智 1995、刘坚・曹广顺・吴福祥 1995、马贝加 2002 等先贤们早已论证指出，受到了时间一维性的影响，从动词衍生而来的介词通常是在连动结构 V1（＋O1）＋V2 中 V1 这个位置上逐步通过自身作为动词的语义虚化而语法化成了介词的。这一结论确实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汉语里的绝大多数介词短语相对于句子中主要动词的语法位置而言，只有位于动词之前的用法而没有置于动词之后的用法。

但是另一方面，众多的语言事实表明，亦有例如“往、向、到、在、给、于”等少数介词，由其主导构成的介词结构既可以前置于动词用作状语，也可以后置于动词充当补语等。而对于介词中的这些少数派，目前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并没有进一步从正面概括性地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有一小部分介词拥有了其他绝大多数介词所没有的后置于动词的用法。着力于共时的先行研究往往会对同一个或者相关近似介词前置或后置于动词时所产生的或明显或微妙的语法、语义及语用差别进行说明分析；而着力于历时个案的先行研究则似乎原则上倾向于对两种位置一视同仁，但讨论时往往又会根据需要选择倚重于其一，尤其是青睐于以后置于动词为对象来展开论述。

1.2 考察对象和目的

语言发展演变的时间长河里，伴随着竞争的兴衰更替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常态。汉语介词体系发展至今亦不例外，既参与了外部语法形式的变换，也经历了内部成员相互之间的词汇更替。例如几乎涵盖介词各类语义范畴的“于”的式微就是广为熟知的一个典型。

介词“往、向、到、在、于”的关联性，一般认为既体现在它们既可以前置于动词也可以后置于动词的句法特征上，又体现在他们表达的语义都跨了处所和时间两类基本范畴，符合语法化过程中从空间域扩展到时间域的这样一个跨语言共性。实际上，它们还有更深层面的关联性，不仅从语义范畴的下位分类来看，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现象，而且还曾经在汉语史上留下过共现的记录。

先行研究关于“往、向、到、在、于”语法化的讨论已经积累了相当成果，不过由于出发点基本上是彼此互不干涉的纵向个案研究。然而所有的语言现象的消长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我们认为即使它们各自的相关演化历程分别得到了阐明，如果不能进行适当的共时比较来梳理清楚其中的横向关联性，大概仍然无法对它们作为介词的同质性或者异质性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将试图在下文中辨析“往”与“向、到、在、于”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共时关系，以期对介词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未知环节做若干有益的补充。

二、“往、向、到、在、于”的语法化研究要点回顾

尽管“往、向、到、在、于”的语法化过程实际上关系到了前置位置的“～（＋O）＋V”和后置位置的“V＋～＋O”两种格式，但是先行研究往往倾向于聚焦“V＋～＋O”格式而有意淡化了对“～（＋O）＋V”格式的关注。

由于是独立分别的个案研究，各个先行研究相互之间并没有统一的考察标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选择在围绕共同对象、针对相关的要点分别做一下简单回顾之后再进行梳理小结。

2.1 “往”的语法化进程

“往，之也”（说文・彳部）。刘光明・储泽祥・陈青松 2006 认为，“往”作为实义动词时，表示趋向，其意相当于“到……去”，突出的是［＋位移］和［＋外向性］这两个语义特征。在句子里，它最早以不及物的光杆形式充当谓语（例 1[1]），后

[1] 例 1-5 转引自刘光明・储泽祥・陈青松 2006。

来才带上宾语充当谓语（例 2），亦可作为连动结构的第一动词或第二动词充当谓语（例 3、4）。当“往”大约在唐五代的“V＋往＋O”格式中语法化成介词时，失去了［＋位移］和［＋外向性］这两个语义特征，表示处所，包括目的地和通过目的地来表示的方向（例 5）。 而根据马贝加 2002，“往（＋O）＋V”格式中“往”可确定为介词用法的用例（例 6[2]）也大约在同一时期。

⑴今朕必往。（书・汤誓）

⑵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史记・孝武本纪）

⑶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论语・子罕）

⑷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⑸远公迤逦而行，将一部《涅盘》之经，来往庐山修道！（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⑹暂往比邻去，空闻二妙归。（[唐]杜甫：范二员外邈吴十御史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

在确定“V＋往＋O”中的位移义不再由“往”而是由 V 来承担，即“往”已经语法化成了一个介词之后，一部分研究（吴梦婧 2015、马兴茹 2016）继续讨论“V＋往”词汇化的可能性，另一部分研究（米颖舒 2019）则比较“去”和“往”的竞争现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邵宜 2005 是唯一注意到“往＋向 / 于 / 到”共现情况（例 7-9[3]）的先行研究，不过止于了说明其中的“往”是动词，“向 / 于”是介词，“往到”应该看作连动结构。我们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

⑺越王取得此物，即差勇猛之人，往向吴国，赠与宰彼。（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⑻太子闻唤，便遣车匿被于鬃，便拟往于雪山。（敦煌变文集・太子成道经）

⑼令乘素车，前后侍从，三千余人，往到墓所。（[？唐]韩朋赋）

2.2 “向”的语法化进程

介词“向”的产生和发展首先经历的是意为“北出牖”的名词用法（例 10[4]），之后引申转变成包括“面对 / 朝向”这一义项在内的动词用法，其语义特征是［＋人］和［＋面朝某个方向］（例 11）；而大约至六朝时期，这一义项的动词用法逐渐失去

[2] 例 6 转引自马贝加 2002。
[3] 例 7-9 转引自邵宜 2005。
[4] 例 10-16 转引自马贝加 1999。

［＋人］和［＋面朝某个方向］，进而主语推广到无生名词，于是语法化成了表示处所的介词。此后，“向”作为介词，其语义范畴的变化表现在了两方面：一方面是表示处所的内部以表示方向为切入口，经历了如下衍生：方向→起点→地点→经过点→终点（例 12-16），不过最终保留下来的只有最初的表示方向这一用法；另一方面是到了唐五代时期，已经由表示处所扩展到了可以表示时间和对象（例 17、18[5]）。（马贝加 1999，2002、刘祥友 2007）

(10)穹窒熏鼠，塞向墐户。（诗经・豳风）

(11)秦伯素服郊次，向师而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12)菊花随酒馥，槐影向窗临。（[南北朝]庾信：西门豹庙诗）

(13)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唐]李贺：龙夜吟）

(14)采果汲水却回来，忽向道中逢猛兽。（敦煌变文集・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15)若向蘼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唐]刘禹锡：怀妓）

(16)家中常所养狗，来向其妇前而语曰：……（太平广记・朝野佥载・火灾）

(17)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唐]陈玄佑：离魂记）

(18)填填满心气，不得说向人。（[唐]元稹：感梦）

另外，刘祥友 2007 提出“向＋O＋V”格式中的“向”的动词语义滞留明显，而“V＋向＋O”格式很可能促使“V 向”词汇化。罗耀华・贺黎 2014 则进一步讨论“V＋向”如何通过介词并入实现词汇化。

2.3 “到”的语法化进程

本文涉及的几个介词当中，“到”是近三十年来被讨论得最多的一个。关于语法化之前的“到”，先行研究的意见基本上一致：“到，至也”（说文・至部），即“到”是“至”的同义动词，本义是“到达”。无论单独带上宾语充当谓语（例 19[6]），还是作为连动结构的第一动词或第二动词充当谓语（例 20、21），它都带有明显的［＋位移］语义特征，体现为“V＋O”可以独立。

(19)大寇传攻前池外廉，城上当队鼓三，举一帜；到水中周，鼓四，举二帜；到藩，鼓五，举三帜……乘大城半以上，鼓无休。（墨子・旗帜）

(20)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三国志・魏书十二）

(21)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世说新语・言语）

但是关于“到”的语法化进程却有较明显的意见分歧，主要体现在语法化的契机

[5] 例 17,18 转引自刘祥友 2007。

[6] 例 19-21 转引自吴金花 2005。

为何和“到”是否已经语法化为了介词这两方面。一种意见以马贝加 2002、吴金花 2005 为代表，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到”的语法化随着“V＋到＋O”这一格式中的 V 本身负载［＋位移］义逐渐成为焦点所在而开始；此时的“V＋到”的语法关系即可分析为连动，亦可分析为动补（例 22[7]）。直至唐五代，同样的“V＋到＋O”格式里，连焦点所在的 V 也发展至可以摒弃［＋位移］义时，“到”已经语法化成为了一个表示处所的介词（例 23）。

(22)还到龙亢，士卒多叛。（三国志・魏书一）

(23)临至捉到萧墙外，季布高声殿上闻。（敦煌变文集・捉季布变文）

另一种意见以仝国斌 2006 为代表，主张“到”语法化为介词的过程实际上是“到于”形式当中“到”后“于”的消失过程，其理由是“到”作为介词时所表示的处所和时间在它语法化为介词前是正介词“于”的功能之一。而“到于”这一形式（例 24[8]、25）长期存在，直至明中叶的《西游记》里仍有表示时间的 1 例和表示处所的 35 例（例 26）。

(24)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

(25)武王伐纣，到于邢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韩诗外传卷三）

(26)太白金星领着美猴王，到于灵霄殿外。（西游记第四回）

另有一些先行研究则持了“到”的语法化并不彻底充分这种观点。马显彬 2011a 通过副词、时态助词、重叠格式和补语来确定了“V＋到＋O”里“到”的动词性，马显彬 2011b 通过分析“到＋NP 处所＋VP” 和“到＋NP 时间＋VP”是紧缩结构来论证了“到＋O＋V”里的 “到”仍然是动词。刘芳 2009 一方面侧重于解读现代汉语里的用法来说明“到＋O ＋V”里的“到”大部分的语法化还正在进行中，一方面跳过了语法化为介词这个环节，将“V＋到＋O”里的“到”处理成实义动词→趋向动词→构词语素。马婷婷・刘伶俐 2015 承接刘芳 2009 的思路，进一步为“到”的语法化构拟出了三条路径。

2.4 “在”的语法化进程

作为汉语里的一个高频词,“在”的问题一直都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兼难点。关于语法化前的“在”，先行研究基本上达成了以下共识:“在，存也”（尔雅・释诂）。先秦时期作为动词使用时已具备四种语法形式，以不及物的光杆形式充当谓语表示人

[7] 例 22,23 转引自马贝加 2002。
[8] 例 25 转引自仝国斌 2006。

活着或事物存在（例 27[9]），单独带处所宾语作谓语表示人或者事物存在于某处（例 28），亦可作为连动结构的第一动词或第二动词充当谓语（例 29、30）；其中又以第二种形式出现频率最高，并且除了不及物的光杆形式以外都带有［＋处所］语义特征。

(27)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论语・学而）

(28)王在灵囿，麀鹿攸伏。……王在灵沼，於牣鱼跃。（诗经・大雅・灵台）

(29)子在川上曰。（论语・子罕）

(30)禹往见之，则耕在野。（庄子・天地）

关于“在”的语法化讨论则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在（＋O）＋V”格式的这个方向，韩玉强 2011 以“在”的［＋处所］义为中心指出“在＋NP 处所＋VP”格式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不断涌现新的语法现象，诸如例 31[10]的和主语之间出现新的语法标记——副词来构成一种显性分界，例 32 的“在＋NP 处所”的语义投射范围仅限于焦点 V 的内部等等，使得“在＋NP 处所”逐步摆脱与主语之间的直接主谓关系，语法关系上向后靠拢成为焦点 V 的修饰成分。通过重新分析和类推机制，“在＋NP 处所”可以表示起点、终点和经过点等泛化语义，从而标志着“在”的介词地位的确立。

(31)我时亦共在其中学。（大正新修大藏经・道行般若经卷二）

(32)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世说新语・德行）

更多的先行研究则选择了“V＋在＋O”格式为研究对象。邵洪亮 2005 重点考察出“V＋在＋O”格式的重新分析过程发生在汉代，魏晋南北朝以后保留了表示“人或事物通过动作达到、状态呈现于某处所”的语义（例 33[11]），却基本上不再表示“动作发生于某处所”（同上例 30）；而 “V＋在＋O”格式是在元明时期才真正词汇替代了唐五代以前长期占有绝对优势的“V＋于＋O”格式，并由于同一时期处置式的大量出现使得原本占据 V 后宾语位置的名词性成分前移，“在”才得以实现进一步前附于 V（例 34）来让格式固定下来。

(33)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搜神记卷十六・曹公船）

(34)那妇人揭起席子，将那药抖在盏子里，将白汤冲在盏内。（金瓶梅第五回）

2.5 “于”的语法化进程

“于”被视为语法化成介词的第一号，几乎涵盖介词的各类语义范畴。先行研究

[9] 例 27 转引自韩玉强 2011，例 30 转引自邵洪亮 2005。

[10] 例 31,32 转引自韩玉强 2011。

[11] 例 33 转引自马贝加 2002，例 34 转引自邵洪亮 2005。

对“于”语法化的关注点在 2010 年代后呈两极分化。

“于，往也”（毛诗・国风・桃夭：“之子于归”传），用“往”来为“于”释义；二者在音韵方面还是鱼阳对转[12]，这些说明都与“往”关系极为密切。基于“于”在殷商时期既已从动词语法化成介词的学界共识，张玉金 2015 讨论了位事介词“于”绝大多数意为“到”，其前后的 V 具有或[＋位移]或[＋存在]或[＋放置]的语义特征，“于＋O”通常表示位移的终点，一般后置于动词（例 35[13]），前置时，都是语句的对比焦点（例 36）。而 O 可以是方位名词/处所名词/代词“之”/鬼神名词/动词。

(35) 贞：王往于田?王勿往于田?（甲骨文合集 635）

(36) 己未卜，敲贞：我于雉次?贞：勿于雉次?（甲骨文合集 7352）

李先银 2010 构拟甲骨文中“于”的语法化过程为三个步骤：首先在“往/步，于＋处所”的语法语义框架中开始意义的虚化，重新分析为“往/步＋于＋处所”，出现介词化的倾向（同上例 35），→经常被借用于引进祭祀对象而形成了“V+于+对象”的范式（例 37），→反过来促进了“往/步＋于＋处所”中“于”完全介词化（例 38）；即“于”从引介空间到引介时间，最终完成语法化过程，作为介词形成了分别引进处所、时间、对象的不同格式。

(37) 贞：燎于王亥母豚。

(38) 贞：作大邑于唐土。（甲骨文合集 40353 正）

魏金光 2016 提出殷商时期“于”的及物性和语义概括性决定了它在“V+于+N”结构中成为语法化源词的首选者，经历了“于 ＋N/跑类 V＋ 于 ＋N”→“至达类 V +于 ＋N”→“非位移 V＋ 于 ＋N”，“于”存在了动词→动介词→介词这一语法化“斜坡”和动介重新分析的过程。

而户内俊介 2021 首次严格区分目标点标记和处所介词（＝地点标记），否认殷代时间介词“于”来自处所介词；他的最新解释是，出现在甲骨文献里的“于”首先是通过语法化从移动动词变成目标点标记（同上例 35）而非处所介词，然后再进一步虚化为时间介词，其指向将来时的语义功能即由此而来。

另一些先行研究则着眼于“于”语法化成介词之后的词汇化新轨迹。龚娜・罗昕如 2011 提出从历时发展轨迹来看，“X 于”经历了介词“于”的衰落、复音词“X 单音节于”的兴起与进一步虚化、“X 非单音节于”向词靠拢和“于“零形化的语法化过程。并概括其中的机制和动因包括词语双音化趋势、语义系统变动、介词短语位置

[12] Ito, Michiharu & Takashima, Ken-ichi. 1996. *Studin i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的观点（转引自户内俊介 2021）。

[13] 例 35,36 引自张玉金 2015。

前移以及重新分析和类推等因素。王用源・车易赢 2016 认为句法位置、韵律结构、重新分析、语用驱动等因素致使介词“于”的介引功能日渐衰退,其介词功能逐渐向构词成分转化，或使得介宾短语词汇化（例如“于今、于是”等），或导致“于”向前依附谓语中心语,甚至与单音节谓词组合,实现跨层结构的词汇化（例如“乐于、敢于”等）。谢雯瑾 2009 讨论“X 于”中“于”进一步语法化对 X 配价增值的影响，即“于”从词缀进一步虚化成零形式会对之前实词的词性和配价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词性从形容词向动词转变,配价从一价向二价转变。

2.6 回顾小结

综观以上回顾，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侧重角度也各有不同，可是并不影响确认伴随着动词本身所负载的重要语义特征逐步转移或消失而导致的语义虚化，以及重新分析和类推这两种语法化机制是如何诱发并推动“往、向、到、在、于”这些动词的介词化。而在这些总体上较为平稳顺利的语法化进程中，非主流的“往”与“于、向、到、在”的共现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激活两种语法化机制与继承固有语法形态之间的小插曲。

三、“往”与“于、向、到、在”的共现现象

“往”与“于、向、到、在”的共现形式，除了“于”早已介词化而不能以光杆形式前置于“往”以外，理论上交叉搭配可以有 7 种形式——往于、往向、往到、往在、向往、到往、在往，但在语料中查找后发现“在往”的形式不存在，所以实际上只存在 6 种。

先行研究中，除了仝国斌 2006 主张“到”语法化为介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到”后“于”的消失过程，“于”的重要性并没有在“往、向、在”的语法化进程中得到特别强调。邵宜 2005 提到了“往于、往向、往到”的存在，但只注意到了其中“往”的动词性，并没有真正去分析这种组合的意义。

3.1 “往于”与“往”

“往于”早在甲骨文献就已出现，汉语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形式关系到“于”语法化的第一步。这一时期的“往”与其他在同一语法位置出现的“步/出”等一样具有[＋位移]和[－及物]的语义特征，必须借助“于”的介引才能到达目标点宾语（例 39）。即在甲骨文献里不存在“往日”之类的用法。

(39)己巳卜，何贞：王往于日，不遘雨。（甲骨文合集 27836）

因此可以说，先秦文献里的“往于”可视为上承殷商；不仅如此，在至两汉为止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往”无论单独充当谓语，还是以“往 V”或者“V 往”形式充当谓语，都以不带宾语的不及物用法为常态（同上例 1、3、4），也印证了“往”的[－及物]特征的存在。根据吴梦婧 2015，《史记》里“往”带宾语的用法为零，魏晋南北朝才有了较大改观。虽然我们在处于过渡阶段的《汉书》里发现了“往”带宾语的零星例子，但目前能够确认到的宾语仅限于一个“家”。

(40)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汉书・陆贾传）

《世说新语》中带宾语的“往”就有 31 例，其中“往＋O”做谓语的 19 例（例 41），“往＋O＋V”的 10 例（例 42），“V＋往＋O”的 2 例（例 43）；在以处所宾语占绝大多数的情形下，似出现了以人名指代处所的用法，如例 44 的“王氏”并不是称呼人名而是指王家，即谢夫人嫁入王家。

(41)君往东厢，任意选之。（世说新语・雅量）

(42)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世说新语・方正）

(43)后孙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世说新语・文学）

(44)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世说新语・贤媛）

换言之，“往”的[－及物]特征是从魏晋南北朝才正式转变为[＋及物]，不再依靠“于”的介引却仍然需要表达位移前往目标处所，所以[＋位移]依旧鲜明强烈。相反的，只要[＋位移]的动词性质不变，对于“往”而言，“往于”还是“往”都差别不大，更何况“往”跟“于”的语义音韵关系还曾经那么密切，利用长期的共现关系转移“于”的目标处所功能为己用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往于”，其中的“于”形同虚设，成为了一种赋元功能的羡余（superfluity of marks）。

3.2 “往向”与“向往”

那么在与“往”共现的“向、到、在”是不是也重蹈“于”的覆辙了呢？答案是“未必”。因为“往于”的情况在于“于”远早于“往”就介词化了，所以只需要弄清“往”的问题。而“向、到、在”和“往”的语法化时间相对而言比较接近，所以相互之间更容易存在竞争关系，也更加具有对比性。

“往”自身大约在唐五代的“V＋往＋O”格式中语法化成介词时，失去了［＋位移］和［＋外向性］这两个语义特征，表示处所，包括目的地和通过目的地来表示的方向。不过在“往＋向/到/在/于”这种共现组合里，“往”的语法位置决定了它的

动词语义不可能虚化，即只能保持动词性质。

3.2.1 “往向”

“往向”的用例不少，不过集中在唐五代——敦煌变文包括例 7 在内共有 4 例（例 45-47），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佛经里的用例更是不少于 40 例（48-50）。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文献里也都可以见到（例 51-55），但从数量上来看似乎唐五代是使用的高峰期。

(45)须达舍利乘白象，往向城南而顾望。（敦煌变文集・降魔变文）

(46)儿辞阿娘往向王舍城中，取饭与阿娘相见。（敦煌变文集・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

(47)其妻抱子往向后园树下，欲致子命。（敦煌变文新书卷八）

(48)输头檀王作是念已，从其马车下地足步，往向佛所。（佛本行集经卷五十三）

(49)即往向长者妻，具陈其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药事卷十二）

(50)汝更往向彼下意，令其欢喜。（摩珂僧祇律卷二十六）

(51)文往向呼处，因问，向赤衣冠谁？答，是金也，在屋西壁下。（太平御览・人事部一百一十三・富下）

(52)往向夜，见离塘有双炬。（太平广记・鬼八・谢道欣）

(53)見一個耍蛾儿来往向烈焰上飞腾，正撞着银灯，拦头送了性命。（元刊杂剧三十种・诈妮子调风月杂剧）

(54)而王、李两驸马，称名贼领兵往向海州云，实未知向何处。（[明]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十三年）

(55)招致客旅入中，往向南茶市收钱数，春拨充杂卖场课额。（[清]宋会要辑稿・食货・务杂类）

通过先行研究，我们确认到“向”的语法化进程是大约至六朝时期语法化成了表示处所的介词之后，其语义范畴的变化经历了与处所相关的如下衍生：方向→起点→地点→经过点→终点，另一方面是到了唐五代时期，已经由表示处所扩展到了可以表示时间和对象。“往向”的例子也正好证实了“向”的这些变化：例 49 的“长者妻”是对象，例 50 的“彼下意”是抽象了的终点，例 52 的“夜”是时间，例 53 的“烈焰上”是地点。

反之，假设略去例 49、50、52、53 原有的“向”，只有“一個耍蛾儿来往烈焰上飞腾”似乎没问题，而“往长者妻具陈其事/汝更往彼下意/往夜见离塘有双炬”都不成立；其原因就在于“往”不存在“向”的进一步语义范畴扩展这个步骤。这也说明

了即使形式上的主要动词是“往”，与何种宾语搭配的话语权却在于“向”。

3.2.2 “向往”

表示位移用法的“向往”不多。目前找到的只有唐代以后的例子。到宋代为止，“向往”没有宾语，情形颇似不及物（例 56-58）；《朝鲜王朝实录》则全部带上表目的的处所宾语（例 59-62）。

(56) 报言无患，向往观军斗为箭所射。（四分律卷十六）

(57) 向往视祥，祥仰眠。（太平广记・释证一・僧惠祥）

(58) 某向往奏事时来相见，极口说陆子静之学大谬。（朱子语类・朱子十七）

(59) 永兴迤南各处驻贼，俱各率领徒众，向往咸兴府，的有合势向西之计。（[明]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二十六年）

(60) 向往何地耶，并示之为望。生以舟师检饬事，向往泗川。（[明]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三十年）

(61) 臣向往南中，年事大歉，民皆流散，昔之百家，今有十室。（[明]朝鲜王朝实录・英祖实录元年）

(62) 而渠向往驿村，时景等四人向往天生山城。（[明]朝鲜王朝实录・纯祖实录即位年）

康熙字典引了“《释文》崔云：向，往也”。虽然作为动词，语义上“向”和“往”可以互释，但二者的语法功能并不是对等的。由于例 56-58 里的“向往”没有宾语与它们共现，后面直接跟上其他 VP；而“向”一般只在表示东西南北方向时没有宾语，显然例 56-58 无法弃“往”留“向”，所以推测说“向往”的语法重心原本在“往”，而且也只能在于“往”。

在“向往”发展出了带宾语的用法之后，“向”在组合中的地位理应得到相当提升，去留可选择的余地也得以增加。但是如果省略去“往”的话，例 59-62 中，似乎只有例 62 在对比的语境中“而渠向驿村，时景等四人向天生山城”依然能够成立；“俱各率领徒众，向咸兴府/向何地耶，并示之为望。生以舟师检饬事，向泗川/臣向南中，年事大歉，……”则显得不自然。大约是伴随着各种介引功能的发达，“向”的动词性大大减弱，在需要单独表达一个具体完整的活动的语境中就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往”在发展出表示方向的介引功能后没有再增加更多功能，动词性也似乎更好地保留了下来。

3.3 “往到”与“到往”

如果按照“到”的语法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V＋到＋O”这一格式中的 V 本身负载[＋位移]义逐渐成为焦点所在而开始，唐五代同样“V＋到＋O”格式里，连焦点所在的 V 也发展至可以摒弃[＋位移]义时，“到”已经语法化成为了一个表示处所的介词这一观点，那么“往”和“到”的语法化差不多就是同步的。

3.3.1 “往到”

“往到”这一组合早在“往”和“到”语法化开始之前就出现了（例 63-65），所以二者都应该视为动词，构成了一种连动关系；另外，由于这一时期的“往”还没有真正获得带宾语的资格，前后语序应该是严格固定的。

(63)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史记・滑稽列传）

(64)便敕群臣严驾，往到佛所，五体投地，为佛作礼。（[东汉]犍陀国王经）

(65)佛入国分卫，遥见之，往到其家问之，何为六向拜？（[东汉]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

魏晋南北朝以后，“往”逐渐向及物转变，于是例 66-69 的“往到”理论上颠倒顺序说成“到往”似乎也无大碍。“到往其前曰/到往于冢上/则我早已到往永川，或差人到往/一直到往女监中”都能成立。

(66)忽有一人著黄练单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劳乎道士，乃辛苦幽隐！（抱朴子・内篇・登涉）

(67)往到于冢上，郎君沃酹，主簿俯伏在后。（太平御览・人事部二・产）

(68)我若早闻清正要见之语，则我早已往到永川，或差人往到。（[明]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三十年）

(69)自己走下监去，一直往到女监中。（醒世姻缘第十四回）

仅就用例的数量而言，“往到”同“往向”类似，西汉以后各个时期的文献里都可见，但仍以唐五代为使用高峰期，又以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佛经里的用例超过 600 为最，其次是来自敦煌变文的 5 例，因为类似于已有例句，此处不再重复列举。这些用例都表明“往到”表示的内容清一色的为处所而完全没有扩展到表示时间；“往”、“到”二者保持同步的连动共宾关系，因其时间先后关系模糊，难以产生句法焦点，也就没有语法化倾向。

另一方面，有三处值得注意的变化，一个是例 67 的“往到于”形式，目前尚不知该分析成“往到＋于”还是“往＋到于”；另一个是例 68 的第二处“往到”承前省略了宾语“永川”；例 69 由于受到“女监中”的语义制约，“到”凸显了“往”所没

有的终点义，在取舍选择时只能变成“一直到女监中”，而不能变成“一直往女监中”。

3.3.2 “到往”

“到往”只在明代小说里找到 2 例（例 70、71）,情形与上文分析的例 66-69 极为相似，颠倒说成“往到”，“就往到二娘府上望望/经繇河间府，往到山东”也能够成立。

(70)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金瓶梅第十四回）

(71)却就是元礼的叔父，叫做杨小峰，一向在京生理，贩货下来，经繇河间府，到往山东。（醒世恒言卷二十一）

3.4 “往在”

目前能够找到的“往在”的用例出现在唐五代以后，集中在了大正新修大藏经和《朝鲜王朝实录》中，前者 7 例（例 72-78），后者数量庞大，尚未全部确认，暂举 4 例（例 79-82）。用例均是“往在＋NP 处所”，形式和语义都与初步语法化成了介词的“在”的情况十分吻合，不再表示“动作发生于某处所”，而是表示“人通过动作达到、状态呈现于某处所”的语义；例如例 72 的“往在”就是世尊通过自己的双脚移动身体出现在了路旁，例 82 里的十一个人的“往在”也是自己移动身体，先位移去了后门，后又位移去了某人的家。

(72)尔时，世尊闻此语已，即以神足，往在道侧，在一树下坐。（增台阿含经卷二十六）

(73)应持菩萨往在其前，不能睹之。（密迹金刚力士会卷八）

(74)闻已身往在其会中，令诸会者远离诸恶，至心听授如是持呪。（大方等大集经卷第二十一）

(75)若人往在高山峰上之心诵呪，眼根所及，远近世界，山谷林野江湖河海。（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76)于时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往在娑竭罗龙宫大海法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

(77)意愿去处悉皆能往在于彼处。以神通定力得神通地神通而去。（不空羂索陀罗尼经）

(78)时夫问汝往在何处。（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79)尔等往在汝家。（[明]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二年）

(80)其时不知，乙酉、丙戌年间，闻产儿往在交河。……其时不知，至己丑年乃闻往在交河，而未尝见也。([明]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十五年)

(81)上召坡平君尹坤问曰："向今在何处？是无罪而見黜也。"坤对曰："往在积城。"([明]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十六年)

(82)闻建州卫人十一名，往在后门，我记他姓名。……今十一人，往在狼甫儿干之第。……看详事目，十一人往在后门之语，非独指平安道后门，必指咸吉道后门。……今十一人往在狠甫儿干家。([明]朝鲜王朝实录·文宗实录二年)

但是"往在"并没有像其他"V在"那样得到进一步发展，包括完全没有与处置式同现。估计这大约是受制于主要动词"往"的特点，因为位移是施事本身的行为，很难产出处置式所需要的处置对象。

四、结语

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对跨空间和时间范畴的前后置介词的历史发展做一次梳理。所以我们首先通过回顾先行研究关于"往、向、到、在、于"语法化进程的研究成果把握了这几个介词的主要个性和共性，然后选择"往"跟其他四者共现的角度来探讨类似或相关形态下彼此的共时关系。

"往于、往向—向往、往到—到往、往在"这六种组合形式都是作为语言事实存在过、却没有在现代汉语里保留下来的用法。在组合的形态下后，"往、向、到、在、于"或动词或介词的各自的句法特点、语义虚化及语法化程度的不均衡性被更好地揭示了出来。

"往"在共现组合里体现出了较强的动词性，这或许也是它介引功能单一、缺少变化的原因之一。"向"的多样化介引功能在"往向"这一形式里亦得到了反映，但是语法形态上它并不占优势。"往"和"到"在一定时期之后可以互换前后语序意味着"往到/到往"地位相近，语法化概率极低。"往在"形式和语义都与初步语法化成了介词的"在"的情况吻合十分，能产性却不高。

语料来源：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上古汉语语料库、中央研究院中古汉语语料库、中央研究院近代汉语语料库

参考文献

戴浩一 1988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第 1 期：10-20 页。

方绪军 2002 <“V 向……”和“V 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7-24 页。

冯胜利 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龚娜・罗昕如 2011 <“X 于”结构的语法化>《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 期：123-126 页。

郭锡良 1997 <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第 2 期：131-138 页。

韩玉强 2011 <“在＋L＋VP”结构中处所介词形成的语法化历程和机制>《语文研究》第 1 期：21-27 页。

户内俊介 2021 <殷代汉语时间介词“于”的语法化过程之考察——从“将来时指向”的视角出发>《古汉语研究》第 3 期：83-96 页。

鞠志勤 2016 <语法化视角下“着”和“在”的差异性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75-83 页。

刘光明・储泽祥・陈青松 2006 <“单音动词＋往”里“往”的语法化>《古汉语研究》第 2 期：14-20 页。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 1995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第 3 期：161-169 页。

刘祥友 2007 <“向”的介词化过程>第 5 期：100-103 页。

罗耀华・贺黎 2014 <“V+向”结构的词汇化与介词并入>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Vol. 3：261-284

马贝加 1999 <处所介词“向”的产生和发展>《语文研究》第 1 期：43-47 页。

马贝加 2002《近代汉语介词》中华书局

马婷婷・刘伶俐 2015 <基于语法化视角的现代汉语“到”的功能角色分析>《石家庄学院学报》第 5 期：59-63，88 页。

马显彬 2011a <VP＋到＋NP/VP”中“到”的词性>《沂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3 期：43-45 页。

马显彬 2011b <“到＋NP ＋VP”中“到”的性质及相关问题>《河西学院学报》第 4 期：99-104 页。

马兴茹 2016 <“往”的语法化与“V＋往”的词汇化>《焦作大学学报》第 1 期：19-22，83 页。

梅祖麟 2004 <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中国语文》第 4 期：323-332，

383-384 页。
米颖舒 2019 <语法化中的竞争现象个案探析——“去”与“往”的介词化比较>《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 3 期：93-94 页。
邵洪亮 2005 <“V 在 L”格式的发展和虚化历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119-124 页。
邵宜 2015 <介词“往”的语法化过程考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80-86，159 页。
石毓智 1995 <汉语时间的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中国语文》第 1 期：1-10 页。
石毓智 2011《语法化理论——基于汉语发展的历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史冬青 2008 <介词“向”的历史演变>《潍坊学院学报》第 3 期：61-63 页。
仝国斌 2006 <“到”的语法化过程>《殷都学刊》第 2 期：89-94 页。
王伟 2009 <论“在”的语法化>《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 3 期：27-31 页。
王小溪 2004 <为什么不能说“扔往地上”>《汉语学习》第 4 期：76-80 页。
王用源·车易赢 2016 ＜介词“于”的功能转化与去向＞《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31-35 页。
魏金光 2016 <介词“于”语法化再谈>《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26-30 页。
吴金花 2005 <处所介词“到”的产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105-107 页。
吴梦婧 2015 <介词“往”语法化的过程及词汇化>《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18-21 页。
谢雯瑾 2009 <“X 于”中“于”进一步语法化对 X 配价增值的影响>《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99-106,183 页。
张玉金 2015 <甲骨文中位事介词“于”研究>《古代汉语研究》第 1 期：2-11 页。

On the Co-occurrence Behavior between “wang (往)” and “xiang (向), dao (到), zai (在), yu (于)” during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WANG Zhouming

Graduat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saka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ve prepositions “*wang* (往), *xiang* (向), *da*o (到), *zai* (在), *yu*(于)”,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analyzes the co-occurrence behavior between “*wang* (往)” and the other four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syntactic feature, semantic bleaching and imbalance of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語彙交替と文法形式

—飲食動詞の変遷を例として—

竹越　孝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要旨：本稿では、新たな語彙が出現する際に取る文法形式について論じる。「飲む」を意味する動詞は通時的に“喫”から“喝”へと交替したが、後者が本来は飲食の具体的な動作を表していたことの現れとして、出現期には数量詞を伴う表現が多いことを指摘する。このことは、もともと具体的な動作を表していた語が、意味の抽象化を経て、新たな語に置き換えられるという仮説に、一つの根拠を提供するものである。

1.　はじめに

1.1 飲食動詞の通時的変遷

飲食動詞とは「食べる」「飲む」といった経口摂取を意味する動詞の総称である。摂取の対象が固体か液体かによって動詞を使い分けるか否か、使い分けるとすればその境界がどこにあるか、といった問題は、「意味の場」（semantic field）の議論に興味深い素材を提供するものであり、その通時的変遷や地理的分布をめぐって、これまでいくつかの論考が公にされている。

中国語の飲食動詞をめぐる問題に先鞭をつけたのは王力 1958 であり、上古から六朝までは「食べる」が“食”、「飲む」が“飲”であったが、唐代から明代までは「食べる」「飲む」がともに“喫”になり、明代以降「飲む」に“呷”を前身とする“喝”が現れ、現代では「食べる」が“喫”、「飲む」が“喝”として使い分け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変遷の過程を描いている。この枠組を受けて、崔宰榮 2001 では上古以来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使用状況を整理し、解海江・李如龍 2004 では主に「食べる」類、呂傳峰 2006 では主に「飲む」類の動詞の交替状況を論じている。これらをまとめる形で、飲食動詞の全体的な変遷の状況を呂傳峰 2006 に基

づき示すと以下のようになる。

表 1：飲食動詞の通時的変遷（呂傳峰 2006）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近代漢語	現代漢語
食べる	食	食	喫	喫
飲む	飲	飲	飲/喫/喝	喝

大まかに見れば、近代漢語の時期になって「食べる」を意味する“喫”が“食”に置き換わり、「飲む」の領域にも拡張するとともに、新たな語彙“喝”が登場して“飲”、“喫”、“喝”の三者が並立する状態になった後、現代漢語に至って“喝”が残った、という変遷過程を描く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1.2 飲食動詞の地理的分布

中国語の飲食動詞に関しては、通時的変遷の議論と相互に補完する形で、その地理的分布をも考慮に入れる必要がある。Astrakhan 1998 は、中国語のある方言では“喫”を「酒を飲む」（drink wine）については用いるものの「茶を飲む」（drink tea）には用いず、またある方言では“喫”を「茶を飲む」については用いるものの「酒を飲む」には用いない、といった状況があることを分布図とともに提示している[1]。同論によれば、“喫”の使用領域は以下の四類型に分かれることになる。

表 2：“喫”の使用領域の方言分布（Astrakhan 1998）

類	方言	食べる	茶を飲む	酒を飲む
A	普通話、北方官話、徐州、西安、江蘇北部、合肥、泰州、東干語	＋	－	－
B	淮陰、高郵、温州	＋	＋	－
C	塩城、句容	＋	－	＋
D	昆明、長沙、南昌、南京、揚州、成都、江蘇呉語、通如、老湘話	＋	＋	＋

この地理的分布を上に見た通時的変遷と重ねるならば、D 類が最も古い状態を反

[1] 同論ではさらに「煙草を吸う」（smoke）の用法についても検討の対象としているが、本稿ではその議論を省く。

映し、A 類が最も新しい状態を反映している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飲む」に対して“喫”以外の動詞を用いるようになる変化は、「茶」から始まるタイプ（B 類）と「酒」から始まるタイプ（C 類）があると推定される。こうした意味論的側面をも考慮した方言分布の分析は、解海江・李如龍 2004、中川・山下 2004、賈燕子・呉福祥 2017 などで行われるとともに、飲食動詞の地理的分布を総合的に提示したものとして、曹志耘主編 2008 所収の語彙巻 84「喫」、85「喝」、86「“喫－喝”説法的異同」、及び岩田礼編 2009 所収の 47「飲食動詞」（中川裕三作成）などがある。

本稿は、上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を踏まえて、飲食動詞の主体と対象、即ち「誰（何）が何を」経口摂取するかに留意しながら、北方方言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通時的変遷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して、「飲む」を意味する動詞がどのような形を取って現れてくるかに着目し、語彙交替の進行過程をめぐる議論に一つの材料を提供したいと思う。以下で用いる主要な語料は、朝鮮王朝時代の中国語教科書『老乞大』『朴通事』における異なる版本と、明代の白話小説『金瓶梅詞話』である。

2. 『老乞大』・『朴通事』における飲食動詞

2.1 概況

『老乞大』と『朴通事』は、ともに高麗（918-1392）の末期に編纂され、朝鮮王朝（1392-1910）を通じて通訳養成機関たる司訳院で使用された中国語会話教科書である。時代の変遷に応じて改訂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から、北方方言における語彙・語法及び音韻の変化を知る上でまたとない好条件を持つ資料と言える。本稿で使用するテキストは次の通りである。『老乞大』では元代の言語を反映する『旧本老乞大』（14 世紀末？）、明代の言語を反映する『翻訳老乞大』（1517 年以前）、そして清代の言語を反映する『老乞大新釈』（1761 年）と『重刊老乞大』（1795 年）の四種を対象とする。また『朴通事』では元本の系統が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ので、明代の言語を反映する『朴通事諺解』（1679 年）[2]、及び清代の言語を反映する『朴通事新釈』（1765 年）の二種を対象とする。なお、全体的に見て『老乞大』は後代の版本において前代の版本の内容を比較的忠実に踏襲する傾向が強いのに対し、『朴通事』

[2] 『朴通事』の明本系統としては、『翻訳老乞大』とほぼ同時期に成立した『翻訳朴通事』があるが、上巻しか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ため、漢字部分がそれとほぼ等しい『朴通事諺解』を用いる。

では『諺解』と『新釈』の間で内容の差異が大きく、後者で句や場面を丸ごと削除したり書き換えたりしている場合もある。

以上の『老乞大』四種、『朴通事』二種における主な飲食動詞の用例数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3]。

表 3：『老乞大』『朴通事』における飲食動詞

	老乞大				朴通事	
	旧本	翻訳	新釈	重刊	諺解	新釈
喫	106	105	119	114	71	56
喝	1	1	7	11	1	0
飲	11	11	8	8	3	7

この表によれば、『老乞大』において「飲む」を意味する“喝”が清代改訂本の段階から増え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以下では、各版本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使用状況を、その主体と対象に留意しつつ検討する。

2.2 『旧本老乞大』・『朴通事諺解』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主体と対象

2.2.1 『旧本老乞大』

まず、『老乞大』『朴通事』の最も古いテキストにおける使用状況を見る。

『旧本老乞大』における“喫”は全部で 106 例見られるが、うち主体が人の例は 85 例、馬あるいは家畜の例は 18 例、桶（帖落）の例は 3 例[4]である。以下では、「主体－対象の類」と総数を掲げ、その後に具体的な対象と次数を挙げる。対象が複数にわたる場合は「＋」で繋ぐ。

（1a）人－飯類 41：飯 31、茶飯 7、淡飯 2、早飯 1。

（1b）人－主菜副菜類 11：餅 2、乾物事 2、鹽瓜兒 2、燒餅 1、熟菜蔬 1、酒肉 1、餅等 1、燒餅＋肉 1。

（1c）人－湯麺粥類 9：粥 4、薄粥 1、酪解粥 1、湯 1、醒酒湯 1、濕麺 1。

（1d）人－薬類 3：藥餌 1、檳榔丸 1、檳榔丸＋生薑湯 1。

（1e）人－酒類 15：酒 14、冷酒 1。

[3] 飲食を意味しない用例の数は除く。また『老乞大新釈』『朴通事新釈』における“喫”の表記は“吃”であり、『朴通事諺解』における“喝”の表記は“欱”である。

[4] いずれも「桶に水が入る」の意味で使われている。金文京等 2002 参照。

（1f）人－無表示 6。

（2a）馬－草料類 11：草 5、料 3、草料 2、和草 1。

（2b）馬－水類 3：水 3。

（2c）馬－無表示 1。

（2d）頭口－草料類 3：草 1、草料 1、稻穰 1。

（3）帖落－水類 3：水 3。

『旧本老乞大』における“喝”は、“俺不打火，喝風那甚麽？”「我々が火を使わない（食事をしない）というなら、風でも食らえというのか」（第 15 話，6a9）[5]の 1 例のみである[6]。

『旧本老乞大』における“飲”は、「飲ませる」が 8 例、「飲む」が 3 例。「飲ませる」の例はすべて「人が馬に水を飲ませる」であり[7]、「飲む」の例は「馬が水を飲む」が 2 例、「人が酒を飲む」が 1 例である。

2.2.2 『朴通事諺解』

『朴通事諺解』における“喫”は 71 例、うち主体が人の例は 65 例、動物の例は 6 例である。上と同様に、対象ごとに分類して示すと以下の通り。

（4a）人－飯類 25：飯 22、筵席 1、飯湯 1、和和飯 1。

（4b）人－主菜副菜類 15：蘿蔔 2、酸甜腥葷等物 1、生果子 1、海菜乾魚脯肉 1、紫蘇 1、荇荏 1、茶芽 1、軟肉薄餅 1、粔籹 1、祭星茶果 1、桃肉 1、金橘蜜煎銀杏煎 1、榛子 1、生薑料物葱蒜醋 1。

（4c）人－湯麺粥類 3：湯 1、粥 1、稍麥粉湯 1。

（4d）人－薬類 3：香蘇飲子 1、藿香正氣散 1、進食丸 1。

（4e）人－酒類 9：酒 9。

（4f）人－茶類 4：茶 3、淡茶 1。

（4g）人－その他 2：山 1、水 1。

（4h）人－無表示 4。

（5a）馬－草料類 4：草 2、料 1、料水 1。

---

[5] 『老乞大』『朴通事』の挙例にあたっては、各版本の影印本により話数と（巻）葉・表裏・行を示す。

[6] 金文京等 2002 によれば、これは食べる物がない時の慣用表現であり、“喝西風”、“喝西北風”ともいう。

[7] “飲”は「飲ませる」の意味と「飲む」の意味では声調が異なり、『翻訳老乞大』のハングル注音ではそれが声点の数に反映されている。遠藤光暁 1990 参照。

（5b）頭ロ－草料類 1：稻草 1。

（5c）老鼠－米類 1：米 1。

『朴通事諺解』における“喝”は、“欱”の表記で“你来欱汁熱着”「お前は汁を飲んで温まれ」（第 93 話，下 33b6）という 1 例のみ見られる。『老乞大』と『朴通事』には『翻訳老乞大・朴通事』の編者崔世珍（1467-1543）の手になる注釈書として『老乞大集覧』と『朴通事集覧』があり、この箇所に対する注釈として、『朴通事集覧』では“喝汁：詳見老乞大集覽這湯下”（下 7a6-7）とし、『老乞大集覧』の該当部分では次のように記されている。

（6）湯即粉羹也。凡人買燒餅饅頭而食者、必有湯并欱之用以解渴、亦曰欱汁。如本國所云床花羹。（上 3a1-2）

『朴通事』本文及び『老乞大集覧』で“欱”に作るものを『朴通事集覧』では“喝”に作ることから、当時“欱”と“喝”が通用していたことを知り得る。

『朴通事諺解』における“飮”は 3 例あり、いずれも「人が酒を飲む」の例である。

2.3 改訂と増補の状況

2.3.1 全体の状況

以上の主体と対象に対する分類を踏まえ、『老乞大』『朴通事』の諸版本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改訂と増補の状況を示すと下の表のようになる。数は用例数を表し、「＋」は同じ語彙が増補された数、「/」は違う語彙で表される場合を示す。

下の表において目立つ傾向は、『老乞大』諸版本において『旧本老乞大』と『翻訳老乞大』はほぼ大差のない状態であるのに対し、清代の改訂版である『老乞大新釈』及び『重刊老乞大』では、「人が酒を飲む」の場合に“喫”が“喝”に一部置き換えられ、「馬が水を飲む」の場合に“飮”が“喝”に一部置き換えられることである。

以下では、『老乞大新釈』、『重刊老乞大』及び『朴通事新釈』における改訂と増補の状況を具体的に見ていくことにしたい。

表 4：『老乞大』『朴通事』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改訂と増補

主体	対象	老乞大				朴通事	
		旧本	翻訳	新釈	重刊	諺解	新釈
人	飯	喫 41	喫 41	吃 39+9	喫 48	喫 25	吃 18+3
	主菜副菜	喫 11	喫 11	吃 11+2	喫 13	喫 15	吃 8+6
	湯麺粥	喫 9	喫 8	吃 8+2	喫 10	喫 3	—
						飲 1	—
	薬	喫 3	喫 3+1	吃 4	喫 4	喫 3	吃 2
	酒	喫 15	喫 15	吃 15+2	喫 12/喝 5	喫 9	吃 3+6/飲 1
		—	—	喝 3	喝 2		
		飲 1	飲 1	飲 1	飲 1	飲 3	飲 3+3
	茶	—	—	吃 1	喫 1	喫 4	吃 2/用 1
	その他	喝 1	喝 1	喝 1	喝 1	喫 2	吃 2
		—	—	吃 3	喫 3		
	無表示	喫 6	喫 6	吃 5	喫 5	喫 4	吃 3
馬	草料	喫 11	喫 11+1	吃 12+1	喫 13	喫 4	吃 1+1/喂 1
	水	喫 3	喫 3	吃 1	喫 1	—	—
		飲 10	飲 10	飲 7/喝 3	飲 7/喝 3		
	無表示	喫 1	喫 1	吃 1	喫 1	—	—
頭口	草料	喫 3	喫 3	吃 3	喫 3	喫 1	—
老鼠	米	—	—	—	—	喫 1	吃 1
帖落	水	喫 3	喫 1/沈 2	盛 1/沈 2	盛 1/沈 2	—	—

2.3.2 『老乞大新釈』・『重刊老乞大』

まず“喫”の例では、『老乞大新釈』において増補された飲食動詞としての“吃”は 20 例あり、そのうち主体が人の例は 19 例、馬の例は 1 例ある。

（7a）人－飯類 9：飯 5、飯菜 2、酒席湯飯 1、飯＋湯 1。

（7b）人－主菜副菜類 2：蘿蔔生葱茄子 1、燕窩等 1。

（7c）人－湯麺粥類 2：粥 1、空湯 1。

（7d）人－酒類 2：酒 1、到門盞 1。

（7e）人－茶類 1：茶 1。

（7f）人－その他 3：家裏有的 1、東西 1、冷物 1。

（8）馬－草料類 1：料水＋草 1。

“喝”の例では、『老乞大新釈』において『旧本老乞大』『翻訳老乞大』の“飲”を“喝”に改訂するものが 3 例で「馬が水を飲む」の場合、“喝”を用いた句を増補するものが 3 例で「人が酒を飲む」の場合、『重刊老乞大』において『旧本老乞大』『翻訳老乞大』『老乞大新釈』の“喫”を“喝”に改訂するものが 5 例でいずれも「人が酒を飲む」の場合である。『重刊老乞大』はその約 30 年前に刊行された『老乞大新釈』の改訂をある種行き過ぎと捉え、それを保守的な方向に戻すことが編纂の一つの意図であったとされるが[8]、“喫”と“喝”に関してはむしろ革新的な方向に改訂していることが注目される。

なお、“飲”の例が新しく増補されたり、他の語彙から“飲”に置き換えられたりした例は見られない。

2.3.3 『朴通事新釈』

まず“喫”の例では、『朴通事新釈』において増補された飲食動詞としての“吃”は 16 例あるが、そのうち主体が人の例は 15 例、馬の例は 1 例である。

（9a）人－飯類 3：飯 3。

（9b）人－主菜副菜類 6：羊 1、匾食 1、點心 1、猪羊鵝鴨等類 1、冬瓜西瓜等 1、羊肉饅頭等 1。

（9c）人－酒類 6：酒 6。

（10）馬－草料類 1：草 1。

“喝”の例では、『朴通事諺解』における“欱”は『朴通事新釈』に受け継がれず、該当箇所は削除されている。

“飲”の例では、『朴通事新釈』において増補された飲食動詞としての“飲”は 3 例で、いずれも「人が酒を飲む」の場合である。

2.4 飲食動詞の使用傾向

以上に見てきた『老乞大』四種、『朴通事』二種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使用傾向を見てみると次の通りである。

“喫”は各版本において最も広範に用いられる飲食動詞であり、主体が人であっても動物であっても、その対象に固体・液体の区別はない。また、清代改訂版でも対象が液体の場合に“喫”で増補される場合があり、この段階でもまだ生産力を失

[8] 太田辰夫 1990、汪維輝 2015 等を参照。

っ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が窺われる。

“飲”は主に「人が酒を飲む」場合と「馬が水を飲む」場合で用いられるが、前者の例では俗諺・詩詞・慣用表現の中で用いられるものが目立つ。例えば、“滿飲一盞”(『旧本老乞大』第 49 話，18a10)；“張弓有別力，飲酒有別腸”(『朴通事諺解』第 28 話，上 49b3)；“對客飲酒吟詩句”（同第 64 話，中 44a3)；“自飲自歌”（同第 102 話，下 50b11)；“開懷暢飲”(『朴通事新釈』第 1 話，3a1）などがあり、総じて文語的色彩が強いと言える。

“喝”が使用されるのは、『老乞大新釈』と『重刊老乞大』においては「人が酒を飲む」及び「馬が水を飲む」の場合に限られるが、「人が酒を飲む」の例では“喝＋数量詞（＋名詞)”の形式を取るものが目立ち、『老乞大新釈』及び『重刊老乞大』で増補あるいは“喫”から改訂された 8 例の“喝”のうち 6 例を占めている。例えば、“喝幾鍾酒”(『老乞大新釈』第 29 話，12b6)；“喝一鍾”（同第 48 話，20b2)；“喝幾盞酒”(『重刊老乞大』第 48 話，19b2, 19b3)；“喝一杯酒”(同第 59 話，23b10)；“喝一兩杯”（同第 59 話，24a2）などである。以下に、『老乞大新釈』の段階で増補された例と、『重刊老乞大』の段階で改訂された例を挙げる。

（11a）咱急急的收拾了行李，鞴了馬時，大明也。(旧本第 29 話，11a8-9)

（11b）咱急急的收拾了行李，鞁了馬時，天亮了。(翻訳，上 38a8-38b1)

（11c）穿上衣裳，喝幾鍾酒，收拾行李鞴馬，天亮了。(新釈，12b5-7)

（11d）穿上衣裳，喝幾鍾酒，收拾行李鞴馬，天亮了。(重刊，12a4-5)

（12a）且停些時，咱每聊且喫一盞酒，不當洗塵。(旧本第 59 話，21b9-10)

（12b）且停些時，咱們聊且喫一盃酒，不當接風。(翻訳，下 6b4-6)

（12c）且停些時，咱們聊吃一杯酒，接風不好麼？(新釈，24b10-25a1)

（12d）且停些時，咱們聊喝一杯酒，接風不好麼？(重刊，23b10)

清代改訂本から本格的に使用され始めた“喝”に数量詞を伴う例が多いことは何を意味しているのか、次節の後に考えることとする。

3. 『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飲食動詞

3.1 概況

次に、近代漢語の範疇にあって、ちょうど“喝”系の動詞が登場し“喫”系と共存し始めた頃の状況を反映するものとして、笑笑生撰『金瓶梅詞話』を取り挙げて検討する。成書は明の万暦 10 年から 30 年（1582-1602）の間とされ、現存する最

古の刊本には万暦 45 年（1617）の序がある。同書の基礎方言については諸説あるが、概ね北方方言を反映していると見なすことに問題はないであろう[9]。また、同書に飲食の描写が多いことも本稿の考察にとって有利である。

『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主な飲食動詞の用例数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なお、地の文で用いられた数と会話部分で用いられた数を区別せず、また飲食動詞以外の用法で使用された例は除く。

表 5：『金瓶梅詞話』に見られる主な飲食動詞の用例数

飲食動詞	吃	飲	呷	呵
用例数	2325	236	27	7

『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喝”には飲食動詞としての使用例がなく、“呷”と“呵”が用いられている。王力 1958 及び同 1993 は“呷”を“喝”の前身と捉え[10]、平山久雄 1997 は音韻対応の面からこれを批判するが[11]、例えば“呷呷笑道”（第 15 回 6b7）[12]と“呵呵笑了”（第 12 回 14b11 など 7 例）、“呵叱”（第 62 回 14b3）と“喝叱”（第 65 回 13a2）のように、似通った表現の中で使われる例があることから、同書では“呷”、“呵”、“喝”の三者が近似音であった可能性がある。

3.2 飲食動詞の対象

『金瓶梅詞話』において使用された“吃”では、主体が人の例は 2311 例、動物の例は 14 例である。動物の例はほとんどが俗諺や詩詞の中で用いられるものなので対象としない[13]。主体が人の場合の対象と次数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ほぼ同義もしくは類義と考えられる対象は「/」で繋ぐ。

---

[9] 太田辰夫 1969：「ストーリーの地点が山東であるし、作者も蘭陵の人としているから、山東方言が用いられている可能性はあるが、《醒世姻縁伝》ほど明確ではないから、北方語としておくのがよいであろう。」（p. 257）

[10] 王力 1993：“‘喝’的前身是‘呷’。《説文》：‘呷，吸呷也。’‘吸呷’是象聲詞，還不是吸飲的意思。吸飲的‘呷’大約起源於南北朝。唐代以後沿用。……‘呷’，呼甲切，是入聲字。今呉方言仍讀入聲，表示吸飲。宋元以後，北方話入聲消失，音變爲‘喝’。”（pp. 110-111）

[11] 平山氏は大島吉郎 1989-1994 の調査に拠りつつ、『金瓶梅詞話』においては“呵”を“喝（欲）”に連なる存在と見ている。

[12] 『金瓶梅詞話』の挙例にあたっては、大安影印本により回数と葉・表裏・行を示す。

[13] 主体が動物である 14 例の内訳は以下の通り：狗 3、老虎 2、蛇 1、促織 1、仙鶴 1、鷂鶯 1、老鸛 1、斑鳩 1、錦鷄 1、滔鳶 1、老鴉 1。

（13a）飯類 379：飯 247、酒飯 23、齋 12、茶飯 11、湯飯 10、夜飯 7、早飯 5、飲食 4、飯食 4、齋食 4、雌飯 4、湯飯點心/點心湯飯 4、晚飯 3、午飯 3、午齋 3、齋饌 3、家飯 3、米飯 2、冷飯 2、湯飯點心下飯 2、錢粮 1、羹飯酒肴 1、點心茶飯 1、齋飯 1、飯粥 1、齋食素饌 1、自在飯 1、早齋 1、酒肉湯飯 1、衣飯 1、白米水飯 1、便飯 1、茶飯粉湯 1、中飯 1、宿飯 1、齋供 1、長齋 1、素菜齋食 1、筵席 1、肉湯子泡飯 1、飯菜 1、酒＋飯 1、飯＋茶 1。

（13b）主菜副菜類 267：點心 28、酒肉 11、餅 11、螃蟹 10、菓子/果子 10、茶食 10、菜 8、下飯/嗄飯 6、酒＋肉 6、肉 5、酒食點心 5、飲饌 5、衣梅 5、角兒 4、酒食 3、酒菜點心 3、下飯點心/點心下飯/點心嗄飯 3、東道 3、瓜仁/瓜仁子 3、水角 3、酒＋菜 3、橘皮 2、菜蔬 2、捲餅 2、鮮蓮蓬子 2、瓜子 2、燒猪頭 2、菓餡餅 2、糖 2、元宵 2、臘肉 2、魚 2、紅棗 2、檀香餅 2、下飯菜 2、小菜 2、泡螺 2、猪 2、柑子 2、燒餅 2、酸笋 2、猪頭肉/猪頭 2、螃蟹等 2、鴿子雛兒等 2、穗子＋瓜仁子 2、柑子＋石榴 2、酒＋梨子＋柑子 2、荷花餅 1、猪毛皮 1、茶湯點心 1、蒸酥菓餡餅 1、海青捲 1、豆腐 1、沙糖拌蜜 1、生菓子 1、乾臘 1、李子 1、饊子 1、荸薺 1、肉絲細菜 1、餅定 1、細菓 1、匾食 1、包兒 1、肴饌 1、蒜 1、鰣魚 1、鮮物 1、枇杷 1、乾糕餅食 1、糖糕餅果 1、鮮果殘饌 1、紅梭 1、醬瓜 1、菜蔬肉絲捲 1、牛肝乾魚 1、生肉 1、嗄飯肴品 1、團兒 1、黃芽韮猪肉 1、酒饌 1、酒菜 1、黃芽韮菜肉包 1、點心瓜子 1、菓仁 1、春餅 1、茶食點心 1、熟食肉麵 1、鷄肉 1、玫瑰果餡餅 1、頂皮酥玫瑰餅 1、餡肉角兒等 1、燒鵝肉等 1、小菜等 1、素菜等 1、臘肉等 1、肉員子等 1、肉酢等 1、燒鴨等 1、菜蔬下飯＋酒 1、酒＋點心 1、菜＋粳米粥 1、酥燒＋酒 1、湯＋蒸餅 1、酒＋菜 1、燒鴨子＋白酒 1、茶食＋點心 1、燒猪頭肉＋鴨子 1、螃蟹＋燒鴨子 1、粥＋乳餅 1、下飯＋點心 1、酒肉＋點心茶水 1、匾食＋酒 1、菓子＋蜜餞 1、肉＋饅頭＋酒 1、下飯＋酒＋點心 1、乾糕＋檀香餅＋茶 1。

（13c）湯麵粥類 115：粥 53、麵 10、湯水 5、梅湯 5、湯 4、壽麵 4、毒藥汁 4、粥湯 3、合汁 3、定心湯 3、小米兒粥 3、鷄尖湯 3、迷魂湯 2、豆粥 2、和合湯 2、濕麵 2、姜湯 1、炒麵 1、汁湯 1、八寶攢湯 1、茶湯 1、紅花湯 1、湯麵 1。

（13d）藥類 111：藥 80、胡僧藥 6、丸藥/丸子藥 6、符藥 4、心疼藥 3、三七藥 3、延齡丹/延壽丹 3、和尚藥 1、官藥 1、補藥 1、符水藥 1、蠟丸 1、藥＋酒 1。

（13e）酒類 925：酒 819、金華酒 14、燒酒 11、暖酒/煖酒 10、素子酒 6、南酒

4、葡萄酒 4、生日酒 4、茉莉花酒/茉莉酒 4、慶官酒/慶官哥兒酒 4、早酒 3、會親酒 3、薬五香酒 3、白泥頭酒 3、節酒 3、冷酒 2、咂酒 2、看燈酒 2、南燒酒 2、頭腦酒/頭腦 2、進門盞 1、喜酒 1、白酒 1、熱酒 1、寡酒 1、艾酒 1、荷花酒 1、河清酒 1、紅面酒 1、黃酒 1、菊花酒 1、樂工酒 1、淡酒 1、火酒 1、接風酒 1、公宴酒 1、滿月酒 1、藥酒 1、麻姑酒 1、雄黃酒 1。

（13f）茶類 329：茶 309、清茶 4、木稞金燈茶 3、茶水 2、香茶 2、寬蒸茶 1、江南鳳團雀舌牙茶 1、六安茶 1、梅茶 1、菓仁茶 1、姜茶 1、甜水茶 1、芫荽芝麻茶 1、艷茶 1。

（13g）水類 9：水 5、洗脚水 2、符水 1、凉水 1。

（13h）その他 63：東西 12、妳/妳子 8、素/素的 8、牛奶子 5、臉 2、屄2、我 2、厚味 2、甜行貨子 2、葷/葷的 2、橄欖灰 1、稀奇之物 1、無名之食 1、你 1、生冷 1、他 1、馬糞 1、大鱗桃 1、仙桃 1、醋 1、祭品 1、搭連 1、鹽米 1、人肉 1、毒 1、總律心等 1、龍肝鳳髓等 1、鴈卵石＋牛騎角 1。

（13i）無表示 113。

“飲”は「飲ませる」が 2 例で「人が馬に水を飲ませる」の場合、「飲む」が 234 例で「人が酒を飲む」の場合である。主体が人の場合の対象は以下の通り。

（14）酒類 234：酒 227、香膠 4、熱酒 1、喜酒 1、玉液 1。

“呷”は 27 例、主体はすべて人である。対象は以下の通り。

（15a）飯類 2：粗飯 2。

（15b）主菜副菜類 2：衣梅 1、泡螺 1。

（15c）湯麺粥類 7：粥 2、湯 1、粥湯 1、汁水 1、梅湯 1、清湯 1。

（15d）藥類 3：薬 3。

（15e）酒類 6：酒 6。

（15f）茶類 5：茶 2、細茶 1、冷茶 1、六安雀舌芽茶 1。

（15g）水類 1：氷水 1。

（15h）その他 1：牛奶子 1。

“呵”は 7 例、主体はすべて人である。対象は以下の通り。

（16a）湯麺粥類 2：湯 2。

（16b）酒類 1：酒 1。

（16c）茶類 3：茶 3。

（16d）その他 1：牛奶子 1。

以上の飲食動詞における用例数を対象ごとに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ようになる。

表 6 :『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対象

	飯	主副菜	湯麺粥	薬	酒	茶	水	その他	無表示	合計
吃	379	267	115	111	925	329	9	63	113	2311
飲	0	0	0	0	234	0	0	0	0	234
呷	2	2	7	3	6	5	1	1	0	27
呵	0	0	2	0	1	3	0	1	0	7

この表によれば、“吃”と“呷”は対象が固体・液体の区別なく用いられるものの、“飲”と“呵”では対象がほぼ液体に限られるようで、特に“飲”は専ら“酒”に対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

3.3 飲食動詞の使用傾向

以下に『金瓶梅詞話』におけるそれぞれの飲食動詞の使用傾向を見ていくことにしたい。

“吃”は最も用例数が多く、またその対象も広範で、固体・液体の区別なく用いられている。

“飲”はそのほとんどが地の文で現れ、“飲酒”の例が全体の三分の二にあたる 151 例を占める。その他の例でも、“滿飲”が 4 例（第 1 回 17b9 など)、“飲之”が 4 例（第 34 回 10b10 など)、“～而飲”が 3 例（第 6 回 6b8 など）のように、文語的な表現の中で多く見られる。

“呷”は対象に固体・液体の区別がない。そのうち、“呷＋口（＋名詞)”が 17 例（うち“呷了一口”が第 1 回 18b5 など 13 例)、他に“呷在口内/裡”が 3 例（第 67 回 3a3 など)、“呷（了）一呷”が 2 例（第 4 回 7a7 など)、“呷（了）半碗”が 2 例（第 53 回 7b7 など）のように、数量詞を伴う表現が多い。

“呵”の対象はほぼ液体に限られる。その内訳は、“呵＋口＋名詞”が 3 例（“呵口茶兒”第 34 回 14b11 ;“呵了兩口湯”第 68 回 8b11 ;“幾口就呵”第 67 回 3a4)、“呵＋量詞＋名詞”が 2 例（“呵甌子酒”第 33 回 3b10 ;“呵了一甌子茶”第 50 回 8a11)、“呵＋些＋名詞”が 2 例（“呵些湯”第 40 回 4a3 ;“呵了些茶”第 72 回 3a10）であり、ほぼ数量詞を伴う表現に限られる。

このように、『金瓶梅詞話』において“吃”は最も用例数が多くかつ広範な対象に用いられ、“飲”は文語的な色彩が強く、“呷”や“呵”は数量詞とともに用いら

れる例が多い。これは言うまでもなく、上に見た『老乞大』『朴通事』における“喫”、“飲”、“喝”と共通する傾向である。

4. 考察

4.1 飲食動詞の変遷

以上に見てきた『老乞大』『朴通事』の諸版本と『金瓶梅詞話』の使用状況から、飲食動詞の変遷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る。

14 世紀から 18 世紀までの北方方言における最も無標（unmarked）な飲食動詞は“喫 (吃)”であり、その対象に固体と液体の区別はなかった。それに対して“飲”、“呷”、“呵”、“喝”は対象や用法に一定の制約を持つことから、有標（marked）な飲食動詞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飲”は文語として「人が酒を摂取する」、口語として「人が家畜に水を摂取させる」あるいは「家畜が水を摂取する」という限定された文脈でのみ使用されたので、固体・液体の区別がない“喫”とも共存可能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喝”、“呷”、“呵”は数量詞を伴う表現が多いことから見て、その出現当初は特定の摂取の仕方を表す動詞であり、それが後に液体一般の摂取を表すものへと拡張したと考えられる。“呷”あるいは“呵”と“喝”との淵源関係如何について、本稿は充分な判断材料を持たず[14]、また液体への拡張が「酒」から進行する方言と、「茶」から進行する方言が存在することの理由についても、本稿の調査の範囲では特に見通しを得られないが、「酒」や「茶」が、例えば「吸う」、「あおる」、「すする」といった特定の摂取の仕方を許容する対象であることが関係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想像される。つまり、吸ったり、あおったり、すすったりする対象として、「酒」と「茶」のどちらがその地域においてポピュラーであったかによって、この差異が生まれたと考える。

4.2 語彙交替の動機とメカニズム

以上に述べた飲食動詞の通時的変遷は、液体の摂取、即ち「飲む」の領域における“喫”から“喝”への語彙交替（lexical replacement）の過程と捉えることができ

[14] なお、大島吉郎 1989-1994 によれば、「飲む」を意味する“喝”の最も早い使用例として、『永楽大典戯文三種』所収の『張協状元』に 2 例、『元刊雑劇三十種』所収の『単刀会』、『七里灘』に各 1 例が挙げられるという。

るが、その動機とメカニズムに関しては、平山久雄 1997 の考察が示唆に富んでいる。平山氏は趙元任 1948 の説に基づいて“喝”の前身を“欱”に求め[15]、古今の文献を引いて詳細な考証を行うとともに、“欱”は本来の「吸い取る」の意味から、①吸い取る動作を続ける、②吸い取って口中に含む、③液体を吸い取って口中に含む、④液体を吸い取って口中に含み嚥下する、といった一連の意味拡張を経て一般的な「飲む」の意味を獲得し、その後“喫”の領域を侵食していったとして、その過程を次のように推定している。

> 我們可想像：“欱”變為飲義以後，“喫”在口語裏也仍然表示飲義，正如現在表示“視”義“瞧”、“看”並用那樣，只是因為“欱”多少帶一點飲取動作（啜取而吞下）的具體形象，給人以更生動的印象，所以口語中用得越來越多，終於把“喫”驅逐了。(p. 178)

ここで平山氏は、“欱”という動詞が吸い取って飲み込むという動作の具体的なイメージを伴い、それが人々に生き生きとした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から、口語の中で使用領域を拡大し、最終的に“喫”を駆逐したとしている。

本稿で見た“喝”、“呷”、“呵”に数量表現を伴う用例が多いという事実は、この説に一つの裏付けを与えるものと言えるだろう。数による修飾を受けるということは、動詞の定性（definiteness）を担保する、即ちその動作が概念的・抽象的なものではなく、その場で現実に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示すからである[16]。このことは、“喝”系の動詞がもともと特定の摂取の仕方を表していたという想定とも矛盾しない。

この推定は本稿で行った調査の範囲のみから支持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い。実は、この問題に先鞭をつけた王力 1958 が“喝”の早期の用例として挙げている『西遊記』の 2 例も、ともに数量詞を伴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 （17）衆怪聞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風，將椰酒滿斟一石碗奉上，大聖喝了一口。（第 5 回）
>
> （18）却説那怪物坐在上面，自斟自酌，喝一盞，扳過人來，血淋淋的嗐上兩口。（第 30 回）

「飲む」の領域における“喫”から“喝”への交替は、本来具体的な動作を表していた“喝”が、抽象的な意味を表すものであった“喫”に取って替わる過程であり、そのことは王氏が問題を提出した段階から既に示唆されていたと言える。

---

[15] 趙元任 1848：“‘喝’字在今官話區有‘吆喝’話‘喝水’兩義。用在第二義時原當寫作合韻（亦見盍韻）的‘欱’字。這次調查中，惜未問清‘喝’字的用法。好在湖北不分合韻（或盍韻）的 -p 尾與曷韻的 -t 尾，無大礙。”（p. 18）

[16] ここで言う「定性」とは、沈家煊 1995 等で議論される「有界性」とほぼ同義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本稿では、中国語北方方言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の通時的変遷に対する考察を通じて、「飲む」を意味する動詞が本来は特定の摂取の仕方を表す具体的なものであり、その現れとして、出現当初には特定の文法形式と親和性が高い、ここでは数量詞を伴う場合が多いということ、そしてこの事実は平山久雄 1997 が提起した飲食動詞の交替をめぐる仮説に一つの根拠を提供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を述べた。

平山氏は飲食動詞の変遷をめぐる分析から得られた知見を一般化して、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既に概念化・抽象化された古い語彙が、より現実的で具体的なイメージを持つ新しい語彙に置き換えられるのは、語彙交替におけるパターンの一つであり、交替の完成に伴って、置き換わった新しい語彙もまた概念化・抽象化の道をたどる、それは勝者の運命（“勝利者的命運”）である、と[17]。かつて、梅祖麟 1981 は語彙の新陳代謝たる語彙交替をリレー競走に喩え、一人の走者が走り疲れた時、別の走者がそのバトンを受け継いで走ると形容したが[18]、これに平山氏の主張を重ね合わせたとき、我々はこのメタファーを、意味の抽象化とその解消という不断の過程として捉え直す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付記 : 本稿は、次の二つの口頭報告を基礎とし、今回全面的に改稿したものである : 「飲食動詞の通時的変遷」（日本中国語学会第 54 回全国大会，2004 年 11 月 7 日，京都大学）;「飲食動詞的歴史演変与地理分布」（漢語的文献語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工作坊, 2015 年 10 月 25 日,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なお、本研究は JSPS 科研費 21K00483 の助成を受けている。

参考文献

太田辰夫 1969 金瓶梅詞話,『中国語学新辞典』光生館 257-258
太田辰夫 1990『老朴』清代改訂三種の言語,『中文研究集刊』2: 49-69
大島吉郎 1989-1994“喝”に關する若干の問題（1-6),『中国語研究』30: 28-39; 『語

[17] 平山氏はその例として王力 1958 で言及される“目”から“眼”へ、“行”から“走”への交替を挙げるとともに、平山久雄 2004 では“喫”が“食”に交替した過程においても同様の原理が働いたとしている。
[18] 梅祖麟 1981 : “句法結構不變，詞彙中的新陳代謝就像接力賽跑，一個運動員跑累了，另一個接棒跑下去。”（p. 66）

学教育研究論叢』7: 97-106; 8: 207-217; 9: 101-115; 10: 25-36; 11: 1-19
中川裕三・山下玲子 2004 中国語における飲食動詞について―通時的変化と現在の共時的分布の関係を中心に―,『歴史文献データと野外データの綜合を目指した漢語方言史研究』3: 152-160
曹志耘主编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全 3 册，商务印书馆
崔宰荣 2001 汉语“吃喝”语义场的历史演变,《语言学论丛》24: 151-190
霍生玉、陈建初 2009 语义场的古今演变——对“吃喝”义场演变轨迹的探析,《求索》2009(8): 197-199
贾燕子、吴福祥 2017 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吃”“喝”类动词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7(3): 361-381
解海江、李如龙 2004 汉语义位“吃”普方古比较研究,《语言科学》2004(3): 96-104
吕传峰 2006 近代汉语“喝类语义场”主导词的更替及相关问题,《语言学论丛》33
梅祖麟 1981 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 65-77；2000《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 1995“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1995(5): 367-380
平山久雄 1997 説「欲」――論飲義「喝」的來源,『訓詁論叢』3: 161-179
平山久雄 2004 试论“吃（喫）”的来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30-32
汪维辉 2015《重刊老乞大》对《老乞大新释》的修改及其原因,《语文研究》2015(2): 35-43
汪维辉 2018《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商务印书馆
王力 1958《汉语史稿》下册，中华书局；1988《王力文集》第 9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力 1993《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1990《王力文集》第 11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岩田礼编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趙元任等編 1948《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商務印書館
Astrakhan, E. B. 1998. Lexical items of the semantic field. O. I. Zavyalova and E. B. Astrakhan eds., *The Linguisitc Geography in China*, 『中国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1: 72-81+Map 17.

（使用語料・索引等）

遠藤光暁 1990『《翻譯老乞大・朴通事》漢字注音索引』開篇単刊 3，好文出版
金文京・佐藤晴彦・玄幸子訳注，鄭光解説 2002『老乞大―朝鮮中世の中国語会話読

本—』東洋文庫 699，平凡社
陶山信男 1973『朴通事諺解・老乞大諺解語彙索引』采華書林
大安 1963『金瓶梅詞話：明萬曆本』大安
竹越孝 2020『老乞大四種版本対照テキスト』研究叢書 63，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編 1968『金瓶梅詞話語彙索引』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
奎章閣 2003『老乞大・老乞大諺解』奎章閣資料叢書語學篇 1，서울大學校奎章閣
奎章閣 2003『老乞大新釋・重刊老乞大・重刊老乞大諺解』奎章閣資料叢書語學篇 2，서울大學校奎章閣
奎章閣 2004『朴通事諺解』奎章閣資料叢書語學篇 3，서울大學校奎章閣
奎章閣 2004『朴通事新釋・朴通事新釋諺解』奎章閣資料叢書語學篇 4，서울大學校奎章閣
李丙疇 1966『老朴集覽考』進修堂
慶北大學校 2000『元代漢語本《老乞大》』慶北大學校出版部
亞細亞文化社 1980『原本老乞大諺解（全）』亞細亞文化社
白维国、卜键校注 1995《金瓶梅词话校注》全 4 册，岳麓书社
白维国编 1991《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
汪维辉 200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全 4 册，中华书局

Lexical Replacement and Grammatical Form: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Verbs for ‘Eat’ or ‘Drink’

Takashi Takekoshi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grammatical form of new words that emerge from lexical replacement. The Chinese verb *chī,* meaning both ‘eat’ and ‘drink’, was replaced by the verb *hē* in the semantic field of ‘drink’ over time.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latter originally implied the action of taking food or drink, as it was often used with quantitative expressions. This confirms the hypothesis that verbs which originally describe specific actions become old through the meaning abstraction process and are replaced by newer verbs.